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
· 春夏卷 ·

簡帛研究



慶祝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周年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
· 春夏卷 ·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16. 春夏卷 / 楊振紅, 鄔文玲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95-8491-8

I. ①簡… II. ①楊…②鄔… III. ①竹簡—中國—
文集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153156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衡陽順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園藝村 9 號 郵政編碼: 421008)

開本: 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 23.25 字數: 50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1 200 冊 定價: 10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顧問

[日] 永田英正 李學勤 林甘泉 裘錫圭 [英] 邁克爾·魯惟一 饒宗頤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均明 卜憲群

主編

楊振紅* 鄔文玲*

編輯委員

卜憲群 王天然 [韓] 尹在碩 邢文 李均明 宋艷萍*
汪桂海 馬怡 [日] 初山明 侯旭東 莊小霞* 凌文超*
孫曉 [日] 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曾磊*
楊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凱 劉馳 劉樂賢 戴衛紅*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排列，加“*”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目 錄

楚簡用字習慣與文獻校讀舉例	禰健聰/1
再論郭店《老子》的“絕急弃慮”	李 銳/12
試用清華簡《筮法》解讀包山占卜記錄中的卦義	[美]柯鶴立/18
《清華簡(伍)》字詞零釋四則	蔡一峰/29
清華簡《繫年》所涉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疏證	楊 博/36
上博簡拾詁二則	王凱博/51
從勞力需求看秦代赦免制度	楊 琳 于振波/58
里耶戶籍簡三題	韓樹峰/67
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	黃浩波/81
里耶秦簡中的“田官”與“公田”	李 勉 晉 文/120
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	鄒水杰/132
從出土文書論秦代縣政令的下達與執行機制	吳方基/147
嶽麓書院藏秦簡《亡律》研究	周海鋒/163
嶽麓秦簡《亡律》“亡不仁邑里、官者”條探析	歐 揚/172
放馬灘秦簡《日書》所見“土忌”神煞考釋	梁 超/184
音聲與軍政：論秦漢軍鼓及相關問題	孫聞博/197

《二年律令·具律》所見“皆如耐罪然”試解	支 强/213
北大藏漢簡《蒼頡篇·顓頊》校釋與解讀	楊振紅 賈麗英/222
讀北大簡《蒼頡篇》札記	白軍鵬/251
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	李均明/256
東牌樓東漢簡《侈與督郵某書信》考釋二則	李世持 張顯成/265
白衣衛士試釋	熊 曲/273
吳簡所見復民身份考辨	蘇俊林/281
走馬樓吳簡紀日干支錯亂問題試探	連先用/294
漢代伏日及臘日：節日與地方統治	[韓]金秉駿/309
從簿籍的製作與管理看臨湘侯國 ——以名籍類為中心	[日]關尾史郎著 楊振紅譯/323
第三屆簡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綜述	單印飛/338
文字·文本·文明——出土文獻研究青年論壇綜述	吳雪飛/342
1900年以來出土簡帛一覽(續)	單育辰/345

楚簡用字習慣與文獻校讀舉例^{*}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 禰健聰

內容提要 梳理楚簡所見八例詞(葛,關,盈,種、種,輔,性,節,禁)的用字習慣,及在傳世文獻中的用字異同;結合用字習慣,對相關字詞的釋讀及文義理解提出意見。

關鍵詞 楚簡 用字習慣 文獻校讀

用字習慣是指人們記錄語言時選擇用哪一個字(形體)來記錄哪一個詞(音義)的習慣,此常因時代或地域不同而存在差異。裘錫圭先生謂:“文字的用法,也就是人們用哪一個字來代表哪一個詞的習慣,古今有不少變化。如果某種古代的用字方法已被遺忘,但在某種或某些傳世古書裏還保存着,就會給讀古書的人造成麻煩。秦漢文字資料表現出來的當時人的用字習慣,有時與保存在傳世古書裏的已被遺忘的用字方法相合,可以幫助我們讀通這些古書。”^①此於戰國文字資料,同樣適用。本文梳理八例楚簡所見戰國文字的用字習慣,并試對相關文獻用字情況或字詞釋讀提出意見,以就正於方家。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9CYY028)、廣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項目(YQ2013125)成果。

^① 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372頁。

《說文》：“葛，絺綌艸也。从艸、曷聲。”楚簡未見以“葛”記寫{葛}之例，{葛}多記寫作“藁”。

(1) 困於藁藁。(上博三《周易》簡43)

(2) 野有藁。(上博四《采風曲目》簡1)

例(1)“藁”對應今本《周易》困卦正作“葛”。例(2)“藁”整理者原釋“藁”，^①董珊先生謂字“从‘艸’、‘素(或索)’”。^②三體石經《春秋》僖公“葛”字古文作𦰩，與上述楚簡“藁”為一字之變。陳劍先生詳細分析了“索”旁演變之迹，指出例(2)“藁”以讀為{葛}最合適。^③郭永秉、鄔可晶先生進而認為，“藁”當是“藁”之省，後者所从之“剝”為{割}之初文，於字中作聲符，新蔡簡甲三263地名“藁丘”之“藁”，為不省“刀”旁之子遺。^④

上博七《鄭子家喪》篇有句云：

(3) 使子家利木三寸，疏索以紼，毋敢丁門而出，掩之城基。(甲本簡5，乙本簡5-6)

“疏索以紼”之“索”，與楚簡一般“索”字寫法無別，然古書中記述簡陋的束棺緘繩常為“葛”，如：

(4) 桐棺三寸，葛以紼之。(《墨子·節葬》)

(5) 空木為櫨，葛藁為紼。(《說苑·反質》)

例(4)“桐棺三寸”與例(3)“利木三寸”表述正同，又《左傳·哀公二年》：“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無入於兆”亦與例(3)“掩之城基”相合，皆指不以禮葬以為懲罰。^⑤“葛藁”《周易》困卦孔穎達疏謂“引蔓纏繞之草”，直接以藤葛為緘繩，正是簡陋之徵。由此可見，例(3)的“索”應視為“藁”之訛省，所記寫者，仍是{葛}。傳世文獻似亦有類似情況。如：

(6)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家語·六本》)

(7) 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墨子·尚賢中》)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5頁。

② 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收入其著《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3頁。

③ 陳劍：《上博竹書“葛”字小考》，《中國文字研究》2007年第1輯(總第8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68-70頁。

④ 郭永秉、鄔可晶：《說“索”、“剝”》，《出土文獻》第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99-118頁。

⑤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葛亮執筆)：《〈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89頁。

例(6)《列子·天瑞》所記略同,其中“鹿裘帶索”,向以為指粗劣衣物,然“索”多指繩索,以繩為帶與衣物粗劣義不密合。竊以為此“索”實亦“藁(葛)”之誤,“帶索”本作“帶藁”,即以葛為帶。葛帶與鹿裘皆指喪服。《禮記·郊特牲》:“葛帶、榛杖,喪殺也。”《禮記·檀弓上》:“鹿裘衡、長祛。”孔穎達疏:“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榮聲期喪服而歌,正示其樂,所謂“能自寬”也。例(7)“被褐帶索”亦見於《淮南子·齊俗訓》,又作“衣褐帶索”,見《荀子·富國》《淮南子·道應訓》,此“索”亦應是“藁(葛)”,指直接以葛藤為帶。

今本《詩·周南》“葛覃”之“葛”,上博一《孔子詩論》篇作“蒿”,或省作“萬”(簡16)。裘錫圭先生認為“蒿”是{害}的早期用字,而“害”與“禹”古音也相近,^①故可省作。{葛}記寫作“蒿”若“萬”,楚簡暫僅見於《孔子詩論》篇。

二

《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从門、𠂔聲。”又:“患,憂也。从心、上貫𠂔,𠂔亦聲。悶,古文从關省。患,亦古文患。”楚文字{關}皆作“闢”。

(1)王率宋公以城榆闢,是武陽。秦人敗晉師於洛陰,以為楚援。(清華二《繫年》簡126-127)

(2)《闢睢》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上博一《孔子詩論》簡10)

(3)田無蔡,宅不空,闢市無賦。(上博二《容成氏》簡18)

(4)四荒之內,是帝之闢。(上博五《三德》簡22)

(5)曰其罰時償,其德刑宜利,如闢拔不閉,而繩斷失揆,互相不彊,罔肯獻言。(清華三《芮良夫毖》簡22)

如例(2)之“闢睢”即《詩經》篇名“關雎”。楚簡以外,亦見於鄂君啓舟節(《集成》12113)。“闢”所从之“串”,當是“毌”之異構,作聲符。《說文》“患”下段注謂:“古毌多作串,《廣韻》曰:‘串,穿也。’親串即親毌。貫,習也。《大雅》:‘串夷載路’,《傳》曰:‘串,習也。’蓋其字本作毌,為慣、攢之段借也。”上博八《命》篇簡5云:“我不能睥睨而視聽。”“睥”从“串”聲,於句中讀為{貫},可證。《爾雅·釋詁下》:“串,習也。”義近於{慣},當即{貫}之意義引申。由此可知,《說文》以為“患”“𠂔亦聲”不確,段玉裁注謂:“此八字乃淺人所改竄,古本當作

① 裘錫圭:《釋“蚤”》,收入其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13頁。

‘从心、母聲’四字,母、貫古今字。古形橫直無一定。如目字偏旁皆作𠂔。患字上从母,或橫之作申,而又析爲二中之形,蓋恐類於申也。”《說文》謂“患”字古文“从關省”,亦可說明“聞”“患”的密切關係。

清華三《說命上》有句云:

(6) 惟攷人得說於傳嚴,厥倖繃弓,紳弣辟矢。(簡 1-2)

“弣”字从“弓”,“申”聲,字書無載。整理者認爲當讀“關”,訓爲“引弓”。^①《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杜預注:“注,傳矢;關,引弓。”古書又作“貫”,《史記·伍子胥列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司馬貞索隱:“劉氏音貫爲彎,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關”“貫”過去學者多以爲當讀“彎”,《集韻·刪韻》:“彎,《說文》:‘持弓關矢也。’《左氏傳》作關,或作貫。”《孟子·告子下》:“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戴震以“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爲音轉。^②《漢語大字典》亦以爲“關”“貫”通“彎”。^③《說文》:“彎,持弓關矢也。从弓、繼聲。”以“關矢”釋“彎”,與例(6)“弣”後接“辟矢”同例。簡文“紳”整理者讀爲“引”,^④可從。則“弣”不當訓爲“引”,疑是指置矢於弓持滿待發,以“弣”爲本字。“弣”“聞”皆从“申”得聲,“申”又是“母”之異構,故傳世古書多以“關”“貫”記寫。

齊文字{關}多作“聞”,如齊璽“行人聞”(《璽彙》173)、左關鉤“左聞之鉤”(《集成》10368)等。“關”即“聞”之繁構,出土文獻見於睡虎地秦簡等。《說文》以爲“關”从“𠂔”聲,“𠂔”實不成字,其“𠂔”旁應爲“絲”旁之變,“絲”即{聯}之表意初文,金文或从“車”,如長陵盃“有蓋緘梁”(《集成》9452)、春成侯盃“蓋柯緘環”(《新收》1484)。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門戶關鑰”(簡 9 叁),何琳儀先生謂:“關,从門,絲聲。疑關之異文。”^⑤“絲”於“關(關)”字,當是兼表音義。嶽麓秦簡《數》篇{關}的用字或作關(簡 149 正),疑“𠂔”下所從之“𠂔”是“絲”下半筆畫訛變而聲化。《說文》訓“𠂔”爲“織絹從糸貫杼也”,似可移以釋“絲”。

三

《說文》:“盈,滿器也。从皿、夨。”用“盈”爲{盈}出土文獻見於秦石鼓文和睡虎地簡。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123 頁。

② 戴震:《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48 頁。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1990,3629、4318 頁。

④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叁)》,122 頁。

⑤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1040 頁。

趙平安先生認為，“盈”所从之“𠂔”爲{股}的初文作（《合集》13670）者之變。^①上博三《周易》簡9“有孚𠂔缶”，“𠂔”對應今本《周易》作“盈”，是楚簡所見唯一以从“𠂔”之字記寫{盈}之例。楚簡帛{盈}多數記寫作“涅”，又作“𣶒”“經”。

（1）乃涅其志。（九店簡56·26）

（2）非稷之種，而可飲食。積涅天之下，而莫之能得。（上博六《用曰》簡8）

（3）一缺一涅。（郭店《太一生水》簡7）

（4）雖𣶒必虛。（上博五《三德》簡8）

（5）月則經紕。（楚帛書）

“涅”字《說文》無載，清華一《楚居》述楚先祖遷徙事，涉及楚都稱“郢”的原因云：“衆不容於免，乃潰疆涅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日郢。”（簡8）此或與楚人用“涅”表示{盈}的用字習慣有關。例（1）李家浩先生謂：“秦簡《日書》甲種楚除陽日占辭作‘乃盈志’。上古音‘涅’、‘盈’都是耕部喻母四等字，可以通用。”^②“𣶒”累增“皿”旁，與“盈”結構原理同。“經”从“糸”，《說文》以爲“經”字或體，楚簡中仍讀爲{盈}，清華二《繫年》篇“經經”（簡93），即史書所記之“樂盈”，《史記·晉世家》又作“樂逞”。“經”郭店《成之聞之》亦用爲{逞}（簡35）。

用“涅”表示{盈}傳世古書亦有其例：

（6）春采生，秋采蕨，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訕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管子·宙合》）

王念孫《讀書雜誌》謂：“涅當爲逞，儒當爲偃，皆字之誤也。逞與盈同。偃與縵同。盈縵猶盈縮也……盈縮與訕伸義相因也。”^③由楚簡用字可知，“涅”可逕讀{盈}，不必輾轉求訓。晉璽多見“呈志”（《璽彙》4517-4524等），一般讀爲“逞志”，其實也可讀爲“盈志”，郭店《老子》甲簡10“不欲尚呈”，“呈”正讀爲{盈}。

四

《說文》：“種，執也。从禾、童聲。”又：“種，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依《說文》，“種”的本義是種植之{種}，引申表示種子、種類之{種}，而“種”則是專指先種後熟的禾類。楚簡

① 趙平安：《關於“𠂔”的形義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收入其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97-105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81頁注80。

③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427頁。

種植之{種}(如下例1)、種子之{種}(如下例2)皆寫作“種”,或作“𣎵”。

(1)王子曰:“疇何以爲?”曰:“以種麻。”王子曰:“何以麻爲?”答曰:“以爲衣。”(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簡5→2)

(2)新都莫敖勝、新都喪夜公達爲新都貸越异之黃金五鎰以糴種。(包山簡113)

(3)紂爲無道,昏者百姓,至約諸侯,絕種侮姓,土玉水酒,天將誅焉。(上博二《容成氏》簡53)

(4)非稷之𣎵,而可飲食。積盈天之下,而莫之能得。(上博六《用曰》簡8)

“禾”“米”屬義近形符可替換,“𣎵”“種”一字異體。秦至漢初出土文獻{種}之用字多亦如是,皆以“童”爲聲。睡虎地秦簡《日書》乙本:“五種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丑黍,辰卯及戌菽,亥稻,不可以始種、獲、始嘗,其歲或費食。”(46 貳-49 貳)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論》:“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55 上)《二三子問》:“五種不收。”(9 下)

傳世文獻“種”“𣎵”二字的用法與《說文》正相反。{種}多作“種”,如種植義,《詩·大雅·生民》:“種之黃茂,實方實苞。”種子義,《書·呂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種”則指先種後熟的禾類,如《周禮·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

今本《說文》中“種”字用法多如此,如“播”字下謂“種也”,“𣎵”字下謂“一曰:覆耕種也”,“蒔”下謂“更別種”,“貉”字下謂“北方豸種”等等,而諸例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皆改作“種”。又《說文》釋“鐘”謂“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以“種”與“鐘”同源。不過,今本《說文》也見以“種”記{種},如“執”下謂“種也。从壺、𠂔,持亟種之”,“類”下謂“種類相似,唯犬爲甚”,“狄”下謂“赤狄,本犬種”等等。尤以“種”釋“執”爲可疑,其與以“執”釋“種”不相對應。《周禮》之“種稑”,今本《詩·豳風·七月》作“重穰”,《說文》“稑”字下引作“種稑”。由此看來,今本《說文》說解中以“種”記{種}之例,當爲後世傳抄所改。《說文》以“種”義爲先種後熟的禾類,以“𣎵”義爲種植,本是清晰分明的。

《說文》“種”字下段玉裁注謂:“小篆‘執’爲‘種’,之用切。‘種’爲‘先種後孰’,直容切。而隸書互易之,詳張氏《五經文字》。種者以穀播於土,因之名穀可種者曰種。凡物可種者皆曰種,別其音之隴切。《生民》曰:種之黃茂。又曰:實種實衰。箋云:種生不雜也。”“種”字下又謂:“此謂凡穀有如此者。《邠風》傳曰:後孰曰重。《周禮·內宰》注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按毛《詩》作重,段借字也。《周禮》作種,轉寫以今字易之也。”《詩·豳風·七月》“重穰”陸德明《釋文》:“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穰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莩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以出土文獻驗之,二說誠是。

五

《說文》：“輔，人頰車也。从車、甫聲。”又：“𩵿，頰也。从面、甫聲。”又：“𩵿，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以“輔”爲頰𩵿，與“𩵿”同義，以“𩵿”爲輔佐之{輔}。傳世文獻則主要以“輔”記寫{輔}及{𩵿}。段玉裁謂：“謂人之𩵿，猶車之輔也。𩵿，見《爾雅·釋詁》：‘弼、𩵿、輔、比，𩵿也。’郭注云：‘𩵿，猶輔也。’《廣韻》曰：‘𩵿，出《埤蒼》。’蓋輔專行而𩵿廢矣。”然出土文獻似未見表示{輔}的“𩵿”。^①楚文字{輔}記寫作“𩵿”“𩵿”或“輔”。

- (1) 是以能𩵿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郭店《老子》丙篇簡 13-14)
- (2) 外臣而居吾左右，不稱賢，進何以屏𩵿我？(上博八《命》簡 4)
- (3) 有其爲人之[菴如]也，弗𩵿不足。(上博一《性情論》簡 38-39)
- (4) 既告汝元德之行，譬如主舟，𩵿余於險，𩵿余於濟。(清華一《皇門》簡 13)
- (5) 子產之𩵿：子羽、子刺、蔑明、卑登、富之𩵿、王子百。(清華三《良臣》簡 10)

“𩵿”已見於春秋齊金文叔尸𩵿(《集成》276)，《汗簡》《古文四聲韻》“輔”字古文亦或作“𩵿”。“𩵿”當是“𩵿”之異體，“甫”“父”同音，作聲符可替換。“輔”字亦見於中山王方壺(《集成》9735)，楚簡迄今於清華簡中凡 3 見(另一例見清華三《周公之琴舞》簡 10)。此外，亦偶見假“甫”記{輔}。曾侯乙墓鐘磬銘文“𩵿”字常見，字書以爲“𩵿”字異體，學者多以爲當讀爲輔助之{輔}。

作爲車輿部件的{輔}，一般認爲指車輪外旁增縛夾轂的兩條直木，其功效爲增強輪輻載重支力。《詩·小雅·正月》孔穎達疏：“此云‘乃弃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然則輔佐之{輔}爲“輔”引申義。“輔”“𩵿”異體，从“車”作者明其用，从“木”作者示其質。

《左傳·僖公五年》引諺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輔車”之所指，長期聚訟紛紜。今本《周易》咸卦“咸其輔頰舌”及艮卦“艮其輔”，兩“輔”字上博三《周易》皆作“頰”(簡 27、49)，馬王堆帛書《周易》則作“股”，“頰”“股”所記寫的無疑是{𩵿}。陸德明《釋文》謂“輔”“虞作‘𩵿’，云‘耳目之間’”。故今本《周易》等是假“輔”記寫{𩵿}，《說文》或即據此訓“輔”爲“人頰車”。清代以前故訓將《左傳·僖公五年》之“輔車”與《詩·小雅·正月》之“輔”“車”分開來解釋，將《左傳》之“輔”訓爲人的面部器官，當是可信的。“輔車相依”之“輔”與今本《周易》“輔”一樣，記寫的實爲{𩵿}。亦唯如此解，其與下句“唇亡齒寒”纔密合無間。

① 中山王鼎(《集成》2840)有“𩵿”，然實用爲保傅之{傅}。

六

《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本義是人的本性，概由{生}孳乳，故早期古文字當用“生”記寫{性}，馬王堆帛書猶見之。“性”是後起分化字。楚簡主要用“眚”記寫{性}。

(1) 聖人之眚與中人之眚，其生而未有非之。(郭店《成之聞之》簡 26)

(2) 眚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性自命出》簡 2-3)

(3) 民眚固然：見其美，必欲返其本。(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16)

(4) 情生於眚，禮生於情。(郭店《語叢二》簡 1)

《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性”古文亦作“眚”。{姓}早期古文字記寫作“生”，楚文字多記寫作“眚”，恰與{性}的用字一致。《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古文字“眚”、“省”為一字分化。古書多用“眚”為災眚之{眚}，楚簡則多作“眚”。楚文字假“眚”記寫{性}原因待考。^①

上博二《昔者君老》篇原 3 號簡有以下文句：

(5) 君子曰：子眚蓋喜於內，不見於外；喜於外，不見於內；慍於外，不見於內。內言不以出，外言不以入。

此簡言“子”之行爲，與《昔者君老》篇講君與太子之事不密合，而與上博四《內禮》篇講孝子的內容類似，兩者字體亦基本一致，此簡或當與《內禮》同篇。句中之“眚”，整理者讀為“省”，^②疑應讀為“性”，“喜於內不見於外”云者，即“子”當具備之“性”。

郭店《性自命出》簡 1 “凡人雖有眚”，對應上博一《性情論》簡 1 作“凡人雖有生”，論者多讀此“眚”或“生”為{性}。唯兩篇其他簡文與楚簡通常的用字習慣一樣，{性}皆記寫作“眚”，故馮勝君先生認為當把《性情論》的“生”讀為本字，而不是依照《性自命出》讀為“性”，^③於義可講通。不過，楚系文字的用字習慣是相對的，楚文字承商周古文字而來，與其他地域用字并存，不可避免地會有接觸和交叉，所以用字習慣有時候祇能作為釋讀判斷的輔助標準。如前所述，{性}{姓}早期古文字皆記寫作“生”，楚文字存在早期寫法之孑遺，屬正常情理。楚簡就有少數用“生”記寫{姓}的例子，如：

① 金文{生}或記寫作“眚”，如揚簋(《集成》4294)、散氏盤(《集成》10176)等，郭沫若認為“眚”“實生之初文，象果實迸芽之形，後乃訛變而為从目、生聲。”見郭沫若《卜辭通纂》，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二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507 頁。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4 頁。

③ 馮勝君：《〈性情論〉首句“凡人雖有生”新解》，《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7-229 頁。

(6) 蔡哀侯止之曰：“以同生之故，必入。”（清華二《繫年》簡 23-24）

(7) 子之史行，百生得其利。（上博九《史籀問於夫子》簡 11）

{性}的用字亦或如此。楚簡“眚”“生”有相通之例，如清華一《程寤》簡 8“眚民不災”，“眚”當讀{生}；清華三《說命中》簡 7“干戈生其身”，“生”當讀{眚}。上博八《子道餓》簡 1“家眚甚急”之“眚”，疑亦當讀為{生}。^①此外，舅甥之{甥}楚簡或作“生”（上博七《吳命》簡 6），又作“眚”（上博八《志書乃言》簡 5）。故《性自命出》與《性情論》“眚”“生”異文同義仍是有可能的。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簡 5“人之生三，食、色、~~眚~~”，^②“生”一般讀為{性}，李天虹先生則據上引馮勝君先生的用字分析如字讀，“‘人之生三’，大意可能是說人生來有三件大事”。^③將“人之生三”理解為“人生來有三件大事”在語法上是較難講通的。上博五《競建內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應合為一篇。^④此篇兩種字體并存，用字情況比較複雜，原《競》篇簡 2、7、8 等均有字與原《鮑》篇的字體相合，似是原字漫滅而後補全者；然則原《鮑》篇或是後來補充進來的。兩種字體存在用字差異，如{百姓}寫作“百眚”（《鮑》簡 5），又作“百生”（《競》簡 8）；易牙之{易}既作“易”“慝”（《鮑》6），又作“貳”（《競》10）。此可以解釋為不同書手用字習慣不同所致，不過，同一種字體下，{諫}既作“訐”（《鮑》簡 5），又作“諫”（《鮑》簡 9），則可見其有一定的隨意性。從文義上看，本篇“人之生”當仍讀為“人之性”。

七

《說文》：“節，竹約也。从竹、即聲。”楚簡{節}多記寫作“節”，又或假“即”為之。

(1) 風也，亂節而哀聲。曹之喪，其必此乎？（上博五《弟子問》簡 4）

(2) 體其宜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上博一《性情論》簡 10）

(3) 體其宜而即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郭店《性自命出》簡 17-18）

(4) 《雨無正》、《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8）

(5) 制法即刑，恆民趨敗。（上博六《用曰》簡 14）

① “家生”指家庭生計。《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

② 末字有不同釋讀意見，其上所從與上博一《緇衣》簡 12“𡗗（𡗗）”字所從同，我們傾向於讀為“嫉”。

③ 李天虹：《〈鮑叔牙與隰朋之諫〉5-6 號簡再讀》，《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80-284 頁。

④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 年 2 月 19 日，收入其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8-173 頁。

例(2)(3)爲异文, {節} 一作“節”, 一作“即”。例(4)“即南山”即今本《詩經》篇名“節南山”。例(5)同篇另有表 {節} 之“節”字, 如“心目及言, 是善敗之經, 三節之未得, 豫命乃縈”(簡1), 與“即”似有記寫名詞或動詞用法之別。

郭店《成之聞之》篇有如下文句:

(6) 故君子不貴庶物, 而貴與民有同也。智而比即, 則民欲其智之遂也; 富而分賤, 則民欲其富之大也; 貴而能讓, 則民欲其貴之上也。(簡16-18)

“比即”裘錫圭先生疑讀爲“比次”。^①類似的文句亦見於上博五《君子爲禮》篇:

(7) 夫子: “智而忘信, 斯人欲其[忘]也; 貴而能讓, 斯人欲其[貴]貴也; 富而[忘] (簡4→9下)

“貴也”上一字據簡影實从“貝”, 似仍是“貴”字, “貴貴”與例(6)“貴之上”意義相近。又“信”上一字原缺釋, 諦審簡影, 上實从“比”, 下似从“心”, 字可隸定爲“忘”, 讀爲 {比}, 或即“比”字異體。“比信”與例(6)“比即”可對讀, “即”當讀爲 {節}。《集韻》: “節, 信也。”《周禮·地官·掌節》: “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 以輔王命。”符節用以守信約, 可引申爲誠信。是 {節} 與 {信} 皆有誠信義。“比”可訓爲“合”, 《禮記·射義》: “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義。”然則“比信”或“比節”意即合於信義。智者多謀, 其反則是擅用權謀; 智者不欺, 方能“與民有同”。

八

《說文》: “禁, 吉凶之忌也。从示、林聲。”用“禁”記寫 {禁} 出土文獻見於睡虎地秦簡, 楚簡 {禁} 記寫作“欽”。

(1) 今薪蒸使虞守之; 澤梁使鮒守之; 山林使衡守之。舉邦爲欽, 約挾諸關, 縛纓諸市。(上博六《競公瘡》簡8)

(2) 伊尹既已受命, 乃執兵欽暴。(上博二《容成氏》簡37)

(3) 或迪而教之, 能能, 賤不肖而遠之, 則民知欽矣。如進者勸行, 退者知欽, 則其於教也不遠矣。(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簡7→9)

《說文》: “欽, 欠兒。从欠、金聲。”楚簡“欽”有時用同“噤/噤”:

(4) 毋欽毋呿, 聲之疾徐。(上博五《君子爲禮》簡6)

^①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69 頁注 18“裘按”。

《說文》：“噤，口閉也。”《呂覽·重言》：“君呿而不噤，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噤，閉。”“金”“禁”古音相同，“撿”《說文》或體作“撿”。楚簡之“欽”或可視為“噤/噤”的異體，用“欽”表示{禁}或由此而來。《戰國策·趙策一》“韓乃西師以禁秦國”，“禁”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正作“噤”（233行）。《說文》“噤”字下段玉裁注謂：“凡金聲、今聲之字皆有禁制之義。”

義為承尊之器的{禁}，楚簡作“鉢”，如包山簡 266“二鉢”，“鉢”从“木”，“金”聲。^①

今本《周易》咸卦之“咸”，多訓為感知、感化。《荀子·大略》：“《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咸卦象傳“山上有澤，咸”孔穎達疏：“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為咸。”“咸”上博三《周易》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皆作“欽”。其中上六“咸其輔頰舌”句，通常認為“輔”“頰”“舌”三事并列，然若此，則“輔”“頰”所指重複。此句簡本作“欽頰夾舌”（簡 27），帛書本作“欽其股陟舌”（61行），又“頰”陸德明《釋文》謂“孟作‘俠’”。“夾”“陟”“俠”義近，似不能讀為{頰}。疑此句本是“欽頰”“夾舌”連舉，則“欽”與“夾”義應相關。“欽”似可讀為表按壓、執持義之{撿/撿}，依簡本，{撿/撿}的賓語分別為{拇} {腓} {脢} {跗}。

本文曾在“出土文獻與先秦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2015年10月16—17日）上宣讀，并承與會師友是正，謹此志謝。

^① 李家浩：《包山 226 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國學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收入其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34—235 頁。

再論郭店《老子》的“絕憊弃慮”^{*}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李 銳

內容提要 “絕憊弃慮”一章如何釋讀，學界討論已多。裘錫圭先生就這一章專門寫了三篇文章，影響較大。圍繞其說，學界有很多討論。仔細考察裘說，發現其依據是張立文批評其文而說的“憊”“慮”等成對概念應該相異，這指導了裘氏的有關釋讀結果。本文認為成對觀念應該相近，依據清華簡的材料，“慮”應該讀為“作”，聖與智意思相近，並討論了與本章相關的問題。

關鍵詞 《老子》 郭店簡 絕仁弃義 絕聖弃智 命訓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組開篇的“絕憊弃慮”，曾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其關鍵在於“慮”字的釋讀（見圖 A）。裘錫圭先生最先讀為“絕偽弃詐”，後來改正為“絕偽弃慮”，^①其說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贊同。^②此後還有一篇文章繼續討論這一問題，讀為“絕為弃慮”。^③李零先生曾舉上博簡《三德》中的形近字（簡 2，見圖 B）為說，認為裘先生原讀正確，改釋反不可取，但是字形小有不同；而同篇字形相近的字（簡 15，見圖 C），李零先生讀為“且”，^④陳偉

^{*}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自選項目“新出簡帛與百家爭鳴的重要論題研究”（12CZS01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11&ZD086）的資助。

① 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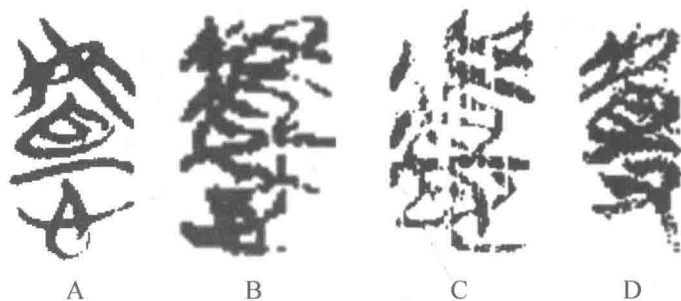
② 參見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第 150 頁。按：下引相關說法多可參此書，不另注。

③ 裘錫圭：《關於〈老子〉的“絕仁弃義”和“絕聖”》，《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

④ 李零：《三德》，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89，298 頁。

先生則根據裘先生說認為當讀為“慮”。^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中,《命訓》篇有形近字(簡9、11,簡9見圖D),有傳世文獻作比較,確切無疑該讀為“詐”,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一問題。

D字已多見,李守奎等編著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②第152頁收有不少,多讀為“且”。“且”“詐”古音相近。其478頁“慮”字下收有“慮”,所舉為《性情論》簡39兩字形,模糊不清,但審查上博簡放大彩圖,不難發現中間從“目”,不從“且”,與所收《緇衣》簡17之字相近;其最後一字形則為《三德》簡11之字。其495頁收有《三德》簡2的“慮”字,認為讀為“作(詐)”。《命訓》確定無疑讀“詐”,以及《三德》簡2讀“詐”,提醒我們此字當從“慮”得聲。從心的“慮”,也很可能要從“詐(乍)”聲,而“慮”字是中間從“目”或“田”,其下沒有一橫劃,不從“且”(“目”下加橫,一般隸定為“且”)。不過裘先生曾將《老子》這一字讀為“詐”,因此從讀音上講,此字可讀“詐”或“慮”或音近之字,並不存在問題,關鍵是相關的文獻如何能解釋得通順。



先擱置《老子》不談,《三德》簡15的C形字:“百事不遂(遂),慮事不成”,“慮”字讀“且”已被陳偉先生反駁。但陳先生讀為“慮”,雖然“慮事”常見,却不如讀“作”,因為“作事不成”這樣的話見於古書。如《大戴禮記·千乘》:“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管子·四時》:“作事不成,必有大殃”,帛書《十六經·雌雄節》:“以守不寧,以作事不成”。“作事不成”與“百事不遂”並不重複。“百事不遂”說的是諸事不順,“作事不成”是突出地說積極主動地作事也不成功(或者借用陳偉先生的說法,前面的“百事不遂”可以理解為自然發生的事情,而後面的“作事不成”則是人作為事情)。

再看《老子》的“絕急弃慮”,因為裘先生說過:“即使肯定‘慮’是從‘慮’之字,由於其字形與‘慮’很相似,《老子》原文中此字本作‘慮’,但被抄寫者誤書為從‘慮’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所以要決定這個字的釋讀,必須充分考慮文義。”^③因此我們也來討論一下《老

① 陳偉:《上博五〈三德〉初讀》,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三德〉校讀》,《新出楚簡試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251-252頁。下引陳文皆出此,不另注。

②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③ 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329頁。

子》的文義。

筆者同意季旭昇和龐樸先生將簡文讀作“絕爲弃作”的意見，因為這和《老子》的思想相合，而《老子》全文中沒有出現一次“慮”。《老子》的思想核心是無爲，並且反對“不知常，妄作”(第16章)，第37章更說：“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此處不是欲望作，而是將欲要作。此章可與第16章的“萬物并作，吾以觀復”相參看，郭店《老子》簡12作“居以須復”，“作”必須回到歸根的狀態)。^①

裘錫圭先生反對這一意見的原因是“作”“爲”二字之義相重的程度太高。這一說法影響太大，以致季旭昇先生要說上博三《恆先》篇簡11、12“爲”與“作”同出而意義不同。^②其實《恆先》簡7有“舉天之事，自作为事”，“作”“爲”的意思顯然是相近的。而裘先生的說法，却來自張立文先生批評裘說“絕僞弃詐”：在簡本同章“絕智弃辯”“絕巧弃利”兩句中，“智”與“辯”，“巧”與“利”，其義相異相關。“僞”“詐”均爲欺詐，義重。^③

其實在筆者看來，此處每兩個絕X弃Y的對象X和Y，恰恰應該是文義相近相關。《離騷》的“余猶惡其佻巧”，王逸注就釋“巧”爲“利”，說明二者意思很相近。劉國勝也舉《荀子·王制》、郭店簡《性自命出》的例子說明這一問題。而王弼注《老子》就說：“聖智，才之善也；仁義，行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④可見王弼也認爲“聖”與“智”、“仁”與“義”、“巧”與“利”，它們的意思相近相關。而“作”與“爲”，意思也是相近相關。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所謂“絕聖”不符合《老子》思想之說是不可信的。《老子》全書出現31次“聖”，但是30次都是作“聖人”出現的。在《老子》這裏，“聖”和“聖人”不同。汪桂年已指出：“聖猶智也。”^⑤高亨也說：“此聖字僅是博通深察；可云大智曰聖，與聖人之聖異義。”^⑥《大戴禮記·四代》記：“子曰：聖，智之華也。”“聖”和“智”的意思也是接近的。《孟子·公孫丑上》子貢說“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很明顯是發展了的聖之義。郭店簡沒有“絕聖弃智”，祇有“絕智弃辯”，有學者認爲郭店簡的思想和今傳本《老子》不同。其實不然，這裏“智”“辯”也是意思接近的，則其與“聖”自然也是意思相近的。《廣雅·釋詁一》：“辯，慧也。”《讀書雜誌·荀子第二·非十二子》“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王念孫按：“辯，智也，

① 雖然《老子》中有“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這類的話講“作”，但是這是講人作事的方法，如同第81章所說的“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帛書乙本、北大簡本作“人之道”，仍然是指正確的聖人之道)一樣，聖人不得已而作、爲，也當是“爲而不爭”，“爲無爲”，“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老子》第2章的“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之“作”(《老子》說“萬物”時常常包括了人)，看來是正面的，那麼“辭”(郭店簡作“忖”，帛書乙本作“始”)應當讀爲“怠”(詳另文)。

②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③ 張立文：《論簡本〈老子〉與儒家思想的互補互濟》，《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135頁。

④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45頁。

⑤ 汪桂年：《老子通詁》，《北強月刊國學專號》，1935，9頁。

⑥ 高亨：《老子正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32頁。

慧也。”可知“聖”“辯”“智”“慧”之義接近，主要是指才智上的聰慧。莊遵《老子指歸》殘文對此章有解釋說：“黜聰弃明”，而《漢書·司馬遷傳》“黜聰明”如淳注就說：“不尚賢，絕聖弃智也。”^①可見古人也早有此意見。有學者提議讀“絕智弃辯”為“絕知弃辨”，裘錫圭先生支持這種說法，應該是為了將“知”“辨”作區別，使之不相重。但使絕X弃Y的對象X和Y不相重的結果，是要使讀者承認“絕聖弃智”和“絕智弃辯”相差甚遠，是有人故意改動的結果。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

因為《莊子·胠篋》說“故絕聖弃知，大盜乃止”之後，還講“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是發揮，把“聖”等同於“聖人”，而不是這些人改寫了《老子》。因為《胠篋》篇又見於《鬼谷子》，^②雖然今存殘文沒有“絕聖弃智”，但殘文中與《莊子·胠篋》相近者不少，不難猜想原來的完本應該有，這說明《胠篋》篇流傳十分廣遠。但《胠篋》之被《莊子》和《鬼谷子》收錄，反倒說明它可能不是某一學派的核心著作。古代學派重視宗師之言，對宗師之言的理解，是學派得以延續及分裂的原因，但學派都不會輕易改易宗師之言。^③即使我們承認有改動，要讓所有的本子都聽從《胠篋》之言，也是很困難的。^④有些學者稱《胠篋》為左派道家之言，那更要反思一下右派道家怎麼可能跟着左派來改呢？雖然現在所見的馬王堆帛書和北大簡三種《老子》都作“絕聖弃智”，但并不能代表尚未見到的戰國時期其它《老子》沒有別的讀法。比較融通的解釋，應該是承認“絕聖弃智”和“絕智弃辯”的意思接近，因為這些文本的來源都是老子。在意思接近的情況下，改動文字而不改變文義，這總比右派、中派聽從左派的改動要讓人容易接受些（而且即使真有改動，也應該是根據其它《老子》傳本，而不是《胠篋》）。

由“聖”“智”“辯”的意思接近，也可以知道，今傳本《老子》第18章的“智慧出，有大偽（為）”，馬王堆帛書和北大簡三種《老子》都有，則郭店《老子》很有可能是脫落了。廖名春先生指出：《老子》是韻文，從用韻考慮，此句非有不可。依楚簡本，“義”和下句的“慈”，一為歌部，一為之部，並不押韻，是不正常的。如有“智慧出，安有大偽”句，則“義”和“偽”為韻，皆屬歌部。“慈”和“臣”為韻，之真合韻。還要細分的話，則“廢”和“出”為韻，月物合韻；“和”和“亂”為韻，歌元通韻。整個四句，皆為交韻。^⑤

之真合韻雖然罕見，但“義”“偽”押韻則確鑿無疑。而且不難發現，“絕為弃作”與“絕智弃辯”或“絕聖弃智”都與“智慧出，有大偽（為）”相應，所以這一句確實該有。而有了“絕智”，當然可以放棄“絕為弃作”，因為大為是智慧出的結果。大概因為此章在別的傳本裏排

① 參見樊波成《老子指歸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66頁。

② 參見李銳《〈莊子·胠篋〉之“十二世有齊國”補論》，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③ 參見李銳《戰國秦漢時期的學派問題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④ 李銳、邵澤慧：《北大漢簡〈老子〉初研》，《中國哲學史》2013年第3期。

⑤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515頁。

在第18章之後,因為那裏有“大道廢,焉有仁義”,所以此章用“絕仁棄義”比“絕為棄作”更能照應上文。馬王堆帛書和北大簡三種《老子》都是“絕仁棄義”,這三種《老子》都有與今本相應的連續的第18、19章。而且在北大簡《老子》里,今傳本的第17、18、19章是合為一章,并未分開。

郭店《老子》“絕為棄作”後面說“民復季子”,今傳本作“民復孝慈”。因為《老子》第18章有“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子”“慈”古通,故學者或認為“季”為“孝”之訛。但從楚文字來看,說字訛,終究難以令人完全信服。或就讀為“季子”,裘先生就是如此,并引馬王堆帛書《脈法》的“季子忠謹,學……見於為人……言不可不察也”為證,認為所指與《老子》中所講的“嬰兒”“赤子”等類似。其實李學勤先生很早就舉《脈法》之例來說明“季子”為“孝慈”之訛。^①然而《脈法》殘損較重,“季子”的意義不明确。又帛書的年代是漢初,隸書與戰國楚簡文字也有差別(彭裕商、吳毅強所補充的張家山漢簡《裸律》“季父”誤為“孝父”的例子,也存在這個問題),故孰是孰非尚難斷定。^②可以懷疑的是,延陵季子年歲很大了也還是被稱為“季子”,故“季子”之說能否代表小孩子,尚難確定。最近裘先生主編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③由施謝捷先生整理的《脈法》篇,在“季”字後面加了“〈孝〉”,按照《凡例》的說法,這是認為“季”為“孝”之訛。雖然其注釋全圍繞“季子”為說,不提訛誤,但不難看出對此處“季子”之讀是有疑義的。^④

今按:“季”古音見紐質部,可讀為“愛”(古音影紐物部)，“季子”可讀為“愛慈”。《春秋繁露·為人者天》說:“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可證“愛慈”之讀(古代用慈愛者更多),且與第18章相關。“愛”古音是影紐物部,“孝”是曉紐幽部,幽物二部關係密切,^⑤可以相通。因此“愛慈”可能是“孝慈”轉為“季子”的中間環節。當然,質部和物部過去有的古音學家或不分部,有一些字該歸入物部還是質部,古音學家或有不同意見,故不能排除“季”直接讀為“孝”的可能性,若然,則郭店簡《老子》、張家山漢簡、馬王堆帛書《脈法》之“季”與“孝”倒是通假字,并非訛誤了。不過“孝”和“季”中古音的開合口不同,雖然在漢初二字有相通的現象,但這是屬於方言還是出於混訛,二字上古音能否直接相通,還有待研究。但是到了漢代,不僅有前述彭裕商、吳毅強所舉出土文獻的例子,而且漢代以孝治天下,其讀為孝慈,就順理成章了。至於裘先生說“子”和前文押之部上聲韻,更符合先秦漢語四聲分用的說法,“慈”則是平聲字,他依據的是周祖謨的《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一文。但檢核原文,周先生也舉了

① 李學勤:《論郭店簡〈老子〉非〈老子〉本貌》,收入其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37頁。

②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

③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北京:中華書局,2014,207頁。

④ 注釋採用了《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和魏啓鵬、胡翔驊著《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的解釋。此篇的參考文獻有《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或據此而在“季”後加“〈孝〉”。

⑤ 參見史傑鵬《由郭店〈老子〉的幾條簡文談幽、物相通現象及相關問題》,《簡帛》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不少“上去聲字古讀平聲例”，^①所以裘說并不絕對。

“民復孝慈”，“復”解釋為免除比較好，因為在《老子》中，孝慈是六親不和的結果，所以絕為弃作後，民沒有所謂的孝慈，即不被孝慈這種道德所束縛。《老子》中“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的“復”也是免除之義。古代復有免除之義，後來多用作免除賦稅的意思。

總之，《老子》甲組開篇的“絕急弃慮”，應該讀作“絕為弃作”，這符合《老子》整體的思想。

^① 周祖謨：《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收入其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71-74 頁。

試用清華簡《筮法》解讀包山占卜記錄中的卦義

[美]理海大學 柯鶴立

內容提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四冊《筮法》記載了占筮的原理和方法,這對於我們理解戰國占筮意義重大。包山簡有關 M2 墓主左尹邵佗的占卜記錄中有六例涉及兩列六爻的數字卦。其排列與清華簡一致(“四位”)。由此,通過對包山簡 201、210、229、232、239、245 簡所記數字卦的分析,結合清華簡《筮法》對“四位”中相關卦象、方位以及導致祟的原因的解釋,解讀包山簡占卜結果雖“恒有貞”却“少有憂”之憂源於何,加之參考當季、當日對應的卦象的凶吉,以及不同卦陰陽強弱,可以大致推測其可能導致“少有憂”的原因和彼時祭祀男女鬼神的系統。

關鍵詞 筮法 包山簡 四位卦

最近二十多年,出土和公布了衆多公元前四世紀的占卜材料。當時的占卜者除了有《周易》《歸藏》等六爻卦“易”類手冊,也可能使用《日書》、式盤、龜卜等工具。最近發表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四冊又公布了驚人的新材料,其中不但有世界上最早的算表之一,又有以三爻卦來算命的所謂《筮法》手冊。此類手冊與“易”類書完全不同,不再用詩歌史傳典故作為爻辭解釋卦義,其中的某個節(譬如第二十四節“卦位圖”、“人身圖”)則類似於將“日書”類占卜文獻縮寫并用八卦代替“日”來計算。當然日書與《筮法》的占筮過程並不一致,但兩類書的內容標題都反映了貴族成年男子日常生活所關注的問題,譬如職業、家庭、宮廷、身體等主題。

湖北省包山 M2 墓主左尹邵佗也占問同樣的事情。公元前 318 到前 316 年間有一組占

卜者各自使用不同卜法來解決其職業與身體上的問題。^① 按照當時社會思想,使人內外有“咎”的原因應該源自環境或祖先等超自然力量作“祟”(即鬼神所帶來的禍害)。占卜者的責任首先是找出“祟”的緣故,然後用不同方式來撫綏或懲處鬼神,解除身體或住處中的“咎”,受祟者纔能好轉。包山簡記錄的八個祭祀或占卜案例發生在不同日期。其中第二和第六例祇記錄了祭祀活動而沒有占卜活動,其餘各例都記載了占卜活動。十二位不同卜者用十種不同占法來找出導致“祟”的鬼神的過程。其中三位卜者的占法涉及數字卦,一共有六例(參表1)。每例由兩列六爻數字卦構成。學界一直認為占卜者應該是用六爻“易”類手冊來解釋,^②但包山竹簡內容卻無法與已知的《易經》爻辭解讀傳統聯繫起來。包山簡的占卜者為什麼將所有結果解讀為“恒吉”而其中還出現一些“少憂”,更是令現代學者摸不着頭腦。此種釋法似乎與後世習見的“易”占傳統沒有明確關係。《筮法》則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③《筮法》的卦象剛好也是兩列六爻數字卦為一組,清華簡整理者清楚地指出:這兩列數字卦應為四個三爻卦,每組卦的卦象也都遵循一定的規則。可以想象,占卜者會查詢《筮法》的不同章節來解決問題。

《筮法》稱其四卦的排列構型為“四位”。^④ 從第一節竹簡上句點的用法可知,讀法順序應起於右上,從上至下,從右至左。從原本句點位置我們可以猜測占卜者先檢查四位卦,然後再閱讀其下的指示。《筮法》三十節中,一共有十九節含有四位卦和指示,其他十一節都是含有解釋卦義的各種信息和指示的參考材料。其實用《筮法》來解釋包山卦中的“吉”非常簡單,複雜的是對“憂”的判定。^⑤ 參考《筮法》第二十六節“祟”來解釋各卦與鬼神的關係。此節最後一段則陳述讀卦的一般原則:“夫天之道,男勝女,衆勝寡”。從這句話我們知道《筮法》的三個基本概念:(1) 利用“天之道”思想,即(2) 男卦(乾、震、坎、艮)強於女卦(坤、巽、

①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2-37頁。本文所引包山簡均出自此書,以下不詳注。

② 見《包山楚簡》。晏昌貴等學者也多從此說。見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研究》7,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③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75-123頁。本文凡征引《筮法》均出自此書,以下不煩注釋。為方便計,採用寬式隸定。











④ 《筮法》第十九節(105頁):“凡筮志事,而見同次於四位之中……”,整理者注釋“‘四位’指右上、右下、左上、左下四卦。”

⑤ 運用《筮法》來解釋包山簡卜例,馬楠、李銳、蔡飛舟等先生已進行了相關探討。詳參馬楠《清華簡〈筮法〉二則》,《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李銳《讀清華簡〈筮法〉札記》;蔡飛舟《清華簡〈筮法〉補釋》,《周易研究》2015年第2期;此外謝炳軍《清華簡〈筮法〉理論性與體系性新探》,《理論月刊》2015年第6期,結合《筮法》探討了兩例包山數字卦。感謝李銳先生惠贈大作,在此深表謝忱。諸家所採用《筮法》原則不一,側重解釋內容也不相同,與本文具體解釋推測並不重合。

離、兌)；^①(3)多數勝於少數。^② 包山簡中每一組四位卦都遵循這三個原則。在包山數字卦例中前三例女性卦占多數、後兩例男性卦占多數。問題是解釋占卜者是如何根據數字卦來決定舉行何種儀式,以何種鬼神為對象。在這裏我們用《筮法》的相關章節試着推演古代占卜邏輯。

為討論方便計,將包山簡中涉及四位卦的占卜信息列表如下。其中信息表用卦例竹簡編號為序號。每個日期的占卜活動都記錄了不同卜法的占卜過程。第一和第四例含有三個部分。數字卦出現在例一的第三個部分和例四的第一個部分。第七個活動分十個部分,卦者出現在第二、四、七、九個部分。一般來說由蓍龜兩種卜法的人員輪流演算。

表 1:包山卜筮簡中涉及數字卦的占卜活動信息表

卦簡號	活動次號 ^③	年月 (公元前)	日	占卜者名	筮卜方法名	所憂	數字卦	卦象分析	
201	1.3	318 年 4 月	乙未	應會	央筮	身體 職位 “少有憂於躬身,且爵位遲踐”		兌 (女) 	震 (男) 
								兌 (女) 	坤 (女) 
210	4.1	317 年 5 月	乙丑	五生	承德	身體 宮室 外 “少有憂於躬身與宮室,且外有不訓”		坤 (女) 	艮 (男) 
								兌 (女) 	兌 (女) 

① 關於卦性的提法,本文採納清華簡整理者的意見。同冊的《說卦》明確提到有男卦、女卦。

② 譬如《筮法》第二節(82頁)“得”有“三男同女乃得”或“三女同男乃得”,吉。

③ 活動次號採用筆者所排列的次序。詳參 Constance A. Cook, *Death in Ancient China: the tale of one man's journey*. Leiden; Brill Press, 2006, pp.161-205.

續表

卦簡號	活動次號	年月 (公元前)	日	占卜者名	筮卜方法名	所憂	數字卦	卦象分析	
229	7.2	316年 4月	己卯	陳乙	共命	宮室 “少有憂於宮室”		離 (女) 	艮 (男)
								坤 (女) 	巽 (女)
232	7.4			五生	承德	宮室寢 “少有憂於宮室寢”		離 (女) 	兌 (女)
								離 (女) 	震 (男)
239	7.7			陳乙	共命	身體 “疾弁,有遺,遞瘥”		乾 (男) 	艮 (男)
								震 (男) 	震 (男)
245	7.9			五生	承德	身體 “疾弁,病窻”		坎 (男) 	震 (男)
								乾 (男) 	巽 (女)

以上數字卦皆被解釋為吉。前四個數字卦皆以女卦為大多數，後兩例則以男卦為大多數。除了 239 簡外，均是《筮法》所謂的“三女同男”以及“三男同女”的情況。包山占卜者都解釋說“占之：恆貞吉，少有憂也”。為了深入了解四位卦的含義，我們借《筮法》的相關記載來試着解讀包山筮卜的有關儀式。

《筮法》第二十九節“爻象”有兩個相關部分。“爻”指爻數。常見成卦的數字是 6(陰)、1(陽)。稀見爻數是 4、8(陰)、5、9(陽)。在這節中最後一句所陳述的一般規則是：“凡爻，如大、如小，作於上，外有吝；作於下，內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鷹獬、風雨，日月有此(裁)”。^①大意即“爻數無論大小，當出現在上兩卦時，外事不吉；當出現在下兩卦時，內事不吉；如果它們同時出現在上下兩列卦中，國家將會遭遇兵事、天會降下一隻會審判人罪責的怪獸、風暴、以及日食月食”。“下”和“上”在卦象上有內外、陰陽等含義。第二十九節第二個相關部分是稀見爻數的所謂“爻象”。清華簡整理者已指出其內容與《說卦》有些共同點。一般來說陰數(4、8)或陽數(5、9)象徵陰陽。包山組卦祇有 5、8 這兩個稀見爻數(參以上表 210、229、239、245 簡號)，不見 4 與 9，因此以下據引《筮法》第二十九節“爻象”祇標出 5 和 8 的爻象。

凡爻象，八為風、為水、為言、為飛鳥、為腫脹、為魚、為罐簣；在上為醪、下為汰。

五象為天、為日、為貴人、為兵、為血、為車、為方、為憂、懼、為飢。

解讀四位卦之間的意義，也需要《筮法》第二十六節各個卦與“祟”的對應：

乾祟：純五、滅宗；九、乃山；清、乃父之不葬死；暮純、乃室中、乃父。

坤祟：門、行。純，乃母。八、乃奴以死，乃西祭。四、乃縊者。

艮祟：疎；九、乃瘡；五、乃摠魃。

兌祟：女子大面端嚇死；長女為妾而死。

坎祟：風、長殤。五、伏劍者；九、牡瘡；四、縊者；一四一五、乃辜者。

離祟：熱、溺者；四、縊者；一四一五、長女殤；二五夾四、辜者。

震祟：日出、東方；食日、監天；晨日、天；暮日、雨師；五、乃狂者；九、乃戶。

巽祟：字殤；五、八乃巫；九、粒、孿子；四、非狂乃縊者。^②

① 清華簡整理者隸定為“鷹忒”，疑讀為“癸怪”，即“火災”(121 頁)。筆者疑當釋為“鷹獬”。漢代文獻(《史記》《漢書》《後漢書》《論衡》《獨斷》)亦作“解鷹”“魃魃”“獬豸”“豸獬”等。《墨子·明鬼下》載：“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泔，搃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桃神之而槁之，殢之盟所。”([清]孫詒讓：《墨子間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232-233 頁)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鷹，解鷹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象形，從豸省。”(北京：中華書局，1978，202 頁)

② 清華簡整理者認為：“粒，疑即包山簡五〇之‘漸(斬)木立(位)’。”按，此處粒當是胥生的意思。詳參柯鶴立《楚先祖的誕生故事》，收錄於《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爲了便於分析包山卦例,我們先將各組四位卦配上《筮法》第二十節所謂“四位表”上的有關“四位”內容。換句話說,選擇一套與占卜者所問有關的生活問題。以下“四位表”包含關於軍事、家事、政事以及宮廷之事的四套對應關係。包山的“憂”則僅限於家族、政治、宮廷事三套“四位”。

下軍之位	上軍之位
次軍之位	中軍之位

臣妾之位	子姓之位
妻之位也	躬身之位

臣之位也	君之位也
大夫之位	身之位也

外之位也	門之位也
宮廷之位	室之位也

分析每組卦的四位關係也需考慮時間的因素。每一個包山占卜例子在三年夏天某“日辰”(等於天干地支)。^①《筮法》第二十一節“四季吉凶”所列夏天卦象對應的吉凶如下:

大吉	小吉	小凶	大凶
坎	震巽	艮離	兌

對照《筮法》第二十五節“天干與卦”和第二十七節“地支與卦”,包山占卜的日辰相對應的卦如下。有趣的是公元前318與317年的卦象剛好相同。

包山日辰	《筮法》卦
乙未	坤巽
乙丑	坤巽
己卯	離離

將包山所有四位卦配上《筮法》“四位表”及其他相關對應,則有如下結果:

① 對於此處季節的界定,採納學界關於楚曆的研究成果。詳參王紅星《包山簡牘所反映的楚國曆法問題》(《包山楚墓·附錄二〇》)、劉斌徽《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包山楚墓·附錄》)、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包山 201 簡占卜者(應會)初夏在“坤巽”日以“央筮”卜法占得震在右上位、坤在右下位、兌在左上與左下位。正是“三女同男”吉祥的情況。201 編號的“憂”與“身體”和“職位”有關,所以應該放在“四位表”第二和第三套對應中來看。在這兩套對應中右下位都代表“自己”,而這個位置都被坤卦占領着。《說卦》八卦按陰陽強弱可以分為不同級別。純陽有乾,以下是長子(震)、中子(坎)、少子(艮);純陰有坤,以下有長女(巽)、中女(離)、少女(兌)。卦的陰陽之力也可能會影響卜者卜卦之後的儀式行動。在《筮法》中乾坤有夫妻關係以及“昭穆”,以此來表示乾坤“陽”與“陰”/“天”與“地”的關係。所以在“坤巽”日,坤卦出現在自身這一位會令人不安。

在《筮法》“人身圖”中,八卦對應貞問對象身體的各個代表性部分。男性卦都在外面,女性卦都在里面。坤在心部、兌在口部、震在耳部。坤卦出現在自己身體的方位有可能更令人不安。兩年後邵佗已患有“心腹”病。可能前 318 年時就已經有了些症狀。





“子姓”與“君”位為除乾卦外最强的陽性卦“震”占據。在《筮法》“卦位圖”中震卦代表西方、金、白、司雷。但包山簡的四位卦中對應的是兌卦(少女),即代表東方、木、青、司收。震卦在夏季“小吉”自然代表吉。問題在於兌卦即是夏天最凶之卦,而且占領着兩個右側位置,即“臣妾”/“臣”與“妻”/“大夫”。也就是說,家庭與官職都會有所“憂”。





臣妾之位 兌 	子姓之位 震 
妻之位也 兌 	躬身之位 坤 

臣之位也 兌 	君之位也 震 
大夫之位 兌 	身之位也 坤 

女性卦占多數,雖然總的來說指向吉祥,但也可能暗示對男性貞問者不利的影響,即“憂”。按《筮法》坤崇有“門、行”“母”。看到四位卦後,占卜者向宮地主、父母鬼神、某一位“東陵連敖”舉行了儀式。包山檔案中的宮廷地神似乎有兩個名字,201 有“宮地主”、232 有“宮侯土”。筆者假設公元前四世紀時一些領神已經開始分裂為陰陽兩種。因此 232 用“侯”的名字也可能代表男性地神,而 201 中的就可能是陰鬼。無論如何,坤卦指向“地”對邵佗身體的影響。另外因為“東陵連敖”不在邵佗父系祖先名單中,筆者也假設他可能代表母系祖先,即邵佗的姥爺。這次舉行的儀式對象有可能是女性鬼神。當天的天干地支所對應的卦——坤巽中也是母和長女。雖然在 201 簡中沒有直接出現巽卦,但是並不能據此否認當日干支對於卦的影響。

據包山簡 210,一年以後(公元前 317),另一個占卜者五生在夏天乙丑(坤巽)以承德筮法就三個“憂”(身體、宮室、外)進行占卜:

臣妾之位 坤 	子姓之位 艮 
妻之位也 兌 	躬身之位 兌 

外之位也 坤 	門之位也 艮 
宮廷之位 兌 	室之位也 兌 

這正是《筮法》“三女同男”的情況。此次兩個兌卦移到了下層并含有稀見爻數，坤則跑到左上位了。之前震的位置被少男卦艮卦代替了。卜者五生向天上的大神靈舉行了祈禱與祭祀，所謂“蝕太”即是太一被其他天象遮掩而看不見的現象，既是其“陰”面，也可能是一個女神。然後五生又向兩位方位神舉行了祭祀儀式：門外的“社”與門內的“宮行”。這兩位都可以從某處（地或宮廷內）移動到另一處（天或外面）。至於是否與《道德經》中“母”的形象一樣代表“無”與“有”之間的門戶則不得而知。坤卦占據“臣妾”與“外”的位置。“社”也算是個地神，可是會與天神溝通。按“坤崇”，“憂”也可能從“行”來。祭祀蝕太與社神的原因也可能均由坤卦（母親）占領了“外”的位置引起。

包山 210 簡下層出現了兩個有奇異號數字 8 的“大凶”兌卦，占據“妻”/躬身/宮廷/室的方位，似乎暗示邵佗的問題來自於家中的私人關係。妻子的象徵（坤）被放在“外”/“臣妾”方位；少男（艮）在“子姓”/“門”也可能代表稍微不正常的占位。8 出現在四位卦的下層，《筮法》第二十九節說得非常清楚：“在上為醪、下為汰”。據《說文》“汰”是淘米剩下的水；在《左傳》等書上這樣的髒水則是淫蕩行為的象徵。邵佗宮室內的預兆似乎不太吉利。因此五生“思攻解於明祖，且除於宮室”。“攻”與“除”是兩種除祟方法。前者指占卜者（或巫醫）以一個巫術工具比喻性地攻擊躲在身內的魔鬼或其他任何無名的“明祖”，這樣纔能“解放”邵佗身體。按《日書》巫醫可能是用荊楚帶有箭頭的桃木箭杆來“攻”。“除”這一除祟法似乎用於宮室類場合。占卜者驅散房間裏的陰鬼。

據包山簡 229，一年後（316 年），另一位占卜者陳乙又在夏天己卯（離離）日以共命筮法對“宮室”進行占卜：




外之位也 離 	門之位也 艮 
宮廷之位 坤 	室之位也 巽 

此次坤在“宮廷”位。艮則留在“門”位。另外兩個女性卦也出現了：離在“外”位，“巽”在“室”位。四位卦上下兩層都有稀見爻數，即非常“吝”。陳乙即祭祀了“宮行”，并对其進

行了“攻”和“除”兩種除祟儀式。“宮室”位被巽卦占據。按《筮法》巽祟有死於生產的女鬼。按之前所見的例子中占卜者已經認為邵佗宮室中有陰鬼,這可能與邵佗跟妻子和其他後來死掉的下等女人進行淫蕩行為有關。包山文獻沒有直接診斷邵佗患病是否源於蠱毒或與其他生活瑣事有關。以上是從數字卦和“憂”配合的儀式中猜測到的。

巽卦在《筮法》相關章節中和性與生殖有關。除了“祟”的例子之外,在第二十二節“乾坤運轉”中似乎含有生產的隱喻:“晦”時坤(母親)邀請乾(父親)行至東南方的巽位停留五天,在月亮出現後兩卦繼續下行至東北方的艮卦位停留五天。月亮够大時(等於一旬時間)兩卦返回原來位置(坤在西南,乾在西北)。按第二十四節“卦位圖、人身圖”乾坤運轉剛好在圖中人體軀幹周圍形成一個方塊。月亮不但有其運行規律,而且會直接影響人身。據陰陽五行系統排列八卦,《筮法》上的圖也將八卦直接標誌在人身各處。在人體圖上,巽在兩隻腿中的“股”位,艮在手位,坤與離在身體中間的“心腹”位。在四周的八卦排列中,乾坤巽艮正好組成方形的四隅。乾坤也代表夫妻關係,巽代表了坤之下長女卦,艮則代表少男卦。四卦(坤乾巽艮)之間關係正是之前提到第二十二節“乾坤運轉”隱喻生產,少男代表生產新生之月。按第二十一節“四季吉凶”巽與離春天為“大吉”,即生殖能力最強的時候。離代表中女。這個離卦也含有8。按離“祟”和8的“爻象”上,“下”層卦代表“內”,而包山此例“內”被兩個強力的女性卦占據。為了了解占卜者向“行”和“外”舉行的儀式,我們可以參考簡210之例,即“行”是將陰鬼從“宮廷”向“外”趕走的通道。





包山簡323記述了與簡210相似的情況:在同一天內同一卜者五生又以承德之法占問“宮室寢”之祟。此次稀見爻數沒有出現,但長男震卦代替了長女巽卦占據“宮室”位置。右上位的少男艮卦被大凶的少女兌卦所代替。最奇妙是從“宮廷”到“外”的通道都出現了剛好與當日天干地支相配的兩個離。

外之位也 離 	門之位也 兌 
宮廷之位 離 	室之位也 震 

占卜者向“宮侯土”和“行”舉行了祈禱與祭祀。向男性地神舉行的儀式也可能反應“震”代替“巽”的現象。占卜者又用一隻白狗來對“大門”進行稱之為“閼”(肢解)的儀式。在《筮法》“祟”節震祟多出現於一天的不同時段,也與天氣和方向有關,但并不與五生施行的儀式直接相關。其實時間關係對解釋這組卦也有幫助。譬如按“四季吉凶”表在夏天占領“門”位的兌卦表為“大凶”,在“室”位的震是“小吉”,在“外”與“宮”兩位的離則為“小凶”。與日辰相應的“離離”在四位卦的卦象中也出現了。似乎從宮廷到外面(經過“行”和“門”)的路

程的晦氣必須被除掉。

包山簡 239 例與簡 229 例發生於同一天。同一占卜者陳乙又以共命筮法占問邵佗“心服”疾病的緣故。從簡 239 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變化：1.多數卦的性別從女變為男；2.“憂”的對象變為邵佗的身體。很明顯之前的儀式都不成功，他所患的病不但沒有好轉，而且忽然變得更壞。下層（“內”部）有兩個震卦但在“躬身”位出現了 8，即“吝”的標識。

臣妾之位 乾 	子姓之位 艮 
妻之位也 震 	躬身之位 震 

這裏四卦皆為男性卦。陳乙先祭祀了“五山”，然後向邵佗男性直系祖先中最近的五代祖神舉行儀式。5 是陽數字。雖然“山”屬於“地”上的現象，按《筮法》山與父卦乾卦相關。乾崇有“山”，但是僅限於最強陽數字 9。包山數字卦中有數字 9，所以我們無法解釋祭祀五山的具體原因。陳乙又對“祖”與“兵死”鬼舉行了被稱為“思攻”的儀式用以“解”邵佗之病。因為女性祖先叫做“妣”（或“王母”）而當時參與軍事的多半是男人，這兩種無名鬼很可能也是男性。另外他也向“高丘、下丘”舉行了名為“脫”的除祟儀式。在四位男性卦之間占據“臣妾”位的乾卦是純陽卦。與其相關的“崇”中，在晚上如果乾卦含有相同數字，則“崇”有可能是因為“室中”或“父”。按《禮記》“室中”是舉行祭祀和玩投壺的地方。“室中”是否等於“中雷”（五祀之一）并不清楚。中雷則與地神有關。其含義似乎是“臣妾”位中有“父”鬼。如果將此次四位卦配上宮廷四位，數字 8 所在的卦就占據邵佗顧客的“室”，又配上簡 232 例中的“憂”（“宮室寢”），我們可以推測出蠱毒症狀。

蠱毒在商朝甲骨文材料中已經出現。蠱毒的症狀包括心臟與腹部疼痛。在古代思想中算是一種“熱病”。《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的記載最為有名。占卜者用各種方法追尋“崇”之由來（“敢問此何神也”）。一位秦國來的醫生診斷了，認為“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并用《周易》“蠱”六爻卦解釋“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在《周易》傳統內“風”代表下三爻“巽”卦象；“山”代表上三爻“艮”卦象；其實“蠱”卦已發生在以上 229 例）。晉侯之疾病由於其“內實有四姬焉”。

包山最後的卦例發生在同一天。占卜者五生又以承德法來占卜邵佗的身體問題。這裏我們看到“三男同女”情況中有父卦乾卦；唯一的女性卦也是長女巽卦。讓占卜者擔心的是稀見爻數出現在下與上兩層位置，非常危險。

臣妾之位 坎 $\begin{smallmatrix} 8 \\ \equiv \\ 1 \\ 6 \end{smallmatrix}$	子姓之位 震 $\begin{smallmatrix} 6 \\ \equiv \\ 6 \\ 1 \end{smallmatrix}$
妻之位也 乾 $\begin{smallmatrix} 1 \\ \equiv \\ 1 \\ 1 \end{smallmatrix}$	躬身之位 巽 $\begin{smallmatrix} 1 \\ \equiv \\ 1 \\ 8 \end{smallmatrix}$

邵佗的情況讓五生很煩惱，他問道：“毋有奈？”男性卦象占多數的現象出現後五生又對五個神靈，即五位楚國先王舉行了祈禱與祭祀。之後又舉行了“攻”以除“水上”和“没水”鬼的祟。數字8的很多“象”都與水有關：“凡爻象，八……爲水……爲魚……在上爲醪、下爲汰”。因爲該天的天干地支對應“離離”，對此也可能有些影響。離在《筮法》“卦位圖”上代表北方、水、黑色和“司藏”。離卦之“祟”也含有“没者”鬼。下右位置代表貞問對象的身體：這個位置又被强有力（跟“蠱”卦有關）的巽卦占據着，暗示邵佗的問題可能跟房事有關係。

這組卦還有一個現象值得考慮。如果查看原簡上的數字卦，我們會發現上兩爻和下四爻間有一點空間。如果不是竹簡原來的結綫痕迹造成的，不知是否因爲占卜者故意強調最後兩排正好相反的四個數字：左邊的陰爻6下面有三個陽爻111、右邊的三個陽爻111下有陰爻6。解讀《筮法》四位卦時有時需要考慮其他規則。譬如所謂“數入”或“數出”的“出入”情況，這可能等於數字“往陰”（入）或“往陽”（出）的方向。卦象右側的爻往陰的方向移動，左側的爻往陽的方向移動，二者正好互相抵消了，無法實現“入”或“出”的動作。這些是否引起占卜者“毋有奈”的反應也很難說。

與我們現代人一樣，古代占卜者無可奈何地解釋着“祟”的由來。值得慶幸的是發現了戰國時期埋藏於邵佗墓葬裏的占卜記錄，否則我們無法深入了解古代占卜的邏輯和男女鬼神系統。《筮法》中的內容很可能與包山簡中所記載的占卜有一些共同點。通過《筮法》來解讀包山簡中的卦象，當然免不了假設性地想像古代故事，然亦可當作門徑以進一步考察這一系統。

《清華簡(伍)》字詞零釋四則*

中山大學中文系

蔡一峰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清華簡第伍冊中《厚父》“惟司民之所取”之“取”當讀為“趨”，表促使、致使義；《封許之命》“旃補珅(武王)”之“旃補”與西周金文“捍敵”可能為同一詞；《命訓》“斂之以哀，娛之以樂”之“斂”即“𨾏”字，與傳世本异文“斂”字音近互通，後世或作“殮”；《湯處於湯丘》“饔”疑為美味珍饈之“珍”的專字。

關鍵詞 清華簡 取 旃補 𨾏 斂 𨾏

小文是我拜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及相關論著之後的幾則札記，謹求教正。^①

一 “惟司民之所取”

《厚父》簡9-10(釋文儘量用寬式，下文皆同)：

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禋祀，惟所役之司民啓之。

民其亡諒，迺弗畏不祥，亡顯於民，亦惟禍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

* 本文係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CTWX2015BS028)階段性成果。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此句從馬楠女士斷讀，馬氏謂“恭心敬畏”與“亡諒”、“畏不祥”與“弗畏不祥”、“保教明德”與“亡顯於民”、“慎禩祀”與“禍之攸及”句意兩兩相對，是司民作為致使的兩種相反的情況。^①甚是。“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禩祀”是司民教化的正面結果，“民其亡諒，乃弗畏不祥，亡顯於民，亦惟禍之攸及”是司民所致的負面結局，故“惟所役之司民啓之”與“惟司民之所取”二句亦成對舉。“啓”古書常見開導、教化義，“惟所役之司民啓之”之“之”當指代“民”，故謂因司民教化之方使其能明德敬祀；再之“惟司民之所取”，“所取”之義亦應與“啓之”合觀，馬文徑訓“取”為“招致”恐未達一間。竊以為“取”當是“趨”之假借，“趨”有促使、致使義。《荀子·王制》：“勸教化，趨孝弟”，“趨”之義與之相類，又《荀子·強國》：“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弃義之志而有趨奸之心矣。”此亦可資對照。“惟司民之所取”即謂司民所致使的種種負面情況。古書“趣”“趨”習見相假，^②可知通用條件無礙。

二 “旃補武王，攷敦殷受”

《封許之命》簡3：

亦惟汝呂丁，旃補珅(武王)，攷(干)敦殷受，咸成商邑……^③

“旃補”整理者釋文讀“扞輔”，未加注釋。從用字上看如此讀甚為直接。竊以為“旃補”與西周金文習見之“捍敵”當為同一個詞，如：

以乃族幹(捍)耑(敵)王身(《集成》02841 毛公鼎)

率以乃友幹(捍)耑(敵)王身(《集成》04342 師詢簋)

幹(捍)害(敵)王身，乍(作)爪牙(《集成》04467 師克盃)

“幹敵”典籍作“捍禦”，《列子·楊朱》：“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後漢書·逢萌傳》：“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④金文“捍敵”之後往往承以“王身”作賓語，與簡文“旃補”“武王”的搭配正相應。

① 馬楠：《清華簡第五冊補釋六則》，《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整理者釋文將“啓之”屬下為句，其餘斷讀亦與馬文略異。文意上以馬文為優。

② 參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360-364頁；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61-162頁。

③ “攷敦”可從整理者釋，或有學者讀作“翦(或踐)敦”，見蘇建洲《〈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年4月18日。

④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229頁。

“旃”“捍”均从旱聲，自可相通無需贅言，而讀“楠”爲“敵(禦)”，音理上仍需加補說。“楠”字从木从甫，舊未見，網友“無斃”先生認爲“木”旁爲“木”旁之訛，^①可從，但字从甫聲應該沒有問題。“甫”和“吾”古皆爲魚部字，聲紐一爲唇音一爲喉牙音，看似遠隔，但古文字材料已可見其有溝通。長方形、斗狀、器蓋同形之青銅器簠之自名有作“匱”(如《集成》4517)或“害”(如《集成》4574)等即是“甫”聲與“吾”聲相通之力證，另外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簡2-3“舜耕於歷山，陶拍於河匱”，李家浩先生讀“河匱”爲“河浦”已爲多數學者信從，這也表明从“甫”得聲的字確實與同韻部的喉牙音聲系有聯繫。趙彤先生對相關語音現象有專門分析，可參看。^②總之，“楠”和“敵”相通應該不存在音理上的障礙。

有學者已經指出，《封許之命》篇與西周冊命體金文關係密切，不僅體現在內容的結構格式，語詞、句子乃至用字都很接近，^③所以將“旃楠”與銘文“干敵”聯繫起來是可行的，其間反映的可能是詞的語音流變在文字上的表現。

三 “斂之以哀，娛之以樂”

《命訓》簡 11-12：

撫之以季(惠)，和之以均，
 斂(斂)之以哀，娛之以樂，【11】
 倂(訓)之以禮，教之以藝，
 正之以政，童(動)之以事，
 勸之以賞，畏之以罰，
 靈(臨)之以中，行之以崙(權，
 權)不法，中不忠，罰□□□□【12】。

簡本“斂”字傳世本對應之字作“斂”，整理者言：“斂”，讀爲來母談部之“斂”，《禮記·喪服大記》鄭注：“棺之入坎爲斂。”

“斂”字按整理者所隸定甚是，惜失於簡略，未指明爲何字。此字見於楚國璽印(《璽匯》0008)，李家浩先生已有文章將其釋爲“斂”，^④至確。陳劍先生繼而溯其源，認爲該字因西周

① 見簡帛論壇帖《清華五〈封許之命〉初讀》，第43樓。

② 趙彤：《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戰國楚系文獻中的交替現象及其解釋》，《中國語文》2006年第3期。

③ 如“四”作“三”、文王作“玫”、武王作“珣”、“一人”作“天”等，詳見程浩《〈封許之命〉與冊命“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

④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又載其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25-128頁。

金文“𨾏”字而來,是“贛”與“貢”共同的表意初文,蓋其變形聲化而訛“𨾏”爲“欠”聲。^①如嚴式隸定,古文字“𨾏”有“𨾏”“𨾏”“𨾏”“𨾏”“𨾏”等異構。目前所見古文字材料已見有不少以“𨾏”爲聲者,用法可概述如下:

A.單字

A1.用爲“陷”或“窩”,見上博四《季康子問於孔子》簡19、九店簡《建除》等。^②

A2.用爲“坎”,見上博六《用曰》簡20。又《詩·小雅·伐木》:“坎坎鼓我”之“坎”《說文·文部》引作“𨾏”。

B.从“貝”

B1.用爲“貢”,如“子貢”之“貢”楚簡均如是作,二字通用於傳世古書俯拾皆是。^③

B2.用爲“黔”,見上博四《曹沫之陣》簡53下、上博八《吳命》簡6等。^④

B3.用爲“坎”,見上博六《用曰》簡7,馬王堆帛書《周易》“坎卦”中“坎”即作“𨾏”。

B4.用爲“𨾏”,見新蔡簡零40、乙一11等,宋華強先生認爲是娛神降神中的歌舞儀式。^⑤

B5.用爲“恐”,如清華簡《繫年》簡30。^⑥

C.从“鹵”,用爲“黔”,見上博八《吳命》簡6。此字亦見於齊國陶文,有學者以爲雙聲符字,^⑦可商。

D.从“竹”(或又增从“土”),如包山簡遣冊255、264等,學者或以爲“筭”字異體。^⑧

E.从“金”,見於望山楚簡2·50,疑讀“坎”。^⑨

F.从“革”,見隨縣曾侯乙墓竹簡122、137。

雖然部分字的釋讀仍未明確,但其諧聲音讀大致可尋,聲紐上均不出喉牙音,韻部涉及侵、談、東三部。目前古文字材料未見“𨾏”有作“𨾏”,如按《集韻》注音“匹降切”,則知可从

① 陳劍:《釋西周金文的“𨾏(贛)”字》,《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又載其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

② 可參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920頁。

③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2頁。

④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陣〉新編釋文》,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又載其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⑤ 宋華強:《新蔡簡“百之”、“贛”解》,《簡帛》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⑥ 或有學者讀“陷”,但文意似不如讀“恐”允愜,詳參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璿《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311-312頁。

⑦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3250頁。

⑧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79頁。

⑨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110頁。

𦍋聲。^① 古音學家一般將“𦍋”歸談部或侵部，^②雖意見不大一致，但從各種材料來看，“𦍋”最早應該收-m，收-ŋ 是後起的。潘悟雲先生曾對“𦍋”字存有兩讀的現象有過解釋，他認為是受圓唇元音影響導致的異化音變（*koms > koŋs），另外還通過舉證“噏（-m）”和“喁（-ŋ）”為一詞異寫，進一步指出兩者是同樣的音理，不過是一個採用一個字形，另一個採用兩個字形而已。^③ 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今所見《命訓》篇出土本“𦍋”與傳本“斂”的異文就更加證實了二聲系確實很可能存在相同的音變軌迹。

孟蓬生先生曾對上古閉口韻尾的一系列字有過專門討論，其中就有將“𦍋”和 1985 年劉家莊南出土殷墟玉璋朱書中的“𦍋”字聯繫起來，認為“章”和“竜（龍的古文）”同源歸侵（談）部，“𦍋”中“章”可表聲。^④ 此說值得重視，不過，“章”在“𦍋”字中可表音應該反映在該字造字之初，後來進一步聲化而從欠或𦍋則表明其聲符功能已被取代，至少就目前所見戰國中晚期的楚簡用字來看，“𦍋”以“章”為聲的證據還不够充分。^⑤ 所以“𦍋”與“斂”這對異文，嚴格上講是欠（或𦍋）聲字和僉聲字的相通，而與章聲無關，至於孟文將郭店簡《緇衣》中對應今本“儉”的“𦍋”視為雙聲符字則恐未必是。

字形和語音關係厘清後，訓釋上也需補說一二。

舊注對“斂之以哀”之“斂”字多有歧解，一者謂“斂”為喪禮之事，指為死者穿衣、入棺，即古書常見之“大斂”、“小斂”，此說以潘振《周書解義》為代表，簡本整理者亦采此釋；一者訓“斂”為節制、不放縱之義，陳逢衡《逸周書補注》、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和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均主此說。^⑥ 二說分歧節點在是否需將“斂”視作使動用法。揆之上下文，當以前說為是，整理者所據可從。該文段形式齊整，文氣貫通，兩兩相聯，各自成對，不過每兩個語句構成的單位內部結構則未必盡同，如下文“勸之以賞，畏之以罰”，句式相同但用詞實異，“畏”可用為使動而“勸”則非，由此，“娛之以樂”之“娛”可視

① 《集韻·絳韻》：“𦍋，鼓聲”。按《詩·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說文》引作“𦍋𦍋鼓我”，又《詩·陳風·宛丘》：“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毛傳：“坎坎，擊鼓聲。”知《集韻》所訓自有其據。

② 舊有各家歸部的意見可參見何九盈、陳復華《古韻三十部歸字總論》（《音韻學研究》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251 頁），後出的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歸談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325 頁）；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歸侵部（上海：商務印書館，2011，294 頁）。

③ “噏”“喁”同訓“魚口上見”，又《韓詩外傳》“水濁則魚喁”，《淮南子·主術訓》作“水濁則魚噏”，詳見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46—247 頁。另，《左傳·文公二年經》：“盟於垂隴”，《公羊傳》《穀梁傳》“隴”作“斂”，亦同理。

④ 孟蓬生：《“竜”字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10 月 31 日，又《歷史語言學研究》第 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⑤ 從諸聲角度，西周以降諸“章”為聲的古文字已多歸陽部，古音學家對諸“章”聲字的歸部也沒有太大分歧（可參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107 頁）。

⑥ 詳參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5 頁；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4—15 頁。

作使動而“斂之以哀”之“斂”則未必；其次，“斂之以哀”與“娛之以樂”語義正相反，一以悲，一以喜，知“斂”當與喪事有關。《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割，以吊禮哀禍裁，以膾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可與之并觀，又或與孔子所倡“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的“無服之喪”有關。總之，舊將“斂”訓收斂、節制義實難順當，此“斂”當是與喪事相關之“斂”，後世典籍或作“殮”。為政者當體察民情，體恤民哀，民生乃邦國之大計，民之喪事亦當如此。


四 “飮時不旨饕”

《湯處於湯丘》簡 15-16：

不事問，不處疑；食時不旨(嗜)Z，五味皆哉(飮)，不又(有)所滯(滯)；^①不服𠂔(華)文，^②器不雕鏤；不虐殺，與民分利，此以自愛也。

Z: 

其中 Z 字整理者隸作“饕”，以為从繇省聲，喻母宵部字，讀為透母宵部之“饕”，據《說文》訓為貪。就字形看，整理者所隸至確，然以為从繇省聲則非是，楚簡从“繇(/繇)”字習見，對照即可知與 Z 字右部所从結構和寫法均有不類(字形如下舉)，且就目前發表的楚簡中確定為“繇”和从“繇”之字幾乎未見有省“肉”者。

繇/繇:  (郭店·語叢一 1);  (郭店·尊德義 30);  (上博六·平王問鄭壽 2)

再之“繇”“饕”雖韻部相同，但聲紐仍有距離，二字相通於古書似無證，如此破讀值得懷疑。准此，我們認為需要對 Z 字重新考慮。

許可先生似乎也意識到此處所釋未安，遂另立新釋，將 Z 所从之“𦘔”與楚簡用為“慎”字的“𦘔”溝通起來，認為字从食、𦘔聲，讀為“珍”，謂食材之珍貴。^③新說頗具啟發性，遁此思路，王寧先生進而提出“饕”為“𦘔”字或體，从食慎省聲，又認為“旨”不煩讀為“嗜”，“旨珍”乃以珍饈為美味之意。^④郭店《老子甲》簡 27：“和其光，迴(同)其𦘔”之“𦘔”，馬王堆帛書本

① 原整理者釋“滯”讀“瀦”，不少學者已指出所釋非是，今暫從網友暮四郎、yushiaojen 二先生意見釋讀，見簡帛論壇帖《清華五〈湯處於湯丘〉初讀》，第 16、17 樓。

② 詳參陳劍《據〈清華簡(伍)〉的“古文虞”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第五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史語所 2016 年 1 月 25-27 日。(此承王挺斌先生賜知，謹致謝忱)

③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網站，2015 年 4 月 8 日。

④ 王寧：《讀清華五〈湯處於湯丘〉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 年 4 月 21 日。

甲種作“𣎵”；陳偉先生曾舉大量“真”聲字與“𣎵”聲字相通之例，以說明包山簡 145 號所見人名“陳慎”當即“陳軫”，^①皆可為“饡”字之釋提供輔證。

文意上許氏的釋讀可從，“旨”照整理者讀“嗜”更為允恰，“食時不嗜珍”於古書有類似的表達，《禮記·坊記》、《春秋繁露·度制》有言曰“食時不力珍”，《後漢書·章帝紀》：“食無兼珍”皆可合觀。竊疑“饡”為美味珍饈之“珍”的專字，未必與訓為貪食之“飡”字有關。^②《說文》：“飡，貪也。從食、殳省聲。《春秋傳》曰：謂之饗飡。”“殳省聲”徐鍇《繫傳》作“𣎵聲”，《段注》從之。按訓貪之“飡”字古文字尚未見，先秦傳世古書亦罕有，《說文》“飡”字條所言《春秋傳》指《左傳·文公十八年》，今本亦作“饗”。古書“饗饗”連綿成詞，常見且固定，大徐本以為“飡”為“殳省聲”恐非毫無根據。

必須承認，此字之釋仍存在一點困難，就目前所見楚簡用作“慎”字的諸多寫法中，有見“𣎵”省“斤”而作“𣎵”（上博一《性情論》簡 39 兩例，簡殘損較嚴重），但尚未見“𣎵”省“斤”而作“𣎵”的。對該字的認識諸家還存在分歧，如認為從“𣎵/𣎵”聲，^③或認為從所聲（或所省聲），^④或認為從“丨/十”聲，^⑤或認為從幺（玄）聲（或丨聲），^⑥或認為“𣎵（𣎵）”字之省等。^⑦總之，這一系列字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2015 年 9 月 14 日初稿

2016 年 3 月 12 日改定

附記：本文蒙陳師偉武先生審閱教正，又承多位師友及匿名審稿專家惠賜寶貴意見，對本文的修訂給予了很大幫助，謹致謝意！

① 陳偉：《包山簡“秦客陳慎”即陳軫試說》，《古文字研究》第 2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

② 不否認二詞之間可能存在詞義引申的關係。

③ 陳偉武：《舊釋“折”及從“折”之字平議——兼釋“慎德”和“愆終”問題》，《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又載其著《愈愚齋磨牙集》，上海：中西書局，2014。

④ 陳劍：《說慎》，《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又載其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綏裝書局，2007。

⑤ 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計”——兼說“丨”為“針”之初文》，《古墓新知》，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3，又載其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⑥ 來國龍：《釋謹與慎——兼說楚簡“丨”字的古韻歸部及古文字中同義字孳乳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漢語言文字研究》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⑦ 曹錦炎：《蔡公子緇戈與楚簡中的“慎”》，《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

清華簡《繫年》所涉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疏證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 博

內容提要 清華簡《繫年》第三、四章簡文提供了討論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的新材料。但簡文敘述主題並非在處置殷遺事上,故有必要結合金文資料與傳世文獻對《繫年》所涉上述史事進行疏證。周人翦商後對殷遺的處理階段可分為武王時期與成王和周公時期兩個階段。傳統認為周公和成王采取的對待殷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肇基於武王時期。周公和成王的措施帶有相當強的次序性和針對性,根據具體情勢對不同的殷遺宗族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處置殷遺的過程中,侯的遷封成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創獲。

關鍵詞 《繫年》 殷遺 監、分而治

一 引言

有關殷遺的處置問題長久以來為治上古史者所關注。胡適先生 1934 年發表的《說儒》一文意在補章太炎《原儒》之不足,以所謂“儒”的本質與其來歷互相考證,認為最初的儒者都是殷遺,他們是周人所征服、統治和鎮壓的下層民族。^①此說曾激起馮友蘭、^②錢穆、^③郭沫

① 胡適:《說儒》,《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本三分),1934,1-284 頁。

② 馮友蘭:《原儒墨》,原載《清華學報》1935 年第 2 期,後收入《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303-330 頁。

③ 錢穆:《駁胡適之說儒》,原載《學思》1942 年第 1 期,後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 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73-382 頁。

若等先生的批判。^①但除馮友蘭先生稍作歷史探討，指出殷商貴族雖亡國之餘仍有土有民外，其餘各家多就儒的本質駁議，而鮮見觸及胡先生所自詡的來歷部分。建國以後，囿於歷史因素，學者觀點或以為殷遺民被嚴密壓迫，^②或說其被夷為周族的奴隸。^③另一方面傅斯年先生早年即指出周王對殷遺用一種“相當懷柔的政策”，^④之後張政烺、^⑤白川靜^⑥及杜正勝等諸位先生也陸續闡發了安撫懷柔之論。^⑦

事實上，殷遺作為周初一個亟待解決的政治問題，周人必然會根據具體的情形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故不少學者認為周人對殷遺的政策是鎮壓與安撫相結合的，如王玉哲先生認為“周公對商遺是采取了恫嚇、鎮壓與安撫、懷柔的政策”。^⑧楊寬先生則認為周初對殷遺民的政策可分為周武王和周公兩個階段：“武王設置三監，目的在於監督‘殷臣’，防止殷貴族的叛亂，但是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周公在平定三監和武庚的叛亂之後，就接受了這個教訓決定改變對殷及多方貴族就地監督的辦法，把他們集中遷移到一定的地點，以便加強監督、管理和使用。因此，大規模地強迫遷移殷貴族及其多方的貴族，就成為周公鞏固周朝統治的一項重要措施。”^⑨朱鳳瀚先生亦曾指出：“在周人統治者武力震懾與安撫懷柔相結合的政策下，商人舊有強宗大族的境況可大致歸納為五種類型：一是保持舊有的宗族組織結構作為周人貴族之私屬，隨之遷徙至封土；二是一個較大的宗族被分割成幾部分，各部或隨周人遷移至新的封土，或被移民至王畿及其他地區；三是留在舊居之地被周人統治者就地治理，仍保留了原有的宗族結構與集聚狀態；四是若干宗族被從舊居之地遷至新建之邑集中管轄；五是商遺民貴族得受封建立邦國”。^⑩

如上所述，目前學者對於周人對殷遺採取鎮壓與安撫相結合的政策並無太多異議，同時對於殷遺曾經被遷徙各處的研究亦有不少。除上舉外，如劉起鈇先生據《尚書》周初八誥探

① 郭沫若：《駁“說儒”》，原載《青銅時代》，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後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34-462頁。

② 岑仲勉：《“圖侯矢簋銘”試釋》，收入其著《西周社會制度問題》附錄一，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155-162頁。

③ 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35-41頁；李民：《〈尚書〉所見殷人入周後之境遇》，《人文雜誌》1984年第4期。

④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本三分），1934，285-290頁。

⑤ 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歷史教學》1951年第3期，後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277-313頁。

⑥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一上“十四、康侯簋”，神戶：白鶴美術館，1962-1982，141-166頁；《周初殷人之活動》，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三《上古秦漢》，北京：中華書局，1993，122-149頁。

⑦ 杜正勝：《周代封建考》，《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五十本三分），1979，661-709頁；《略論殷遺民的遭遇及地位》，《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三本四分），1982，661-695頁。

⑧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39頁。

⑨ 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8頁。

⑩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61-289頁。

討了周公對殷人的處理措施。^① 李宏先生等曾據周初青銅器的分布、製作、銘文等方面,分析周初殷遺民的身份、遷徙方向。^② 彭裕商先生曾經通過文獻和古文字材料,探討西周初年被周人遷往洛邑的所謂“殷遺”“殷頑民”的過程與身份等問題。^③ 楊朝明先生通過論述“殷民六族”在魯國的地位,來討論殷遺民在西周時期的社會地位。^④ 任偉先生利用考古及金文、文獻資料對燕國的殷遺民狀況進行分析。^⑤ 趙燕姣先生從微氏牆盤入手探討了周人對殷遺貴族統治策略的歷史演變。^⑥ 宮長為、徐義華二位先生近年對滅商後周人對殷遺的處置和控制措施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梳理,認為殷遺民實可分為三類:一是被遷置於各地的殷遺;二是留居原地的殷遺;三是逃居於邊地的殷遺。留居原地的殷遺在數量上最多,逃居邊地的則與政治事務疏遠,周人最重視的還是遷置各地的殷遺民上層,他們所處以成周、宗周、魯、齊、宋等地為多。^⑦

以上研究對於了解入周後殷遺民的境遇、流散等情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亦可以看出,似由於研究關注重點的不同和資料的缺乏,上述研究多着重於殷遺的遷徙分布情況,或關注殷遺的身份境遇,而對於西周初年周人之於殷遺民的具體遷徙方式與處理的歷史過程,則顯得有些關注不夠。清華簡《繫年》簡文在涉及西周史事的第三、四章中,亦發現有關於周初處置殷遺的史迹新知,給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新資料。

二 對《繫年》相關簡文的分析

《繫年》簡文第三章、四章的部分內容與處置殷遺民事有關,其釋文如下:

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案子耿。成王戾伐商邑,殺案子耿,飛廉東逃於商孟氏,成王伐商孟,殺飛廉,西遷商孟之民於邾虛,以禦奴虜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屈。

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於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衛人自康丘遷於淇衛。^⑧

① 劉起鈞:《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殷都學刊》1988年第4期。

② 李宏、孫英民:《從周初青銅器看殷商遺民的流遷》,《史學月刊》1999年第6期。

③ 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周初的殷代遺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④ 楊朝明:《試論西周時期魯國“殷民六族”的社會地位》,《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⑤ 任偉:《從考古發現看西周燕國殷遺民之社會狀況》,《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⑥ 趙燕姣:《從微氏牆盤看殷遺民入周後的境遇》,《文博》2009年第1期。

⑦ 宮長為、徐義華:《殷遺與殷鑒》,宋鎮豪主編:《商代史》卷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33-196頁。

⑧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141-146頁。為行文方便計,釋文用寬式。

簡文“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整理者訓為“繼”，意指成王繼武王之後再次伐商。陳劍先生讀為“踐”，^①筆者以為可從。網友飛虎讀為“翦伐”之“翦”，并引《呂氏春秋·古樂》“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踐”“翦”通用，其中“踐伐”與“屎伐”正相對應。^②“邾虐”，整理者指出楚文字中“虐”字常寫作“吾”，即《禹貢》雍州之“朱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下寫作“朱圉”，李學勤先生認為可確定其地在今甘肅甘谷縣西南。^③“奴虐之戎”，李先生亦曾指出，其詞例同於《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商末武乙文丁時期周人征伐的“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及“翳徒之戎”等。朱圉一帶從來即是戎狄羌人等部族居住活動的地區，而“奴虐之戎”更可聯想到殷末卜辭中屢次出現的虐方。虐方或作盧方，見於無名組與黃組卜辭。由於黃組卜辭最早是文丁時，故這些卜辭應屬於文丁至帝辛時期，也即與《紀年》所述“燕京之戎”等在同一時期。“奴虐之戎”應即卜辭中的虐方。^④“周屈”，整理者以為“屈”字從尸從山，鄔可晶先生認為此字應即見於戰國文字、傳抄古文的“人形立於山上”的“危”字。這裏可能將“人”形與“尸”“弓”之形訛混了，據《繫年》文意這裏當讀為“衛”，古書中“危”與“偉”“圉”與“垓”皆有相通之例，“危”讀為“衛”應該沒有問題。^⑤

在大致明確文意之基礎上，上引簡文於西周初年重要史事亦多有關涉。如“三監”“封建”等，特別是關於武王所設“三監”。傳世文獻對此舊有兩說：一說武庚及管叔、蔡叔，見於《左傳》定公四年、《史記·周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一說為管叔、蔡叔、霍叔，見於《逸周書·作雒》及《詩譜·邶鄘衛譜》，限於篇幅，茲不贅引。《繫年》簡文說：“殺三監而立哀子耿。”“哀子耿”，李學勤先生指出其即大保簋銘文中的昝子耶，祿父是名，武庚為其廟號，昝子耶可能為名號連稱。^⑥如是，則按《繫年》簡文文意，武庚不在“三監”之內。這也合乎“監”官設置的情理。簡文云“設三監於殷”，“三監”應在商都邑附近，則此殷地當即商後期殷王國之王畿區域內，簡文所言可與西周初年之史實印證。監類同於侯，是王朝設置的軍事職官，不完全等同於封君，所以管叔、蔡叔在殷地為監，并不等於在此地有封地。“三監”是周王派駐在殷王畿範圍內擔任監職的周人貴族，若按文獻記載，則管叔、蔡叔為“三監”，霍叔是否亦為“監”，簡文并未明言。簡文下文“殺三監”，并不可認為是管叔、蔡叔為殷遺所殺，簡文所記“三監”為“商邑興反”所殺，亦即為商邑中的殷遺民所殺，與多種先秦史書所記“三監”叛

① 復旦讀書會：《〈清華（貳）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23日。

②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80-83頁。

③ 李學勤：《清華簡關於秦人起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④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奴虐之戎”試考》，《社會科學戰綫》2011年第12期。

⑤ 復旦讀書會：《〈清華（貳）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23日。

⑥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亂，爲周公東征所剿滅之說不同，其可信程度自然要打折扣，恐當仍以多數文獻所記爲是。^①李學勤先生曾認爲簡文所指被殺的是參與監管的周人貴族與軍士，^②因其屬於“三監”，以“三監”代指也是合適的。

明了上述有關問題似可將簡文與本文討論有關者，簡要歸納其要點如下：

第一是周人翦商後對殷遺的處理階段可分爲武王時期與成王和周公時期兩個階段。

第二是武王時期對殷遺的處置是設立了三監。

第三是武王陟後，成王和周公對殷遺的處置方式，按簡文記述順序是其一將部分商奄之民西遷於邾圉，是秦之先，這部分商奄之民似應是隨飛廉叛亂而東逃的飛廉族屬；其二是遷殷遺民於洛邑；其三是封建衛康叔以侯殷之餘民。

簡單來說，簡文的史料價值主要在於一方面驗證了傳統上對於殷遺處置的兩個階段，以及成王與周公遷殷民於洛邑、建衛等方面的正確認識，另一方面對爭議已久的如秦人始源等問題亦給出了詳細的解釋，^③也爲殷遺的流向提供了新的資料。此外簡文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一是周初對殷遺的處置是否如簡文記載的那樣祇包括以上幾方面的內容，另外僅就以上成王和周公時期的處置內容來說，亦有一個時間次序與史事因果方面的問題需要梳理。

第一方面，《繫年》的編纂特徵之一是具有“紀事本末”的特徵而非後世完整的紀事本末體，故從《繫年》三、四章敘事主題看，第三章敘述秦人始源，第四章敘述衛人屢遷。此兩章於周初對於殷遺的處置問題均不是其敘述要點，故可知上述第一個問題即周初對殷遺的處置應該比簡文記述的要更複雜。這樣，聯繫傳世文獻與其他出土文獻資料對《繫年》所反映的內容再作推求，似能理出周公與成王時期處置殷遺民的次序。

三 《繫年》所涉處置殷遺史事的梳理

如《繫年》所述，周初對殷遺的處置分爲武王、周公和成王兩個階段，下文筆者亦將以此爲序，梳理遷殷遺民的史事過程，並對其中一些重點問題作出說明。

(一) 周武王與處置殷遺

雖然克商後武王在位時間短暫，但對於殷遺民的處置，武王時期即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並爲周公、成王時期的處理奠定了基礎。下文擬分兩方面加以說明：

① 參見朱鳳瀚《清華簡〈繫年〉所記西周史事考》，李宗焜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449-450頁。

②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③ 參見李學勤《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第11版；王洪軍：《新史料發現與“秦族東來說”的坐實》，《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第一是對殷遺的遷移。傳世文獻中對武王克殷後所採取的措施的記述也有不少,如《史記·周本紀》: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余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祀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①

按此記載,武王克商以後,基本上沒有觸動殷民原有的生活,而且通過保留殷祀、旌表賢德、振貧扶弱等系列懷柔措施以爭取殷遺的擁護。但是實際上,這些安撫措施之外,面對不同的殷遺,武王也會採取不同的手段。杜正勝先生曾據《逸周書》指出:“《克殷》獎勵降順,《世俘》警戒不服。任何戰爭皆有投降和抵抗的人,兼具二者,乃得全豹。”^②此言一語中的。

《逸周書·商誓》篇,經劉起鈇、李學勤等先生的考訂,確爲西周“同時代”文獻。李學勤先生甚至認爲“《商誓》之作,祇能在武王居於殷都的幾天期間。”^③據學者研究,《商誓》中已含有對殷遺民採取的具體措施。其一是針對留居商都的殷遺民,即“三監”政策。二是根據《商誓》云“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及惻興亂。”^④這句話大意是說你們這些“多子”與“百姓”要自我謹敬、順應天命,以便使上天永遠保佑我們西土,這樣你們就可以在西土安居。服從天命的安排,不要發起叛亂。此處“西土”與“彼”對應,將西土稱作“彼”,可明確武王講話地點是在殷都。而訓話對象“多子”與“百姓”應是指商王近親及與之爲善的同姓家族之長。^⑤照此理解,則《商誓》中實際反映了武王已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移到了西土。^⑥若以上理解不誤,則似可知周人遷移殷遺民的政策實始自武王。

許倬雲先生曾指出“把商人遷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區”,是“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武王克商後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將東土俊傑成族的遷到陝西,強幹弱枝,也使東土人纔能爲周用。”^⑦上述認識亦得到了史牆盤銘文(《集成》10175)的證明,其銘文記有“靜

① 《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126-127頁。

② 杜正勝:《略論殷遺民的遭遇及地位》,《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三本四分),1982,663頁。

③ 劉起鈇:《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95-96頁;李學勤:《〈商誓〉篇研究》,《古文獻叢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67頁。

④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五《商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59-460頁。

⑤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61、66、279頁。

⑥ 張懷通:《武王伐紂史實補考》,《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⑦ 許倬雲:《西周史(增補二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126-134頁。

幽高祖,在微靈處。雩武王既伐殷,微史刺(烈)且(祖)乃(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舍)宇於周卑(俾)處。”有關牆盤器主的身份,徐中舒先生認為其是微子啓之後。^①朱鳳瀚先生申論說:“徐中舒先生認為,牆盤所謂‘青(靜)幽高祖,在微靈處’,即是講微子啓的情況,與《史記》所載微子啓數諫紂王不聽,因而退隱之際遇符合。‘靜幽’、‘靈處’皆取幽隱退遜之意。頗有道理。盤銘所言微史烈祖,可能是微子之子輩,其家族當是微子宗族之小宗分支。所謂微史,即是史官,當是在受周武王封土後即任周人之史官,故有此稱。”^②這種看法既立足牆盤銘文,又結合文獻記載;既參考商末政治形勢,又符合商周命氏原則,因此是可取的。故史牆所在的微氏家族應當是在武王伐紂勝利後就歸順了周人,并被安置在西土岐周的殷遺民。此外,此時被遷居西土的殷遺,可能還有一些世家大族。這點從著名的“戈”氏、“𠄎”氏等家族器物西周早期在西土的不斷發現中亦可看出。^③這些殷遺,學者或以為是投順周人的殷人貴族,他們熟悉王朝典儀制度,并以此為西周王朝服務。^④

第二是對留在原地的殷遺的防範處置。這批殷遺仍是新生周王朝的心腹大患。上舉《周本紀》也以“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來描述其對此憂心忡忡的情況。^⑤武王采取“監、分而治”的策略,監即是三監,如《繫年》簡文“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殷。”“三監”以外,其措施值得留意的其一是選建洛邑,其二是封建微子。

《逸周書·度邑》與《史記·周本紀》中均有“武王度邑”的相關記載,^⑥如《周本紀》云: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

清末出於陝西岐山,現藏國家博物館的天亡簋銘文(《集成》04261)中亦有“天室”的記載,其銘云“乙亥,王又(有)大豐(醴),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佑)王。”不少學者將“天室”解作“太室”,以為“天室”即是太室山。如楊樹達先生、唐蘭先生等即將天亡簋中的“天室”、《度邑》中的“天室”與太室山聯繫起來。^⑦所謂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在今豫西一

① 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陝西周原考古隊、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48-263頁。

②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283頁。

③ 參見朱鳳瀚《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南開學報》1983年第3期;何景成《商末周初的舉族研究》,《考古》2008年第11期;張懷通《武王伐紂史實補考》,《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④ 宮長為、徐義華:《殷遺與殷鑒》,146頁。

⑤ 《史記》卷四《周本紀》,128頁。

⑥ 《逸周書》卷五《度邑》,472、479-481頁;《史記》卷四《周本紀》,129頁。

⑦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142、235頁;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12頁。

帶。^① 三塗，即三塗山，楊伯峻先生曾考訂其地在今河南嵩縣西南十里伊河之北。^② 岳鄙，黃河北邊的太行山南麓之地。^③ 河、伊、洛，即今黃河、伊河、洛河。結合三塗、岳鄙、伊洛、黃河等山川地理，學者認為武王描繪的是在嵩山之巔見到的情景。這似意味着武王的度邑是在太室山上進行的。^④

1963年出土於陝西寶雞，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何尊銘文（《集成》06014）亦印證了武王選址營建洛邑的記載。其銘文有：“惟王初遷宅於成周……曰：‘……惟珣（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惟王五祀。”從上述材料可知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登臨太室選擇雒邑位址，開啓了西周初年周人營建雒邑進而經營東方的序幕。^⑤ 洛邑地區地理位置特殊，雖靠近原殷商王畿，^⑥但卻由南部的三塗山、北部的黃河、西部的崤山與東部的嵩山圍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周人初建據點於此，既便於深入殷商王畿加以管控，又不易遭受殷遺的合圍。遺憾的是武王很快去世，營建成周的任務在周公攝政的時期纔得以完成。

選建成周以外，武王采取的另一措施似是封建微子。有關微子的始封，傳世文獻中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以成書於西漢以後的《史記》及《書序》為代表，云封微子成王時，後世多數學者都從《史記》所說。

另一說在武王時，多見於戰國傳世文獻的記載。如《左傳》僖公六年記楚成王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事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⑦《史記·宋微子世家》將“使復其所”寫作“復其位如故”。^⑧ 清人劉文淇、楊伯峻先生等認為“復其所，復微子之國也。微國本在紂之畿內，後又封武庚於畿內，乃改封於宋。”^⑨楊寬先生則認為復其所就是使其回歸原來的封邑，其地在今山東梁山西北，後來再徙封到宋國，並認為《史記》說成王封微子是錯解了《書序》意思。^⑩ 此外，《荀子·成相》云“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⑪《禮記·樂記》

① 《史記》卷四《周本紀》，130頁。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1246頁。

③ 《史記》卷四《周本紀》，130頁。

④ 蔡運章：《周初金文與武王定都洛邑——兼論武王伐紂的往返日程問題》，《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林沄：《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

⑤ 張懷通：《武王伐紂史實補考》，《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商末王畿的南境在牧野一帶，朝歌位於王畿南緣，故洛邑處於王畿周邊。參見韋心滢《殷代商王國政治地理結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45頁。

⑦ 《左傳》卷一三《僖公六年》，北京：中華書局，2009，3903頁。

⑧ 《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1610頁。

⑨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280-281頁；楊伯峻：《春秋左傳注》，314頁。

⑩ 楊寬：《西周史》，123-124頁。

⑪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一八《成相》，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458頁。

記載武王“投殷之後於宋”，鄭玄注曰：“投，舉徙之辭也。時武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之。”^①《呂氏春秋·慎大》亦云：“武王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②

陳立柱先生針對文獻記載宋之宗廟不在國都而在其北數十里的薄邑、微子死於薄邑而不是宋之國都、封於宋而仍稱“微子”，甚至其弟仲衍繼位仍稱“微仲”，直到其侄稽繼位纔曰“宋公”等與微子封宋不能契合的疑問，認為“微子不稱‘宋公’，說明接受成王之命者不會是微子”；並聯繫微子在武王克商過程中的事蹟指出“封建微子的周王祇可能是武王，先秦文獻多言武王封微子，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三監之亂平定後，宋公稽承續了微子一脈替代武庚成為殷之宗子，纔被周公和成王徙封到宋。^③此說既圓融地解答了上述疑問，又明確了武王時期微子的事蹟與地位，似是目前關於此爭論一個較為合理的看法。

如此，武王時封建微子於薄，其封地仍屬殷人舊地。學者或以為在其地原有殷遺的基礎上，周人又從殷王畿地區遷來不少的殷遺民，^④比如原屬微子宗族的殷遺當有大部會遷至此處。另外，將王畿地區的殷遺分割部分予微子，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武庚的實力。周人這一策略的成功之處體現在三監之亂時，微子控制下的殷遺並無任何文獻記載顯示其參與到武庚的叛亂中來。

上文一方面對武王時期即開始的遷殷遺民至西土的史事進行梳理，另一方面除《繫年》記載“設三監於殷”之外的，對其他留在殷商王畿內部的殷遺所采取的“監、分而治”的處置措施亦進行探討，而討論“選建洛邑”“封建微子”的目的還在於上述兩處在周成王、周公時期均各自成為遷殷遺民的主要流向之一，故不得不事先有所交待。

(二) 成王、周公之處置殷遺

武王去世後由於周公攝政輔佐成王而爆發三監之亂，^⑤按《繫年》記載，在成王為反叛而克殷的戰事中武庚被殺，與《史記》等記載“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相同。^⑥《逸周書·作雒》則云“王子祿父北奔”，^⑦有所不同。武庚最終命運如何，無關本文宏旨。但是平亂後留下的殷遺，特別是對隨武庚作亂殷遺之處置，是周公和成王必須解決的問題。上文已述，《繫年》簡文按分章記事敘述的處理順序是一是西遷商奄之民；二是遷殷民於洛邑；三是封建衛康叔以侯殷之餘民，所以首先需要藉助其他材料以廓清三者的時間順序，然後就相關問題再作統一解釋。

① 《禮記》卷三九《樂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3344 頁。

②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一五《慎大覽·慎大》，北京：中華書局，2009，357 頁。

③ 陳立柱：《微子封建考》，《歷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④ 宮長為、徐義華：《殷遺與殷鑒》，156 頁。

⑤ 周公攝政而并未稱王，參見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⑥ 《史記》卷四《周本紀》，132 頁。

⑦ 《逸周書》卷五《作雒》，517 頁。

簡文云“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乃先建衛叔封於康丘，以侯殷之餘民。”學者多解此句“先建”意為“選建”，^①與表時間上的先後意關涉不多。而“既”“乃”等連接詞却帶有明顯的時間先後次序。由是據簡文而言，“封建衛康叔”的時間是在“遷殷民於洛邑”之後。此似明確了周公和成王對於殷遺的處理是有步驟的、分階段的帶有策略性的政策行為。

由簡文“成王屎伐商邑，殺寡子耿，飛廉東逃於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圉”可以看出，飛廉在周公和成王攻破商邑後東逃至商奄氏。周公和成王繼伐商奄，殺了飛廉。因此，伐商邑與商奄之間是有時間先後順序的。《尚書大傳》曾描述周公攝政時期的業績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②與《繫年》記載時序相同。由是，周公和成王處理商邑殷遺的時間要在“西遷商奄之民”之前。《尚書·多士》：“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③其中“昔朕來自奄”亦說明殷人自殷王畿地區遷往洛地的時間是在周公攝政三年踐奄之時。^④故在“成王伐商蓋(蓋)”之時，已經開始了對原殷商王畿地區參與叛亂的殷遺的處理。這也在情理之中，若放任王畿之內曾參與反叛的殷遺不管，則東征踐奄勢必不會有穩定的後方。《史記·周本紀》亦記載“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⑤是“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是在“成王既遷殷遺民”之後。

而與上述認識相左的是《尚書·多士》序有“成周既成，遷殷頑民”。^⑥學者多以為《書序》是秦漢時人的作品。^⑦例如序文中有“殷頑民”之稱，朱芳圃先生曾經指出：“按《古文尚書》及《逸周書》，凡稱殷朝的遺民概謂之‘獻民’或‘獻臣’，至於頑民一詞，始於漢代，非周初所固有。”^⑧此似可作為漢人於遷移時間理解有誤的旁證。彭裕商先生亦指出“《書序》記載殷民的遷徙，說：‘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以成王五年的營洛為營建成周，^⑨而繫殷遺的遷徙於

① 參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璿《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208-209頁。

② [清]王闕運：《尚書大傳補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44頁。

③ 《尚書》卷一六《多士》，北京：中華書局，2009，469頁。

④ 參見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⑤ 《史記》卷四《周本紀》，133頁。

⑥ 《尚書》卷一六《多士》，466頁。

⑦ 參見劉起鈺《尚書源流及傳本》，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32頁；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97頁。

⑧ 朱芳圃：《殷頑辯》，《中州學刊》1981年第1期。

⑨ 朱鳳瀚先生認為，周公攝政七年的時間未必包括在成王紀年以內。洛邑的營建始於周公攝政五年，至七年初成。《尚書》之《召誥》《洛誥》所記即此七年洛邑初成後，召公、周公在邑內“相宅”“卜宅”，實乃為成王選擇營建王宮之位置。同年，周公致政成王，成王於新邑主持盛大祭典，是為元祀。何尊銘文所記為成王親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時事，此時洛邑內王宮已建成，成王始遷都於洛邑，洛邑自此亦稱成周。參見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是年,與《多士》《多方》等篇的記載明顯不合。”^①洛邑的大規模營建始於周公攝政五年,至七年初成,亦稱“新邑”。劉起鈞先生、彭裕商先生等認為營建成周、居於新邑的主要是來自殷商王畿的殷遺,^②是故必有先遷殷民於洛邑而後有營建之事。隨着戰爭的進行,衆多的殷遺被集中到洛邑,爲了更有效地控制,周人也加大監管力量。人口的集聚使得原來的城邑日益不能滿足需要,這當是促成了“五年營成周”之事發生的因素之一。

但是明末清初顧炎武認爲此“殷頑民”爲凡參與武庚叛亂的“殷民”似有一定道理。顧氏認爲其性質“皆畔逆之徒……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他們被周公遷至洛邑。另一些則不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讎者也。”^③按顧氏所見,遷於成周的是參與叛亂的殷遺中的世臣大族,分予康叔的“殷民七族”是“不與乎畔”的平民。以是否參與叛亂作爲分辨標準,合乎《繁年》簡文“既遷殷民於洛邑……乃先建衛叔封於康丘”的敘述。惟遷往洛邑的是世家大族自無異議。但是分予康叔的亦未必皆是平民,所謂世家大族與平民蓋是針對殷遺貴族與殷遺普通宗族而言。^④故“克殷”之後,當務之急一方面在於處置參與反叛的王畿地區的所謂“殷頑”,另一方面對於飛廉、商奄等與武庚一起叛亂的宜乘勝追擊以求得最終勝利。如此可明確“遷殷民於洛邑”在“西遷商奄之民”之前。

接下來需要討論“西遷商奄之民”與“封建衛康叔”的時間順序。上述逯簋銘文(《集成》04059)同樣涉及到“封建衛康叔”的史事,其銘爲“王來伐商邑,征令康侯畺(鄙)於衛。濬(洧)嗣土逯眾鄙,乍(作)厥考隣彝。𠄎”,就銘文字面意思來說,“康侯畺(鄙)於衛”事似與“王來伐商邑”事可直接接續。按鄙,是指邊鄙之地,在此指邊邑。《左傳》莊公二十六年“群公子皆鄙”,杜預注:“鄙,邊邑也”。^⑤《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王使來告難於鄭伯,曰王“鄙在鄭地汜”,^⑥亦即僻居於鄭地之邊邑汜。此銘言“鄙於衛”則應是指在衛的邊邑內居住或建邊邑於衛。“鄙於衛”即不在衛中心區域(那裏當是殷餘民所居處)。在衛地內建邊邑的目的,自然是令康侯將自己的屬下從康丘遷到那裏以控制整個舊殷商王畿地區。這與簡文所言“衛人自康丘遷於淇衛”當指的是同一件事,也當與《左傳》定公四年記成王時封康叔“……

① 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劉起鈞:《周初八〈誥〉中所見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種措施》,《殷都學刊》1988年第4期;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③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二《武王伐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5頁。

④ 參見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274頁。

⑤ 《左傳》卷一〇《莊公二十八年》,3866頁。

⑥ 《左傳》卷一五《僖公二十四年》,3947頁。

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有關，^①這一舉措可能是康侯受命封於殷墟的具體行動。^②

李學勤先生曾解釋簡文說：“封康是‘侯殷之餘民’，可見康即在殷的鄰近地……衛國建立以後，衛人纔‘自庚（康）丘遷於淇衛’……至於衛國的遷都是在叔封在世之時，還是其子康伯之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③按逯簋銘言“鄙於衛”並非“侯於衛”，因此康叔雖封於衛地，但並未見稱“衛侯”，康叔在已見青銅器中亦祇自稱“康侯”。而《史記·衛康叔世家》記康叔卒後，其子仍稱康伯，康伯以後直至頃侯前的五代，亦皆稱“伯”，未見稱侯，直至頃侯時，由於“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④西周諸侯稱“侯”必有王命。^⑤照此理解，對於西周初年衛之史事，簡文記載的是封建衛叔封於康和徙衛兩件史事，而逯簋銘文強調的則是將衛叔封從康徙封到衛地的一件史事。如此“王來伐商邑”似作爲“征令康侯畺（鄙）於衛”的背景出現，意在揭示康叔所鄙之衛爲原殷商王畿地區，所受之民亦爲此一地區的殷之餘民。李先生亦撰文指出，康侯封都於殷人故地範圍內的康丘，而原爲商王紂所居的沫（朝歌）反處於邊境。^⑥如此，“康侯畺（鄙）於衛”似需要給“王來伐商邑”這一“二次克殷”的重大戰事留下足夠的時間。

由上述可知，《繫年》所記之“西遷商奄之民”與“遷殷民於洛邑”中殷遺所屬似均爲所謂“殷頑”，衛康叔所“侯殷之餘民”似屬於未參與叛亂的殷遺。按《尚書·大傳》“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的記載，《繫年》所記上述三事的發生次序簡單說來似是“遷殷民於洛邑”最先，“西遷商奄之民”隨後，“封建衛康叔”次之。

在廓清三者的時間發生順序的基礎上，即可以就周公與成王處置殷遺的具體方式與處理過程所體現的特點作如下概括：

第一，綜言之，周公與成王似繼承了武王“監、分而治”的策略，針對具體的情況與族群採取不同的措置方式。首先處理的便是參與叛亂的殷遺，按照平定的先後時間先將原屬王畿地區的殷遺大部遷至洛邑使之營建洛邑；同時繼續東征踐奄，勝利之後將部分商奄之民遷至朱圉、薄姑等地。然後纔是處理那些未曾與亂的殷遺，除其一部分宗族遷至各邊地諸侯國分割治理外，留在原地的殷遺也通過封建諸侯等方式加以監視。

第二，具言之，不同的殷遺宗族似按照殷王室族屬與商奄等族屬的區別，分別將王室大族分置於宗周與成周，降順的置於宗周爲王朝所用，頑固不化者使營建成周并居之以便於集

① 《左傳》卷五四《定公四年》，4636 頁。

② 朱鳳瀚：《清華簡〈繫年〉所記西周史事考》，449-450 頁。

③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解答封衛疑謎》，《文史知識》2012 年第 3 期。

④ 《史記》卷三七《衛康叔世家》，1589-1591 頁。

⑤ 朱鳳瀚：《覲公簋與王令唐伯侯於晉》，《考古》2007 年第 3 期。

⑥ 李學勤：《由清華簡〈繫年〉釋讀沫司徒疑簋》，《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 年第 3 期。

中管理。而對於商奄之民之頑固不化者，除《繫年》所記部分遷於邾邰外，《史記·周本紀》還記載“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①《書序》亦見類似記載。朱圉、薄姑等均是邊地，分別處於抵禦奴虔之戎、淮夷、徐戎等的前綫，這種分散策略一方面利於周人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其抵禦外族的進攻。

第三，對於未曾與亂的殷遺的處理，同樣基於防範的目的，將部分宗族以諸侯私屬的形式，使其隨之遷徙至封土，甚至拆分某些勢力龐大的宗族。^②上引《左傳》定公四年於此已有記載。文獻記載之外，如任偉先生等對燕國殷遺的考察，^③亦屬此例。田野考古資料中亦多見各諸侯國中殷遺的活動情況，學者多有舉例，^④茲不贅述。

最後需要留意的是，成王和周公還通過遷封措施，對留在原地的殷遺加以監視、控制。《繫年》所記衛康叔的遷封外，還有上述微子的遷封。《史記·管蔡世家》記載：“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⑤這裏宋國所得殷遺當不是指其原有人口而言，應是周人把原屬畿內武庚的一批較順服的宗族充實到宋國。

不惟對留在殷王畿地區的殷遺通過遷封諸侯加以管理，《史記·魯周公世家》記武王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⑥與《左傳》定公四年杜預注均以曲阜爲少昊之虛。《左傳》昭公九年記周大夫詹桓伯曰：“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孔穎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⑦是漢以後學者多以商奄即在魯國都城即曲阜一帶。上引《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言伯禽受封時“因商奄之民”，^⑧是其主要因承的是原屬商奄的當地土著殷遺。但是《史記·魯周公世家》記周公在武王時已被封於少昊之虛，《左傳》昭公九年亦記商奄武王時已屬周。上文已述商奄實際歸屬周人則應是在周公東征以後。現藏國家博物館的禽簋（《集成》04041）銘文“王伐蓋侯”、綱劫尊（《集成》05977）銘文“王征蓋”等西周金文中，亦明記成王時伐蓋。故伯禽此前所封之“少昊之虛”似不應在商奄。曲英傑先生亦曾指出：“然伯禽就封於魯後，既有成王踐奄之事發生，則魯、奄二國之都顯然不在一地。不過，從魯都所在原屬商奄之地來看，二者相距又不會很遠。”^⑨這與微子之封薄在宋都以北，衛康叔之封康在衛之鄙差相仿佛。朱鳳瀚先生近據新出匚器亦論定魯煬公時魯國始將都城正式設立於曲阜。^⑩目前看來，魯曾

① 《史記》卷四《周本紀》，133 頁。

② 史廣峰、郭文佳：《從西周邶器之散失看周初對邶族之處置》，《文物春秋》2000 年第 2 期。

③ 任偉：《從考古發現看西周燕國殷遺民之社會狀況》，《中原文物》2001 年第 2 期。

④ 參見宮長爲、徐義華《殷遺與殷鑒》，133-196 頁。

⑤ 《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1565 頁。

⑥ 《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1515 頁。

⑦ 《左傳》卷四五《昭公九年》，4466 頁。

⑧ 《左傳》卷五四《定公四年》，4635 頁。

⑨ 曲英傑：《先秦都城復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262 頁。

⑩ 朱鳳瀚：《匚器與魯國早期歷史》，《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19 頁。

遷封亦有相當大的可能。

此外，文獻中對於錯叔繡的始封時間亦存在爭議。^①《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縣”云：“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②其地亦是商奄舊地，再聯繫康叔封於衛的事例，則錯叔繡之封於滕，似亦應屬於踐奄後為處置商奄殷遺的遷封措施。曾有學者從禮儀角度探討西周封建諸侯中始封與徙封的區別與聯繫，認為徙封是改換諸侯封地，使其統治新獲土地。徙封強調城邑土地。^③所謂徙封強調城邑土地蓋始於此時。

四 小結

對殷遺的處置是西周王朝立國之初的大事之一，經過武王、周公與成王兩代人的努力，最終基本消弭了殷遺的反抗勢力，終有周一代未見殷遺再掀起大的波瀾。除了上文關注的強制遷移外，殷遺的流散方式還有自發遷徙，如箕子出奔；隱世不出，如伯夷叔齊等。當然，強制政策之外，周人之於殷遺也會採取拉攏、融合的綏靖政策，殷遺貴族祇要臣服於周，他們還是會被周王朝重用的。^④《左傳》定公六年記載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⑤可見殷遺的社會風俗在魯國仍得到很大程度地保存。^⑥學者於此成果頗多，故不贅述。而殷遺問題之適當處理對於當時與後世之影響，多位學者亦已進行深入的研究，指出周初實施的分割、遷徙殷民的政策，改變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進程，促進了當時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是導致中國古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⑦

根據《繫年》簡文提示，筆者結合傳世文獻與金文資料，就周初王朝處置殷遺的歷史過程進行討論，似可將主要觀點歸納如下以明《繫年》對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的徵補情況：

第一，傳統認為周公和成王采取的對待殷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肇基於武王時期。如遷殷遺於周人易於控制的區域（如宗周）；設立三監、選建成周等“分而治之”以削弱殷遺實力的措施均始自武王，當然周公在這些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亦值得重視。

第二，周公和成王的措施帶有相當強的次序性，隨着“二年克殷”的結束即開始“遷殷民於洛邑”，“三年踐奄”之中有“西遷商奄之民”，最後纔通過“封建衛康叔”等措施來處理未曾與亂的殷遺宗族。

①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三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頁。

②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1572頁。

③ 于薇：《始封在廟與徙封在社：西周封建的儀式問題》，《歷史教學》2014年第2期。

④ 任偉：《從考古發現看西周燕國殷遺民之社會狀況》，《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⑤ 《左傳》卷五五《定公六年》，4649頁。

⑥ 楊朝明：《試論西周時期魯國“殷民六族”的社會地位》，《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⑦ 參見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285-286頁。

第三,周公和成王的措施還帶有針對性,特別是“西遷商奄之民於朱圉”的記載與《史記》等文獻驗證,證明了周公將原殷王室親貴大族集於成周,將一般宗族分散於諸邊地,以貫徹“監、分而治”的戰略意圖。

第四,周公和成王通過遷封發展了封建政策。“先建衛叔封於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衛人自康丘遷於淇衛。”聯繫宋、魯、滕等的遷封,既就近解決了留在原地殷遺的管理問題,又開其後徙封虞、邢等侯之先河,是西周封建制度史上一大創獲。

最後,新出土文獻中記載的史事,往往會帶給我們相當多的史學新知,但由於其成書時代、編纂體裁的局限,需要將之與《尚書》《逸周書》等同時代傳世文獻、同時代金文資料及田野考古資料相互印證,與《左傳》《史記》等較可靠的傳世典籍相互參考,纔是科學認識當時史實的正確途徑。

附記:感謝朱鳳瀚教授悉心審閱、修訂拙文,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修改意見。拙文初稿曾呈請陳偉教授、李天虹教授撥冗教示,在此謹致謝忱!

上博簡拾詁二則*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王凱博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討上博楚簡若干疑難字詞的訓釋問題。上博簡《容成氏》簡 29“喬能”，以往大都讀“能”為“怠”、訓為懈怠，這一讀法不但不符合楚系文字的用字習慣，而且在邏輯上前後語句也不能很好貫通。據簡文的表意邏輯，“喬能”所表達的當屬詐偽、奸邪等類意思，執其語音以求，“能”當讀作“慝”，《商君書·君臣篇》“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可與簡文對讀，厘清“喬能始作”跟前後語句間的邏輯關係，證明“民乃息”之“息”以往訓蕃息是可靠的。清華簡《芮良夫毖》簡 19“德刑慝紕”之“慝”或讀作“怠”，從用字或通假上說，同樣不合習慣，“慝”可讀“忒”，差失之意，“紕”則讀為“逌”，回辟、迂邪之意。上博六《用曰》簡 19 的“虔”，當讀作“阻”，是恃、怙之意，與下句的“怙”對文而同義。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簡 5 的“紕”，也應讀作“阻”，作為名詞，在簡文中它是喻指用法，將尚父比作保護、安定周邦的靠山，是為凸顯尚父之於周的重要性。

關鍵詞 上博簡 字詞 訓釋

通過學界的不斷努力，上博簡中的很多疑難字詞已得到確釋，但至今還有某些字詞未得其善解，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探討。本文想就這方面問題談兩則自己的意見。有不妥之處，請讀者多批評、指正。

* 本文係“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CTWX2015BS022)”成果之一。

上博簡《容成氏》講到禹疏導洪水後，命后稷為農官，后稷“食於野，宿於野”，終致“五年乃穰”，其後簡 29 曰（釋文從寬）：“民有餘食，無求不得，民乃𡗗，喬能始作，乃立皋陶以為理。”

其中的“𡗗”，整理者李零釋作“賽”，謂“指爭利競勝”。^①蘇建洲認為是指“賽禱”之“賽”，報神福之意。^②何有祖讀作“塞”，引《說文》“塞，實也”、《廣雅·釋詁》“安也”釋之，“民乃塞，驕態始作”指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纔安定下來，却出現了新的問題（即“驕態始作”）。^③陳偉讀為“塞”，訓為安定。《方言》卷六：“塞，安也。”郭璞注：“物足則定。”正與簡文上云“民有餘食，無求不得”相應。^④林素清、^⑤單育辰^⑥則都認為，“𡗗”是“實”的一種訛混寫法。子居讀“賽”為“息”。^⑦網友“易泉”、^⑧唐洪志援清華簡《繫年》“賽”“息”通假的例證，也讀作“息”，訓蕃息，“民乃息”指人民蕃息衆多。^⑨最近，陳劍經辨析字形後認為“𡗗”左部所從係“人”而隸釋作“僂”，但他不同意“僂”讀作“息”，而認為“僂”當讀作“僂”，訓為薄、蕩。^⑩

關於“喬能始作”，整理者李零認為即“驕態始作”，謂“指訟獄之事起”。^⑪蘇建洲將“驕態”譯作“驕傲的心態”。^⑫鄧少平、^⑬孫飛燕^⑭則先後指出“喬能”當讀“驕怠”，驕傲、懈怠之意。從相關的研究論著看，讀“驕怠”之說早就被學界普遍接受，至今未見異議。

實際上，將“喬能”讀為“驕怠”并不足信。首先，此數語互為關聯，語意上不斷遞進、深入。“驕怠始作”是“乃立皋陶以為理”的原因，但人民驕傲、懈怠了，如何就致使禹非得以極

① 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3 頁。

② 蘇建洲：《〈容成氏〉東釋（三）》，簡帛研究網，2003 年 4 月 3 日；蘇建洲：《〈容成氏〉釋譯》，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146 頁。

③ 何有祖：《讀上博簡〈容成氏〉偶得》，簡帛研究網，2003 年 7 月 11 日。

④ 陳偉：《竹書〈容成氏〉零識》，《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古文字學與經典詮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2003 年 10 月，295-300 頁；陳偉：《竹書〈容成氏〉零識》，簡帛網，2005 年 11 月 13 日。

⑤ 林素清：《楚簡文字叢釋（二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論文，杭州，2004 年 11 月 8-10 日，1-2 頁。

⑥ 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研究》（吉林大學 2008 年“985 工程”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110 頁。

⑦ 子居：《上博二〈容成氏〉再編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 年 6 月 7 日。

⑧ 參見簡帛網“簡帛論壇”版塊“《容成氏》的‘民乃賽’考釋補證”主題貼下的討論，2011 年 12 月 22 日。

⑨ 唐洪志：《說〈容成氏〉“民乃賽”及相關問題》，《文物》2013 年第 8 期。

⑩ 陳劍：《〈容成氏〉補釋三則》，“紀念容庚教授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屆年會”散發論文，廣州東莞，2014 年 10 月 10-12 日。

⑪ 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273 頁。

⑫ 蘇建洲：《〈容成氏〉釋譯》，127、128 頁。

⑬ 鄧少平：《上博竹書〈容成氏〉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徐心希），2009，8 頁。

⑭ 孫飛燕：《〈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廖名春），2010，109-110 頁；孫飛燕：《讀〈容成氏〉札記》，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194-195 頁。

致的法律來予整治，其間跨度過大，難以理解。其次，從語音方面講，“能”讀為“怠”自無問題，兩聲系之字相通的例證，古書及秦漢簡中都有見，^①但這一讀法却跟楚文字的用字習慣不合。據統計，今從“臺”聲之字（如“怠”“始”“殆”“胎”“怡”“治”“貽”“臬”等），楚文字多係從“𠂔”得聲，而從“能”者尚無一見。^②

我們認為“能”應讀為“慝”。“慝”，“詐僞”“奸邪”之意。《荀子·成相篇》：“讒夫多進，反復言語生詐態。”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第八》“詐態”條曰：“態，讀為奸慝之慝。言言語反復則詐慝從此生也。以態為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奸態當窮竟。’皆借態為慝。”^③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簡16“晨(振)若叙(除)態”，“態”整理者亦讀作“奸慝”之“慝”。^④彼此可以互證。既然“能”讀為“慝”、訓詐僞、奸邪，那麼“喬”讀“驕”、訓驕傲恐怕就不妥當了。疑不必改讀，“喬”也有“詐態”“僞邪”之意。《莊子·在宥篇》：“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鷖。”成玄英《疏》：“喬，詐僞也。”^⑤

設置法律、刑罰以防禁奸邪，古籍中類似的說法如：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漢書·景帝紀》）

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昇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新語·道基》）

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桀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奸之禁也。（《鹽鐵論·申韓》）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商君書·錯法》）

所以，簡文“喬能始作，乃立皋陶以為理”，“喬慝始作”是說奸邪、詐僞之心起（從而為非作歹），這作為禹“立皋陶以理”的充分條件，是很適宜的。

《商君書·君臣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民衆而奸邪生”是說人民繁衍衆多則易生奸邪之事。據此，反觀學者們對《容成氏》“民乃僨”的理解，就可以判斷諸說中祇有讀“民乃息”（即人民蕃衍衆多）的理解是正確的。《容成氏》簡文與上引《君臣篇》的話，兩者所講皆上古之事，“民乃息”與“民衆”相應，“喬慝

①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35、392頁。

② 參看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5頁。

③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893頁。

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釋文151頁、注釋156頁。

⑤ 讀“矯”亦通，《莊子·雜篇》“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矯言”“僞行”并舉，《淮南子·主術》：“夫權輕重不差蠹首，扶撥枉橈不失針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矯”“邪”連文，皆可證之。

始作”與“奸邪生”相應,“乃立皋陶以爲理”與“故立法制、爲度量”相應,二者對讀吻合無間。

附帶對清華簡《芮良夫毖》簡 19“惠(德)型(刑)態紕,民所詆訛”中的“態紕”也談一點看法。“態紕”原整理者括讀爲“怠惰”,^①黃傑、^②子居、^③王坤鵬、^④劉樂賢、^⑤黃甜甜^⑥等從之。按,前面已論及楚系文字“能”聲的字讀爲“怠”跟用字習慣不合,故此讀未可信據。蘇建洲疑讀爲“德刑乃墜”或“德刑一墜”,“一”是皆的意思,“德刑一墜”即“德刑皆墜”。^⑦王瑜楨讀爲“態術”,“態”指“態度”,“術”指方法。^⑧按,“民所詆訛”雖尚不得其確解,但我們傾向於多數學者的看法,即它應該是講人民對“德刑態紕”的反應;若將“德刑態紕”當成四個名詞并列,兩句簡文則不大好貫通。該篇多次提到“德刑”一詞,如簡 7“此德刑不齊,夫民用憂傷”、簡 18“和德定刑”、簡 21“政命德刑,各有常次”及簡 22“曰其罰時當,其德刑宜利”等,我們認同“態紕”像整理者理解的那樣,是講“德刑”如何的話,它當是帶有負面詞義的述語。上面提到的簡 7“此德刑不齊,夫民用憂傷”,其中“齊”,王坤鵬訓爲中正,^⑨至確。

我們認爲“態”可讀爲“忒”。古籍中“匿”“弋”二聲系可通,^⑩如《書·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即其例,故“態”讀作“忒”沒有問題。“忒”爲“差失”之意,乃古書常訓。^⑪《老子》第二十八章:“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王弼注:“忒,差也。”“紕”則當讀作“遙”,回辟、迂邪、不直之意。“術”“裔”聲系可相通,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簡 177“吏初捕丁來,冠鉢冠”的“鉢冠”即古書中的“鵠冠”,或稱之爲“術氏冠”,實爲一物。^⑫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篇》“凡地之道,陽爲表,陰爲裏,直者爲綱,術者爲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釋文 146 頁。

② 黃傑:《初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筆記》,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

③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孔子 2000 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13 年 2 月 24 日。

④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簡帛網,2013 年 2 月 26 日。

⑤ 劉樂賢:《也談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准”有關的一段話》,“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會議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⑥ 黃甜甜:《清華簡“詩”文獻綜合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廖名春),2014,69 頁。

⑦ 參見簡帛網“簡帛研讀”版塊“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貼下第 26 樓“海天游踪”(蘇建洲先生網名)的評論,2013 年 1 月 31 日。

⑧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芮良夫毖〉釋譯》,《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13 年 11 月 25-26 日),330-331 頁;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芮良夫毖〉釋譯》,《出土文獻》第 6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190 頁。

⑨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簡帛網,2013 年 2 月 26 日。

⑩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413、414 頁。

⑪ 宗邦福、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772 頁。

⑫ 陳偉、彭浩、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圖版 78 頁、釋文 372 頁、注釋 373 頁。

紀。”“術”整理小組原疑讀“屈”，^①蔣禮鴻指出“術”當讀“遁”，與“直”相對，其論證亦可參。^②《說文·辵部》：“遁，回辟也。”《詩·小雅·小旻》：“謀猶回遁，何日斯沮？”朱熹集傳：“回，邪。遁，辟。”《詩·大雅·抑》：“回遁其德，俾民大棘。”朱熹集傳：“遁，僻也。”所以，“德刑忒遁”是指德刑差忒、辟回而不正，其意與簡 7“德刑不齊”相類，而與簡 21“政命德刑，各有常次”、簡 22“德刑宜利”等則相反。

二

上博簡《用曰》簡 19：“定有紀，而亦不可阻；民道繁多，而亦不可涸。”其中的“阻”原作“虔”，整理者張光裕說：“疑讀為‘阻’，《逸周書·武紀解》第六十八：‘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涸”字未作解釋。^③董珊曰：“‘阻’讀為‘沮’，訓為敗，謂敗壞制度。‘涸’讀為‘怙’，訓為‘恃’，謂依恃各種民道。”^④李銳認為“定有紀，而亦不可阻；民道繁多，而亦不可怙”是說言當謹慎，但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亂講話，民衆的方法很多，但是并不能完全依靠。^⑤顧史考則將“虔”讀作“助”、“涸”讀為“固”，引《吳子·料敵》“將薄事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中“固”“助”押韻之例以為佐證，他於“定”前補“國”，句謂定國有其綱紀可用，而昏主（或其臣屬）無能輔導其成，治民之道儘管多樣，而亦無能力使之安定。^⑥

簡文“定有紀”語意不完，據下文“民道繁多”來看，其前當還有一字，目前雖無法得知為何字，但也無礙於此句的理解。“涸”，董珊、李銳等讀“怙”，可從，但有關“阻”的以上訓釋，却有待商榷。

整理者所引《逸周書·武紀解》“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句，舊多歧解，在此需先辨明。丁宗洛移“阻體之小”於上句。唐大沛則曰：“此十三字不可句讀，其中必有脫誤字。”劉師培曰：“本文有誤。繹其詞義，似指國失險阻言。上云循山川之險而固之，下云然後絕好於閉門循險，本文所述當亦類是，竊疑‘可’係衍文，或係‘向’訛，謂所居之地不修險阻也。體小一語與下文不類，亦有舛誤。”潘振曰：“國有幾乎失之者，居其地，不可為險阻。國體之小，是無本也。”朱右曾曰：“幾失，失國之幾。阻，疑也。國政相猜，國政誰恤？”^⑦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孫臏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62 頁。

② 蔣禮鴻：《義府續貂》，北京：中華書局，1981，145 頁。

③ 張光裕：《〈用曰〉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5-306 頁。

④ 董珊：《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雜記〉》，收入其著《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78 頁。

⑤ 李銳：《讀〈用曰〉札記（三）》，簡帛網，2007 年 7 月 27 日。

⑥ 顧史考：《上博楚簡〈用曰〉章解》，2007 年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臺灣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主辦，2007 年 11 月 10-12 日。

⑦ 以上各說引自黃懷信等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83 頁。

以上注疏或稱句有“脫誤”“衍”“訛”,或解釋說“國失險阻”“所居之地不修險阻”“居其地,不可爲險阻”“阻,疑也”等,莫衷一是。實際上,“居之不可阻”句子結構明白,應無訛誤,其致疑的根由乃在於“不可阻”的“阻”未得其解。其實“阻”在句中是恃、負之意。

“阻”字有恃、負之義訓,典籍中實不乏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江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第二》“介江淮”條曰:

索引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爲“恃”。《說文》:“負,恃也。”)①

“居之而不可阻”,以往將“阻”解爲險阻、疑等都講不大通,今以恃、負解之,句謂:“國有幾失”則雖處其國而不能恃、負、保有之,言外即說,國有此數失,將會墜失其國。這樣理解,恰跟緊鄰的上文“……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構成了正反說理的關係。

再來看簡文“定有紀,而亦不可阻;民道繁多,而亦不可涸”,“紀”“道”意思無差,其實整理者讀“虔”爲“阻”是正確的,但“阻”在此取恃、負之意,與“怙”對文。簡文蓋謂:紀雖堅定而不可恃,民道雖繁而不可怙。現在知道,雖說整理者引用《武紀解》“居之不可阻”,但從“涸”字未被破讀的情況看,可以肯定整理者是并不了解“阻”的詞義的,僅是因爲“而亦不可阻”跟《武紀解》“居之而不可阻”都有“不可阻”這一短句而已。

最後還想對上博簡中另一處與“阻”這一詞義頗相關的簡文談一點看法。上博九《舉治王天下》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簡7+5曰:“子爲我得尚父,載我天下;子失尚父,垓我周_𠄎。”②其中的“_𠄎”,整理者疑釋作“瞿”、讀作“懼”,③劉雲認爲當釋讀爲“墜我周室”,④白於藍則認爲“_𠄎”當從“且”聲,讀作“墜我周祖”,⑤蘇建洲從“_𠄎”讀爲“祖”的意見,而將“垓”讀作

①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1893頁。

② 此處簡文的編聯從鄒可晶《〈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簡帛網,2013年1月11日的意見;又,《〈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中國文字》新39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91、95頁。

③ 濮茅左:《舉治王天下(五篇)釋文注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0頁。

④ 參見簡帛網“簡帛研讀”版塊《〈舉治王天下〉初讀》主題貼下第2樓“苦行僧”(劉雲先生網名)的評論,2013年1月5日。按,“_𠄎”與“室”字形無關,楚文字“室”之字形可參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364-365頁。

⑤ 參見簡帛網《〈舉治王天下〉初讀》主題貼下第3、4樓“溜達溜達”(白於藍先生網名)的評論,2013年1月5日。

“遺”，^①鄔可晶隸定作“𠂔”、讀爲“祚”，加問號以示不確定，句謂得不到尚父，則周祚將墜失，^②孟蓬生從整理者釋“瞿”之說而讀爲“祜”，“周祜”猶言“周祚”。^③

今按，白於藍已指出“𠂔”之所从跟見於簡9的“祖”即“𠂔”（辭例爲“乃語周之先祖曰”，將此字釋讀作“祖”沒有疑問，唯“且”上多加了“亼”）的右邊爲同一形體，所以將“𠂔”分析爲从“且”聲之字，應該可信，這也是多數學者尋求其讀法的出發點。我們考慮，既然“𠂔”是从“且”聲的字，它應該讀作“阻”。簡文“子失尚父，墜我周阻”怎樣理解呢？可由與“阻”詞義近似的“固”“鎮”的下列用法來作推定。

典籍中“固”作爲名詞，其義爲要塞、屏障，即保障國家安全的設施（包括山關、溝渠、城郭、樹木、河流等皆可稱“固”），^④如：《鹽鐵論·險固篇》“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沖萬里之外也”，《荀子·強國篇》“其固塞險、形勢便，山川林谷美”，《荀子·議兵篇》“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引申之，能保障國家安全的人亦可稱爲“固”，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被稱爲“社稷之固”。《左傳》宣公二年：“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靈公若爲善有終，則爲社稷之固，“社稷之固”可保障國家安全，一國皆賴之，故云不止群臣賴之。“鎮”也有類似的用法。作爲名詞的“鎮”，可指山之重大能保障一方安全者，如：《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鄭玄《注》：“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用作比喻則指人之重要能安邦保國者，猶今所言“靠山”，如：《國語·晉語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後漢書·皇甫規傳》：“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

“阻”作爲名詞，也指保障國家安全的設施或屏障（多係險要的山嶽、關塞等），如：《漢書·東方朔傳》：“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此以南山爲“阻”。班固《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是“阻”“固”同義而換用。又如前引《議兵篇》“是豈無固塞隘阻”，以“固”“阻”并言。所以，拿“固”“鎮”的詞義及用法來類推的話，則簡文“子失尚父，墜我周阻”中的“阻”作爲名詞而用以比喻，顯然就是將尚父比作周邦的靠山，認爲尚父有保衛、安護周邦之能之用。文王這樣講，意在凸顯尚父之於周的重要性。

① 參見簡帛網“《舉治王天下》初讀”網貼下第11樓“海天游踪”的評論，2013年1月5日。

② 鄔可晶：《〈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簡帛網，2013年1月11日；又，《〈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96頁。

③ 參見簡帛網“《舉治王天下》初讀”主題貼下第79樓“mpsyx”（孟蓬生先生網名）的評論，2013年4月25日。

④ “固”字這方面的詞義及用法，參見楊寶忠《釋固》，收入其著《古代漢語詞語考證》，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23-27頁。

從勞力需求看秦代赦免制度*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楊琳 于振波

內容提要 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赦令的發布比較頻繁，與關東六國并無明顯區別，法家的重刑思想并未妨礙赦令的發布與執行。秦朝建立之後，對勞動力有大量需求，而刑徒又在工程建設、生產活動以及官府雜役中很好地滿足這種需求，故赦免意味着失去這些勞力資源，從而造成勞動力需求的緊張，無赦事體現的正是殘暴的秦帝國對刑徒這一龐大勞動力群體的依賴性，反映了其為政之苛酷。

關鍵詞 秦代 赦令 勞動力

秦朝建立後，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①對於秦朝“久者不赦”的原因，以往論者多歸咎於秦政苛酷或法家的重刑思想，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將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與統一後的秦朝之相關史料做一比較，上述推論則不免有所偏頗。本文擬從勞力需求的角度對秦朝建立前後赦免制度的變化原因做一探討。

一 秦朝建立前後的赦免史料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法家思想滲透到國家政策的各個方面，但各種形式的赦免一直

* 本文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2YJA770049)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資助。

①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238頁。

存在：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P212)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P213)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赦罪人遷之南陽。(P213)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P213)

秦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馳苑囿。(P219)

秦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P219)^①

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間，戊午赦。^②

秦王政二十二年至秦朝建立前，己巳赦。^③

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④

秦二世二年冬，大赦天下。^⑤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從勞力需求角度討論秦代赦免制度，所以諸如秦始皇對趙高、高漸離的赦免事例，祇針對特定個人，無關乎勞力需求，沒有列出。^⑥

在昭襄、孝文、莊襄三王時代，赦令的發布還比較頻繁，說明法家的重刑思想并未妨礙赦令的發布與執行。

睡虎地秦簡中也保存了若干與赦有關的法律條文：

《法律答問》：或以赦前盜千錢，赦後盡用之而得，論可(何)毆(也)？毋論。

《法律答問》：將司人而亡，能自捕及親所智(知)為捕，除毋(無)罪；已刑者處隱官。
可(何)罪得“處隱官”？·群盜赦為庶人，將盜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論，斬左止為城旦，後自捕所亡，是謂“處隱官”。·它罪比群盜者皆如此。

《法律答問》：有稟叔(菽)、麥，當出未出，即出禾以當叔(菽)、麥，叔(菽)、麥賈(價)賤禾貴，其論可(何)毆(也)？當貲一甲。會赦未論，有(又)亡，赦期已盡六月而得，當耐。^⑦

有關赦令的法律條文及其司法解釋，直到秦朝建立前後仍為基層官吏所傳習，說明赦免制度在秦國也是經常實行的。

秦王政即位之後，史書中沒有他發布赦令的記載，但嶽麓書院藏秦簡中却提到了屬於這

① 以上引文見《史記》卷五《秦本紀》，212-219 頁。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之《程、敞知盜分贓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19-128 頁。

③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之《田與市和奸案》，205-213 頁。

④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758 頁。

⑤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70 頁。

⑥ 趙高事見《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2566 頁；高漸離事見《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2537 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2、123 和 129 頁。

一時期的兩個赦令。其中戊午赦令在《猩、敞知盜分贓案》中提及。此案發生於秦王政二十一年五月，奏讞時間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由此推斷，戊午赦令應發布於這兩個時間點之間。己巳赦令在《田與市和奸案》中提及，這一案件中涉及日期的簡文均已殘缺。其中提到隸臣田的服刑地點在魏縣（治今河北大名縣西南），此地在戰國時期屬於魏國，因此，己巳赦令的發布當在魏國滅亡的秦王政二十二年（前 225）之後。嶽麓書院藏秦簡中這批案例類司法文書的時間範圍，能確定年代者多在秦王政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間，最晚的一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九月。^① 據此推斷，己巳赦令可能也在嬴政稱帝之前。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看出，秦統一六國後，赦令明顯減少。根據現有資料不能確定秦始皇稱帝期間是否曾頒布過赦令。秦朝建立之後，見於記載者祇有秦二世時期的兩次大赦。秦二世元年十月大赦，是胡亥以非常手段攫取大位後的籠絡人心之舉，而且這一仁政立即被隨後的暴政所淹沒；秦二世二年冬大赦，則是在秦朝統治出現危機時的應急策略，目的是利用驪山徒鎮壓義軍。也就是說，秦二世的兩次大赦，在很大程度上都屬於迫不得已之舉，這與統一之前秦國的情況大有不同。這一變化正是發生在秦統一六國前後，顯然與統一所帶來的社會歷史巨變有關，其中除了統治者過於迷信自己手中的專制權力而外，秦帝國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應該是這一變化的重要因素。

二 里耶秦簡所反映的勞力需求

睡虎地秦簡中的秦律，有大量利用刑徒從事各種勞役的規定。^② 而秦代役使刑徒的具體情況，里耶秦簡為我們提供了直接而且重要的證據。

在已經整理公布的近三千枚里耶秦簡中，^③ 我們發現了大量“徒簿”“作徒簿”簡，粗略搜集有 40 枚左右。此類簿籍的標題簡如下：

- | | |
|----------------------------------|----------|
| 廿九年盡歲田官徒簿(簿)廷 | (8-16) |
| 卅一年司空十二月以來，居貲、贖、責(債)簿(簿)，盡三月城旦舂廷 | (8-284) |
| 畜官、田官作徒簿(簿)，□及貳春廿八年 | (8-285) |
| 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已盡 | (8-1428) |

這些標題寫在形狀特別的木牋上，簡的上端均塗黑色。簡 8-16 似是年度匯總。簡 8-284 似是季度匯總。簡 8-1429 則是月度匯總。里耶秦簡中更為常見的是按日匯總的徒簿，例如：

① 參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之《前言》。

② 參見栗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263-276 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本文所引里耶秦簡資料，若未特別注明，均出於此。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武庫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九人，鬼薪一人，舂三人，受倉隸臣二人。・凡十五人。

其十二人爲簠：獎、慶忌、魋、魋、船、何、冢、交、頡、徐、娃、聚。一人絨：竄。二人捕羽：亥、羅。（以上正面）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武庫敢言之：疏書作徒日薄（簿）一牒，敢言之。橫手

五月庚子日中時，佐橫以來。／圉發（以上背面）（8-1069+8-1434+8-1520）

當時役使刑徒的數量非常多。例如簡 7-304：^①

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府課。・泰（大）凡百八十九人。死亡・銜（率）之，六人六十三分人五而死亡一人。

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廿八年新・入卅五人。

・凡百五十一人，其廿八死亡。・黔道（首）居貲贖責作官卅八人，其一人死。

（以上正面）

令拔、丞昌、守丞臙之、倉武、令史上、上逐除、倉佐尚、司空長、史郤當坐。

（以上背面）（7-304）

遷陵縣在秦始皇二十八年有隸臣妾 151 人（其中有 28 人死亡），居貲贖責作官府者 38 人（其中 1 人死亡）。隸臣妾的死亡率高達 18.54%，遠遠高於居貲贖債作官府者（2.63%），這應與隸臣妾生活境遇太差和勞動強度過高有關。這裏尚未統計城旦舂、鬼薪白粲及司寇等的數量。

下面兩例分別是遷陵縣庫和啓陵鄉的徒簿：

廿九年八月乙酉，庫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倉隸臣一人。・凡十一人。

城旦二人繕甲：□□。城旦一人治輪：□□。城旦一人約車：登。丈城旦一人約車：缶。隸臣一人門：負劇。舂三人級：姁、□、娃。

廿廿年上之□

（以上正面）

八月乙酉，庫守悍敢言之：疏書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

（以上背面）（8-686+8-973）

卅一年四月癸未朔癸卯，啓陵鄉守逐作徒薄（簿）：

受倉大隸妾三人，受司空仗城旦一人。凡四人。

其一人□□ 一人行□

（8-1278+8-1757）

①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

根據這些簡文推斷,遷陵縣庫和啓陵鄉所用刑徒主要來自司空和倉,而且里耶秦簡中確實有司空和倉管理大量刑徒的記錄。例如簡 8-145+9-2294:^①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圜徒作簿:

城旦司寇一人,鬼薪廿人,城旦八十七人,仗(丈)城旦九人,隸臣繫(繫)城旦三人,隸臣居貲五人。·凡百廿五人:其五人付貳春。一人付少內。四人有逮。二人付庫。二人作園:平、□。二人付畜官。二人徒養:臣、益。二人作務:藿、亥。四人與吏上事守府。五人除道沅陵。三人作廟。廿三人付田官。三人削廷:央、閒、赫。一人學車酉陽。五人繕官:宵、金、應、裨、觸。三人付段(假)倉信。二人付倉。六人治邸。一人取簫:廐。二人伐槩:始、童。二人伐材:□、聚。二人付都鄉。三人付尉。一人治觀。一人付啓陵。二人爲筭:移、昭。八人捕羽:操、寬、□、□、丁、圉、段、却。七人市工用。八人與吏上計。一人爲烏:劇。九人上省。二人病:復、卯。一人[傳]徙酉陽。

□□[八]人。□□十三人。隸妾繫(繫)舂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受倉隸妾七人。·凡八十七人:其二人付畜官。四人付貳春。廿四人付田官。二人除道沅陵。四人徒養:棠、瘞、帶、復。二人取芒:阮、道。一人守船:遇。三人司寇:□、猥、款。二人付都鄉。三人付尉。一人付□。二人付少內。七人取簫:□、林、嬈、粲、鮮、夜、喪。六人捕羽:刻、婢、□、□、娃、變。二人付啓陵。三人付倉。二人付庫。二人傳徙酉陽。一人爲筭:齊。一人爲席:姁。三人治泉:挾、茲、緣。五人繫:婢、般、囊、南、儋。二人上肯(省)。一人作廟。一人作務:青。一人作園:夕。

·小城旦九人:其一人付少內。六人付田官。一人捕羽:强。一人與吏上計。

·小舂五人:其三人付田官。一人徒養:姊。一人病:□ (以上正面)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圜敢言之:寫上,敢言之。/瘞手

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佐瘞以來。 (以上背面)(8-145+9-2294)

這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乙亥日來自遷陵縣司空的“徒作簿”,裏面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刑徒的數量及其所從事的各項勞動。從數量上看,這份文書中提到成年男刑徒 125 人(即城旦司寇 1 人,鬼薪 20 人,城旦 87 人,丈城旦 9 人,隸臣繫城旦 3 人,隸臣居貲 5 人),成年女刑徒 87 人(即白粲 8 人,舂 53 人,隸妾繫舂 8 人,隸妾居貲 11 人,受倉隸妾 7 人),^②以及未成年男刑徒 9 人(小城旦),未成年女刑徒 5 人(小舂),總計 226 人。

簡 10-1170 則是遷陵縣倉秦始皇三十四年十二月的“徒簿取”:^③

①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

② 其中關於“白粲”與“舂”的名稱與數量,簡文殘缺,係根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注釋而得。

③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

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簿）最：

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

其男四百廿人吏養，男廿六人與庫武上省，男七十二人牢司寇，男卅人輸或（鐵）官未報，男十六人與吏上計，男四人守囚，男十人養牛，男卅人廷守府，男卅人會逮它縣，男卅人與吏□具獄，男百五十人居貲司空，男九十人穀（繫）城旦，男卅人為除道通食，男十八人行書守府，男卅四人庫工。

· 小男三百卅人吏走，男卅人廷走，男九十人亡，男卅人付司空，男卅人與史謝具獄。

· 女五百一十人付田官，女六百六十人助門淺，女卅四人助田官穫，女百卅五人穀（繫）舂，女三百六十人付司空，女三百一十人居貲司空，女六十人行書廷，女九十人求菌，女六十人會逮它縣，女六十人□人它縣，女九十人居貲臨沅，女十六人輸服（箠）弓，女卅四人市工用，女卅三人作務，女卅四人付貳舂，女六人取薪，女廿九人與少內段買徒衣，女卅人與庫佐午取黍，女卅六人付畜官，女卅九人與史武輸鳥，女六十人付啓陵，女卅人牧鴈，女卅人為除道通食，女卅人居貲無陽，女廿三人與吏上計，女七人行書酉陽，女卅人守□，女卅人付庫。

（10-1170）

這份文書以累積的形式統計秦始皇三十四年十二月份刑徒出工情況。比如“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可以理解為大隸臣在十二月份總共有 990 個工作日，除以 30 天，可知有大隸臣 33 人。依此類推，可知“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即小隸臣有 17 人。“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不能被 30 整除（95 餘 26），大概是因為有人生病或其他事由而缺工所致，估計大隸妾至少有 96 人。幾項合計，秦始皇三十四年十二月遷陵縣倉掌管的刑徒至少有 146 人。

從所搜集到的徒簿來看，使用刑徒並編製各類簿籍的單位有田官、司空、庫、倉等各部門，也有各鄉。刑徒所從事的勞動，包括農業、手工業及官府雜役。刑徒數量之多，應用之廣，表明刑徒是官府各部門和各種官營事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勞力資源。

眾所周知，秦代刑徒是無期的，如果沒有赦免、贖免或立功等機會，將終身服刑。^① 這類刑徒的大量存在，保證了官府勞力資源的穩定。

對刑徒而言，贖免或立功的機率是非常低的，不足以影響刑徒隊伍的整體穩定，但赦免則不然，一次大赦可以為大量無期刑徒帶來難得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重獲自由。問題是，如果一次大赦使囹圄一掃而空的話，官府該如何應對突然而來的人手不足？大赦是否真的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① 參見栗勁《秦律通論》，277-283 頁。

三 赦令的追溯時效

如前所述,嶽麓書院藏秦簡中保存了一組秦代案例,其中有兩次案例提到了秦王政時代兩次赦令的執行情況。關於上述問題,這兩個案例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解答的線索。

《田與市和奸案》的主要案情是,^①田到市的羈押地與市和奸,被隸臣毋智當場抓獲。田雖百般為自己申辯,最終還是被判有罪。田不服,請求重審(乞鞫),理由是“不與女子市奸,夏陽論耐田為隸臣,不當”。重審結果,田有當場被捉奸並認罪的最初證據,而且田的口供與其他多位當事人的口供不合,最終被認定和奸的犯罪事實成立,田因此又犯了“乞鞫不審”之罪:

覆之:市仁(認)與田和奸,隸臣毋智捕校上。田不服,而毋以解市、毋智言。其氣(乞)鞫不審……當貲(繫)城旦十二歲,還己已赦。其赦除田,復為隸臣。

根據上述事實,田與市和奸,被判耐為隸臣,後因乞鞫不審,又被判繫城旦十二歲。適逢己巳赦令,“繫城旦十二歲”之罰得以免除,但是並沒有恢復自由,仍為隸臣。^②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赦前先後多次犯罪,赦令祇追溯到最近的一次犯罪,而不是將此前的所有犯罪一筆勾銷,免除所有刑罰。

如果說《田與市和奸案》祇是個案,不足以支持上述推論,那麼,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猩、敞知盜分贓案》。^③此案的主要案情是,士伍達等盜墓,士伍猩、上造敞沒有參與謀劃及盜墓,但在知曉達等盜墓的情況下參與分贓,贓值超過六百六十錢,因此士伍猩獲黥城旦之刑,上造敞因有爵位而獲較輕的耐鬼薪之刑。適逢戊午赦令,江陵縣認為兩人當赦免為庶人,並向上級提請覆核確認。至於主犯士伍達,在盜墓之前,還有逃亡之罪,因此江陵縣決定另案處理(“別論”)而不在赦免之列。秦律逃亡之罪最重不過黥城旦,^④與盜墓贓值過六百六十錢者相同,如果赦前所有犯罪可以一筆勾銷,士伍達等人似乎也沒必要“別論”了。

兩漢時期發布的赦令,有的明確規定了追溯的時效,如:

漢武帝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詔: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

①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205-213頁。

② 由於記錄此案的竹簡多有殘損,內容不完整,判決結果與我們目前已知的事實之間有出入。參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叁)》,213頁注18。或許秦、漢法律規定有所不同,不能完全套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相關規定。

③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19-128頁。

④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80頁。具體案例可參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之《多小未能與謀案》,141-144頁。

以前，皆毋聽治。^①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辛卯，皇太后詔：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②

這些規定了追溯時效的赦令，追溯的時限并不固定。既然如此，那些沒有明確規定追溯時效的赦令，是否也如上述兩個案例那樣，祇追溯到距赦令發布最近的一次犯罪？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討論。^③

無論如何，上述兩個案例至少說明，赦令對祇有一次犯罪的刑徒和先後多次犯罪的罪犯是有所不同的，大赦雖會使官府掌握的刑徒數量有所減少，但不會導致囹圄一掃而空的局面。既然戰國時期的秦國與關東六國一樣不時發布赦令，官府應對刑徒勞力減少自然會有行之有效的辦法。刑徒數量的減少，一方面可通過徵發徭役來解決，另一方面，由於當時輕罪重刑，百姓動輒得咎，赦令導致的刑徒數量減少會很快得到補充。

四 秦朝“久者不赦”之因

如前所述，刑徒是重要的勞力資源。秦朝建立之後，結束了諸國紛爭的局面，但官方所宣稱的“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④不過是自我粉飾而已。秦朝急功近利地大興土木，窮兵黷武，普通百姓沒有絲毫喘息之機，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賦稅徭役負擔，以致“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⑤

秦朝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築長城、馳道，營造宮殿、陵墓，以及秦始皇的巡遊、求仙，諸多“事業”連綿不斷，且每一項都要耗費巨大的物資和人力，正常的賦稅徭役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秦朝甚至不斷創造新的罪名以增加刑徒、“謫民”的數量，充實官府所需的無償勞動力。《漢書·晁錯傳》晁錯曰：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

① 《漢書》卷六《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169頁。

② 《後漢書》卷四《孝殤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197頁。

③ 張俊民先生指出，新出西北漢簡中有因赦減刑的資料，“部分詔書赦令明確規定被赦免的囚徒可以‘毋有復作’，直接免爲庶人；部分詔書赦令雖不是直接的‘毋有復作’，而其具體的勞作時間仍減半折算。即死罪逢赦令可以減免罪責減爲復作三年，城旦舂以上勞作二歲，鬼薪白粲勞作一歲即可”。如此看來，漢代赦令的具體實施情況也比較複雜，可能與秦代有所不同，但也確有可互相印證之處。參見張俊民《漢代勞役刑刑期問題小識》，“第三屆簡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論文，桂林，2015年11月6日-7日。

④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45、252頁。

⑤ 《史記》卷一二《主父偃列傳》，2954頁。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①

贅婿、賈人、嘗有市籍者等等，并非有罪者，然而秦朝統治者爲了填補巨大的勞力需求，巧立名目，陷人於罪。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四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隱宮(官)徙刑者七十余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②

隨着秦朝統治者對勞動力需求的急速膨脹，刑徒在工程建設、充實邊防等方面的功能也隨之被強化。除了這些長時間大規模的役使刑徒而外，秦統治者還有各種名目的臨時徵調。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路經湘山，“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③

既然秦帝國對勞動力有大量需求，而秦之刑徒又在工程建設、生產活動以及官府雜役中很好地滿足這種需求，故赦免意味着失去這些勞力資源，從而造成勞動力需求的緊張，無赦事體現的正是殘暴的秦帝國對刑徒這一龐大勞動力群體的依賴性，反映了其爲政之苛酷。

2015年10月初稿。2015年12月二稿。2016年4月根據《簡帛研究》匿名審稿意見修改，在此致謝。

① 《漢書》卷四九《晁錯傳》，2284頁。

②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53、256頁。

③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48頁。

里耶秦戶籍簡三題*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韓樹峰

內容提要 秦里耶戶籍簡最多可分七欄，第一欄錄戶人、大男，第二欄錄大女，第三欄錄小男，第四欄錄小女，第五欄錄免役老年男子，第六欄錄免役老年女子，第七欄錄奴婢、伍長。秦戶籍簡及其他秦簡“大男”、“大女”屢見，而無“老男”“老女”，《二年律令》及《二年西鄉戶口簿》呈現出同樣的特點，說明秦及漢代早期不存在“老”這一特定稱謂。這種狀況的形成，與先秦以來以身高作為服役標準密切相關。秦戶籍簡家庭成員關係書式有異於孫吳、西晉、前秦、西涼諸政權戶籍書式，而與西魏、唐相類，從書寫材料角度解釋這種現象尚存在不少問題，其深層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 秦戶籍簡 著錄內容 欄數 老 書式

里耶秦戶籍簡牘係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戶籍實物，對研究秦戶籍制度，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學界對秦戶籍簡不乏關注，其中各欄著錄的內容，已有研究貢獻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意見，但細思之下，筆者認為仍有再推敲的餘地。至於戶籍簡著錄“大”“小”所反映的問題及家庭成員關係的書式與魏晉戶籍的異同問題，似乎尚未引起足夠的關注。本文擬對這三個問題談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 戶籍簡各欄的著錄內容

戶籍簡出土時為 51 個殘段，經整理拼復綴合得整簡 10 枚，殘簡 14 枚（段）。完整簡長

*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准號為：15XN1007。

均為 46 厘米,分五欄書寫,分欄符號多為墨綫,僅 22 號簡二、三欄為硬物刻劃。涵蓋五欄且內容完整的簡牘共 3 枚,分別為 K27、K1/25/50、K2/23,茲錄後兩枚簡文如下:

2(K1/25/50)

第 1 欄:南陽戶人荆不更黃得

第 2 欄:妻曰嗟

第 3 欄:子小上造臺

子小上造

子小上造定

第 4 欄:子小女庠

子小女移

子小女平

第 5 欄:五長

10(K2/23)

第 1 欄:南陽戶人荆不更宋午

弟不更熊

弟不更衛

第 2 欄:熊妻曰□□

衛妻曰□

第 3 欄:子小上造傳

子小上造逐

□子小上造□

熊子小上造□

第 4 欄:衛子小女子□

第 5 欄:臣曰禱^①

簡牘分欄書寫,每一欄自有其特定的內容。整理者張春龍對各欄內容進行了概括:第一欄為戶主籍貫、爵位、姓名;第二欄為戶主或兄弟的妻妾名;第三欄為戶主兒子之名,且其前多冠以“小上造”;第四欄為戶主女兒之名,一概稱為“子小女子”;第五欄為有相關內容則錄,無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203、205 頁。有文字可識的秦戶籍簡共 22 枚,見該書 203-207 頁,下文引用這些簡牘不另出注。

則留白,和今日檔案的備注一欄相當。^①這一概括是在簡牘出土之初進行的,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如以簡10而論,第一欄包括戶主之弟,第三欄包括戶主兄弟之女。劉欣寧通過比對所有戶籍簡,得出了如下認識:第一欄為大男;第二欄為大女;第三欄為小男;第四欄為小女;第五欄為奴婢。^②但按簡2,第五欄除奴婢而外,尚著錄伍長。為此有研究者認為,第五欄為老男、老女及伍長之類的備注項目。^③

以家庭成員的大、小作為確定各欄內容的標準,較張春龍的說法前進了一步,但其中也不無可議之處。簡9第二欄的家庭成員為大女,其餘諸簡第三、四欄內容較為完整者均有“小”的記載,據此,第二、三、四欄分別著錄大女、小男、小女的解釋是正確的。問題出在第一欄和第五欄。按上述看法,第一欄、第五欄分別著錄大男和老男、老女,這意味着後者絕對不會出現在第一欄。現有22枚戶籍簡均未記載家庭成員的年齡信息,論者據以判斷第一欄為大男的依據是,這些男性均有爵位且未標注“小”,而且多已成婚。成婚者不能排除老男無須多論,以爵位而言,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秦代老男無爵。相反,《漢舊儀》記載:“秦制二十爵。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年五十六免。無爵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有罪,各盡其刑。”^④漢初更是直接將爵位與免老年齡掛鉤:“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裹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為免老。”^⑤而在走馬樓吳簡中,有爵位的老人比比皆是,這顯然是對漢制的沿襲而非孫吳的獨創。所以,秦及漢初,老年男性不但擁有爵位,而且爵位是其免除力役的主要依據。如果說所有老年男性均沒有爵位,那祇能意味着,他們在步入老年後,此前通過驅馳疆場、出生入死而獲得的寶貴爵位被政府剝奪了,這在以軍功爵激勵百姓奮勇作戰的秦國,顯然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所以,依據爵位及婚姻狀況判斷第一欄祇有大男沒有老男,是不妥當的。

第一欄中的男性,其子女在第三、四欄多標注為“小”,據此似乎可以推測他們應為大男。我們不否認這種推測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男性55歲以後可以生育者并非特例,而且古代老夫少妻的情況相當普遍,因此,子女尚小,父親已步入老年,是完全可能的。^⑥秦代類似資料比較缺乏,但吳簡中有不少這樣的例證。古代年少生子屢見不鮮,在這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208-209。

② 劉欣寧:《里耶戶籍簡牘與“小上造”再探》,簡帛網,2007年11月20日。

③ 張榮強:《湖南里耶所出“秦代遷陵縣南陽里戶版”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71頁。“老男”“老女”為研究者通用的稱謂,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論,秦及西漢早期固然存在免除全役的老年人,但沒有“老男”“老女”這樣的稱謂,嚴謹的表述應為:免除全役的老年男性、老年女性。為免繁瑣,此節亦以“老男”“老女”稱之。

④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85頁。

⑤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2頁。

⑥ 小男的終齡一般為15歲,老男、老女的始齡有不同看法,但不會超過70歲。如55歲生育,在子女成人前,父親已進入老年。

種情況下,以其子已經成年推斷其父為老男,顯然過於武斷,既然如此,我們同樣沒有理由根據“小男”“小女”的記載,推測其父尚在壯年。

認為第一欄僅著錄大男,不僅證據不足,即使在邏輯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老男、老女登錄於第五欄的說法雖不準確,但按現有戶籍簡,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必定列於小女之後的某欄,這是就一戶之中大男、大女、小男、小女、老男、老女俱備的情況而言的。不過,一戶缺少某一欄家庭成員必定是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後一欄家庭成員自然上提,典型的例子如簡7,本來著錄小女的第四欄著錄了母親,這是該戶家庭沒有小男或小女導致的,研究者對此已有討論。照此推演,如若某戶不存在大男,第一欄著錄的先後順序是:大女、小男、小女、老男、老女。就常理而言,戶籍簡必定突出戶主,這不僅指戶主必須放在首位,而且必定有“戶人”標識。22枚戶籍簡中,除簡12、13、16、18、20第一欄缺損,簡14、19第一欄內容殘缺不全外,其餘15枚簡無一例外在第一欄明確記錄了戶人,可以說,第一欄記錄戶主是戶籍簡的基本要素。以此為前提,如果前一欄成員不存,後一欄依次上提,秦代戶主將按如下順序繼承:(1)大女;(2)小男;(3)小女;(4)老男;(5)老女。換而言之,老男、老女作為尊長,在其他家庭成員存在的情況下,一律不得擔任戶主,祇能附籍於卑幼。

唐代戶主一律以家長為之,秦未必有類似的規定,但是,考慮到尊卑長幼有序的傳統觀念,秦禁止老年尊長特別是老年男性擔任戶主的可能性相當之小。按漢代早期的代戶法,戶主去世後,戶主繼承順位為:(1)兒子;(2)父母;(3)寡妻;(4)女兒;(5)孫子;(6)曾孫;(7)祖父母;(8)同居的兄弟姐妹。^①如以一戶三代為標準,將漢代繼承順序與以上所說的秦代繼承順序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存在着很大的差異:第一,漢代不是在戶主步入老年而是在去世後,將戶主之位傳給其他人。第二,漢代無論兒子長、幼,均優於妻子,秦代幼子位於妻子之後。第三,漢代無論父母壯、老,均優於妻子,秦代祇有壯年父親優於妻子。第四,漢代無論父母壯、老,均優於女兒,秦代祇有壯年父親優於女兒。另外,按論者所說的著錄格式,秦代作為戶主的丈夫進入老年後,將轉而著錄在小女之後的一欄,而此時著錄在第二欄的妻子如處於壯年,將上提到第一欄,成為該戶戶主。但是,在漢代代戶法中,繼承人不包括丈夫,這意味着丈夫在世,無論壯、老,妻子無論如何不能成為戶主,這在《二年律令·戶律》中也有明確規定:“為人妻者不得為戶。”^②我們也很難想像,秦政府會硬性規定戶主進入老年之後,必須把戶主之位傳給弟弟、兒子特別是妻子和女兒。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過如下格式的簡牘:“郭乙二戶,儋行,少一日。”^③這類簡牘共14枚,是征發市陽里徭役的文書,“二戶”之

① 關於漢代戶主繼承順位的討論,可參韓樹峰《漢唐承戶制度的變遷》,收入其著《漢魏法律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38-143頁。

②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27頁。

③ 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2頁。

上的文字，是戶主之名，其後的“某行”指每兩戶中出一個人服徭役。^① 值得注意的是，14 枚竹簡中，服徭役者無一人是戶主。我們知道，免老者是無須服役的，這可能暗示着戶主大多數屬於老年人。

如上所論，按研究者確定的秦戶籍著錄格式推演，戶主的身份及其繼承順序與漢初大相徑庭。漢律對秦律全盤繼承之說固然值得商榷，^②但以秦律為藍本應該是有問題的。在大的歷史背景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漢政府沒有必要將秦律修改得面目全非。兩者差異如此之大，祇能說明秦戶籍第一欄的內容並非如研究者所說，僅著錄大男。在可以識讀的 15 枚戶籍簡的第一欄中，首位成員均為戶主。如果我們承認這是戶籍文書的必備特徵，那麼就不得不承認，該欄除登錄大男外，還必須登錄戶主，而且戶主不分性別，也不分年齡大小，必定位於該戶之首。也就是說，儘管張春龍推測的各欄內容不盡精確，但第一欄著錄戶主的說法還是應該採納的。研究者判斷第一欄均為大男，並沒有證據支撐，退而言之，即使現有戶籍簡第一欄均為大男，也不能證明大男是該欄的唯一內容。理由很簡單，因為現有戶籍簡中，作為父親的老男均已去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按照慣例，戶主之位也可能由其壯年兒子繼承，而其他大男按規定也必須著錄在第一欄，從而給人以該欄僅著錄大男的假像。

另外需要補正的，是第五欄的內容。戶籍簡第五欄內容可以識別的簡牘有簡 1、2、7、12、10 五枚，前四枚著錄“伍長”，後一枚為“臣曰禱”。據此，第五欄除劉欣寧所說的著錄奴婢外，還著錄伍長。簡 7 第四欄著錄“母睢”，有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該戶無小男或小女，“母睢”上提一欄的結果。無論“母睢”一欄是否上提，可以肯定的是，與第五欄的“伍長”係分欄書寫，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老男、老女會與性質完全不同的伍長著錄在同一欄，所以，第五欄著錄老男、老女和伍長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其實，嚴格說來，第五欄著錄伍長、奴婢的說法也未必確切，因為這牽涉到戶籍簡的欄數問題。目前所見戶籍簡最多祇有五欄，但是，這些戶籍簡祇見老女，未見老男。除戶主而外，大男、大女、小男、小女均按性別分欄書寫，因此，老男、老女分欄的可能性極大。這樣，在前四欄家庭成員齊備的情況下，老男、老女將依次登錄在第五欄、第六欄，而伍長和奴婢則登錄在第七欄，也就是最後一欄。

根據以上所論，秦戶籍簡可能的架構如下：第一欄：戶人、大男；第二欄：大女；第三欄：小男；第四欄：小女；第五欄：老男；第六欄：老女；第七欄：奴婢、伍長。由於目前所見戶籍簡均為五欄，筆者所說的這個架構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即一枚戶籍簡的長度是否可以容納七欄？按里耶發掘報告，完整戶籍簡長度均為 46 厘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所錄簡 10-1170

①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4 頁。

② 關於漢初法律全部繼承秦律的論述，可參高敏《漢初法律係全部繼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收入其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76-84 頁。

即分七欄書寫,簡長46.2厘米,較戶籍簡僅多出0.2厘米,但下方尚有近一欄的空白,^①所以,一枚完整的戶籍簡容納七欄內容沒有任何問題。現有戶籍簡均為五欄,應該是缺少大男、大女、小男、小女、老男、老女中的某一類或某幾類所致,並非制度規定如此,如果一戶之中各類群體齊備,戶籍簡可能至少分為七欄。當然,由於目前發現的戶籍簡有限,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祇能視為一種推測。

二 戶籍簡無“老”或“老男”“老女”稱謂蠡測

22枚戶籍簡中,第三、四欄記錄子女時,均標注了“子小上造”“子小女”或“子小女子”,簡9第二欄則標注了“大女子”。“小上造”“小女”“大女”等稱謂並非泛泛而言,而是與身高或年齡相對應,有固定含義的特稱。^②戶籍簡未見“大男”,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擁有爵位而加以省略的緣故。^③里耶秦簡記載了數例無爵位的“大男”和“大男子”：“故邯鄲韓審里大男子吳騷,為人黃皙色,隋(橢)面長七尺三寸□。”“□大男子五人。”“黔首□大男子四人。”^④可以肯定,“大”“小”作為特定稱謂,在秦代是存在的。

秦自然有老年人,戶籍簡將其另欄書寫,反映秦有區分老年人的固定標準,但是與成年人、未成年人不同,當時並不存在“老”或“老男”“老女”這樣的特定稱謂。戶籍簡未見老年男性,簡7、11第四欄的“母睢”“母◇”可能是老年人,却均未標注“老女”。戶籍簡數量較少,據此認為當時不存在“老”,有武斷之嫌,但是,已經出版的所有里耶秦簡中,未見一例“老男”、“老女”。

與“老男”“老女”一例未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等稱謂在里耶秦簡中屢見不鮮。據筆者統計,除戶籍簡外,里耶秦簡記錄“大男”7例、“大女”28例、“小男”21例、“小女”14例。^⑤除良民外,賤民也以“大”“小”而不是“老”加以區分,類似“大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待出。

② “小上造”是小爵之一種,係未成年人擁有的爵位,對此學界討論頗多,可參劉欣寧《里耶戶籍簡牘與“小上造”再探》,簡帛網,2007年11月20日;劉敏《秦漢時期的“賜民爵”及“小爵”》,《史學月刊》2009年第11期,99-100頁;王子今《里耶戶籍簡所見“小上造”“小女子”》,收入其著《秦漢稱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90-95頁。“子小女子”即“子小女”,可參王子今《秦漢“小女子”稱謂再議》,收入其著《秦漢稱謂研究》,97-101頁。

③ 未成年男性標注“小上造”爵位,應該是為了與成年男性授爵者加以區分。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44、365、375頁。

⑤ 可參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張春龍《里耶秦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90-194頁。統計時,“小上造”“小公士”視為“小男”。兩文獻內容相同的,不再重複計算。前者“大男”“大女”“小男”“小女”分別為6例、20例、15例、7例,後者分別為1例、8例、5例、7例。此外,《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有“小男”1例。

奴”“小奴”“大隸臣”“大隸妾”“小城旦”“小春”的例子相當多。在為數眾多的例證中，無論個體信息的記錄，還是家庭成員的分類統計，均不見“老”的踪影，以後者而言，可舉如下例證：

9-2299：

南里戶人官夫：(大夫)布□

口數六人□

大男子一人□

大女子一人□

小男子三人□^①

當然，以此證明“老”不存在是有瑕疵的，因為該戶也許本來就沒有免除全役的老年人。那麼，我們不妨看一下《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所錄簡 9-2294+9-2305a+8-145a“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囹徒作簿”、簡 10-1170“〔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簿)”。兩簿記錄各類徒作、倉徒的人數及工作分類，前者分類中有小城旦、小春，後者有大隸臣、大隸妾、小隸臣，但均無“老”這一群體。對此仍然可以質疑，“老”本可免役，不見於兩簿順理成章；何況即使兩簿人數極多，但小隸妾這樣的群體同樣未見，據此否定“老”的存在又有多少說服力？老年城旦春、隸臣妾等刑徒是否像百姓一樣可以免除力役，是值得懷疑的，至於後一質疑，針對兩簿確實有一定道理，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的如下記載或許可以消除這樣的質疑：

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春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春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②

律文未言“大”，但《倉律》規定：“小隸臣妾以八月傅為大隸臣妾，以十月益食。”顯而易見，6.5 尺、6.2 尺分別為城旦、隸臣和春、隸妾的“大”“小”分界綫，廩食 2 石、1.5 石的隸臣、隸妾是大隸臣、大隸妾的省稱。在里耶秦簡中，當“小”存在時，“大”略而不書似乎是一種常態，如簡 10-1170，概括性記錄隸臣妾總人數時，分為大隸臣、大隸妾、小隸臣，但具體記錄分類工作的人數時，前兩者一律記為“男”“女”，後者則記為“小男”，簡 9-2294+9-2305a+8-

① 張春龍：《里耶秦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193-194 頁。此文所引里耶秦簡，出土層數以帶圈數字表示，本文為統一體例，改為不帶圈數字，下文不另注。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49 頁。

145a 記錄的城旦舂同樣如此。又如簡 16-950:“新黔首戶百六男千冊六人小男子𠂔。”^①戶口分類統計一般先“大”後“小”,“男千冊六人”之“男”不是所有男性的總計,而是指大男,是與“小男子”相對而言的。與“大”不同,秦簡中不見以“老”標注的各種群體,并非省略了“老”,而是當時本來就不存在這樣的稱謂,因為“老”是不能通過身高體現的。

如果說具體例證中有“大”“小”沒有“老”,還可以視為偶然的話,那麼,概括性的法律規定中同樣存在這種現象,就不能視為偶然了,而是“老”作為特定稱謂本不存在的間接體現。漢代早期似乎繼承了秦有“大”“小”無“老”之制,《二年律令·金布律》:

諸冗作縣官及徒隸,大男,冬襦布袍表裏七丈、絡絮四斤,袴(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袴(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②

這是關於冗作、徒隸廩衣的概括性規定,包括了大男、大女、使小男、使小女、未使小男、未使小女,却唯獨不見老男、老女。類似的情況也見於漢武帝時期的《二年西鄉戶口簿》:

戶千一百九十六,息戶七十,耗戶三十五,相除定息四十五戶。大男九百九十一人,小男千四十五人,大女千六百九十五人,小女六百四十二人;息口八十六人,耗口四十三人,相除定息口四十三。·凡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③

《戶口簿》備列漢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西鄉戶口總數及增減情況,口數方面分列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的具體人數,無老男、老女。對此學界有如下解釋:由於當時有單獨的免老簿,所以這些人不再計入當地每年的戶口統計的總數之內。^④這種看法是不能成立的。除免老簿外,罷癰、新傅、歸義者、復事算者、見卒、吏卒等群體亦各有簿冊,^⑤且不見於戶口簿,依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將他們排除在戶口總數之外,如此一來,戶口總數還有多少群體可以記錄呢?東海郡《集簿》在記錄本郡總口數後,又分列男、女人數,其下特別記錄年 70 以上的受杖人數及 80、90 歲以上老人的總口數。^⑥毫無疑問,各級政府登錄的人口總數是包括所有老人的,《金布律》、《戶口簿》記錄各種群體唯獨不見“老”,祇能說明一直到漢代早期,仍

① 張春龍:《里耶秦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190 頁。

②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50 頁。

③ 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11 頁。

④ 可參彭浩《讀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二)》,簡帛網,2009 年 4 月 4 日;劉瑞:《松柏漢墓出土〈二年西鄉戶口簿〉小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 年 3 月 28 日。

⑤ 松柏木牘有新傅簿、歸義簿、復事算簿、見(現)卒簿、置吏卒簿等,可參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29 頁。

⑥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77-78 頁。

不存在“老”這一特定稱謂。

學界所說的“老”，是指免除力役的老人，以此為標準，當時老人的特定稱謂是眾所周知的“免老”。我們知道，自西晉丁中制確立以後，免除力役的老人統稱為“老”，為什麼秦和西漢早期不稱為“老”而稱為“免老”？這可能因為除免老外，當時還存在服半役的眊老這一稱謂，他們同樣屬於老人。免老可以與眊老相對，但“老”却含義模糊，指向不明，以“老”代替免老容易導致誤解。《秦律十八種·倉律》：“隸臣欲以人丁鄰者二人贖，許之。其老當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隸妾欲以丁鄰者一人贖，許之。”^①律文以免老限定“老”，說明除免老以外，“老”還包括其他類型的老年人，或者即是眊老亦未可知。《秦律雜抄》：“百姓不當老，至老時不用請，敢為詐偽者，貲二甲。”整理者注：“老，即免老。”這一解釋未必正確，如“老”即免老，律文不應書“老”而應直書“免老”，這個“老”應該同樣是一個涵蓋範圍較廣的稱謂，意指免老和眊老。所以，秦簡中固然有“老”這一稱謂，但并不與某一群體形成唯一的對應關係，與學界所說的表示免除力役的老人之“老”屬於不同的概念。可以說，免老和眊老排擠了作為特定稱謂的“老”的存在空間，“老”作為一個概念，在秦和西漢早期祇能以含義較為寬泛的面目出現。

“大”“小”等稱謂是基於力役征發而形成的概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大”“小”而無“老”。就承擔力役的能力而言，一般與身高密切相關，秦以身高區分“大”“小”，原因即在於此，這當然不是秦的創舉，而是對此前制度的沿襲。身高固然可以區分“大”“小”，却無法區分“大”“老”，所以，在力役產生之初甚至很長一個時期裏，祇有“大”“小”而無“老”。不過，從壯年轉向老年導致逐漸無法承擔力役，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祇有引入年齡標準這一條途徑。《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②征發力役兼用身高和年齡，前者針對“大”“小”，後者針對壯、老，也就是說，僅以身高為標準，“大”必然包括壯年和老年兩個群體，為將兩者區分開來，不得不使用年齡標準。這種規定未必始於《周禮》，但駁雜不純的標準說明，年齡標準產生以後，作為舊制的身高標準一直得到繼承。秦代儘管年齡、身高并存，但仍以後者為唯一的判斷依據，這不僅體現在對大、小城旦舂、隸臣妾的概括性法律規定中，在簡9-337中也有具體的反映：“□□隸小上造臣黑色長可六尺年十五。”^③臣身高6尺，年齡15歲，秦律規定6.5尺以下為“小”，按漢代制度，15歲以上為“大”，可見，臣的小上造身份

① 三條律文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53-54、143頁。

②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地官·鄉大夫》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840頁。

③ 里耶秦簡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該簡兩字未釋，就“隸”“臣”而言，似乎這個小上造身份較為低賤，但不能排除“臣”作為人名的可能性，而且上造似乎也不應該授予身份低賤之人，所以，“臣”未必是隸臣妾或奴隸。

是由身高決定的,與年齡無關。按正常情況,年齡出現以後,“老”隨之出現似乎順理成章,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老人有免半役和免全役之分,“老”不足以區分這兩個群體,祇能以免老和皖老與其一對應,而且舊制中本沒有“老”這一特定稱謂,兩相結合,導致秦乃至西漢早期始終無法以“老”作為特定稱謂代表免除全役的老人。一直到“大”“小”之制為丁中制所取代,免半役的老人劃入次丁,“老”終於可以與免全役的老人對應,纔取代了免老,成為一個特定的稱謂。

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金布律》、《西鄉戶口簿》等關於廩衣、戶口統計的內容,不可能不包括老年人,但是,其中既不見“老”,也不見“免老”“皖老”,這該如何解釋?筆者認為,老年人包括在了“大”中。如前所說,以身高區分“大”“小”,老年人必然包含在“大”中,就衣食需求而言,壯年、老年沒有本質性的差異,不必對兩者另行區分。《戶口簿》是國家掌握人口數量的基礎,但卻不是派役的直接依據,征發力役另有《傳簿》《免老簿》《罷癯簿》等專門簿冊可據,所以《戶口簿》同樣沒有區分壯年、老年的必要,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筆者曾經論證的一個觀點,即:秦漢戶籍沒有賦役的注記。

三 秦戶籍簡家庭成員關係書式與魏晉戶籍的差異

以秦戶籍與魏晉北朝比較,其中多有差異,在此僅就戶主子女前標注的家庭關係略加討論。在22枚秦戶籍簡中,記載戶主子女時,一律標注與戶主的關係,如“子不更”“子小上造”“子小女子”等。《封診式·封守》記某里士伍子女:“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①這份虛擬的查封文書並非戶籍,但對家庭成員關係的記載,應該是模仿戶籍而來。

迄今為止,兩漢未見可以肯定為戶籍的實物,我們不妨將居延漢簡記載戍卒與家屬關係的名籍作為參照: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年卅二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	子大男輔年十九歲
棠佗吞胡隧長張彭祖符	子小男廣宗年十二歲
	子小女女足年九歲
	輔妻南來年十五歲 皆黑色 ^②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249頁。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44頁。

名籍登錄戍卒家屬，表現其與戍卒的關係，而不是與上一行成員的關係，性質與秦戶籍相同。可以說，自秦到漢元帝永光四年（前 45），這種著錄方式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這種書式的改變至遲發生在孫吳時期。走馬樓吳簡名籍簡記錄戶主子女時，除長子、長女標注與戶主的關係外，其他一律標注與前一行家庭成員的關係，具體形式如下：

萬歲里戶人大女管妾年卅八 子男難年十一 難 男弟符年九歲（柒·202）

樂安里戶人□□年卅四 子女鼠年十七 鼠女弟□年十一（柒·231）

富貴里戶人陳取年七十五 子男甚年十八 甚女弟視年十三（柒·288）^①

這種與秦、西漢截然不同的戶籍書式被西晉繼承，並至少持續到西涼時期，期間出土的如下三件文書構成了一條清晰可見的綫索。《晉〔四世紀？〕樓蘭戶口簿稿》：

蒲(?)緣(?)□富年七十二 物故

息男奴□年卅五物故

□男弟□得年卅物故

得□□阿周年□物故^②

《前秦建元廿年（384）籍》：

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民崔裔□

.....

裔息女顏年廿一從夫 □

得闕高桑菌四畝半

顏男弟仕年十四 □

得江進鹵田二畝以一畝為場地

仕女弟訓年十二

得李虧(?)田地桑三畝

平息男生年三新上

舍一區

生男弟麴(?)年一新上

建□^③

① 走馬樓吳簡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括弧中的阿拉伯數字代表整理號。走馬樓吳簡所錄戶口簿籍以及以下四件文書未必是戶籍，但除首位成員外，其他成員的著錄形式應係參照戶籍而來，所以，以這些資料討論戶籍的書式應該沒有問題。

② [日]池田溫著，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北京：中華書局，2007，163頁。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也收錄了這份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4-85頁），但釋文多有不確。

③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177頁。其餘各戶書式與此相同，見本書177-179頁。為免繁瑣，此件文書僅錄與論題有關的家庭成員，其他成員省略。下引《計帳文書》亦省略了口數集計、租調及授田狀況。

《西凉建初十二年(416)籍》: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呂德年冊五

妻唐年冊一	丁男二
息男哭年十七	小男七
哭男弟受年十	女口二
受女妹媚年六	凡口六
媚男弟興年二	居趙羽塢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①

秦、西漢戶籍與魏晉戶籍的這種書式差異原因何在?或許《西魏大統十三年(547)計帳文書》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間接的答案,因為在這份文書中,反映子女和戶主關係的書式再次發生變化,重新回到了秦代戶籍的書式:

戶主劉文成己丑生年三拾究	蕩冠將軍
妻任舍女甲午生年三拾肆	臺資妻
息男子可乙卯生年拾三	中男
息男子義丁巳生年拾壹	中男
息女黃口水亥生年仵	小女
息男子候辛酉生年柒	小男
息男黃口甲子生年肆	小男 ^②

本件文書中的子女按年齡排列,但五歲的“女黃口”却位於七歲的“男子候”之前,或許抄寫有誤,不過,這不影響戶籍書式。本件文書和秦戶籍一樣,記錄子女與戶主的關係,而且這種書式一直延續到唐代。

對《西凉籍》與唐籍的這種差異,池田溫有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解釋,即:名籍以木簡為書寫材料,繫紐有可能斷開導致木簡分散,名籍順序因此前後顛倒,記錄子女時,表明與前一行登載者的關係容易恢復原狀,而書寫於紙張之上的名籍則不存在這一問題,作為紙文書的西凉籍,是簡牘時代名籍書式的遺留,借此可以間接窺知漢晉木簡籍的面貌。^③孫吳仍處於簡

① [日]池田溫,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4頁,其餘各戶見本書3-5頁。

② [日]池田溫,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13頁,其餘各戶見本書14-21頁。計帳文書中,“黃口”凡五見,應不是姓名,大概指三歲以下的嬰兒,例如,兩個兩歲的嬰兒均記為“黃口”,戶口集計按“黃”統計。令人不解的是,其他三例分別為四歲、五歲,顯然已經超過“黃”的年齡,集計亦按“小”統計,但具體信息卻標注為“黃”。而另外一例兩歲者儘管在集計中為“黃”,具體信息卻又未標注“黃口”。這些矛盾的記錄是文書抄寫有誤所致還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

③ [日]池田溫著,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50-51頁。傅克輝也有同樣的認識,見其著《魏晉南北朝籍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1,24頁。

牘文書的時代，而西晉、前秦儘管以紙為文書載體，但和西涼一樣，屬於池田溫所說的過渡期，這三個時代的戶籍書式為池田溫的說法提供了很好的注腳。

池田溫的觀點同樣有助於理解里耶戶籍簡的書式。所謂木簡容易散亂，顯然是針對類似孫吳一戶由數枚簡組成的名籍而言，但里耶戶籍各戶均書寫於一枚大木牘之上，不存在散亂問題，這一特點與紙文書相類，或許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秦、西漢儘管與魏晉時間更為接近，書寫材料相同，與西魏以後相隔懸遠，書寫材料相異，但戶籍書式反而與前者相異，與後者相同這一現象。

不過，秦戶籍是否主要因為寫於大木牘之上而采取了目前這種書式，仍有疑問。《商君書·去強》：“強國知十三之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稿之數。”^①商鞅強調掌握人口對治國的重要性，人口必須區分壯、老、弱。這一觀念是從力役角度出發的，如果落實在戶籍上，必然將三類人口分別排列。子女大、小不同，分書於不同欄，這樣就無法登載家庭成員與上一行成員的關係，而祇能登載其與戶主的關係。如果商鞅的政策確實影響了秦戶籍的書式，那麼，書寫材料就是一個次要因素，甚至有可能不成為一個因素了。

事實上，從書寫材料角度解釋戶籍中家庭成員關係的書式，確實還有再思考的餘地。我們知道，秦素以法家治國，追求制度的高度統一，因此，目前所見的里耶戶籍書式應該是秦帝國唯一行用的書式。如果說書寫材料決定了這一書式，那就意味着秦不分區域，規定所有戶籍必須書寫於大木牘之上。目前所見里耶戶籍確實如此，但恐怕很難排除在幅員廣袤的秦統治區內，戶籍書寫在類似走馬樓竹簡那種較窄竹簡之上的可能性。按池田溫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戶籍祇能登錄戶主子女與上一行成員之間的關係。這樣，秦戶籍就必然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式，而這又是秦帝國所不允許的。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承認秦戶籍確實均以大木牘為書寫材料，秦戶籍書式的問題固然可以得到解釋，但新的問題產生了：為什麼孫吳甚至更早的東漢轉而以竹簡書寫戶籍了呢？長沙東牌樓出土有漢靈帝時期的一枚名籍簡：

凡口五事 𠄎
中 算三事 訾五十
甲卒一人 𠄎^②

該簡第一、三行內容與走馬樓名籍簡十分相似，王素據此指出，孫吳戶籍有承襲東漢的成

①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去強》，北京：中華書局，1986，34頁。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8頁。

分。^①遺憾的是,此簡殘損、漫漶嚴重,記載家庭成員的上半部分內容無法識讀,但下半部分與吳簡如此相近,是否暗示着上半部分的書式與孫吳簡同樣相近呢?如果確實相近,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麼東漢改變了西漢的書式?如果不同,我們更需要思考,為什麼在內容相近的情況下,孫吳改變了東漢的書式?而且東牌樓漢簡與孫吳竹簡時代前後相近,並且完全在同一個區域,難道果真是書寫材料導致了這一變化嗎?這其中一定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嗎?

如果以書寫材料解釋西魏名籍與西晉、前秦、西涼名籍的不同,同樣存在疑問。《樓蘭戶口簿稿》年代不明,但採用西晉制度是沒有疑問的,這意味着自西晉以紙書寫戶口簿籍開始,到西涼甚至更晚的時間,書式方始發生改變。當然,西晉時代戶籍文書未必完全以紙張為材料,但至遲在東晉初年,已經完全進入了紙文書時代,^②自那時到西涼也有一百年的時間。簡牘戶籍書式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仍被遵循,過渡期未免過於漫長,而在保留如此之長的時間以後,到西魏卻發生了變化。面對這些問題,池田溫的解釋無論如何也給人以理由不太充分的感覺。

自秦到唐代,記載家庭成員關係的戶籍書式一再發生變化,目前的材料可以較清晰地描述這些變化的綫索,但卻很難解釋變化發生的原因。從迹象上看,僅從書寫材料角度立論,仍存在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也暫時沒有發現,也許祇有在出現更多的秦漢戶籍實物以後,這種戶籍書式反復變化的原因纔能得到較為合理而深刻的說明。

① 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選釋》,《文物》2005年第12期,70頁。

② 韓樹峰:《漢晉時期的黃簿與黃籍》,未刊。

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

南寧沛鴻民族中學 黃浩波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牘作為秦代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公文檔案,其中所見“計”文書多屬縣下部門年度統計文書。“計”文書有固定的結構與格式、專門的術語以及一定的書寫原則。“計”文書的形成途徑至少有二,其一是以“徒計”為代表的從“簿”到“計”,其二是以“禾稼計”“金錢計”為代表的從“券”到“計”。通過對“計”文書的形成途徑、校驗過程的考察,可以窺見秦代文書行政的基本樣貌,增進對秦代文書行政的認識。

關鍵詞 里耶秦簡 “計”文書 作徒簿 券 文書行政

里耶秦簡牘所見“計”名目繁多。《里耶秦簡(壹)》所見即有以下多種:

1.司空曹計錄	贖計	凡五計	
船計	貲責計	史尚主(第三欄)	
器計(第一欄)	徒計(第二欄)		8-480
2.倉曹計錄	器計	馬計	
禾稼計	錢計	羊計	
貸計	徒計	田官計	
畜計(第一欄)	畜官牛計(第二欄)	凡十計	
		史尚主(第三欄)	8-481

3. 戶曹計錄	田提封計	
鄉戶計	鬻計	
繇(徭)計	鞠計	
器計	・凡七計(第二欄)	
租賃計(第一欄)		8-488
4. 金布計錄	工用計	【金】錢計
庫兵計	工用器計	凡六計(第三欄)
車計(第一欄)	少內器計(第二欄)	8-493 ^①

目前學界對里耶秦簡牘所見“計”之所指的討論已多,雖然諸說各有不同,但是“計”作為與統計相關的文書似已成共識;^②對“計”與秦代的考績制度、行政運行的關係,亦有所涉及。^③在此基礎上,結合新公布的資料,對於“計”文書,仍有頗多可以探討的空間。以下不揣淺陋,試就“計”文書的結構、格式、術語、形成途徑及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欲以就正於大方之家。

一 “計”文書作為年度統計文書

(一) “計”文書的結構與格式

《里耶秦簡(壹)》所見即有“計”文書的自名簡:

5. 廿八年,遷陵田車計付厲(雁)門秦守府
革□二。 金鈎銀四。 □□別□□□ 8-410

《校釋》認為:“車,人名。”^④朱紅林先生認為:“此處‘田車’也許指的就是車輛的一種,因為接下來的‘[革]□二。金鈎銀四’都屬於車輛的配件。‘田車計’就是有關田車數量的記

① 本文所引《里耶秦簡(壹)》簡文,均據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後文不再一一出注。

② 馬怡:《里耶秦簡選校》(連載二),簡帛網,2005年11月18日,後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33-186頁;陳治國:《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63頁;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0,45、50頁;李均明:《里耶秦簡的“計錄”與“課志”解》,《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51頁。

③ 沈剛:《〈里耶秦簡〉[壹]中的“課”與“計”——兼談戰國秦漢時期考績制度的流變》,《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65頁;陳偉:《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秦代行政と算術》,《大阪産業大学論集:人文・社会科学編》第19號,2013,1-25頁,中文版《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年1月24日。

④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以下簡稱《校釋》),144頁。

載。下引里耶簡 8-493 有‘車計’，亦可為佐證。”^①“田車”作為車輛的一種，確實屢見於古代典籍。《詩經·小雅·車攻》與《詩經·小雅·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之句，^②對此，朱熹《詩集傳》曰：“田車，田獵之車。”^③《墨子·明鬼下》有“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④《周禮·考工記序》亦有“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⑤然而，簡 4 所見為“車計”而非“田車計”，不能成為“‘田車計’就是有關田車數量記載”的堅實證據。此處“田”應屬上讀，與“遷陵”連讀為“遷陵田”。“遷陵田”屢見於《里耶秦簡(壹)》，“遷陵田”之外，與之相同的“縣名+田”格式，還有“零陽田”，陳偉先生認為此處“田”應為“田官”。^⑥其說可信。因此，“遷陵田”即遷陵縣田官。故而，簡 5 應是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田官的車計。

在《里耶秦簡(壹)》之後公布的第九層簡牘，^⑦亦有“計”文書的自名簡：

6. 卅七年，遷陵庫工用計受其貳春鄉鬻：

漆(漆)三升，飲(飲)水十一升，乾重八。 9-1138^⑧

對於此簡，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有注釋曰：“簡 8-493 有遷陵縣金布曹的‘工用計’，本簡的‘工用計’應為遷陵縣庫之‘工用計’。”即首行簡文所見“工用計”是其自名。此簡簡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卅七年遷陵庫工用計”，是文書標題，其中“卅七年”是年度，據此可知“工用計”是年度統計文書；“遷陵”為縣名；“庫”即遷陵縣庫，是縣之下的一個部門；^⑨“工用計”則是“計”文書的具體名稱。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認為：“工用”是一類物資的總稱，“可能主要指待加工的原料”。第二部分是“受其貳春鄉鬻”一句，是對物資來源的說明；《說文解字·受部》曰：“受，相付也。”^⑩“貳春鄉鬻”，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認為即貳春鄉管理的漆園，亦是遷陵縣下的一個部門。因此，簡文首行可點斷為“卅七年遷陵庫工用

① 朱紅林：《讀里耶秦簡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 1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137 頁。

② 《毛詩正義》卷一〇《小雅·車攻》《小雅·吉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648、656 頁。

③ [宋]朱熹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卷一〇《小雅·車攻》，北京：中華書局，2011，154 頁。

④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問詁》卷八《明鬼下》，北京：中華書局，2001，224 頁。

⑤ 《周禮注疏》卷三九《冬官考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067 頁。

⑥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第 4 期，140-146 頁。

⑦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 年 12 月 23 日。本文所引游逸飛、陳弘音的觀點均據此文，後文不再一一出注。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後刊《簡帛》第 10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7-210 頁。

⑧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的釋文較游逸飛、陳弘音的釋文在“飲”字前多有一個“升”字，此處採用游逸飛、陳弘音的釋文。

⑨ 孫聞博認為里耶秦簡所見縣級組織有列曹與諸官之分，“列曹負責領導、管理某方面的行政事務，諸官則是主管某項專門事務的機構”。詳見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7 日；郭洪伯認為秦漢縣下機構分對外事務的職能部門“稗官”與輔助部門“諸曹”，詳見郭洪伯《稗官與諸曹》，《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01-127 頁。本文不擬作列曹與諸官的區分，一概稱之為“部門”，並且將鄉亦視為縣下的部門。

⑩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0 頁。

計:受其貳春鄉鬻”。第三部分是“漆(漆)三升,飲(飲)水十一升,乾重八”,是“工用計”的正文,統計項目包括“漆”“飲水”“乾重”,“三升”“十一升”“八”則是統計數量。

反觀簡5,則首行簡文應點斷為“廿八年遷陵田車計:付鴈(雁)門太守府”。“廿八年遷陵田車計”即簡5標題,其中“廿八年”亦為年度,對應簡6“卅七年”,據此可知“車計”亦是年度統計文書;“遷陵田”,即遷陵縣田官,對應簡6“遷陵庫”,庫與田官均為遷陵縣下的部門。“車計”則與“工用計”同見於簡4“金布計錄”之下,亦是“計”文書的具體名稱;雖名曰“車”,但實際上并非車輛,而是相關的配件,類似“工用計”的“工用”,實為一類物資的總稱。兩簡標題內容均能一一對應,其格式為“年度+縣名+部門+具體名稱(某計)”。簡5“付鴈門太守府”一句亦與簡6“受其貳春鄉鬻”正相對應;《說文解字·人部》曰:“付,予也。”^①因此,此句是對物資去向的說明;雁門太守府,雖與簡6所見貳春鄉漆園并非同一級別,但與遷陵縣庫、遷陵縣田官、貳春鄉漆園一樣,亦是一個部門。兩簡說明部分的“受”與“付”意思正好相對,應是“計”文書用以說明統計對象來源、去向的術語。說明部分的格式可歸納為“受或付+部門”。“革□二。金釵環四”是殘見的正文部分,“革□”“金釵環”是殘見的統計項目,“二”“四”則是統計數量,正文部分的書寫格式亦與簡6所見一致,其格式可歸納為“統計項目+數量”。

至此,可以對“計”文書結構與格式初步小結:“計”文書至少由標題、說明、正文三部分構成;標題部分的格式為“年度+縣名+部門+具體名稱(某計)”,說明部分的格式為“受或付+部門”,正文部分的格式為“統計項目+數量”。同時,根據標題格式還可明確:“計”文書是部門年度統計文書。

依照“計”文書的結構與格式,還可發現《里耶秦簡(壹)》中其他屬於“計”文書正文部分的殘簡:

7.木具機四,木織杼二,木織膝三,□ 6-25

《校釋》已指出“具機,疑是織機的一種”,而杼、膝皆為織機部件。^②具,有完備義,“具機”當指完整的織機。《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有“具弩二,矢廿”,整理小組注釋曰:“具弩,一套完整的弩,常見於居延漢簡”,^③可為參照。此簡當是“器計”或“少內器計”正文殘簡。

8.衡一	□一	□□□
角弦二	輪二	鞞二□
厄二(第一欄)	張一司(第二欄)	鞞四□(第三欄) 8-95+8-361 ^④

①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373頁。

②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5-26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152頁。

④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二)》,簡帛網,2012年5月14日。

簡文中所見諸字,《校釋》已多有注釋。^①之後,學者又有所補充。^②姜慧先生認為“簡文是依據當時車的結構按照先馬後輿的順序依次記錄的。首先是車馬的曳引結構部分‘衡’和‘軛’,其次是乘載結構部分‘輪’和‘帳’,最後是附屬於車馬、用來繫馬固車的‘靽’和‘鞏’。”此簡所見皆為車輛部件,當屬“車計”殘簡。

9.遷陵庫真見	胄廿八	矢四萬九百□
甲三百卅九	弩二百五十一	戟(戟)二百五十(第三欄)
甲窵廿一	臂九十七	
鞏贅卅九(第一欄)	弦千八百一(第二欄)	8-458

此簡所見,李均明先生已有解析:“首欄二至四行及第二欄首行為四種護身器具”,“第二欄第二行至第三欄首行所載為遠射兵器弩、矢及其備件等”,“第三欄末行為長兵戟”。^③此簡先列弩後列弩的備件臂、弦,與簡7先列具機後列機的部件杼、滕的寫法相同,皆是先整體而後部件。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亦見有兩簡:

10.□□十八,弩二百五十一,臂九十七,幾(機)百一十七,弦千八百一,矢四萬九百九十,

□千二百八十四物,同券齒。 9-29

11.□□計元年餘甲三百卅九,窵廿一,札五石,鞏贅……五十一,臂九十七,幾(機)百一十七,弦千八百一,矢四萬九百九十八,戟(戟)二百

□緯四斤二兩。 · 凡四萬四千……齒。 9-2045+9-2147^④

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已注意到以上兩簡與簡9的密切關聯,指出:“本簡與館藏簡9-29、9-2147內容大抵均見於簡8-458(遷陵庫的武器裝備物資紀錄),排列順序亦一致”。

簡4“金布計錄”之下有“庫兵計”。“庫兵”一詞,典籍屢見。《韓詩外傳》有:“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⑤《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有:“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⑥《史記·酷吏列傳》亦有:“大群至數千人,擅自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61、138頁。

② 伊強:《〈里耶秦簡〉(壹)字詞考釋三則》,簡帛網,2012年9月26日;姜慧:《里耶秦簡8-95和8-361簡再讀》,《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9期,79-81頁。下引姜慧先生觀點即據此文。

③ 李均明:《里耶秦簡“真見兵”解》,《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130-131頁。此外,簡文“真見”亦據此文補釋。

④ 此簡由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綴合,詳見《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年9月3日,後刊《簡帛》第10輯,201頁。

⑤ [漢]韓嬰撰,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0,321頁。

⑥ 《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2705頁。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①《漢書》中亦多有各地“盜庫兵”“取庫兵”作亂的記載。^②“庫兵”一詞亦見於漢代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器車器集簿》結尾有“右庫兵、車;種百八十二,物二千三百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四”,^③《敦煌漢簡》亦有“假敦德庫兵奴矢五萬枚”。^④李均明先生認爲:“秦時倉、庫已分立,倉儲糧,庫存錢、物。遷陵庫爲縣級庫,物品中包括兵器,可見沒有單獨設立武庫。”^⑤《睡虎地秦墓竹簡·爲吏之道》“除害興利”一節之下亦有“倉庫禾粟,甲兵工用”。^⑥禾粟屬糧,儲於倉,因而“禾稼計”列於倉曹計錄之下;“甲兵”與“工用”則歸屬於庫,故而金布計錄之下有“庫兵計”和“工用計”。因此,“庫兵計”之“庫兵”應當是指庫藏兵器。簡9與簡10、簡11內容爲遷陵縣庫武器裝備物資名稱、數量的記錄,格式則與“計”文書的正文格式相符。準此推測,此三簡皆是“庫兵計”正文殘簡。

通過對以上“器計”“車計”“庫兵計”正文殘簡的考察,還可發現:“計”文書的正文部分在格式一致之外,還體現出分項分類、按照一定順序書寫的原則。此外,從圖版上看,前述簡5、簡7、簡8在大部分統計數額之後皆有豎綫符號“丨”。^⑦雖然同樣符號還見於8-149+8-489、8-454、8-478、8-1844等簡,但是根據簡5、簡7、簡8皆屬“計”文書正文殘簡推斷,此類符號應是“計”文書的書寫特征之一。^⑧

(二)“計”文書術語之“已計某年餘”

“計”文書中以術語“付”字說明物資的去向,以術語“受”說明物資的來源。物資的“付”“受”即物資的支出與收入。若年度當中所“受”的物資多於所“付”的物資,則年度內便有結餘物資,因而必定亦會在“計”文書中有相應的記錄。

《里耶秦簡(壹)》中便有對年度結餘物資的記錄,其簡文如下:

12.遷陵已計:卅四年餘見弩臂百六十九

·凡百六十九

出弩臂四輪益陽

① 《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3151頁。

② 《漢書》卷一〇《成帝紀》、卷一二《平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314、318、323、355頁。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圖版17頁,釋文118頁。下文所引《尹灣漢墓簡牘》簡文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223頁。

⑤ 李均明:《里耶秦簡“真見兵”解》,《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130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170頁。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圖版11、26、60、63頁。

⑧ 漢簡中亦有此類符號,李均明先生認爲是鈎校符號,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396-398頁。

出弩臂三輪臨沅

·凡出七

今九月見弩臂百六十二

8-151

對於此簡，李均明先生已有精彩分析：“簡文所見‘卅四年’乃本賬之前一年，故此例所見當為秦始皇卅五年兵器備件的綜合賬……賬本體現三柱結算的會計方法：‘卅四年餘見弩臂百六十九’為卅四年的餘數額，在沒有其他新入專項的情況下，它便是該賬卅五年的人數，故下云‘凡百六十九’；其下‘出弩臂四輪益陽’‘出弩臂三輪臨沅’為支出項目，支出項目相加，即其下所云‘凡出七’。故‘出七’為支出數。入出之差便是該賬卅五年八月的合計數，即簡文所云‘今八月見弩臂百六十二’”。^① 據此可知，簡 12 的書寫時間當為卅五年九月，實際上即是卅五年遷陵縣庫關於弩的“計”文書。“計卅四年餘”之後的記錄是卅五年“計”文書中對卅四年剩餘物資的追記，而“今九月見”之後的記錄則是卅五年九月見有的物資。因為“計斷九月”，所以可以想見“今九月見弩臂百六十二”，在卅六年的“計”文書中將被記為“已計卅五年餘見弩臂百六十二”。

具有“已計某年餘”格式的簡文還見於 7-304 簡：

13. 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府課。·泰(大)凡百八十九人。死亡

·衡(率)之，六人六十三分人五而死亡一人。

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

廿八年新·入卅五人。

·凡百五十一人，其廿八死亡。·黔道(首)居貲贖責作官卅八人，其一人死。

(正)

令拔、丞昌、守丞臈之、倉武、令史上、上逐除、倉佐尚、司空長、史郤當坐。(背)

7-304^②

此文書自名“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府課”，並非“計”文書，然而其中亦涉及隸臣妾和黔首居貲贖責的人數的年度統計。簡文“泰凡百八十九人”是廿八年“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的總數，是“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和“廿八年新·入卅五人”以及“黔道(首)居貲贖責作官卅八人”的總和，其中“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表明隸臣妾百一十六人是廿八年承繼廿七年而來。此文書廿八年時書寫，亦是用“已計廿七年餘”以追記廿七年剩餘的隸臣妾人數。

前述簡 11 首行有“□計元年餘”，根據簡 12“已計卅四年餘”及簡 13“已計廿七年餘”的

① 李均明：《里耶秦簡“真見兵”解》，《出土文獻研究》第 11 輯，131 頁。

②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後刊《簡帛》第 10 輯，179 頁。

文例,便可將簡首空缺之字補為“已”。

里耶秦簡牘寫作“已計某年餘”,西北漢簡則常寫作“某年餘計”或“某年計餘”,如:

●肩水候官地節四年計餘兵穀財物簿毋餘舩毋餘芰	14·1A
永光五年計餘六石弩系弦六百八十八完 毋出入	158·15 ^①
始建國三年餘計緹紺胡二十三 建國三年毋出入	E.P.T4:8
永始三年計餘鹽五千四百一石四斗三龠	E.P.T50:29
建昭三年計餘蘭三百二 完	E.P.T51:110
永光四年計餘具斤十二完	E.P.T51:376
新始建國天鳳上戌六年計餘蚤矢服	E.P.T65:438
建武三年計餘三石弩系承弦十四 建武四年毋定入	E.P.F22:442 ^②
永光五年計餘漆擣	73EJT14:10 ^③

以上諸簡,紀年跨度從西漢地節四年至東漢建武四年,中經新莽,大多寫作“某年計餘”,僅有 E.P.T4:8 簡寫作“某年餘計”。除 14·1A 簡較為特別,涉及“兵穀財物”,其餘諸簡亦如簡 12 一般,祇涉及某一種物資。根據 E.P.T4:8 簡和 E.P.F22:442 簡,可知上年剩餘物資亦轉入翌年帳目,與簡 12 及簡 13 所見相同;還可知“某年計餘”,與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某年餘”一樣,應是翌年所書,實際上是翌年的“計”文書正文首行,乃是對上年剩餘物資的追記。

若某種物資在上年的“計”中無結餘,則如 14·1A 簡所見,在翌年的“計”中寫明上年“計毋餘某物”;此類情況還見於以下諸簡:

元康三年計毋餘完車	10·20
五年計毋餘	156·28
元年歲計毋餘錢	274·22
計毋餘四石弩	403·24
元鳳元年計毋餘蘭席	511·39 ^④
建昭二年計毋餘	E.P.T51:548 ^⑤
五鳳二年計毋餘布復袴	73EJT28:86 ^⑥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260 頁。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8、154、180、203、449、505 頁。

③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2,4 頁。

④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6、255、462、553、620 頁。

⑤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215 頁。

⑥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3,86 頁。

274·22 簡所見有“元年歲計毋餘”，據此還可推知前揭“某年計餘”或是“某年歲計餘”的省稱。

就字面含義而言，“計某年餘”與“某年計餘”相去無幾；就使用語境而言，二者均是用以表明翌年的計文書中繼承上年剩餘物資的情況，用法相同。因此，“計某年餘”與“某年計餘”應是秦漢時代不同時期的不同寫法，皆是“計”文書中用以說明承繼上年剩餘物資的術語。此術語中“年”與“計”密切關聯，亦可表明“計”文書為年度統計文書。

(三)“計”文書與集簿

前文推斷簡 9 與簡 10、簡 11 為“庫兵計”正文殘簡。三簡簡文所見與尹灣漢墓所出自名木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以下簡稱《兵車器集簿》）從格式到內容均有頗多相同或相近之處。

其一，統計周期相同，均為年度統計。簡 11 首行有術語“計元年餘”，足可表明此簡與秦二世元年的年度統計有關；且前述通過對“計”文書標題格式的考察，已經明確“計”文書是年度統計文書。《兵車器集簿》標題中即有“永始四年”的年度，其作為年度統計報簿，謝桂華先生已有論述：“所記分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大部分，逐項記載成帝永始四年（前 13 年）所收藏的兵、車器的名稱和數量。兩部分之末均有兵、車器種類和物件的統計數字，最後還有總的統計數字，當為年度報簿。”^①

其二，正文書寫格式相同，均為“武器裝備名稱+數量詞”格式。以“甲”為例，簡 9、簡 11 所見皆為：“甲三百卅九”，《兵車器集簿》正文所見則有：“乘輿甲三百七十九”“甲十四萬二千三百廿二”。此格式相當於居延漢簡中常見的“裝備名稱+數量詞”的文書格式。^②若將“裝備名稱”擴大理解為“統計項目”，則其格式便是“計”文書正文的“統計項目+數量詞”格式。

其三，所列武器裝備分類方法相同。《兵車器集簿》所載武器的分類，李均明先生已有解析：“皇室器物統計中，（二）至（八）為遠射兵器弩、弓及其備件，（一〇）至（一八）為甲、盾等護身器具，（一九）至（二五）為劍、戈等格鬥武器。非皇家器物統計中，（五九）至（七九）為遠射兵器弩、弓及其備件，（八〇）至（九五）為甲、盾等護身器具，（九六）至（一一一）為劍、戈等格鬥武器。”^③對於簡 9 所載武器的分類方法，李均明先生亦有詳細解析，其中甲、甲兜、鞬脅、胄為護身器具，弩、臂、弦、矢為遠射兵器弩、矢及其備件；戟為長兵；且明確指出“分類方法和漢簡所見相同”。^④祇是里耶秦簡牘“庫兵計”與《兵車器集簿》的書寫排列順序略有不同，

① 謝桂華：《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 年第 1 期，42 頁。

② 邢義田：《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律、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450-472 頁。

③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93 頁。

④ 李均明：《里耶秦簡“真見兵”解》，《出土文獻研究》第 11 輯，130-131 頁。

《兵車器集簿》是先列遠射武器,次列護身器具,後列格鬥長兵器;里耶秦簡牘“庫兵計”則是先列護身器具,次列遠射武器,後列格鬥兵器。

其四,統計結果記述形式相近。《兵車器集簿》乘輿兵車器統計結果記述形式:“·右乘輿兵、車器五十八,物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普通兵車器統計結果記述形式:“·右庫兵、車器種百八十二,物二千三百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四”,兩類總計:“·凡兵、車器種二百卅,物三〈二〉千三百廿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簡11殘見“·凡四萬四千……齒”,簡9殘見“千二百八十四物,同券齒。”由此推測,里耶秦簡牘“庫兵計”的統計結果記述形式應為:·凡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若干十若干物,同券齒。比較而言,相同之處有:兩者都以“凡”的形式作總計,都以“物”概稱武器裝備;不同之處則是尹灣漢墓簡牘不僅統計物件,還統計種類,而將“物”置於數額之前,里耶秦簡牘則僅統計物件,將“物”置於數額之後,同時強調“同券齒”。

另外,“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的標題格式與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的標題格式亦頗為相近。在“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標題中,“武庫”是部門,“永始四年”是年度,“兵車器集簿”是文書具體名稱,“兵車器”即兵器與車器的合稱,“集簿”則是文書名稱。其標題格式為“部門+年度+具體名稱(集簿)”,與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的標題格式“年度+縣名+部門+具體名稱(某計)”相較,差別僅僅在於“部門”置於“年度”之前,且少有“縣名”一項。李均明先生認為,尹灣漢墓簡牘所見武庫“不屬於東海郡直接管轄”“其供應範圍必超出東海郡範圍,亦受朝廷直接管轄,因此它有可能是漢朝設於東南地區的大武庫。”^①因此,在《兵車器集簿》的標題中未見有縣名、郡名並不奇怪;而且里耶秦簡牘所見簡5及簡6均是遷陵縣下部門的統計文書,“縣名”一項則必不可少。

此外,就文書名稱含義而言,“計”與“集簿”亦有密切關聯。《說文解字·言部》曰:“計,會也。筭也。”^②《玉篇》則曰:“會,歲計也。”^③《周禮·天官·小宰》有“聽出入以要會。”鄭玄注引鄭司農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④以上解說與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為年度統計文書相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計於季氏”,杜預注曰:“送計簿於季氏。”^⑤《漢書·武帝紀》有“受計於甘泉宮”,顏師古注曰:“受郡國所上計簿,若今諸州計

①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95頁。

②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93頁。

③ [南朝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卷一五,北京:中國書店,1983,296頁。

④ 《周禮注疏》卷三《小宰》,58頁。

⑤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一《昭公二十五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464頁。

帳也。”^①《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有“上計謾”，顏師古注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②由此可見，杜預、顏師古均將“計”解為“計簿”。“計簿”一詞，亦見於《漢書·宣帝紀》，其載黃龍元年詔書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③此處“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可與前引“上計謾”齊觀。楊樹達先生曰：“《功臣表》：‘衆利侯郝賢元狩二年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計謾，免。’是此事武帝時已先行之，特彼事為偶發，此著為令耳。”^④由此可見，楊樹達先生亦將“計”等同於“計簿”。

除《兵車器集簿》之外，尹灣漢墓所出還有自名《集簿》的木牘，朝鮮平壤貞柏洞 364 號漢墓所出亦有三枚自名《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集簿》的木牘，^⑤尹灣漢墓所出《集簿》和《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集簿》全篇亦皆是“統計項目+數量”的格式。“集簿”一名，傳世文獻記載僅見於《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胡廣《漢官解詁》“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⑥謝桂華先生認為“其中所云集簿，乃是指縣、邑、道、侯國於每年秋冬歲盡向所屬郡國呈報的上計簿，而尹灣六號漢墓發掘出土的《集簿》，則是我國迄今首次發現的郡國上計簿。”^⑦高恒先生則認為“計簿亦名集簿”。^⑧

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與《兵車器集簿》在統計周期、文書標題、正文，乃至正文的格式、書寫原則以及統計結果記述，乃至文書名稱上均有頗多相同或相近之處，與《集簿》和《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集簿》的正文部分格式亦相同，因此可以視為同一種文書。

(四) “計”文書作為年度統計文書的律令依據

《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見還有數例可為“計”指“計簿”即年度統計文書提供證據：

《秦律十八種·倉律》有“縣上食者籍及它費大(太)倉，與計偕”，《秦律十八種·金布律》亦有“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所謂“與計偕”，整理小組的注釋曰：“即與地方每年上呈計簿同時上報”，^⑨顯然即將“計”理解為“計簿”。

《秦律十八種·金布律》“官相輸者，以書告其出計之年，受者以入計之。八月、九月中其

① 《漢書》卷六《武帝紀》，199 頁。

② 《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647 頁。

③ 《漢書》卷八《宣帝紀》，273 頁。

④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7 頁。

⑤ 楊振紅、[韓]尹在碩：《韓半島出土簡牘與韓國慶州、扶餘木簡釋文補正》，《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81-287 頁。

⑥ 《續漢書》志二八《縣鄉》，北京：中華書局，1965，3623 頁。

⑦ 謝桂華：《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30 頁。

⑧ 高恒：《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評尹灣漢墓木牘〈集簿〉》，《東南文化》1999 年第 1 期，77 頁；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129 頁。

⑨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29 頁。

有輸,計其輸所遠近,不能逮其輸所之計,□□□□□□移計其後年,計毋相繆。工獻輸官者,皆深以其年計之。”其中“計毋相繆”一句,整理小組翻譯為“雙方賬目不要矛盾”,^①“計”指“賬目”,然而結合前後簡文“出計之年”“移計其後年”以及“以其年計之”等與年度密切相關語句,則此處“計”亦應指“計簿”。

綜前所述,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即後世所謂“計簿”,尹灣漢墓簡牘所見“集簿”亦即“計簿”,睡虎地秦簡所見“計”亦多指“計簿”。因此,“計”“集簿”“計簿”當是同一種文書在秦漢不同時期的不同叫法。“計”文書與“集簿”格式大致相同,又因為處在不同時代而在細部上呈現出些許差異,正所謂“漢承秦制,有所損益”。

二 從簿到計:“計”文書的形成途徑之一

陳偉先生認為:“簿是原始檔案,計是根據原始檔案整理、綜合而成的統計資料。”^②循此思路,下面將根據里耶秦簡牘所見的“原始檔案”,嘗試以“徒計”為例,揭示“計”文書的一種形成途徑。

司空與倉作為刑徒的管理部門,^③與此相應,司空曹計錄所見有“徒計”,倉曹計錄所見亦有“徒計”。里耶秦簡牘所見內容與“徒”“司空”“倉”有關,且與“計”文書使用相同術語的“原始檔案”便是作徒簿。^④根據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的研究,遷陵縣官署使用刑徒勞作且製作作徒簿者有:司空、倉、庫、田官、畜官、少內、都鄉、啓陵鄉、貳春鄉等。

(一) 日作徒簿及相關問題

1. 日作徒簿的格式、內容、術語、呈報

《里耶秦簡(壹)》所見較為完整的作徒簿有:

14.廿九年八月乙酉,庫守悍作徒簿(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倉隸臣一人。·凡十一人。

城旦二人繕甲□□

城旦一人治輸□□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37 頁。

② 陳偉:《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秦代行政と算術》,《大阪産業大学論集:人文・社会科学編》第 19 號,2013,19 頁,中文版《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 年 1 月 24 日。

③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136 頁;賈麗英:《里耶秦簡牘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簡帛研究二〇一三》,68-81 頁;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史學月刊》2015 年第 2 期,25 頁。

④ “作徒簿”亦稱“徒簿”或“徒作簿”,參見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3 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454 頁。

城旦一人約車：登（第一欄）

丈城旦一人約車：缶

隸臣一人門：負劇

舂三人級：姁、□、娃（第二欄）

廿廿年上之□（第三欄）（正）

八月乙酉，庫守悍敢言之：疏書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

乙酉旦，隸臣負解行廷。（背） 8-686+8-973

此簡正面首行所見“廿九年八月乙酉，庫守悍作徒薄（簿）”應即該簿的標題部分，格式為“年、月、日+部門+嗇夫名+作徒簿”，據此可知，此作徒簿為日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倉隸臣一人·凡十一人”是該簿的說明部分，以“受司空”和“受倉”說明刑徒的來源，其後是對各來源的刑徒類型、各刑徒類型數量的說明，最後是刑徒總數的說明。其後，第一欄第二行起至第二欄末尾是作徒簿的正文部分，正文內容包含有：刑徒類型、人數、勞作內容、刑徒名，格式一致。第三欄內容與作徒簿內容無關。^① 背面第一行“八月乙酉，庫守悍敢言之：疏書作徒薄牒北上，敢言之。逐手”是呈報文書和文書抄手名。“乙酉旦，隸臣負解行廷”，則是發文記錄，其格式是“日期+時間+身份+名字+行+目的地”，此格式在里耶秦簡牘文書中屢見。^② 據此可知，此簿在當日早晨發出，呈報縣廷。^③ 綜此，此簡所見作徒簿包括：標題、說明、正文、呈報文書、發文記錄五部分；除正文部分略有殘缺，首尾仍然完整，應該便是結構完整的作徒簿了。

不過作徒簿的結構與格式并非一成不變；以下一簡便是明證：

15.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庫武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九人、鬼薪一人、舂三人；受倉隸臣二人。·凡十五人。

其十二人為莫：獎、慶忌、魋、魋、船、何、取、交、頡、徐、娃、聚；

一人絃：竄。

二人捕羽：亥、羅。（正）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庫武敢言之：疏書作徒日薄（簿）一牒。敢言之。橫手。

五月庚子日中時，佐橫以來。／囹發。（背） 8-1069+8-1434+8-1520

此簡言明所呈報為“作徒日簿”。此簡呈報文書之後的“五月庚子日中時，佐橫以來。囹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05頁。

② 汪桂海：《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36頁；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簡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簡帛》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2頁。

③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134頁。

發”并非發文記錄,而是收文和啓封記錄,收文記錄包括收文的日期、時刻、遞送人身份、名,啓封記錄則僅有啓封人名字加“發”字。^①從收文記錄上看,此作徒簿亦是當日送達縣廷。

雖然以上兩個作徒簿在細節上略有差異,但是其主體結構、格式并無太大差別。《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簿亦不外乎以上兩種類型。因此,完整的作徒簿應該至少包括五部分內容:標題、說明、正文、呈報文書、發文或收文記錄,若是收文記錄則還有相應的啓封記錄。

通過對上述作徒簿的考察,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一、作徒簿有其較為固定的結構和格式;二、在說明和正文部分的書寫上,一般體現出先司空後倉、先男後女的順序;三、說明部分以術語“受”說明所接受刑徒的來源,其用法正與“計”文書術語相同。

司空和倉作為刑徒的管理部門,亦各有作徒簿。完整的司空徒作簿有:

16.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圉徒作簿。城旦司寇一人。鬼薪廿人。城旦八十七人。仗(丈)城旦九人。隸臣穀(繫)城旦三人。隸臣居貲五人。·凡百廿五人。其五人付貳春。一人付少內。四人有逮。二人付庫。二人作園:平、□。二人付畜官。二人徒養:臣、益。(以上第一欄)

二人作務:翟、亥。四人與吏上事守府。五人除道沅陵。三人作廟。廿三人付田官。三人削廷:央、間、赫。一人學車酉陽。五人繕官:宵、金、應、稗、觸。三人付段(假)倉信。二人付倉。六人治邸。一人取簫:廐。二人伐槩:始、童。(以上第二欄)

二人伐材:□、聚。二人付都鄉。三人付尉。一人治觀。一人付啓陵。二人爲筭:移、昭。八人捕羽:操、寬、□、□、丁、圉、段、却。七人市工用。八人與吏上計。一人爲烏:劇。九人上省。二人病:復、卯。一人【傳】徙酉陽。(以上第三欄)

白粲【八】人。舂五十三人。隸妾塹(繫)舂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受倉隸妾七人。·凡八十七人。其二人付畜官。四人付貳春。廿四人付田官。二人除道沅陵。四人徒養:棠、瘞、帶、復。(以上第四欄)

二人取芒:阮、道。一人守船:過。三人司寇:□、猥、款。二人付都鄉。三人付尉。一人付□。二人付少內。七人取簫:□、林、燒、粲、鮮、夜、喪。六人捕羽:刻、婢、□、□、娃、變。二人付啓陵。三人付倉。二人付庫。(以上第五欄)

二人傳徙酉陽。一人爲筭:齊。一人爲席:姁。三人治臬:挾、茲、緣。五人塹:婢、般、囊、南、儋。二人上省(省)。一人作廟。一人作務:青。一人作園:夕。(以上第六欄)

·小城旦九人:其一人付少內。六人付田官。一人捕羽:強。一人與吏上計。·小舂五人。其三人付田官。一人徒養:姊。一人病:□。(以上第七欄)(正)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圉敢言之:寫上,敢言之。/瘞手。

^① 汪桂海:《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簡帛研究二〇〇四》,136頁。

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佐瘞以來。（背） 8-145+9-2294^①

此簡所見標題、呈報文書、發文記錄部分均與前見作徒簿相應部分格式一致。唯有說明和正文部分，與前述作徒簿略有差異。從書寫格式和內容看，第一欄第二行至第八行、第四欄第一行至第六行、第六欄第一行和第六行皆為說明部分，內容多為刑徒類型、數量、刑徒總數；唯有第四欄第五行有一條“受”的說明——“受倉隸妾七人”，表明司空並無“隸妾”類型的刑徒，因而接受來自倉的“隸妾”。

說明部分之下便是正文，正文的內容大致還可再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則是“若干人+付+部門”的記錄。此處“付”字的含義，與“計”文書說明部分所用的術語“付”字相同，所“付”的部門有：貳春鄉、少內、庫、畜官、田官、倉、都鄉、尉、啓陵鄉。如此情形，根據“付”“受”二字的含義，可以明確：對於司空而言，是“付”；對於其他部門而言，則是“受”。因此，司空作徒簿中正文部分“若干人+付+部門”的記錄即與前見其他部門作徒簿中說明部分“受司空+刑徒類型+若干人”的內容形成對應記錄。一部分則是與庫作徒簿相同的刑徒勞作的記錄，包括刑徒人數、勞作內容，以及刑徒名。還有一部分是若干人“有逮”或“與吏上事守府”等事務，所見事務多為臨時而具體的事務，由此推測，此部分與“付”某部門的部分不同，亦與直接在司空監管之下勞作的部分不同，或可稱之為“參與臨時事務”。

此簡說明部分與正文部分錯雜記錄，看似混亂，實則自有規律。第一欄第二行至第八行說明部分所見皆是男性刑徒，其後的正文部分是男性刑徒的“付”記錄、勞作記錄和參與臨時事務的記錄；第四欄第一行至第六行說明部分所見皆為女性刑徒，其後的正文部分則是女性刑徒的“付”記錄、勞作記錄和參與臨時事務的記錄；第六欄第一行和第六行的說明部分則分別是未成年的男性刑徒和未成年的女性刑徒，之後的正文亦是未成年男女刑徒的“付”記錄、勞作記錄和參與臨時事務的記錄。可見其書寫亦體現出先男後女，先大後小的順序，與前述作徒簿的書寫順序相同。

此外，司空與倉皆自有刑徒，據此可以斷定，若有刑徒“付倉”的記錄，則必定來自司空，必定屬司空作徒簿簡文；若有刑徒“付司空”的記錄，則必定來自倉，屬倉作徒簿簡文。由此，可以判定以下一簡即是倉作徒簿：

17. 二人付□□□

一人付田官。

一人付司空：枚。

一人作務：臣。

^①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年9月3日，後刊《簡帛》第10輯，204-208頁。本簡過長，為節省版面，故採用聯排形式。

一人求白翰羽:章。

一人廷守府:快。(第一欄)

其廿六人付田官。

一人守園:壹孫。

二人司寇守:囚、嫖。

二人付庫:恬、擾。

二人市工用:鎮、亥。

二人付尉□□。□(第二欄)(正)

五月甲寅倉是敢言之:寫上,敢言之。□(背)

8-663

此簡殘見內容包括正文和呈報文書兩部分,正文亦是可分為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刑徒勞作記錄,一部分是“若干人+付+部門”的記錄。根據前見作徒簿可推知,倉作徒簿正文中的“若干人+付+部門”記錄即與其他部門作徒簿說明部分中的“受倉+刑徒類型+若干人”內容相對應。此外,此簡第一欄已有“一人付田官”,第二欄又有“其廿六人付田官”,根據司空作徒簿所見,“其”皆是說明部分之下正文第一行的起首字,由此推斷,第一欄和第二欄所記當是不同類型的刑徒,其上當各有說明部分,其說明部分與正文部分錯雜并行的書寫形式亦與司空作徒簿相同。因此,從此簡殘見內容推測,倉作徒簿與司空作徒簿在各部分結構和格式上並無區別。

此外,以下一簡亦是倉作徒簿:

18. 卅一年四月癸未朔甲午,倉是□□

大隸臣廿六人□

其四人吏養:唯、冰、州、□□(正)

□午旦,隸妾□□(背)

8-736

《校釋》根據殘筆和文意推斷簡背“午旦”前一字為“甲”,^①則此倉作徒簿亦是當日送達縣廷,說明司空作徒簿和倉作徒簿亦與其他部門的作徒簿一樣,須當日呈報。

通過對上述司空作徒簿、倉作徒簿的考察,可以發現:一、司空和倉的作徒簿與其他部門的作徒簿在各部分的結構和格式上並無二致,在正文內容上則多有“付”刑徒與其他部門的記錄,而其所“付”部門與使用刑徒勞作且製作作徒簿的部門相吻合;二、倉和司空作為刑徒管理部門,同時亦是使用刑徒勞作的部門,故在其作徒簿中相應的既有“若干人+付+部門”的記錄和參與臨時事務的記錄,又有刑徒的勞作記錄;三、司空與倉的刑徒類型不同,司空的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13頁。

刑徒類型有城旦、丈城旦、鬼薪、白粲、春、城旦司寇、隸臣繫城旦、隸妾繫春、隸臣居貨、隸妾居貨、小城旦、小春等，倉的刑徒類型祇有隸臣、小隸臣和隸妾、小隸妾。由司空與倉的刑徒類型不同，亦可推知司空曹計錄所見“徒計”與倉曹計錄所見“徒計”應是對各自所管理的刑徒的年度統計，內容必定有所差別。此外，作徒簿說明部分以術語“受”“付”二字分別說明刑徒的來源、去向，其用法與“計”文書相同；說明部分和正文部分分門別類，按照一定順序書寫的原則亦與“計”文書的書寫原則相似。

2.“日作徒簿非當日真實勞作記錄”說補證

從字面上看，“作徒簿”或曰“作徒日簿”即刑徒的每日勞作記錄簿。^①從標題格式上，亦知前述作徒簿皆為日簿，且其呈報文書便自稱“作徒日簿”。然而，高震寰先生已經根據簡上日期，指出“作徒簿不是事後記錄，而是在晨間安排好今日工作後，就要上繳”。^②其說可從。試再補證如下：

其一是作徒簿的發文或收文日期時刻。前述作徒簿中，有發文記錄者僅有簡 14，發文日期時刻是“乙酉旦”；有收文記錄者，簡 15 的日期時刻是“五月庚子日中時”及簡 16 的日期時刻記為“十月己酉朔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此處“旦”與“日中時”位置相當，應是秦漢紀時中“平旦”的省寫，相當於如今二十四小時制的 3—5 時，而“日中時”則相當於二十四小時制的 11—13 時。^③根據胡平生先生的研究，“水十一刻刻下二”相當於現在時間的 7:05—8:10。^④作徒簿平旦發文或收文，此時刑徒或許方纔開始當天的勞作。即便收文時刻在“日中時”，刑徒當天的勞作亦尚未結束；況且日作徒簿的書寫時刻還要略早於發文或收文時刻。如此便意味着作徒簿上所見刑徒的勞作內容在日作徒簿書寫時實際上尚未完成，甚至於尚未開始，因此，日作徒簿並非為刑徒當天實際完成的勞作的真實記錄，而更像是刑徒當天的勞作任務分配記錄。

其二是在司空與倉之外各部門勞作的刑徒短期內相對固定。目前已公布的作徒簿中可見數組時間接近的同一部門作徒簿。第一組是 8-196+8-1521 簡“卅一年五月壬子朔丁巳都鄉作徒簿”與 8-2011 簡“卅一年五月壬子朔壬戌都鄉守是徒簿”，兩簡日期相隔四天，說明部分所見均有“受司空城旦一人、倉隸妾二人”，應該是同一群人。^⑤第二組是 8-1278+8-1757 簡“卅一年四月癸未朔癸卯啓陵鄉守逐作徒簿”與 8-1759 簡標題殘見“卅一年四月癸未朔乙未啓陵”，兩簡說明部分皆有“受倉大隸妾三人”。第三組包括四枚簡：8-1146 簡殘見

①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3 輯，455 頁；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0、111 頁。

②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135 頁。

③ 李天虹：《分段紀時與秦漢社會生活舉隅》，《出土文獻研究》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150 頁。

④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10 頁。

⑤ 唐俊峰：《里耶秦簡所示秦代的“見戶”與“積戶”》，簡帛網，2014 年 2 月 8 日。

標題“廿九年九月戊午，貳春”；8-787+8-1327 簡是“卅年十月癸卯貳春鄉守綽作徒簿”；9-564 簡是“卅年十一月癸未，貳春鄉徹作徒簿”；9-18 簡則是“卅年十一月丁亥，貳春鄉守朝作徒簿”^①此四簡時間跨度長達兩個多月，所見刑徒名字多有重合，尤其是 9-564 簡和 9-18 簡相隔四天，所見刑徒名幾乎全同，當是同一批刑徒無疑。此外，本組簡牘所見諸刑徒亦見於 8-779 簡、8-780 簡、8-1707 簡，而且勞作內容無外乎“治土”“負土”“運土”“學甄”“爲甄”等。另外，還有一組三簡內容相同：8-1207+8-1255+8-1323 簡、^②8-1340 簡、8-1742+8-1956 簡。從簡文格式和內容上便可判斷，此三簡皆是貳春鄉守吾作徒簿，說明部分皆爲“受司空白粲一人，病”；而且 8-1742+8-1956 簡日期殘見“子”字，顯然與 8-1207+8-1255+8-1323 簡有別。前兩組作徒簿所見固然可以用部門每日接受司空和倉的刑徒類型與數量有其固定性來解釋，但無法以此來解釋後兩組作徒簿。因此，更爲合理的解釋應是其他部門作徒簿說明部分所見“受司空（或倉）”祇是說明其來源而已，刑徒并非一定在當日纔接受，而且刑徒在一定時期內都在固定的部門勞作。正因如此，在勞作開始之前，分配勞作任務并寫上刑徒名字便成爲可能。

綜此，雖然名曰“作徒簿”或“作徒日簿”，但是實際上并非每日刑徒實際完成勞作的真實記錄，而更像是刑徒的勞作任務分配記錄，而且作徒簿說明部分的刑徒付受記錄并不一定是當日的實際付受記錄，而更有可能祇是對刑徒來源或去向的說明。

3. 日作徒簿的查驗

作徒簿呈報之後，縣廷在當月之內會對各部門每日所呈報的作徒簿進行清點查驗，若有缺交便會下令追繳。以下兩簡便清晰顯示有關部門的查驗和追繳：

19. 六月都鄉不上乙丑作徒簿(簿)□□

卅五年六月戊午朔癸未令□□

六月戊午朔癸□

8-1425

20. 卅四年十二月癸丑司空不上作徒簿□

……□刻，奏遷陵□□曰移□□當□□

10-688 ^③

學者認爲此兩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司空名‘不’者和都鄉嗇夫名‘不’者（“不上”不作人名理解）向縣廷呈送（“上”）作徒簿，但是作徒簿前標明‘上’者僅此二例；二是司空未呈送（“不上”）‘卅四年十二月癸丑’作徒簿，都鄉未呈送‘六月乙丑’作徒簿，相關機構具文追

① 四簡簡號、簡文各版本不甚一致，文中第八層簡號、簡文據《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9-18 簡據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一文，9-564 簡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作徒簿”》，《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102 頁。

② 簡文“五月”從趙岩改釋，參閱趙岩《里耶秦紀日簡牘札記》，《簡帛》第 8 輯，246 頁。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作徒簿”》，《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108 頁。

查。”^①當以第二種解釋爲是。因爲前述作徒簿簡 14、簡 16、簡 17 在呈報文書中均以“上”字表“呈送、呈報”之意，而且在目前已經公布的里耶秦簡牘中并未見有司空名“不”者和都鄉嗇夫名“不”者。^②

另外，根據簡 19，六月戊午朔，則乙丑是初八日，癸未是二十六日，間隔十八天，表明雖然各部門的作徒簿都是當日呈報，但是有關部門并未當即查驗，而可能是在月底清點查驗時纔發現都鄉漏報，進而下文追繳。^③ 簡 20 首行格式與簡 19 類似，次行殘缺太甚已難知其意，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兩簡與作徒簿的清點查驗和追繳有關。

(二) 月作徒簿及其相關問題

1. 月作徒簿的形成及其結構、內容

在每日作徒簿的基礎上，各部門每月還要將作徒簿累積匯總製作成“月作徒簿”，直接證據有以下兩簡：

21. 卅年八月貳春鄉作徒簿(簿)。

城旦、鬼薪積九十人。

仗城旦積卅人。

舂、白粲積六十人。

隸妾積百一十二人。(第一欄)

· 凡積二百九十二人。☐

卅人甄。☐

六人佐甄。☐

廿二人負土。☐

二人☐瓦。☐(第二欄) 8-1143+8-1631

此簡首行“卅年八月貳春鄉作徒簿”即其標題，其格式是“年、月+部門+作徒簿”，因此可稱之爲“月作徒簿”，相應地前述的每日作徒簿則可稱之爲“日作徒簿”。月作徒簿的標題較之日作徒簿少了部門嗇夫一項內容。標題之下亦是說明部分，與日作徒簿相比，不再出現“受”刑徒的記錄，因爲刑徒類型已經足以表明其來源；在各刑徒類型和人數之間、刑徒總數“凡”之後皆有“積”字，表明此處人數乃是一個月內累積的人數。^④ 至於“隸妾積百一十二人”一句，自然亦是工作日數的累積。王偉、孫兆華兩位先生認爲“隸妾的累積人數不能被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作徒簿”》，129-130 頁。

② 目前可見司空嗇夫的名字與任職時間、都鄉嗇夫的名字與任職時間，參見[加]葉山《解讀里耶秦簡》，《簡帛》第 8 輯，131、135-136 頁。

③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139-140 頁。

④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 年 12 月 23 日。

30 整除,可能存在以下兩種情況:情況一,原有 3 名隸妾,另有 1 名隸妾中途被調來,此人當月僅工作了 22 天;情況二,原有 4 名隸妾,其中 1 名隸妾工作了 22 天後被調走。”^①此外可能還有一種情況是“百一十二人”為隸妾四人三十日的工作日數累積,祇是扣除了八人(日),扣除的原因極有可能是日作徒簿中屢見的“病”記錄。《睡虎地秦墓竹簡·倉律》中對刑徒稟食規定“其病者,稱議食之,令吏主。”^②生病的刑徒的口糧祇能酌情給予。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生病者不能勞作。準此推測,日作徒簿中記為“病”的刑徒,便是當日因病不能勞作的刑徒,^③在勞作人數的累積中自然要扣除。漢簡所見邊塞卒作簿中亦有勞作、病、休的記錄,在統計功勞時亦有“其十五日河平元年陽朔元年病不為勞”“其六日五鳳三年九月戊戌病盡癸卯不為勞”,生病的天數不能記入功勞。^④綜合秦漢簡牘所見情況判斷,日作徒簿中記錄為“病”的人數要在月作徒簿的累積人數中扣除。

說明部分之後便是正文部分,包括人數、勞作內容,其格式與日作徒簿正文部分的格式相同,祇是此人數乃是一個月內某項勞作內容的累積勞作人數。

22.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簿)冢: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其男四百廿人吏養,男廿六人與庫武上省。(以上第一欄)

男七十二人牢司寇,男卅人輸或(鐵)官未報,男十六人與吏上計,男四人守囚,男十人養牛,男卅人廷守府,男卅人會逮它縣,男卅人與吏□具獄。(以上第二欄)

男百五十人居貲司空,男九十人穀(繫)城旦,男卅人為除道通食,男十八人行書守府,男卅四人庫工。·小男三百卅人吏走,男卅人廷走,男九十人亡。(以上第三欄)

男卅人付司空,男卅人與史謝具獄,·女五百一十人付田官,女六百六十人助門淺,女卅四人助田官穫,女百卅五人穀(繫)舂,女三百六十人付司空,女三百一十人居貲司空。(以上第四欄)

女六十人行書廷,女九十人求菌,女六十人會逮它縣,女六十人□人它縣,女九十人居貲臨沅,女十六人輸服(簾)弓,女卅四人市工用,女卅三人作務。(以上第五欄)

女卅四人付貳春,女六人取薪,女廿九人與少內段買徒衣,女卅人與庫佐午取黍,女卅六人付畜官,女卅九人與史武輸鳥,女六十人付啓陵。(以上第六欄)

女卅人牧鴈,女卅人為除道通食,女卅人居貲無陽,女廿三人與吏上計,女七人行書

① 王偉、孫兆華:《“積戶”與“見戶”: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編戶數量》,67 頁注 39。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71 頁。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作徒簿”》,130 頁。

④ 詳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152 頁 E.P.T50:10;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下冊,54 頁 73EJT26:88A。

酉陽,女卅人守□,女卅人付庫。(以上第七欄)10-1170^①

此簡標題較簡 21 標題多一“取”字,《說文解字·一部》曰“取,積也”,^②與說明部分的“積”字正相呼應。與司空日作徒簿、倉日作徒簿相對應,其正文部分的内容亦大致可再分為三部分:一是在本部門——倉直接監管之下勞作的人數累積,勞作内容諸如吏養、守司馬、守囚、養牛、除道、行書、求菌、市工用、輪服弓、作務、取薪、牧鴈等亦見於司空日作徒簿和倉日作徒簿。一是付與其他部門的人數累積,“付”的人數累積記錄格式“性別+人數+付+部門”正與簡 21 所見貳春鄉月作徒簿說明部分的“刑徒類型+積+人數”相對應。三是“與”“助”“穀”“居貲”等臨時而具體的事務。試簡要分析如下:“與”所見有“與庫武上省”“與吏上計”“與吏謝具獄”“與少內段買徒衣”“與庫佐午取黍”“與史武輪鳥”,皆是臨時性工作。“助”有“助田官穫”,《說文解字·禾部》曰“穫,刈穀也”,^③具有季節性,亦是臨時性的工作,還有“助門淺”,門淺是縣名,并非遷陵縣內部門,自然是非常態化付與。“穀”或寫作“擊”“擊”,實即“繫”,張金光先生認為“秦簡律文中凡言‘繫’,尚含臨時附繫的意思。凡言‘繫城旦舂’者或‘繫作’者,皆為本非城旦舂或應作,而是由於某種原因,臨時附繫拘作於城旦之列或他役。”^④日作徒簿所見繫城旦舂皆來自司空可為其證。“居貲”,前揭簡 16 有“隸妾居貲”,亦有“隸臣居貲”,可證隸臣居貲和隸妾居貲亦歸司空管理。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有“及隸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減其衣食,毋過三分取一,其所亡衆,計之,終歲衣食不踐以稍賞(償),令居之”,^⑤此簡所見“居貲”當與《金布律》的規定有關,除“居貲”遷陵縣司空之外,還有“居貲臨沅”“居貲無陽”,以日作徒簿所見推測,當是“居貲”臨沅司空和無陽司空。“居貲”司空的人數,在司空亦有對應的“居貲、贖、責簿”予以記錄。^⑥

張春龍先生指出“此牘完整,背面無文字”,^⑦則月作徒簿僅由標題、說明、正文三部分構成。

2. 月作徒簿的呈報

各部門日作徒簿彙編成為月作徒簿的時間在當月月末,並且在晦日呈報縣廷。《里耶秦簡(壹)》所見相關簡牘有:

23. 作徒簿(簿)及取卅一□ 8-815

24. 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辛巳,將捕爰,段(假)倉茲敢言之:上五月作徒簿及取(最)卅

①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年9月1日,後刊《簡帛》第10輯,182-184頁。本簡過長,為節省版面,故採用聯排形式。

②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353頁。

③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325頁。

④ 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36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38頁。

⑥ 8-284簡有“卅一年司空十二月以來居貲、贖、責簿盡三月城旦舂廷”。

⑦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古文字與古代史》第3輯,458頁。

牒。敢言之。(正)

五月辛巳旦,佐居以來。氣發。 居手。(背) 8-1559

對此兩簡,梁煒傑先生認為:“‘卅牒’及‘卅一(牒)’指的乃按月編制‘作徒簿’及每日記錄‘作日徒簿’牒數的總和……‘取’即所有‘作日徒簿’的統稱”。^①對此說法,胡平生先生已詳引孫詒讓《周禮正義》指出其不足之處,並且認為:“這裏的‘最’,不是牒數的總計,應當是作徒人數、分工數據的總計。”^②

根據簡文內容與格式分析,簡24正面是段倉茲的呈報文書,背面則是收文和啓封記錄;五月壬子朔,則辛巳爲晦日。此簡清楚表明,各部門嗇夫還須在晦日將月內每日的作徒簿再次呈報,且將每日的作徒簿彙編成爲“取”一併呈報。從“取”是“作徒人數、分工數據的總計”,以及簡22標題後綴有“取”字來看,簡23和簡24所言的“取”的具體形態當即“月作徒簿”。根據簡22標題,甚至可以認為“月作徒簿”的完整名稱應爲“月作徒簿取”,^③“月作徒簿”和“取”祇是其省稱。

因爲月作徒簿在晦日與月內每日的日作徒簿一併呈報,所以簡23、簡24即其呈報文書部分與送達、啓封記錄。此亦是“取”即指月作徒簿的另一證據;由此亦可理解月作徒簿何以祇有標題、說明和正文三部分內容,而無類似日作徒簿的呈報文書。至於晦日呈報的日作徒簿與此前每天呈報的日作徒簿在格式和內容上是否有所區別,限於資料,祇能存疑待考。

此外,還有以下一簡亦與月作徒簿的呈報和保存有關:

25.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已盡 8-1428

簡文“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與月作徒簿的標題格式相同。《校釋》認爲此簡屬簽牌,^④亦即《里耶發掘報告》中所說的筭牌。^⑤

葉山先生推測:“大部分的行政單位將檔案存放於不同的竹筭,或者是兩個或者是更多的單位共同使用一個筭”。^⑥整理者提到出土器物中有“竹編的籃、筐”,^⑦其中應包含簡文屢見的“筭”。從穿孔形制推測,筭牌即繫在筭邊緣外或側面,^⑧分門別類,以方便存放、查驗、核校所存文書。結合前述各部門日作徒簿每日呈報,晦日再次呈報月內每日作徒簿及月作徒

① 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簡帛網,2013年11月9日。

② 胡平生:《也說“作徒簿及最”》,簡帛網,2014年5月31日。

③ 9-245簡另有“亭作徒簿取”,詳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8頁。

④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23頁。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180頁。

⑥ [加]葉山:《解讀里耶秦簡》,《簡帛》第8輯,91頁。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1頁。

⑧ 徐世虹:《秦“課”芻議》,《簡帛》第8輯,258頁。

簿,而且有關部門查驗、核校的事實,可以推測,在縣廷中均有相應的筭用以存放各部門呈報的文書。^①

“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的時限為“十月”,表明該筭是用以存放司空曹廿八年十月每日呈報的日作徒簿。此外,“已盡”二字明顯是後書,或許十月晦日再次呈報的每日作徒簿及月作徒簿,查驗無誤之後,方能在“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筭牌之後標上“已盡”,表示司空曹十月應當呈報的作徒簿已經呈報完畢,清點無誤。

3. 月作徒簿的核校

月作徒簿呈報之後須要接受核校,以下一簡或即反映對月作徒簿的核校:

26. 城旦瑱以三月乙酉有還。今隸妾益行書守府,因之令益治邸代處。謁令倉、司空,薄瑱以三月乙酉不治邸。敢言之。/五月丙子朔甲午,遷陵守丞色告倉司空主,以律令從事,傳書。/囹手。 8-904+8-1343

根據簡文推知,原先在司空呈報的三月乙酉作徒簿中當有“一人治邸:瑱”的勞作安排記錄,祇是當天城旦瑱“有還”,實際並未完成“治邸”的勞作任務;而隸妾益在五月甲午的倉作徒簿中祇有“行書守府”一項勞作內容,而實際上當日還額外完成“治邸”的任務。“謁令倉司空”一句,梁煒傑先生已懷疑應斷為“謁令倉、司空”;^②結合前面的分析,此疑可以得到證實,而且“司空”與“簿”之間亦應該點斷,“簿”當為動詞,是“登記”的意思。因為此事涉及的刑徒還有隸妾益,隸妾益屬倉,所以守丞在命令司空登記城旦瑱為“三月乙酉不治邸”的同時還要告知倉,隸妾益“五月甲午治邸代處”一事。此外,發生在城旦瑱身上的情況,亦是此前判斷日作徒簿“并非刑徒的每日真實勞作記錄”的有力佐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當日作徒簿在刑徒開始勞作之前已經書寫完成,城旦瑱在司空日作徒簿發文之後纔因獄事不能完成當日的勞作,隸妾益在倉五月甲午上呈的作徒簿中祇安排有“行書守府”一項勞作任務。

此簡看似僅是對三月乙酉司空作徒簿的核校,然而三月乙酉距五月甲午已經一月有餘,三月的每日作徒簿已經在三月晦日彙編成三月作徒簿,對三月內任何一日的日作徒簿的核校、更改實際上都會變成對三月作徒簿的核校、更改。另外,結合庫、都鄉等部門日作徒簿中“受”的記錄和司空、倉日作徒簿中“付”的記錄相對應的情形,還可以推測縣廷能獲知城旦瑱“三月乙酉不治邸”,是因為對照其他部門的作徒簿或是相關記錄。由此推測,日作徒簿呈報的目的之一應當在於查驗和核校;日作徒簿在勞作內容之後多注明刑徒名字的做法或許

^① 藤田勝久:《里耶秦簡の記録簡と実務》,《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科編》第25號,33-36頁。此部分的翻譯由學生韋智浩完成,謹致謝忱。

^② 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簡帛網,2013年11月9日。

正是出於方便核校的目的。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有如下案例：

蜀守漱(讞)：佐啓主徒。令史冰私使城旦環爲家作，告啓，啓詐(詐)簿曰治官府，疑罪。·廷報：啓爲僞書也。

蜀守漱(讞)：采鐵長山私使城旦田、舂女爲薑，令內作，解書廷，佐恬等詐簿爲徒養，疑罪。·廷報：恬爲僞書也。^①

在這兩個案例中，皆明確記錄刑徒的姓名、真實與僞造的勞作內容，其中僞造的勞作內容“治官府”與里耶秦簡牘所見“繕官府”含義相近，“徒養”更是屢見於司空和倉的作徒簿。此雖屬漢初案例，然而去秦時未遠，仍能反映出作徒簿核校的事實，甚至可以由此窺見漢初文書行政制度對秦代的繼承。

(三) 徒計的形成

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牘中并未見到“年度作徒簿”。整理者提及的《卅四年倉徒簿》與《卅二年司空作徒簿》，所引簡文有“女五百一十人付田官”“女四十四人助田官穫”“廿三人付田官”，^②根據所引簡文判斷，所謂《卅四年倉徒簿》當是指前揭簡 22，而所謂《卅二年司空作徒簿》當是指前揭簡 16；實際上，簡 22 的完整標題是“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取”，而簡 16 的完整標題是“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囹徒作簿”，前者是月作徒簿，後者是日作徒簿，皆非“年度作徒簿”。

梁煒傑先生根據《里耶秦簡(壹)》中“‘作徒簿’見有‘按月編制’‘按日記錄’的實物簡，推測亦有‘按年編制’的習慣”，而且認爲“按年‘作徒簿’暫不見實物，但從 8-16‘廿九年盡歲田官徒簿’簽牌看來，包含全年作徒詳情的記錄應是存在的”。^③前述已指出“計”文書爲年度統計文書，因此，倉曹計錄和司空曹計錄之下的“徒計”便是按年編制的“作徒簿”。

各部門可能在月作徒簿基礎上編制“年度作徒簿”——徒計的證據同樣來自於筭牌，與此相關的筭牌有：

27. 廿九年盡歲田官徒簿(簿)廷。

8-16

28. 畜官、田官作徒簿(簿)，□及貳春

廿八年

8-285

高震寰先生認爲簡 27“既標明是田官一整年的徒簿，說明每一年的作徒簿最後要集成建檔，以備查驗”，簡 28“也許本來祇搜集了畜官、田官廿八年的作徒簿，後來纔加入倉及貳春

①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釋文 347-348 頁。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4 頁。

③ 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簡帛網，2013 年 11 月 9 日。

鄉的資料”。^①

前述已經指出，簡 25“廿八年十月司空曹徒簿（簿）”以“十月”為時限，是用以保存司空十月內每日所呈報的日作徒簿，因此，簡 27、簡 28 以“年”為時限的簡中所存應該便是核校之後的月作徒簿。保存有整年中每月的月作徒簿，則在月作徒簿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彙編，年度作徒簿——徒計便可輕易得出。即使簡中所存并非月作徒簿，而是一年中每一日的作徒簿，在日作徒簿的基礎上統計，其結果亦是年度作徒簿——徒計。

根據前述“計”文書的標題格式推斷，“徒計”的標題格式應為“年度+部門+徒計”。因此，8-9 簡“卅二年司空徒計”，或即“卅二年司空徒計”標題殘簡。

倉與司空分別以各自部門所管理的刑徒付與本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倉曹計錄和司空曹計錄之下亦分別有“徒計”，因此，倉與司空之外的各部門應當是分別統計年度內所受來自倉與司空的刑徒，然後根據刑徒類型，分別向倉曹和司空曹呈交相應的“徒計”。根據前述“計”文書的格式，呈交倉曹的“徒計”的說明部分格式為“受倉”，正文部分的“統計項目”則是倉所管理的各類刑徒，“數量”則為各刑徒類型的累積人數；呈交司空曹的“徒計”的說明部分格式為“受司空”，正文部分“統計項目”則是司空所管理的各類刑徒，“數量”則為各刑徒類型的累積人數。與倉、司空的作徒簿、月作徒簿相對應，倉與司空的“徒計”中亦至少有三部分內容，一為年度“付”其他部門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統計；一為年度本部門使用勞作的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統計；一為年度參與臨時性事務的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統計。此外，結合前揭簡 13 所見，應該還有承繼上年度的刑徒類型及其人數、新入刑徒類型及其人數、死亡刑徒類型及其人數的部分。

前述亦已指出，倉和司空的日作徒簿和月作徒簿與其他部門的日作徒簿、月作徒簿均有對應記錄。實際上，倉和司空在各自的日作徒簿和月作徒簿上即可形成“徒計”，內容即包括本部門年度使用勞作的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所受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付”其他部門的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參與臨時性事務的各刑徒類型及其累積人數。為何還須各部門製作、分別呈交呢？根據倉和司空日作徒簿、月作徒簿與其他部門的相互對應性，倉和司空付與其他部門的刑徒類型、累積人數亦應與其他部門的“徒計”形成對應關係。因此，其他部門分別製作并且呈交的目的之一仍是為了核校，與呈報日作徒簿、月作徒簿的目的一致。倉和司空徒計中，倉和司空付與其他部門的刑徒類型、累積人數即可與其他部門的年度作徒簿核校，倉和司空相互付、受的刑徒類型、數量則可根據兩部門的“徒計”相互核校。

里耶秦簡牘所見的由日作徒簿到月作徒簿，再到徒計（年度作徒簿）的形成途徑，在《周禮》中可以找到相近的記載，《周禮·天官·宰夫》云：“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

①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138 頁。

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賈公彥疏曰:“‘正歲會’,正猶定也,謂一年會計文書,總句考之。歲計曰會也。‘月終則令正月要’者,謂每月終,則令群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曰要’也。‘旬終’,謂每旬終則令群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曰成也。”^①《周禮·天官·宰夫》又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賈公彥疏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②日作徒簿、月作徒簿、徒計的形成途徑與日成、月要、歲會的形成途徑類似。祇是《周禮》的記載相對簡略,遠不及里耶秦簡牘所見細膩鮮活。里耶秦簡牘中各部門日作徒簿、月作徒簿中的“付”“受”記錄之間相互照應,便於核對校驗,從中則可窺見秦代制度設計的細緻綿密。

三 從券到計:“計”文書的形成途徑之二

“徒計”之外,諸曹計錄所見還有頗多涉及錢糧器物的“計”,如金錢計、禾稼計、器計、畜計等,然而《里耶秦簡(壹)》中并未見到與之內容相關的簿。整理者在介紹簡牘形制時提到:“券書(校券):記載錢糧物的數量,其上有與數量相符的刻齒。”^③因此,就內容而言,與錢糧器物相關的“原始檔案”應該便是券。

(一) 券的製作與術語

學者根據里耶秦簡牘中“同出的無字殘校券有基本完成剖分而底端留約兩厘米未剖分者”,推斷券的製作過程為“先將木料加工成有一定厚度的契券形式,剖分為兩片,保留底端不分開,待完成記錄和施加刻齒後再剖開,以保證刻齒的同一性和工作效率”。^④雖然在《里耶秦簡(壹)》中未見有字而“基本完成剖分”的券,但是在敦煌懸泉漢簡中却有如下內容:

出粟 元始元年正月 縣泉置嗇夫就付 A

入粟 元始元年正月

B

I T0114①:26AB

入穡麥小石一石五斗 甘露元年十月戊寅遮要御孫定國…… (右齒) A

出穡麥小一石五斗 甘露元年十月戊寅縣泉廩嗇夫弘付遮要御孫定國 B

II T0115④:41AB

① 《周禮注疏》卷三《宰夫》,70頁。

② 《周禮注疏》卷三《小宰》,58頁。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2頁。按:“券”與“校券”應當有所區別,實不可一概而論。

④ [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張春龍:《里耶秦簡中の刻齒簡と〈數〉中の未解讀簡》,《大阪産業大學論集》第18號,21頁;中譯《里耶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の未解讀簡》,《文物》2015年第3期,56頁;張春龍、胡平生、[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里耶秦簡中的校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北京,2013年6月,385頁。

☐神爵三年十一月丁酉朔己酉縣泉廩佐禹付廚嗇夫時（中剖未分離） A

☐神爵三年十一月丁酉朔己酉廚嗇夫時受縣泉廩佐禹 B VT1813③:1AB

張俊民先生指出“以上三簡均保留了漢代剖符合券的原始狀態，文字兩面書寫，一面是‘出’，一面是‘入’”。^①此外，I T0114①:26 簡 A 面和 II T0115④:41 簡 B 面與“出”相應的字眼正是“付”，依據 VT1813③:1AB 簡文例及 II T0115④:41 簡 B 面簡文，可以補足 II T0115④:41 簡 A 面簡文為“入穰麥小石一石五斗 甘露元年十月戊寅遮要御孫定國受縣泉廩嗇夫弘”，如此，“出”“付”便與“入”“受”正好形成對應關係。券以“出”“付”“入”“受”說明物資的去向、來源，其用法與“計”文書術語“付”“受”用法相同。VT1813③:1AB 簡附注“中剖未分離”的狀態應當便是里耶秦簡牘中“同出的無字殘校券有基本完成剖分而底端留約兩厘米未剖分者”的狀態了。

《里耶秦簡(壹)》中亦有大量與懸泉漢簡所見形制、格式和術語相近的券。由此推測，從簿到計絕非計形成的唯一途徑，此外至少還有從券到計的途徑。以下試以禾稼計、金錢計為例，探討從券到計的形成途徑。

(二) 禾稼計的形成途徑

“禾稼計”在倉曹計錄之下。“禾稼”一詞，《校釋》已據《墨子》指出其為“穀類作物的統稱”，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和《法律答問》“所云‘禾稼’皆指收藏在倉中的穀實。”^②因此，“禾稼計”當是關於倉所管理的糧食的年度統計。《里耶秦簡(壹)》所見倉管理的糧食主要有粟和稻；與倉及糧食出付入受有關的券則頗為多見。

一類是倉的稟食記錄的券。稟食記錄之下還可細分為出稟記錄和出貨記錄，其中又以出稟記錄最為多見。^③以下試舉一條出稟記錄，以概其全：

29. 粟米一石二斗半斗。·卅一年三月癸丑，倉守武、史感、稟人援出稟大隸妾并。
令史犴視平。感手。 8-763

此券是倉出稟大隸妾并的記錄，內容包括：糧食種類、數量、日期、嗇夫、史、稟人、去向、用途、領受對象、視平人、書手。^④出稟券的內容格式大致如此，偶爾還有倉名，將史換成佐、視平人換成監者等。在領受對象方面，除刑徒之外，還包括居作、戍卒、縣丞、吏佐、鄉佐等。在糧食種類上，出稟刑徒、居作、戍卒的是粟米，出稟縣丞、吏佐、鄉佐的則為稻米。

① 張俊民：《懸泉置出土刻齒簡牘概說》，《簡帛》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6-237頁。

②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64-165頁。

③ 關於稟食記錄的相關問題，筆者已有《〈里耶秦簡(壹)〉所見稟食記錄》論述。

④ 學者對券的格式已有類似的解析，本文有所借鑒，但側重點不同。詳見[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張春龍《里耶秦簡中の刻齒簡と〈數〉中の未解読簡》，34-35頁；中譯《里耶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の未解讀簡》，57頁。

此外,出貸記錄則有:

30.粟米二石。卅三年九月戊辰乙酉,倉是、佐襄、稟人藍出貸更□

□令□

8-1660+8-1827

此券出貸的領受對象僅殘見“更”字,根據文例,可補足為“更戌”。從殘存簡文推測,出貸記錄與出稟記錄的內容格式相同,皆以術語“出”說明糧食去向。

另一類是倉與其他部門之間糧食付受的券。倉付司空的券有:

31.粟米十二石二斗少半斗。卅五年八月丁巳朔辛酉,倉守擇付司空守俱□ 8-1544

此券字面所見是倉守擇付司空守俱粟米,實際上“倉守擇”和“司空守俱”分別代表各自所掌部門之間的行為,即倉付與司空粟米,而非個人之間的行為。

司空受倉的券有:

32.□=七石。元年端月癸卯朔□□,司空□□受倉□□

6-3

此簡上下兩端均有殘斷,上端殘見重文符號“=”,其後是數量“七石”。鑒於《里耶秦簡(壹)》中所見“粟米”皆寫作“粟=”,可以推知“七石”之前當是“粟=”。雖然簡文殘缺甚多,但是仍見“司空”“受倉”等關鍵信息,據此可知其為司空受倉粟米七石的券。

以上兩簡一“付”一“受”,而且均在倉和司空之間,恰好形成對應的記錄;與前述作徒簿中司空、倉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刑徒付受記錄形成對應相同。此類涉及部門之間付受的券,其內容包括:物品名稱、數量、日期、部門嗇夫、付或受、部門嗇夫,與前述懸泉漢簡所見券的內容相比,僅少起首的“出”或“入”字。

對比倉關乎糧食的兩類券,還可以發現:稟食記錄的券,都是倉對個人的記錄,可稱之為“對私券”,其術語用“出”,除了以“出”說明去向之外,還有“稟”或“貸”以說明用途;倉與其他部門之間糧食付受的券,則可稱之為“對公券”,其術語用“付”或“受”以說明去向或來源,之外再無用途的說明。

此外,還有倉和各部門之間與券相關的往來文書:

33.卅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啓陵鄉守意敢言之: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啓陵鄉。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為付券一上。謁令倉守。敢言之。·七月甲子朔乙亥,遷陵守丞配告倉主:下券,以律令從事。/壬手。/七月乙亥旦,守府印行。(正)

七月乙亥旦,□□以來。/壬發。恬手。(背) 8-1525

此件文書,中日學者已有研究,認為“所謂‘付券’,是由啓陵鄉守、倉佐之間在授受粟米時製作的券,應有表示‘六十二石’的刻齒的簡牘。由倉佐到調運粟米現場的啓陵鄉直接運

輸到倉，‘付券’首先送交縣廷，再轉送到倉”，並且根據此簡指出“校券應是最終由縣廷保存的檔案”。^①

34.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倉守敬敢言之：出西廩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輸；案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陽□□□□。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正）

□中水十一刻刻下三，令走屈行。操手。（背） 8-1452

此文書由倉守敬上呈，事由是倉出付兩批糧食，而將“出中辨券”上呈。《校釋》已經指出“中辨券，三辨券中間的一份。”^②學者推測“‘三辨券’的製作方式是先加工成厚度足夠剖分為三片的木料，剖分而保留底端，完成正背面的記錄和施加刻齒後再徹底剖開，將中間一片的一面削平，謄寫簡文即成。”^③關於“中辨券”，秦漢律令中均有相關的條文，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中有“月壹輸鈔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張家山漢簡《金布律》亦有“官爲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爲鈔，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參辨券之，輒入錢鈔中，上中辨其廷”。^④兩條律文雖皆關乎錢而與倉的糧食管理無涉，但是均有上中辨券縣廷的規定，由此推測，簡 34 提及的“出中辨券”亦是上呈縣廷。

關於券的存放，《商君書·定分》云：“即以左券予吏之間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⑤即以木柙存放。然而，《里耶秦簡（壹）》所見用以存放券的容器仍是筭，其中有不少與倉曹及券有關的筭牌：

35. 卅七年，廷倉曹當計出券□一 8-500

36. 卅年四月盡九月，倉曹當計禾稼出入券。已計及縣相付受廷。 第甲
8-776

37. 倉曹廿九年當計出入券甲筭 8-1201

簡 36，《校釋》指出：“‘相付計’三字較小，插寫‘已計及縣’和‘廷’之間。或當讀爲‘已計及縣廷相付受’。”^⑥結合前述所見筭牌可以發現，“廷”爲筭牌中常見末字，或用以表明該

① [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張春龍：《里耶秦簡中の刻齒簡と〈數〉中の未解讀簡》，36 頁；中譯《里耶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の未解讀簡》，61 頁。

②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31 頁。

③ [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張春龍：《里耶秦簡中の刻齒簡と〈數〉中の未解讀簡》，21 頁；中譯《里耶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の未解讀簡》，56 頁。張春龍、胡平生、[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里耶秦簡中的校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385 頁。

④ 陳偉：《關於秦與漢初“入錢鈔中”律的幾個問題》，《考古》2012 年第 8 期，69-79 頁。

⑤ 蔣禮鴻：《商君書雜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141 頁。

⑥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25 頁。

筭所在爲縣廷,^①因此當以“已計及縣相付受”爲是。所謂“縣相付受”,當是縣與縣之間的糧食付受,8-1618 簡即有“□□沅陵輸遷陵粟二千石書”,9-1481 簡亦有刑徒參與“載粟沅陵”“載粟門淺”的記錄。^②而“禾稼出入券”當即前述稟食記錄的券和倉與其他部門之間糧食付受的券。

以上筭牌表明,券亦是按年度、分部門存放在筭中。^③此外,以上筭牌皆有“當計”二字,8-434 簡有“三月壹上發黔首有治爲不當計者守府上薄(簿)式”,其中“不當計”與“當計”正好相對,陳偉先生將 8-434 簡的“不當計”理解爲“不在正常上計範圍之內”,^④如此則“當計”意即“在正常上計範圍之內”,表明筭中之券皆在上計範圍之內。筭牌上“計”“券”同見,亦足以表明“計”與“券”有直接的關聯。沈剛先生即據此認爲“計的具體內容是‘券’,或者他們是以‘券’爲基礎編制而成。”^⑤

倉曹的券既按年度存放,又兼有出入券,而且券上記錄糧食的種類、數量、出付入受、經手人員等信息。因而,年底時對筭中所存放的出入券進行統計,其結果便是倉一年之內各類糧食出付入受的具體統計結果。根據前述,“計”文書是“年度統計文書”,則統計結果便是倉的“禾稼計”了。

(三) 金錢計的形成途徑

金錢計在金布計錄之下,《里耶秦簡(壹)》中頗多與金錢及金布皆相關的券:

38. 錢三百五十。卅五年八月丁巳朔癸亥,少內沈出以購吏養城父士五(伍)得。得告戍卒贖耐罪惡。

令史華監。 瘳手。

8-811+8-1572

39. 錢二千一百五十二。卅五年六月戊午朔丙子,少內沈受市工用段(假)少內唐。

瘳手。

8-888+8-936+8-2202

40. 錢百六十。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戊寅,少內沈出以稟□□

8-1214

以上諸券,根據其內容格式亦可分爲對私券和對公券兩種,而且其書寫格式亦與倉的對私券、對公券的格式、術語皆相同。

此外,以上與金錢相關的券皆由少內經手。《校釋》認爲少內是“朝廷、縣府掌管錢財的官署”,而金布是“管理金錢、布帛等財物的機構。”^⑥朱紅林先生亦認爲:“少內是一縣主管金

①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138 頁。

② 9-1481 簡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作徒簿”》,《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121 頁。

③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前言”10 頁。

④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 年 1 月 24 日。

⑤ 沈剛:《〈里耶秦簡〉[壹]中的“課”與“計”——兼談戰國秦漢時期考績制度的流變》,65 頁。

⑥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36、23 頁。

錢財政的機構,主管金錢的收入與支出”。^①王彥輝先生則認為“就遷陵縣而言,少內是縣廷主管錢物的機構,金布則是少內的一個主司出納、核算的具體辦事單位,類似現代的財會科室。”^②然而,根據前述與錢相關的券皆與少內有關,以及金布計錄之下包含少內器計、金錢計等事實推斷,應以《校釋》及朱紅林先生之說為是,而且應是少內隸屬於金布,而非金布隸屬於少內。

聯繫簡 22 第三欄第六行有“小男”,而之後均省寫為“男”的情況,還可推知倉曹計錄之下“畜官牛計”之後的“馬計”“羊計”,是“畜官馬計”“畜官羊計”的省寫;金布計錄之下“少內器計”之後的“金錢計”,是“少內金錢計”的省寫;即“金錢計”的全稱應是“少內金錢計”。

《里耶秦簡(壹)》中亦有少內和各部門之間關於金錢及券的往來文書:

41.卅年九月庚申,少內守增出錢六千七百廿,環(還)令佐朝、義、佐盍貲各一甲,史犴二甲。

九月丙辰朔庚申,少內守增敢言之:上出券一。敢言之。/欣手。九月庚申日中時,佐欣行。 8-890+8-1583

根據前述對倉上呈出券的文書的分析,此次接收文書的部門應是縣廷,即少內涉及金錢的券亦保存在縣廷。根據前揭出錢券的內容與格式,可以推測文書中提及的“出券”當有“錢六千七百廿。卅年九月庚申,少內守增出以環令佐朝、義、佐盍貲各一甲,史犴二甲”等信息,即文書第一行的內容便是券所記錄的信息。

此外,還有涉及“少內金錢計”的文書:

42.廿八年十二月癸未,遷陵守丞臚之以此追如少內書。/犯手。□

甲申水下七刻,高里士五(伍)□行。□

七月辛亥,少內守公敢言之:計不得敢(?)臚有令,今遷陵已定,以付郵少內金錢計,計廿□

□年。謁告郵司佐:□雖有物故,後計上校以應(應)遷陵,毋令校繆,繆任不在遷陵,丞印一□□ (正)

弗用,不來報,敢言之。/氣手。/□水下八刻,佐氣以來。/敝□□

七月壬子,遷陵守丞臚之敢告郵丞以寫□,敢告之。/尚手。/□水□

□佐氣行旁□

□□水下□刻□□以來。/犯手。□(背)

8-75+8-166+8-485

① 朱紅林:《讀里耶秦簡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 11 輯,136 頁。

② 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古代文明》2012 年第 4 期,52 頁。

43. 付郵少內金錢計錢萬六千七百九十七。□。

8-1023

以上兩簡均涉及“金錢計”，且皆稱之為“少內金錢計”，此是“金錢計”實為“少內金錢計”省稱的有力佐證。朱紅林先生認為，此兩簡所見“金錢計”是“同級縣政府之間有關金錢往來的文書”，進而認為“計簿不僅僅是用於上計考課的簿冊，同級或上下級機構之間有關人員、物資調撥及核算的文書簿籍亦可稱為‘計’”，並以簡5為證。^① 陳偉先生認為這兩簡“應該就是‘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②然而，首先，簡42並非“金錢計”文書，從結構上看，其與前述“計”文書格式不符；從內容上看，首行有“追如少內書”的詞句，表明其為《里耶秦簡(壹)》的文書中習見的追書。其次，根據前述考查，部門之間無論是同級還是上下級之間物資調撥所用的文書皆是券，且附有移券文書，並非用“計”文書。再次，前述已指出簡5實為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田官的車計，“付鴈門泰守府”祇是說明“車計”中所載物資的去向，而非將“車計”交付鴈門泰守府。同理，簡43的“付郵少內金錢計”亦祇是說明後文“錢萬六千七百九十七”的去向，並非指“少內金錢計”是付與郵縣的文書。此外，簡43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簡文“付郵少內”符合“計”文書說明部分“付+部門”的格式，“錢萬六千七百九十七”亦符合“計”文書正文“統計項目+數量”的格式；其二，從圖版上仍可見簡文之後還有豎綫符號“|”，^③同樣的豎綫符號亦見於簡5、簡7、簡8等“計”文書殘簡，此乃“計”文書的書寫特征之一。因此，從書寫格式和書寫內容判斷，簡43應是“少內金錢計”的殘簡。

與少內、金錢相關的筭牌有：

44. 元年少內金錢日治筭 9-26

游逸飛、陳弘音兩位先生指出：“此簡為楬，頭作半圓形，楬首塗黑，原應置於少內儲藏金錢之筭。”然而，此筭牌以“元年”為限，若是僅用於儲藏金錢似乎并不需要限定年份，有年份限定表明其以年度為單位存放金錢，這樣做的目的可能還是為了方便年度統計。雖然此筭牌與“少內金錢計”並無直接關聯，但是從少內金錢出付入受券與倉糧食出付入受券的書寫格式相近以及少內以年度為單位存放金錢推斷，“少內金錢計”與“禾稼計”的形成途徑應當相同。

(四) 小結

《里耶秦簡(壹)》中，還有幾種與“計”文書內容相關的券：

45. 錢十七。卅四年八月癸巳朔丙申，倉□、佐却出買白翰羽九□長□□□□之□十

① 朱紅林：《讀里耶秦簡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137頁。

②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行政與算術》，簡帛網，2014年1月24日。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圖版138頁。

七分，□□陽里小女子胡傷。

□。 令佐敬監□□□□。 配手。 8-1549

此券與出稟記錄的書寫格式相近，術語用“出”，因此亦屬“對私券”。倉曹計錄之下有“錢計”，此券與倉及錢相關，應是編制“錢計”的“原始檔案”。

46. 牝豚一。 卅三年二月壬寅朔庚戌，少內守履付倉是。 8-561

此券涉及少內與倉兩個部門，術語用“付”，其格式亦符合前述“對公券”的格式。牝豚，即母豬，為六畜之一。倉曹計錄之下有“畜計”，此券與倉和豚皆有關，應是編制“畜計”的“原始檔案”。

此外，8-893 簡還提及“少內器券”，可與“少內器計”相對應。

綜上所述，“券”記錄的內容與“計”文書統計的內容相關，其術語“出”“付”“入”“受”亦與“計”文書的術語“付”“受”相同；“券”分部門按年度保存，最終以年度為單位進行統計，其結果便是各部門錢糧的年度出付、入受記錄，即各部門與錢糧相關的“計”文書。從名稱上判斷，諸曹計錄所見的“計”文書多與錢糧器物相關，都應是在相關的券的基礎上編制而成，因此，從“券”到“計”應是多數“計”文書共同的形成途徑。

此外，券的側面刻有“與簡面所記數量相對應”的刻齒，能够有效防止竄改和舞弊行為。^①因此，若要對由券編制而成的“計”文書進行校驗，祇需對照出付券和入受券的記錄及刻齒即可。簡 10 庫兵計正文部分記述統計結果之後有“同券齒”三字，簡 11 末尾亦殘見“齒”字。“計”文書正文部分結尾的“同券齒”三字，一方面反映出“券”與“計”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或許亦是為了強調“計”文書的統計結果與年度所有記錄出付入受情況的券的刻齒總量相同，以此表明“計”文書統計結果的準確性。

四 “計”文書的校驗：律令與實踐

“計”文書的原始檔案——簿與券，在製作時皆有便於校驗的形式和內容設計。從“簿”到“計”的各個環節都有嚴格校驗。在“計”文書形成之後，乃至“計”文書呈交上一級部門之後，仍須校驗。秦漢律令對此皆有明確規定。

《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中有如下條文：

計校相繆(繆)毆(也)，自二百廿錢以下，誅官嗇夫；過二百廿錢以到二千二百錢，

^① [日] 初山明著，胡平生譯：《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簡帛研究譯叢》第 2 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62 頁。

貲一盾；過二千二百錢以上，貲一甲。人戶、馬牛一，貲一盾；自二以上，貲一甲。

計脫實及出實多於律程，及不當出而出之，直(值)其賈(價)，不盈廿二錢，除；廿二錢以到六百六十錢，貲官嗇夫一盾；過六百六十錢以上，貲官嗇夫一甲，而復責其出毆(也)。人戶、馬牛一以上爲大誤。誤自重毆(也)，減罪一等。^①

汪桂海先生認爲，這兩條律文“都是有關核校下級官府上交來的籍簿，對其中的錯誤如何處理的具體規定”。^②

“計校相繆(謬)毆(也)”一句，整理小組翻譯爲“會計經過核對發現差誤”；孫曉春、陳維禮兩位先生認爲：“計，賬目……計、校相繆，即賬目與錢物不符。”^③其實此句與《金布律》“計毋相繆”一句意思相對，此處“計”當解爲“計簿”。“計脫實及出實多於律程”一句，整理小組翻譯爲“會計賬目不足或多過實有數超出了法律規定的限度”。“計”亦可解爲“計簿”。

律文詳細規定了在“計”的校驗過程中若有出入時將如何進行處罰，以及針對具體出入數額的具體處罰辦法，具有極強的操作性。其中“人戶、馬牛”正可對應戶曹計錄之下的“鄉戶計”和倉曹計錄之下的“馬計”“畜官牛計”；與“錢”直接相關的“計”則有司空曹計錄之下的“貲責計”“贖計”、倉曹計錄之下的“錢計”、金布計錄之下的“金錢計”；其他諸如“禾稼計”“器計”等涉及的穀物、器物亦可通過“直(值)其賈(價)”轉換成錢數，從而與律文對應。^④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中亦有涉及“計”文書校驗的律文：

諸獄辟書五百里以上，及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皆以郵行。^⑤

所謂“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彭浩先生認爲大致包括“郡縣官員管理財物的審校報告”與“上計文書”。^⑥于振波先生認爲是與“郡縣之間在財物調撥交接過程中，要對相關財物的明細賬目進行核對與檢驗”有關的文書。^⑦蔡萬進先生認爲“是指官府間有關財物交接各類文書的統稱”。^⑧連劭名先生則認爲：“指郡縣官交接領受財物而須統計、核對的賬目。”^⑨就語法而言，“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是定語後置句，“郡縣官相付受財物”實指各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76 頁。

② 汪桂海：《漢代的校計與計偕簿籍》，《簡帛研究二〇〇八》，202 頁。

③ 以上諸例分別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29、42、37、39、76 頁。孫曉春、陳維禮：《〈睡虎地秦墓竹簡〉譯注商兌》，《史學集刊》1985 年第 2 期，72 頁。

④ 可參看 8-63 簡的事例。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7 頁。

⑥ 彭浩：《讀張家山漢簡〈行書律〉》，《文物》2002 年第 9 期，54-55 頁。

⑦ 于振波：《里耶秦簡中的“除郵人”簡》，《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3 期，11 頁。

⑧ 蔡萬進：《〈奏讞書〉與漢代奏讞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4 頁。

⑨ 連劭名：《〈二年律令〉所見漢初的行書制度》，《文物春秋》2010 年第 3 期，4 頁。

郡縣之間相互付受的財物，“當校計者”即“計”文書所記各郡縣相互付受財物中須要核校的部分，全句的意思是：須要核校計文書所記各郡縣相互付受的財物的相關文書。因此，結合前述對“計”文書格式、術語的考察，此律校驗的對象是“郡縣”，是中央政府對郡縣上呈“計”文書的校驗規定。此類文書須“以郵行”，是因為計文書的重要性和核校計文書的時效性。由此可見，郡的“計”文書上呈中央之後，中央要對其進行校驗，亦當是通過對照各郡縣的付受記錄來實現。

黃今言和汪桂海先生通過對西北漢簡所見“校計”的研究，發現漢代西北邊塞對計的“拘校”是分層級進行的，既有基層單位的“自校”，又有上級部門對下級財物的“拘校”；而且均認為漢代的校計制度、拘校政策乃是繼承秦代而來。^①

在《里耶秦簡(壹)》中，亦可見到有關部門在“計”文書形成，乃至呈交之後對其校驗的實例：

47.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貳春鄉茲敢言之：受酉陽盈夷鄉戶隸計大女子一人，今上其校一牒，謁以從事。敢言之。(正)

如意手。(背) 8-1565

此文書由貳春鄉八月上呈縣廷，具體日期不詳；內容是貳春鄉接受來自酉陽縣盈夷鄉的戶隸計，接受遷徙而來的大女子一人，因而上呈校牒。文書於八月上呈，當與從秦到東漢一直實行的“八月算民”而“計斷九月”的制度有關。^② 此前學者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推測“外地縣道上計郡府的時間當早於八月”。^③ 在《里耶秦簡(壹)》中還有貳春鄉八月上呈當年各種年度報告的文書，8-487+8-2004 簡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癸卯，戶曹令史韃上呈“廿八年以盡卅三年見戶數”；8-1527 簡卅四年八月癸巳朔丙申，貳春鄉守平上報“貳春鄉樹枝枸卅四年不實”；8-731 簡殘見“八月”“春鄉戶計”等內容。據此推測，八月時貳春鄉與人口相關的隸戶計亦應當上呈縣廷。因而，簡 47 的文書或是在貳春鄉當年的鄉戶計上呈之後追加上呈，以校驗此前上呈的鄉戶計，仍屬貳春鄉的“自校”。根據前述“付”“受”記錄的相互對應關係，參照簡 5 的內容與格式，可以推測酉陽盈夷鄉在上呈鄉戶計時亦必有“付遷陵貳春鄉戶隸計：大女子一人”的記錄。若是貳春鄉不上校牒，則“計校相謬”的責任便在貳春鄉。由此亦不難理解前揭簡 42 遷陵少內謁告鄴縣司佐“後計上校以應(應)遷陵，毋令校繆，繆任不在遷陵”。

① 黃今言：《居延漢簡所見西北邊塞的財物“拘校”》，《史學月刊》2006 年第 10 期，18-24 頁；汪桂海：《漢代的校計與計偕簿籍》，《簡帛研究二〇〇八》，202 頁。

② 邢義田：《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225 頁；張榮強：《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89-192 頁；[加]葉山：《解讀里耶秦簡》，《簡帛》第 8 輯，99 頁。

③ 張榮強：《漢唐籍帳制度研究》，197 頁。

此外,還有以下一簡:

48. □□年後九月辛酉朔丁亥,少內武敢言之:上計□

□□而後論者獄校廿一牒,謁告遷陵將計丞□

上校。敢言之。□(正)

□九月丁亥水十一刻刻下三,佐欣行廷。欣手。□(背) 8-164+8-1475

此簡殘缺頗多,從簡文格式和發文記錄可知,此為秦始皇二十九年後九月丁亥少內武上呈縣廷的文書。從內容上判斷,是上呈“後論者獄校廿一牒”的呈報文書。根據文書中“後九月”“上計”“將計丞”等信息,可以推測,“而後論者獄校廿一牒”亦是對此前已上呈的“計”文書的校驗,亦屬“自校”。因為從“而後論者”字面意思判斷乃是部門上計之後纔定讞的案件。

此外,秦代以十月為歲首,閏月置於年終,稱為“後九月”。^① 此簡從另一個側面還反映出,在置閏而有“後九月”的情況下,“計斷九月”便順延為“計斷後九月”。

五 “何縣官計付/受署年名”解

早先公布的一組裏耶秦簡 9-1 簡至 9-12 簡,其中有九枚包含“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為報”的文句,另有 9-1 簡和 9-10 簡作“問何縣官計年為報”,9-3 簡作“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為報”。諸位學者對此句的斷讀和理解各不相同。^②《里耶秦簡(壹)》中亦有類似的簡文:

49. 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煩故為公田吏,徙屬。事荅不備,分負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錢三百一十四。煩冗佐署遷陵。今上責校券二,謁告遷陵令官計者定,以錢三百一十四受旬陽左公田錢計,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為報。敢言之。

三月辛亥,旬陽丞滂敢告遷陵丞主:寫移,移券,可為報。敢告主。/兼手。

廿七年十月庚子,遷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從事言。/應手。即走申行司空。

(正)

十月辛卯旦,胸忍案秦士五(伍)狀以來。/慶半。 兵手。(背)

8-63

50.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丙戌,尉廣敢言之:□□

自言:謁徙遷陵陽里,謁告襄城□□

何計受?署計年名為報。署□ (正)

8-1141+8-1477

三月丙戌旦,守府交以來。/履發。□ (背)

8-1477^③

① 相關研究可參李忠林《試論秦漢初曆法的置閏規則》,《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5-11頁。

② 相關釋文及圖版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諸家學者意見詳見朱紅林《里耶秦簡債務文書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46-48頁。

③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八則)》,簡帛網,2013年5月17日。

簡 49 有“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爲報”,簡 50 有“何計受署計年名爲報”,兩句格式相同,祇是一爲“受”,一爲“付”,恰好相對。可見,上舉簡文中“問……爲報”應是文書中的固定句式,其中關鍵的內容當爲“何縣官計付/受署計年名”,所見各句在此基礎上略有不同。

在厘清“計”的含義、格式、術語、形成途徑以及校驗之後,下面試以“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例,對此進行解說。

“何縣官計”,9-1 簡至 9-12 簡所見同此,簡 49 與簡 50 作“何計”。根據“計”文書的標題格式“年度+縣名+部門+具體名稱(某計)”,可知在縣級及縣級以下各部門的“計”文書中“縣名”一項不可或缺。9-1 簡至 9-12 簡是陽陵縣司空發往洞庭郡的文書,其中均言“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即不知在哪個縣,故而要求洞庭郡告知是“何縣官計”。簡 49 則是旬陽縣與遷陵縣之間的往來文書,已經明確“煩冗佐署遷陵”,因而在文書中無需要求告知縣名。簡 50 亦有“自言:謁徙遷陵陽里,謁告襄城”,即已知雙方縣名分別爲遷陵和襄城,故而亦不要求告知縣名。

“付署”,與之相對的是“受署”。“計”文書中相應的格式爲“受或付+部門”,因此“付署”與“受署”之“署”當指官署,亦即本文所謂“部門”。“計”文書中必然寫明“付”或者“受”,以及“付”或“受”的具體部門,以說明物資、錢物的去向或來源。前已述及這是爲了便於核驗。在 9-1 簡至 9-12 簡中陽陵要求洞庭郡協助追索欠款,然後授予陽陵司空,簡 49 中則是旬陽要求遷陵裁定,將三百一十四錢授予“旬陽左公田錢計”。以簡 49 爲例,旬陽發出文書之時,並不知曉錢款將由遷陵縣的哪一個部門撥付,但根據“計”文書的格式要求,旬陽在收到錢款之後,年末編制“計”文書時一定要寫明錢款“受”自遷陵縣的哪一個部門,故而要求遷陵將“付”錢的部門告知。簡 50 從殘文判斷應與人口遷徙有關,簡文“徙遷陵陽里”,似已知“付”遷陵,不過“自言”似乎暗示這祇是遷徙者的說法,並無正式的部門文書,故而正式發文,要求遷陵告知。

“計年名”,“年”即年度,“名”即名稱。^① 根據“計”文書的標題格式“年度+縣名+部門+具體名稱(某計)”,年度和具體名稱兩項亦不可或缺。先說年度,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曰:“官相輸者,以書告其出計之年,受者以入計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輸,計其輸所遠近,不能逮其輸所之計,□□□□□□移計其後年,計毋相繆。工獻輸官者,皆深以其年計之。”^②此律明確規定:官府間財物往來,“付”者要告知“出計之年”,而“受者以入計之”。以此確保出付部門記錄的年度與入受部門記錄的年度一致。前已述及“計”文書形成之後還有核驗的環節,“付”“受”的一致性必定是一項重要的核驗內容,因此出付部門所記的年度與入受部門所記的年度一定要吻合,否則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誤差。正因如此,無論是 9-1 簡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83 頁,在 8-1141 簡之下已有注釋“年,年份。名,名目”,與此相近。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 35 頁。

至9-12簡的陽陵,還是簡49的旬陽、簡50的襄城,皆要在文書中問清“計年”。此外,《里耶秦簡(壹)》所見文書中亦常見“計某年”的文句,8-60+8-656+8-665+8-748簡遷陵縣要求熨道協助追索罰款,就有追書明確告知“計廿八年”,前揭簡42遷陵少內付與鄴少內金錢,亦明確告知“計廿七(或“八”)年”。^①

其次說“名”,“名”即“計”文書的具體名稱用來記錄財物所屬種類。一般而言,具體名稱與統計項目、內容直接相關,不過也并非一一對應,以金錢為例,與之相關的“計”文書即有“司空曹計錄”之下的“貲責計”“贖計”,“倉曹計錄”之下的“錢計”,“金布計錄”之下的“金錢計”。9-1簡至9-12簡雖然涉及“貲錢”“貲餘錢”“贖錢”,但在“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之前均已言“司空不名計”,因而祇有9-3簡提及“名”。簡49則已經明確爲“錢計”,因此祇有“問何計付署計年爲報”,便不再涉及“名”。“名”的重要性與“年”類似,因爲出付的部門在編制“計”文書時,必須寫明財物以何名目支出,入受的部門必須有相應的名目記錄,否則在校驗時將會出現差錯。

至此,可以明確“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報”一句當斷讀爲“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報”,其與“計”文書的格式息息相關,包含“計”文書的標題、說明部分的主要內容,其背景則與“計”的形成途徑以及核驗關聯密切。

明乎此,則可發現前揭簡42中“少內公敢言之:計不得敢臆隕有令,今遷陵已定,以付鄴少內金錢計,計廿七(八)年”一句,便是與“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報”相應的具體實例。其中“遷陵”即是“縣官”,“少內公敢言之”表明“付署”爲遷陵少內,“付鄴少內金錢計”表明“受署”與“名”,“計廿七(八)年”即“計年”。

六 “計”文書與秦代文書行政

里耶秦簡牘是“秦代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公文檔案”,^②因此,上述“計”文書祇是縣以下各部門的“計”文書,其形成途徑亦祇是從縣以下各個部門到縣一級的形成途徑。不過由此亦可窺見秦帝國基層行政的具體運行機制:在上計制度的統轄之下,縣以下各個部門的日常行政細節,包括各部門刑徒的每日勞作任務分配、稟食發放、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錢糧器物往來等等,以作徒簿、券等具有相互對應性的簿籍文書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來,最終一一呈送縣廷。縣廷則以笥分門別類保存各部門呈送的文書,并且根據簿籍之間的相互對應記錄對簿籍進行核驗。年末,各部門彙編日常行政記錄,形成部門的各類“計”文書,然後向縣廷上計。縣廷在各部門“計”文書的基礎上整理形成縣級“計”文書。縣廷亦根據年內的日常行政記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6頁注8。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4頁。

錄以及記錄之間的相互對應性核驗各部門的“計”文書，以此實現對縣之下各部門的掌控。

高恒先生指出：“縣令長於年終將該縣戶口、墾田、錢穀、刑獄狀況等，編制為計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國。根據屬縣的計簿，郡守國相再編制郡的計簿，上報朝廷。”^①永田英正先生亦曰：“郡在各縣簿籍的基礎上作成郡的計簿，提交給中央。”^②因此，從縣以下各部門到縣級“計”文書的形成途徑與從縣級到郡級“計”文書的形成途徑應有相似性。就此而言，從遷陵縣的文書行政便可窺見整個秦帝國文書行政的基本樣貌。

透過從“作徒簿”到“徒計”的形成途徑，可以窺見秦代文書行政制度的運作細節，并且由此增進對秦代文書行政的認識。

里耶秦簡牘所見，凡是使用刑徒勞作的部門，包括刑徒的管理部門在內，每日均製作“日作徒簿”，而且呈報縣廷，縣廷以筭按月分部門存放；縣廷會在當月月底對各部門所呈報的作徒簿進行清點查驗，若有缺漏，便會下文追繳。每月晦日，各部門要將當月每日的“日作徒簿”及由每日“日作徒簿”彙編而成的“月作徒簿”（或曰“月作徒簿取”）上呈縣廷，縣廷以筭按年度分別保存各部門的“月作徒簿取”，再根據各部門之間相互對應的記錄，對月作徒簿進行核校。年末，各部門在月作徒簿或日作徒簿的基礎之上再編制部門的“徒計”，呈送倉和司空。“徒計”上呈縣廷，乃至縣廷上呈郡之後，仍可能有對“計”文書的核驗。從作徒簿到徒計的形成過程中，始終存在着嚴格的審核程序，審核主要是通過對照各部門之間相互對應的記錄而實現，對審核結果的處置有明確的律令依據。

永田英正先生曾經通過居延漢簡的簿籍制度，還原了西漢邊郡軍政系統文書行政的諸多細節。^③祇需簡單對比秦漢兩代文書行政“實施的細部”，便可以發現二者從文書的製作與處理方式到文書的核驗程序與方法，皆有諸多驚人的相同或相近之處。這足以表明，秦代的文書行政已經十分成熟，漢代文書行政“實施的細部”幾乎完全是對秦代文書行政的繼承，絕非如永田英正先生之前所認為的“最多祇是繼承了秦代一些制度的大框框而已”。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張俊民先生、何有祖先生的指教；投稿之後，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沈剛先生、辛德勇先生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在資料方面，得到伊強先生的鼎力相助。謹向諸位先生致謝！唯文中疏失，概由本人負責。

① 高恒：《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評尹灣漢墓木牘〈集簿〉》，《東南文化》1999年第1期，77頁；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129頁。

② [日]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上冊，320頁。

③ [日]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上冊，255-322頁。

里耶秦簡中的“田官”與“公田”*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李 勉 晉 文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中記載了“左公田”和“田官”兩個官署。田官並不屬於都官系統，二者都屬於管理公田的縣級官署。戰國至秦代，“公”的含義逐漸由公家變為官府。秦始皇“書同文字”後，“縣官”取代“公室”成為官府的代稱，田官取代公田成為縣級公田的管理機構，縣級公田也可能改稱“官田”。田官作徒由司空刑徒、倉隸臣妾和戍卒組成。根據已刊布的里耶秦簡，田官考課的內容包括墾田、取薪等項目。

關鍵詞 里耶秦簡 公田 田官 作徒

裘錫圭先生曾發表《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官有農田的經營》^①一文，對秦漢公田的研究堪稱經典，但囿於資料，與秦代相關的論述尚有不足。里耶秦簡的發現和整理，為進一步探討秦代的官田提供了珍貴的檔案資料。本文不揣譾陋，擬以“公田”和“田官”為題，對田官的性質、“公田”與“田官”的關係以及秦代縣級官田的經營管理等進行考察。謬誤之處，懇請方家指正。

*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秦漢簡牘史料中的土地制度研究”(13AZS004)，江蘇省 2014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經濟研究”(KYZZ_0208)。

① 裘錫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官有農田的經營》，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1997 年，429-478 頁)，後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210-253 頁。

一 “田官”與“公田”的設置與性質

里耶秦簡保存了大量關於“田官”與“公田”的記載，學界給予了高度關注，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 田官

關於“田官”的設置問題，里耶秦簡有如下相關記載：

貳春鄉佐壬，今田官佐。(8-580)

卅年二月己丑朔壬寅，田官守敬敢言【之】□……(8-672)

□田官□□(8-1608)^①

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廷曰令居貲目取船，弗予，謾曰亡。亡不定言。論及謾問，不亡，定謾者訾，遣詣廷。問之，船亡，審。漚泉。乃甲寅夜水多，漚，流包船，船□(繫)絕，亡。求未得，此以未定。史逐將作者汜中。具志已前上，遣佐壬操副詣廷。敢言之。(9-981)^②

根據以上記載，並參考陳偉和王彥輝等先生的研究，秦代田官的設置與其他縣級官署類似，皆由嗇夫、佐、史等組成^③。其中，田官嗇夫的代理者稱“田官守”。

關於“田官”的性質，張春龍和龍京沙先生認為田官是“鄉嗇夫的佐吏”^④。卜憲群先生認為屬於基層田官系統，即縣設田嗇夫，鄉設田官，里設田典^⑤。《王文》最早發現遷陵縣田部系統與田官系統并存，認為田官應是經營公田的機構，並將田官和畜官都列入都官系統。《陳文》則根據田官使用作徒的記錄，肯定了田官是經營公田的機構的觀點，但對田官屬於都官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

田官經營公田的觀點是可取的。尤其最近整理出版的《湖南出土簡牘選編》，披露了里耶7、9、10、11等層的簡牘資料。其中“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記載了遷陵縣共使用“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10-1170)。而且“女五百一十人付田官”及“女卅四人助田官獲”^⑥，所使用作徒的數量也多於其他部門，更加證明了裘錫圭等先生的觀點。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82、199、368頁。

② 轉引自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

③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以下凡征引前文，皆簡稱《陳文》；征引後文，皆簡稱《王文》。

④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⑤ 卜憲群：《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南都學壇》2006年第1期。

⑥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黃樸華：《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117頁；里耶秦簡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年9月1日。

關於田官是否屬於都官系統的問題,我們贊同田官並不屬於都官系統的看法。以下僅就官曹關係和畜官方面再作一些旁證。

仲山茂、青木俊介和土口史記等日本學者提出,縣一級行政機構是由“廷”和“官”兩大系統組成^①。土口史記先生把“某曹”等組織稱為“縣廷內列曹”,主列曹者是令史,縣廷對“官”有絕對優勢地位^②。嚴耕望先生利用《五行大義》卷五“論諸官”條引《洪範五行傳》對漢代縣屬吏曾進行了開拓性研究^③,凌文超、孫聞博先生又繼續發掘了這條史料^④。他們都注意到其中十天干皆為“曹”,十二地支多為“官”,這與日本學者的研究可以相互印證。

里耶簡8-481“倉曹記錄”中有“田官計”一項。《王文》認為“倉曹記錄”是縣倉的統計,因而提出“既然太倉無法考課遠離京師的都官,改由各縣的縣倉考課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根據秦代縣官署中曹、官分立的格局,此處的倉曹却並非是指縣倉,而是縣廷的倉曹。“計錄”也並非是對諸官的考課,而是對“現有國家資財的靜態總結與統計”;對諸官的考課叫做“課”,“課”是“對國有資財增減情況的動態記錄和監督”^⑤。里耶秦簡中有田課、田官課、畜官課、司空課、倉課、尉課、鄉課等考課記錄,可見“田官計”並不能說明田官由縣倉考課。而田官課的記載,則恰恰說明了田官的考課由縣廷負責,因而田官與田、司空、尉、鄉、倉、畜官等無異,也都是縣屬官員。

畜官與田官相似,在里耶秦簡中常并提。例如,在“倉曹計錄”(8-481)中,“畜官牛計、馬計、羊計”就和“田官計”并列——“□傳畜官。貳春鄉傳田官……”(8-1114+8-1150)“畜官、田官作徒簿(簿)”(8-285)^⑥。從里耶簡的相關記載看,畜官也很難被列入都官。諸如:

1. □□朔戊午,遷陵丞遷告畜官僕足,令□□毋書史,畜官課有未上,書到亟日□□守府事已,複視官事如故,而子弗□事,以其故不上,且致劾論子,它承□就手(8-137)

2. □□□人。□□十三人,隸妾壻(繫)春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受倉隸妾七人。凡八十七人。其二人付畜官。(8-145)

3. □□。□寇……□作園。□畜官。□□□令。□□載粟輸……(8-162)

4. 畜官、田官作徒簿(簿)(8-285)

5. 倉曹計錄……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8-481)

① 仲山茂:《秦漢時代の「官」と「曹」——県の部局組織》,《東洋學報》82-4,2001年;青木俊介:《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県の部局組織につい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9,2005;土口史記:《戰國・秦代の県:県廷と「官」の關係をめぐる一考察》,《史林》95-1(特集 都市),2012。

② 土口史記:《里耶秦簡所見的秦代文書行政:以縣廷與“官”的關係為中心》,《“中古中國的政治與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4年5月,1-9頁。

③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5-237頁。

④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簡帛網,2014年9月17日。

⑤ 沈剛:《〈里耶秦簡(壹)〉中的“課”與“計”——兼談戰國秦漢時期考績制度的流變》,《魯東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⑥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64,279,128頁。

6. 畜官課志(8-490)

7. 卅年十二月乙卯, 畜□□□作徒薄(薄)。□受司空居貲一人。□受倉隸妾三人。
 □……十二月乙卯, 畜官守丙敢言之: 上。敢言□十二月乙卯水十一刻刻下一, 佐貳以
 來。□(8-199+8-688)

8. 謂令佐唐段(假)為畜官□(8-919)

9. □傳畜官。貳春鄉傳田官, 別貳春亭、唐亭。□(8-1114+8-1150)^①

其中簡1是遷陵縣丞催促畜官上交“畜官課”的文書, 簡6是“畜官課”的主要內容, 簡5“倉曹記錄”中有畜官牛、馬、羊計。簡2、3、4都是畜官接受作徒的記錄, 作徒由遷陵縣統一派遣。簡8縣令佐可任職畜官。《陳文》根據“貳春鄉佐壬, 今田官佐”認為, “田官吏員可以在遷陵縣諸官署中調動”, 從而指出田官是“隸屬於遷陵縣廷的一個官署”。簡9亦可與之互證。

綜上, 畜官是隸屬於遷陵縣丞的官署。鑒於畜官與田官的相似性, 即可旁證田官屬於縣官署而非都官的觀點。

(二) 公田

關於“公田”的記載主要如下:

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 左公田丁敢言之: 佐州里煩故為公田吏, 徒屬。事荅不備, 分負各十五石少半斗, 直錢三百一十四。煩冗佐署遷陵。今上責校券二, 謁告遷陵令官計者定, 以錢三百一十四受旬陽左公田錢計, 問可(何)計付, 署計年為報。敢言之。

三月辛亥, 旬陽丞滂敢告遷陵丞主: 寫移, 移券, 可為報。敢告主。/兼手。

廿七年十月庚子, 遷陵守丞敬告司空主, 以律令從事言。/應手。即走申行司空。

十月辛卯旦, 胸忍索秦士五(伍)狀以來。/慶半。兵手。(8-63)^②

這是旬陽縣發到遷陵縣的一件收文批轉文書, 實際上包括四份嵌套文書, 其主體是第一份, 即旬陽左公田發給旬陽丞的文書。這份文書的大意為: 煩曾為旬陽縣的公田吏, 現在是遷陵縣的吏員。煩在任職公田期間, 進出荅(小豆)不足數, 需要賠償十五石又三分之一斗, 價值314錢。旬陽左公田丁請求旬陽縣丞詢問遷陵縣, 這筆錢的官計應該由哪個縣的官府記帳。旬陽縣丞收到這份文書後, 將文書批轉給遷陵縣丞, 遷陵縣丞再將文書發給遷陵司空, 要求司空處置此事。

在這份公文中, 出現了“左公田”和“公田吏”的名稱。按照秦人的語詞習慣, “左公田”是一個官署, 它的吏員稱作“公田吏”。左公田應是縣丞的下屬單位, 即旬陽縣廷的一個官署。主要證據是: 第一, 從公文的常用語——“敢言之”來看, 由旬陽左公田發給旬陽丞的文書應該是下級官府發往上級的文書。在雲夢秦簡《封診式·亡自出》條中, 鄉官向上級官府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77、84、98、128、164、168、111、249、279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48-49頁。

報告已使用“敢言之”作為文書末尾的敬詞——“鄉某爰書：男子甲自詣……亡五月十日，毋（無）它坐，莫覆問。以甲獻典乙相診，今令乙將之詣論，敢言之。”^①第二，左公田發往遷陵的文書，必須經過旬陽縣丞的批轉，也符合秦文書行政的基本要求。里耶簡8-122規定，“言事守府及移書它縣須報”，^②即要求縣級官署發文給太守府或者他縣，必須通過本縣縣廷，而不能直接發文。

傳世秦印中亦有“右公田印”，^③還有“郎中左田”“趙郡左田”以及“左田之印”^④等。這裏的左和右顯然指的是公田的方位。地理上常以東為左，西為右。如此說來，這份公文中的“左公田”應該就是旬陽縣治東邊的公田。

二 公田與田官的關係

要究明田官與公田的關係如何，首先就必須弄清戰國時期官與公的關係。

衆所周知，在春秋戰國之際，公、私對立的雙方還指的是公室與私家。史載齊相晏嬰就曾給晉大夫叔向分析齊國政局說：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貴踊。^⑤

叔向亦慨歎：“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⑥但僅僅三百多年後，公室與私家的對立便被官與民的對立所取代。從簡牘來看，秦人稱呼官有財物一般採取“公+某物”的結構，如“公馬牛”“公器”“公甲兵”“公車牛”“公大車”“公金錢”^⑦“公船”^⑧等。

官府所有財物皆以“公”為前綴，也就明確了財產所有權，從而與私有財產區分開來。秦人對財產所有權的認識，源於戰國時期的公、私觀念。有日本學者認為，中國的公、私觀念經歷了“由共同體的公·私整合為政治上的君·國·官對臣·家·民之間的公·私的過程”。^⑨其實到戰國末期，上述公、私對立的雙方已最終變為官和民了，前引秦簡的諸多記載就足以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78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66頁。

③ 周曉陸：《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0，309頁。

④ 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14、230、255頁。

⑤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1234-1236頁。

⑥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236-1237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33、60、71、82、165頁。

⑧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2頁。

⑨ [日]溝口雄三著，鄭靜譯：《中國的公與私·公私》，上海：三聯書店，2011，55頁。

證明。而“官”與“公”也逐漸有了相同內涵。以“公室”為例，秦律的規定即表明它在許多方面已與“官府”同義。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公室告”【何】毆（也）？“非公室告”可（何）毆（也）？賊殺傷、盜他人爲“公室”；子盜父母，父母擅殺、刑、髡子及奴妾，不爲“公室告”。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可（何）謂“非公室告”？·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是謂“非公室告”，勿聽。^①

所謂“公室告”，即控告主體對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殺傷人、偷竊財物罪行所提出的控告；“非公室告”，即控告主體對其家庭內部犯罪行爲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公室告”的案件官府必須受理，“非公室告”的案件官府不予受理。可見其“公室”指的就是官府。

再如睡虎地秦簡《倉律》規定：“隸臣妾其從事公……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②從秦簡來看，倉所管理的隸臣妾應該是官奴婢，所以隸臣妾冗居和工作的“公”指的就是官府無疑。

及至漢初，“縣官”一詞更直接替代了“公室”，成爲官府的代稱^③。如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規定：“或捕告人奴妾盜百一十錢，問主購之且公購？公購之。”^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亦有類似規定——“口主人購縣官，其主不欲取者，入奴婢，縣官購之。”（161）^⑤但却用“縣官”來指代官府。另外張家山漢簡對官有財物的記載也發生明顯變化，例如“縣官積取（聚）”“縣官事”“縣官馬、牛、羊”“縣官車牛”“縣官畜產”“縣官器財物”。^⑥所以張燕先生提出：“張家山漢簡這一組財產的標識便是用‘縣官’作爲前綴，替代了睡虎地秦簡中的‘公器’、‘公司馬’、‘公甲兵’中‘公’之標識。”^⑦但追根溯源，這種語詞的轉變實際在秦代就已開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⑧所謂“王室曰縣官，公室曰縣官”（8-461）^⑨，用“縣官”來取代“王室”和“公室”，就是這種改革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且官有財物的稱呼也發生變化，如龍崗秦簡“牧縣官馬、牛、羊盜□之弗□□□”，^⑩嶽麓秦簡“敬給縣官事”“擅段縣官器”^⑪等。因此，由“公”到“縣官”的變化早在秦朝統一之際便已出現，漢初不過承襲了秦的制度而已（參見表一）。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95-196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9 頁。

③ 按：“縣官”在漢代亦代指皇帝和朝廷，參見劉德增、李珣《“縣官”與秦漢皇帝財政》，《文史哲》2006 年第 5 期。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211 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0 頁。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8、15、43、64、68 頁。

⑦ 張燕：《睡虎地秦簡中的“公”與“官”——以官方財產所有權標識爲核心》，《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

⑧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63，239 頁。

⑨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56 頁。

⑩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106 頁。

⑪ 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27、28 頁。

表一：秦至漢初“公—縣官”用詞變遷一覽表

簡牘 分類	睡虎地秦簡	嶽麓秦簡	里耶秦簡	龍崗秦簡	張家山漢簡
官有財物	公馬牛、公服牛、公車牛、公大車、公器、公甲兵、公金錢	縣官器	公船	縣官馬牛羊	縣官馬牛羊、縣官畜產、縣官車牛、縣官器財物、縣官積聚(聚)、縣官脯肉、縣官米、縣官田宅
官府勞作	從事公、公事	縣官事			工事縣官、內作縣官、縣官事
官府居住	居公				居縣官
官府收入	入公、入粟公			入縣官	出金錢縣官、入錢縣官
官府支出	公食、粟禾稼公、衣食公、公購		縣官食		縣官食、縣官購

由此可見，從睡虎地秦簡到張家山漢簡，不論是“公+某物”還是“某某+公”中的“公”都由“縣官”替代，而嶽麓、里耶、龍崗等秦簡所出現的縣官一詞，就體現了這種演變的趨勢。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早期中國的一個重大變局。戰國時期很多制度早已發生變化，秦代逐漸將其法律化、規範化、統一化。例如官制、中央和地方行政建制等。由“公”到“縣官”的語詞演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大變局的一種體現，這種演變是分封制結束、郡縣制開始的社會變革帶來的必然結果，體現了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府取代了戰國的封君，成為國家運作、管理的主要力量。

里耶簡 8-63 的寫作日期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而已知“田官”的最早記錄却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廿九年盡歲田官徒薄(簿)廷。”(8-16)^①因之可以推測，秦朝統一中國後，更替名號，官府統稱為“縣官”，公田的管理機構亦由“公田”改稱為“田官”。但簡 8-63 的寫作恰恰處於秦始皇更替名號之前，於是纔保留了“公田”的稱謂。甚至縣屬公田也可能更名為“官田”。如“□□官田一□”(8-165)^②的記載，就是責問遷陵縣某官墾田的文書，並出現了“官田”一詞。里耶簡 8-672 還有“官田自食簿”^③的記載，從簡文來看，這份簿籍由田官管理，因而“官田”也很可能是縣屬公田。至於朝廷和中央官署所領公田，為了與縣屬公田相區分，則繼續沿用了“公田”之名。如《漢書·元帝紀》載：“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④這雖然是漢代資料，但漢承秦制，秦代的情況當相差不大。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1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00 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99 頁。

④ 《漢書》卷九《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4，279 頁。

三 田官作徒與考課

鑒於秦簡資料的缺乏,尤其里耶秦簡尚未完全整理刊布,以下僅就田官作徒、墾田和考課三個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 田官作徒

從已經公布的里耶秦簡看,秦代田官應主要使用徒隸勞作。簡 8-1566 便記載了按日勞作應給口糧的徒隸人數:

卅年六月丁亥朔甲辰,田官守敬敢言之:疏書日食牘北(背)上。敢言之。
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舂廿二人。小舂三人。隸妾居貲三人。
戊申,水下五刻,佐壬以來。/尚半。逐手。(1566)^①

據此可知,在秦始皇三十年六月甲辰共有徒隸 56 人由田官提供口糧,這幾乎是在田官勞作的所有徒隸。其中成年男性為 18 人,成年女性為 25 人,未成年男性 10 人,未成年女性 3 人。六月通常都是莊稼收割的時候,急需大量人手,但勞作的田官徒隸實際却祇有 56 人,還包括了 13 個未成年人。

另據里耶秦簡《月作簿》,亦可以列表如下(表二):

表二:田官作徒統計表

簡號			8-145	8-162	8-444	8-663	8-1566	10-1170
作徒								
成年	男	城旦、鬼薪					18	
	女	舂					22	
		隸妾居貲					3	
		隸妾						510+44(17+2)
		未知	24					
未成年	男	小城旦	6	8			10	
	女	小舂	3				3	
		小隸妾		6	6			
未知						26+1		

值得注意的是,簡 10-1170 的數字遠大於他簡。該簡所記隸妾的人數,出自前引“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且簿中無論大隸臣、小隸臣,還是大隸妾,抑或總數,實際都是用的積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62 頁。

數。更重要的是,簿中分計的大、小隸臣和大隸妾的人數合計,與“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的總計相同,祇有大隸妾的人數被算錯了 50 人^①。因之可以斷言,這裏的 510 人加 44 人實際也都是積數,亦即 510 人次加 44 人次。類似記載在里耶簡中還有很多。最為明顯的,就是對貳春鄉作徒的統計:

卅年八月貳春鄉作徒簿(簿)。

城旦、鬼薪積九十人。

仗城旦積卅人。

春、白粲積六十人。

隸妾積百一十二人。

· 凡積二百九十二人。□(8-1143+8-1631)^②

研究認為,貳春鄉此月的城旦、鬼薪、仗城旦、春、白粲實際人數分別是 3 人、1 人和 2 人,而八月 30 天的累積人數恰好分別是 90、30 和 60^③。其中,隸妾為 112 人次,實際人數亦祇有 4 人。但通過 112 人次的累積,卻可以說明,在隸妾 30 天的勞作中,共計 28 天有 112 人次出工,有 2 天 8 人次未能出工(這裏是說合計 2 天,實際隸妾 4 人都同時得病的可能性很小,故 30 天中她們應該每天都有人出工),並充分顯示了積數考核的必要和嚴密。因此,簡 10-1170 中的 510 人次,按十二月是 30 天計算,其實際人數亦僅僅 17 人而已。所增加的 44 人也同樣如此,按 44 人次計算,實際就是 2 人,共計增加出工 22 天。儘管表二的統計資料還並不完整,但從中亦可發現:遷陵田官作徒的數量不大,加之徒隸耕作的積極性較低,女性和未成年人的體力較小,因而能够墾種的土地面積相當有限,產量也應該不大。裘錫圭先生曾明確指出:“在秦代,國家掌握着大量土地,直接為官府所經營的公田,數量也一定極為可觀。”^④但僅就遷陵的公田而言,與裘先生的論斷似不相符。

總的來說,田官管轄公田的勞動力大致可分為三類,即司空刑徒、倉隸臣妾及戍卒。根據表二,“城旦、鬼薪”、“春”、“小城旦”、“小春”以及“隸妾居貲”都屬於司空管理的刑徒,而隸妾則屬於縣倉管理的官奴婢。此外就是戍卒。里耶簡中田官負責的糧倉支出記錄見下表(表三):

① 按:根據簡 10-1170 分計大隸妾的人數,全部相加的總數是 2926 人,比“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多了 50 人。但仔細辨認圖版照片,其中“女三百一十人居貲司空”的釋文,實際却應當是“女二百一十人居貲司空”,總數比“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又少了 50 人。而不管是多了 50 人,還是少了 50 人,也都是由於其計算錯誤,並不影響大隸妾的分計人數相加等於大隸妾的總計人數的結論。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83 頁。

③ 王偉、孫兆華:《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編戶數量》,《四川文物》2014 年第 2 期。

④ 裘錫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官有農田的經營》,《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211 頁。

表三：田官負責糧倉支出記錄表

倉	時間	負責人			支出數量	支出類型	支出對象	視平者 記錄者	簡號
		田官守	佐	稟人					
徑	卅一年正月甲寅	敬	壬	顯	粟米一石九斗 少半斗	出稟	資資士五	令史扁 壬 手	8-764
	卅一年六月壬午	敬	□	姪	無	出貨	罰戍簪裹	令史逐 □ 手	8-781+ 8-1102
	缺	敬	壬	姪	無	出稟	居資士五	令史逐 缺	8-1328
	卅一年七月辛亥	敬	壬	蓉	粟米一石八斗 泰半	出稟	屯戍簪裹 屯戍士五	令史逐 壬 手	8-1574+ 8-1787
		敦長簪裹悍							
卅一年七月辛亥	敬	壬	姪	粟米四石	出稟	罰戍公卒	令史逐 壬 手	8-2246	

表三中的罰戍、屯戍屬於戍卒，資資、居資則屬於司空管理的刑徒。從秦簡來看，勞作者和冗作者由相關的管理機構提供口糧，如隸臣妾由倉管理，所以由倉直接發放口糧的祇有隸臣妾，而司空管理着其他刑徒，所以其他刑徒的口糧就需要司空發放^①。除了倉和司空，其他官署也要負責在本官署勞作人員的口糧。例如，啓陵鄉的大隸妾京、窰等 13 人，在三十一年正月的最後三天勞作中，她們每天的口糧——“日三升泰半半升”便都由啓陵鄉提供。

粟米一石六斗二升半升。卅一年正月甲寅朔壬午，啓陵鄉守尚、佐取、粟人小出粟大隸妾□、京、窰、莖、并、□人、□樂官、韓歐毋正月食，積卅九日，日三升泰半半升。令史氣視平。□(8-925+8-2195)^②

因此，表三中的罰戍、屯戍等戍卒也應該是在田官勞作的勞動力。

(二) 田官墾田

秦代極為重視農耕，地方官員被要求勸勉墾田，並作為地方政府考核的一項主要內容。如里耶簡 9-39 記載：“律曰：已獵(墾)田，輒上其數及戶數，戶嬰之。”^③里耶簡 8-1519 就是一個突出事例：

①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史學月刊》2015 年第 2 期。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49 頁。按：由於積日為 39 日，能被 39 整除的數字祇有 3 和 13，因而此簡記錄在啓陵鄉勞作的大隸妾實際就是 13 人，共勞作 3 天。

③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按：漢初亦繼承了這一做法，如張家山漢簡 243 簡《田律》規定：“縣道已獵(墾)田，上其數二千石官，以戶數嬰之，毋出五月望。”(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2 頁)

遷陵卅五年狼(墾)田與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四頃□□戶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畝一石五;戶嬰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①

另外簡 8-1763 亦載:“□當狼(墾)田十六畝。□已狼(墾)田十九畝。”^②具體到田官的墾田,里耶簡中亦有田官將“狼田課”上報到縣廷的記錄:

正:元年八月庚午朔庚寅,田官守顧敢言之:“上狼(墾)田課一牒,敢言之。”

背:八月庚寅日入,顧以來/援發 顧手(9-1869)^③

此次上報的時間是八月份,可能是秦以十月為歲首,要進行全年的考課,所以必須在十月之前把各官署的考課記錄匯總。

遷陵縣的墾田分官墾和民墾兩種。除了簡 8-1519,民墾的記錄亦見於簡 9-14 和簡 9-2350。如“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書: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謁狼(墾)草田六畝武門外,能恒藉以為田……”(9-2350)^④

官墾則一般使用徒隸墾田,例如: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禮謂遷陵丞:丞言徒隸不田,奏曰:司空厭等當坐,皆有它罪,耐為司寇。有書,書壬手。令曰:吏僕、養、走、工、組織、守府門、肖力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簿)移治虜御史,御史以均予。今遷陵廿五年為縣,廿九年田廿六年盡廿八年當田,司空厭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傳於奏。及蒼梧為郡九歲乃往歲田。厭失,當坐論,即如前書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歇手。·以沅陽印行事。(8-755-759)^⑤

該簡便記載了由於督責徒隸墾田不力,遷陵縣司空厭等被洞庭郡守責備、處罰的情況。

田官“墾田課”的內容應該與司空的墾田考核不同。聯繫簡 8-755 到 8-759 可知,由於職能有別,司空墾田考核的重心在於是否“令(徒隸)田”,而田官“墾田課”的重心則應該是墾田的畝數和品質。

(三) 田官考課的其他項目

除了上文提到的“墾田課”,田官考課的內容還有其他項目。其中最基本的考課,就是對作徒及其勞作的日常管理。前揭《日食牘》、《日作簿》或《月作簿》的記錄、匯總和上報,便全面反映了田官對作徒的各項管理。如簡 8-1566“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春廿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5-346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88 頁。

③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 年 12 月 22 日。

④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17 頁。

人。小春三人。隸妾居貲三人”等。又簡 8-479 記載：“田官課志。田□□課。·凡一課。”^①林獻忠先生根據圖版字形推測“課”前□字為“薪”^②。如果此字釋作“薪”字，則極有可能與“取薪”相關。在里耶簡中，就有“□取薪廿五石。□”(8-1117)^③和“木薪一石五斗。卅五年九□”(8-2193)^④的記錄。因此，“田官”的職責似乎還包括伐薪取柴，甚至作為縣廷考核的項目之一。

此外，前引簡 8-672 有“官田自食薄”的記載：

卅年二月己丑朔壬寅，田官守敬敢言【之】□官田自食薄（簿），謁言泰守府□□之。

□^⑤

根據字面含義，這似乎指的是官田糧食支出的匯總和統計，也應該是田官考課的內容。

前引公田吏“事荅不備，分負各十五石少半斗”，可見對公田農作物的管理和收穫也同樣是田官考課的內容。

總之，田官屬於縣級諸官，是管理公田或官田的機構。通過對秦代田官問題的梳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田官的性質、演變和職責的細節，也豐富了關於縣級公田的開墾、經營和管理的認識。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17 頁。

② 林獻忠：《讀里耶秦簡札記六則》，簡帛網，2015 年 4 月 20 日。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79 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43 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99 頁。

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鄒水杰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近年出土的秦代簡牘資料顯示,秦代縣下有曹和官之分,諸曹設於縣廷之內,諸官置於縣廷之外。里耶簡牘文書表明,縣廷設有相當多的令史,各令史值事縣廷各曹或監管某一專門事務。在行政文書中稱為“(廷)某曹”或“(廷)主某”的用語,實際上是指“某曹令史”或“主某令史”。將秦簡與西漢初期的張家山漢簡、西漢後期的尹灣漢簡和益陽兔子山漢簡對照後可知,縣廷由主某令史和令史值某曹并存發展到諸曹掾史的格局,可能遲至東漢纔成型。

關鍵詞 令史 諸曹 某曹令史 主某令史

有關秦代縣下機構設置與吏員配備的情況,由於史料闕如,歷代史家均以《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秦官”^①為基礎,結合秦漢時代相關文獻作出較簡單的推定。^②至1974年湖北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碑刻文獻與東漢官制研究”(13BZS019)階段性成果。

① 如:“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② 相關主要研究成果有俞正燮《癸巳類稿·少吏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強汝詢《漢州郡縣吏制考》,《中國學報》第3卷第6、8、9期,1912;黃綬《兩漢行政史手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瞿兌之、蘇晉仁《兩漢縣政考》,上海:中國聯合出版公司,1944;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後，開始有學者對其進行重點關注。^①而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則出於日本學者仲山茂之手。仲山茂重點分析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徭律》：“縣毋敢擅壞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壞更殿（也），必灑（讞）之。欲以城旦舂益爲公舍、官府及補繕之，爲之，勿灑（讞）。”^②他認爲“官府”與“廷”分別有着各自的“公舍”。又據《秦律十八種·內史雜》：“毋敢以火入臧（藏）府、書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嗇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閉門戶。令令史循其廷府。”^③他認爲在縣裏，官嗇夫與吏對“官”、令史對“廷府”分別進行巡視。仲山氏據此判斷，秦代的縣有官嗇夫署事的“官”及令史署事的“（縣）廷”這兩種官衙。^④這是秦代縣下官制結構研究的突破。其後，青木俊介利用里耶秦簡的文書傳送情況指出，“官”與“廷”之間還有着一定的空間距離，直屬於縣廷的是名爲金布、主户的組織。青木氏進一步推測：金布和主户是令史擔任的。^⑤

前賢已經指出，秦代縣廷的令史，對於秦代縣行政運作和文書處理，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栗勁先生考察、譯注睡虎地秦簡律文時指出：“在參與司法活動方面，令史也受縣丞的指揮。這樣的令史就不單是縣令的屬吏，而是縣機關的屬吏。”^⑥劉向明先生有專門文章討論了秦簡中的令史。他通過睡虎地秦簡出土秦律的翔實史料，證明秦朝縣令史不僅是縣令的屬吏，也是丞、尉的屬吏，其職掌涉及行政、司法、經濟、監督和軍事等縣級“長吏”所管轄的事務。進而強調，在普遍設縣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視。^⑦在另一篇文章中，劉先生指出，縣令史應是縣廷諸多事務的實際主管，其所承擔的文書檔案管理職能，在保障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縣級政權的正常運轉和維護地方秩序上，均發揮着不容忽視的作用。^⑧孫聞博先生通過隋人蕭吉《五行大義》卷五“論諸官”條引《洪範五行傳》的一則佚文，認爲列入天干的十官皆稱“曹”，列入地支的十二官基本多稱“官”，突出了廷曹與諸官之分。對於廷曹的任職者，他指出：“令史可以被考慮從事列曹工作，顯示列曹相對諸官地位稍高……當時職務固定的曹吏仍在發展之中。”^⑨孫先生論文重點在揭示秦縣官、曹的分別設置，但也在思考令

① 主要研究分散在一些論著中，如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高恒《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濟南：齊魯書社，1985；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1；等。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77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109頁。

④ [日]仲山茂：《秦漢時代の「官」と「曹」一縣の部局組織一》，《東洋學報》（東京）82-4，2001，35-59頁。

⑤ [日]青木俊介：《裏耶秦簡に見える縣の部局組織について》，中國出土資料學會編集：《中國出土資料研究》9，2005，103-111頁。

⑥ 栗勁：《睡虎地秦墓竹簡譯注斟補》，《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4年第5期。

⑦ 參見劉向明《從出土秦律看縣“令史”一職》，《齊魯學刊》2004年第3期。

⑧ 參見劉向明《從睡虎地秦簡看縣令史與文書檔案管理》，《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3期。

⑨ 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秦簡”，2014年9月17日。

史與列曹之間的關係。郭洪伯先生同樣從解讀《洪範五行傳》入手,引入行政學中職能機關與輔助機關的分類方法,結合文獻中的“稗官”一詞,指出秦漢簡牘中稱“官”的基層機構其實就是縣道的“稗官”,是執行各項對外事務的職能部門,其主管者為嗇夫;而與之相應的令史、尉史等組成基層機構的輔助部門,負責溝通中樞與職能部門、監督和審查職能部門,并在縣廷分曹辦公。^① 郭先生對秦代縣下之官和縣廷諸曹的組成與運作做了相當深入的分析。最近,土口史記通過里耶秦簡中“廷主某”與“廷某曹”的封檢記錄,來考察縣廷內列曹的設置,并以此分析秦縣廷與各“官”的關係。^② 學界利用新出秦簡對秦代縣下官制結構已經作出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本文則集中關注縣廷令史,詳細分析秦簡中出現的“(廷)某曹”或“(廷)主某”等文書用語,試圖進一步考證分析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的關係,并進而思考漢代郡縣府廷諸曹格局的形成,以求教於方家。

近年來關注秦代縣下官制結構和縣廷令史設置,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必然是里耶秦簡中可以綴合的“遷陵吏志”木牘:

1. 遷陵吏志:吏員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使,[今見]十八人。(第一欄)

官嗇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使,今見五人。校長六人,其四人缺,(第二欄)

今見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使,今見廿四人。牢監一人。(第三欄)

長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見一人。凡見吏五十一人。(第四欄)(7-67+9-631)^③

木牘明確記載,遷陵縣 103 名官吏編制中有 28 名令史,在各類吏員編制中,僅次於官佐的 53 人,幾乎是我們原先認為最重要的官嗇夫人數的 3 倍! 這與西漢末年東海郡各縣邑侯國 2-6

① 郭洪伯:《稗官與諸曹——秦漢基層機構的部門設置》,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01-127 頁。郭先生將基層機構的官長——嗇夫或有秩歸為稗官,并視稗官為與諸曹相對的專有名詞,筆者仍有不同意見。

② [日]土口史記:《里耶秦簡にみる秦代縣下の官制構造》,《東洋學研究》第 73 卷第 4 號,2015,1-38 頁。

③ 鄭曙斌等編:《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圖版和釋文分列 18、104 頁,經電話諮詢張春龍先生核對原始圖片,可以綴合。釋文根據圖版有所校正。原第四欄首行釋為“倉吏三人”,根據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何有祖執筆)《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秦簡”,2014 年 9 月 1 日,改釋為“長吏三人”。另里耶簡 8-887、8-1118、8-1231、8-1593、8-1704 和 8-1137 也應是另一份“遷陵吏志”或其原稿的殘存,最後的統計為:“■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見五十人。”(8-1137)

名斗食令史的吏員構成，^①有很大的不同；與嚴耕望先生考證出來縣廷屬吏設置分綱紀、門下、列曹的結構，^②更是相去霄壤。這就會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思考：縣廷設置這麼多的令史，在縣行政運作中有什麼樣的地位與作用，是如何進行運作的呢？

從里耶簡中可能稱為“令史更行廟詔”的值班安排文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多名遷陵縣廷令史的名字：

2. 廿六年六月壬子，遷陵□丞敦狐為令史更行廟詔：令史行□失期。行廟者必謹視中□各自署廟所質日。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屬。（正）

十一月己未，令史慶行廟。十一月己巳，令史愷行廟。十二月戊辰，令史陽行廟。十二月己丑，史夫行廟。（第一欄）

□□□□，令史韋行。端月丁未，令史愷行廟。□□□□，令史慶行廟。□月癸酉，令史犯行廟。（第二欄）

二月壬午，令史行行廟。二月壬辰，令史莫邪行廟。二月壬寅，令史鉅行廟。四月丙申，史戎夫行廟。（第三欄）

五月丙午，史鉅行廟。五月丙辰，令史上行廟。五月乙丑，令史□□□。六月癸巳，令史除行廟。（第四欄）（背）（8-138+8-522+8-174+8-523）^③

這是遷陵守丞敦狐安排的令史行廟值班表，說明令史由縣丞統一管理。牘的背面羅列了從十一月己未至六月癸巳（缺三月的安排）共 16 次輪流行廟的安排，共涉及至少 12 名令史。^④值得注意的是，牘文中規定的行廟順序是“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屬”，意即從緊挨着道路邊上的“曹”開始，每“曹”又按坐次先後輪值。我們因此可以作一大膽推測：秦代遷陵縣中的衆多令史，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按“曹”分工的，縣廷中設有多個“曹”。雖然這些令史並沒有明確冠以“某曹”之名，實際上却是按“曹”區分和安排辦公地點的，同時每一“曹”令史也可能有多名，在各“曹”內部還有固定的座次安排，否則就毋須在某曹後還說“以坐次相屬”了。

① 參見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木牘二正反《東海郡吏員簿》，北京：中華書局，1997，13 頁（圖版）和 79-84 頁（釋文）。如千石秩的首縣海西縣吏員總共 107 人，有“令史四人，獄史三人”；排在最後的都陽侯國吏員 33 人，有“令史二人”。具體吏員數量的研究可參看謝桂華《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上）》，載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33-36 頁。

② 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簡牘的校釋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下引里耶秦簡不出注者同。

④ 嶽麓書院歐陽先生引用了尚未正式刊布的嶽麓秦簡《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庚》殘簡冊，其中簡 J47 載：“更，五日壹行廟，令史句壹行，令若丞□□□□□□。”參見其著《嶽麓秦簡所見比初探》，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秦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湖南大學嶽麓書院，2014 年 12 月，77 頁。但根據文義判斷，本簡可能并非此“共令”簡冊之一，而更可能屬於“行廟”性質的簡，其內容可與里耶簡“更行廟詔”文書對照。

縣廷令史的這種座次安排,應該體現了某種排位和待遇的差異。這從下面兩份文書中可以略窺一二:

3.廿八年六月己巳朔甲午,倉武敢言之:令史敞、彼死共走興。今彼死次不當得走,令史畸當得未有走。今令畸襲彼死處,與敞共走。倉已定籍。敢言之。(正)

六月乙未,水下六刻,佐尚以來。/朝半。 尚手。(背)(8-1490+8-1518)

4.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辛巳,遷陵丞昌謂倉嗇夫:令史言以辛巳視事,以律令假養,襲令史朝走啓。定其符。它如律令。(正)

後九月辛巳旦,守府快行。言手。(背)(8-1560)

文書3涉及敞、彼死和畸三位令史,現在是敞和彼死共用走興爲其服務,但根據令史內部的排序,彼死不當配備爲其服務的走,而畸應該有服務的走却没有配備。^① 倉嗇夫武的辦法是:讓畸坐到彼死辦公的地方,與敞共用走興,而且還在簿籍上作了明確記錄。文書4中的令史言辛巳日開始視事,就從當天開始有養、走爲其服務,這是律令的規定,由縣丞正式給倉嗇夫下指令配備。這兩份文書的言外之意就是,令史坐在哪個位置辦公,是根據所掌職事安排的,存在某種排序的規定,體現的是職事與待遇的不同。因此,文書2中的“以坐次相屬”也便有了更爲重要的意義。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縣廷中設有多個“曹”,那麼,在官僚科層制發展初期的秦代,都設了些什么“曹”?各“曹”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主要是些什麼樣的官吏在任職呢?

二

要想弄清楚上述問題,得首先找出簡牘中稱爲“某曹”的事例,分析其情況。從里耶簡牘記錄來看,除了明確書有“(署)某曹發”“廷某曹(發)”“某曹書幾封”“某曹計錄”或“某曹事”等含有“曹”字的幾種情況,在與之對應的文書格式中,那些不書“曹”字的情況,如“署(主)某發”“(廷)主某(發)”等格式,體現的是同樣的意義。如文書封檢中多次出現的“主倉(發)”“廷主倉(發)”與“廷倉曹(發)”,其含義應是一致的,均指將文書送往縣廷中處理倉官事務的吏員處,或表示由處理倉官事務的吏員拆封文書。^② 從文書內容和末尾的簽名可知,這些收發文書的縣廷吏員大多爲令史,少數情況下爲令佐。^③

^① 根據里耶簡文書傳遞的記錄,常有“走某以來”之語,說明走爲文書傳遞者,因此這種排序(“次”)可能主要與職事相關。這似乎也符合居其位則有其事的原則。

^② 有關“某某發”“某某半”的含義,參看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6月4日。

^③ 如簡8-1317爲:“令佐邵發。”

除了封檢,文書正文中的類似用語,其意亦是一致的,如下述文書:

5. 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段(假)守齮下□;聽書從事。臨沅下索(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別書臨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鐵官,皆以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追。臨沅、門淺、零陽、【上衍】□言書到,署兵曹發。/如手。道一書。·以洞庭候印□^①(正)

酉陽報充,署令發。

急報零陽,金布發。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刻下十,都郵人□以來。/□發。(上列)

遷陵報酉陽,署主令【發。】

恒署。丁四。(下列)(背)(9-712)^②

這是一份由洞庭假守齮所下的文書,現在看到的是文書收發後的副本。文書明確要求到達臨沅、門淺、零陽、上衍等縣後,要由兵曹令史拆封。遷陵縣收到文書後,雖然由於殘損,看不到是誰拆封的文書,但根據文書格式和書寫用語,很有可能是由令史或令佐拆封的。^③收到文書後,遷陵縣報給酉陽縣,封面寫上“署主令發”,而報給零陽的則寫上“金布發”,酉陽報給充的寫上“署令發”。雖然不知道為何傳遞給不同的縣要由掌管不同事務的令史拆封文書,但十分清楚的是,這幾種表述的意思是相同的,即均表示由主管某種事務的令史拆封文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署(主)某發”“(廷)主某(發)”的用語與“(署)某曹發”“廷某曹(發)”的格式,其指向的部門和人員是一致的。

茲將里耶秦簡中出現相關用語的簡及內容列舉如下:^④

倉曹:8-481(倉曹計錄),8-496(司空、倉曹期),8-776(倉曹當計禾稼出入券),8-1201(倉曹當計出入券),8-1463(移倉曹),8-1777+8-1868(已事倉曹筭)

廷倉曹:8-3(廷倉曹發),8-500(廷倉曹當計出券),8-1288(廷倉曹),9-1130(廷倉、司空曹已[事筭])

主倉:8-579,8-922,8-830^⑤(主倉發。全為封檢)

① 此處或可補“行事”二字。“以洞庭候印行事”這類語句在秦簡文書中常見。

② 里耶秦簡第9層部分簡牘見鄭曙斌等編《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文字校釋見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何有祖執筆):《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秦簡”,2014年9月1日。背面的地名與書寫順序體現了文書傳遞的順序,相關文書還有簡8-159。遷陵縣的文書應是七月己未從酉陽傳過來的,故遷陵縣收到文書後報給酉陽。相關研究可參看於洪濤《試析里耶秦簡“御史問直絡程書”的傳遞過程》,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編《長江文明》第十三輯,2013,32-41頁。

③ 從里耶秦簡文書中大量出現於文書末尾表示拆封的“某發”“某半”來看,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令史與令佐。這與令史負責文書事務也是吻合的。

④ 簡8-365為“□傳舍發”的封檢類簡,但由於前面已斷,暫時無從明確判斷,故不列入。

⑤ 釋文原作“主食”,根據圖版,改釋為“主倉”。

廷主倉:8-1228,8-1294,8-1366,8-1498,8-1628(廷主倉發。全爲封檢)

車曹:8-405(車曹佐),8-562(車曹)

戶曹:8-488(戶曹計錄),8-769,8-1318(廷以郵行戶曹),8-1533(戶曹書四封),8-2004(戶曹令史)

廷戶曹:8-263(廷戶曹發),8-1072,8-1489(廷戶曹。全爲封檢)

廷戶:8-1,8-283,8-878,8-952,8-1292,8-1451,8-1834(廷戶發。全爲封檢)

主戶:8-746,8-1925,8-2041(主戶發)

戶:8-2029(署戶發)

廷主戶:8-155,8-156,8-266,8-1142,8-1249,8-1395,8-1607,8-1650,8-1752,8-1955,8-2547(廷主戶/廷主戶發。全爲封檢)

吏曹:8-2017(吏曹發),8-2149(吏曹發),9-982,9-1131(吏曹已事簡)

廷吏曹:8-98,8-241,8-554,8-699,8-829,8-1126,8-1700,8-2507(廷吏曹/廷吏曹發。全爲封檢)

主吏:8-197(報署主吏發),8-272(私進遷陵主吏毛季自發)^①

廷主吏:8-52,8-347,8-526,8-709,8-1305,8-1606,8-1651,8-1696,8-1701,8-1750,8-1758,8-1869,8-1881(廷主吏/廷主吏發。全爲封檢)

令:8-159,9-712(署令發^②)

主令:8-601,9-712(署主令發)

廷令曹:8-778,8-1859(廷令曹發)

司空曹:8-269(可直司空曹),8-375(司空曹書),8-480(司空曹計錄),8-1428(司空曹徒簿),8-1860,9-1130(司空曹已事簡)

主司空:8-695(主司空發)

尉曹:8-71(行尉曹),8-253(尉曹[已]事[簡]),8-453(尉曹書三封),8-1225(尉曹書二封),8-1616(尉曹書一封),7-5(尉曹發),16-3(尉曹書二封)

廷尉曹:9-2318^③(廷尉曹卅一年期會以事簡)

獄東曹:5-6([獄]東曹發),8-22,8-273,8-959,8-996,8-1155(獄東曹書一封)

獄東:8-2272(獄東發)

廷獄東:8-1741(廷獄東發)

獄南曹:8-728(獄南曹書二封),8-1760(獄南曹),8-1874(獄南曹斷獄[事集簡]),8-

① 這是一封私信的封緘,但也表示傳遞給誰,由誰拆封。故列於此。

② 根據上下文和文書格式,此處的“令”與“令曹”同義,而非指“遷陵令”。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文211頁,圖彩版二四。

1886(獄南曹書三封)

中曹:8-61+8-293+8-2012(署中曹發)

兵曹:9-712(署兵曹發)

金布:6-18(遷陵金布發),8-304(遷陵金布發),8-64+8-2010(署金布發),8-155(署金布發),8-156(署金布發),9-1,9-2,9-3,9-4,9-5,9-6,9-7,9-8,9-9,9-10,9-11,9-12(均為署金布發),8-454(課上金布副),8-493(金布計錄),9-712(金布發),9-1594(金布書一封)

廷金布:8-332,8-506,8-545,8-799,8-935,8-969,8-1166,8-1183,8-1274,8-1297,8-1313(廷金布/廷金布發。為封檢),8-1776(廷金布治笥)

廷主簿:8-1110(廷主簿)

主簿:8-303(遷陵主簿發)

廷主計:8-1773(廷主計)

主爵:8-1952(報署主爵發)

主錢:8-966(報署主錢發)

主責:9-1,9-2,9-3,9-4,9-5,9-6,9-7,9-8,9-9,9-10,9-11,9-12(報署主責發)

主髻:8-1548(貳春鄉主髻發)

另外,漢初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十一年八月夷道沓”讞案有“署獄史曹發”,“十一年八月江陵丞驚”讞案有“署史廡發”,“十年七月江陵餘”讞案有“署獄史廡發”,^①是與里耶簡上述表述同義的格式,可以統并考慮。

從上述文書的情況來看,那些“某曹發”“廷某曹(發)”“廷某(發)”“署(主)某發”“(廷)主某(發)”格式的封檢,無疑是縣內各“官”(職能機構)發給縣廷的文書,專署由主管某“曹”事務或某類事務的令史拆封的文書封面或標籤;那些“(廷)某曹書幾封”的文書,一般表示某“官”文書,由某曹令史審核後,需要經由縣丞或縣令簽署後發往縣外者;而有“某人行某曹”“移某曹”格式的文書,則是“官”與“曹”之間文書傳遞的指示或記錄。那些標題為“某曹已事笥”“某曹計錄”“某曹徒簿(簿)”者,均表示各“曹”所處理相關文書的匯總。所有這些,都不是在文書正文出現的,是與文書收文或發文機構相關的記錄,或是同類文書的標籤。那些出現於文書內文中的“(報)署主某發”或“署某(曹)發”的文字,往往是上級機關下發文書或同級機關轉發文書中,指示要由主管某事務或值某曹令史拆封文書之意,與封檢的作用是一致的。也正因為各“曹”令史通過收發、審查各官的文書來進行監察、管理,因此,

^① 分別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91、92、95頁。很明顯,這裏江陵的“史廡”與“獄史廡”是同一人。

令史對文書本身的問題是要負責任的。如睡簡《效律》有：“官嗇夫貲二甲，令、丞貲一甲；官嗇夫貲一甲，令、丞貲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貲、誅如官嗇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計者，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如令、丞。”^①這裏的“吏主者”應該就是對應各“官嗇夫”的各“曹”令史或“(廷)主某”令史，有問題時的處罰與官嗇夫相同，而那些祇是佐助計簿的令史和冗吏，所受的處罰則更輕微些。這也是縣廷令史要分“曹”視事、明確責任、進行科層化管理的原因之一吧。^②

因此，簡文涉及的遷陵縣廷設有倉曹、車曹、戶曹、主吏、主令、司空曹、尉曹、獄東曹、獄南曹、中曹、兵曹、金布、主簿、主計、主爵、主錢、主責(債)等或稱為“曹”的機構，或“主”某事的部門，是因事所設的，均設有一名以上的令史。無怪乎遷陵縣廷有這麼多令史！因此在分析縣下諸曹時，不能僅考慮字面上帶有“曹”字的機構或部門。這又與嚴耕望先生所考證的縣下列曹分戶曹、時曹、田曹、水曹、將作吏、倉曹、金曹、市掾、集曹、法曹、嗇夫、司御、^③傳舍、候舍、道橋津史、兵曹、庫嗇夫、塞曹、尉曹、獄司空、賊曹、賊捕掾、辭曹、獄掾史、盟掾等，^④有相應之處，但又要稍顯繁複和零亂。

三

然而，在正式文書中“某曹”與“主某”“廷某”稱謂的不固定，恰好是當時科層化行政體制尚未完備的反映。這與秦縣下小吏設置的複雜是一致的。^⑤我們先來看幾條含有“某曹”的文書材料：

6. 資中令史陽里釗伐閱：十一年九月隕為史。為鄉史九歲一日，為田部史四歲三月十一日，為令史二月。(第一欄)口計。戶計。年卅六。(第二欄)可直司空曹。(第三欄)(《里耶秦簡(壹)》，8-269)

7.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癸卯，戶曹令史推疏書：廿八年以盡卅三年見戶數牘北、移獄具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23-124頁。

② 日本學者高橋庸一郎在解釋睡虎地秦簡“一曹事”時指出：“曹最初是審判之語，以後指主管審判、治獄之事的官府或與此有關的官吏，進而又表示所有的官署……在發布《語書》的秦代，曹作為表達衙署、屬吏的用語，一般化到了何種程度尚不清楚，但它還是保留了曹的最初含義……所謂‘一曹事’，或可解作有關詞訟、罪法、治獄的處理。”見高橋庸一郎《睡虎地秦簡〈語書〉釋文注解》(下IV)，《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學編)第29卷第2號，1993，5-6頁。轉引自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基礎史料研讀會《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集釋(一)：〈語書〉(下)》，載徐世虹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7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68-69頁。

③ 嚴先生這裏還列了“廢令史”，但查居延漢簡，並無廢令史，故暫不列。

④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⑤ 參見李學勤《張家山漢簡研究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3期；鄒水杰：《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集上，如請史書。／推手。(正)廿八年見百九十一戶。廿九年見百六十六戶。卅年見百五十五戶。卅一年見百五十九戶。(第一欄)卅二年見百六十一戶□。卅三年見百六十三戶。(第二欄)(背)(《里耶秦簡(壹)》，8-487+8-2004)

8.司馬令史掾苑計，計有劾，司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計劾然。(《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簡55)

9.蜀守灝(獻)：佐啓、主徒令史冰私使城旦環，爲家作，告啓，啓詐薄(簿)曰治官府，疑罪。廷報：啓爲僞書也。(《張家山漢簡·奏獻書》)

10.鞠：勳，不更，坐爲守令史署金曹，八月丙申爲縣輸元年池加錢萬三千臨湘，勳匿不輸，即盜以自給。勳主守縣官錢，臧二百五十以上，守令史故劾無長吏使者，審。(J3⑤：2)(益陽兔子山漢簡，元始二年)^①

如果根據以往的認識，上述簡牘中的“司空曹”“戶曹”“司馬”和“金曹”，其官長應爲掾或嗇夫，但諸簡中均爲令史所署。如果這些令史之上仍有嗇夫主管，按照秦漢的法律規定，縣下機構向上級報告事務或負行政責任者，應爲機構之官長，則至少會有嗇夫簽署或負責，但簡文中均不見“嗇夫”。同時，里耶簡8-272的信封爲“私進遷陵主吏毛季自發”，而簡8-1529的正面爲“進書令史毛季從者”。這兩枚簡是別人寫給毛季的書信之封檢。簡272稱呼毛季爲“主吏”，簡1529則稱爲“令史”。按照前面的論證，毛季的正式身份應是“令史”，其處理的是有關縣吏的文書事務，亦即可稱爲“主吏令史”。^②

里耶簡的這種情況在傳世典籍中也有迹可尋。《史記》卷五三《蕭相國世家》載：“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索隱》注：“《漢書》云：何爲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何爲功曹掾也。”^③而在卷八《高祖本紀》中記“蕭何爲主吏”，《集解》注引孟康曰：“主吏，功曹也。”根據此二處的注釋，可知道此注“主吏，功曹也”來源於曹魏時人孟康的認識，漢初應該尚未有功曹一職。但從西漢後期的尹灣6號漢簡名刺木牘記錄可知，“主吏”的確發展爲後來的“功曹”。投給師饒的名刺正面文字，木牘一四爲“進卒史師卿”，一五爲“進東海大守功曹師卿”(一七同)，一六爲“奏東海大守功曹”，一八爲“奏主吏師卿”，一九爲“進主吏師卿”，而師饒投謁名刺的自稱在木牘二二爲“東海大守功曹史饒再拜謁”，投謁長安令的名刺反面爲“東海大守功曹史饒謹請吏奉謁再拜”(二三反)。^④綜合這些

① 兔子山考古隊：《二十年風雲激蕩 兩千年沉寂後顯真容——益陽兔子山遺址簡牘再現益陽古代歷史》，《中國文物報》2013年12月3日，第6、7版。

② 另里耶簡8-835爲：“毛季……尺□”8-1694爲：“詣毛季。”兩簡均爲封檢。雖然不知道這幾枚簡的確切時間，但毛季不是嗇夫而是令史，應該是明確的。

③ 《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2431頁。《索隱》注爲：“《漢書》云：何爲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何爲功曹掾也。”

④ 連云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133-137頁，圖版爲25-34頁。

往來名刺上的稱謂可知,東海郡功曹師饒的正式官名為郡“卒史”,即木牘二《東海郡吏員簿》^①太守府“卒史九人”之一,其具體職名則為“功曹史”,其職事為“主吏”。然而,名刺顯示,“功曹史”似乎祇用為自稱,“卒史”“主吏”與“功曹”則用為他稱,這似乎讓我們能理解傳世典籍中更多的是功曹而非功曹史了。了解了這一點後,再回到秦簡的時代,結合“遷陵吏志”,可知蕭何的任官等級為秦沛縣的“令史”,其職事為“主吏”,稱其為“主吏令史”應該是可行的。郡的卒史與縣的令史正好都是性質相同的史類吏員,故秦的監郡御史看到蕭何能辦事,就讓其“給泗水卒史事”,而蕭何在入關後也正好利用了熟悉文書的長處,取得了不少秦的文書圖籍。

如上所述,根據“遷陵吏志”所記,遷陵縣有 28 位令史,10 位官嗇夫,且令史列於官嗇夫前,故可明確地說,主事於上述諸“曹”的官吏均應為縣廷的令史。在縣廷中,“令史”纔是體現官吏等級的正式稱謂,而各“曹”則是給事的崗位。這些處於縣廷中的令史,由於署理不同官文書事務的職責劃分,就有了在不同“曹”值班或主事某專門文書的情況出現,也因此纔會有令史釐的“可直司空曹(意為可於司空曹值事)”,令史推也由於主戶籍事而稱為“戶曹令史”,^②睡簡《效律》中主苑事的則稱“司馬令史”。文書 9《奏讞書》漢初案例中更是明確稱令史冰為“主徒令史”。文書 10 則表明,直到西漢晚期的元始二年,張勳還是作為“守令史署金曹”,也可稱其為“守金曹令史”,其職正為“主守縣官錢”。這些都與秦代的各曹令史有直接的承續關係。^③

雖然上列遷陵縣廷令史所署各部門有可稱為“曹”者,如倉曹、車曹、戶曹、吏曹、令曹、司空曹、尉曹、獄東曹、獄南曹、中曹、兵曹、爵曹^④等,但仍有某些稱為“主某”的部門,不能以曹名之,如主錢、主責(債)、主計、主簿、^⑤主徒、司馬等,似不應稱為錢曹、債曹、計曹、簿曹、徒曹、司馬曹,而祇是臨時主某事務的令史之稱謂;金布亦不名為曹,但根據“金布計錄”“報署金布發”和“課上金布副”的記錄,實應為固定設置的機構或部門。從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

① 此名稱為整理小組所加,或者可以按照“遷陵吏志”的名稱,改為“東海吏志”。

② 里耶簡 8-247 載:“[尉]府爵曹卒史文、守府戍卒士五狗以盛都結。”簡文明確記載都尉府爵曹吏為卒史,正相當於縣廷曹吏為令史一般。

③ 居延簡中也存在“司馬令史”(45.7B, E.P.T51:70, E.P.T51:210A, E.P.T53:212),“別田令史”(90.13, 310.19, E.P.T51:308, E.P.T51:554),“庫令史”(E.P.T51:318),“主官令史”(71.43, E.P.T68:1, E.P.T68:7)。這些令史雖大多存於殘簡上,但頗與上引與官嗇夫對應的令史相同。另簡 110.28 殘存“倉令史”三字,似為“城倉令史”之殘,故不列。分別見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④ 里耶簡 8-1952 僅有“報署主爵發”,但簡 8-247 明確有“[尉]府爵曹卒史文”,表明郡都尉府設有爵曹,則大體可認為縣有爵曹之設。另簡 8-2550 有“覆曹”,但其歸屬尚不明朗,根據秦代覆治之事歸口於郡,本文將其歸為郡府屬曹,不列於遷陵縣列曹。

⑤ 里耶秦簡中的“主簿”與漢世習見的綱紀吏“功曹”“主簿”應不相同,但秦與漢兩個時代“主簿”的聯繫尚未有資料能够解讀,故不做推測。

及漢代文獻的記載來看,均有《金布律》或《金布令》的律令條款,^①但漢代郡縣機構中均無“金布曹”,而處理縣財政事務的職能機構,在秦為少內,主官為少內嗇夫;在漢為金曹與小府,主官為金曹掾史或小府嗇夫。^②則秦簡“金布”的主事吏也祇能為令史。這從下引文書11、12、13、14中可以明顯看出來。

在里耶秦簡“某曹計錄”的文書末尾,還出現了“史某主”的簽署,如:

11.司空曹計錄:船計。器計。(第一欄)贖計……貲責計。□計。(第二欄)凡五計……史尚主。(第三欄)(《里耶秦簡(壹)》,8-480)

12.倉曹計錄:禾稼計。貸計。畜計。(第一欄)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第二欄)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第三欄)(《里耶秦簡(壹)》,8-481)

13.戶曹計錄:鄉戶計。縣計。器計。租賃計。(第一欄)田提封計。泰計。鞠計。·凡七計。□(第二欄)(《里耶秦簡(壹)》,8-488)

14.金布計錄:庫兵計。車計。(第一欄)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第二欄)□錢計 □凡六計。□(第三欄)(《里耶秦簡(壹)》,8-493)

11、12 這兩枚牘分別是司空曹和倉曹文書的匯總統計,最後的史尚主表示這些簿書由令史尚負責。令史尚在里耶簡中還多次出現,如8-7,8-45,8-1177,8-211,8-351,8-2245,8-1336,8-1540,8-1584,8-1046(均寫作“令史尚視平”),8-760(令史尚監),8-1066,8-1815(稟令史尚)等。這些有“令史某視平/監”的文書,都是監督、管理倉或司空、鄉錢糧物資出入的記錄。也就是說,令史尚的主要職責似與倉、司空的錢物出入有關。因此,在這兩件匯總統計文書中,可以將令史尚看作縣廷的“倉曹令史”和“司空曹令史”,也可以看成“主計令史”^③,負責在縣廷董理倉與司空錢糧、器物出入的統計簿籍。這種多名令史同治一曹文書和一名令史負責多個官署事務同時出現的現象,同令史名稱的不固定一樣,都屬於設官分職的科層化程度不高的產物。文書13、14雖然殘斷,但有理由相信,“凡七計”“凡六計”後邊應該也有“(令)史某主”的簽署。

再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空倉中有薦,薦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貲一甲,令史監者一盾。”(簡153)糧倉下面要放保持糧食干燥的薦草,但如果空倉的薦下還有一石以上

①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中有《金布律》十六條。嶽麓秦簡中有《金布律》七則,參見陳松長、周海鋒《〈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概述》,收入長沙“秦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71-75頁。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有《金布律》。傳世文獻中的漢《金布律》與《金布令》可參見程樹德《九朝律考·漢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25頁。

② 孫聞博先生也指出金布為曹,並認為:“金布應即兩漢以來的金曹。”見《秦縣的列曹與諸官》。

③ 李昭毅先生在對土口史記的論文評議中認為此史尚的全稱為“倉曹令史”或“主倉令史”。見“中古中國的政治與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議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4年5月。考慮到“廷主計”(8-1773)封檢的出現,或許縣廷中有總管統計器物簿籍的令史,各曹令史先分曹將器物簿籍匯總,最後歸總到主計令史或主簿令史處,因此稱此令史尚為主計令史或主簿令史也是可以的。

的糧食,不僅行事之吏要負責,監管的令史也要受處罰。這些視平錢糧出入的令史,同樣要對所監管的事務負連帶責任。那麼這些主事的令史,不僅需要簽署文書,更要親臨現場“視平”與監管。雖然他們可能由於職事而離開縣廷,但他們的身份一直都是縣廷的令史。文書8中,因為司馬令史是佐助并審閱苑之計簿的,如果計簿有問題,司馬令史必須負責而受到處罰。可知苑在縣廷有對應的司馬令史負責其文書、計簿。而從簡文最後“如令史坐官計劾然”來看,縣屬各官均有相應的令史負責其計簿,這是當時的普遍情況。

另外,從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可以看出,墓主喜在秦王政三年八月“掄史”,於四年十一月“除安陸口史”,^①六年四月“為安陸令史”,並於七年正月為“鄢令史”,在十二年四月,“喜治獄鄢”,^②即以獄史的身份治獄,但其本官仍為令史。睡簡《封診式》同樣記載有很多令史治獄的情況,如“爭牛”“告臣”“告子”“賊死”“經死”“穴盜”“出子”等。里耶簡8-754+8-1007明確記載秦始皇三十年“遷陵丞昌、獄史堪訊”,而8-76和8-2030均有表示抄寫文書的令史或令佐簽名的“堪手”,以及前引《奏讞書》中江陵縣“史瘡”與“獄史瘡”的同時出現,進一步說明令史治獄時既可稱令史,也可稱獄史的情況。在嶽麓秦簡所載秦王政廿年《陂盜殺安、宜等案》文書中,首云“即令獄史彭沮、衷往診”(簡0511),次云“即令獄史觸與彭沮、衷求其盜”(簡0422),次云“今獄史觸、彭沮、衷得微難獄磔罪”(簡1830),說明整個獄訟過程中,三人的職位沒有發生變化。但最後則記錄為:“觸為令史廿二歲,年卅三;彭沮、衷勞年中令,皆請(清)絜毋害、敦設守事、^③心平端禮,任謁課以補卒史,勸它吏。”(簡1821+1819)^④這說明,雖然觸、彭沮、衷三人從事的是獄史的職事,但其正式的身份還是令史。或者也可以說獄史是令史給事獄訟而來。這也就能解釋為何“遷陵吏志”中列有28名令史,而無尉史、獄史的原因。或者上述“尉曹”“獄東曹”“獄南曹”的值班令史也可能稱為“尉史”^⑤“獄史”,或者徑稱為“史”。^⑥到了西漢後期,從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可以看出,令史、獄史、尉史

① 所缺之字,陳侃理先生根據右邊殘存的“卩”,推測為“卿”,即“鄉”。因此,喜此時除為安陸鄉史。陳侃理:《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48頁。

② 最近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重新考釋稱《編年記》為《葉書》,文字也有所訂正。見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6-11頁。

③ 整理小組將“守事”釋為“守吏”。

④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彩色圖版見47-50頁。

⑤ 相關尉史的研究可參看李迎春《漢代的尉史》,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漢簡”,2009年6月16日。李先生研究的主要是漢代已經從令史中獨立出來的尉史,但仍然是“直屬縣廷以輔佐令史處理文書為職”,正說明了秦漢之間的傳承。

⑥ 如前引“令史尚”也稱為“史尚”,“令史逐”(8-1839,8-2246等)也被稱為“史逐”(8-672),“令史畸”(8-1518)也稱“史畸”(8-406)等,餘不贅引。但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有(又)以八體(體)試之,郡移其八體(體)課大史,大史誦課,取取(最)一人以為其縣令史,殿者勿以為史。三歲壹并課,取取(最)一人以為尚書卒史。”(簡475-476)要成為令史,首先得通過考試成為史,再在史中選拔。但從總體上來說,令史仍屬於史類吏員,成為史是其取得職事的最基本資格,升為令史後就有了斗食甚至有秩之祿秩等級。

均單列,說明其已經不是給事的關係,而是各自獨立成爲一種職官了。

還需要指出的是,鄉一級機構中也有類似情況,如“貳春鄉主鬻”,雖然不能說鄉中有“鬻曹”,但可能由於貳春鄉有生漆或漆器作坊,縣廷特派專門的令史駐貳春鄉處理相關文書事務。

從以上考述可知,秦代遷陵縣下設有稱爲“官”的職能機構,其長官是官嗇夫;縣廷中有衆多的令史分“某曹”或“主某”來董理專門文書,監管各“官”的文書往來,審閱各“官”的計簿籍錄,或者協助長吏管理吏員。根據“遷陵吏志”,“官嗇夫十人”可能就表示遷陵縣設有7個職能機構和3個鄉(都鄉、啓陵鄉和貳春鄉^①),但縣廷令史却多達28人。每個機構都有相應的令史製作、處理與其相關的文書,或親臨現場視平各官的錢糧財物出入。這些對應各“官”的令史是相對固定的,因此有時可以稱“某曹令史”(如戶曹令史),其相對固定的辦公場所稱爲“某曹”;另有部分令史雖不對應某一特定的“官”,却主管某類具體事務的文書,因此稱爲“主某令史”(如主徒令史);有些令史如果協助治獄的話,又可稱“獄史”。但秦代縣廷令史祇是處理相關文書,或協同丞、尉治獄,祇監管而不插手各職能機構的具體事務,這與漢代縣下諸曹涵蓋諸官事務的固定職掌頗不相同。^② 如果某官嗇夫臨時有事離官,必須以君子無害者或相應的令史、令佐“守官”,^③這時的無害君子或令史、令佐就直接稱爲“某(官)守”,^④而不是“某人守某官”。換言之,從令史到“某官守”,其身份發生了暫時的轉變,故里耶秦簡縣下官文書中經常見到“某官守”的表述,而非“守某官”;功勞名籍上也可以單獨稱“守加”“守頤”。又根據益陽兔子山漢簡元始二年的記載,即使到了西漢末年,縣廷裏仍有“令史署金曹”,而不是全用“金曹掾”或“金曹史”這種我們熟知的“諸曹掾史”之稱謂,顯見這種由“令史署某曹”的格局在西漢末年仍然存在。尹灣漢簡所示的東海郡功曹也可以“主吏”“卒史”的稱謂出現在正式的名刺中,似也有“卒史署某曹”的意味。以前的研究大都認

① 里耶秦簡8-1555載:“冗佐上造臨漢都里曰援。爲無陽衆陽鄉佐三月十二日,凡爲官佐三月十二日。(第一欄)庫佐冗佐,年卅七歲。族王氏。(第二欄)爲縣買工用,端月行。庫六人。(第三欄)”王援任衆陽鄉佐的時間也算在官佐的任期內,可知秦代將鄉也視爲“官”,主官稱爲“官嗇夫”。這和漢代官、鄉有秩與嗇夫不同。

② 孫聞博先生稱秦縣各曹爲“列曹”,但由於秦縣各曹并未完全固定,更有諸多“主”某事的情形,故本文不採用表示漢代固定諸曹的“列曹”稱謂而仍用“諸曹”。

③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明確規定:“官嗇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無)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但從里耶簡的情況來看,守官者除令史外,還有令佐和他官嗇夫。

④ 里耶簡中直接稱“某守”的情況很多,如簡9-728:“守丞枯五十五日。守丞平五十七日。守丞固二百四十二日。令佐機卅四日。令佐賀一百卅日。令佐章百八十日。(第一欄)守加卅四日。守頤三百一十日。佐集卅四日。佐蘇三百一十日。(第二欄)”其中的加和頤直接稱爲“守”,而不稱爲“守嗇夫”。郭洪伯先生也考察了這一情況,認爲官嗇夫如果需要代理,“令史是專門推薦的候選人”。他並由此而斷定,“令史構成縣道的輔助部門”。見前引《稗官與諸曹》,載《簡帛研究二〇一三》。

爲西漢武帝進行的改革,使得縣屬諸曹掾史代替了各官嗇夫^①,現在看來,縣廷中的令史正式與各縣屬機構的“官”合併,使得嗇夫成爲曹掾^②,令史成爲各曹之史^③,漸次形成瞿兌之、蘇晉仁^④與嚴耕望先生列出的縣下諸曹之格局,更有可能是在東漢初成型的。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并惠贈資料。

2014 年 11 月初稿

2015 年 10 月修訂

2016 年 3 月定稿

① 日本學者堀毅指出:“這種縣官嗇夫是商鞅變法以後制定的各種行政法規的執行官員,這些官員在漢《九章律》制定以後,逐漸過渡到列曹。”“但這種過渡并非與《九章律》的制定同時進行,可以推定列曹體制的健全是在漢武帝時期。”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秦漢鄉官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114-115、122 頁。

② 筆者以田嗇夫爲個案,根據學者的研究,簡單分析了田嗇夫向田曹或勸農掾的轉變。見拙作《再論秦簡中的田嗇夫及其屬吏》,《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5 期,228-235 頁。

③ 這種情況可能由令史“守”官逐漸發展而來,祇是過程較爲複雜。從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來看,縣下各官嗇夫應均爲“有秩”的等級,而有秩嗇夫與斗食嗇夫的分等至少在呂后二年以後纔出現。而令史,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賜律》載:“賜吏酒食,衛(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各一斗。”(簡 297,此處“斗食、令史”的斷句爲筆者所加)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12 頁。估計令史尚未有秩級,祇是與斗食同列,故需特別指出,但令史在級別上低於官嗇夫是毫無疑問的,祇是由於其縣廷書記或秘書的性質,在“遷陵吏志”中列於官嗇夫之前。

④ 瞿兌之、蘇晉仁:《兩漢縣政考》,上海:中國聯合出版公司,1944。

從出土文書論秦代縣政令的下達與執行機制

長江大學歷史系 吳方基

內容提要 關於出土秦代檔案,已有不少研究文書形態、製作、存放與傳遞等單項文書制度,但鮮有綜合考察秦代政務運行機制,特別是關於地方縣政令下達與執行機制的系統討論更少。經分析發現,據政令的來源主體不同,秦代縣政令下達方式有直接下達與轉達,兩者文書格式有異。不管何種方式,下達政令多以縣丞負責,要求當天政令當天下達。縣政令的執行方式有“以律令從事”和“聽書從事”。若執行不當,縣廷一般分別采取“追”(追溯未執行之事,要求補救執行)、“却之”(未獲批准,特此批復)等措施或進行相應的處罰。

關鍵詞 秦代 出土檔案 文書格式 縣級政令 執行機制

傳世文獻關於秦代歷史記載很少,過去討論秦代政治制度往往據“漢承秦制”進行推理。隨着出土秦簡的不斷刊布,秦代政治制度研究取得重要進展,尤以“職官制度”探討成果顯著。但主要還是傳統的研究,重在關注機構、官職、職掌等,没能解讀制度的實踐運作。然而許多出土檔案文書,保存着行政運作中的文書程式及處理流程,為分析政務運行機制提供了條件。從政務運行機制切入,考察制度運作及所體現的權力關係,成為近年來研究制度史的前沿話題。依此研究理路,秦漢(主要集中在漢代)政務運行機制的討論已有一些重要成果,如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①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②和《秦漢官僚制

①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② 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度》、^①勞榦《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②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③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④廖伯源《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⑤邢義田《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⑥范學輝《秦漢地方行政運行機制初探》、^⑦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⑧等。但因此前材料闕如，探析秦代政務運行機制很大程度上還是以漢代推理，尤其地方行政運作，更遑論把握基本情况。

近來，里耶出土大量秦代縣級官府檔案，一些涉及文書形態、製作、存放與傳遞等制度層面的研究成果相繼刊發。^⑨然而，這些成果注重分析文書制度，一些討論涉及縣行政運作，但未整體把握運行機制問題。故此，我擬拋磚引玉，從文書形態入手，對秦代縣政令的下達與執行機制初作考察。

① 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② 勞榦：《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第13本，1948。

③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④ 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⑤ 廖伯源：《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

⑥ 邢義田：《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其中收入有關行政運作及其機制的研究有：《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湖南龍山里耶 J1(8) 157 和 J1(9) 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等。

⑦ 范學輝：《秦漢地方行政運行機制初探》，《文史哲》1999 年第 5 期。

⑧ 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⑨ 相關研究成果有：王春芳、吳紅松：《從里耶簡看秦代文書和文書工作》，《大學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2 期；高榮：《秦代的公文記錄》，《魯東大學學報》2006 年第 3 期；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 J1(8) 157 和 J1(9) 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汪桂海：《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藤田勝久：《里耶秦簡的文書形態與信息傳遞》，《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2006；《里耶秦簡與秦代政府之運作》，陝西省秦簡學研究會等編《秦簡博物館開館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秦簡學第七屆年會會議論文集》，2009；陳治國：《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第 1 期；藤田勝久：《里耶秦簡的文書與資訊系統》，《簡帛》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李超：《由里耶幾條秦簡看秦代的法律文書程式》，簡帛網，2008 年 11 月 29 日；廣瀨熏雄：《里耶秦簡所見的“令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等編《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09：秦簡牘研究論文集》，2012；葉山：《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等編《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09：秦簡牘研究論文集》，2012；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簡帛》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呂靜：《秦代行政文書管理形態之考察》，簡帛網，2010 年 2 月 22 日；《關於秦代文書形態與運作流程的考察——以里耶秦牘的分析為基礎》，《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8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胡平生：《里耶簡所見秦朝行政文書的製作與傳送》，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鄒水杰：《秦代簡牘文書“政告某某主”格式考》，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吳榮政：《里耶秦簡文書檔案初探》，《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沈剛：《秦簡所見秦代行政文書標準化問題》，《檔案學通訊》2014 年第 2 期；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 J1(16) 5、J1(16) 6 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浙江學刊》2014 年第 3 期。

一 政令文書格式與下達的特點

行政組織研究是進一步討論行政運作的基礎，故在探討政令下達與執行之前，先對秦代縣級行政機構設置與職官分類作一簡單介紹。^① 秦代縣設有令、丞、尉，縣屬吏有“曹”、“官”之分別，縣廷之內設置列曹，其外設置諸官、鄉、司馬等機構。縣尉官府內設尉史、發弩，外置郵、亭等。在此行政組織系統下，秦代縣政令的下達文書格式出現多種情形，呈現鮮明特點。

根據政令的來源主體劃分，秦代縣政令的下達方式有：直接下達與轉達，兩種政令文書格式稍有不同。

（一）縣廷直接下達的政令文書格式

為明晰政令文書格式，必先確定政令的表現形式，以作出政令與否的區分。出土檔案所見，秦代縣廷直接下達的政令有（廷）令、詔、廷書等形式。^② 廷令或簡稱“令”較為常見，如“令曰二月壹上人臣治（筭）者名”（8-767）、“廷下令書曰取鮫魚與山今廬（鱸）魚獻之”（8-769）、“廷令[]”（8-1797）等。^③ “詔”的形式僅有一例，如“廿六年六月壬子，遷陵[守丞]敦狐為令史更行廟詔：令史行[]失期。”（8-138+8-174+8-522+8-523）^④ 秦統一後，“詔”成為皇帝“令”的專稱，《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并天下後下令“議帝號”，丞相等皆曰：“……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又里耶秦簡 8-461 記載：“以王令曰[]皇帝詔”。^⑤ 不過由於“廿六年六月壬子”日，中央改制詔令尚未下縣，故遷陵縣丞還可發布“詔”形式的政令。這也說明秦統一前，“詔”非皇帝的專用形式。廷書有“廷書曰令史（吏）^⑥操律令詣廷讎”（8-173）^⑦。

從以上幾種表現形式來看，縣廷直接下達的政令文書格式一般是：

① 關於秦代縣級行政機構設置與職官分類的進一步情況，詳見拙稿《簡牘所見秦代縣尉與令、丞關係新探》、《論秦代縣屬機構的地理分布與政務運營方式》等，待刊。

② 長期以來學界對秦令有無問題進行了不少爭論，詳見徐世虹《百年回顧：出土法律文獻與秦漢令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結論是秦令是存在的。我們發現，秦代不但中央存在“令”這一法律形式，地方（包括縣）行政規範也以此形式頒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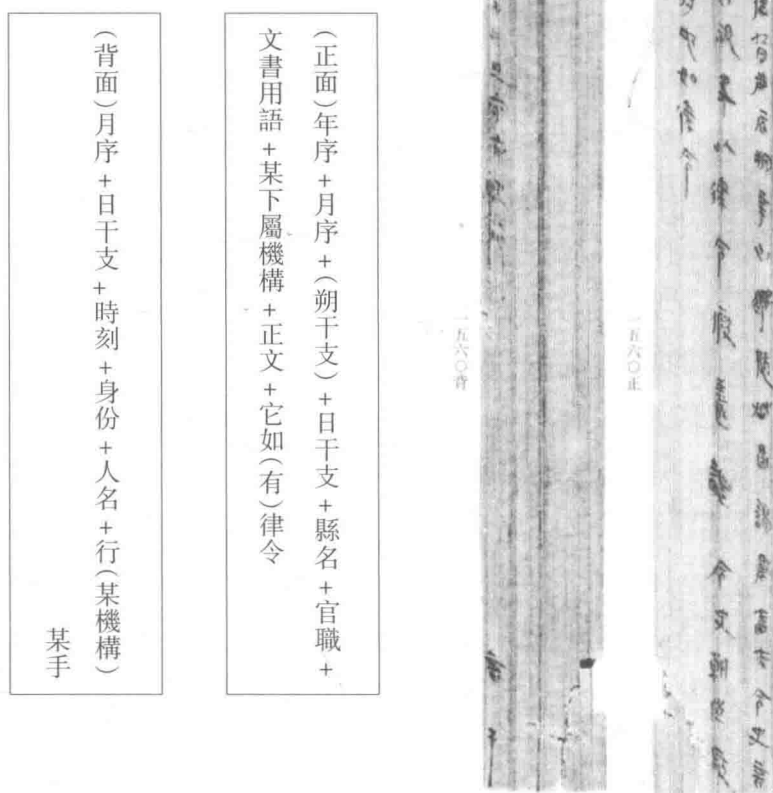
③ 分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21、222、392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8頁。原文“守”字未釋讀，我們推測應釋讀為“守”，因為簡 16-9 載“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二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簡 8-406 載“廿六年六月癸亥（十四）”（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44頁）直到簡 8-1743 +8-2015 載“廿六年八月丙子（二十七）”（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85頁），遷陵守丞敦狐一直在職。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56頁。

⑥ 楊先雲《里耶秦簡識字三則》（簡帛網，2014年2月27日）指出，“史”應釋讀為“吏”。

⑦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04頁。“書”是通用形式，有按發文者、事類、行文方向、傳遞方向、外形、稿本形態、期限等分類方式（見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173-179頁），“廷書”屬於按發文者分類的一種。



8-1560

其中,文書用語有“敢告”、“謂”、“告”、“下”等四種,其後所接的收文者有所區別:“敢告”接縣尉,“謂”一般接“某官職”,“下”接某機構,“告”雖多接“某主”,但也接官職、機構等。^①“它如(有)律令”表示“其他依相關的律令規定”。^②簡牘背面第一行是發文記錄,“行”即傳送。文書實際運行中,發文記錄有時缺寫。“某手”是文書的書寫者。^③如下簡:

卅五年五月己丑朔庚子,遷陵守丞律告啓陵鄉嗇夫:(中略)它有律令。(正)

① 鄒水杰指出:“謂”後面一般接“某嗇夫”,“下”用某機構,“告”雖多數接“某主”,但三種用語形式并存(見鄒水杰《里耶秦簡“敢告某主”文書格式再考》,《魯東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更準確地說,“謂”後面一般接“某官職”。

② 邢義田:《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499-529頁。

③ 關於“某手”問題,以往爭論很大,主要有三種觀點:抄手說、簽署說和經手說(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頁;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J1(16)5、J1(16)6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形成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沒有厘清行政文書的製作和傳遞流程所致。秦代行政文書依性質可粗分為兩類:一是書寫本單位送出的公文;二是抄錄其他單位的來文,不但抄錄來文內容,還一并抄錄原“某手”。(可參閱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J1(8)157和J1(9)1-12號秦簡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第1輯,275-296頁)。故而,祇有厘清文書的製作和傳遞流程,“某手”的性質纔能正確判斷。據行政文書的最初製作而言,“某手”是文書的書寫者。

五月庚子，□守恬□□。 敬手。(背)(8-770)

卅一年後九月庚辰朔辛巳，遷陵丞昌謂倉嗇夫：(中略)它如律令。(正)

後九月辛巳旦，守府快行。 言手。(背)(8-1560)^①

簡 8-770 用語為“告”，接官職“鄉嗇夫”；簡 8-1560 用語為“謂”，接官職“倉嗇夫”，均以“它如(有)律令”作為結束語。

(二) 縣廷轉達的政令文書格式

縣廷轉達的政令文書一般是在抄寫原上級所下政令文本的基礎上，加寫轉達命令。一般上級政令抄寫於正面，加寫部分書於背面。原上級所下政令與上述縣廷直接所下政令的文書格式相同，加寫轉達命令的文書格式為：

月序 + (朔干支) + 日干支 + 縣名官職 + 文書用語 + 某下屬機構 + 正文 + 它如律令 / 某手 / (月序) + 日干支 + 時刻 + 身份 + 人名 + 行 (某機構)

因上級所下政令是年、月、日俱全，故加書內容祇具署月、日。^② 文書用語有“下”或“敢告”、“告”等。加寫轉達命令與縣廷直接所下政令的文書格式有一顯著不同，後者一般把“某手”和行書記錄寫於簡牘背面，前者則緊接文書主體，先寫“某手”，後寫行書記錄，中間用“/”符號隔開。如：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谷、屬尉：(中略)它如律令。(正)

^① 分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23、359 頁。

^② 漢代官文書的格式也具有這個特點，凡祇具月日的文書，其前還應有一份文書，年月日俱全。參見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51 頁。

三月庚戌,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中略)它如律令。/鉤手。庚戌水下□刻,走裙行尉。(背)(16-6)^①

簡 16-6 正面為洞庭守禮(禮,人名)下達各縣的政令文書,與縣廷直接下達的政令文書格式相同。背面為遷陵縣轉達洞庭所下政令的文書,用語為“敢告”與“告”。“某手”和行書記錄緊接轉達文書主體部分。

(三) 政令下達的特點

總體而言,政令不管是直接下達,還是轉達,一般呈現以下兩個特點:

1. 政令下達由縣令、丞負責,尤以縣丞負責居多,負責下達者與接收者均很明確,見表 1:

表 1: 縣廷部分政令下達表^②

政令來源	負責下達者	接收者	簡號及出處
出自縣廷	遷陵拔	學俾	(14-18) ^③
	遷陵丞昌	倉嗇夫	(8-1560)359 頁
	遷陵丞昌	鄉官	(8-198+8-213+8-2013)109-110 頁
	遷陵守丞律	啓陵鄉嗇夫	(8-770)223 頁
	遷陵丞遷	畜官	(8-137)77 頁
	遷陵守丞敦狐	船官□	(6-4)19 頁
	遷陵守丞衡	尉	(8-2001)415 頁
縣廷轉達	遷陵丞歐	尉、鄉、司空、倉主	(16-5) ^④
	遷陵守丞敦狐	尉、鄉、司空、倉主	(16-6) ^⑤
	遷陵守丞色	少內	(8-155) ^⑥

注:表中拔、昌、律、遷、敦狐、衡、歐、色等均為人名。

表中 10 份政令,祇有 1 份為遷陵縣令所下,9 份為遷陵縣丞(或守丞)下達或轉達,縣丞負責下達政令占絕對多數。政令下達負責者均書寫人名,接收者指明長官(如嗇夫、主),責任落實到個人,說明秦代縣行政有嚴格的責任制度。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②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列表材料均引自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③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錄》,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232-233 頁。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⑥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94 頁。

2. 政令下達效率高, 當天政令當天下達, 見表 2:

表 2: 政令形成及下達時間表

政令來源	政令形成時間	政令下達時間	簡號及出處
出自縣廷	卅一年後九月辛巳	後九月辛巳旦	(8-1560)359 頁
	卅五年五月庚子	五月庚子	(8-770)223 頁
縣廷轉達	廿七年三月丙辰	三月丙辰下水四刻	(16-5) ^①
	廿七年三月庚戌	三月庚戌水下口刻	(16-6) ^②
	卅二年四月癸丑	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	(8-155) ^③

對比表中政令形成與下達時間, 均為同一天。政令當天形成當天下達係秦代《行書律》的規定, 如《秦律十八種·行書》曰: “行命書及書署急者, 輒行之; 不急者, 日蹻(畢), 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④意即: “傳送皇帝所下命書及標明‘急’字的文書, 應立即傳送; 不急的, 當天送完, 不准留置。留置者依律論處。”留置者的處罰標準, 嶽麓秦簡記載:

· 行書律曰: 傳行書, 署急輒行, 不輒行, 貲二甲。不急者, 日蹻(畢)。留三日, 貲一盾; 四日上, 貲一甲, 二千石官書

留弗行, 盈五日, 貲一盾, 五日到十日, 貲一甲, 過十日到廿日, 貲二甲, 後有盈十日, 輒蹻(加)一甲。^⑤

嶽麓秦簡摘抄自秦統一後的法律文本, 較之統一前的睡虎地秦簡所載法律更為細密,^⑥詳細規定針對留置時間的長短作出相應處罰。

二 執行文書格式與執行方式

縣廷直接下達與轉達政令的執行文書格式與運行機制相同, 下面一併論述。

(一) 執行文書格式

里耶秦簡所見, 政令執行文書的一般格式是: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94 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61 頁。

⑤ 引自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行書律令初論》, 簡號分別是 1250、0792,《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⑥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行書律令初論》。

<p>(背面)</p> <p>某手</p>	<p>(正面)年序+月序+(朔干支)+日干支+機構+官職+人名+敢言之+正文+敢言之</p>
-----------------------	--

其中“正文”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對所下達政令主體內容的復述，二是執行情況的彙報，中間以“·”符號隔開。如：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庚戌，庫武敢言之：廷書曰令史(吏)操律令詣廷讎，署書到，吏起時。有追。·今以庚戌遣佐處讎。敢言之。(正)
處手。(背)(8-173)^①

廿九年四月甲子朔辛巳，庫守悍敢言之：御史令曰：各第(第)官徒丁【鄰】☐
勸者爲甲，次爲乙，次爲丙，各以其事勸(劇)易次之。·令曰各以☐☐
上。·今牒書當令者三牒，署第(第)上。敢言之。(正)
槐手。(背)(8-1514)^②

簡 8-173 是庫官執行縣廷下達政令的文書，“正文”中“廷書曰令吏操律令詣廷讎，署書到，吏起時。有追”是復述縣廷下達的政令，即下令庫吏到縣廷校讎律令，庫執行後回復文書寫明政令下達和庫吏出發的時間。“今以庚戌遣佐處讎”是庫執行情況的回報，說明今已於“庚戌”日遣派庫佐處(處，人名)前去校讎律令。兩部分內容以“·”相隔。簡 8-1514 是庫官執行縣廷轉達御史所下政令的文書，文書格式與簡 8-173 一致。

(二) 政令執行方式

以依據標準來分，政令執行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律令從事”，即依照相關律令的規定來執行；二是“聽書從事”，即依據政令文書的規定來執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04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2 頁。

1. “以律令從事”

秦代貫徹以法治國理念，律令是指導處理政務的依據。所下政令中常見“以律令從事”或“如律令”^①等依照相關律令規定的執行方式，見表 3：

表 3：部分政令所見“以律令從事”的執行情況表

政令內容	執行者	執行方式	簡號及出處
計以具付器計廿八年不來報	令史	可以律令從事	(8-21)33-34 頁
	令史	可以律令從事	(8-1219)293 頁
屯戍士五桑唐趙未到官署	尉官	以律令從事	(8-140)80 頁
死亡者別以爲二課		應令	(8-41)38 頁
令史言假養	倉	以律令	(8-1560)359 頁
追貲債	少內	以律令從事	(8-60+8-656+8-665+8-748)43 頁
	少內	以律令從事	(8-131+8-378+8-514) ^②
債校券	司空	以律令從事	(8-63)48-49 頁
計		當律令	(8-222+8-1039) ^③
		以律令從事	(8-1538)353 頁
以五月斂之	都鄉	應律	(8-1454+8-1629)331 頁

表中政令內容涉及計、課、債、征斂等，執行者包括縣尉、令史、倉、少內、司空、鄉等，執行方式均是依據律令處理，可見“以律令從事”是執行縣政令的一種重要方式。

2. “聽書從事”

在律令規定不完善或缺乏規定的情況下，“聽書從事”則爲執行縣政令的另一方式，如：

【里】士五辟繕治，謁令尉定

丞繹告尉主：聽書從事。(8-69)

廿七年八月甲戌朔壬辰，酉陽具獄獄史啓敢

① 關於“如律令”的含義，王國維、陳直、裘錫圭、李均明和日本學者大庭脩、鷹取祐司等都有研究，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是其律令就是法令，要求照此辦理；二是固定的一種下行文書用語，是官府文書的一種常用格式，與具體法令無關；三是符咒用語（參見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69-271 頁）。張伯元、王煥林認爲“如律令”的含義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從秦至漢初，“如律令”具有實際內容，有具體法令可按，大致在漢武帝時代，始逐漸成爲一種固定的文書格式，爲催促命令習語，魏晉以降演變爲道家符籙術語（參見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268-284 頁。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174-175 頁）。邢義田、劉太祥也認爲秦代文書中的“如律令”就是強調要求以律令行政（參見邢義田《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513 頁。劉太祥《簡牘所見秦漢律令行政》，《南都學壇》2013 年第 4 期）。

②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八則）》，簡帛網，2013 年 5 月 17 日。

③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六則）》，簡帛網，2012 年 12 月 24 日。

啓治所獄留須，敢言之。·封遷陵丞□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陞告司空主：聽書從事。(8-133)^①

既然規定“聽書”執行政令，那麼執行所依據的文書一定會附帶下達，簡8-69與8-133尉官、司空“聽書從事”，其上都附有執行所依據的文書。

需要說明的是，“以律令從事”和“聽書從事”兩種方式并非絕對獨立，有時結合起來執行。如：

□亥朔辛丑，琅邪段(假)【守】□敢告內史、屬邦、郡守主：琅邪尉徒治即【默】□琅邪守四百卅四里，卒可令縣官有辟、吏卒衣用及卒有物故當辟征還□告琅邪尉，毋告琅邪守。告琅邪守固留費，且輒却論吏當坐者。它如律令。敢□□一書。·以蒼梧尉印行事。/六月乙未，洞庭守禮謂縣嗇夫：聽書從事(中略)/八月甲戌，遷陵守丞臚之敢告尉官主：以律令從事。(8-657)^②

洞庭郡下達縣嗇夫的政令規定“聽書從事”，即依照其上琅邪的文書執行。遷陵縣收到洞庭和琅邪的文書，下令縣尉“以律令從事”。此一份政令的執行結合了“以律令從事”和“聽書從事”兩種執行方式。

三 執行程式與執行不當的處理形式

(一) 執行程式

依據涉及機構的數量來分，縣政令分為針對單個機構的政令和涉及兩個或多個機構的政令，其執行程式不同。

1. 針對單個機構的政令執行程式

這種程式一般是：政令下達，執行機構先“問之”，即詢問情況，再執行并回復。詢問的情況主要有三種：

(1) “毋當令者”，就是沒有符合政令的情況，如：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辛酉，啓陵鄉趙敢言之：令曰二月壹上人臣治(答)者名。·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8-767)^③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3、70-71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93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21頁。

啓陵鄉執行的廷令規定二月上報“人臣治(笞)者”(處以笞刑的私家奴婢)^①名單,詢問後,啓陵鄉回復縣廷沒有符合政令規定的情況。

(2)“當令者”,就是有符合政令的情況,並以牒書作為附件的形式上報,如:

廿九年四月甲子朔辛巳,庫守悍敢言之:(中略)令曰各以□□

上。·今牒書當令者三牒,署第(第)上。敢言之。(8-1514)^②

此為庫官執行縣廷轉達御所下的政令,“今牒書當令者三牒”即以附件牒書的形式上報符合政令的情況。

(3)執行較為複雜的政令,回復詢問結果及執行情況,如:

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廷曰:“令居貲目取船,弗予,謾曰亡。【亡】,不定言論,及謾問,不亡,定謾者‘訾’,遣詣廷。”問之,船亡,審(沉)漚泉,廼甲寅夜水多,漚流包(浮)船,【船】毀【繫】絕,亡,求未得。此以未定。史逐將作者汜中。具志已前上,遣佐壬操副詣廷。敢言之。(9-981)^③

縣廷下達政令說:“縣廷令‘居貲’(以勞役抵償貲債的人)^④目(目,人名)取船,田官吏不給,胡說丟亡。如果真丟亡,不追究責任,待詢查沒有丟亡,定胡說者‘訾’的罪名,并遣送到縣廷”。田官回復執行情況:已詢問,船確實丟亡……。

對於一些簡單的政令,執行者可直接回復執行情況,無需詢問,如:

廿九年十二月丙寅朔己卯,司空色敢言之:廷令隸臣□行書十六封,曰傳言。今已傳者,敢言之。(8-1524)

卅年十一月庚申朔丙子,發弩守涓敢言之:廷下御史書曰縣□治獄及覆獄者,或一人獨訊囚,嗇夫長、丞、正、監非能與□□毆,不參不便。書到尉言。·今已到,敢言之。(8-141+8-668)^⑤

此政令簡單要求“傳言”(傳送文書後回復)或“書到尉言”(收到文書後回復),無需詢問,司空與發弩(縣尉下屬機構)回復執行情況說:“今已傳者”(已傳送文書)和“今已到”(已收到文書)。

① 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注釋:“人臣、人妾,私家的奴、婢。”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5號簡,94頁注釋[一]。

② 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2頁。

③ 簡文的句讀引自王煥林《里耶秦簡叢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5號簡,52頁[譯文];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60-562頁。

⑤ 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8、81頁。

2. 涉及兩個或多個機構的政令執行程式

縣廷下達的政令涉及兩個或多個機構,執行分爲兩個連續程式:

(1) 接收者執行政令,回復情況,回文指明(文書用語爲“謁”或“謁令”)相關機構,由縣廷居中轉達。如:

□□月己亥朔辛丑,倉守敬敢言之:令下覆獄還遷陵隸臣鄧

□□□名吏(事)、它坐、遣言。·問之有名吏(事),定,故旬陽隸臣,以約爲

□□□决(決),有還耐臯以上,穀(繫)遷陵未决(決),毋遣毆。謁報覆獄治所,敢言
(8-136+8-144)^①

倉守敬(敬,人名)接收縣廷政令,執行後回復,回文指明“謁報覆獄治所”,即請求縣廷轉達覆獄治所。

(2) 相關機構收到文書後,執行并回復情況,回文指明原政令執行者,同樣由縣廷居中轉達。如: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啓陵鄉守意敢言之:廷下倉守慶書言令佐贛載粟啓陵鄉。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爲付券一上。謁令倉守。敢言之。·七月甲子朔乙亥,遷陵守丞配告倉主:下券,以律令從事。(8-1525)^②

縣廷轉達倉守慶(慶,人名)所回復執行情況給啓陵鄉,說令佐(官名)載粟到啓陵鄉。啓陵鄉收到粟後作成記錄券回復縣廷,文中“謁令倉守”意即請把券交予倉守,由縣廷居中轉交。

如果執行政令過程中出現問題,執行者需作詳細說明,如:

啓陵鄉趙敢言之:令令啓陵捕獻鳥,明渠雌一。以鳥及書屬尉史文,令輸。文不肯(肯)受,即發鳥送書,削去其名,以予小史適。適弗敢受。即詈適。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枅(枅)以走趙,美詢詈趙。謁上獄治,當論論。敢言之。(8-1562)^③

啓陵鄉執行縣廷下達捕獻鳥的政令出現問題,上報詳細情況:啓陵鄉以鳥和送鳥文書交給尉史文,令其輸送,然而文不肯接受輸送任務,便“發鳥送書”,即拆封送鳥文書,削去自己的名字,轉而交小史適輸送(文、適,人名)。適不肯接受,文便詈罵適……致使執行政令發生問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6頁。陳偉《里耶秦簡中的“决”》(簡帛網,2013年9月26日)將誤釋的“史”改釋爲“决”。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9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56-360頁。

(二) 執行不當的處理措施

政令執行不當分兩種情況：一是執行後未回復；二是未按規定執行。針對前者，採取“追”的方式處理；針對後者，採取“却之”的方式處理，還可相應處罰執行不當者。

1. “追”

政令執行後未回復，縣廷“追”執行者。如：

廿八年十二月癸未，遷陵守丞臚之以此追如少內書。(後略)(8-75+8-166+8-485)^①

這是遷陵縣“追”少內。《里耶秦簡牘校釋》曰：“追，追究。”^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注釋：“追，追查。”^③《里耶秦簡校詁》解釋“追”為追問。^④不過，我們注意到“追”的這些意思不能解釋下述記載：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戊戌，司空騰敢言之：陽陵下里士五(伍)不識有貲餘錢千七百廿八(中略)今為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中略)敢言之。/四月壬寅，陽陵守丞恬敢言之：寫上謁，報署金布發，敢言之。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辛卯，陽陵速敢言之：未得報，謁追，敢言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假)尉麟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以律令從事報之。(9-3)^⑤

陽陵司空騰(騰，人名)為士五所欠貲錢事需謁告洞庭尉，因司空是陽陵縣下屬機構，無權直接上書洞庭尉，須經陽陵縣丞居中轉達洞庭尉處理。三十三年四月陽陵縣丞已轉達洞庭尉，但未見洞庭尉回復，三十四年七月又上書說未得到回復，故而“謁追”洞庭尉。陽陵縣丞作為洞庭尉的下級，“追”若作“追究”、“追查”解釋，下級追究、追查上級於理不合。又簡8-60+8-656+8-665+8-748：

十二月戊寅，都府守胥敢言之：遷陵丞臚曰：少內配言冗佐公士熒道西里亭貲三甲，為錢四千卅二。自言家能入。為校□□謁告熒道受責。有追，追曰計廿八年□責亭妻胥亡。胥亡曰：貧，弗能入。謁令亭居署所。上真書謁環。□□熒道弗受計。亭譴當論，論。敢言之。^⑥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5-56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5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61頁。

④ 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63頁。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⑥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3頁。

簡文記載熒道(地名)一個叫亭的人欠四千三十二錢的債務,遷陵少內“追”熒道,熒道回復說,把二十八年亭的債務計錄傳告亭的妻子胥亡(胥亡,人名),胥亡回答:“家貧,無能力償債。”其中“追”顯然不作“追問”解釋,而是“追”熒道的回復文書。

馬怡《里耶秦簡選校》解釋“謁追”為“向上級追索(回覆)”^①,頗為符合簡文本意,不過其依然把“追”作動詞理解,缺乏對“追”的性質的界定。我們認為“追”是一種文書用語,《康熙字典》曰:“凡上溯以往曰追。”如《左傳》成公十三年:“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②《古漢語字典》注釋:“追,補救。”^③如《左傳》哀公十六年:“弗敬弗休,悔其可追。”^④說明“追”指追溯未執行之事,要求補救執行。《秦律十八種·行書》曰:“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也)……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⑤嶽麓書院藏秦簡 1271 載:“行書律曰:傳書受及行之,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相報。宜到不來者,追之。書有亡者,亟告其縣。”^⑥里耶秦簡 9-712 載:“書到相報,不報,追。”^⑦都是說文書要回報,當時未報,過後也須補報。

上簡 8-75+8-166+8-485“遷陵守丞臚之以此追如少內書”即遷陵縣廷下達政令到少內,少內未回報執行情況,縣守丞臚之(臚之,人名)追溯并要求補報,故七月辛亥少內作出回報曰:“計不得敢……”。簡 9-3 洞庭尉未回報三十三年陽陵縣丞的上書,三十四年陽陵縣丞追溯三十年的事,請求洞庭尉回報。簡 8-60+8-656+8-665+8-748“有追,追曰……”,前一個“追”是文書用語,後一個“追”指代補救回報的文書,整句可理解為“遷陵要求少內補報亭的債務償還情況,補報文書說……”。

2.“却之”

執行者未按政令規定執行,縣廷可以“却之”。如:

却之:廷令尉、少內各上應(應)書廷,廷校,今少內□□

日備轉除以受錢,而尉言毋當令者,節□

當坐者,以書言,署金布發。(8-64+8-2010)^⑧

此為縣廷“却之”尉、少內的公文,理由大概是:縣廷下令尉、少內各自上“應書”(指上級官府

① 馬怡:《里耶秦簡選校(連載二)》,簡帛網,2005年11月18日。

② [清]洪高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467頁。

③ 上海辭書出版社語文辭書編纂中心編著:《古漢語字典》(新一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453頁。

④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882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61頁。

⑥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行書律令初論》。

⑦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編:《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

⑧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則)》,簡帛網,2012年5月1日。

就某一特定問題對下級有所探詢或索取資料,下級回復的文書)^①到廷,縣廷進行考核,而今少內……每日錢足數……尉却說没有符合法令規定的內容。

對於“却之”的解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訓“却”為詰問、詰難之意,“却之”即上級官吏對下級官吏上報的文書有疑問而提出質詢;^②一是訓“却”為退,“却之”乃秦代行政司法公文中的術語之一,用於公文下達,理解為“未獲批准,特此批復”。^③《里耶秦簡校釋》傾向於第二種觀點,^④可從。上引簡 8-64+8-2010 就是縣廷未批准尉、少內的執行,特此批復的文書。

3. 執行不當的處罰條款

秦代政令在實施中對執行不當者設有相應的處罰條款,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在下達政令中相應設定處罰條款,如:

□勿令繆失,以縱、不直論,有令□(8-70+8-1913)

□不從令,貲二甲。(8-1890)^⑤

簡 8-70+8-1913 對違反法規的以縱、不直論處。何謂“縱、不直”,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論獄【何謂】‘不直’? 可(何)謂‘縱囚’? 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弗論,及傷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⑥“不直”就是無視量刑定罪,使重罪輕論,輕罪重論。“縱”就是有罪不論,放走罪犯。如何處置“縱、不直”之人,秦始皇時期是把他們遷往邊地築城,如秦始皇“三十四年,適(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⑦簡 8-1890 直接規定不從令者,貲罰二甲。

其二是根據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給予處罰。如《語書》說:“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⑧南郡守下達政令中規定:舉劾不從令者,依據國家法律進行處罰,且縣令、丞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出土官府檔案所見,秦代縣政令的下達與執行有着相當完善的運行機制。首先,文書用語多樣,文書格式較為固定。在用語上,據政令下達對象不同,下達政令的文書用語有“敢告”“謂”“告”“下”等;政令執行不當,縣廷的處理文書用語有“追”“却之”等。在格

① 參見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207 頁。

② 見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簡牘學研究》第 4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見王煥林《里耶秦簡叢考》。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68-69 頁)中對諸家解釋“却之”的觀點作了介紹,可參看。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69 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4、404 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115 頁。

⑦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253 頁。

⑧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13 頁。

式上,直接下達的政令一般具有時間、官職、人名、正文、行書記錄、書手等要素,轉達的政令則是在抄寫原上級所下政令文本上,加寫轉達命令,原政令抄於簡牘正面,轉達命令書於簡牘背面;執行文書的正文由兩部分組成:對所下達政令主體內容的復述和執行情況的彙報,兩者以“·”符號隔開。

其次,政令執行標準明確,程式正當,并對執行不當的情況設定處理方式與處罰條款,保障政令的執行。政令執行標準有兩種:依照相關律令的規定和依據政令文書的規定,明確性強。針對不同的政令,設定不同執行程式。下達單個機構的政令執行程式是:政令下達,執行者“問之”并回復。下達政令涉及兩個或多個機構,執行分為兩個連續程式:一、接收者執行政令并回復,回文指明相關機構,由縣廷居中轉達;二、相關機構收到文書後,執行并回復,回文指明原政令執行者,同樣由縣廷居中轉達。若執行不當,縣廷一般分別采取“追”“却之”的措施,并進行相應的處罰。

嶽麓書院藏秦簡《亡律》研究^{*}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周海鋒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嶽麓書院藏秦簡《亡律》條文絕大多數是針對刑徒的，這既說明其時刑徒逃亡現象十分普遍，又表明秦統治者在預防刑徒逃亡方面是頗費心思的。不同類別和等級的刑徒逃亡，秦律給予的處罰相同，而漢初的《二年律令》是區別對待的，這或可看作法律改進的標誌。“命者”指已經論罪的刑徒；“亡命”應理解為“命亡”，指已論罪而逃亡者。“徼中蠻夷”是指服從秦統治的少數民族政權管轄區，和睡虎地秦簡中出現的“屬邦”性質相近，是與“徼外蠻夷”相對的概念。“中縣道”包括秦內史郡和隴西郡的一部分，是秦的核心統治區域。

關鍵詞 嶽麓書院藏秦簡 亡律 命者 亡命 徼中蠻夷 中縣道

《嶽麓書院藏秦簡》第四卷收錄的第一組律文計 105 枚，其內容多與逃亡相關，且形制、字體頗為一致，故歸為一組。1991 號簡背有“亡律”篇名，因此這類簡當歸入《亡律》之中。

參之第四卷所收錄其他律文，如《尉卒律》《田律》《金布律》《戍律》等，易知《亡律》的數量要遠多於其他律類。雖然哪些文獻得以重現天日乃諸多因素所致，但面對同一批出土文獻中各類文獻數量多寡問題，僅僅用偶然性來解釋似乎不能讓人信服。嶽麓秦簡所見律令名稱數十種，而名稱之下的律令內容多寡不一，這可能與律令持有者生前所擔任的職務有

^{*}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嶽麓秦簡與秦代法律制度研究”（批准號：11JZD013）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關,亦可與睡虎地秦簡的保存情況類比。律令持有者是如此在意與逃亡相關的法律,一則說明在秦代逃亡現象十分頻繁,再則表明秦代十分重視這一現象。

秦雖然通過武力一統六國,政令暢行於九州(這一點從里耶行政文書可以得到極好的證明),但各種危害帝國穩定的因素若暗流湧動,從未止息。首先是東方貴族的反抗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如史書載秦始皇巡幸屢遭刺客襲擊,江東項氏網羅黨羽蠢蠢欲動等。其次,亡命、群盜呼嘯山林湖澤,對抗朝廷,如張耳、黥布、彭越之流。後一種情況與《亡律》極有關聯。

嶽麓秦簡《亡律》條文中所見逃亡者稱謂不一,據其身份,大致可分刑徒、黔首、奴婢和官吏逃亡四類。下面分別討論秦律對各類逃亡者的處罰及相關問題。

首先,對刑徒逃亡的懲處。嶽麓秦簡《亡律》所見條文,大部分是針對各類刑徒的,少數針對普通百姓,這似乎可以證明秦代刑徒逃亡現象更為普遍。傳世典籍相關記載也足以說明這一點,《史記·黥布列傳》載黥布“及壯,坐法黥”,“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① 黥布犯法被處以黥刑,以刑徒身份輸送至驪山勞作,然其不安本分,私交徒長,伺機率領部分刑徒逃亡到長江中為群盜。

役使數量眾多的刑徒勞作是秦政的一大特色,也是某些學者認定秦亡的一大原因。以里耶秦簡所見官府各部門的“作徒簿”觀之,刑徒數量的確可觀。為了迫使刑徒斷絕逃亡念頭,一心勞作,秦針對刑徒逃亡制定了一系列懲罰性條文。茲錄嶽麓秦簡《亡律》數則如下:

城旦舂亡而得,黔,復為城旦舂;不得,命之,自出毆(也),笞百。其懷子者(2009)大枸櫞及杖之,勿笞(1983)。^②

秦廢城旦不將司從馬,亡而得者,斬其左止,復為城旦。後復亡,勿斬,如它城旦然。(1997)^③

城旦舂司寇亡而得,黔為城旦舂;不得,命之,其獄未鞠而自出毆(也),治(笞)五十,復為司寇。(1976)^④

【舂】司寇。【舂】司寇、白粲、奴婢以亡,黔為城旦舂,黔奴婢(顏)頽,畀其主。(2062)^⑤

上述律文共涉及四種刑徒逃亡,分別為城旦舂、秦廢城旦、城旦司寇和白粲,其中城旦舂和秦廢城旦又可勉強歸為一類。城旦舂、白粲和城旦司寇身份依次升高,但他們逃亡所面臨的處罰卻是一樣的,都是黔為城旦舂。而對秦律有明顯承繼的《二年律令》針對不同等級的

① 《史記》卷九一《黥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3151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54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5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5頁。

⑤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1頁。

刑徒逃亡，給予不同的懲處。例如《二年律令·亡律》規定：“城旦舂亡，黥，復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皆笞百”，^①鬼薪、白粲逃亡祇要笞一百，比城旦舂逃亡處以黥刑要輕得多。秦漢律中諸如此類的細微差別，既可以看作是法律日趨嚴密合理的表現，也可視為是漢律相對寬和的表征。

囿於史料與史觀，先賢們過分強調秦代行政剛硬嚴酷的一面，實則為了保障帝國機器之穩健運行，秦政有其極為靈便的一面。如上文所引 2009 和 1976 簡，都提及自出減刑，前者還規定對懷孕刑徒給予特別照顧。逃亡的刑徒自首無疑可以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對孕婦給予特殊關照亦有助於保障人口增殖。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自出”，有一定的時間限制，祇有在“獄未鞠”時自首纔會獲得減刑。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鞠”的含義，《漢書·刑法志》如淳注曰：“以囚辭決獄事為鞠”，律文中鞠顯然不可如此解釋，“囚”尚在逃亡，何以得“辭”。許慎《說文解字》云：“鞠，窮治罪人也”，“獄未鞠”解釋為案件尚未完結是比較合理的。

上引簡文中所見的“命之”，鮮見於傳世典籍，其含義值得探究一番。細審律文，“命之”是發生在抓捕逃亡刑徒而不得之後的一個舉措。“命之”一詞又見於《二年律令·具律》：

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

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②

據上引《具律》條文，漢初“命之”祇施用於“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的逃亡者，至於犯耐隸臣妾以下罪者逃亡則不“命之”，祇要“論令出會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接下來的律文“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講的是與前面律文相對的情形。後文特意強調“不得”，則前半部分顯然應當是對捕得逃亡者之後的處置，祇是律文有部分省略而已。又一“亦”字表明，即使逃亡者沒有捕獲，也要“論命之”。故知律文中“命之”為“論命之”的省略，所謂命之即論罪。有學者認為“命”當“出告示緝拿”講，恐未達一間^③。驗之上引《具律》前半部分，逃亡者已被抓獲，何必再出告示緝拿。又，嶽麓秦簡 2087 號載：“有罪去亡，弗會，已獄及已劾未論而自出者，為會，鞠，罪不得減”，簡文中的“論”與“論之”之“論”用法一樣，表示論罪。日人保科季子在《亡命小考——兼論秦漢的確定罪名手續“命”》一文中指出“命”為確定罪名的司法手續，^④甚確。

在逃而被論罪者有一個專門稱謂——“命者”，“命者”數見於秦漢簡牘：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0 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25 頁。

③ 業師陳松長先生告知筆者，2014 年暑假其在漢堡大學與德國學者討論《亡律》簡時，勞武利、史達等持此觀點。

④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49 頁。

盜賊旋(遂)者及諸亡坐所去亡與盜同法者當黥城旦舂以上及命者、亡城旦舂、鬼薪、白粲舍人(2011)室、人舍、官舍,主舍者不智(知)其亡,贖耐。其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歲者及典、田典不告,贛一甲。(1984)^①

群盜、命者,及有罪當命未命,能捕群盜、命者,若斬之一人,免以爲庶人。所捕過此數者,購如律。(1984)^②

《二年律令》以“命者”與“當命未命”相對,則“命者”指已論命者無疑。又“命者”能够“捕群盜、命者,若斬之一人,免以爲庶人”一句至少向我們傳達了以下兩點信息:斬殺群盜、命者,不僅無罪,且可受到獎賞;“命者”均爲刑徒,故有“免爲庶人”一說。綜合以上可知“命者”指已經論罪的刑徒(包括在逃者)。

“命者”與“亡命者”并非一回事。兩漢史書中多載“亡命”者,如《史記·張耳列傳》載:“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引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漢書·張耳傳》顏師古注:“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晉灼、顏師古均將命釋爲名,謂亡命爲脫名籍而亡命,實則是對“亡命”本義的誤解。前代學者已指出此誤,如《漢書補注》王先謙引劉奉世云:“顏(師古)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也。”劉氏所言有一定道理,然仍有一間未達。“亡命”的正確解釋當爲已經論罪的逃犯。“亡命”有時的確可釋爲逃命,《說文》正以“逃”釋“亡”。以下兩則材料能更加直觀地證明“亡命”即“逃命”,而絕非“脫名籍而逃”:

《漢書·王嘉傳》:“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征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漢書·嚴延年傳》:“於是覆劾延年闔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征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

雖然在典籍中“命”可通“名”,如《史記·天官書》“以所犯命之”,在《漢書·天文志》中作“以所犯名之”。然逃亡在先,被削掉名籍在後,晉灼的注釋給人造成張耳主動脫民籍而亡的錯覺。其實,名籍由官府保管,是征發徭役賦稅的主要憑據;而在逃者不能繼續服役納稅,故銷除其名籍。相對而言,崔浩的注釋雖然也沒有將“亡命”的本義揭示出來,但不失爲一說,“逃匿則削除名籍”則更符合歷史事實。然“亡命”又不能簡單地與逃命劃等號,“亡命”乃倒叙詞,應理解爲“命亡”,指已論罪而逃亡者。其實,李善在給《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作注釋時已揭示出“亡命”的正確含義,其文曰“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8-59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29頁。

其次，對奴婢逃亡的處罰。嶽麓秦簡《亡律》中與奴婢逃亡相關的律文有數條，通過律文內容可知秦律對奴婢逃亡的懲處有獨特之處，這是由其自身屬性決定的。奴婢在睡虎地秦簡中又稱“人臣妾”，附屬於主人，不具備獨立的法人地位；若從經濟上而論，與其他物品無異，甚至是可以明碼標價的。《里耶秦簡》所載關於遺產繼承的爰書，奴婢常與牛馬等物什列在一起，過繼給財產繼承人。如：

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鄉守武爰書：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Ⅰ等，牝馬一匹予子小男子產。典私占。初手。Ⅱ（8-1443+8-1455）^①

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鄉守沈爰書：高里士五（伍）廣自言：謁以大奴良、完，小奴疇、饒，大婢闌、願、多、□，Ⅰ禾稼、衣器、錢六萬，盡以予子大女子陽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齒。Ⅱ典弘占。Ⅲ（8-1554）^②

這兩份爰書顯示，奴、婢與馬、禾稼、衣物、錢等列在一起作為個人財產轉讓，值得注意的是奴、婢都排列在其他私產的前面，這應當不是巧合。奴婢雖然可以像其他物品一樣轉讓、出售，但其作為自然人之價值，又是其他物品不能匹敵的。

由於奴婢“半物半人”的屬性，故其犯逃亡罪後，一方面要對其處以刑罰，另一方面施刑後又要將其遣還給主人。也就是說奴婢逃亡，官府可對其進行懲處，但不可將其納為刑徒，這是與處置其他類型的逃亡罪最大的不同。如嶽麓秦簡《亡律》載：

【春】司寇。【春】司寇、白粲、奴婢以亡，黥為城旦舂，黥奴婢顏（顏）顏，畀其主。（2062）^③

奴婢亡而得，黥顏（顏）顏，畀其主。·其自出吏及自歸□□（2117）^④

□□主，不自出而得，黥顏（顏）顏，畀其主。之亡徼中蠻夷而未盈（0161）歲，完為城旦舂。奴婢從誘，其得徼中，黥顏（顏）顏；其得故徼外，城旦黥之；皆畀主。（0186）^⑤

從 2062、2177 號簡可知，奴婢逃亡被捕獲後先黥顏顏，然後送還主人。秦律對奴婢逃亡的處罰規定，亦被漢律沿用，如《奏讞書》所載漢高祖十一年的案例，祿之婢媚逃亡，吏當：“黥媚顏（顏）顏，畀祿”。^⑥又如《二年律令·亡律》載：“□□顏畀主。其自出毆（也），若自歸主，主親所智（知），皆答百。”^⑦“顏”前面的內容由於竹簡殘泐不得而知，但是根據後文“自歸主”可以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26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356-357 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1 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1 頁。

⑤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1-72 頁。

⑥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2 頁。

⑦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0 頁。

判定律文與奴婢逃亡相關。“黥顏頰，畀其主”是秦漢處置奴婢逃亡的慣用手段，故“頰”至少可以增補“黥顏”二字。

0161 與 0186 號簡是對逃亡或被誘引至蠻夷地區的奴婢的懲處條例，這其中又分多種情況。一種是奴婢逃亡到徼中蠻夷地區時間未達一年的，完為城旦舂；前文雖缺失，但可推測其內容當是有關奴婢逃亡至徼中蠻夷地區而時間超過一年的要“黥顏頰，畀其主”的規定。“黥顏頰”比“完為城旦舂”的處罰要更重些。另一種情況是奴婢被引誘到徼中蠻夷地區的，亦要“黥顏頰，畀其主”。第三種情況是奴婢被引誘到徼外蠻夷地區的，將“城旦黥之”。“徼中蠻夷”“徼外蠻夷”與“縣道”一樣，可作為行政區劃名使用，如嶽麓簡 2065+0780 號“誘隸臣、隸臣從誘以亡故塞徼外蠻夷，皆黥為城旦舂；亡徼中蠻夷，黥其誘者，以為城旦舂；亡縣道，耐其誘者，以為隸臣”，^①所謂徼中蠻夷是指服從秦統治的少數民族政權管轄區，與睡虎地秦簡中出現的“屬邦”性質相近；“徼中蠻夷”依舊由蠻夷實際控制，秦朝政府並不委派官員前去管轄，這也是與“道”最為顯著的差別。徼外蠻夷與徼中蠻夷相對，指不接受秦統治的少數民族政權管轄區。故“徼”不能單純地解釋為“塞”，“徼中”“徼外”與地理上的遠近或無關係，較之“徼外蠻夷”，“徼中蠻夷”或離秦之核心統治區域更遠。“徼中”與“徼外”可能亦不是是否設置關塞、離秦國距離遠近為主要區別特征，而以是否臣服於秦國為標誌。

奴婢被引誘到徼外所受“城旦黥之”的刑罰比“黥顏頰”要重，所謂“城旦黥之”即施刑的方式如黥城旦一樣。奴婢逃亡至徼外將受“城旦黥之”之刑亦見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偕邦亡，出徼，得，論各可（何）毆（也）？當城旦黥之，各畀主。”^②“出徼”即逃亡到徼外，面對的懲罰是“城旦黥之，各畀主”。按照秦律規定，同時犯有數罪，祇論其情節最為嚴重的，而不累加它罪。故雖然人臣甲和乙還犯有偷盜罪，由於其情節不如逃亡到徼外嚴重，所以祇論其後者。如《法律答問》：“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當為盜不當？自出，以亡論，其得，坐臧（贓）為盜；盜罪輕於亡，以亡論。”^③

奴婢長期逃亡，期間可能組建新的家庭，對其家眷的處置嶽麓秦簡亦有相關律文，如：

奴亡，以庶人以上為妻，婢亡，為司寇以上妻，黥奴婢顏頰，畀其主。以其子為隸臣妾，奴（0168）妻欲去，許之。（0167）^④

奴逃亡娶庶人以上身份者為妻，婢在逃以司寇以上身份者為夫，被抓獲後，仍舊是黥其顏頰，遣送主人處，其所生之子為隸臣妾，允許奴妻離夫而去。從以上簡文還可以得知，奴婢的配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2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94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24 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8 頁。

偶若不知對方為亡人，當不會受到懲處；在逃奴婢的事實婚姻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果知道對方為亡人而與其結為夫妻，定會受到法律處罰，這一點可以從《二年律令·亡律》和《奏讞書》中找到佐證：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爲妻，及爲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爲謀(媒)者智(知)其請(情)，皆黥以爲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論。弗智(知)者不_□①

律：取(娶)亡人爲妻，黥爲城旦，弗智(知)，非有減也。②

依漢初律條，與亡人結為夫妻者，不論是否知曉對方亡人身份，均要黥以爲城旦舂。以理揣之，秦律亦應有相關律文，惜未見。

奴婢或可被免為私屬或庶人，這一點從《為獄等狀四種》“識劫媿案”可以證實；私屬或庶人逃亡將如何處置，秦律亦有相應條文：

免奴為主私屬而將陽闕亡者，以將陽闕亡律論之，復為主私屬。(1945)③

將陽即不經批准擅自出走，其逃亡時間在一年以內者。④ 闕亡指無符傳而私越關卡、且逃亡時間在一年以上者，邦亡指逃離秦故地。⑤ 嶽麓秦簡《亡律》對將陽、闕亡者有相應的懲罰規定：

闕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為將陽，鰕(繫)城旦舂。(0185)⑥

從 185 號律文可知，闕亡者會處以耐刑，將陽者會繫城旦舂，然無法得知其所針對的是所有人，還是特定身份者。

再次，對黔首逃亡的懲處。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統一六國後改民為黔首，以睡虎地秦簡見百姓未見黔首和里耶秦簡見黔首未見百姓驗之，史書所載不誣。黔首是秦帝國統治的基石，人數最多，是徭役的主要承擔者，也是最重要的租賦繳納者。鑒於黔首之重要性，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其進行控制，其中之一就是制定相關法律防止人口的隨意流動並對逃亡者加以懲處，茲錄嶽麓秦簡《亡律》相關律文如下：

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及遷(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2106)男女去，闕亡、將陽，來入之中縣、道，無少長，舍人室，室主舍者，智(知)其請(情)，以律遷(遷)之。典、伍不告，貲典一甲，伍一盾。不智(知)其(1990)請(情)，主舍，貲二甲，典、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1 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4 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4 頁。

④ 陳松長：《睡虎地秦簡中的“將陽”小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

⑤ 周海鋒：《〈為獄等狀四種〉中的“吏議”與“邦亡”》，《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4 期。

⑥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9 頁。

伍不告，貲一盾。舍之過旬乃論之，舍，其鄉部課之，卒歲，鄉部吏弗能得，它人捕之，男(1940)女無少長，伍人，誅鄉部嗇夫；廿人，貲鄉部嗇夫一盾；卅人以上，貲鄉部嗇夫一甲，令丞誅，鄉部吏主者，與鄉部(2057)嗇夫同罪。其亡居日都官、執灋屬官、禁苑、園、邑、作務、官道畝(界)中，其嗇夫吏、典伍及舍者坐之，如此律。(2111)免老、小未傅、女子未有夫而皆不居償日者，不用此律。(1941+2031)^①

諸遷(遷)者、遷(遷)者所包去遷(遷)所，亡□□得，遷(遷)處所，去亡而得者，皆耐以爲隸臣妾，不得者，論令出(1931)會之，復付遷(遷)所縣。遷(遷)者、遷(遷)者所包其有罪它(2123)縣道官者，罪自刑城旦舂以下。已論報之，復付遷(遷)所縣道官。遷(遷)者、遷(遷)者所包有罪已論，當(1962)復詣遷(遷)所；及罪人、收人當論而弗詣弗輸者，皆遷(遷)之。有能捕若訶告，當復詣遷(遷)所。(2045)^②

爲了鞏固邊防和加強統治，秦在統一六國後曾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將秦故地之人遷到新占領的地區，僅向嶺南一地就遷徙民衆 50 萬人。安土重遷乃人之常情，如何防止被遷徙者重返故園是決策者們不可回避的難題。上面所引二組簡文使得我們知曉秦代是如何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下面將分別討論之。

先弄清楚第一組律文首簡所涉及的地名及其相互關係是正確理解簡文意思的前提。“郡”與的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等地名并列，頗令人疑惑。秦實行郡縣制，郡縣等級分明，襄武、上雒、商等爲縣邑名，如何能與郡相提并論呢？尤其是函谷作爲關卡名，不屬於任何一級行政單位，怎麼能并列於後呢？又據《漢書·地理志》襄武屬於隴西郡，上雒、商屬於三輔之地（即秦內史郡所轄）。將秦內史郡所轄上雒、商與郡并列或許可以接受，畢竟其地位與一般的縣不同。然屬於隴西郡的襄武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或許應該考慮抄寫出現訛誤的可能性，然終歸是下策。仔細揣摩幾個地名之間的關係，換一種思路理解，簡文意思便顯得極爲暢通。

“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一句所涉及地名，位置最沒有歧義且戰略地位最爲重要的是函谷關。函谷關位於今河南省靈寶縣，古關遺址尚存，是秦人東出、東方六國西進的必經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史書上所載的“函谷關外”均指函谷關以東區域，則與函谷關外并列的“郡”或可理解爲設置在函谷關以西的郡。然襄武所在的隴西郡及上雒、商所在的內史郡均在函谷關以西，與“郡”所稱的區域重合了，顯然是說不通的。看來祇有進一步改變簡文的讀法，試着將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四個地名并列，而將“外人”單獨作爲一個語群，如此就會出現襄武外人、上雒外人、商外人、函谷關外人的組合。順着秦漢人以函谷關外指函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6-58 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2-63 頁。

谷關以東區域的思路，四個地名中位於最西面為襄武，則襄武外人指襄武以西的區域，以此類推，商外指商邑以南的區域。上雒位於秦內史郡之腹地，區域內無重要關隘，但是處雒水上游，是秦人東出的重要水上通道，故“上雒外”似可理解為上雒以東區域，與函谷關外所指區域重合，但是不會影響到整則簡文的理解。再來看襄武、上雒、商、函谷關這四個地名所圍成的區域，恰好是秦內史郡和隴西郡的一部分，也是秦的核心統治區域，也即是後邊簡文中所說的“中縣道”。秦疆域除去函谷關以西、商邑以南、隴西以西，剩下的郡祇有北地、上郡、九原、雲中等，故與“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並列的“郡”似指秦內史郡正北方的北地、上郡、九原、雲中等四郡所轄區域。

在明曉相關地名後，後文所說的“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男女去，闌亡、將陽，來入之中縣、道”一句纔好理解，中縣道所指區域也明晰起來。“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男女去”，指遷往內史郡以北諸郡、襄武以西、商邑以南、上雒和函谷關以東的人逃亡，驗之史料，秦每征占一片新的區域，必從關中地區移民實邊。最為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將大批中縣之人遷往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的史實。

“中縣”雖然數見於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之中，但是以往的解釋頗為含糊，其究竟代指哪些區域誰也沒有說清，嶽麓秦簡《亡律》材料的出現使得千年謎題得以解答。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簡文中所出現的“人”，秦律中指稱人時一般不用模糊概念，而是根據等級身份將人劃分為官吏、黔首、奴婢、徒隸、蠻夷等等。那麼律文中所出現的“人”應該包括所有的自然人，在此是一個中性概念，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因為被遷徙之人有官吏、刑徒、黔首、商賈、贅婿等等，故祇有用“人”這一概念纔可以涵括之。

此外，官吏逃亡的現象在秦代也時有發生，如《史記·張丞相列傳》載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又“避為吏”的記載數見於嶽麓秦簡，但嶽麓秦簡《亡律》中沒有發現專門針對官吏逃亡而制定的法律條款，不過這並不代表秦律原本沒有這方面的規定，祇是相關的文獻沒有保存下來或尚待發掘出來而已。

嶽麓秦簡《亡律》“亡不仁邑里、官者”條探析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歐 揚

內容提要 通過與相關出土秦漢法律文獻的對讀,可知嶽麓秦簡《亡律》中“亡不仁邑里、官者”之“仁”應讀作“認”,是指身份不明的逃亡者,睡虎地秦簡“不仁邑里者”、“亡不仁其主及官者”之“仁”亦當讀作“認”;《亡律》規定對“亡不仁邑里、官者”的處置方式“繫城旦舂作”,帶有勞役性質,但並不是刑罰;“群下吏毋耐者”包含“亡不仁邑里、官者”等各種案件未審結者,針對這類案件有專門的審理程序規定,相應案件的偵查取證有固定的模式,相關的司法公文書有專門的格式;“覆治”或“覆獄”并非局限於對已決案件的再次審查。

關鍵詞 嶽麓秦簡 亡律 秦律令 繫城旦舂 覆獄

嶽麓秦簡《亡律》中有一條新見的律文規定了官府對不明身份逃亡者的懲罰方式以及相關案件辦理方法,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見的信息,亦可修正以往學界對睡虎地秦簡相關內容的解釋,並加深對秦代刑事偵查程序的理解。為了討論方便,茲將整理者釋讀編聯的相關簡文彙錄如下:

1. 者已刑,令備貲責(債)。【亡不仁邑里、官,毋以智(知)何人毆(也),中縣道官詣咸陽,郡【縣】道詣其郡都(1978)

2. 縣,皆毆(繫)城旦舂,榑作倉,苦,令舂勿出,將司之如城旦舂。其小年未盈十四歲者,榑(1996)

3. 作事之,如隸臣妾然。令人智(知)其所,為人識,而以律論之。其奴婢之毋(無)罪者毆(也),黥其頤(顏)(2027)

4.類,畀其主。咸陽及郡都縣恒以計時上不仁邑里及官者數獄屬所執灋,縣道官別之,(1973)

5.且令都吏時覆治之,以論失者,覆治之而即言請(情)者,以自出律論之。(2060)

6.【匿】亡不仁邑里、官者,貲二甲。^① (2083)

整理者對這組簡文進行編聯的基本依據是簡背劃線,這六枚簡的簡背劃線連續而且都位於中下部靠近下端編痕繩紋處。前五枚簡的簡背中下兩道編痕繩紋之間見多道連續的線條狀痕迹,應是粘連在簡背上的某些物質造成的。綜合簡背劃線和簡文內容來看,整理者的編聯方案可從。從內容來看,簡文可分成三部分:一是明確“亡不仁邑里、官者”所指代的對象;二是規定對“亡不仁邑里、官者”即不明身份逃亡者的處置方式;三是規定“亡不仁邑里、官者”類逃亡案件的審理程序。下文分別討論。

一 “亡不仁邑里、官者”所指代的對象

簡1中的符號“丨”起分隔提示作用,之前的內容“者已刑,令備貲責(債)”屬上一條律文,之後的內容“亡不仁邑里、官,毋以智(知)何人毆(也)”為本條律文的起首。關於“亡不仁邑里、官”之“仁”,整理者注曰:

仁,讀為認,《玉篇·言部》:“認,識認也。”“亡不仁邑里、官”,指一類逃亡者,因不知其原籍縣鄉里和所屬官署,不能通過原籍地的戶籍資料和官署記錄確認其姓名等情況,故簡文言“毋以智(知)何人毆(也)”。^②

陳劍先生贊同此注對“仁”的解讀,並指出嶽麓秦簡《為獄等狀四種》有“仁”讀“認”的辭例。^③《為獄等狀四種》中的相關辭例均見於“田與市和奸案”,用例皆作“仁(認)奸”^④,即承認犯有奸罪。另外,尚在整理中的嶽麓秦簡《秦律令》部分亦有明確的“仁”讀“認”的辭例。

律文中有多個涉及身份確認的用語,如“識”、“知”、“別”等,亦可證實“仁”當讀作“認”。《亡律》云:“令人智(知)其所,為人識,而以律論之。”識,《說文》:“識,常也。一曰知也。”《玉篇》:“識,認也。”《詩·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玉篇》:“知,識也,覺也。”“認”、“知”、“識”三者互訓。不過,《亡律》中“認”、“知”、“識”三字所指似已有所分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該律釋文見46-48頁,簡背編聯圖版見34頁。下文省稱這條律文為“嶽麓秦簡《亡律》”或“《亡律》”。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5頁。

^③ 陳劍先生在2015年9月長沙“《嶽麓書院藏秦簡(肆)》審定研討會”上的發言。

^④ 相關釋文參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205頁。

化。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有鞠》：“遣識者以律封守”^①之“識”，用法與“爲人識”相類。《漢書·外戚傳上》：“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嫗，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嫗。”漢宣帝派官吏考問與王嫗同鄉里并且認識她的人，“識知者”指鄉里普通民衆，并不是指治獄官吏，這爲理解《亡律》“識者”提供了參考。關於“縣道官別之”之“別”字，整理者注釋認爲是決獄的意思。^②不過，從律文來看，“別”當是識別之意，指身份甄別。文獻中有“識別”用例，或可相參，如《後漢書·劉盆子傳》：“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緊接“亡不仁邑里、官”之後，律文云“毋以知何人也”，意即不能確認逃亡者的原籍或所屬官署，則無法獲知其人的名字爵位經歷等身份信息。“毋”、“不”同爲秦漢律令常見否定詞，“毋以知何人也”就是“不知何人”之意，是秦漢公文書中的固定用語，用來指代特定的身份不明者。這一術語凸顯了官府要求“知何人”，也即要明確相關人員的身份。

不能確認身份的特定之人或屍體，公文書中稱其爲“不知何人”，簡稱“何人”。如嶽麓秦簡《爲獄等狀四種》第151簡：

●即令獄史彭沮、衷往診：安、宜及不智(知)可(何)一女子死(屍)皆在內中，頭頸有伐刑痛。不智(知)殺者，【□□□□□】^③

此乃診文書，內容包括犯罪現場勘察以及屍體檢驗，由於女屍以及殺人者的身份不明，因此文書云“不知何一女子”、“不知殺者”。又如《後漢書·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李賢注：“何人，謂不知何人也。”“何人”、“賊傷”等用語與秦漢出土法律文獻中的用法如出一轍。

睡虎地秦簡中有兩處與“亡不仁邑里、官”相關的內容，分別辨析如下：

《秦律十八種·金布律》：稟衣者，隸臣、隸府之毋(無)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其小者冬七十七錢，夏四十四錢。舂冬人五十五錢，夏四十四錢；其小者冬四十四錢，夏三十三錢。隸臣妾之老及小平能自衣者，如舂衣。·亡、不仁其主及官(95)者，衣如隸臣妾。金布(96)^④

關於“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隸臣妾”一句，整理者注曰：“不仁，不忠實對待，此處即所謂犯上。不仁其主疑指私人奴婢(簡文稱臣妾或人奴妾)而言。”譯文曰：“逃亡或冒犯主人、官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48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5頁。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85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2頁。

長的臣妾，按隸臣妾的標準給衣。”^①可見，整理者是將“亡”與後文斷讀，將“仁”理解為“忠實”。參照前述嶽麓秦簡《亡律》的相關內容，這裏的“亡”應與後文連讀，“仁”亦應讀作“認”，識別之意。“亡不仁其主及官者”，指不能確認其主人的逃亡奴婢與不能確認其主管官署的逃亡者。嶽麓秦簡《亡律》包含了對逃亡的“奴婢之無罪者”的處罰，其“亡不仁邑里、官者”實際上包含了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亡不仁其主及官者”，即包括不能確認其主的逃亡奴婢。睡虎地秦簡《金布律》涉及刑徒稟衣，與嶽麓秦簡《亡律》之間也存在關聯，“亡不仁邑里、官者”所從事的勞役與“城旦舂”、“隸臣妾”相同，因此其稟衣等待遇亦參照刑徒給予。

《法律答問》：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何）論？當繫（繫）作如其所縱，以須其得；有爵，作官府。（63）^②

關於“不仁邑里者”，整理者在語譯中將其理解為“在鄉里作惡的人”。栗勁先生認為此“指那些破壞社會秩序而又沒有觸犯刑律的搗亂分子。”^③兩說皆值得商榷。

首先，“將上不仁邑里者”是動賓結構，包括了“將”和“上”兩種行為，“將”即“將司”，意為統領、監管，參見《亡律》“將司之如城旦舂”。“上”對應《亡律》的“中縣道官詣咸陽，郡縣道詣其郡都縣”以及“恒以計時上不仁邑里及官者”，應是監管人員押解逃亡者至上級官署并附相關文書的意思。在類似的語法結構下，兩部文獻都省略了“亡”字。其次，據“當繫作如其所縱”，可知“不仁邑里者”是要“繫作”的，與《亡律》“繫城旦舂作”和“作如隸臣妾”的規定相吻合。由於存在不祇一種類型的“作”，因而概言“繫作如其所縱”，意即根據監管對象是繫城旦舂還是作如隸臣妾來確定對監管者的懲罰。因此，“不仁邑里者”之“仁”，亦當據嶽麓秦簡《亡律》，讀作“認”，意指不能確認其邑里籍貫的逃亡者。

總之，睡虎地秦簡中兩處涉及“亡不仁其主及官者”、“不仁邑里者”的律文，分別是對其稟衣和監管者責任的規定，內容與嶽麓秦簡《亡律》吻合，皆指身份不明的逃亡者，因此，應據《亡律》將其中的“仁”讀為“認”。

此外，在睡虎地秦簡中還有一處涉及“仁”字的讀法和理解問題：

《秦律十八種·行書律》：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毆（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184）令。書廷辟有日報，宜到不來者，追之。行書（185）^④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2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08 頁。

③ 栗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401 頁。此說收入《秦簡牘合集》，參見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220 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61 頁。

關於“不可誠仁”，整理者注曰：“意應為不足信賴。”^①則是將“誠仁”作動詞表信賴之意，然而在文獻中幾乎找不到類似的辭例。根據前述相關討論，不排除這裏的“仁”也當讀為“認”的可能，意指識認或認知能力。律文禁止“老弱”與“不可誠仁(認)者”行書，兩者并舉，其共同點是不具備行書所必須的體力、智力等能力。另，從圖版來看，“誠”字筆畫殘缺，也不能完全排除為“識”之誤釋的可能。如此，則“不可誠(識)仁(認)者”與“亡不認邑里、官者”關係密切，也有可能是指身份不明的“作如隸臣妾者”。

綜上，根據嶽麓秦簡《亡律》提供的信息，可以修正以往學界對睡虎地秦簡相關簡文的認識。嶽麓秦簡《亡律》“亡不認邑里、官者”指代所有的不明身份逃亡者，包涵了睡虎地秦簡所涉及的“亡不仁其主及官者”、“不仁邑里者”等人群。

二 處置“亡不仁邑里、官者”的方式

簡 1-3：“中縣道官詣咸陽，郡【縣】道詣其郡都縣，皆繫(繫)城旦舂，轉作倉，苦，令舂勿出，將司之如城旦舂。其小年未盈十四歲者，轉作事之，如隸臣妾然。”

這是對“亡不仁邑里、官者”的處置方法。綜合整理者的相關注釋，其大意是：“中縣道官署遣送此類人至咸陽，諸郡縣道遣送這類人至郡治所在縣，在咸陽、諸郡治所在縣集中的此類人，都以對待城旦舂的方式將其拘繫，轉作於倉，令其舂米而不能讓他們外出，監管此類人如同監管城旦舂。如果是年齡未到十四歲的此類逃亡者，則轉作役使，如對待隸臣妾一般。”

刑徒處置方式以十四周歲為界劃為兩類，應是秦律令之慣例，然而身份不明逃亡者的戶籍資料或刑徒資料尚未查閱，其年齡無法確認，此規定恐難以施行。或許更適合此處的是見於睡虎地秦簡的以身高判斷刑事責任能力的方式。

對滿十四歲成人的懲處方式“皆繫(繫)城旦舂，轉作倉”，結合前引《法律答問》“不仁(認)邑里者”須“繫作”的規定，可省稱為繫城旦舂作，其人屬於繫城旦舂作徒的一類。不過，《亡律》中“繫城旦舂作”的性質，應是對相關人群的暫時的處置以及監管方式，而不是正式的刑罰。試分析如下。

第一，此處“繫城旦舂作”不是刑罰。定罪量刑的前提是確定罪人身份以及查明犯罪情節，嶽麓秦簡《亡律》針對身份不明逃亡者，規定查得實情後要按律處理。此處繫城旦舂作是確認身份前的處置。秦人不將其當作刑罰看待，否則不必在查得實情之後對其執行律令規定的刑罰。

與“亡不仁邑里、官者”相類的群體，睡虎地秦簡所見有“群下吏毋耐者”，相關簡文如下：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61 頁。

《秦律十八種·司空》：……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櫨櫨杖。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贖贄(134)責(債)於城旦，皆赤其衣，枸櫨櫨杖，將司之；其或亡之，有罪。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所弗問(135)而久繫(繫)之，大嗇夫、丞及官嗇夫有罪……(136)^①

《秦律十八種·工人程》：隸臣、下吏、城旦與工從事者冬作，爲矢程，賦之三日而當夏二日。工人程(108)

《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內史雜(192)。

《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爲官府佐、史及禁苑憲盜。

內史雜(193)

先梳理“群下吏毋耐者”的含義。第一，“群”。《左傳·哀公五年》：“寘群公子於萊。”杜注：“群或作諸。”此處即《左傳》常見的“諸公子”。可見“諸”“群”都訓衆，“諸”是常見的律令用語，律令中的“群”當與“諸”同義，即諸種、各種。第二，“下吏”。睡虎地秦簡整理者注釋《工人程》“下吏”：“秦漢時把原有一定地位的人交給官吏審處，稱爲‘下吏’，如《史記·叔孫通傳》：‘於是二世命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此處係名詞，指被‘下吏’的人。古書中或稱下級的官吏爲‘下吏’，與簡文不合。”^②按，“下吏”之意與文獻所見“屬吏”同，見《史記·高祖本紀》：“（沛公）乃以秦王屬吏”。《正義》：“屬，付也。”亦同於“下有司”，見《漢書·宣帝紀》：“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交付罪囚給具體官署的情況，見《漢書·張馮汲鄭傳》：“於是（皇帝）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可見“屬廷尉”、“下廷尉”意思相同。“下吏”這一術語源於“某人（官署）將某罪人（及其案件）交付某官署處置”的固定語法。整理者認爲被下吏者是“原有一定地位的人”，我們認爲無此限制，前引漢文帝將地位普通的罪人交付廷尉處置。辭例多見皇帝將有地位罪人交付官署，整理者當是因此產生誤解。第三，“毋耐者”。執行耐刑以後必然成爲某類刑徒，而未執行者則否，參見《二年律令·具律》第90-91簡：“有罪當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爲司寇，司寇耐爲隸臣妾。隸臣妾及收人有耐罪，繫（繫）城旦舂六歲。繫（繫）日未備而復有耐罪，完爲城旦舂。”^③“名耐”指確定罪人的刑徒名類，如耐爲司寇、耐爲隸臣妾等。“群下吏毋耐者”的案件未審結，無法執行刑罰，導致這一類人沒有類似司寇或隸臣妾那樣明確的刑徒身份。綜上，秦簡中“下吏”指被交付相關官署拘繫的罪囚，其案件未審結，未被執行耐刑等刑罰。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1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5頁。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1頁。

根據秦律《工人程》《內史雜》的規定來看,“下吏”有從事工的勞役的,也有在官府從事勞役的,律令對其在官府從事勞役的範圍有限定。與《亡律》關係密切的是繫於城旦舂勞作的“群下吏毋耐者”。

“群下吏毋耐者”應包括“亡不仁邑里、官者”。首先,秦律《司空》云“所弗問而久繫(繫)之”,“久繫”在秦漢律令中多指長期拘繫而其案件未決者,《漢書·刑法志》:“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所弗問而久繫(繫)之”所針對的顯然不是已經審結的刑徒如“鬼薪白粲”等,而祇能是“群下吏毋耐者”,因為其案件未審結,所以律文規定吏有責任“問”,而不能拖延不訊問導致其“久繫”。這與嶽麓秦簡《亡律》關於吏要時時覆問“亡不仁邑里、官者”的規定吻合。其次,“群下吏毋耐者”居於城旦舂,其“皆赤其衣,枸櫞櫟杙,將司之”,與城旦舂刑徒待遇同,這與《亡律》滿十四歲的“亡不仁邑里、官者”應“將司之如城旦舂”的規定吻合。

總之,在城旦舂勞役場所的“群下吏毋耐者”包含各種案件未審結的罪人,“亡不仁邑里、官者”即屬於其中的一類。

第二,“繫城旦舂作”被用作對不明身份逃亡者的處置方式,與作為逃亡犯罪之刑罰的“繫城旦舂作償亡日”存在聯繫。以下是陳松長先生舉出并予以比較研究的兩則律文:

嶽麓秦簡《亡律》:闕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為將陽,馾(繫)城旦舂。(185)^①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吏民亡,盈卒歲,耐;不盈卒歲,馾(繫)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償亡日。其自出馾(也),笞五十。給逋事,皆籍亡日,輒數盈卒歲而得,亦耐之。(157)^②

關於《二年律令·亡律》第157簡的規定,日本學者福島大我將其列表如下:

	一年未滿	滿一年以上	自出	逋事
無爵者	繫城旦舂 償亡日	耐(司寇)	笞五十	籍亡日
有爵者	作官府 償亡日			

原表注:亡律(157)にみる逃亡規程^③

陳松長先生指出,“秦漢簡文中將‘耐’刑作為比‘繫城旦舂’更重的一種處罰,也許是當時對刑罰輕重認識的正常現象。”^④兩則律文明顯存在傳承,對不滿一歲逃亡者的懲罰都是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9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0頁。

③ [日]福島大我:《秦・前漢初期における國家と亡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の研究》,東洋文庫,2014。

④ 陳松長:《嶽麓秦簡〈亡律〉初論》,第五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1月),258頁。

“繫城旦舂作償亡日”，是對情節較輕的逃亡行為的刑罰，嶽麓秦簡《亡律》以此作為對不明身份逃亡者的處置方式，一是因為“繫城旦舂作償亡日”不屬肉刑，不會對人身造成不可恢復的傷害，所以查得實情之後，作徒就可以按照律令處理，而一旦受過肉刑，如果後經查實，其罪不至此，就很難予以糾正了；二是秦朝官方意圖通過強制勞役這種方式逼迫不明身份逃亡者交待實情，刑罰“繫城旦舂作償亡日”有期限即逃亡時間“亡日”，而“繫城旦舂作”無期限。如果逃亡時間不滿一年，那麼逃亡者供認實情對自身有利，如果逃亡時限超過一年或者有其他犯罪等，逃亡者可隱瞞實情，但要付出無限期勞作的代價，從官府角度看，沒有浪費勞動力。

另外，《二年律令·亡律》規定逃亡不滿一年的公士以上有爵者以“作官府償亡日”的刑罰代替“繫城旦舂作償亡日”，這一優待見於前引《法律答問》：

《法律答問》：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何）論？當穀（繫）作如其所縱，以須其得；有爵，作官府。（63）^①

其中“有爵，作官府”，對應《二年律令·亡律》“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償亡日”。可見《二年律令》這一優待有爵者的規定是對秦律的承襲。

第三，“繫城旦舂作”有強制勞役的性質。^②尚無堅實的證據表明秦人明確區分暫時處置措施與刑罰，“繫城旦舂作”兼具兩種功能就是證明。

“繫城旦舂作”在秦律中有多種功能，從前文所述諸多律文和法律文獻來看，其有時是獨立適用的刑罰，有時是加刑或對刑徒的特殊管理方式，有時是對不明身份逃亡者以及其他案件未審結者的處置。

關於“繫城旦舂作”之“繫”，參照《為獄等狀四種》與《奏讞書》中的相關內容來看，其特定功能在於描述未決案件的罪囚是否被官府控制，如《奏讞書》案例三：“疑闡罪，繫，它縣論，敢讞之。”從嶽麓秦簡《亡律》可知，對未決案件罪人的“繫”，不僅僅控制其人身，在某些情況下還帶有強制勞役的內容，如對不明身份逃亡者的處置就是“繫城旦舂作”，秦政府絲毫不浪費被拘繫罪囚的勞動力，前述對“群下吏毋耐者”的強制勞役也說明此點。

即使官府一直無法查明“亡不仁邑里、官者”的身份，無法對其處以相應的刑罰，《亡律》對其強制勞役的規定，實際上也對其進行了一定的懲罰。這也是秦律令針對實際問題採取的應對和解決辦法。

另外，嶽麓秦簡《亡律》規定了對藏匿逃亡者行為的刑罰，刑罰輕重取決於逃亡犯罪的輕重。即使無法查證逃亡犯罪者的身份，對藏匿這類逃亡者的行為也要進行處罰，“【匿】亡不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08 頁。

② 嶽麓秦簡《亡律》“繫城旦舂作”不符合當代刑法理論中“刑事強制措施”的概念，後者不包括勞役。

仁邑里、官者，貲二甲。”由此可見，秦政府不允許任何逃亡者和藏匿逃亡者的人逃避處罰，即使案情無法查明，對身份不明逃亡者進行強制勞役，對相關藏匿者進行處罰，就是必然的了。

三 “亡不仁邑里、官者”案件的審理程序

簡3-6：“令人智(知)其所，為人識，而以律論之。其奴婢之母(無)罪者毆(也)，黥其離(顏)頰，畀其主。咸陽及郡都縣恒以計時上不仁邑里及官者數獄屬所執灋，縣道官別之，且令都吏時覆治之，以論失者，覆治之而即言請(情)者，以自出律論之。【匿】亡不仁邑里、官者，貲二甲。”

這是對“亡不仁邑里、官”類逃亡案件的審理程序規定，其末附有對藏匿這類逃亡者行為的處罰規定。

綜合整理者的相關注釋，其大意是：“令人辨識其居所，如果為人識認，則對其按律論罪。如果是除了逃亡以外沒有其它犯罪行為的奴婢，黥其面部顴骨處，交給其主人。咸陽和諸郡治所在縣每年上計時提交這類人的數目以及案卷給其屬所執法。縣道官甄別此類人的身份，郡都吏不時審查此類案件，對論罪有失的官吏追究責任，如果審查的時候供述實情，則以自出的相關律文規定處理。藏匿此類逃亡者的人，貲二甲。”

不明身份逃亡者按律集中於咸陽或郡治所在縣，而其未決之案件也轉交二千石官，如簡文所見“屬所執灋”，此處的執灋就屬於二千石官。^①雖然甄別身份的工作還是由縣道官負責，但案件是由二千石官派遣“都吏”來辦理，辦案工作稱“覆治”而非普通的“治獄”。

關於二千石官派都吏覆治，亦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

《二年律令·具律》：乞(乞)鞠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乞(乞)鞠，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116)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117)^②

《二年律令》對乞鞠案件辦理的相關規定，與嶽麓秦簡《亡律》對不明身份逃亡案件辦理的規定，存在類似之處。首先，都是縣道官將案卷上交二千石官。其次，二千石官都指派都吏“覆治”案件。但兩類案件存在性質上的不同，乞鞠案件是縣道官已判決的案件，而不明身份逃亡案件是未審結的。這兩類案件的辦理都稱“覆治”，可見不能把“覆治”或“覆獄”的理解局限於對已決案件的再次審查，還有其它類型案件的“覆治”。“覆治”由二千石官負責，

^① 關於嶽麓秦簡所見“執灋”，參見陳松長《岳麓秦簡中的幾個官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24、25頁。

這是其最大特征。秦及西漢初期的最高官秩就是二千石,所以如果“執灋”或其它官署再將案件進一步上交,也是交付給其它二千石官。“覆治”或“覆獄”的官署稱“覆獄治所”,數見於里耶秦簡牘。里耶秦簡 8-135 簡是關於“競陵漢陰狼假遷陵公船”案的文書,其中涉及“覆獄卒史”,《校釋》對“覆獄”一詞的注釋如下:

覆獄,張春龍、龍京沙先生注云:案件的覆核或重審。今按:《資治通鑒·秦始皇帝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胡三省注:“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字亦作“復”。《奏讞書》案例一八記云:“南郡卒史蓋廬、摯、朔,段(假)卒史鳴復攸雇等獄簿。”“蒼梧縣反者,御史恒令南郡復。”^①

根據嶽麓秦簡《亡律》來看,以上觀點需予以補正,“覆獄”之案件不一定是已經審判并執行的案件。

對於審理不明身份逃亡者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亡律》規定,要派人去逃亡者的居所查證其身份,并要求相關都吏時時覆治此類案件。一方面,規定要不時審訊不明身份的逃亡者,秦漢時代對罪人的訊問都要首先確認其身份,因此秦漢的司法官吏訊問罪人的爰書是以“名事里”起首的,這是固定格式。另一方面,管轄案件的官署派人去罪人戶籍資料所在縣鄉或都官查證其身份,是秦漢時代辦理任何案件所必經的程序,辦理逃亡犯罪的案件也是如此。總之,《亡律》規定以兩種偵查方式結合來查實逃亡者的身份和案情,從而按照律令規定對其處以刑罰。在多數情況下,官吏是以逃亡者交待的“名事里”與相應官署接洽來展開調查的,所以下文先分析訊問爰書的格式。

第一,由里耶秦簡牘等出土文獻可見,訊問爰書是以“名事里”起首的,即姓名、身份、戶籍所在縣鄉里。^② 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調查罪人的這些情況,因此“名事里”成為訊問罪人類爰書的開頭部分固定格式。

廿七年【八月丙戌,遷陵拔】訊歐辭曰:上造,居成固畜□□(里耶秦簡 8-209)^③

可見訊問爰書格式為:日期、負責訊問的吏、被訊問者名、事、里,之後纔是供辭的主體內容。

《亡律》從司法實際需要出發,規定不明身份逃亡者如供述實情即可按“自出律論之”,鼓勵其自首供述,目的是盡快對逃亡者定罪量刑,避免相關人員“久繫不決”。前引睡虎地秦簡《司空》關於“群下吏毋耐者”規定:“所弗問而久繫(繫)之,大嗇夫、丞及官嗇夫有罪”。即是給有關負責的官吏施加壓力,避免出現“久繫”者過多的現象。

第二,官吏通過文書知會有關官署調查相關人員居所鄉里的戶籍等資料,確認其供述的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簡稱《校釋》),第74頁。

② 對“名事里”的說明,可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6頁校釋3。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14頁。

身份。這種調查活動有時與派獄史去封守相關人員房屋財產同時進行。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覆”條：敢告某縣主：男子某辭曰：“士五(伍)，居某縣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論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問毋(無)有，幾籍亡，亡及逋事各幾可(何)日，遣識者，當騰騰，皆為報，敢告主。^①

廿六年七月庚辰朔乙未，遷陵拔謂學佾：學童拾有鞠，與獄史畸微執，其亡，不得，上奔牒，而定名事里，它坐，亡年日月，論云何，【何】罪赦，或覆問之毋有。與獄史畸以律封守，上牒。(里耶秦簡 14-18)^②

本文根據《封診式》諸條內容，對里耶秦簡 14-18 的釋文做了校訂，將此簡內容與《封診式》相比照，可知其為實用公文書。

與《封診式》“覆”條相比，里耶秦簡 14-18 更突出了從遷陵縣出發辦案的獄史畸的作用，獄史畸前往遷陵縣的學室調查學童拾的案件，帶有縣令拔寫給學室的管理人“學佾”(據里耶秦簡 15-172，此“學佾”名“亭”^③)的公文書，要求辦理兩事，第一是徵詢拾的相關信息，問題如上表所列，第二是要求“學佾”與獄史一起對學童拾的房屋財產進行查封，即“以律封守”。

值得注意的是，《封診式》“覆”條和里耶秦簡 14-18 都徵詢了“或覆問毋有”，《封診式》“有鞠”、“告臣”、“黥妾”等條也見此句，這是此類文書中唯一出現“或”字之句，“或”是解讀這類文書性質的關鍵。

《為獄等狀四種》與《奏讞書》中的“或”字經常是引出并列的定罪量刑意見，如《奏讞書》案例三：“·或曰：當以奸及匿黥春罪論”。^④可見“或”是另有人或另有官署的意思。“或覆問之毋有”，即文書涉及案件是否已經其它官署“覆問”。這彰顯此類文書本身是“覆問”文書，所以要詢問此案是否已經“覆問”。《封診式》“覆”條應得名於“覆問”，而“覆問”是覆獄官署徵詢的意思，相應文書是管轄此案的官署徵詢罪人原籍地或所屬官署的文書，里耶秦簡中可見如下實例：

□□月己亥朔辛丑，倉守敬敢言之：令下：覆獄還遷陵隸臣鄧

□□□名吏(事)、它坐、遣。言。·問之：有名吏(事)，定，故旬陽隸臣，以約為

□□□史，有還耐臯以上，穀(繫)遷陵未央(決)，毋遣毆。謁報覆獄治所，敢言(里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50 頁。

②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錄》，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232-234 頁。按，原釋文為：“廿六年七月庚辰朔乙未，遷陵拔謂學佾：學童拾有鞠，與獄史畸微執，其亡，不得，上奔牒而定名事里。它坐亡年日月，論云何，【何】辜，赦或覆問之，毋有。與獄史畸以律封守上牒。”

③ 參見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錄》，232-234 頁。

④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3 頁。

耶秦簡 8-136+8-114 正面)^①

引文標點據文意所有改動：“令下”“言”“問之”，《校釋》原來均與前後文連讀。這是倉守敬對“覆獄治所”所發覆獄公文書的回復，起首引用“覆獄治所”所發公文書的內容，即“令下……言”部分，要求調查并回復遷陵隸臣鄧的“名事、它坐、遣”，而“言”意為以文書上言。符號“·”後以“問之”起首的主體部分是倉守敬調查的結果，包括鄧的“名事、它坐、遣”等情況。因此“令下”“問之”應與後文斷讀；參考里耶秦簡 8-1077“□月及所遣。亟言。·今”^②，可見“言”是“亟言”之省，應在“言”前斷句。

此例證明“覆問”文書是管轄案件的官署對罪人原籍地官署或刑徒所屬官署的徵詢文書。

“覆問”文書和《奏讞書》《為獄等狀四種》所見“診問”文書有關，這一點日本學者宮宅潔、初山明已有闡釋。^③“診問”文書的內容來源之一就是相關官署對覆獄官署徵詢的回復，例如倉守敬的回復就提供了相應情況。

而“覆問”這種文書徵詢方式又是《亡律》“覆治”的必經程序，“覆治”就是辦理刑事案件偵查工作的統稱，刑偵工作如果沒有經過“覆問”，就不算最終確定罪人身份，不能對其定罪量刑。

《亡律》“令人智(知)其所，為人識，而以律論之”這一規定其實是辦理所有刑事案件必經的程序，辦理逃亡案件自然不能例外。可以參見《封診式》的“有鞫”“封守”等條。

四 結語

如前所述，《亡律》內容豐富而且與其它出土秦漢法律文獻聯繫緊密，不僅是研究秦代法制史的材料，也使我們得以一窺秦代官方的法律思想。從秦人視角進行分析，秦代黔首賦稅和徭役極重，而刑徒是沒有固定刑期的，奴婢也深受其主剝削，所以逃亡現象非常嚴重，與之對應的是嶽麓秦簡《亡律》篇幅可觀的規定。這正是《道德經》所言“法物滋彰盜賊多有”現象的寫照。既然身份帶來奴役，逃亡并隱蔽身份就成為擺脫奴役的方法。如此背景下，秦司法官吏會以類似“有罪推定”的心態視一切身份不明者為逃亡者，并且力求盡快查明其身份。在尚未查明身份時，秦政府也不會讓逃亡者順遂擺脫勞役的心願，“繫作”的規定彰顯了秦政府對逃亡者的嚴厲打擊以及法網的嚴密。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6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74 頁。

③ 參見[日]初山明著、李力譯《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0 頁。

放馬灘秦簡《日書》所見“土忌”神煞考釋

中國傳媒大學理工學部 梁 超

內容提要 對日書“土忌”神煞的討論,大都集中於睡虎地秦簡,對放馬灘等新出材料的關注不足。本文從數術原理的角度,考釋放馬灘秦簡日書中的幾種“土忌”神煞,在解析時日宜忌、干支規律的同時,修正和補充簡文,提出了新的看法:“土口月”即後世“土符”神煞;“人彼日”與“魯班殺日”有關;“咸池旱牛晨弇日”是“咸池”對應所“合”四地支與各季極盛的五行之氣相害;“地司空”日支的三合局五行屬性與月支的三合局五行相衝;簡 302 記載了“管(帝)為室”日和“土微”兩神煞“土禁”“地杓”,也出現於孔家坡簡和睡虎地簡;“土星”在其他日書中叫“司空”“土神”;“凶日”的地支與後世“血支”存在一致和相衝的關係。

關鍵詞 放馬灘秦簡 土忌 神煞 數術

對於日書中的“土忌”神煞,已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如劉樂賢、劉信芳、劉增貴等。^①不過這些研究大都集中於睡虎地秦簡(以下簡稱“睡簡”),對孔家坡、放馬灘等新出材料的關注並不充分。^②放馬灘秦簡(以下簡稱“放簡”)日書 1986 年出土於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秦墓,2009 年 8 月完整公布,其內容包括“建除”“置室門”“方位吉時”“土忌”等,是日書研究的重要材料。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劉信芳:《〈日書〉四方四維與五行淺說》,1991 年“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後刊於《考古與文物》1993 年第 2 期;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 78 本第 4 分,2007,675 頁。

^② 陳炫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2007 年 7 月;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156-159 頁。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數術原理的角度對放簡日書中的幾種“土忌”神煞進行考釋,涉及時日宜忌、干支規律的解析以及簡文校補。為行文方便,文中先列出放簡簡文,再列出與其他日書完全相同者。

在討論之前,先將日書中五行與季節、方位、月份、地支、天干、數字的配合關係列成表格,以備隨文察看。^①

表 1 五行配物表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節	春	夏	季夏、四維	秋	冬
方位	東	南	中、四維	西	北
月份	1、2、3	4、5、6	分在 12、3、6、9 各月部分	7、8、9	10、11、12
地支	寅卯辰	巳午未	丑辰未戌	申酉戌	亥子丑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數字	8	7	10	9	6
色彩	青	赤	黃	白	黑
五祀	戶	竈	中雷	門	行

一 土□月

放乙日書簡 135 壹:^②

子、巳、酉、寅、午、戌、卯、未、亥、辰、申、丑,凡是謂土□月,不可取土其鄉(向),壞垣;興垣其[鄉(向)],不死必亡。

按:此條簡文論起垣、壞垣朝向之忌,其神煞名為“土□月”,其中“□”字模糊不清,無法辨識,後世神煞中亦未發現相當者。不過這可能是原簡誤抄導致的,其中正月地支當為“丑”,十二月當為“子”,對調之後,排列如下:^③

① 此表轉引自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75 頁。後文不再標注。

② 本文所引放簡簡文出自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為行文方便,日書甲種簡稱作“放甲日書”,日書乙種稱作“放乙日書”,後文不再標注。

③ 本文繪圖參考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後文不再標注。



圖一：土口月/土符

可以看到,其時日安排與後世的“土符”完全相同,《協紀辨方書》卷六引《曆例》曰:“土符者,正月丑、二月巳、三月酉、四月寅、五月午、六月戌、七月卯、八月未、九月亥、十月辰、十一月申、十二月子。”^①

然而“土符”為何不利土事?尚需進一步說明。《協紀辨方書》卷六引曹震圭之言:“土符者,乃土地握符信之神,使掌五土也。假令春木旺,土受其克,故托子金以制之,是春三月曆巳、酉、丑也。夏火旺,土休,賴火為母以養之,故夏三月曆寅、午、戌也。秋金旺,土相,不畏木制,故秋三月曆亥、卯、未也。冬水旺,土亦剛堅,賴水以柔和之,故冬三月曆申、子、辰也。”其於曹氏之外又認為:“萬物生於東、旺於南、收於西、藏於北。而由北而東,則土之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也;由南而西,則土之所以盛美昌熾夫萬物者也;由西而北,則土之所以伏藏保固夫萬物者也。寅、巳、申、亥長生之位,則以丑、寅、卯、辰為其長生之符;子、卯、午、酉帝旺之位,則以巳、午、未、申為其帝旺之符;辰、未、戌、丑收藏之位,則以西、戌、亥、子為其收藏之符。故曰土符也。其有所忌者,亦猶月建之為土府,尊之,故不敢犯也。”^②

今按:《協紀辨方書》編者所謂“長生之符”“帝旺之符”“收藏之符”的說法構成不明。由簡文看,很像是將五行“三合局”某一屬性的“生、壯、老”地支分配給同一屬性的季節。

先說五行“三合局”。這是五行屬性的一種關係,睡簡、放簡、孔家坡漢簡(以下簡稱“孔簡”)日書中皆有說明。如放簡日書乙種 73 下-76 下云:“火生寅,壯午,老戌;金生巳,壯酉,老丑;水生申,壯子,老辰;木生亥,壯卯,老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又《淮南子·天文訓》說:“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

① [清]允祿等:《欽定協紀辨方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262 頁。

② [清]允祿等:《欽定協紀辨方書》,262 頁。

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①相互參照，“三合局”中的五行關係如下所示：^②



圖二：三合局

明白了“三合局”的關係，“土符”不利土事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春木旺，土受其克，故托金以制之（木金相克），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故正月丑、二月巳、三月酉；夏火旺，土休，賴火為母以養之，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故四月寅、五月午、六月未；秋金旺，土相，不畏木制，故七月亥、八月卯、九月未也；冬水旺，土亦剛堅，賴水以柔和之，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故十月申、十一月子、十二月辰也。

需要注意的是，簡文云：“其鄉（向），壞垣；興垣其〔鄉（向）〕，不死必亡。”可知其意義兼指日辰和方位。現將日辰和方位列表如下：

表2 “土□月”所見日辰方位排列表

月	日支	方位	月	日支	方位	月	日支	方位	月	日支	方位
正	丑	北	二	巳	南	三	酉	西	四	寅	東
五	午	南	六	戌	西	七	卯	東	八	未	南
九	亥	北	十	辰	東	十一	申	西	十二	子	北

二 人彼日

放乙日書簡 129 壹：

春子、夏卯、秋午、冬酉，是謂人彼日，不可築室、為嗇夫、取（娶）妻嫁女，兇（凶）。

①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269 頁。

② “圖二：三合局”轉引自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77 頁。

按：本簡“人彼日”的神煞名不見於後世，從簡文看為各季築室的禁忌日。試繪圖如下：



圖三：人彼日

簡文中提到不可築室，但土忌的數術原理究竟為何，尚無學者說明。這裏試加解析。關鍵性的線索仍是五行“三合局”（圖見上文“土口月”條）。五行中子、卯、午、酉分別為水、木、火、金之“旺”日，故此簡的意思是春季子日為水旺之時，夏季卯日為木旺之時，秋季午日為火旺之時，冬季酉日為金旺之時，動土需避忌。

這樣的日子在數術文獻當中稱作“不舉日”，如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春子、夏卯、秋午、冬酉，即不舉日也。”又稱作“天獄”，如《六壬大全》：“天獄：春子、夏卯、秋午、冬酉。”“人彼日”之所以不能築室，可能與“魯班殺”日有關。《玉匣記》云：“魯班殺忌豎造。春子、夏卯、秋午、冬酉。”魯班為古代建築工匠的祖師，可能是古代數術家認為魯班殺日是一個大忌日，因此建築之事，一定要避開這些時日。這種禁忌神煞與神話人物相關聯的情況，日書中頗為多見，如“赤帝臨日”“齒(蚩)尤死日”^①等，皆是其例。本簡中的動土禁忌當與此相同。

不過，為何此日不利“為嗇夫”“娶妻嫁女”？睡簡日書中有“天李”：

天李：正月居子，二月居子〈卯〉，三月居午，四月居酉，五月居子，六月居卯，七月居午，八月居酉，九月居子，十月居卯，十一月居午，十二月居辰〈酉〉。凡此日不可入官及入室，入室必威(滅)，入官必有罪。（《日書甲種》145背-146背）

對照日期後可以發現，天李中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所屬地支與本簡的季节日辰完全相同。其入官、入室的禁忌事項亦與放簡例中的“為嗇夫”“娶妻嫁女”基本一致。從這個角度解釋，放簡此處的“人彼日”似可讀作“人破日”，破謂“破敗”，與數術中“歲破”“月破”“破日”的含義一樣。

^① “齒尤死日”原釋“齒爪死日”，今從劉樂賢改釋。詳見劉樂賢《釋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幾個古史傳說人物》，《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三 咸池旱牛晨弇日

放乙日書簡 130 壹：

春乙卯、夏丙午、秋辛酉、冬壬子，是謂咸池旱牛晨弇日毆，不可垣其鄉（向），必死亡。

本簡含義不得其解。先看四個日子的性質。首先，春乙卯，月份、日干、地支三者皆屬木，是木盛之日；夏丙午，三者皆屬火，為火盛之日；秋辛酉，三者皆屬金，為金盛之日，冬壬子，三者皆水，是水盛之日。^①但與“咸池”有何關係？

我們認為，禁忌的原理與咸池的方位有關。咸池又稱大歲、大時，左（右）行於四仲之辰（卯、午、酉、子）。對於咸池，古人認為迎（“迎”即“向”）則凶，背則吉，左則凶，右則吉。此簡後文曰“不可垣其鄉（向）”，即不可向着咸池的方位。睡甲日書簡 96-99 正貳：“春三月，毋起東鄉（嚮）室。夏三月，毋起南鄉（嚮）室。秋三月，毋起西鄉（嚮）室。冬三月，毋起北鄉（嚮）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又簡 140 背-141 背：“春三月毋起東鄉（嚮）室，夏三月毋起南鄉（嚮）室，秋三月毋起西鄉（嚮）室，冬三月毋起北鄉（嚮）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意思與之相近。區別僅在於，睡甲日書是以迎“小歲（小時）”為凶，但其數術原理與此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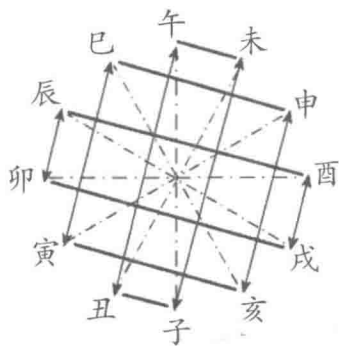
稍令人費解的是“咸池旱牛晨弇日毆”。晏昌貴釋作“咸池日，牛晨弇日毆”。^②按：細審圖版，原文不甚清楚，不能確定釋文是否正確。這裏暫對“弇日”試作解釋。“弇”或可理解作“合”，是五行學說中的一個概念。

我們知道，五行中有“害”“衝”“合”的說法。三者的相互關係，隋代蕭吉《五行大義》卷二《論害》已有論述。其文曰：“相害者，逆行相逢，於十二辰兩兩相害，名為六害。戌與酉、亥與申、子與未、丑與午、寅與巳、卯與辰，是六害也，是殺傷之義。今之相害……五行所害，其在破衝，今之相害，以與破衝合。”蕭吉的意思是說，地支間之所以“相害”是因為“與破衝合”，即“合”的對象（另一地支），是與對方相衝的。這樣的關係，蕭吉、劉增貴都有詳細說明，今以辰、卯為例，并附以圖表說明（見圖四）。^③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295-296 頁。

② 晏昌貴：《天水放馬灘秦簡乙種〈日書〉分篇釋文（稿）》，《簡帛》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③ “圖四：六衝·六合·六害”轉引自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91 頁。



本圖中虛線者為對衝（衝），粗直線者為合，兩頭有箭頭者為相害（害）。

圖四：六衝·六合·六害

有意思的是，本簡中的時日在後世又稱作“天轉”日，《淵海子平》說：“物極而反謂之轉，旺連天干曰天轉，旺連納音曰地轉，謂之天地轉。如春木旺之時，見乙卯乃天連天，謂之天轉。見辛卯乃旺連納音，謂之地轉。夏乃火旺，見丙午為天轉，見戊午為地轉。秋乃金旺，見辛酉為天轉，見癸酉為地轉。冬乃水旺之時，見壬子為天轉，丙子為地轉。地轉取納音為是，其日最忌，上官受職、出行商賈、造作、嫁娶，必主凶。命逢此日，必主夭折。”^①可見，神煞禁忌源遠流長。

本簡中季節、月份、干支、方位的對應關係可列表如下：

表3 本簡所見季節、月份、干支、方位對應表

季節	春	夏	秋	冬
月份	正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干支	乙卯	丙午	辛酉	壬子
咸池	卯	午	酉	子
咸池合	戌	未	辰	丑
咸池方位	東	南	西	北

四 地司空

放乙日書簡 134 壹：

卯、丑、寅、午、辰、巳、酉、未、申、子、戌、亥，凡是謂地司空，不可操土攻（功），不死必亡。

按：此簡說的是不可操土功，文獻中未見與之完全相同者（孔簡日書中有“司空”，但時日安排

^① [宋]徐子平：《淵海子平》卷一，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54 頁。按：《淵海子平》說的天轉地轉，是指干支或納音五行都專旺於四季。例如，春天的乙卯日，天干地支都屬木，專旺生於春天，所以為天轉。春天的辛卯日，天干辛納音屬木，地支又屬木，也專旺於春天，所以為地轉。其餘可類推。這類說法，又叫“天地轉殺日”，在現今民間擇日通書中廣為流傳。

亦與此不同),其數術原理,亦無學者解釋。這裏試作分析,繪圖如下:



圖五：地司空



圖六：地司空與五行三合局

據上圖五來看,這裏除了正月卯日、七月酉日、十月子日外,“地司空”中日支的三合局五行屬性與月支的三合局五行(見圖六)皆有相衝。例如,二月丑日三合局屬金,月支卯三合局屬木,金克木,故為二月土忌;三月寅日三合局屬火,月支辰三合局屬水,水克火,故為三月土禁忌,其餘可類推。至於正月卯日、七月酉日、十月子日,可能與咸池(大時)所對之辰有關(四月午日雖然與月支的三合局五行屬性有相衝,但應該也與咸池有關係)。《協紀辨方書》卷六引《神樞經》云:“大時者,將軍之象也。所值之日,忌出軍、攻戰、築室、會親。”曹震圭曰:“大時者,乃月建三合五行沐浴之辰也。蓋五行至此則敗絕,是最凶之辰也,故曰大凶之時。”可知咸池當非吉神,遇之尤凶。現將此四日與咸池所對地支列表如下:

表4 “地司空”與咸池所對地支

季節	春	夏	秋	冬
月份	正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咸池	卯	午	酉	子

五 畜(帝)為室

放乙日書簡 302 上半部分云:

春三月申、夏寅、秋巳、冬亥,戊子、庚申、癸未、己亥及戊己。

按:本簡祇有時日,沒有說明禁忌事項,孫占宇、晏昌貴均將此簡歸入“土忌”簡,但沒有進一步說解。^① 從時日順序看,簡文中的“春三月申、夏寅、秋巳、冬亥”指的是睡簡日書甲種中的

^①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159 頁。

“啻(帝)爲室”日：

春三月，帝(啻)爲室申，剽卯，殺辰，四廢庚辛。(96 正壹)

夏三月，帝(啻)爲室寅，剽午，殺未，四廢壬癸。(97 正壹)

秋三月，帝(啻)爲室巳，剽酉，殺戌，四廢甲乙。(98 正壹)

冬三月，帝(啻)爲室辰，剽子，殺丑，四廢丙丁。(99 正壹)

同樣內容亦見於放乙日書：

啻(帝)以春三月爲室亥，利卯，殺辰，四灋(廢)庚辛。(95 壹)

夏三月啻(帝)爲室〔寅〕，杓(剽)午，殺未，四灋(廢)壬癸。(96 壹)

秋三月啻(帝)爲室巳，杓(剽)酉，殺〔戌〕，四灋(廢)甲乙。(97 壹)

冬三月啻(帝)爲室申，杓(剽)子，殺〔丑〕，四灋(廢)丙丁。(98 壹)

兩相對照，可知睡簡簡文中的“亥”爲“辰”字誤寫。此外，金良年據五行三合局原理(木生亥，火生寅，金生巳，水生申)，指出睡簡中的春三月、冬三月爲室地支當依放簡改作亥、申。^①正確可從。所以此簡的意思是，春三月亥日爲木始生之時，木氣尚弱，不宜動土滋擾生氣，其他可以類推。故放乙日書云：“凡四時啻(帝)爲室日毆，不可築大室、內，大人死之。(99 壹)”

再看簡 302“戊子、庚申、癸未、己亥及戊己”的內容。“庚申”“癸未”“己亥”，三者較容易理解，對照納音六十甲子的五行屬性(見下表五)，^②“庚申”“癸未”“己亥”皆屬木，五行中木土相克，故不利動土。同理可知“戊子”當爲“壬子”誤寫。至於“戊己”，由於二者爲中央土盛之天干，土氣旺盛，故亦不利動土。

表 5 納音六十甲子所配五行屬性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金		水		火		土		木	
丑		金		水		火		土		木
寅	水		火		土		木		金	
卯		水		火		土		木		金
辰	火		土		木		金		水	
巳		火		土		木		金		水
午	金		水		火		土		木	
未		金		水		火		土		木
申	水		火		土		木		金	

① 金良年：《雲夢秦簡〈日書〉“啻”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 5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62 頁。

② 轉引自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75 頁。

續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酉		水		火		土		木		金
戌	火		土		木		金		水	
亥		火		土		木		金		水

這樣補充、更正後，放簡 302 上半部分的簡文當作：春三月申〈亥〉、夏【三月】寅、秋【三月】巳、冬【三月】亥〈申〉，戌〈壬〉子、庚申、癸未、己亥及戊己。

六 土微

放乙日書簡 302 下半部分云：

正月寅、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戌、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

其中“正月寅”，晏昌貴釋作“正月壬”，孫占宇對照圖版後認為原釋不誤。按：例中的“正月寅”當是“正月壬”之誤。睡簡日書中有“土微”：

土微：正月壬，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戌，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戌，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己^①，不可為土攻（功）。（《日書甲種》104 正壹）

對照後可以發現，放簡時日與此完全一致。這些時日在日書中又稱作“𠂔日”，“𠂔”通“陷”，為“地陷”之日，故不能作土事。關於“𠂔日”的內容，可參看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𠂔日”條說解。^② 這裏不再贅述。

七 土禁

放乙日書簡 133 壹：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土禁，不可垣。垣一版，貲；三版，耐（𠂔）；成垣，父母死。

按：土禁之名，文獻未見。其時日安排亦見於放乙日書，謂之“地杓”：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亥、未、戌、丑，凡是謂地杓，不可垣。穿地井，到𦵏（膝）

^① 按：原文作“乙”，劉增貴指出當為“己”字之誤。今從之。詳見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81 頁。

^②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81 頁。

少(少)子死,到要(腰)中子死,到夜(腋)長子死,到壘(頸)妻死,没人母父死。以它辰垣杓鄉(向),不死大兇(凶);以辰垣它鄉(向),吝(咎)。延行以杓辰鄉(向),必死亡。
(136 壹-137 壹)

孔簡日書謂之“大微”:

【正月司空在亥,大微在寅。】二月司空在酉,大微在巳。三月司空在未,大微在申。四月司空在寅,大微在亥。【五月司空在子,大微在】卯。六月司空在戌,大微在午。七月司空在巳,大微在酉。八月司空在卯,大微在子。九月司空在丑,大微在辰。十月司【空在申,大微在未。十一月司空】在午,大微在戌。十二月司空在辰,大微在丑。(219-220)

睡簡日書中還有:

正月寅、二月巳、三月未、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當其地不可起土功。(《日書甲種》131 背)

劉增貴指出,睡簡中的“當其地”一語顯示地支不祇代表日子,也代表方位。正、五、九三個月之地支方位是東方,二、六、十月南方,三、七、十一月西方,四、八、十二月北方。這種月份與方位的關係和太歲(咸池)相似,祇是運行方向為左行(東南西北,順時針)與太歲之月行於四仲(子、午、卯、酉)，“四斂日”之行於丑、戌、未、辰不同,而是每月隔三個干支跳躍一次。“當其地不可起土功”又可從孔簡日書《土功》篇得到證明。孔家坡漢簡“其嚮”的意義與睡虎地秦簡“當其地”相近。^① 上舉放簡日書“地杓”中有“以它辰垣杓鄉(向),不死大兇(凶);以辰垣它鄉(向),吝(咎)。延行以杓辰鄉(向),必死亡”,其中“以它辰垣杓鄉(向)”“杓辰鄉(向)”意義亦與此相近。唯“杓”字令人費解,從簡文意思看,“杓”有指向義,惜文獻中未見用例。“杓”或為數術用語,取名“地杓”或與此有關。

八 土星

放乙日書簡 132 壹:

亥、酉、未、寅、子、戌、巳^②、卯、丑、申、午、辰,凡是謂土星,不可興垣、土攻(功),大兇(凶)。

按:土星之名,文獻未見。孔簡謂之“司空”(例見上文“土禁”例)。睡簡日書謂之“土神”:

正月亥、二月酉、三月未、四月寅、五月子、六月戌、七月巳、八月卯、九月丑、十月中、

①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86-687 頁。

② 按:孫占宇釋作“己”,細查圖版,當作“巳”,今改之。

十一月午、十二月辰，是胃（謂）土神，無起土攻（功），凶。（《日書甲種》132 背- 133 背）

劉增貴認為，此項“土神”之忌，看起來很像是將五行三合局某一屬性的“生、壯、老”地支分配給同一屬性的季節，然後各季再互調其“壯”之對衝地支（子午對調，卯酉對調），例如木生亥、壯卯、老未，春為木，故正月亥、二月卯、三月未，但因卯酉互調，故二月為酉，其餘三季也是如此。所以四季之氣極盛之月（即三合局之“壯”月），反有相克之辰（二月酉，木金相克；五月子，水火相克，其餘二季亦同）。究竟是否如此，目前尚難下結論。^①

九 凶日

放乙日書簡 301：

正月丑酉、二月寅申、三月卯未、四月辰、五月巳亥、六月午戌、七月卯未、八月申寅、九月酉丑、十月戌、十一月辰巳、十二月巳亥，凶日，不可以

按：此簡未記有禁忌事項，從文中僅知此神煞叫作“凶日”，孫占宇將其歸入“土忌”簡。至於此簡的五行關係、數術原理，尚無學者解釋。此外，從各月的地支看，簡中還存有脫字的現象。這裏一并試加解析。

首先，從簡文地支及月份來看，本簡應該是逐月運行的神煞，以每月兩地支日為凶日。茲根據逐月兩地支的運行，圖繪如下：^②



圖七：凶日

以上內圈數字為月份，內圈起於丑日，外圈以酉日為始，逐月依次運行。我們可以發現圖中的地支排列中“卯”“戌”“辰”“亥”多有重複，誤抄的可能性很大。我們根據地支的運行規律

①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87-688 頁。

② 繪圖 1、圖 2 參考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94 頁。

對地支做了改正,從運行看較為可能。

改正後的時日排列如下:

正月丑酉、二月寅申、三月卯未、四月辰【午】、五月巳亥、六月辰午、七月卯未、八月申寅、九月酉丑、十月戌【子】、十一月亥巳、十二月子戌,凶日,不可以

圖繪如下:



圖八:凶日(修正後)

由於“凶日”的神煞不見於後世,後世之神煞亦不見於正月兩地支者,因此我們試從運行軌迹上入手。先看內圈的地支,正月起丑、二月在寅、三月在卯,以下依次順行。其時日安排與建除的“閉日”完全一致,後世稱之為“血支(神煞名)”。而外圈中正月起“酉”的地支正與“血支”起點的地支“丑”相衝。

日書中關於“閉日”記載如下:

閉日:可以波(破)渴(竭),^①入人、奴、妾。(放甲日書 20 貳)

閉日,可以劈決池,入臣徒、馬牛、它生(牲)。(睡甲日書 25 正貳)

閉(閉)日,可以蓋藏(藏)及謀,毋可有為也。(睡乙日書 46 壹)

閉日,可以入馬牛、畜生(牲)、禾粟,居室,取(娶)妻,入奴婢,破隄(堤)。(孔簡日書 24)

從上引文例看,波(破)渴(竭)、劈決池、破隄(堤)皆與破壞有關,可理解為不利建造。

劉增貴曾指出,以衝破、反向等方式產生的兩個相反神煞,在吉凶上不但不相反,反而具有相輔相成的性質。^②“凶日”為“土忌”神煞,或可由此理解。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此簡後文殘缺,未見具體禁忌內容,視作“土忌”簡似乎缺乏證據,有待後續相關材料的證明。

^① 原釋“沒池”,宋華強改作“波渴”,可從。詳見宋華強《放馬灘秦簡日書識小錄》,《簡帛》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②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695頁。

音聲與軍政：論秦漢軍鼓及相關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孫聞博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金鼓”作為進退節制與信息傳遞之具，在軍事實踐中使用廣泛。旗、金、鼓三類指揮用具中，鼓的作用較為突出。戰國秦漢“金鼓”的分類及使用，參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並結合考古文物資料，有望獲得更深入認識。圖像資料中，建鼓與鞀鼓形成的“鼓、鼓鞀”組合，引人注目。與軍鼓相關群體有鼓下卒、鼓史等。居延漢簡所見“歌人”，是軍中供長官驅使，主要在列陣、校閱等場合參與儀式的群體。無論訓練作戰、城守備禦，還是駐屯候望、傳置送迎，軍鼓及相關鼓令作用重要。夜間用鼓、“卧鼓”典故及《光武紀》“椎鼓數十通”的含義所在，均可在鼓制探討中，得以揭示。

關鍵詞 軍鼓 《兵車器集簿》 鼓—鼓鞀 歌人 鼓令

中國古代軍事活動中，常以“金鼓”為進退節制與信息傳遞之具。“金”指鈺、鐃，“鼓”指鼓、鞀。^①秦漢軍鼓的使用是秦漢軍事制度的重要方面，也是認識秦漢時期軍隊組織管理及軍

*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准號16XNB012）。

① “金鼓”有時或被理解作其中一種。《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上》：“撝金鼓，吹鳴籥。”顏注：“金鼓謂鈺也。”北京：中華書局，1962，2542頁。《釋名·釋兵》：“金鼓。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247頁。

事文化的重要途徑。由於資料有限且較為零散,相關探討很少。^①今主要從秦漢軍鼓的特徵、分類,軍鼓樂的相關人員身份,作戰、城守、日常管理中鼓的使用幾方面展開,以期增進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一 “金鼓”辨正——以簡牘、圖像為中心

戰國秦漢軍隊的信息指揮用具,為旗、鼓、金三類。《管子·兵法》云: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②

“五教”是五種教習、訓練兵卒的方法,“九章”是九種環境下的行軍。而“三官”——鼓、金、旗——作為軍事調動時三種號令指揮,則居二者之前。所謂“有三令而兵法治也”。而“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③作為指揮作戰、發起進攻的號令所出,又居“三官”之首。《司馬法·嚴位》“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所記軍鼓七種指揮功能,第一種即為指揮旌旗。《吳子·治兵》還見有“聞鼓聲合,然後舉旗”的說法,也是先“鼓”後“旗”。

金鼓分類,較早見《周禮·地官·鼓人》“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④習慣多稱作“六鼓四金”。所叙順序為前“鼓”後“金”,“金”主要輔助“鼓”,作節制之用。先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六鼓”按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列,也是祀事在前,戎

① 以往研究,多在器物研究的樂器條目下統而論之。代表性論著如:[日]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九 樂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422-424頁;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71-89頁,2010年復有修訂版(下文引用據後者);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29頁;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305-364頁。而專論很少,如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39 旌旗,符節,金鼓,騎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初版為文物出版社,1990),176-180頁;王子初《音樂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9-77,130-147頁。

② [清]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4,319頁。

③ 江瀚云:“任”,當也。《春秋傳》所云,“一鼓作氣”也。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通:《管子集校》,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254頁。

④ 《周禮注疏》卷一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720-721頁。

事在後。^① 鄭注并提示各鼓形制、尺寸差異。雷鼓、靈鼓、路鼓爲八、六、四面，至“鼓軍事”之“鼗鼓”以下，始爲兩面。^② “四金”是鎛、鐃、鐃、鐃。鎛即鎛於。鐃出現較早，體短而闊，無舌，有小大之分。中空短柄在插入木柄後，或手執、或口朝上置於座上。鐃有舌，是大鈴的一種。^③ 至於鐃，鄭注：“鐃，鉦也，行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④ 今人錢玄更言：“按《周禮》無‘鉦’字，即用‘鐃’字。”^⑤ 《周禮·夏官·大司馬》記田獵時，“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及“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有助於增進對“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的認識。

秦漢軍用金鼓，較早材料見秦始皇陵兵馬俑坑 1 號坑。T10 五過洞、T2 二過洞車輿所存鼓迹處，各發現有三件鼓環，對應兩枚軍鼓。^⑥ 以標本 T10G5:01242 爲例，鼓環爲“環首、柄作方鍵形，柄上有長方形穿，穿內橫貫一長方形銅片”。此外，九過洞車前及五過洞車的右前角各出土有一件甬鐘。^⑦ 又，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具體提到：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1)

乘輿鼓。鼗八百廿四(35)

乘輿木枹千(?)三百廿五(36)

乘輿鉦車鼓車武庫手車十八乘(37)

乘輿鼓二百一十五(42)

乘輿淳於鉦鐃卅四(43)(以上爲第二欄)

乘輿鼓上華卅五(45)

乘輿鼓枹百廿七(47)

乘輿鼓拊五十六(48)

① 祀事的“神”“社”“鬼”，由高到低對應天神、地祇、宗廟。戎事依性質、程度，則先軍後役。“金奏”指鈃鐘類樂器演奏，故在最後。

② 《說文·鼓部》：“鼗，大鼓謂之鼗。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從鼓賁省聲。”《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

③ 鎛於、鐃、鐃的考述，具體參見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第七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0-283、292-293、296-298 頁；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33-343、381-387 頁。

④ 《說文·金部》：“鐃，鉦也。從金，蜀聲。軍法：司馬執鐃。”

⑤ 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262 頁。按《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等辭書多解釋“鐃”爲“鐘狀的鈴”，則易生歧義。鈴形小而有舌，“鐃”如爲“鉦”，則形大而無舌。

⑥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上册，229、231 頁。

⑦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上册，229-230 頁；下冊，175 頁。今按：王學理改名作“鐃”(《指揮系統與指揮權——秦俑陣營裏透漏的信息》，《文博》1988 年第 3 期)。不過，此兩器內部均既無舌又無納舌裝置。另有意見將其定爲鉦(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314 頁)，未見解釋。這裏暫從原整理者意見。“四金”之外，“金鼓”之“金”可能還涉及甬鐘。

乘輿木鉦椎? 廿一(51)

●右乘輿兵車器五十八物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58)

鼓鞮四千七百廿五(128)

鼓拊百廿(130)

鼓枹四千二百卅三(131)

鼓枹八百卅三(132)

淳於鉦鏡鐸千八十(133)

鞮拊卅四(137)

鉦淳於椎六百一十四(139)(以上正面)

將軍兵車比二千石將□鼓車一十六乘(157)

鉦車八乘(159)

鼓車六乘(160)

鼓上飭十(221)

●右庫兵車種(?)百八十二物二千三百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四(236)

●凡兵車器種二百卅物三〈二〉千三百廿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237)(背面)^①

此為尹灣漢墓 M6 所出 6 號木牘。據篇題,年代為西漢成帝永始四年(前 13)。木牘兩面書寫,正面 6 欄、背面 5 欄。據筆者重新統計,每欄實際為 21-26 行,每行 2-25 字。記錄分乘輿兵、車器與庫兵、車器兩類。每類及全篇結尾皆有集計,共 140 種,23268487 件。^② 李均明已對此木牘做過較全面分析,並認為所記武庫性質“有可能是漢朝設於東南地區的大武庫”。^③

而從上所摘引涉及“金鼓”內容的簡文,我們又可獲知以下幾點認識。軍事上使用的鼓、鉦等器物,當時可直接稱為“兵器”;鼓車、鉦車,則歸屬“車器”。^④ 關於“乘輿鼓。鞮八百廿四”(35),李均明注意到下文復提到“乘輿鼓二百一十五”(42),並結合山東沂南畫像磚、河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103-118 頁。按簡文後括弧內數字為第一欄第一行以下的順序號。

②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尹灣漢墓簡牘》“前言”,2 頁。

③ 李均明:《尹灣漢簡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收入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86-120 頁。相關探討又參見張顯成《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名物釋讀札記》,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437-442 頁;李斌《從尹灣〈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看漢代兵種構成》,《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第 5 期;〔韓〕李成珪《前漢長安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於尹灣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之探討》,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411-437 頁。

④ 懸泉漢簡新見“□六月余大將軍衡鼓車壹帶二完(I T0110①:34)”,“傳馬一匹驪牝齒十一歲高六尺名曰溫驪十月庚午送大鼓車□□□病中不能飲食使□□□(II T0216①:13)”(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敦煌研究》2009 年第 2 期)。前者並可與這裏“將軍兵車比二千石將□鼓車一十六乘”(157)聯繫思考。

南新野畫像磚，指出前者應是“配套使用的大鼓與小鼓”。^①由此，鼓具體分作成套的“鼓、鼓鼙”及單獨使用的鼓、鼙。敲擊用具有“木枹”“鼓枹”，^②承鼓的闌足有“鼓柎”“鼙柎”。此外，又見有“鼓上華”“鼓上飭”。“鼓上華”，李文已釋。而“飭”“飾”通假。^③“鼓上飭”即“鼓上飾”，也是鼓上所使用的裝飾。

與鼓相對的“金”，《兵車器集簿》所見主要是淳於、鉦、鐃、鐸。這與《周禮·地官·鼓人》所記“四金”的敘述順序頗為近似。唯“鐸”，《兵車器集簿》作“鉦”，可一定程度印證前引錢說。淳於即鎛於，有意見認為“戰國晚期以後的北方地區，鎛於確實不再流行，故而出現上引《北史》所言人多不識鎛於的情況”。^④按《北史》所載，本自《周書》卷二六《斛斯征傳》“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征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鎛於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北朝距東漢已二百年，不能簡單推之以說明兩漢情形。尹灣漢簡出土地西漢屬東海郡、徐州刺史部，仍位於北方地區。而《兵車器集簿》中無論乘輿兵器，還是庫兵器，涉及金屬敲擊的軍樂多以“淳於”居首，顯示其地位依然重要且使用普遍。西安六村堡西漢手工業遺址出土有題銘“嚴鼓擊鈍（鎛）於左[臂]”（85）的樂俑範殘件。^⑤此外，時代為西漢初期的山東淄博齊王墓3號陪葬坑，發掘者指出其性質屬“兵器儀仗坑”。其中埋藏銅鏃、木弓、弩機、箭杆、彈丸等5000餘件，同時出土有一件鎛於。而西漢呂后時下葬的山東章丘洛莊漢墓，其中14號陪葬坑也出土有一件鎛於，^⑥均可作為例證。

至於敲撞金屬軍樂的用具，《兵車器集簿》提到有“乘輿木鉦椎？廿一（51）”“鉦淳於椎六百一十四（139）”。與“枹”相對，稱作“椎”。並且在使用“椎”上，更多被提及的是“鉦”及“鎛於”。按鎛於上端多有鈕，一般懸掛起來敲打。^⑦而鉦如何使用，需要考慮。以往有意見認為“鉦的使用方法當與鐃相類，亦是使其口向上敲擊發音的”，並據李純一意見，特別提到“鉦從其銘文走向判斷其使用方法并不合宜”。^⑧僅據銘文走向判斷使用方法，確需審慎。不過，目前所見兩周銅鉦，實際多為柄端有環、以供懸掛者。^⑨這一情形同樣不宜忽視。至於漢代銅鉦，“三年平周鉦”、“新莽侯騎鉦”祇有銘文流傳，形制不詳。^⑩而山東章丘洛莊漢墓14

① 李均明：《尹灣漢簡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110頁。

② 居延漢簡有“卅井吞虜隧鼓枹各一”（1976年甘肅文物隊居延調查所得）。“枹”又寫作“扶”。簡文參見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171頁。

③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416頁。

④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四章，383頁。

⑤ 熊龍：《孚堂藏秦漢陶範所涉名物叢考》，收入《孚堂藏秦漢陶範題刻》，北京：中華書局，待刊。

⑥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⑦ 早期論說見[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一“古鎛於”條，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348-349頁。

⑧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四章，376頁。又，李純一：《無者俞器為鉦說》，《考古》1986年第4期。

⑨ 相關資料參見高至喜《兩周銅鉦研究》，《考古學報》2006年第3期。

⑩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105頁上欄；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297頁。

號陪葬坑出土有一件銅鉦,甬爲空心圓筒狀,一側有小圓孔;^①河南襄城所出新莽天鳳四年銅鉦,柄中部有半圓形環;^②新莽地皇二年侯騎鉦,“甬與鉦身連接處有可用於穿繫懸掛的鈕”;^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館所藏東漢“鳳凰牯牛坪鉦”,甬首端附十字形環鈕。^④四器應該均可繫繩,進行懸掛。聯繫尹灣《兵車器集簿》中,相對“鼓桴”“鼙桴”,却暫未發現固定與安置金屬樂器的闌足、器座,則這裏與錚於一併敘述的鉦,很可能也是懸掛起來進行敲擊。前舉章丘洛莊發現有“銅錚於、鉦、鈴樂器架”一套,架子的“梁上等距離嵌入三個鐵吊環,自南向北分別懸掛着錚於、鉦和鈴各一件”,^⑤亦可爲證。

漢代畫像中樂舞題材豐富,而直接反映軍鼓的材料却不多。^⑥戰國銅器紋飾有一類爲“水陸攻戰圖”,^⑦其中有軍鼓。如山彪鎮銅鑿花紋有三座建鼓,^⑧均位於戰船船尾,用以指揮作戰。建鼓上端植有羽旌,有的還橫置擊鼓者隨身攜帶的戟;下端爲半圓形鼓跗,^⑨自鼓跗各有一向上挑起的圓形物。學界一般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爲是丁寧,即鉦一類金屬樂器。^⑩另一種則認爲是小鼓。^⑪前者并舉《左傳·宣公十四年》“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而潞城潞河戰國墓所出銅匱,刻畫有鼓下置鉦者,^⑫與《左傳》記載相合。^⑬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不過,潞河戰國墓銅匱所刻畫鼓下爲何物,還可以討論。^⑭而山彪鎮水陸攻戰圖中人物、兵器、用具刻畫,無疑較銅匱又更爲寫實。這種情形下,唯獨構圖之中的“丁寧”均改繪作較爲抽象難辨的圓形,使人略感疑惑。從其他畫像看,不僅鐘鐃,即便形體不大的鈴、鐸一類,

①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9頁。又,孫機提到“山東臨淄齊王墓3號陪葬坑出土一鉦”(《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179頁)。今按:原發掘簡報中稱“甬鐘”。且據所繪綫圖,屬“甬鐘”可能性大,故這裏暫不納入討論。

② 姚壘:《襄城縣出土新莽天鳳四年銅鉦》,《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③ 呼嘯:《新見王莽地皇二年侯騎鉦考論》,《秦漢研究》第5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178-182頁;《新見王莽地皇二年侯騎鉦》,《上海文博論叢》2011年第3期。

④ 此鉦“1976年9月出土於湘西鳳凰縣竿子坪鄉牯牛坪村,同時出土的還有銅壺、東漢五銖錢等物,銅鉦共2件,此爲其中之一”。《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 湖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149頁。

⑤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9頁及圖版陸-3。

⑥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39 旌旗,符節,金鼓,騎吹”,176-180頁。

⑦ 目前發現四種,資料介紹及分析參見李零《中國的水陸攻戰圖和亞述的水陸攻戰圖》,收入其所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64-377頁。

⑧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山彪鎮 M1:56 銅鑿花紋。

⑨ 先秦鼓座偶見於湖北、安徽等地,資料不多,近年發現有春秋晉國蟠螭紋青銅鼓座,形制上均與此十分相似。參見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擂鼓墩二號墓清理發掘組:《隨州市擂鼓墩二號墓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江漢考古》1981年第1期;湖北省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期;《保利藝術博物館藏青銅器》,2006,25頁。

⑩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23頁。楊泓、李零、孫機等多贊同此說。

⑪ 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61-62頁。

⑫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縣潞河戰國墓》,《文物》1986年第6期, M7:156-6。

⑬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四章,397頁。

⑭ 李純一將此類形制者多歸入“鐃”。參見其所著《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321-323頁。

在與鼓出現在同一畫面時也是較為寫實的。^①而在漢代畫像中，建鼓周圍所置除鉦、鈴外，更多是小鼓，數量一至四者不等，具體圖像正為圓形。^②考古資料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認識。前舉洛莊漢墓同時出土有建鼓一套。發掘執筆者指出，“在大鼓的南北側分別有2件小鼓”，“每件小鼓上均鑲嵌着1件銅樺形插件，以與大鼓插件相接。另外，還發現銅銷釘2件，其大小正好插入銅插件的旁孔中，它們是用於固定插件的”。^③至於周圍小鼓與建鼓形成組合，除通過懸掛、樺卯固定外，還有另伸支架以承托者。如常見的沂南漢畫像石戲車。^④大鼓下另有支架，承托有小鼓一枚。此畫像設計較為立體，更多圖像還是二維視角的刻畫：由建鼓中部或鼓跗伸出兩個支架，其上各承托一圓形物。^⑤將這些與置於地上的鞞鼓，^⑥及大鼓周圍所懸掛小鼓比較，彼此是相像的。而支架承托小鼓的這種造型，則又與水陸攻戰圖中所見軍鼓圖像，頗為類似。如再參考前引尹灣漢簡《兵車器集簿》所提示的三點信息：1. 相對“乘輿鼓”，出現有“乘輿鼓、鼓鞞”；2. 鉦暫未見到用以安插的器座，似多懸掛使用；3. 乘輿車與庫車中，鼓車、鉦車均各為一類，即鉦并非簡單安裝到鼓架上組合使用，軍鼓在配套組合時，形成“鼓、鼓鞞”一類組合鼓的情形，值得注意。

二 鼓下卒、鼓史及歌人身份考析

文獻中常見“鼓下”一語，實指軍門所立建鼓處。《後漢書》卷一七《岑彭傳》“光武知其謀，大怒，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李賢注：“中軍將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⑦西北漢簡中有“鼓下卒”“鼓下官奴”等身份：

應皆署鼓下為罷卒治車至五月甲子罷食食起應乃遂成出就事與遂成所持刀(19·33A)

乙卯鼓下卒十人徒一人(513·29)

戊午鼓下卒十人徒二人(509·16)^⑧

□縣泉佐賞受鼓下趙子春(ⅡT0114②:43)^⑨

① 南陽市博物館、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東關漢畫像石墓》，《文物》1980年第3期，71頁圖六。

②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96 樂器 I 打擊樂器”，435頁；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61-62, 71頁；李均明：《尹灣漢簡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110頁。

③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9頁。

④ 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圖版98。

⑤ 湯池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四卷《江蘇、安徽、浙江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12頁；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65-66頁。

⑥ 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65頁。

⑦ 中華本校勘記：“中〔軍〕將〔軍〕最尊 據《刊誤》改。”《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672頁。

⑧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1、623、615頁。

⑨ 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51頁。

以食鼓下官奴慶等十五人,迎護羌使者……(I0116②:7)^①

陳夢家就居延簡“鼓下卒”稱“凡此或爲屯戍軍中的鼓卒,與報警之鼓恐有分別”,後有學人在此基礎上以爲“具體所指似爲一處所或機構”。^②簡 19.33A 作“皆署鼓下”,顯示設有具體崗位,進而部署人員。簡 513.29、509.16,皆出土於大灣(A35),^③編號較爲臨近,很可能屬同一簡冊。“戊午”爲“乙卯”後第三干支,當即之後第三天。官方每日對這一群體似尚有所檢點。鼓下卒、徒是否存在輪值情形,也值得考慮。而參考“鼓下官奴”的表述,上引“徒一人”“徒二人”與“鼓下”的聯繫,也需考慮。

軍中專司軍鼓者稱鼓吏,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有如下資料:

孫方吏士卅五人嘉禾二年十一月直其一人三斛卅二人人二斛二人鼓(鼓)史人一斛五斗其(貳·3880)

嘉禾元年十一月直其六十九人人二斛八人鼓史人一斛五斗□訝奉(俸)米四斛其□(貳·7495)

嘉禾元年四月全殘□□其一人全直(?)四斛六十人凌人□斛十人鼓(鼓)史人五斗
嘉禾元(貳·9079)^④

“鼓”書作“𦔑”。《潜夫論·救邊》提到“今數州屯兵十余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⑤上引當爲嘉禾元年(232)、二年(233)軍隊吏士領取月直簡。依獲糧數量,“鼓史”在軍中地位低於一般兵士。《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補引《漢官儀》提到地方社會上的鼓吏形貌:“鼓吏赤幘行滕,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按文獻中,“史”“吏”通假多見,^⑥“鼓史”或即“鼓吏”。而《後漢書》卷八〇下《文苑列傳·禰衡》載曹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李賢注引《通史志》“岑牟,鼓角士冑也”。當時“鼓角士”,尚有專門冑具。

軍隊中除鼓下吏、鼓史外,還見有“歌人”身份:

出歌人伯史名(511·23A)

■右歌人十九人(511·23B)^⑦

①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6頁。

② 以上參見趙寵亮《居延新簡〈女子齊通耐所責秦恭鼓事〉殘冊復原與研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2頁。

③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867、871頁。

④ 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796、870、902頁。按簡貳·9079首字低格書寫。

⑤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潜夫論箋校正》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267頁。

⑥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417頁。

⑦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619頁。

王子今較早關注這則材料，並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① 特別是在討論“歌人”和邊塞軍人生活的關係時，注意與“出入名籍”結合來考慮相關勞軍性質，並留心南北朝以後出現的“營妓”“營倡”身份，給人啓示頗多。^② 這裏在此基礎上略作探討。按簡 511.23 背面作“右歌人十九人”，字首并加方形墨點，作為“提示小結與合計”，^③ 屬木簡正面。此簡正、背面的標識似可對調。而簡文“出歌人伯史名”中，“歌人”之下緊接書寫有“伯史”語，需要注意。這實際交代了兩種身份。此簡之前，或另有“右伯史若干人”的小計。關於“伯史”身份，《續漢書·百官志三》“少府”條記“尚書”，本注曰“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騶伯史”，當斷作“騶、伯史”，是兩類群體。漢代“騶”有“駕騶”“騶騎”兩種。^④ 尚書左丞所主“騶”，應是“騶騎”一類。而“伯史”，文獻更多寫作“伯使”。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提到“尚書郎伯使二人……伯使從至止車門還”。^⑤ “伯使”為官府驅使以供服務之人。而應劭《漢官儀》的記載值得注意：“伯使，主為諸侯官驅，使避路於道陌中，故言伯使。”^⑥ 《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伯使”條“吏名，漢朝置。掌為諸官驅使清路”的解釋，^⑦ 恐怕即據此而來。這與高級官員出行時，儀仗隊列中的“伍伯”、“辟車”有類似的地方，^⑧ 且名稱上也較相近。由此而言，“伯使”、“伯史”主要為官府驅使，常充當出行儀仗者。簡文“歌人”與“伯史”連稱，對判斷前者身份當有幫助。《漢書》卷七六《韓延壽傳》又記：

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紬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榮，植羽葆，鼓車歌車……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陞列立。

“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在韓延壽所主持的東郡都試中，“歌車”與“鼓車”并舉。因韓氏後以儀式僭越而被定罪，這類用車或許出現在更高等級的軍隊校閱中。“歌車”，推想當是歌者立於特製車上謳歌。“鼓車”亦屬軍用車種。除前舉尹灣《兵車器集簿》外，《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序》云“建武十三年（37），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

① 王子今：《居延漢簡“歌人”考論》，收入其所著《古史性別研究叢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243-253 頁。

② 王子今：《居延漢簡“歌人”考論》，251-252 頁。又，陳直、沈頌金推測這裏“歌人”為秋射服務，但未展開分析（《漢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377 頁；《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267 頁）；趙寵亮則認為上述兩說“無法坐實”（《行役成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321 頁）。

③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73-74 頁。

④ 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下編第四章，北京：三聯書店，2009，375-376 頁。

⑤ [清]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周天游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206 頁。校勘記：“諸引中唯《後漢書·鐘離意傳》注引作‘伯使一人。’”213 頁。

⑥ [清]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周天游點校，155 頁。

⑦ 呂宗力：《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北京出版社，1994，435 頁。

⑧ 《續漢書·輿服志上》“環駟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鞵云”。《後漢書》，3651 頁。

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它國所獻千里馬被用駕鼓車,而“鼓車”又特別與“騎士”對舉,正反映了這種性質。《漢書》卷五三《武五子傳》記燕刺王劉旦覬覦帝位,“遂招來郡國奸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李賢注引《續漢書》“南縊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而“歌者先居射室”“嗷咷楚歌”,則體現“歌者”在內郡都試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徵。前引“歌人”簡出土於大灣(A35),即肩水都尉府所在地。作為張掖郡部都尉,肩水都尉在當時軍事檢閱等活動中使用“歌人”,是可能的。^①

由上,居延漢簡所見“歌人”,由張掖郡肩水都尉府直接統領,是軍隊中供長官驅使,主要在列陣、校閱等場合充任儀仗、參與儀式的群體。

三 征行、城守與軍鼓使用

軍鼓如何使用?在征行、城守、駐屯候望及傳舍管理中又如何發揮作用呢?

《吳子·治兵》提及兵衆動員:“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大體分單擊與合搯。單擊有五輪,分別進行操持兵器、演習陣法、迅速就食、就緒裝備、集合整隊。之後軍鼓齊搯,樹起旗幟。對於已組軍隊,統帥借助軍鼓,進行全方面指揮。前引《司馬法·嚴位》“七鼓兼齊”,即涉及信號、兵種、器械、人員朝向及步伐等多種。

至於進一步指揮,《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提到孫武對吳王宮中姬妾的操練:“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②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 115 號漢墓木簡中有“聞鼓音,左部前曲左右官後,遂皆左間,客口”(329)、^③“鼓音,左部前曲左”(330)、“前,復聞鼓音”(332)、“口右官,鼓之,右部前”(384)內容的殘簡,^④亦有體現。在諸婦人“大笑”不聽指揮,孫武“斬隊長二人以徇”加以整肅後,“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列陣後按鼓聲操練,有“規矩繩墨”的嚴格規範。前、後、左、右進退外,基本內容還包括原地跪、起。^⑤

① 陳直考察《韓延壽傳》,云“居延漢簡甲編八七頁,有簡文云:‘右歌人十九人。’蓋為張掖太守舉行秋射時之歌者,與本傳文正合”。《漢書新證》,396 頁。

② 《尉繚子·勒卒令》提到“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③ 簡文所見漢代軍隊編制,“官”分左右,二“官”為“曲”,統 100 人,官長稱“官吏卒長”“五百將”“五百”(參見李零《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性質小議》,《考古》1983 年第 6 期)。這裏“左右官”當均屬“左部前曲”。

④ 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5、38 頁。標點為筆者所加。

⑤ 《周禮·夏官·大司馬》“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及衝鋒、後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中,多次出現的“坐”“作”,應即指“跪”“起”一類動作。

兩軍對陣時，《尉繚子·勒卒令》提到“金、鼓、鈴、旂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當屬“鼓之則進”。楊泓論古代車戰，還提示“車上的指揮系統。它們安置在主將和各級將領的車上”，其中“一種是指揮進攻的鼓。其餘的戰車都是跟着主將的鼓聲向前衝鋒的，所以在戰鬥開始以後，主將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保持鼓聲不停”。^①《尉繚子·勒卒令》又云“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旂者有誅”。這又反映兩點：一是軍鼓依敲擊頻率，來指揮軍隊齊步、快步或是跑步前進。所謂“步鼓”“趨鼓”“驚鼓”也；二是軍鼓還憑所發音調、音色，體現命令發出者身份。所謂“將鼓”“帥鼓”“伯鼓”也。^②

夜戰時，軍鼓作用更為重要。《孫子·軍爭》“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吳子·應變》“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勢備》也提到“權者，晝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戰也”（三六二）。^③《漢書》卷五四《李廣傳附孫陵傳》記李陵領步卒與匈奴大戰後，欲退往遮虜郭，有“擊鼓起士，鼓不鳴”的描述。《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記班超發於寘擊莎車，而龜茲亦發兵助莎車。班超召將校及於寘王謀議，又有“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於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的計謀。而夜間警戒更依靠擊鼓。《周禮·地官·司徒》“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鄭注：“鼙，夜戒守鼓也。”鄭玄語與《說文》同。《說文·鼓部》云“鼙，夜戒守鼓也。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而昏、夜半、旦明擊鼓之“禮”，更早見《司馬法》。《周禮·地官·鼓人》注引《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唯文字稍異。^④至於夜間警戒守備所用軍鼓形制，則屬大鼓。《周禮·春官·鐸師》“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鄭注：“守鼙，備守鼓也。鼓之以鼙鼓。”稍晚《宋書》卷一九《樂志一》記載略異：“長丈二尺者曰鼙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鼙。”^⑤

除征行、作戰外，城守時對軍鼓的使用也值得注意。《墨子·備城門》、《備梯》、《旗幟》、《號令》、《雜守》諸篇多有涉及。按內容可分三類：敵人來犯時的報警通告；攻城時的號令指

① 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貳 戰車與車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23頁。

② 實際作戰時，除中軍所建大鼓外，其他軍官也持有不同類型軍鼓。《周禮·夏官·大司馬》有“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的說法，旅帥以上皆持鼓。這裏，《尉繚子·勒卒令》“帥鼓”下則出現“伯鼓”，略有不同。

③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釋文63頁。今按：“送戰即致戰，謂致己方欲戰之志於敵人”，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84-85頁。

④ 《周禮·夏官·掌固》亦提到“夜三鼙以號戒”，鄭注引杜子春曰“讀鼙為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

⑤ 《說文·鼓部》“鼙，大鼓也”，段注引《毛傳》“鼙，大鼓也，一丈二尺”，《廣韻·平豪》“鼙，役事車鼓，長丈二尺”。

揮;及城內安全警戒。

報警性信息傳遞,首先涉及距離較遠的郵亭傳應。《墨子·雜守》云“亭一鼓,聾錠。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毋舛逮”。此言舉烽之後,又要擊鼓五下,用鼓傳之。并用火報告寇數多少。^① 具體到所在城池守衛,則一般派出斥候偵查、瞭望。《墨子·雜守》又云“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斥候主要在外郭駐紮,設置田表,樹立旗幟。“即見寇,鼓,傳到城止。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其所爲。其曹一鼓”。^② 此指斥候見寇至即擊鼓,以鼓聲傳遞到城中爲止。而所置表一般有三人守護,守表者同時掌有一鼓。守城主官會數派騎、吏行旁巡視。及至寇抵城下,擊鼓而集結兵員,《墨子·號令》云“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即城樓上擊鼓五次,隨後四周擊鼓以應和,從軍者要在鼓聲響起後迅速集結。如小鼓五擊後纔趕到集合地點,有罪。^③ 同篇復提到“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可對照參考。而在敵人攻城過程中,依照對方前進或退却情形,《墨子·旗幟》記守城者擊鼓以不等次數,並與旗、火配合使用。相關信號可製表如下:

表1 敵人攻、退城池信號示意表

敵所在城池區域 ^④	敵進(晝)	敵進(夜)	敵退(晝)	敵退(夜)
前池外廉	鼓3、幟1	鼓3、火1	幟1	火1
水中周	鼓4、幟2	鼓4、火2	幟2	火2
藩	鼓5、幟3	鼓5、火3	幟3	火3
馮垣	鼓6、幟4	鼓6、火4	幟4	火4
女垣	鼓7、幟5	鼓7、火5	幟5	火5
大城	鼓8、幟6	鼓8、火6	幟6	火6
乘大城半以上	鼓無休、(幟6)	鼓無休、(火6)	(幟6)	(火6)

資料來源: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8,92頁

與野戰時己方進攻擊鼓、退却鳴金相比,城守則對方進攻時擊鼓,退却時去鼓。特別是敵人進攻時,軍鼓作用十分突出。

①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8,143頁。

② 今按:“其曹一鼓”下有“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岑仲勉以“望見寇三句復出前文,應是後來之注”,《墨子城守各篇簡注》,146頁。

③ 岑仲勉指出“此祇五鼓而不幟,猶未攻城也”。《墨子城守各篇簡注》,108頁。

④ 岑仲勉注:“前池,城前之池,廉,邊也”,“‘周’與‘洲’粵同音,池內浮起之地曰水中洲。藩者藩籬,馮垣在女垣外,女垣即外堞。”《墨子城守各篇簡注》,92頁。

而敵人攻城時，守軍更依靠軍鼓指揮，組織相關抵抗。《墨子·備城門》“人擅苴，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爵穴”是城堞上的一種孔穴。因大小僅可容雀，故而得名。此記敵人夜至城下，城上守軍，人持苴火。聽鼓令點燃苴火。鼓聲復響，則納苴火於爵穴中，照現敵人活動。待敵人實際攻城時，《墨子·備梯》云“爲爵穴、燔佩，施答其外，機、沖、棧、城，廣與隊等，雜其間以鑄、劍，持沖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之，技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機、沖、棧、城”是四種防範以梯攻城的作戰器具，據岑說，“機、技機也，沖、衝撞之器，棧、行棧，城、行城”。^① 這些裝備根據敵人進攻區域，布置出相應寬度，嚴陣以待。而根據攻城者情形，選擇“左右夾射，或重疊發射，或用技機投擲”，則均“以鼓發之”。同篇復提到“懸火，四尺一鉤機……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而然火，即具發之……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潰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機同杙，鉤杙即杙之鉤曲者，所以懸火具”。^② 這裏，應戰火具依敵人進攻綫對應布置，燃火使用也依統一指揮，所謂“立而待鼓”。至於敢死銳卒突襲敵人及返回，亦依“城鼓之音”而動。^③

四 駐屯候望、傳置送迎中的鼓與鼓令

軍隊駐屯，立起營壘。軍營所設門，習稱旌門，而門內常置軍鼓。《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國語·齊語》載鮑叔語“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韋昭注：“軍門立旌爲軍門，若今牙門矣。”“旌”即“旌”字異寫。“執枹鼓立於軍門”又見《史記》卷一〇四《田叔列傳》田仁薦任安語：“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鬥，仁不及任安。”王仁湘研究巴蜀徽識，列舉有一枚槌爲金井所出銅印章。^④ 因圖案中有懸掛的一組鐸形器物，王氏將其歸入“鐸形”組合。^⑤ 而畫面主體部分，正呈現旌門與建鼓的形象。^⑥ 與軍門建鼓相映，則有“卧鼓”典故。《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然後遠師振旅，囊弓卧鼓”。《後漢書》卷

①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45 頁。

②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47 頁。

③ 至於戰時城內安全警戒，《墨子·號令》云“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同篇還提到“屯陳、垣外街衢街皆爲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輦錠；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以火指；鼓所立、勿雞足置”。有事則擊鼓，以待吏來。吏到始停止擊鼓。夜間較難辨清情形，特用火指示。此外，關於晨、暮擊鼓開閉諸城門，《墨子·號令》記錄細緻：“莫，鼓擊門閉一闕，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晨暮，卒鼓以爲度”。

④ 王仁湘：《巴蜀徽識研究》，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28 頁圖六：3。

⑤ 王仁湘：《巴蜀徽識研究》，226-228 頁。

⑥ 有關巴蜀符號的相關分析，參見孫華《巴蜀符號初論》，《四川文物》1984 年第 1 期。

七九下《儒林傳下·謝該》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李賢注引《毛詩》“載橐弓矢”，稱“言今太平，橐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又，《後漢書》卷二〇《祭遵傳附從弟彤傳》范曄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雖然樂舞中鞀鼓使用較為靈活，^①漢代鼓類更有名“搏拊”者，^②無論手拍、杖擊，鼓面皆向上方，^③但軍用鼓類應主要以橫向敲擊為主，特別是號令所在的中軍大鼓，更是如此。故卧放軍鼓，成為戰事止息之喻。

至於屯戍候望中的軍鼓使用，陳夢家早年已論及：“漢簡鼓、表并用，似限於報時報平安。”不過，他同時又廣征《史記》卷四《周本紀》、《墨子·備城門》、司馬相如《子虛賦》及《太平御覽》引晉人蔡謨書信，提示軍鼓也有候望報警功能。^④後來學者雖有進一步論證，但僅主張前一認識，以為“確與‘報警之鼓’無關”。^⑤而我們注意到，居延、肩水金關守禦器簿中多次出現軍鼓。^⑥它們與其他守禦器列在一起，顯然不能僅用“報時報平安”解釋。東漢安帝時爆發嚴重羌亂。羌人東進，曾到達洛陽北面的河內郡。《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東號子麻奴》記“元初元年(114)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屯駐河內官軍在修建大量塢堡外，史文特及“設鳴鼓”一事，顯示軍鼓在相關防禦中的重要。又，新出懸泉漢簡“舉烽煙擊鼓舉烽煙旦屠□□”(IT0309③:283)，^⑦可與前論《墨子·雜守》“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屬之”相對照。其實，軍鼓這類功能，先秦時已普遍使用。著名的“烽火戲諸侯”典故，《史記》卷四《周本紀》實作：“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為數舉烽火。”“烽燧”之外，明確提到有“大鼓”。而《呂氏春秋·慎行論·疑似》更作：

周宅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

① 戰國楚墓所出材料較豐富，參見賈峨《再談信陽楚墓懸鼓及鼓簋的復原問題》，《文物》1964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鳥架鼓兩座楚墓的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第9期；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

② 馮漢驥：《論盤舞》，《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8期。另有學者將其命名作“節”，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72-73頁。

③ 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圖版85、100。

④ 陳夢家：《漢代烽燧制度》，收入其所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163頁。

⑤ 初師資：《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吳初驥：《漢代烽火制度探索》，均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171-178、242-243頁；趙寵亮：《居延新簡〈女子齊通耐所責秦恭鼓事〉殘冊復原與研究》，409-412頁。

⑥ 簡506.1、E.P.T49:13B、74.E.J.T37:1537-1558。參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608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61頁；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74頁。

⑦ 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52頁。

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①

“置鼓其上”“傳鼓相告”“幽王擊鼓”“因數擊鼓”等僅及軍鼓的記敘，更凸顯鼓的作用。這裏數言幽王親自擊鼓，以召諸侯援兵情形，細按文意，並參《周本紀》，當時遇緊急軍情首先敲擊軍鼓，然後依烽隧在晝夜間的不同使用規程，及時傳遞報警信息。聯繫“傳鼓相告”語，收到信號烽隧向鄰旁傳遞時，亦不排除同時擊鼓的可能。將此與《墨子》城守諸篇所見軍鼓使用相聯繫，當時屯戍候望中的報警通告、號令指揮，以及日常安全警戒，應當都離不開軍鼓的作用。

此外，懸泉漢簡還有驛置依所到官員等級擊鼓以不同次數的鼓令殘冊：

使者持節擊廿五鼓□(ⅡT0314②:222)

使者不持節擊十五鼓(ⅡT0314②:326)

長史到擊八鼓數之(ⅡT0314②:337)

守丞到擊六鼓數之(ⅡT0314②:349)

候丞縣丞尉秩三百擊三鼓□(ⅡT0113③:101)

官到鼓不趨鼓適二百里 不受教白有所辦除適事百里(ⅡT0114④:314)^②

目前所見，分使者持節，使者不持節，長史，守丞，候丞、縣丞、縣尉五個等級。經過懸泉置之官吏，多為中央奉命出行者及郡、縣佐官而非主官的一類長吏。而從長史到達擊鼓八通，守丞到達擊鼓六通；^③縣級佐官中，候丞居前而縣丞、尉居後的表述看，兼具軍政、行政功能的傳置，所用鼓令的軍事色彩更為突出。更始時，光武入河北，突遇王郎在邯鄲稱帝，反遭逐捕，不得不由幽州星夜南下。《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上》載路途中發生一事：

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餓，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

劉秀當時冒稱邯鄲使者，前往一傳舍飲食。因隨行者饑餓已久，用食爭搶失態，從而引起傳吏懷疑。傳吏為驗身份，假稱邯鄲將軍將到。與此呼應，特有“椎鼓數十通”之舉。驗之懸泉鼓令殘冊，長史以下諸吏抵達，擊鼓皆在十通以下。使者不持節則為十五通，僅屬“椎鼓十餘通”者。唯獨持節使者到來，擊鼓二十五通，合“椎鼓數十通”之意。王郎僭稱天子於邯鄲，

①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2009，607-608頁。

② 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52-53頁。

③ 兩簡末尾皆有“數之”語，發表者認為指重複數次。

“邯鄲將軍”為“天子”所派，將在外專制一方，得行專殺之權，實與持節使者為同一級別。故“冒稱”而未有持節的劉秀“官屬皆失色”，出現“光武升車欲馳”的舉動，“既而懼不免”的恐懼。一句略顯含糊的擊鼓描述，或許仍然傳達了傳置鼓制的基本內涵。

附記：文章完成後，承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先生、湘潭大學李斯先生與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看校追記：陳夢家先生《漢簡所見太守、都尉二府屬吏》（《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97-124頁）一文於“四 漢簡屬吏”之“(19)伯史”條，也言及歌人。相關錄文據《居延漢簡甲編》作“工、歌人、佰史名 右歌人十九人(511.23, 甲 2096, 大)”，解“工歌人應為樂工與歌人”，“太守府中有之，都尉府或亦有之”。而“伯史或佰史應為伯使”，并引《宋書·百官志》及《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蔡質《漢官儀》曰”以論(117頁)。請參看。

《二年律令·具律》所見“皆如耐罪然”試解*

山東政法學院 支 强

内容提要 《二年律令·具律》108 簡出現的“皆如耐罪然”，是解讀這一時期刑罰適用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皆如耐罪然”意指按照“同罪”“同法”等方式確定刑罰時，須參考執行“耐罪”的具體實行方式，其中可能包括不執行“收”。這種規定實際起到了緩和刑罰效果的目的。

關鍵詞 具律 法律用語 耐罪 刑罰

《二年律令·具律》107、108 簡：

告，告之不審，鞠之不直，故縱弗刑，若論而失之，及守將奴婢而亡之，篡遂縱之，及諸律令中曰與同法、同罪、其所與同當刑復城旦舂，及曰黥之，若鬼薪白粲當刑爲城旦舂，及刑畀主之罪也，皆如耐罪然。

對於這一條的內容，時至今日，儘管有多篇論文涉及，但並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解讀。^①不過如研究者已指出，此條中的“皆如耐罪然”爲此前條文整體的共同謂語，^②筆者也同意這一看

* 本文爲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秦漢法律術語與立法技術》(14YJC820084)階段性成果。

① 對於此條爭議頗多，部分論者認爲 107 簡前應與 121 相連綴爲一條，但也有研究者認爲 107 簡前無疑有脫文，但不宜與 121 簡接續，121 簡應獨立出來，不宜與 122 簡相連；另有學者認同原整理者的編連方式。相關論點可參見李力《關於〈二年律令〉簡 121 排列的再探討》，《張家山二四七號墓漢簡法律文獻研究及其述評(1985.1—2008.12)》，東京外國語大學，2009。此外，李力先生還根據中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對整理小組的標點做了部分調整(《張家山二四七號墓漢簡法律文獻研究及其述評》，389 頁)。此處簡文標點採納李力先生之說。

② 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 簡排序辨正》，《法學研究》2004 年第 6 期，155 頁。

法。換言之,“皆如耐罪然”之前的各種情況儘管表述形式以及最終可能導致的刑罰各異,但在具體處置上都可能與耐罪的處置方式存在某種關聯性。

相對於條文結構的解讀,對“皆如耐罪然”一語的探討則相對較少。從字面意義將其理解為“如耐罪規定的那樣”,^①固然無誤,但何為“耐罪規定的那樣”仍然是一個待解答的問題。筆者期望通過對律條的分析,對“皆如耐罪然”的探討有所推進。

一 “皆如耐罪然”中的“皆”

“皆如耐罪然”中的“皆”,意義較為明確。“皆”是中國古代法律文獻中常見的一個“術語”。“皆”字起到了“統領數種性質相關的行為並量以同一刑罰”的作用。^②筆者以為秦漢法律文本中所見的“皆”在表達對相關事物處置的同一性時,不僅指向刑罰的同一,也可以指向所適用的刑罰原則的同一。如《二年律令》74簡“盜出財物於邊關徼,及吏部主智(知)而出者,皆與盜同法”。該條中的“與盜同法”意指與“盜”各類財物行為同樣處罰。從這一意義上說,雖然“皆與盜同法”中並未出現明確的刑罰,但實際上包含了對犯罪行為的處斷規則,即表明應參照處罰“盜”的基本規定(如《二年律令·盜律》55、56簡)實施。就該條而言,“皆與盜同法”所處斷的對象包括兩類主體,即從事了“盜出財物”犯罪的行為人和明知存在這一犯罪行為而不予稽查的責任人。對以上兩個因同一犯罪活動而獲罪的具有牽連關係的主體的處罰,同以“與盜同法”這一處罰方式決定其刑罰適用。此處的“與盜同法”顯然不是指向一個具體刑罰,而是指向法律中處罰“盜”的刑罰適用規則。^③此時“皆”字表達對數種行為人處置同一性的判斷,但其同一性反映為處置依據、具體規則或方式的同一,具體到每一個行為主體,其處罰結果未必相同。

二 “如……然”在罪刑表述上的意義

在“皆如耐罪然”中,“如……然”是其表述的中心。“如……然”是秦簡中常見的一種表述方式。如《秦律十八種·司空》138簡:“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對此

① 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簡排序辨正》,《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155頁。

② 徐世虹:《秦漢法律的編纂》,〔韓〕《中國古中世研究》第24輯,2010,225頁。

③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點,作為同一案件中“盜出財物”的行為人和不予稽查的責任人,在具體案件中,對二者的處罰一般應依照涉案財物價值金額,參照處罰“盜”的基本規定(如《二年律令·盜律》55、56簡)確定其刑罰。由於對以上兩個主體的處罰實際都依據相同的財物價值論斷,從形式上看,二者所獲刑罰是一致的。但這屬於法律規則具體運用的結果,而非法律規定自身的意義。

處的“如律然”，整理小組並無注釋。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祇稱“如律然”而并未表明具體是什麼“律”，但筆者認為，此處的“律”似應指與 138 簡抄寫為一條的《司空》133 簡“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今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償），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的規定。這一規定雖然沒有直接說明如何“居其衣”，但從其規定的“居”食的方式——在每日勞役折抵“貲贖債”的金額中扣除相應的費用看，實際是用延長總的勞役時間的方式，抵償從官方獲得的生活必須品的費用，此方式也可以適用於“居”衣。可見，此處的“如律然”，實際指的是按照法律中已經規定的以勞役折抵官方所給予的食物費用的制度處置（居衣）問題。

又如《秦律十八種·效》170 簡有“如入禾然”。從該條內容來看，此處“如入禾然”是對此前“其出禾，有（又）書其出者”一語的限定。所謂“入禾然”，即指該條 168 簡中的“籍之曰：‘其廩禾若干石，倉嗇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的記錄方式。“如入禾然”即要求在“出禾”時按照“入禾”時的記錄方式對“出禾”人員進行記錄。

由以上幾個“如……然”的用例可見，其意在表明處理此事項時，執行法律規定的處理彼事項時的相關規定。如“如數者然”，指處罰“懸料不備其見（現）數五分一以上”時適用“數而贏，不備”的一整套規定；“令居其衣如律然”，則指處理“居衣”問題適用法律中規定的以勞役折抵從官方獲取的食物費用的方式。

然而，這裏仍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回答。從《二年律令·具律》107、108 簡的規定來看，被規定為按照“耐罪”的規定加以處置的各種事項，實際都有其各自的執行辦法，如該條中所見“告之不審”，依據《二年律令·告律》127 簡的規定，對“告不審”者，“各減其罪一等”處置，其具體刑罰在 127-131 簡中有明確規定。^①而從 127-131 簡中可見，“告不審”所受處罰並不必然是“耐”或“耐罪”。那麼對“告不審”等情形的處罰結果又如何最終體現“耐罪”的規則呢？筆者以為仍須從“如耐罪然”幾個字入手加以解釋。

“如……然”雖然起到了援引規則處斷事項的作用，但其在法律條文中的具體作用仍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以下試以睡虎地秦簡《效律》54、55 簡為例。

首先，《效律》54、55 簡是對法條中涉及的“令、丞”“司馬令史”須承擔職務連坐義務的規定。

如 54 簡：

尉計及尉官吏節（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

^① 127-131 簡：“死罪黥為城旦舂，城旦舂罪完為城旦舂，完為城旦舂罪[]鬼薪白粲及府（腐）罪耐為隸臣妾，耐為隸臣妾罪耐為司寇，司寇、遷及黥顏（顏）顏罪耐，耐罪耐罰金四兩，耐死罪耐城旦舂，耐城旦舂罪耐斬，耐斬罪耐黥，耐黥罪耐耐，耐罪[]金四兩罪罰金二兩，罰金二兩罪罰金一兩。”

條文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尉”所屬會計人員及所屬其他官吏有罪時，“令、丞”責任承擔的規定。整理小組解釋此處的“尉”為“縣尉”，“令、丞”為縣令、丞。^①傳統上對於“縣尉”的認識是，其為縣令的下屬，是負責治安工作的官員。但如果仔細玩味《效律》54簡的規定，就應該發現，“令、丞”與“尉”之間的行政關係似乎存在特殊之處。如《秦律十八種·廩苑律》13-14簡規定：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為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誅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

從該條規定可見，當所飼養的牛，在考核中評為最優，相關人員分別獲得從“壺酉（酒）束脯”到“賜……日三旬”的不同獎勵；在考核中評為最劣，則分別接受不同類型的處分。從上述條文的內容看，當某一違法事項發生後，從直接責任人到管理者都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法律並不需要規定哪一層級的責任人是否“坐之”，祇需指出他們各自具體受到的處分即可。如果說明確的職務連坐關係是統屬關係明晰的表現，那麼似乎可以說在《效律》54簡所反映的“令、丞”與“尉計”以及“尉”的其他屬官之間，並無直接的職務上的統屬關係。

實際上已有論者指出，雲夢秦簡中涉及長吏對縣中的事務負責時，很多都是提及令、丞而不言及尉。祇有在與軍隊、屯戍有關的情況下，纔是尉與縣令負責。且從里耶秦簡的內容來看，縣尉的職權可能大於縣丞。但上述《效律》54簡的規定似乎又表明其地位低於縣丞。按照論者的理解，這一現象是地域差異導致的結果。^②筆者認為，應該重視雲夢秦簡中涉及縣事時多不言“尉”這一重要現象。雖然不能就此認為秦代縣的行政序列中沒有縣尉，^③但很可能縣尉的職能與縣“令、丞”，特別是“丞”所承擔的行政職能有所區分，屬於不同的行政系統。從這一意義上說，“尉”的屬吏在行政職能上不是“令、丞”的直接下屬，因而也不向令、丞直接負責。

筆者之所以討論“尉”與“令、丞”之間的職務關係，意在說明《效律》54簡規定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從以上分析可知，“令、丞”和“尉計”等“尉”屬吏之間，並無行政工作上嚴格的層級統屬關係，那麼當“尉”的屬吏有犯罪行為時，“令、丞”也就沒有必然的連坐義務。換言之，從法律的一般原則層面而言，不能推導出“令、丞”和“尉”屬吏之間存在職務連坐關係，如果要讓“令、丞”連坐於“尉”的屬吏，則需要以特別法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由此可見，《效律》54簡所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即是“尉”屬吏犯罪，“令、丞”是否需要連坐。如從規則結構角度來看，54簡中“尉計及尉官吏節（即）有劾”實際是條文中的“假定條件”要素，“令、丞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6頁。

② 鄒水杰：《秦漢縣丞尉設置考》，《南都學壇》2006年第2期，17頁。

③ 秦代縣無縣尉的觀點，參見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164頁。

坐之”則是其法律後果。至此，該規則的立法意圖得到滿足（確定“令、丞”是否應連坐），一個結構相對完整的法律規則得以構成。

又睡虎地秦簡《效律》55 簡：

司馬令史掾苑計，計有劾，司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計劾然。

不難看出，這是一條與《效律》54 簡結構相同且內容相似的法律規定。整理小組的譯文認為，“司馬令史掾苑計”意為“司馬令史掾管理苑囿的會計”，^①然而此處“管理”二字實無從談起。筆者以為“掾”在此處應是一個動詞。《說文·手部》“掾，緣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為“掾”“本訓當為佐助之誼”，因此“掾”作名詞時多指官府的佐助官吏，此處的“掾”解作“協助”似更為妥當。如果以“協助”之意理解本條，則司馬令史顯然不是“苑計”的管理者，而是“苑計”工作的協助參與者。且就行政關係而言，二者也不應存在統屬關係。整理小組認為司馬令史是縣司馬令史的省稱，此說可從。但從現有資料來看，“縣”與“苑”應分屬兩個行政系統。《秦律十八種·徭律》117-119 簡：

·縣葆禁苑、公馬牛苑，興徒以斬（塹）垣離（籬）散及補繕之，輒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歲或壞陝（決），令縣復興徒為之，而勿計為繇（徭）。卒歲而或陝（決）壞，過三堵以上，縣葆者補繕之；三堵以下，及雖未盈卒歲而或盜陝（決）道出入，令苑輒自補繕之。

該條規定了縣和位於縣中的“禁苑、公馬牛苑”對苑圍牆護欄等工程各自承擔的維修保養責任。從行文來看，“縣”和“苑”之間在維修養護上職責分工十分明晰。如果“苑”是“縣”的所屬機構，維修其設施是縣自身的職責所在，完全不需要與“苑”做如此明晰的責任分擔，而祇需要規定縣的某一官吏與“苑”共同承擔維修責任，不必將抽象的“縣”作為行為主體。由此可見，該條中的“縣”和“苑”，僅是因為上述“苑”處在縣境之內，因此“縣”部分承擔了維修和保養“苑”圍牆護欄的責任，二者之間明顯沒有統屬關係。此外，《秦律十八種·內史雜》190 簡規定：“苑嗇夫不存，縣為置守，如廩律。”此處所謂的“守”，整理小組解釋為代理其職務的人員。^②如果縣對“苑”有行政管理權，則當其負責人因各種原因不能履職時，縣在其職權範圍內必然有權任命新的負責人，也有權任命臨時代理，完全無需法律明文規定縣祇能任命臨時代理人。由此不難看出，縣雖然可以參與“苑”的管理，但“苑”絕非縣所統屬的機構。從以上分析可知，縣司馬令史與“苑計”實際分屬兩個行政管理系統，二者僅存在工作上的協作關係，既非上下級也非行政法律關係上的同僚。因此當“苑計”有犯罪行為時，縣司馬令史并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7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62 頁。

不必然承擔職務連坐責任。所以纔會出現《效律》55 簡這樣的規定,以明示當縣司馬令史協助“苑計”工作時,“苑計”有犯罪行為發生,縣司馬令史須承擔職務連坐責任。由此可見,本條所規定的主要事項,是縣司馬令史是否應承擔連坐責任的問題,這與《效律》54 簡規定的目的相同。因此,正如前文對 54 簡結構的分析,至“司馬令史坐之”一語,其法條的結構已經基本完整。

那麼其最後出現的“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又起到什麼作用呢?筆者認為這是對“令、丞”和“司馬令史”因職務連坐而受到處罰的具體方式的表述。《效律》54、55 兩簡中所見的“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所指向的內容其實是基本一致的,即是此前《效律》51-53 簡的規定。《效律》51-53 簡:

官嗇夫貲二甲,令、丞貲一甲;官嗇夫貲一甲,令、丞貲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貲、誅如官嗇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計者,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如令、丞。

從《效律》所涉及的法律關係來看,該條律文可能是針對在核對官府物資帳目過程中,發現存在“其有贏、不備”的情況時,主要責任人和承擔職務連坐責任的其他主體所受處罰之間對比關係的規定。本條實際分為兩款。第一款規定了“官嗇夫”和“令、丞”之間發生職務連坐時,二者所受處罰的對比關係;由“其”字區分的第二款,則為這一原則的具體適用。其中“其吏主者坐以貲、誅如官嗇夫”一語,“吏主者”實際是與後文所列舉的“它冗吏”等一系列主體相對的概念,指某一具體的違法行為中的直接責任人,後者則指承擔職務連坐責任的主體。這是他們可以與第一層中的“官嗇夫”和“令、丞”相比較的基礎。在第二款的規定中,“吏主者坐以貲、誅如官嗇夫”并非實指對“吏主者”處以與“官嗇夫”同樣的罰金和斥責,而是指在與後面的“它冗吏”等一系列主體的連坐關係中,受到“貲、誅”處罰的“吏主者”,處於前款中“官嗇夫”在與“令、丞”連坐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同理,“它冗吏”等一系列主體“如令丞”,也并非指按照令、丞所受的具體處罰加以處置,而是指處在前款中“令、丞”在連坐關係中所處的位置。換言之,當出現某“吏主者”被處以“貲、誅”的情況時,其所受處罰和與其有職務連坐關係的“它冗吏”等主體受到的處罰的對比關係,應按照前款中官嗇夫和令、丞所受處罰的對比關係執行,大致而言,即減一等處罰。

將以上分析的結果帶入 54、55 兩簡,就可以求證“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的具體作用。從前文對 54、55 兩簡內容的分析來看,“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似乎應分別指向《效律》51-53 簡所提及的“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和“令史掾計者”這兩種具體情形。這是由於前者屬於間接的上下級關係,與“尉計”——“令、丞”的關係相近;後者屬於不同行政管理機構之間的協助關係,則可比擬“苑計”——縣“司馬令史”之間的關係。那麼從以上的分析可知,54、55 兩簡中的“尉計”“苑計”在法律設定的連坐關係中

的地位，相當於 51-53 簡中提及的“吏主者”。此處所謂“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即是表明 54 簡規定的“令、丞”和 55 簡規定的“司馬令史”在連坐關係中的地位與“它官”等相當，其所應承擔的職務連坐責任，在具體的承擔方式上適用 51-53 簡的第二款規定。換言之，相對於“尉計”“苑計”等官吏所受的處罰而減一等論處。由此可見，“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計劾然”是“坐之”的具體實現方式，其所處置的對象是法律條文中作為法律後果要素的“坐之”。也就是說，它們在上述兩條法律規則中不是構成要件。二者的出現，不會導致“令、丞”和“司馬令史”所承擔的連坐責任的產生、變更或消滅，而是僅為如何執行兩條法律中所設定的連坐責任提供了法律規範上的依據。

三 “皆如耐罪然”在量刑上的意義

基於以上對“如……然”的解析，可以回應前文所提出的問題。《二年律令·具律》107、108 簡中出現的“皆如耐罪然”，相對於該條列舉的一系列具體的刑罰適用方式而言，並不能變更或消滅這些刑罰適用方式所要達到的處罰直接結果。但其中包含的“耐罪”因素，將會對這些處罰的實際執行產生某種方式的影響。假設 A 行為被法律規定為與被判處“黥為城旦舂”的 B 行為“同罪”，這就意味着 A 行為也將判處“黥為城旦舂”。^①《具律》107、108 簡中“同罪……皆如耐罪然”的規定，不會免除或改變其應受的“黥為城旦舂”這一刑罰，但在執行刑罰時會受到法律中有關“耐罪”規定的制約，而導致刑罰執行的實際效果與直接判處“黥為城旦舂”時有所不同。

需要解釋的是此處“耐罪”的意義，或者說其在影響刑罰執行上的意義。正如富谷至先生指出的，秦漢法律中還沒有“罪”（違反行為）和“罰”的區別，“罪”實際做刑罰意義使用。^②此處的“耐罪”則應從刑罰等級的意義加以理解。如秦簡《法律答問》140 簡：

“盜出朱（珠）玉邦關及買（賣）於客者，上朱（珠）玉內史，內史材鼠（予）購。”可（何）以購之？其耐罪以上，購如捕它罪人；貲罪，不購。

該條解釋了如何對那些捕獲非法攜帶“珠玉”出境或非法將其賣與“外國人”的罪犯實施購賞的問題。從該條行文來看，對捕獲者的獎勵按照捕獲對象是否達到“耐罪”分為兩個層次：達到“耐罪”者給予購賞，“貲罪”者不給予購賞。此處“耐罪”和“貲罪”的主體，顯然是指從

^① 富谷至先生認為“與某同罪”——非指等同某個罪名，而是指所科刑罰相同（〔日〕富谷至：《二年律令に見える法律用語—その（一）》，《東方學報》京都第 76 冊，2004，238 頁）。朱紅林先生也認為“與同罪”是“與同罰”的意思（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104 頁）。筆者基本認同這種看法。

^② 〔日〕富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252 頁。

事“盜出”珠玉行爲的人。前文曾對《二年律令·盜律》中涉及“盜出”財物犯罪的 74 簡進行了討論,指出對於盜出財物的犯罪,包括盜出黃金犯罪,對行爲的處罰一般情況下都要最終適用“盜”的基本規則,即《盜律》55、56 簡的相關規定,以涉案金額爲據確定刑罰。這一規則的適用,在不同的案情中會出現一個從“黥爲城旦舂”到罰金的不同的刑罰適用結果。從本條的內容來看,對“盜出珠玉”行爲的處罰極有可能也適用處罰“盜”的相關規則。這就意味着,其中出現的“耐罪”“贅罪”,實際就是預設的按照涉案金額對“盜出珠玉”行爲人確定的處罰結果。由此可見,“耐罪”是一個用以表達應實施處罰的等級概念。

然而,從對“如……然”這一結構的法律意義所進行的論述可知,在“如耐罪然”這一結構中,“耐罪”所要表達的顯然不是“耐”的刑罰措施。換言之,“如耐罪然”這一結構所要表達的意義,絕非在處置此前涉及的各種情形時一律適用“耐”這一處罰措施。那麼如果拋開“耐罪”這一刑罰等級概念的內涵,即作爲刑罰的“耐”,其外延又將涉及什麼內容呢?

從已有資料來看,這個問題幾乎無法回答。筆者祇能從現有材料出發推測。《二年律令·收律》174 簡: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

該條規定表明,重刑犯不僅本人要受到刑事處罰,其妻、子、財產還要被收歸充公,這一制度在秦漢法律中被稱爲“收”。就《收律》174 簡規定的標準而言,當行爲人獲刑在“完爲城旦舂”以上,對行爲人的妻、子應適用“收”。但在以“與同法”“與同罪”表述對行爲人的處罰時,因 108 簡中有“如耐罪然”的規定,則具體執行方式按照“耐罪”的方式執行。從秦漢刑罰序列來看,耐罪主要指“耐爲隸臣妾”和“耐爲司寇”兩種刑罰,^①犯罪行爲人受耐罪處罰時,其家屬、財產可以避免被“收”,從而緩解了刑罰適用的嚴酷性。

這一結論至少從兩個方面看是合理的。

首先,“收”的適用與否不影響對犯罪主體主要處罰措施的適用。從法律規定來看,“收”的適用並不是法律適用的直接後果,而是因適用了“完爲城旦舂、鬼薪白粲”這一標準以上的刑罰時,所採取的一種對犯罪人家屬、財物等實施的處置措施。是否適用“收”,與法律規則所期望的制裁效果之間沒有直接聯繫。不適用“收”,不會導致依據某一法律規則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發生改變。如前文所舉之例,A 行爲因法律規定與 B 應適用的“黥爲城旦舂”“同罪”,也被判處“黥爲城旦舂”,但因爲“同罪”,故對 A 行爲的主體不採取“收”的處罰措施。但這並未改變“黥爲城旦舂”這一法律後果的發生。

其次,從《二年律令·具律》107、108 簡內容看,不適用“收”有其現實合理性。如 108 簡

^① 《二年律令·具律》90 簡:“有罪當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爲司寇,司寇耐爲隸臣妾”。從該簡規定可知,與“耐罪”直接對應的即以上兩種刑罰。

規定的“鬼薪白粲當刑爲城旦舂”這一情形，如前文所述，“鬼薪白粲”是導致“收”的一種刑罰，換言之，此處的鬼薪白粲在犯新罪適用累積刑爲城旦舂之時，其妻、子、財產等原則上已經被“收”了。這也就是說即便其再犯新罪，即便所受刑罰超過適用“收”的標準，也可能因爲無可收之物而不再適用“收”。又如其中的“刑畀主之罪”，顯然指如《賊律》30簡“奴婢毆庶人以上，黥頤，畀主”，《告律》135簡“奴婢自訟不審，斬奴左止（趾），黥婢頤（顏）頤畀其主”這一類情形。當奴婢犯罪時，政府祇對其施加肉刑，而不處以勞役，隨後將其交給主人處置。從這一類規定來看，政府在處置奴婢犯罪時，已充分考慮到了主人對奴婢的支配權。以理度之，奴婢人身既然是主人支配的，那麼其財產等也應受到主人支配，因而對奴婢犯罪不適用“收”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見，前文做出的“皆如耐罪然”意味着不適用“收”的推測，并非是没有依據的。

北大藏漢簡《蒼頡篇·顓頊》校釋與解讀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振紅

石家莊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賈麗英

內容提要 北大藏漢簡《蒼頡篇》第一次發現了章題及一些內容較為完整的章，為我們探討《蒼頡篇》的性質和體裁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蒼頡篇》各章均有章旨即主題思想，雖然囿於體裁，內容稍顯鬆散，跳躍性較大，但仍可以看出整章內容圍繞章旨展開，句子之間文義有承啓關係。《顓頊》章圍繞開頭的顓頊、祝融展開，而顓頊、祝融是戰國秦漢時人以陰陽五行思想為核心構建的宇宙體系中的重要人物，為“曆數”之鼻祖，掌管天人之際、民神之間。這些思想大多反映在當時流行的三種月令書（《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和《淮南子·時則》）中，故可參照月令書解讀《顓頊》章的內容。《蒼頡篇》並不是單純的字書，而是帶有明確意識形態色彩和教化功能的教科書。本文在此認識下，對《顓頊》章進行了校釋。

關鍵詞 北大藏漢簡《蒼頡篇》 顓頊 祝融 章旨 曆數 民神 月令

一 前言

2009年北京大學入藏的西漢簡《蒼頡篇》，在目前發現的漢代《蒼頡篇》殘本中保留的字數最多，共一千三百餘字，且篇章最為完整，^①因此，對研究《蒼頡篇》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北大藏《蒼頡篇》的重大貢獻之一是發現了十一章的章題。我們認真研讀了北大藏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71-172頁。

《蒼頡篇》若干有標題的章，認為各章均有章旨即主題思想。雖然因字書體裁的限制，為了整齊押韻，而使得句子之間的文義具有非連貫性和跳躍性，但仍能看出整章的內容緊緊圍繞章旨展開，句子與句子之間有承啟轉合關係。基於這一認識，本文嘗試對《顓頊》重新注釋，錯誤之處敬請方家批正。

二 校釋

顓頊[一]祝融[二]，招搖^①[三]奮光[四]。

【校釋】

[一]顓頊，傳說上古帝王名，黃帝後裔，為五帝之一，統治着天下萬物。《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②《白虎通·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③五德終始說中，顓頊為水德之帝，屬北方，主冬。《禮記·月令》孟冬、仲冬、季冬月皆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④漢初統治者亦信奉五德終始說，以為漢得水德，故尊水德之帝顓頊。《史記·曆書》：“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⑤《史記·張丞相列傳》：“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⑥《東觀漢記·世祖光武帝紀》：“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⑦在當時流行的帝王世系中，顓頊為楚的祖先。《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六曰季連，

① 釋文皆按寬式隸定。不另注。

② 《史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11-12頁。

③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52頁。

④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43、553、559頁。

⑤ 《史記》卷二六，1260頁。

⑥ 《史記》卷九六，2681頁。

⑦ [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卷一，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7頁。

芈姓,楚其後也……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①《風俗通義·皇霸·六國》:“楚之先,出自帝顓頊。”^②

[二]祝融,傳說上古之神名。一說,為顓頊之臣,為火正。《國語·楚語下》:“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③《初學記·居處》“祝融作市”,引宋衷注曰:“祝融,顓頊臣,為高辛氏火正。”^④一說,祝融為顓頊之重孫重黎,為火正(火官)。參見前引《史記·楚世家》。一說,為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⑤《呂氏春秋·孟夏紀》高誘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⑥一說,為顓頊之子,為竈神。《風俗通義·祀典》:“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⑦一說,為炎帝後裔。《山海經·海內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并,節并生戲器,戲器生祝融。”^⑧在陰陽五行體系中,祝融為南方炎帝之佐,為火官,主夏。《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列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之名耳。”^⑨《禮記·月令》孟夏、仲夏、季夏之月均載:“其帝炎帝,其神祝融。”^⑩《山海經·海外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⑪《史記·楚世家》司馬駟《集解》引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⑫《淮南子·時則》提到“五位”,其中,“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⑬傳說,祝融之官後為劉累之後所代。《史記·夏本紀》司馬駟《集解》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⑭《漢書·高帝紀上》:“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顏師古注:“本出劉累,而范

① 《史記》卷四〇,1689頁。

②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28頁。

③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514-515頁。亦見於《史記》卷二六《曆書》,1257頁。

④ [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591頁。

⑤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95頁。

⑥ 許維通撰:《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83頁。

⑦ 《風俗通義校注》,360頁。

⑧ 《山海經校注》,471頁。

⑨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06-1507頁。

⑩ 《禮記正義》,490,498,508頁。

⑪ 《山海經校注》,206頁。

⑫ 《史記》卷四〇,1689-1692頁。

⑬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433頁。

⑭ 《史記》卷二,88頁。

氏在秦者又爲劉，因以爲姓。”^①

[三]招搖，典籍中多作“招搖”。星名，北斗第七顆星。《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淮南子·兵略》：“雖順招搖”。高誘注：“招搖，斗杓也。”^②亦稱“搖光”。《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引《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③招搖位於北方，故被說成是北方帝顓頊之象。《白虎通·聖人》：“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注云：“干，楯也。招搖爲天戈，戈楯相副，戴之者像見天下以爲表。”^④《潛夫論·五德志》：“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⑤

[四]奮，《說文》佳部：“翬也，從佳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⑥《玉篇》奮部：“奮，翬也，飛也，動也，朋也，奮奮也，振也。”^⑦本義爲鳥振羽疾飛，引申爲發揚、振奮、昭顯。《詩·大雅·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⑧光，《說文》火部：“明也，從火在兒上，光明意也。”^⑨奮光，奮發光明。《後漢書·文苑列傳》：“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蹈滄海，跨昆侖，奮彗光，埽項軍。”^⑩當時專用以指祝融。《國語·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末有侯伯。”^⑪

【解說】

在戰國秦漢時期流行的陰陽五行體系和古史系統中，顓頊爲黃帝之後，五帝之一，主宰着天下萬物。四海之內，“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皆歸其領屬。他的能力包括：“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⑫其說由來已久。《國語·楚語下》載楚大夫觀射父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

① 《漢書》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1頁。

② 《淮南子集釋》，1082頁。

③ 《史記》卷二七，1291頁。

④ 《白虎通疏證》，337頁。

⑤ [清]王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397頁。

⑥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145頁下欄。

⑦ 《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453頁。

⑧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54頁。

⑨ 《說文解字注》，490頁上欄。

⑩ 《後漢書》卷八〇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2599頁。

⑪ 《國語集解》，465-466頁。

⑫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11-12頁。

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①其說主張，民神不得雜糅，民要敬神，需要通過正確的祭祀來禮神，否則上天就會降下災異。少皞氏衰落時，由於民神雜糅，神不尊而民不敬，於是出現“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的情形。其後，帝顓頊高陽掌管天下，重新整頓了天上人間。他有兩個佐臣，一是名叫重的南正官，負責掌管上天諸神；一是名叫黎的火正官，負責掌管大地生民。在他們的治理下，恢復了以往秩序，民神之間不再互相侵犯。這一說法對後代影響甚大，五德終始說、天人感應說等戰國秦漢時盛行的學說應都是在此說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的。這一思想的緣起和發展過程充分反映在《史記·曆書》和《漢書·律曆志》等之中。《史記·曆書》載：“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其後戰國并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②《漢書·律曆志上》則載：“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

① 《國語集解》，514-515 頁。

② 《史記》卷二六，1256-1260 頁。亦見《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1189-1210 頁，內容略不同。

制，咸正曆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①

由此可知，顓頊和其主管民間的臣祝融在五德終始說和天人感應說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為曆數之鼻祖，曆紀、服色、時氣皆由他們來掌管。可以推想，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形成了以《禮記·月令》為代表的時令思想。這應當就是《蒼頡篇》中專設《顓頊》一章，并在第一句將顓頊、祝融并列的原因。此外，秦及漢初統治者皆以為得水德，而顓頊為水德之帝，可能也是《蒼頡篇》中設《顓頊》章的一個重要因素。

顓頊[五]錄恢[六]，徇隋[七]愷襄[八]。

【校釋】

[五]顓，《說文》頁部：“大頭也。從頁，羔聲。”^②《玉篇》頁部：“顓，《蒼頡》云‘頭大也’。”^③《廣韻·宵部》：“顓，額大貌。”“顓，大額。”^④秦印中有“顓印”。^⑤豫，《說文》象部：“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從象，予聲。”段玉裁注：“侍中說豫象雖大而不害於物，故寬大舒緩之義取此字。此豫之本義。故其字從象也。引伸之，凡大皆稱豫。”^⑥

[六]錄，《說文》金部：“金色也。从金，录聲。”^⑦《玉篇》金部：“錄，貝文也。”^⑧恢，《說文》心部：“大也。从心，灰聲。”《玄應音義》卷三“恢大”注引《蒼頡解詁》曰：“恢，亦大也。”^⑨《漢書·叙傳下》：“恢我疆宇，外博四荒。”顏師古注：“恢，廣也。”^⑩

[七]徇，《說文》彳部：“行示也。從彳，勻聲。《司馬法》：‘斬以徇。’”段玉裁注：“大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⑪古代篆寫勻、旬二字通假，《說文》勹部“旬”段玉裁注：“知古旬勻二篆，相假為用。”^⑫故徇亦與“徇”通假。《周禮·夏官·小子》：“小子掌

① 《漢書》卷二一上，973-974 頁。

② 《說文解字注》，422 頁上欄。

③ 《宋本玉篇》，75 頁。

④ 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153 頁。

⑤ 許雄志主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173 頁。

⑥ 《說文解字注》，464 頁上欄。

⑦ 《說文解字注》，710 頁上欄。

⑧ 《宋本玉篇》，323 頁。

⑨ 《說文解字注》，508 頁上欄。

⑩ 《漢書》卷一〇〇下，4237-4238 頁。

⑪ 《說文解字注》，77 頁下欄。

⑫ 《說文解字注》，437 頁下欄。

祭祀……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①即軍隊出征或田獵時，殺生祭祀，以徇軍陣。隋，整理者釋作“隋”。^②此字可直接釋作“隋”，右上爲“左”，而非“圣”。《說文》肉部：“隋，裂肉也。從肉，陸省聲也。”段玉裁注：“裂肉謂尸所祭之餘也……單言肉者，爲其字從肉也。”^③《周禮·春官·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玄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④《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鄭玄注：“隋，尸之祭也。”^⑤

[八]愷，通“豈”。^⑥《說文》豈部：“豈，還師振旅樂也。”^⑦《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鄭玄注：“軍樂曰愷……《司馬法》‘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⑧《漢書·主父偃傳》：“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⑨襄，《說文》衣部：“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從衣，罷聲。”^⑩《逸周書·謚法》：“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⑪一說，成功，完成。《集韻·陽韻》：“襄，成也。”^⑫《左傳》定公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杜預注：“襄，成也。”^⑬

【解說】

顓、豫、恢的原意均爲大、寬。錄的原意爲金色、光彩。徇，軍隊出征前的祭祀禮。愷，軍隊勝利回師時所奏之樂。襄，軍隊出征勝利。因此，此句應指從出征前祭祀到勝利回師慶祝的盛大場面。但具體所指，即誰、爲什麼出征則不清楚。

鄢[九]鄧[十]析[十一]鄺[十二](簡46)，宛[十三]鄂[十四]郢[十五]鄴[十六]。

【校釋】

[九]鄢，縣名。春秋時爲楚國別都。《左傳》昭公十三年：“王汝夏，將欲入鄢。”杜預注：“鄢，楚之別都。”^⑭《漢書·地理志上》“南郡”條下：“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⑮《說文》邑

①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795頁。

②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15頁。

③ 《說文解字注》，174頁下欄。

④ 《周禮注疏》，562頁。

⑤ 《周禮注疏》，675頁。

⑥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15頁。

⑦ 《說文解字注》，28頁下欄。

⑧ 《周禮注疏》，782頁。

⑨ 《漢書》卷六四上，2799頁。

⑩ 《說文解字注》，398頁下欄。

⑪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68頁。

⑫ 趙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451頁。

⑬ 《春秋左傳正義》，1607頁。

⑭ 《春秋左傳正義》，1315頁。

⑮ 《漢書》卷二八上，1566頁。

部：“鄢，南郡縣……從邑，焉聲。”^①故址在今湖北宜城“楚皇城”。^②

[十]鄧，縣名。故楚地。《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③秦封泥有“鄧丞之印”。^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鄧”縣名，其長官秩六百石。^⑤《漢書·地理志上》“南陽郡”條下：“鄧，故國。都尉治。”^⑥《說文》邑部：“曼姓之國。今屬南陽。從邑，登聲。”^⑦故址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鄧城鎮古鄧城遺址。

[十一]析，縣名。故楚地。《史記·楚世家》：“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⑧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析”縣，其長官秩六百石。^⑨故址在今河南西峽縣蓮花寺古城。^⑩

[十二]酈，縣名。故楚地。《史記·楚世家》：楚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對頃襄王曰：“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⑪《漢書·吳芮傳》：“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顏師古注：“二縣也，并屬南陽。”^⑫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酈”縣，與析縣相鄰，其長官秩六百石。^⑬《說文》邑部：“酈，南陽縣。從邑，麗聲。”^⑭故址在今河南鎮平縣東北。

[十三]宛，縣名，爲南陽郡郡治。故楚地。《史記·楚世家》：昭襄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⑮秦封泥有“宛丞之印”。^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宛”，其長官秩八百石。^⑰《漢書·地理志上》“南陽郡”條下：“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莽

① 《說文解字注》，295 頁下欄。

② 參見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報告》，《考古》1980 年第 2 期。

③ 《史記》卷五，213 頁。

④ 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295 頁。

⑤ 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74 頁。

⑥ 《漢書》卷二八上，1564 頁。

⑦ 《說文解字注》，294 頁下欄。

⑧ 《史記》卷四〇，1729 頁。

⑨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74 頁。

⑩ 參見周維衍《河南西峽縣古城遺址的考證》，《考古》1961 年第 8 期。

⑪ 《史記》卷四〇，1730 頁。

⑫ 《漢書》卷三四，1894 頁。

⑬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74 頁。

⑭ 《說文解字注》，303 頁上欄。

⑮ 《史記》卷五，212 頁。

⑯ 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於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西北大學學報》2005 年第 4 期。

⑰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72 頁。

曰南陽。”^①故址在今河南南陽市宛城故城。^②

[十四]鄂,縣名。故楚地。《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中子紅爲鄂王。”^③漢代有兩地名“鄂”。一爲江夏郡所屬。《說文》邑部:“江夏縣。從邑,畧聲。”^④一爲南陽郡所屬,稱西鄂。《漢書·地理志上》“南陽郡”條下:“西鄂,穰,莽曰農穰。”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⑤此處的“鄂”當爲西鄂,地在今河南南陽市北,與宛相鄰。

[十五]鄂,鄉名。故楚地。《說文》邑部:“南陽育陽鄉,從邑,號聲。”段玉裁注:“今河南南陽府東育陽故城是也。”^⑥《漢書·地理志上》“南陽郡”條下:“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⑦

[十六]鄢,縣名。《說文》邑部:“今南陽穰縣是。從邑,襄聲。”段玉裁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東南二里穰縣故城是也。”^⑧故楚地。《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穰”,其長官秩八百石。^⑩故址在今河南鄧州內城東南隅。

【解說】

以上八地,除鄢屬南郡外,其餘均屬南陽郡,均爲故楚地。如前所述,顓頊、祝融爲楚人的祖先,且祝融爲主管南方的神。上一句的出征勝利當與此句的八個楚地有直接關係,但如上所述,其主語是誰尚不能確定。

閱弊[十七]竈趕[十八],滕先[十九]登慶[二十]。

【校釋】

[十七]閱,《說文》門部:“具數於門中也。從門,說省聲。”段玉裁注:“具者,供置也。數者,計也。計者,會也,筭也。云於門中者,以其字從門也。”^⑪《左傳》襄公九年:“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杜預注:“閱,猶數也。”^⑫行事前卜筮或祭祀時清點祭品數量。周以來也

① 《漢書》卷二八上,1563頁。

② 參見王建中《南陽宛城建置考》,《楚文化研究論集》第4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48-360頁。

③ 《史記》卷四〇,1692頁。

④ 《說文解字注》,295頁下欄。

⑤ 《漢書》卷二八上,1564頁。

⑥ 《說文解字注》,294頁下欄。

⑦ 《漢書》卷二八上,1563-1564頁。

⑧ 《說文解字注》,295頁上欄。

⑨ 《史記》卷五,212頁。

⑩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72頁。

⑪ 《說文解字注》,596頁下欄。

⑫ 《春秋左傳正義》,869頁。

稱閱兵禮。《玉篇》門部：“閱，檢軍實也。”^①《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鄭玄注：“至冬大閱檢軍實。”^②《說文》力部：“發也。從力徹，徹亦聲。”段玉裁注：“斨與徹義別，徹者通也，斨謂除去。若禮之有司徹，客徹重席，《詩》之徹我牆屋，其字皆當作斨，不訓通也。或作撤，乃斨之俗也。”簡作“徹”，俗作“撤”。^③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此從鬲從又，象手象鬲之形，蓋食畢而徹去之。”^④《荀子·正論》：“雍而徹乎五祀。”劉臺拱曰：“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⑤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祠未燂’？置豆俎鬼前未徹乃為‘未燂’。”^⑥

[十八]竈，《說文》穴部：“炊竈也。《周禮》以竈祠祝融。從穴，竈省聲。”^⑦《風俗通義·祀典·竈神》：“《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⑧《禮記·月令》孟夏、仲夏、季夏均有“其日丙丁……其祀竈，祭先肺”之語。^⑨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祠五祀日，丙丁竈，戊巳內中土，乙戶，壬癸行、庚辛口。（簡40貳）”^⑩趕，《說文》走部：“止行也。一曰竈上祭名。從走，畢聲。”^⑪此與“竈”連稱，當為竈上祭名。

[十九]滕，《說文》水部：“水超踴也。從水，朕聲。”段玉裁注：“騰者，滕之假借。”^⑫《玉篇》水部：“滕，《詩》曰：‘百川沸騰。’水上涌也。”^⑬今本《詩·小雅·十月之交》作“百川沸騰”，毛傳：“騰，乘也。”^⑭可知漢代水沸騰之“騰”寫作“滕”，段說是。先，《說文》先部：“前進也。從兒，從之。凡先之屬皆從先。”段玉裁注：“凡言前者，緩詞。凡言先者，急詞也。”^⑮滕、先，指水流湍急貌。

[二十]登，《說文》癶部：“上車也。從癶、豆，象登車形。”段玉裁注：“引伸之，凡上升曰登。”^⑯《玉篇》癶部：“登，升也，上也，進也。”^⑰《呂氏春秋·仲夏紀》：“農乃登黍。”高誘注：

① 《宋本玉篇》，212 頁。

② 《周禮注疏》，774 頁。

③ 《說文解字注》，706 頁下欄。

④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526 頁。

⑤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334 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99 頁。

⑦ 《說文解字注》，347 頁上欄。

⑧ 《風俗通義校注》，360 頁。

⑨ 分見《禮記正義》489-491、498、508 頁。

⑩ 《睡虎地秦墓竹簡》，236 頁。

⑪ 《說文解字注》，67 頁下欄。

⑫ 《說文解字注》，553 頁上欄。

⑬ 《宋本玉篇》，343 頁。

⑭ 《毛詩正義》，723 頁。

⑮ 《說文解字注》，411 頁上欄。

⑯ 《說文解字注》，68 頁下欄。

⑰ 《宋本玉篇》，199 頁。

“登,進。植黍熟,先進之。”^①《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鄭玄注:“登,進也。”^②慶,《說文》心部:“行賀人也。從心,從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③《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慶子家駒。”何休注:“慶,賀也。”^④一說爲“善”之意。《詩·大雅·皇矣》:“則友其兄,則篤其慶。”毛傳:“慶,善。”^⑤

【解說】

閱,祭祀前清點祭品。擗,祭祀後撤掉祭品。閱擗,指祭祀禮儀。竈趕,祭竈儀式。據《說文》和《風俗通義》,當時人將祝融尊爲竈神。祝融主夏,故前引《禮記·月令》和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規定,祭竈儀式要在孟、仲、季夏三個月的丙丁日舉行。丙丁日還對應江河大川。《漢書·天文志》:“丙丁,江、淮、海、岱。”^⑥月令規定,仲夏月要舉行祭祀山川百源的大雩禮,祈求雨水豐沛,穀物豐收。《禮記·月令》仲夏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⑦因此,此句的內容與祝融密切相關。另,顓頊也與雨水有關。《漢書·郊祀志下》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言:“分群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地之別神……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⑧滕先,指河水豐盈,湍流不息。登慶,指進獻豐收的黍。另,顓頊也與雨水有關。

陳蔡宋衛[二十一],吳邾許莊[二十二](簡47)。

【校釋】

[二十一]陳蔡宋衛,兩周時四個相鄰的諸侯國,在今河南南部、江蘇西部等江淮流域一帶。《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撻使也,不足以王天下。”^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錄十二大國即包括宋、衛、陳、蔡。甘肅水泉子漢簡七言《蒼頡篇》有“蔡宋衛故有王(暫27)”之語。^⑩《左傳》昭公八年:(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⑪《漢書·地理志下》:“宋地,房、心之分壑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

① 《呂氏春秋集釋》,105頁。

② 《禮記正義》,494頁。

③ 《說文解字注》,509頁上欄。

④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26頁。

⑤ 《毛詩正義》,1024頁。

⑥ 《漢書》卷二六,1288頁。

⑦ 《禮記正義》,501-504頁。

⑧ 《漢書》卷二五下,1268頁。

⑨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2頁。

⑩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0頁。

⑪ 《春秋左傳正義》,1262頁。

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①春秋時起，四國先後皆依附於楚。《左傳》昭公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杜預注：“陳、蔡皆受封於楚，故稱爵。”^②《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昭公十七年……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③《漢書·地理志下》“淮陽國”條下：“縣九：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為楚所滅。楚頃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陳陵。”^④《史記·貨殖列傳》：“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⑤

[二十二] 吳邗許莊，兩周時江淮流域四大姓氏。甘肅水泉子漢簡七言《蒼頡篇》有“□邗許莊姓不亡(暫42)”之語。^⑥ 吳、邗、許，因封國得氏；莊，因諡為氏。吳，秦嘉謨輯補本《世本·氏姓篇》：“吳氏，本自太伯之後。始封於吳，因以為氏。”^⑦《漢書·地理志上》會稽郡郡治為吳縣，“故國，周太伯所邑”。^⑧ 邗，《說文》邑部：“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段玉裁注：“本是邗國，其地漢屬臨淮郡。”^⑨ 許，秦嘉謨輯補本《世本·氏姓篇》：“許氏，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周文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其後因封為氏。”^⑩《漢書·地理志上》潁川郡下有許縣，“故國，姜姓，四嶽後，太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⑪ 莊氏，《世本·氏姓篇》：“楚莊王支孫以諡為氏。”^⑫《史記·貨殖列傳》：“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⑬《漢書·高帝紀上》：“(元年)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顏師古注引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

① 《漢書》卷二八下，1664 頁。

② 《春秋左傳正義》，1310 頁。

③ 《漢書》卷二七下之下，1514 頁。

④ 《漢書》卷二八下，1635 頁。

⑤ 《史記》卷一二九，3267 頁。

⑥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0 頁。

⑦ [漢]劉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228 頁。

⑧ 《漢書》卷二八上，1590 頁。

⑨ 《說文解字注》，300 頁上欄。

⑩ 《世本八種》，179 頁。

⑪ 《漢書》卷二八，1560 頁。

⑫ 《世本八種》，304 頁。

⑬ 《史記》卷一二九，3267 頁。

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顏師古曰：“孟說是也。”^①

【解說】

陳、蔡、宋、衛原是周王分封的四個諸侯國，在楚國北面，後均被楚兼并。秦漢時稱西楚。傳說，陳爲顓頊之族，宋爲火正閼伯之虛，衛後來遷居帝丘，即顓頊之虛。吳、邗、許、莊，亦是周代江淮流域的四個封國，並以國爲姓氏，後亦被楚吞并。秦漢時稱東楚。此外，在時人觀念中，陳、宋對應星宿中的大辰（也稱大火），即二十八宿之一的心宿。衛屬大水，水爲火之牡。《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②亦見於《漢書·五行志下之下》。^③漢高祖劉邦的故鄉沛屬於宋。總之，八個地名均爲楚地，或與顓頊、水有關，或與火、劉姓有關。

建武[二十三]牴觸[二十四]，軍役[二十五]嘉臧[二十六]。

【校釋】

[二十三]建，《說文》段玉裁注：“今謂凡豎立爲建”。^④《玉篇》廴部：“建，豎立也。”^⑤《周禮·天官·序官》：“惟王建國。”鄭玄注：“建，立也。”^⑥武，《說文》戈部：“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⑦《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功定天下也。”^⑧

[二十四]牴，《說文》牛部：“觸也。從牛，氏聲。”^⑨觸，《說文》角部：“抵也。從角，蜀聲。”二字互訓。段玉裁注：“牴，亦作抵、觝。”^⑩牴觸、抵觸，牛羊等動物用角相鬥。也用以指人格鬥角力。《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顏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⑪

①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上，28頁。

② 《春秋左傳正義》，1367-1369頁。

③ 《漢書》卷二七下之下，1514-1515頁。

④ 《說文解字注》，78頁上欄。

⑤ 《宋本玉篇》，199頁。

⑥ 《周禮注疏》，1頁。

⑦ 《說文解字注》，638頁上欄。

⑧ 《漢書》卷二二，1038頁。

⑨ 《說文解字注》，53頁上欄。

⑩ 《說文解字注》，187頁下欄。

⑪ 《漢書》卷六，194頁。

[二十五]軍,軍事。役,《說文》殳部:“戍邊也。從殳,從彳”。段玉裁注:“引伸之義,凡事勞皆曰役。”^①《詩·小雅·杕杜》序:“勞還役也。”毛傳:“役,戍役也。”^②軍役,因軍事而起之役。《漢書·食貨志上》:“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③

[二十六]嘉,《說文》壺部:“美也。從壺,加聲。”段玉裁注:“嘉,善也。”^④《詩·豳風·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鄭玄箋:“嘉,善也。”^⑤臧,《說文》臣部:“善也。從臣,戕聲。”與“嘉”同義。^⑥《詩·大雅·抑》:“辟爾爲德,俾臧俾嘉。”^⑦

【解說】

建武,指建立武事。牴觸,原意指動物用角格鬥,也用於指人角力。軍役,因軍事而徵發的兵役和勞役。嘉臧,美善。《禮記·月令》孟冬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⑧與此句意思正相合。冬季爲顓頊所掌之月。

貿易[二十七]買販[二十八],市旅[二十九]賈商[三十]。鯁展[三十一]賁達[三十二](簡48),游敖[三十三]周章[三十四]。

【校釋】

[二十七]貿,《說文》貝部:“易財也。從貝,卯聲。”^⑨《玄應音義》卷六“貿易”注引《三蒼》曰:“貿,換易也。”^⑩易,交換。《易·繫辭下》:“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⑪貿易,交易、買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其詐貿易馬及僞診,皆以詐僞出馬令論(簡514)。”^⑫

[二十八]買,《說文》貝部:“市也。從网、貝。”^⑬販,《說文》貝部:“買賤賣貴者。從貝,反聲。”^⑭《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⑮張

① 《說文解字注》,121 頁上欄。

② 《毛詩正義》,602 頁。

③ 《漢書》卷二四上,1135 頁。

④ 《說文解字注》,207 頁下欄。

⑤ 《毛詩正義》,525 頁。

⑥ 《說文解字注》,119 頁下欄。

⑦ 《毛詩正義》,1171 頁。

⑧ 《禮記正義》,551 頁。

⑨ 《說文解字注》,284 頁上欄。

⑩ 王華權、劉景雲編撰:《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7 頁。

⑪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99 頁。

⑫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86 頁。

⑬ 《說文解字注》,284 頁下欄。

⑭ 《說文解字注》,284 頁下欄。

⑮ 《史記》卷八五,2505 頁。

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口市律》：“及有販賣買而詐給人(簡261)”。^①

[二十九]市，《說文》門部：“買賣所之也。市有垣。從門，從亼。象物相及也。亼，古文及字，之省聲。”^②買賣交易的場所。《呂氏春秋·勿躬》：“祝融作市。”^③旅，原指旅行，引申為游客或留宿游客的館舍。《爾雅·釋宮》：“旅，途也。”^④《周禮·考工記·序》：“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玄注：“商旅，販賣之客也。”《呂氏春秋·仲秋紀》：“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高誘注：“旅者，行商也。”^⑤《史記·陳杞世家》：“羈旅之臣。”《集解》引賈逵曰：“羈，寄；旅，客也。”^⑥《風俗通義·佚文》：“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縣有亭長。又語有亭待，蓋行旅宿食所館也。”^⑦

[三十]賈，《說文》貝部：“市也。從貝，而聲。一曰坐賣售也。”段玉裁注：“市，買賣所之也。因之凡買凡賣皆曰市。賈者，凡買賣之稱也。”^⑧與“商”相對時，指在市肆中固定從事交易買賣的行為或人。商，字形作“𠂔”，為小篆的寫法，參見《說文》字形，可直接隸定為“商”。《說文》肉部：“商，從外知內也。從肉，章省聲。”^⑨《廣雅·釋詁》：“商，度也。”^⑩估算。後引申為從事流動交易買賣的行為或人。《周禮·天官·大宰》：“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注：“行曰商，處曰賈。”^⑪《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⑫

[三十一]𦘒，《說文》角部：“角中骨也。從角，思聲。”段玉裁注：“骨當作肉，字之誤也……此則謂角之中、角之本當中有肉之處。外有文理可觀……玉部：‘𦘒理自外可以知中’，引伸謂凡物之文理也。”^⑬此處當為引申義，與下文之“賁”相對應。意為紋飾，指裝飾華麗的貨物。展，字形作𦘒，為小篆，見《說文》尸部“屨”，可直接隸定為“展”。《說文》：“展，轉也。從尸，𦘒省聲。”段玉裁注：“陸德明云：《字林》作輾。然則《周南》作輾轉。”^⑭展，通“輾”，輾轉。戰國秦漢文獻中“展”與“轉”也常連用，作“展轉”。《韓非子·存韓》：“韓則居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5頁。

② 《說文解字注》,230頁下欄。

③ 《呂氏春秋集釋》,450頁。

④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王世偉整理:《爾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38頁。

⑤ 《呂氏春秋集釋》,178頁。

⑥ 《史記》卷三六,1578頁。

⑦ 《風俗通義校注》,493頁。

⑧ 《說文解字注》,284頁上欄。

⑨ 《說文解字注》,88頁下欄。

⑩ [清]王念孫著:《廣雅疏證》卷一下,北京:中華書局,2004,107頁。

⑪ 《周禮注疏》,32-33頁。

⑫ 《白虎通疏證》,346頁。

⑬ 《說文解字注》,187頁上欄。

⑭ 《說文解字注》,404頁上欄。

中國，展轉不可知。”^①《戰國策·趙策一·秦王謂公子他》：“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②此處“展”與後文的“達”意思相通，指貨物流通四通八達。

[三十二]賁，《說文》貝部：“飾也。從貝，𠂔聲。”^③《玉篇》貝部：“賁，飾也。”^④《書·湯誥》：“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孔安國傳：“賁，飾也。”引申為華美。《廣雅·釋詁》：“賁，美也。”^⑤《易·賁》：“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孔穎達疏：“賁如，華飾之貌。”^⑥《詩·小雅·白駒》：“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朱熹《詩集傳》：“賁然，光彩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⑦此處指文飾華麗的商品。達，《說文》辵部：“行不相遇也。從辵，牽聲。”段玉裁注：“今俗說不相遇尚有此言，乃古言也。讀徒葛切。訓通達者，今言也。”^⑧《玉篇》辵部：“達，通也。”^⑨《釋名·釋兵》：“鋌，延也。延，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⑩指貨物流通。《史記·貨殖列傳》：“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⑪即“商而通之”之意。

[三十三]游，《說文》𠂔部：“旌旗之流也。從𠂔，汙聲。”段玉裁注：“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又引伸為出游、嬉游，俗作‘游’。”^⑫《書·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孔安國傳：“盤樂游逸無法度。”^⑬《楚辭·天問》：“焉有虬龍，負熊以游？”王逸注：“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游戲者乎？”^⑭敖，《說文》放部：“出游也。從出放。”段玉裁注：“《邶風》曰：‘以敖以游’。敖游同義也……從放，取放浪之意。”^⑮游敖，指出外旅游、嬉戲。《漢書·食貨志上》記載：商賈“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⑯《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⑰

①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18頁。

② 《戰國策》，615頁。

③ 《說文解字注》，282頁上欄。

④ 《尚書正義》，200頁。

⑤ 《廣雅疏證》卷一上，76頁。

⑥ 《周易正義》，106頁。

⑦ [宋]朱熹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162頁。

⑧ 《說文解字注》，73頁下欄。

⑨ 《宋本玉篇》，196頁。

⑩ [漢]劉熙撰：《釋名》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113頁。

⑪ 《史記》卷一二九，3254頁。

⑫ 《說文解字注》，314頁上欄。

⑬ 《尚書正義》，176頁。

⑭ 黃靈庚疏證：《楚辭章句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1059頁。

⑮ 《說文解字注》，162頁上欄。

⑯ 《毛詩正義》，354頁。

⑰ 《史記》卷二五，1243頁。

[三十四]周,《說文》口部:“周,密也。從用、口。”段玉裁注:“引伸訓爲周緻也。”^①章,從整理者,即“章”。章,《說文》音部:“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竟,樂曲盡爲竟。”段玉裁注:“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②《楚辭·九歌·雲中君》:“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王逸注:“周流也。謂周流往來。”^③《文選·羽獵賦》:“章皇周流。”李善注:“章皇,猶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④“周章”與“游敖”均指商賈、游客穿行往來,周游道路。

【解說】

在時人觀念體系中,一說,“祝融作市”,即市場交易是祝融創造的。一說,炎帝神農作市。《潛夫論·五德》:“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⑤《風俗通義·皇霸》:“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⑥總之,市場與火、夏季有關。因此,《禮記·月令》仲夏月規定:“門閭毋閉,關市毋索。”^⑦這兩句與此對應,講貿易往來、市場買賣的繁榮景象。

黠黧黯黮[三十五],黠黠黠黠[三十六]。黠黠[三十七]赫報[三十八],儵赤白黃[三十八](簡49)。

【校釋】

[三十五]黠,《說文》黑部:“淺黃黑也。從黑,甘聲。”^⑧黧,《說文》黑部:“中黑也。從黑,厭聲。”段玉裁注:“謂黑在中也。”^⑨《廣雅·釋器》:“黧,黑也。”^⑩黯,《說文》黑部:“深黑也。從黑,音聲。”^⑪黮,《說文》黑部:“桑葚之黑也。從黑,甚聲。”^⑫《孔子家語·辯樂》:“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王肅注:“黮,黑貌。”^⑬《淮南子·主術》:“問瞽師曰……‘黑何

① 《說文解字注》,59頁上欄。

② 《說文解字注》,103頁上欄。

③ 《楚辭章句疏證》,786頁。

④ [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131頁。

⑤ 《潛夫論箋校正》,389頁。

⑥ 《風俗通義校注》,7頁。

⑦ 《禮記正義》,504頁。

⑧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⑨ 《說文解字注》,492頁上欄。

⑩ 《廣雅疏證》卷八上,1076頁。

⑪ 《說文解字注》,492頁上欄。

⑫ 《說文解字注》,493頁下欄。

⑬ 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上海書店,1987,204頁。

若?’曰:‘黢然。’”^①《楚辭·九辯》:“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黯而有瑕。”王逸注:“謂不明淨也。”^②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黢厖黯黢黑如皮(暫44)”之語,^③可參考。

[三十六]黢,《說文》黑部:“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登字。”^④黢,《說文》黑部:“微青黑色。從黑,幼聲。”段玉裁注:“謂微青之黑也。微輕於淺矣。”^⑤《爾雅·釋器》:“黑,謂之黢。”^⑥《周禮·春官·守祧》:“其祧,則守祧黢至之。”鄭司農云:“幽讀爲黢。黢,黑也。”^⑦黢,《說文》黑部:“果實黢黯黑也。從黑,弇聲。”^⑧《玉篇》黑部:“黢,深黑色也。”^⑨黢,《說文》黑部:“赤黑也。從黑,易聲。讀若煬。”^⑩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黢黢黢黢赤(暫44)詒多(暫41)”之語,^⑪可參考。

[三十七]黢,《說文》黑部:“黃黑也。從黑,金聲。”段玉裁注:“謂黃色之黑。”^⑫《玉篇》黑部:“黢,黃黑如金也。”^⑬黢,《說文》黑部:“青黑也。從黑,奄聲。”段玉裁注:“謂青色之黑也。”^⑭《玄應音義》卷十七“黢黢”注引《蒼頡篇》:“黢黢,深黑不明也。”^⑮

[三十八]赫,《說文》赤部:“火赤貌。從二赤。”段玉裁改“火”爲“大”,注曰:“大,各本作火,今正。此謂赤,非謂火也。赤之盛,故從二赤。《邶風》:‘赫如渥赭。’傳曰:‘赫,赤貌。’此赫之本義也。”^⑯赧,《說文》赤部:“面慙而赤也。從赤,反聲。”^⑰《孟子·滕文公下》:“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⑱朱熹《集注》:“赧赧,慙而面赤之貌。”^⑲本章當指顏色,與赫相近。

[三十八]儻,《說文》黑部:“青黑繒縫白色也。從黑,攸聲。”^⑳徐鍇《繫傳》作:“青黑繒

① 《淮南子集釋》,700頁。

② 《楚辭章句疏證》,696-697頁。

③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1頁。胡平生先生將“皮”釋爲“夜”(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簡帛網,2010年1月17日)。

④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⑤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⑥ 《爾雅注疏》,264頁。

⑦ 《周禮注疏》,561頁。

⑧ 《說文解字注》,494頁上欄。

⑨ 《宋本玉篇》,396頁。

⑩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⑪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1頁。

⑫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⑬ 《宋本玉篇》,396頁。

⑭ 《說文解字注》,492頁下欄。

⑮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372頁。

⑯ 《說文解字注》,496頁下欄。

⑰ 《說文解字注》,496頁上欄。

⑱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74頁。

⑲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270頁。

⑳ 《說文解字注》,493頁下欄。

發白色也”。^①赤,《說文》赤部:“南方色也。從大火。”段玉裁注:“按赤色至明,引申之,凡洞然昭著皆曰赤……火者,南方之行。故赤爲南方之色。從大者,言大明也。”^②白,《說文》白部:“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從入合二。二,陰數。”^③黃,《說文》黃部:“地之色也。從田,疋聲。”段玉裁注:“玄者,幽遠也,則爲天之色可知。《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禠也。天玄而地黃。’”^④儵赤白黃,當指“赤青白黃”四方色,儵即青色。《續漢書·輿服志下》:“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瘡,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瘡,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⑤

【解說】

“黠”以下十二字,爲深淺不一、雜有其他顏色的黑色。黑色爲顓頊水德北方冬季之色。《禮記·月令》孟仲季冬月,天子均“居玄堂”,“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⑥則“黠”等十二字與顓頊相配。赫、赧則顯然與火、赤有關,即與祝融有關。前文注所引《史記·封禪書》載,力主漢爲水德的丞相張蒼認爲,漢王朝年始冬十月,德色爲外黑內赤。儵赤白黃,指“赤青白黃”四方色,故用於代指天下。《續漢書·輿服志》中的“剛卯”指劉姓。^⑦“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指劉姓擁有天下,統攝四方。“帝令祝融”的“帝”當指顓頊,顓頊命令手下祝融,抵擋瘟疫、厲鬼,護衛劉姓天下。秦時僅祭祀四方帝,不祭黑帝。漢二年,劉邦立北時,祭黑帝,五帝祠纔得以完備。《史記·封禪書》:“(漢)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⑧“儵赤白黃”四方色的觀念自戰國秦以來相沿已久。

殪弃[三十九]臞瘦[四十],兒孺[四十一]早殤[四十二]。

【校釋】

[三十九]殪,《說文》歹部:“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從歹,堇聲。”^⑨《左傳》昭公三年:“庶

① [南唐]徐鉉撰:《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202頁。

② 《說文解字注》,496頁上欄。

③ 《說文解字注》,367頁上欄。

④ 《說文解字注》,704頁下欄。

⑤ 《後漢書》志第三〇下,3673頁。

⑥ 分見《禮記正義》543、553、559頁。

⑦ 《漢書·王莽傳中》王莽始建國元年,下詔:“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顏師古注:“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漢書》卷九九中,4109、4110頁。)

⑧ 《史記》卷二八,1378頁。

⑨ 《說文解字注》,165頁上欄。

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杜預注：“餓死爲殣”。^①《國語·楚語下》：“道殣相望。”韋昭注：“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②弃，《說文》華部：“捐也。從升，推華弃之。”^③《釋名·釋喪制》：“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趨使葬腐而已也。不得埋曰弃，謂弃之於野也。不得停屍曰捐，捐於地邊者也。”^④殣弃，指將路途中餓死的人草草掩埋。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當道魁”之語，可以爲證。《國語·周語下》：“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韋昭注：“小阜曰魁。”^⑤將餓殍草草掩埋，堆起小土包。

[四十]臞，整理者認爲即“羸”，^⑥是。羸，《說文》肉部：“少肉也。從肉，瞿聲。”^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羸。”《集解》引徐廣注曰：“羸，瘦也。”^⑧《漢書·司馬相如列傳下》顏師古注：“羸，瘠也。”^⑨羸、瘦二字同義，也可作瘦羸。《淮南子·脩務》：“神農憔悴，堯瘦羸。”^⑩指消瘦、憔悴。

[四十一]兒，《說文》兒部：“孺子也。從兒，象小兒頭凶未合。”段玉裁注：“兒孺雙聲。引伸爲凡幼小之稱。”^⑪孺，《說文》子部：“乳子也……從子，需聲。”^⑫兒、孺爲同義詞，幼小的孩子。

[四十二]早，《說文》日部：“不雨也。從日，干聲。”^⑬一說，“早”即“早”。^⑭殤，《說文》歹部：“不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爲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爲下殤。從歹，傷省聲。”^⑮《儀禮·喪服》：“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鄭玄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⑯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兒孺早殤父母悲”之語。^⑰

① 《春秋左傳正義》，1183 頁。

② 《國語集解》，522 頁。

③ 《說文解字注》，160 頁上欄。

④ 《釋名》卷八，136 頁。

⑤ 《國語集解》，132 頁。

⑥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18 頁。

⑦ 《說文解字注》，173 頁上欄。

⑧ 《史記》卷一一七下，3056 頁。

⑨ 《漢書》卷五七下，2592 頁。

⑩ 《淮南子集釋》，1321 頁。

⑪ 《說文解字注》，409 頁下欄。

⑫ 《說文解字注》，750 頁上欄。

⑬ 《說文解字注》，308 頁下欄。

⑭ 張存良：《〈蒼頡篇〉的版本、流傳、亡佚和再發現》，《甘肅社會科學》2015 年第 1 期。

⑮ 《說文解字注》，164 頁上欄。

⑯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98 頁。

⑰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1 頁。

【解說】

殣弃，餓殍於路，草草掩埋。羸瘦，瘦骨嶙峋。兒孺早殤，嬰幼兒死去。時人的月令觀念，如果不按照月令行事，采用其他季節的時令，就會出現災異。《禮記·月令》仲夏月：“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蠱時起，其國乃饑。”^①季冬月“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②此句反映的就是違反仲夏月令和季冬月令，造成饑饉、嬰幼兒死亡的情形。

恐懼[四十三]懷歸[四十四]，趨走[四十五]病狂[四十六]。

【校釋】

[四十三]恐，《說文》心部：“懼也。從心，巩聲。”^③懼，《說文》心部：“恐也。從心，瞿聲。”^④恐、懼二字互訓，為同義詞。恐懼，畏懼，害怕。《史記·秦始皇本紀》：“諸侯恐懼，會盟而弱秦。”^⑤

[四十四]懷，《說文》心部：“念思也。從心，褱聲。”段玉裁注：“念思者，不忘之思也。”^⑥歸，《說文》止部：“女嫁也。從止，從婦省，自聲。”段玉裁注：“乃凡還家者假婦嫁之名也。”^⑦懷歸，思念歸家。《詩·小雅·小明》：“豈不懷歸？畏此罪罟。”^⑧

[四十五]趨，《說文》走部：“走也。從走，芻聲。”^⑨走，《說文》走部：“趨也……凡走之屬皆從走。”^⑩二字互訓。《釋名·釋姿容》：“疾行曰趨。”“疾趨曰走。”^⑪

[四十六]病，《說文》癘部：“卧驚病也。從癘省，丙聲。”^⑫《廣韻·映韻》：“病，驚病。”^⑬即癡病，神經官能症。狂，《說文》犬部：“狢犬也。從犬，圭聲。”^⑭狂犬病。引申為瘋癲，精神失常。《史記·倉公列傳》：“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⑮

【解說】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孟冬行春令，則凍閉

- ① 《禮記正義》，507 頁。
- ② 《禮記正義》，564 頁。
- ③ 《說文解字注》，519 頁上欄。
- ④ 《說文解字注》，500 頁下欄。
- ⑤ 《史記》卷六，279 頁。
- ⑥ 《說文解字注》，509 頁下欄。
- ⑦ 《說文解字注》，68 頁下欄。
- ⑧ 《毛詩正義》，800 頁。
- ⑨ 《說文解字注》，64 頁上欄。
- ⑩ 《說文解字注》，64 頁上欄。
- ⑪ 《釋名》卷三，35-36 頁。
- ⑫ 《說文解字注》，64 頁上欄。
- ⑬ 《廣韻校本》，431 頁。
- ⑭ 《說文解字注》，64 頁上欄。
- ⑮ 《史記》卷一〇五，2801 頁。

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①此句反映的是違反季夏月令、孟冬月令，百姓被迫遷徙、顛沛流離、恐懼、思念故鄉乃至發癲發狂的情形。

疵疖[四十七]禿癭[四十八](簡50)，齟齬[四十九]瘡傷[五十]。毆伐[五十一]痠痛[五十二]，腠肤[五十三]睛盲[五十四]。

【校釋】

[四十七]疵，《說文》疒部：“病也。從疒，此聲。”^②《廣韻·支韻》：“疵，黑病。”^③《慧琳音義》卷七十八“瘦疵”注曰：“疵，瘡也，肉有黑毛生曰疵。”^④疖，《說文》疒部：“頭瘍也。從疒，匕聲。”^⑤《周禮·天官·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鄭玄注：“疖，頭瘍，亦謂禿也。”賈公彥疏：“疖，頭瘍，謂頭上有瘡含濃血者。”^⑥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癘》記述丙“以三歲時病，疖，麋(眉)突(禿)(簡52)”^⑦。

[四十八]禿，《說文》禿部：“無髮也。從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⑧癭，《說文》疒部：“頸腫也。從疒，婁聲。”^⑨《淮南子·說山》：“狸頭愈鼠，雞頭已癭。”^⑩疵、疖、禿、癭，應都為頭部的傷病。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疵疖禿癭頭傷瘡”之語，^⑪可參考。

[四十九]齟，《說文》齒部：“齧也。從齒，奇聲。”^⑫齬，《說文》齒部：“齧也。從齒，气聲。”^⑬二字同義，此指牙齒咬嚙傷。《史記·田儋列傳》：“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注：“齟齬，猶齧齧。”《索隱》：“齟齬，側齒齧也。”^⑭

[五十]瘡，《說文》疒部：“傷也。從疒，夷聲。”^⑮《釋名·釋疾病》：“瘡，侈也。侈開皮膚為創也。”^⑯《公羊傳》成公十六年：“王瘡者何？傷乎矢也。”徐彥疏：“瘡，傷也。”^⑰瘡傷，指刀

① 《禮記正義》，507-508 頁。

② 《說文解字注》，352 頁上欄。

③ 《廣韻校本》，48 頁。

④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索引》，1889 頁。

⑤ 《說文解字注》，352 頁下欄。

⑥ 《周禮注疏》，108 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156 頁。

⑧ 《說文解字注》，411 頁下欄。

⑨ 《說文解字注》，353 頁上欄。

⑩ 《淮南子集釋》，1154 頁。

⑪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161 頁。

⑫ 《說文解字注》，79 頁上欄。

⑬ 《說文解字注》，80 頁下欄。

⑭ 《史記》卷九四，2644 頁。

⑮ 《說文解字注》，355 頁上欄。

⑯ 《釋名》卷八，129 頁。

⑰ 《春秋公羊傳注疏》，403 頁。

劍等兵器造成的創傷。《史記·蒙恬列傳》“論”曰：“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①

[五十一]毆，《說文》殳部：“捶毆物也。從殳，區聲。”^②伐，《說文》人部：“擊也。從人，持戈。”^③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鬥而以釵及金鐵銳、錘、椎傷人，皆完爲城旦舂。其非用此物而眚人，折枳、齒、指，肤體，斷肤(決)鼻、耳者(簡27)，耐。(簡28)”^④推測不用金鐵銳器稱毆，用金鐵銳器則稱伐。

[五十二]痍，《說文》疒部：“毆傷也。從疒，祇聲。”^⑤瘡，《說文》疒部：“痍瘡也。從疒，有聲。”^⑥《急就篇》卷四：“痍瘡保辜誑呼號。”顏師古注：“毆人皮膚腫起曰痍，毆傷曰瘡。”^⑦《漢書·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痍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癰者，律謂痍瘡。”^⑧

[五十三]肤，《說文》肉部：“孔也。從肉，決省聲。”^⑨指造成身體創傷。亦通“決”，斷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折枳、齒、指，肤體，斷肤鼻、耳者。(簡27)”^⑩《淮南子·說山》：“故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顛活。”^⑪肤，《說文》：“骨差也。從肉，失聲。讀與跌同。”段玉裁注：“謂骨節差忒不相值。故肤出也。”^⑫指骨節折斷、錯位。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妻悍，夫毆治之，決(決)其耳，若折支(肢)指、肤體(體)，問夫可(何)論？當耐。(簡79)”^⑬

[五十四]睛，《玉篇》目部：“目珠子。”^⑭眼珠。《論衡·書虛》：“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⑮或當釋爲“瞢”。瞢，《說文》：“目不明也。從苜，從旬。旬，目數搖也。”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有“肤肤瞢盲樂府師”，^⑯可參考。盲，《說文》目部：“目無牟子。從目，亡聲。”段玉裁注：“無牟子者，白黑不分是也。今俗謂青盲。”^⑰指失明。《釋名·釋疾病》：

① 《史記》卷八八，2570 頁。

② 《說文解字注》，120 頁下欄。

③ 《說文解字注》，385 頁下欄。

④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2 頁。

⑤ 《說文解字注》，354 頁下欄。

⑥ 《說文解字注》，354 頁下欄。

⑦ 《四部叢刊續編》景明抄本電子版。

⑧ 《漢書》卷八三，3395-3396 頁。

⑨ 《說文解字注》，172 頁上欄。

⑩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2 頁。

⑪ 《淮南子集釋》，1156 頁。

⑫ 《說文解字注》，174 頁上欄。

⑬ 《睡虎地秦墓竹簡》，112 頁。

⑭ 《宋本玉篇》，86 頁。

⑮ 《論衡校釋》，172 頁。

⑯ 張存良、巨虹：《〈蒼頡篇〉研究的新進展》，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4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243 頁。

⑰ 《說文解字注》，136 頁下欄。

“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①《漢書·杜欽傳》：“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顏師古注：“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目也。”^②

【解說】

《禮記·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③“（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④“（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仲冬月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⑤此兩句的病症和創傷應是違反夏季月令和冬季月令後出現的瘟疫病症，以及暴兵來至格鬥後出現的創傷。

執囚[五十五]束縛[五十六]，論訊[五十七]既詳[五十八]（簡51）。

【校釋】

[五十五]執，《說文》𠂔部：“捕罪人也。從𠂔、𠂔，𠂔亦聲。”^⑥《呂氏春秋·慎行》：“王信之，使執連尹。”高誘注：“執，囚也。”^⑦囚，《說文》口部：“繫也。從人在口中。”^⑧拘繫罪犯。《史記·衛青列傳》：“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⑨

[五十六]束，《說文》束部：“縛也。從口、木。凡束之屬皆從束。”^⑩縛，《說文》糸部：“束也。從糸，尊聲。”^⑪二字互訓，義同，用繩子、枷鎖等捆綁。《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長嘆。”^⑫

[五十七]論，《說文》言部：“議也。從言，侖聲。”^⑬訊，《說文》言部：“問也。從言，𠂔聲。”^⑭秦漢法律訴訟程序的兩個環節。《漢書·張湯傳》“訊鞠論報”，顏師古注：“訊，考問也……論報，謂上報之而獲報也。”^⑮論，定罪。嶽麓書院秦簡《癸、瑣相移謀購案》：“五月甲辰，州陵守綰、丞越、史獲論令癸、瑣等各贖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歲，以當灋（法）；先備（簡

① 《釋名》卷八，126 頁。

② 《漢書》卷六〇，2667 頁。

③ 《禮記正義》，507-508 頁。

④ 《禮記正義》，552 頁。

⑤ 《禮記正義》，557-558 頁。

⑥ 《說文解字注》，501 頁上欄。

⑦ 《呂氏春秋集釋》，601 頁。

⑧ 《說文解字注》，281 頁上欄。

⑨ 《史記》卷一一一，2922 頁。

⑩ 《說文解字注》，278 頁上欄。

⑪ 《說文解字注》，654 頁上欄。

⑫ 《史記》卷八七，2560 頁。

⑬ 《說文解字注》，92 頁上欄。

⑭ 《說文解字注》，92 頁下欄。

⑮ 《漢書》卷五九，2637 頁。

013) 贖。不論沛等(簡 014)。”^①訊,審問、審訊。睡虎地秦簡《封診式·訊獄》,對審訊程序有較詳細的記述。^②

[五十八]既,《說文》皀部:“小食也。從皀,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段玉裁注:“引伸之義爲盡也,已也。”^③詳,《說文》言部:“審議也。從言,羊聲。”段玉裁注:“審,悉也。”^④《玉篇》言部:“詳,審也,論也,諛也。”^⑤《釋名·釋姿容》:“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⑥《釋名·釋用器》:“鉞,謹也。板廣不可得制削,又有節,則用此鉞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迹也。”^⑦既、詳同義,指詳盡、審慎之義。《漢書·蕭望之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義不詳。”顏師古注:“詳,審也。”^⑧《後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⑨

【解說】

祝融爲司徒之官,職掌之一即刑罰。《管子·五行》:“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⑩《周禮·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⑪《禮記·月令》孟夏月規定:“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⑫《禮記·月令》仲冬月:“塗闕廷門間,築圜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⑬此段內容講述的就是抓捕囚犯,審訊論罪要仔細、審慎。

卜筮[五十九]卦占[六十],祟在[六十一]社場[六十二]。

【校釋】

[五十九]卜,《說文》卜部:“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凡卜之屬皆從卜。”^⑭筮,《說文》竹部:“《易》卦用蓍也。從竹,從彘。彘,古文巫字。”^⑮占測吉凶,用龜

①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3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148頁。

③ 《說文解字注》,219頁上欄。

④ 《說文解字注》,92頁下欄。

⑤ 《宋本玉篇》,165頁。

⑥ 《釋名》卷三,35頁。

⑦ 《釋名》卷七,105頁。

⑧ 《漢書》卷七八,3288頁。

⑨ 《後漢書》卷二,105頁。

⑩ 《管子校注》,865頁。

⑪ 《周禮注疏》,268-269頁。

⑫ 《禮記正義》,494-495頁。

⑬ 《禮記正義》,557頁。

⑭ 《說文解字注》,128頁上欄。

⑮ 《說文解字注》,219頁上欄。

甲稱卜，用蓍草稱筮，合稱卜筮。《尚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傳：“龜曰卜，蓍曰筮。”^①《禮記·曲禮上》：“龜爲卜，策爲筮。”同篇“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玄注：“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②《白虎通·蓍龜》：“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③

[六十] 𠄎，《說文》卜部：“灼龜坼也。從卜、兆，象形。”段玉裁注：“兆者如龜之坼。”^④龜甲灼燒後形成的璽紋。同“兆”。占，《說文》卜部：“視兆問也。從卜，從口。”^⑤𠄎占，文獻材料中多爲兆占，占卜之義。《漢書·王莽傳上》：“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⑥也稱占兆。《禮記·月令》孟冬月：“命大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⑦

[六十一] 崇，《說文》示部：“神禍也。從示，從出。”^⑧徐鍇《繫傳》：“崇者，神自出之以警示人者，亦癘神無故而爲。”^⑨鬼神爲禍。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甲乙有疾，父母爲崇，得之於肉，從東方來。（簡 69 正貳）”^⑩在，《說文》土部：“存也。從土，才聲。”^⑪此句爲介詞。

[六十二] 社，《說文》示部：“地主也。從示、土。”^⑫《國語·魯語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韋昭注：“社，后土之神也。”^⑬《白虎通·社祭》：“社者，土地之神也。”^⑭場，《說文》土部：“祭神道也……從土，易聲。”^⑮《國語·楚語下》“壇場之所”，韋昭注：“除地曰場。”^⑯《漢書·郊祀志上》“壇場上下”，顏師古注：“積土爲壇，平地爲場。”^⑰社場，謂祭土地神的場所。《鹽鐵論·散不足》：“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⑱

① 《尚書正義》，314 頁。

② 《禮記正義》，93、89 頁。

③ 《白虎通疏證》，329 頁。

④ 《說文解字注》，128 頁上欄。

⑤ 《說文解字注》，128 頁下欄。

⑥ 《漢書》卷九九上，4088 頁。

⑦ 《禮記正義》，544-546 頁。

⑧ 《說文解字注》，8 頁下欄。

⑨ 《說文解字繫傳》，4 頁。

⑩ 《睡虎地秦墓竹簡》，193 頁。

⑪ 《說文解字注》，693 頁下欄。

⑫ 《說文解字注》，8 頁上欄。

⑬ 《國語集解》，155-156 頁。

⑭ 《白虎通疏證》，91 頁。

⑮ 《說文解字注》，699 頁下欄。

⑯ 《國語集解》，514 頁。

⑰ 《漢書》卷二五上，1189-1190 頁。

⑱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352 頁。

【解說】

前引《禮記·月令》，孟冬月要命大史舉行“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的儀式，用以“察阿黨”。這個活動通常應是在社舉行的。月令中數次提到社、公社或社稷。如《禮記·月令》孟冬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①

寇賊[六十三]盜殺[六十四]，捕獄[六十五]問諒[六十六]。百卅六(簡52)。

【校釋】

[六十三]寇，《說文》支部：“暴也。從支，從完。”^②《玉篇》宀部：“寇，賊寇也。寇，暴也。”^③賊，《說文》戈部：“賊，敗也。”^④《玉篇》戈部：“盜也。賊，劫人也。”^⑤《左傳》僖公九年“不僭不賊”，杜預注：“賊，傷害也。”^⑥《國語·晉語五》“使鉏麇賊之”，韋昭注：“賊，殺也。”^⑦寇、賊二字義相近。寇賊在典籍中常連用。《尚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孔穎達疏：“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⑧此解釋最為允當。

[六十四]盜，《說文》次部：“私利物也。從次、皿。”^⑨《左傳》文公十八年“竊賄為盜”，孔穎達疏：“竊人財賄謂之為盜。”^⑩《荀子·正論》：“故盜不竊，賊不刺。”楊倞注：“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⑪殺，《說文》殺部：“戮也。從殳，杀聲。凡殺之屬皆從殺。”^⑫盜殺，法律術語，指盜竊殺人或搶劫殺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盜殺傷人，盜發冢……皆磔。”(簡66)^⑬

[六十五]捕，《說文》手部：“取也。從手，甫聲。”^⑭捉拿、逮捕之義。《漢書·高后紀》：“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⑮獄，《說文》𡩺部：“確也。從𡩺，從言。二犬，所以守

① 《禮記正義》，550-551 頁。

② 《說文解字注》，126 頁上欄。

③ 《宋本玉篇》，332 頁。

④ 《毛詩正義》，1157 頁。

⑤ 《說文解字注》，636 頁下欄。

⑥ 《春秋左傳正義》，360 頁。

⑦ 《國語集解》，380 頁。

⑧ 《尚書正義》，535-538 頁。

⑨ 《說文解字注》，419 頁上欄。

⑩ 《春秋左傳正義》，576 頁。

⑪ 《荀子集解》，338 頁。

⑫ 《說文解字注》，121 頁下欄。

⑬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2 頁。

⑭ 《說文解字注》，615 頁下欄。

⑮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95 頁。

也。”段玉裁注：“許云所以守者，謂陞牢拘罪之處也。”^①也指在獄中核準審結案件。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春秋元命苞》曰：“獄者，核確也。”^②

[六十六]問，《說文》口部：“訊也。從口，門聲。”^③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問訊。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訊問女子噲（簡 202-203）”。^④諒，通假“掠”。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治獄》：“治獄，能以書從迹其言，毋治（笞）諒（掠）而得人請（情）爲上；治（笞）諒（掠）爲下。（簡 1）”^⑤《禮記·月令》仲春月：“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鄭玄注：“掠，謂捶治人。”^⑥

【解說】

寇賊、盜殺在漢代均爲重罪。夏月正是萬物萌芽生長之際，不宜過用刑罰。《禮記·月令》規定，孟夏月要“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仲夏月要“挺重囚，益其食”，^⑦即寬待重囚，增加他們的伙食。《後漢書·魯恭列傳》載其上書稱：“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李賢注：“挺，猶寬也。”“八月宿直昴，爲獄主殺。大陵之氣爲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成圖》曰‘大陵主死喪’也。”^⑧故此段對犯了寇賊、盜殺的重囚，祇是抓捕入獄，拷問審訊，而不能論罪處刑。重囚的論刑在仲秋，《禮記·月令》仲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⑨季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⑩後代俗語“秋後算賬”即源於此。

三 結語

通過上述校釋考察，我們可以確認《顓頊》章的內容緊緊圍繞開頭的顓頊、祝融展開，充分反映了時人關於天地、民神、時令、人類發展歷史等思想觀念。

① 《說文解字注》，482 頁下欄。

② [清]桂馥撰：《說文解字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53 頁。

③ 《說文解字注》，615 頁下欄。

④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90 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147 頁。

⑥ 《禮記正義》，472 頁。

⑦ 《禮記正義》，494-495、504 頁。

⑧ 《後漢書》卷二五，880-881 頁。

⑨ 《禮記正義》，525 頁。

⑩ 《禮記正義》，540 頁。

在先秦秦漢流行的古世系和宇宙觀念體系中，顓頊、祝融具有特殊地位。《漢書·律曆志上》載：“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從顓頊、火正黎即祝融時開始談曆數的起源。這一觀念淵源甚早，我們在記錄春秋歷史的《國語·楚語下》中已可以看到系統闡述。衆所周知，“曆數”是陰陽五行、五德終始、天人感應等學說的重要內容，是戰國秦漢時人構建天、地、民、神以及人類發展歷史等宇宙體系的核心基本概念。當時人認為，民神不得雜糅，但交互感應，民要通過正確的祭祀方式敬神，要順應時令，否則上天就會降下災異。顓頊為黃帝之後，五帝之一，是主宰上天衆神、世間萬物、地下諸鬼的最高神（也正因為如此纔稱“帝”）。在少皞氏衰落、九黎亂德時，顓頊承擔起恢復天地、天人、民神秩序的使命，史稱“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① 佐助他的兩個大臣南正重和火正黎，因火正黎（即祝融）主管大地生民，與人類息息相關，所以更加受到人類的重視。《蒼頡篇》的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創作了《顓頊》章，將顓頊和祝融作為此章的核心和緣起，論說時人流行的曆數思想。由於當時關於曆數、天地、民神、時令等觀念主要反映在以《禮記·月令》為代表的月令書中，所以《顓頊》章的很多內容都可以與月令書相印證，這也為數千年後我們理解《蒼頡篇·顓頊》提供了極好的線索。

由此我們也對北大藏漢簡《蒼頡篇》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了解。《蒼頡篇》並不是單純的字書，而是帶有明確意識形態色彩和教化功能的教科書。其功用不僅僅在於教人識字，還在於宣傳主流意識形態，弘揚統治者所認可的價值觀。我們也不得不感慨《蒼頡篇》作者的才華。《顓頊》緊緊圍繞開頭的顓頊、祝融展開，以宣傳天人相感、順應時令的曆數觀念為主旨，將各種生僻字串聯起來，承啟轉合，句句押韻，僅用一百餘字，便達到了字典、教化與美文兼備的功能。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蒙李振宏先生指教，單印飛、張欣博士幫助查檢資料，特此一并致謝。

^① 《國語集解》，514-515 頁。

讀北大簡《蒼頡篇》札記*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白軍鵬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對北大簡《蒼頡篇》文字的考釋及解讀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其首簡前一簡的上半段當為“賞祿賢知，賜予分貸，莊犯”；“啓久”和“便走”，在《新刊》中作“刺久”“便接”，應為版本不同所致，值得重視；“書插”當釋“奢掩”；“遮遮”二字與《說文》所記載的本義應該是相合的。

關鍵詞 北大《蒼頡篇》 《新刊》 阜陽漢簡



最近，一直被學術界期待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同時出版了第壹、叁、伍三本，其中第一本的內容是《蒼頡篇》，^①因為筆者之前曾經關注過相關問題，並寫過文章，^②因此，得到該書資料後便進行學習和研讀，研讀之後，發現北大《蒼頡篇》有可以證成我們之前觀點之處，亦有可以再進行闡發的地方，因此不揣簡陋，將新的想法寫出來，希望方家指正。


北大《蒼頡篇》簡1作為章題的“祿”上缺一字。按照其章題書寫習慣，我們知道其實是

* 本文的寫作得到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項目“敦煌漢簡校釋”（項目號：1537）及第57批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編號：2015M57134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編號：XQ15038）的資助。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下面為稱引方便，凡引該書簡文時稱北大《蒼頡篇》。

② 白軍鵬：《〈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的初步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字》新39期。為方便稱引，下文簡稱《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為《新刊》，筆者的文章稱《研究》。

前面缺了一枚簡。此簡首句當爲“□祿□□”。按,《新刊》3543有“癰瘞賞賜□”,其中的“賜”爲整理者所釋,我在《研究》中將其改釋爲“祿”,字作,釋“祿”應該沒有疑問。其後一字我釋爲“賢”。簡3382作“癰瘞▲□”,章節分隔號後面一字作,此字釋爲“賞”是沒有問題的,結合簡3382,亦可知將簡3543之“賜”改釋爲“祿”是正確的,簡2007作“▲賞”,由簡3382及2007可知“賞祿”恰好是一章之首。因此,北大《蒼頡篇》簡1前一簡章題“祿”上一字當爲“賞”字。《孔子家語·執轡》“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知“賞祿”乃古時常語。

《新刊》簡2472作“祿賢知賜予”,3430作“賢知賜予分貸莊犯”,加上簡3382以及3543所載,可知北大《蒼頡篇》簡1前一枚簡的內容是“賞祿賢知,賜予分貸,莊犯”。每枚容二十字,恰好半枚。這一章爲之職合韻,處在韻脚的“貸”爲職部字,與之契合,而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層面證明本文的推論不誤。《說文》:“貸,施也。”《國語·晉語》“施舍分寡”,韋昭謂:“施,施德,舍,舍禁,分少財也。”^①由此可知,“分”“貸”意近,與“賜予”意思亦相近。

二

簡3“抑按啓久,嬰但搶援,何竭負戴”,《新刊》3559作“釦久嬰担搶振柯根□”。其中的“振”字作,“根”字作,顯然都應該依照北大《蒼頡篇》改釋爲“援”“揭”。“担”字雖然殘損,然而依簡3311“□久嬰但”及北大《蒼頡篇》,顯然亦應改釋爲“但”。《新刊》3551“刻久”。其中的“刻”作,而3559的“釦”作,我在《研究》中將其改釋爲“刺”,讀“久”爲“灸”,并引《急就篇》“灸刺和藥逐去邪”等爲證。“刺灸”即“針灸”,《淮南子·精神訓》“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北大簡相當於“刺”的字作“啓”,阜陽漢簡《蒼頡篇》與之略同,祇是其从“刀”,不从“支”。馬王堆帛書中有《脈法》一篇,其中有“用砭啓脈者必如式”一句,學者們均認爲所謂的“啓脈”就是“用砭石刺破血脈”。^②《新刊》中兩次出現“刺”,顯然不會是誤書,且“刺”與“啓”字形不相近,無由致誤,二者的差別應該是版本不同所致。我曾經考察過,《新刊》中所載以及水泉子、居延、敦煌等地所出《蒼頡篇》均是“斷六十字爲一章”之後的本子,而北大本、阜陽本則爲斷章之前的本子。^③兩種版本不僅分章各不相同,而且用字也有差異。

稍帶指出一點,《新刊》3559改正後當爲“刺久,嬰但搶援,柯揭□”,“柯”與“揭”均从“手”作,而北大簡則作“何竭”。“柯”,《說文》訓“撝”,這裏應該與“何”一樣均爲“荷”之假借。“揭”,《說文》“高舉也”。“竭”則訓“負舉也”,意思相近。二字亦可相通,《廣雅疏證》


①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349頁。

② 周祖亮等:《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62頁。

③ 白軍鵬:《〈蒼頡篇〉的兩種漢代版本及相關問題研究》,《文獻》2015年第3期。

謂“竭與揭通”。^①《禮記·禮運》“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鄭玄注“竭猶負戴也”。漢魏人注書常引《蒼頡篇》為據，鄭氏的這個注解也許便受到《蒼頡篇》的影響。







三

簡五“便走巧亟，景桓昭穆”。“走”與“便”意近，無需贅言。在《新刊》中，簡 3477 有“敬景桓昭穆”，“敬”字為整理者所疑釋，此字作，我在《研究》中懷疑其當釋“亟”，并根據簡 3032 最末所殘之字與“景”相近而將簡 3441 之“便接巧亟”與 3477 內容作聯綴（并非綴合）。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簡五之“走”，《新刊》作“接”。《說文》“接，交也”，“走，捷也”。然而古籍中“接”訓“疾”之例很多，如《淮南子·本經》高誘注“接，疾也”。而其與“揭”相通或互訓之處也很多，《周易·晉》“晝日三接”，《禮記·內則》“接以大牢”，鄭注皆讀“接”為“捷”。因此郝懿行曰“接訓疾者，捷有疾義，捷接聲同，故古字通”。^②

四

簡六“戲叢書插，顛願重該，悉起臣僕”。此段文字又見於居延漢簡，即有名的第五章內容。其釋文《居延漢簡甲乙編》作“戲表書插，顛願重該，巨起臣僕”，^③胡平生先生改“戲”為“賤”，“巨”根據阜陽漢簡《蒼頡篇》改釋為“已”。^④若從北大簡來看，首字仍當釋“戲”，此字殘存右上角，可以看出是“戈”形，釋“戲”應該沒有問題。阜陽《蒼頡篇》中的“已”字殘缺，下面再簡單談一下。

“書”“插”二字分別作，居延漢簡 9.1A 作，《新刊》中簡 3254，整理者所作釋文為“沽亼亼掩”。其中的“沽”我改釋為“法”，而所謂的“亼”字作，簡 3097 整理者所作釋文為“□□春？□”，其所懷疑釋“春”的字作，我均將其改釋為“奢”，其實仔細觀察，就可知道它們與北大《蒼頡篇》以及居延《蒼頡篇》所謂的“書”是一字，皆為上从“大”，下从“者”，顯然應該釋為“奢”。其下一字北大簡整理者及以往居延漢簡的研究者們均釋“插”，^⑤其實也是不對的，此字當釋為“掩”，漢代隸書文字中，“奄”下“电”字有作“申”形的，


①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36 頁。







②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11 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6 頁。

④ 胡平生：《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上海：中西書局，2012，3 頁。

⑤ 蒙郭永秉先生提示，他與陳劍先生在觀看臺灣史語所《居延漢簡》紅外線圖版第一冊的校樣時，已經看到此“插”字應該改釋為“掩”，並為邢義田等先生採納。我們後來看到該書，確已依陳、郭二位先生的意見釋作“掩”，不過其它部分則較之之前各書沒有新釋意見。

如西嶽華山廟碑“奄有河朔”，“奄”作，可爲其證。“奢”，《說文》訓“張也”，又“夸，奢也”。而與“夸”相連的是“奄”，訓爲“覆也，大有餘也”。“掩”从“奄”聲，因此“奢”與“掩”應該是意近相連。不過《說文》“掩”字訓爲“斂也，小上曰掩”。因此“掩”與“奢”意又相反，按照《蒼頡篇》的列字規律，反義相連也是很常見的。^①

首字，北大《蒼頡篇》整理者釋“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與此字處在同樣位置的字《新刊》中數次出現，整理者或釋“𩇑”，或闕疑。我在《研究》中均釋爲“𩇑”。現在仔細看此字，簡 2449 作，簡 3254 作，簡 3607 作，簡 3675 作，前兩字左側殘缺過甚，不過由簡 3675 可知其左側確實从“盧”，其他簡則左側均不完整，不過从殘存字形看，與“盧”也是比較接近的。至於右側的字，筆者在《研究》中亦認爲所从爲“包”字，然而若从“包”，則“𩇑”與“戲”之間的聯繫很難找到。二字古音遠隔，“包”爲滂母幽部字，而“戲”則在曉母歌部。居延漢簡 14.28 “它”作，居延新簡 E.P.T 56.113 “它”作，均與所謂“𩇑”字的右側十分接近，在睡虎地秦簡中亦能找到例證。而“它”古韻在“歌”部，與“戲”韻同。因此，簡 3254《新刊》整理者認爲該字右側从“它”是有道理的。不過，在典籍中却找不到从“它”之字與“戲”相通之例。所以二字若相通，似乎并非由“它”。“戲”字的得聲其實是从“盧”來的，《說文》“戲，从戈盧聲”，而如《新刊》3675 之字，其亦从“盧”，因此我們懷疑它也是从“盧”得聲，如此則二字同从“盧”聲，從理論上是可相互通借的。^②

前面提到，“悉起臣僕”，阜陽漢簡整理者釋與“悉”相應的字爲“已”，胡平生先生并據此改釋居延漢簡之“巨”爲“已”。《新刊》簡 3028 整理者所作釋文爲“該忌起臣”，其中的“忌”作，“心”上所从爲“米”，這與北大簡“悉”字相同，亦與睡虎地秦簡中“悉”的寫法吻合。因爲阜陽漢簡殘缺過甚，尚不能貿然推測其亦當爲“悉”。

五

簡十九“遮泄沓詢”。“遮”字整理者引《說文》“遮，遏也”，謂其意乃“遏止，攔住”。“泄”，整理者亦引《說文》“迺也，晉趙曰泄”。又引《玉篇》“泄，超踰也”及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吏有五失，一曰夸以泄”爲證，認爲其又有“說得過多之義”。其後一義大概是爲了就“沓詢”的“多言”之義而說。

① 又，掩有“閉”義，如沈約《學省愁卧》“愁人掩軒卧”，李善注謂“掩，猶閉也”。《廣韻·琰韻》：“掩，閉取也”。“閉”與“奢”之“張”義亦相反。

② 無論从“它”還是从“包”，現在我們都尚未發現有這個字，考慮到二者均从“盧”，再觀察《新刊》中的諸字，其右側“它”或“包”與“戈”形很接近，而《新刊》又恰爲習字之簡，所以从“包”或从“它”之字很可能祇是一個被抄寫訛誤之字。

今按,《說文》“迺,遮也”,因此“遮”“迺”均有“遏止”之義。整理者後說不可從。^①《漢書·鮑宣傳》載鮑宣上書哀帝時曾提出“民有七亡”。其中第六亡爲“部落鼓鳴,男女遮迺”。晉灼曰“迺,古列字也”。顏師古謂“言聞桴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遮列而追捕”。郭在貽先生亦指出“民人追捕盜賊,乃正當之事。”與“亡”毫不相干。郭先生提出一種看法,即“遮”當讀爲“蹠”,《說文》曰“楚人謂跳躍曰蹠”,“迺”字讀爲“蹠蹠”之“蹠”。郭先生認爲:“遮迺(蹠蹠)即跳躍舞蹈之義。‘部落鼓鳴,男女遮迺’,謂部落鼓鳴之時,男女相與跳躍嬉戲也。此乃恆見於少數民族之風習,在鮑宣(此人乃孔孟之徒)看來,此乃有傷風化之事,故指爲七亡之一也。”^②

對於《漢書》的內容,郭先生的解釋是有道理的,至少比顏師古的解釋要合理得多。不過北大《蒼頡篇》亦用“遮迺”而未用“蹠蹠”,這又提示我們《說文》所載二字的本義很可能是合於《蒼頡篇》的。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於2015年11月中,蒙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① 其前義亦近引《說文》而未將“遮”“迺”二字聯繫起來。

② 郭在貽:《〈漢書〉札記》,《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1、2合期,後收入《訓詁叢稿》,又收入《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53頁。

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李均明

內容提要 五一廣場出土簡牘中,有一類木牘專門用作上報文件草稿的批件頁,有特定的格式,見多層主官的親筆簽字畫押。文中通常寫有上報草稿的過程概要,說明當時對重要行政、司法事宜皆經過合議的過程,當已形成相互監督與制約的機制。

關鍵詞 五一廣場 東漢簡牘 合議 簽押

五一廣場出土簡牘中,有一類木牘的形制與內容較為特殊,木牘上段通常見“君教若(“若”為諾之省形或變體)”三字,其中“若”字字體明顯大於他字,其下尚見有關官員的簽名,有些雖無“君教若”批署,但形式與內容相類,此乃東漢時期專為合議草稿設置的批件牘,猶今公文之批件頁,有規定的形式,內容比較豐富,是了解合議、合審制度的重要史料。合議、合審是簡牘時代重要的行政、司法制度,是對行政、司法事宜的集體審核,通過相互監督與制約,確保處理過程達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與公平,涉及事務範圍極廣,是研究秦漢歷史的重要議題之一。

一 形式與要素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屢見與合議有關的審批文書,今擇十例,就其文書學特徵解析

如下：

(一) CWJ1③:325-2-9:

辭曹助史襄白：女子張罷自言，桑鄉佐肝負布錢萬九千三百五十。械肝。曹下詭肝，今以錢萬九千三百五十墜雇罷，畢。當處重君教諾。罰，以錢畢，蒙閭略。丞優、兼掾暘議，請解肝械，勅遣歸鄉。

延平元年八月四日己酉白^①

(二) CWJ1③:325-5-21:

兼辭曹史輝、助史襄白：民自言，辭如牒。教屬曹分別白。案：惠前遣姊子毒、小自言，易永元十七年中，以由從惠質錢八百。由去，易當還惠錢。屬主記為移長刺部曲平亭長壽考實，未言，兩相誣。丞優、掾暘議請勅理訟掾伉、史寶實核治決。會月廿五日復白。

延平元年八月廿三日戊辰白。^②

(三) CWJ1③:325-32:

左賊史遷、兼史脩、助史龐白。男子烝備條言：界上賊捕掾副在部受所臧(贓)罪狼藉。教今白。案文書，番稱前盜備禾。今副將備□稱，左曹謹君教諾。實問。備辭不自言，不以錢布與副，恐猾……條言副未有據告者。丞優、掾暘……，副□□亡。任五人。寫移書桑鄉賊捕掾并等考實。□考……宏□□□所起及主名副、任具解到。復白。白草。

永初元年四月十八日庚白。^③

(四) CWJ1③:143:

右賊史牧，兼史蒙、勝白：右部賊捕掾敬等積言，男子張度與黃叔爭言，鬪，度(度)拔刀欲斫叔，不中，無狀。適(謫)度作下津橫

① 長沙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156 頁。

②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57 頁。

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58 頁。

屋。二月,以付將吏嵩。守丞護、掾英議如敬等言,請屬左

□曹□……^①

(五)CWJ1③:165:

正面:

左賊史遷、兼史脩、助史詳白:府趙卒史留事,召男子

張陽、劉次、次舍客任惠將詣在所。

君教諾。教今白。丞優詣府對,掾隗議請勅庾亭長倫亟召次等

將詣廷。到復白。

延平元年十二月一日甲辰白。

背面:

十二月二日付證。^②

(六)CWJ1③:305:

兼左賊史順、助史條白:待事掾王純言,前格殺殺人賊
黃胡、郭

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幽。今胡同產兄宗、宗弟禹於純門外欲逐殺純。

教屬曹今白。守丞護、兼掾英議請移書賊捕掾浩等考
實姦

詐。白草。

延平元年四月廿四日辛未白。^③

(七)CWJ1③:325-1-103:

辭曹史伉,助史脩、弘白:民詣都部督郵掾自言,辭如牒。案文
書,武前詣府自言,部待事掾楊武、王倫,守史毛佑等考,當
畀,各巨异。

君追賊小武陵亭部。今武辭,與子男潰猥(壑)食,更三赦,當應居得。願請大吏一
人案行覆考

如武辭。丞優、掾遺議請屬功曹選得吏當,被書復白。

永初元年正月廿六日戊申白。^④

①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14 頁。

②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16 頁。

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42 頁。

④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55 頁。

(八) CWJ1①:101:

君教諾。^①

(九) CWJ1③:306-2:

君教諾。勅獄司空條□^②

(十) CWJ1③:263-68

君教諾。

即日遣守史胡喜召^③

以上十例,大致可以分爲三類。其中(一)至(五)爲一類;(六)(七)爲第二類;(八)至(十)爲第三類。

第一類各要素俱全。

木牘長22.3至23.6厘米、寬4.2至4.8厘米左右,見兩道編痕。既見編痕,表明尚有其他簡牘與之編聯。

文字以編繩爲欄界,分三欄書寫,但二、三欄文字通常豎行連讀。文字至少包括三種筆迹,即三次寫就完成。

首欄通常祇寫“君教若”三字。君,是對上級主官的尊稱,《書·君奭》“周公若曰,君奭”,蔡沈集傳:“君者,尊者之稱。”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多指臨湘縣主管。教,命令。《孟子·萬章下》“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焦循正義:“教,亦命也。”若,讀“諾”,應辭,此處指同意、批准。《詩·魯頌·閟宮》“莫敢不諾”,鄭玄箋:“諾,應辭也。”“若”爲後署字,是上級主管親筆書寫的批准畫押,通常用非正規字體,見文末圖版。“若”上“君教”二字則與其他文字同,是預先寫上的,故“若”字筆畫常常壓在“教”字上。

第二、三欄所書爲合議情況,通常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以(一)爲例:

先寫合議緣由。緣由爲“女子張罷自言,桑鄉佐肝負布錢萬九千三百五十。械肝。曹下詭肝,今以錢萬九千三百五十塹雇罷,畢。當處重罰,以錢畢,蒙閭略。”即女子張罷自己報告說,桑鄉鄉佐叫肝的欠了她布錢一萬九千三百五十錢。鄉佐肝因此被戴上刑具。縣曹下令催促,肝即以錢一萬九千三百五十還給女子罷,債已還清。原本當處以重罰,由於錢已付清,所以寬大處理。批件上所寫的緣由通常是具體事件的概要,詳情當另文書寫,或附在與批件

①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32頁。

②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44頁。

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29頁。

頁牘相聯的牘冊上。

再是合議人及其簽名。“丞優、兼掾暘議”即是。丞優、兼掾暘是地位稍低於主管“君”的官員，其名“優”及“暘”為後署簽名，字體較大且稍草率。

末為合議之結論，即具體意見。此合議之具體意見即“請解盱械，勅遣歸鄉”，指解脫刑具，放人回歸原籍鄉。

此批件是辭曹助史襄起草撰寫的，撰寫日期為延平元年八月四日己酉。襄應是具體處理案件的當事人，文件也應是丞優、兼掾暘得出合議的具體意見後纔撰寫的，但撰寫時特意留出“君教若”之“若”及“丞優”之“優”、“兼掾暘”之“暘”等字的位置。然後先由丞優簽“優”字、兼掾暘簽“暘”字，批件再上報主管君後，由其在預先寫好的“君教”二字下或其上畫“若”(通“諾”)字。

(二)至(五)例的形式大致相同，祇是緣由不同而已。

第二類與第一類的不同僅在於首欄未署“君教若”，而書其他文字。如例(六)書“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例(七)書“君追賊小武陵亭部”。原因當為主管君未在常駐治所，無法簽署意見，故在批件上專門注明主管君的去向，以說明未簽署的理由。

第三類僅署“君教若”或稍加實施意見，未見緣由及合議意見等。如例(八)書“君教若”，例(九)書“君教諾。勅獄司空條囚”、例(十)書“君教諾。即日遣守史胡喜召”。凡此類或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其他緣由或合議簽名寫在另外的簡或木牘上；二是所批准不一定是合議意見。

批件關於合議緣由的描述之所以比較簡略，乃因其詳情另有記錄。批件木牘大多見編痕，知有其他簡牘與之相聯；又如例(二)見“辭如牒”，表明所見案件的詳情常常記錄在附件中。

合議意見是批件的主要內容，故具體明確，除例(一)所見，又如：

例(二)“丞優、掾暘議請勅理訟掾伉、史實實核治決。會月廿五日復白。”指令此案由理訟掾伉、史實調查核實論決，並定於當月二十五日再匯報。

例(五)“丞優詣府對，掾隗議請勅庾亭長倫亟召次等將詣廷。到復白。”指令庾亭長倫從速召來“次”等人，并把他們帶到縣廷。完成任務即報告。

例(六)“守丞護、兼掾英議請移書賊捕掾浩等考實奸詐。”指令移書賊捕掾浩等調查核實嫌疑人的姦情。

例(七)“丞優、掾遺議請屬功曹選得吏當，被書復白。”因上報意見僅言希望派秩級較高的“大吏”辦案，故合議意見指令選擇合適的官吏人選，針對性很强。

直至三國時期之走馬樓吳簡，亦見形式與上述合議木牘相同的會計合審批件，分項及分工更為明確，列於下以資比較。

(十一)《走馬樓吳竹簡》(七)3197(1):

丞缺。錄事掾潘琬校。

君教諾

嘉禾四年八月廿二日兼田曹史

兼主簿蔡忠省。

悉緝白料諸鄉染租已入未畢事。^①

(十二)《走馬樓吳竹簡》(七)4379(1):

丞他坐。期會掾丞若、錄事掾謝韶校。

君教諾

主簿郭宋省。十二月四日甲午白。^②

(十三)《走馬樓吳竹簡》(七)2124(1):

重核

君教

丞珍如掾掾丞脩如曹。期會掾丞若校。

已校

嘉禾三年正月十五日白嘉禾二年起四

主記史陳嗣省。月一日訖閏月卅日雜米旦簿草。^③

以上三例皆為三國東吳嘉禾年間有關經濟事宜的合審批件。形式、流程與上文所引五一廣場東漢木牘同。同樣由佐史寫出報告,由丞與閣下主管或曹掾合審,再送當地最高首長准諾。緣由內容多已省略。

由上可知,合議或合審有一定的程式規定,故其批件也有固定的格式。

二 合議之制度化

漢代在處理行政事務或司法過程中,常常由多人共同進行,實施時稱作“雜治”“集治”,討論時稱“議”“吏議”等,見於簡牘及傳世古籍,從內容可知此方式已趨於制度化。

東漢簡牘所見多人共同辦事者如:

(十四)CWJ1^①:86:

廷。願謁除前解,從今言。府移豫章府,嚴海昏艾(乂)處何吏於馮等所匿處,得朔所矣。弩不□

① 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系、故宮博物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小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807頁。本文簡稱《走馬樓吳竹簡》(七)。

②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837頁。

③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779頁。

蒙當案致,案致曲折。賜報,盡力實核。報到,有增異,正處復言。鮪、順、鄴考問留遲,惶恐^①

(十五) CWJ1②:124: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東部勸農賊捕掾遷、游徼尚、駟[塋]亭長范叩頭死罪敢言之。

廷書曰:言男子吳輔鬪傷弟妻廩,亡。逐捕有書。輔以微辦(辯)賊傷廩,所犯無^②

以上二例中,例(十四)之案件由鮪、順、鄴三人處理;例(十五)之案件則由東部勸農賊捕掾遷、游徼尚、駟[塋]亭長范共同處理,這種辦法史籍稱之為“雜治”,《史記·淮南衡山王傳》:“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漢書·楚元王傳》“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與他官共治之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從此記載可知,雜治與集議往往是同一過程的兩個階段,當已制度化。又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僅摘錄集議判決部分)如:

(十六)·鞠之:毋憂變(蠻)夷大男子,歲出賁錢,以當徭賦,黨遣為屯,去亡,得,皆審。·疑毋憂罪,它縣論,敢讞之,謁報。署獄史曹發。·吏當:毋憂當要(腰)斬,或曰不當論。·廷報:當要(腰)斬。^③

(十七)·鞠之:媚故點婢,楚時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復婢,賣祿所,媚去亡,年卅歲,得,皆審。·疑婢罪,它縣論,敢讞之,謁報,署史詹發。·吏當:黥媚顏頰,畀祿,或曰當為庶人。^④

(十八)·鞠:闌送南,取(娶)以為妻,與偕歸臨淄,未出關,得,審。疑闌罪,繫,它縣論,敢讞之。·人婢清助趙邯鄲城,已即亡,從兄趙地,以亡之諸侯論。今闌來送徙

①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24頁。

②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37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13頁。

④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4頁。

者，即誘南。·吏議：闡與清同類，當以從諸侯來誘論。·或曰：當以奸及匿黥舂罪論。^①

(十九)·鞠(鞠)：符亡，詐占書名數，解取(娶)爲妻，不智(知)其亡，審。疑解罪，繫，它縣論，敢讞之。·吏議：符有[名]數明所，明嫁爲解妻，解不智(知)其亡，不當論。·或曰：符雖已詐書名數，實亡人也。解雖不智(知)其請(情)，當以取(娶)亡人爲妻論，斬左止(趾)爲城旦。·廷報曰：取(娶)亡人爲妻論之，律白，不當讞。^②

例(十六)(十七)所見“吏當”之“當”指罪之所當刑罰，而從其當之結果皆有兩種，表明此乃兩人或兩人以上集議造成的，並非一人而提出兩個結論。《史記·李將軍列傳》：“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此“吏當”亦指衆吏討論的結果。例(十八)(十九)之“吏議”則與五一廣場簡之“議”義同，亦屢見於史籍。《漢書·朱博傳》：“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吏議當然也有久議不決的時候，典型者如西漢元帝時對陳湯功過的討論。《漢書·陳湯傳》載，陳湯征伐匈奴，矯制而取勝，“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僥幸，生事於蠻夷，爲國召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又，元帝“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於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於。’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意見不一，則決定權在其上級。吏議提出具體意見則如東漢簡牘所見稱“議請”，又見史籍如《漢書·刑法志》：“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弃市。’”《晉書·姚興傳》：“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

又，上引東漢合議批件木牘格式整齊劃一，大多皆設兩位合議人，唯例(五)見一位簽名人，但署說明文字“丞優詣府對”，即由於丞優已經到郡府去述職，所以缺席未能簽名，亦佐證按制度要求應是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簽名。表明當時合議制已常規化。

據上引簡牘及史籍所見，漢代之合議形式已制度化，它對行政及司法事務皆起着集思廣益與相互制約監督的作用。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4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5頁。

東牌樓漢簡《侈致督郵某書信》考釋二則*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李世持 張顯成

內容提要 東牌樓東漢簡《侈致督郵某書信》是一封私人書信。對背面第1行𠄎、第2行諱的釋讀，學界見仁見智。通過仔細校覈字形，全面考察詞義和上下文語境關係，𠄎當釋為“惠”，訓為“恩德”；諱當釋為“諱”，訓為“言談”。

關鍵詞 東牌樓漢簡 《侈致督郵某書信》 惠 諱

東牌樓東漢簡《侈致督郵某書信》是一封私人書信，書於編號為35的木牘上。^①該牘背面（如右圖）第1行的𠄎、第2行的諱，學界釋讀見仁見智，至今沒有統一看法。^②經過仔細校覈字形，考察詞義和上下文語意關係，我們認為對二字的釋讀，學界的意見均不妥。𠄎當釋為“惠”，訓為“恩德”；諱當釋為“諱”，訓為“言談”。現考釋如下。

* 本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XZS001)、“西南大學創新團隊項目”(SWU1509395)支持。

① 該牘整理報告釋文如下：客賤子侈頓首再拜督郵侍前：別亭易邁忽爾，令縲磨年朔，不復相見。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貴皆迷，_(正面)安善歡喜，幸々甚々_。推昔分別縲磨，不數承直，區々之念，欲相從談讀(?)。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_(不)有慙。財自空祀，將命冀見，乃得公々。賤子習逸么。惶恐頓首。_(背面)

② 有關觀點的出處主要見以下論著（其觀點下文將述）：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以下簡稱“整理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以下簡稱“《校訂稿》”。馬怡：《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以下簡稱“馬怡”。劉玉環：《〈長沙東牌樓漢簡牘〉釋文商榷》，《簡帛》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以下簡稱“劉玉環”。

一 釋𠄎

𠄎字所在上下文為“推昔分別縲磨，不數承𠄎，區區之念……”。




對𠄎的釋讀，目前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1. 整理報告^①隸為“直”，未訓解其意義。

按，所隸定的字不見於各類字書，也不見於傳世文獻，無法解其意，隸為此字於簡文釋讀無意義。

2. 《校訂稿》和馬怡釋“直”，訓為“當值”。《校訂稿》：“‘不數承直’之‘直’，原作‘𠄎’，今據圖版及文義改，‘承直’意即當值。”^②馬怡：“‘𠄎’，《東牌樓》未釋出，疑此字當釋為‘直’，‘當值’。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尚書郎入直臺中。’‘不數承直’，不能經常事奉。”^③

按，首先，從字形看，《東牌樓漢簡》“直”的字形與該字相去甚遠，試將該字與同批簡的“直”字比較如下：

	 簡 69
	 簡 130

通過對比可知，該字與同批簡的“直”的確不相類，故從字形上看該字不當釋“直”。其次，從文義看，“當值”義為“值班”，若訓為“當值”，則“不數承直”就義為“多次（或不多次）值班”，這樣，與下句“區區之念”語意無關聯，前後文意不順暢，缺乏邏輯聯繫。馬怡將句意釋為“不能經常事奉”對“當值”之義又作了迂曲的解釋。所以從文義看，釋“直”不妥。

3. 劉玉環釋“面”，訓為“見面”。^④

按，首先，從字形看，𠄎釋“面”不妥。試將該字與同批簡或同時代其他簡中“面”字的寫法比較如下：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88 頁。

②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簡帛研究二〇〇五》，152-153 頁。

③ 馬怡：《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簡帛研究二〇〇五》，179 頁。

④ 劉玉環：《〈長沙東牌樓漢簡牘〉釋文商榷》，《簡帛》第 9 輯，287-291 頁。

	《東牌樓漢簡》50B
	《武威漢簡·儀禮·有司》7
	《居延漢簡》231.92

通過比較可知，該字與同批簡或同時代其他簡的“面”也不相類，故從字形上看該字不當釋“面”。其次，從上下文關係看，如釋為“面”，則“不數承面”就義為“多次（或不多次）見面”，“不數承面”雖然與下句“區區之念”語意相關聯，但與正面第4句“不復相見”却語意矛盾。因此釋“面”也不妥。

我們認為該字當釋為“惠”，是“德”的異體字，訓為“恩德”。理由如下：

第一，字形辨析。

從字形上看，該字上為“一”，中間似為“自”，“自”的“丿”上似有一小橫，但仔細辨認，該“小橫”當是浸漬痕迹而非筆畫，其下為“乚”，“乚”右旁有一“丶”。該字可摹寫為。根據字形特點，該字可隸寫為直。同簡中正面“尊貴皆悉”的“悉”，寫作，其下“心”字構件與下部構件從筆勢上看如出一轍。同批簡中簡76“惠”作，其下“心”字構件也與相類，祇是寫得更加草率。《居延漢簡》454.16“惠”作。由此可以看出，漢簡“心”的草書寫法可作“乚”。可見該字下部構件實際是“心”的草率寫法。《敦煌漢簡》226“德”作，《敦煌漢簡》88“德”作，與《東牌樓漢簡》35中的寫法十分相似，故該字當隸“惠”，即“惠”，亦即“惠”，就是後世通行的“德”。《龍龕手鑑·心部》：“惠，古惠字。”《古文四聲韻·入聲·德韻》“德”作“惠”。《說文·心部》：“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玉篇·心部》：“惠，今通用德。”《廣韻·德韻》：“德，德行。惠，古文。”《漢書·賈誼傳》：“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顏師古注：“惠，古德字。”

第二，詞義辨析。

該字義當訓為“恩德”，與上字“承”構成“承惠（德）”一詞。“承德”即“蒙受恩德”。“承德”一詞使用很早，如《尚書·周官》：“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孔安國傳：“奉承周德。”^①此義後世一直沿用，如《禮記·祭義》：“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德。”^②《漢書·禮樂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③《晉書·華譚傳》：“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乂。”^④出土文物也有類似記載，如《令狐君壺》銘文：“承受屯（純）德。”在“不數承惠（德）”句

①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69頁。

② 孫希旦撰：《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62，1225頁。

③ 《漢書》卷二二《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89，1047頁。


④ 《晉書·華譚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854頁。

中,“不數”爲“數不清、無數”之義。王符《潜夫論·思賢》:“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彭鐸校正:“不數,即無數。”^①該意義後世一直沿用,例如,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長秋寺》:“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范祥雍校注:“《法顯傳·于闐國》云:‘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②唐杜甫《貽阮隱居》:“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迴繼先父祖。”^③宋曾鞏《王平甫文集序》:“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④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回:“相大妗子拿着棒椎,從上往下底打個不數。素姐起初還強,漸次底嘴軟,後來叫那妗子象救月兒一般。”^⑤故此本簡中“不數承惠(德)”意即“無數次蒙受恩德”。

再看“不數承惠”的下句“區區之念”中的“區區”。“區區”有愛慕、思念之義。《古詩十九首》之十七:“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善注:“《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雅)廣雅》曰:‘區區,愛也。’”^⑥東漢末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區區,懼君不視察。”^⑦此義後世一直沿用,如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吳保安弃家贖友》:“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⑧本簡中“區區之念”當然就是“思念之情”。從上下文語境看,“惠(德)”字之義與下文語境配合十分妥帖和諧。該句“不數承惠(德)”與下句“區區之念”語意正好相合,上句追叙蒙受對方的關照,下句表達感激和思念之情。語意順暢,邏輯嚴密。

綜上可知,諸家釋該字爲“直”、爲“直”、爲“面”均不當。該字當釋爲“惠”,訓爲“恩德”爲是。

二 釋讀

此字原簡爲,左邊有簡縱向開裂的裂痕,可摹作讀。對此字的釋讀,學界主要有兩種意見:

1. 整理報告釋爲“讀(?)”,屬上句讀,上下文釋文爲:“欲相從談讀(?),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不有慙。”

① 彭鐸:《潜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75頁。

②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44頁。

③ 周振甫主編:《唐詩宋詞元曲全集·全唐詩》第四冊卷二一八,合肥:黃山書社,1999,1546頁。

④ [宋]曾鞏:《曾鞏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239頁。

⑤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濟南:齊魯書社,1980,780頁。

⑥ [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404頁。

⑦ [陳]徐陵:《玉臺新詠》,上海書店,1988,22頁。

⑧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28頁。

按，釋為“讀(?)”，不僅字形依據不足，句意亦無法理解。首先，從字形看，該字與“讀”相去甚遠，試將該字與簡牘中“讀”字或含有相同構件的“賣”字比較如下：

讀	讀	讀	賣	賣	賣	賣
圖版字	(讀)《龍崗秦簡》66	(讀)《馬王堆·讀謬》012	(賣)《尹灣漢簡》YM6D9B	(賣)《居延漢簡》286.19B	(賣)《敦煌漢簡》1464A	(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321

通過比較可知，該字與簡牘中“讀”不相類，其右邊構件與“賣”也沒有相似之處，從字形上看不可能釋為“讀”。其次，從詞義看，該字也不當釋為“讀”。《說文·言部》：“讀，誦書也。”《說文·言部》：“談，語也。”“談”與“讀”語義完全不相關，“相從談讀”的句意不通，邏輯上沒有關聯。

2.《校訂稿》與馬怡釋該字為“嘆”，屬下句讀。《校訂稿》：“‘談’後之字釋作‘讀’而存疑。據圖版，其字當作‘談’，通‘嘆’。”相應釋文為：“欲相從談。談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①馬怡：“‘談’，《東牌樓》釋為‘讀(?)’，並將該字屬上句，作‘欲相從談讀(?)’。疑非是。查看照片圖版，該字左為言旁，右為‘𠂔’，疑為‘謨’字之訛寫。言旁可與口旁互換，故‘謨’或即為‘嘆’。”相應釋文為：“欲相從談。談(嘆)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

按，釋“嘆”雖句意可通但字形依據不足。該字右邊作“𠂔”，從字形看，出土實物文字中未見有構件“莫”寫作或訛作“𠂔”者，故無論釋該字“通‘嘆’”，還是釋該字“為‘謨’字之訛寫”，均無以服人。試將該字與同時期含有構件“莫”的“歎”“難”“漢”的寫法比較如下：

讀	歎	歎	難	難	漢	漢
圖版字	(歎)《阜陽漢簡·儒家者言》12	(歎)《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難)《東牌樓漢簡》133	(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335	(漢)《東牌樓漢簡》30B	(漢)《居延新簡》1186A

通過比較可知，該字右邊構件“𠂔”是不可能與“莫”有聯繫的。我們認為，該字當釋“諱”，訓為“言談”，屬上句讀，其上下文釋文為：“欲相從談諱，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理由如下：






第一，字形辨析。

初看字形，該字左邊從“言”、右上從“大”、右下似從“𠂔”，似乎可隸寫為“談”。但文獻中不見“談”字，無從知其意義，故不可能釋“談”。

① “之”，整理報告釋為“不”，《校訂稿》和馬怡釋“之”，為是。

該字左邊从言無疑,其釋讀難點主要在右邊構件。我們認為該字的右邊構件當是“𠂔”,即“幸”的異體。試將同批簡或同時代簡的“𠂔”與該字右邊構件比較如下:

字形								
來源	該字右邊構件	《東牌樓漢簡》35B	《東牌樓漢簡》50B	《敦煌漢簡》1962B	《居延漢簡》10.16B	《尹灣漢簡》YM6J47	《龍崗秦簡》196	《敦煌漢簡》7A

通過比較可知,該字右邊構件的寫法與各簡“𠂔”字寫法幾乎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右下多了一點。其右下多出的一點應是增加的飾筆:由於構件“羊”的末筆“丨”寫作“丿”,導致整個字的重心左移,右下顯得空虛,字勢的平穩性被破壞,為解決用筆變化帶來的字勢失衡問題,右下的“丶”當是書手為達到字勢勻稱、字形美觀而添加的飾筆。包括簡帛在內的先秦兩漢實物文字中象這樣增加飾筆的很多,如:《居延漢簡》簡 282.18B+283.27B“竟”作,增加飾筆一點。《武威漢醫簡》簡 60“藥乾復塗之如前法”句中“塗”作,增加飾筆一點。《池陽令張君殘碑》“步”作,增加飾筆一點。《元暉墓誌》“奄”作,增加飾筆一點。《東牌樓漢簡》簡 3B“在”作,增加飾筆一點。

以上這些字,書手所加的點除使字形看起來飽滿美觀外,並無其他含義。這進一步說明該字右邊構件實際為增衍飾筆的“𠂔”字。“𠂔”為“幸”之異體,該牘背面第1行第5字“幸甚”之“幸”即寫作“𠂔”,《敦煌漢簡》1455B“幸”作“𠂔”,《曹全碑》“幸”作“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312“幸”作𠂔,《肩水金關漢簡》73EJT9:13“幸”作𠂔,《李挺墓誌》“幸”作𠂔,《玉篇·𠂔部》:“𠂔,今作幸。”故“𠂔”為“幸”之異體。該字左邊从“言”,右邊从“𠂔”,可擬寫為諱。元本《玉篇·言部》“諱”寫作諱,《字彙·言部》:“諱,同諱。”故諱、諱同“諱”,“諱”為“諱”的異體,所以該字當隸為“諱”,同“諱”字。

第二,詞義辨析。

“諱”有“言”義。“諱”字《說文》未收。《廣雅·釋詁四》:“諱,言也。”由此可見“諱”有“言語”之義。《玉篇·言部》:“談,言論也。”“諱”與上字“談”組合為“談諱”,這顯然是一個同義并列詞,為“言談、談叙”,亦即“談話”之義。“談諱”一詞在傳世文獻中暫未見,但與曹操《短歌行》“契闊談讌,心念舊恩”中“談讌”或“談宴”的結構完全一樣,含義也完全相同。上引《玉篇》“諱”下胡吉宣校釋:“張揖於《廣雅》《埤倉》皆有‘諱’,又於《埤倉》以方俗語申釋之。顧氏有疏證之,謂即《爾雅》之‘行言也’。”^①胡氏校釋至少表達了三個意思:(1)《廣雅》和《埤倉》中均收了“諱”字。(2)在《埤倉》中“諱”是作為方俗語來使用的。(3)“諱”的詞義與“言”有關,相當於《爾雅》中“行言”。方俗語的使用範圍較為狹窄,人們一般不會用

^①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836頁。

其記錄正規重要文獻。因此“諱”字的文獻用例，暫未見。“諱”為方俗語，可能就是“諱”在傳世文獻中暫未找到用例的原因。牘文屬民間個人書信，使用在後世文獻中難以見到的方俗語用字顯然是正常的。其義為“言”，與有“言談”義的“談”同義組合使用，也是非常符合漢語語法發展特點的。

從句意看，“談諱”所在句“欲相從談諱”的“相從”有“在一起”之義。這一詞義產生得比較早，其使用頻率也較高，如《尚書·商書》：“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墨子·非攻》：“則置魏亦相從而謀。”《莊子·漁夫》：“同類相從，同聲相應。”《戰國策·秦策》：“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史記·日者列傳》：“宋中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漢書·食貨志上》：“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從上下文關係看，該句緊承上文的思念之義，繼續表達自己對兩人能够相聚的願望和願望未能實現的原因。故上下文當標點為：“欲相從談諱，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文意為：“希望聚在一起談談，（祇是）我客居他鄉，經濟困難，沒有緣分前去拜訪你，說來真是慙愧。”表達了感激思念之情、相聚談笑的願望和未能如願的原因，所以該字釋為“諱”與上下文語境在邏輯和情感表達上都能關照緊密，文從字順。

三 結語

上文我們分別從字形、詞義和上下文語境三個角度對“惠”和“諱”作了考釋。為更好地檢驗釋讀的正確性，現對整封書信釋文如下：

客賤子侈頓首再拜

督郵侍前：別鬲易邁，忽爾今，由曆年朔，^①不復相見。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尊）貴皆悉^②。（正面）安善懼惠，幸_二甚_一（幸甚幸甚）。推昔分別縲磨，不數承惠（德）。區_二（區區）之念，欲相從談諱。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財自空（乏）^③，將命冀見，乃得乙乙（一一）^④。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⑤（背面）

① “別鬲易邁，忽爾今，由曆年朔”，此處釋文參考了《校訂稿》、馬怡和伊強（《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札記》，《簡帛》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11-419頁）的釋讀意見。

② “悉”，此處釋文參考了伊強（《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札記》，《簡帛》第6輯，411-419頁。初刊於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36，2010年3月23日）的釋讀意見。

③ “財自空（乏）”，此處釋文參考了《校訂稿》的釋讀意見。

④ “乃得乙乙（一一）”，此處釋文參考了馬怡的釋讀意見。

⑤ “賤子習逸公”，此處釋文參考了《校訂稿》的釋讀意見。

整封書信的意思可以譯述如下：

客賤子侈頓首再拜

督郵閣下：分別的時光過得飛快，這麼多年，我們再未見面。（我們）分別之後，（我想您一定）擔任過很多職位。（您）工作勤奮努力，生活起居均在官署，（這些）上級官長（想來應該）盡知。○（正面）（想到）您一切安好，我就感到十分慶幸。回想起當年分別之後，還多次得到您的關照，（我）心中就充滿感激和思念之情，好想與您再次相聚，一起談談笑笑。（祇是我）客居異鄉，經濟狀況不好，沒有機緣前去拜望（您），說起來都覺得慚愧。經濟狀況（確實）不佳，奉命進見時，纔能與您一一擺談（別後的諸多情況）。

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背面）

這樣釋讀，整封信文意貫通，條理清晰，邏輯嚴密。這進一步證明上述兩個疑難字當分別釋讀為“憇（德）”和“諱（諱）”。

“白衣衛士”試釋*

長沙簡牘博物館 熊 曲

內容提要 三國孫吳繼承了漢代以來的衛士制度,同時,又出現了以民充當衛士的“白衣衛士”。它的出現,一方面用以補充衛士的不足,另一方面反映了兵、民的區別,是孫吳“士家”制度形成的表現。後來兩晉南朝的“白衣”“白衣左右”“白衣吏”都可以從孫吳“白衣衛士”中尋到淵源。

關鍵詞 衛士 白衣 士家

走馬樓吳簡中有許多身份性名稱,如郵卒、吏帥客、還民、私學等,已受到學者的關注,有的如“私學”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白衣衛士”還沒有人探討,本文對吳簡中的“白衣衛士”試作解釋,以求教於方家。

在已出版的走馬樓吳簡中祇有三枚簡提及“白衣衛士”:^①

1. 右白衣衛士限米九十七斛五斗(叁·1851)
2. 右嘉禾三年白衣衛士限米八十五斛三斗(叁·1853)
3. 縣三年領白衣衛士限米二百斛已入畢(捌·3788)

這三枚簡指出白衣衛士需交限米。另在吳簡中還出現了“白衣”和“衛士”,如果把這兩個詞的含義弄清楚了,“白衣衛士”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下面我們先探討吳簡中的“衛士”。

* 本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14ZDB027]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資助。

① 本文所引吳簡資料,均出自《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壹、貳、叁和捌,不另注。

衛士制度起源甚早,大約起源於春秋時代。其主要職責是保衛皇宮。《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預注:“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八則云:高誘《淮南子》注:“衛,猶護助也。”^①可見,《左傳》中提到的“衛”,即“衛士”的省稱。秦漢繼續沿用和發展了衛士之制。秦封泥有“衛士”^②和“衛士丞印”^③,爲官署用印。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隨秦二世至望夷宮的官員有衛令,^④應即“衛士令”的省稱,皆可證秦代有衛士之制。《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⑤所謂“衛士三丞”應指衛士令有三員佐官。《續漢書·百官志》中衛尉,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⑥可見,漢承秦制,建立了衛士之制。關於漢代的宮省宿衛制度,楊鴻年、廖伯源認爲漢代實行“三層宿衛體系”,即由省内宦官、省外宮內的郎吏、宮內的衛士共同宿衛君主安全。^⑦其中,衛尉主管衛士,負責宮門宿衛、宮內的巡行及殿門前的屯兵。衛士是守衛皇宮的軍隊,直接爲皇帝服務,享有較高待遇。另在帝王的宗廟、寢陵和京城諸官府中也有衛士服役。罷遣舊衛士的儀式,要君主親臨,百官到位,相當隆重。衛士的來源,《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可見,衛士屬於徭役範疇。它“是材官、騎士和樓船這些人在服役滿一年以後,再行征調赴京師,服役於宮廷和其它中央各個官府的正卒”。^⑧但“凡屬調赴京師的衛士,實際上已是一種軍事編制,和平時的材官、騎士、樓船亦有較大的區別”。^⑨

三國孫吳時期,保留了衛士之制。《吳書·孫和傳》載:(嘉禾七年)“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⑩孫和爲皇子,孫權爲其所置的“宮衛”即皇宮衛士。韋昭注《國語·越語上》“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即謂“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⑪韋昭

①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315頁。

② 周曉陸、劉瑞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封泥發現十周年》,《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5期,5頁。

③ 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第一·二·17號封泥,118頁。

④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274頁。

⑤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728頁。

⑥ 《後漢書》志第二五《百官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3579頁。

⑦ 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10-11頁。廖伯源:《西漢皇宮宿衛警備雜考》,《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9頁。另外,曲柄睿認爲宮省宿衛存在四重宿衛體系,在省中內還有禁中,禁中是皇帝起居之處,是四層宿衛體系中最核心所在。參見其著《漢代宮省宿衛的四重體系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51-58頁。

⑧ 錢劍夫:《秦漢賦役制度考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188頁。

⑨ 錢劍夫:《秦漢賦役制度考略》,191頁。

⑩ 《三國志》卷五九《吳主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1367頁。

⑪ 韋昭注:《國語》卷二〇《越語上》,上海:世界書局,1936,223頁。

(204-273)爲三國吳人,其言“若今”,應指的是孫吳時期。韋昭認爲吳王夫差的水軍如孫吳時期的衛士,都是賢良。可見,衛士是經過挑選,不但身體素質好,且經過訓練,技術嫺熟的精兵。長沙走馬樓吳簡出現的衛士與史籍所載及韋昭所講共同印證了孫吳衛士制度的存在。由於資料缺乏,我們不清楚孫吳衛士制度的具體情況。不過,西晉、東晉都存在衛士制度。《晉書·職官志》:“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①衛尉職掌衛士,在漢代就如此,已如上述。祇是到西晉衛尉執掌範圍有所擴大。東晉,衛尉之職被撤,但衛士仍存在。“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②可見,衛士的職責仍是保衛皇宮。下面,根據走馬樓吳簡中的衛士材料,對其職責等情況進行分析。

吳簡中的衛士爲編戶民:

4.高遷里戶人公乘衛何城年卅六筭一【注】“衛”下應脫“士”字。(捌·1617)

5.入樂鄉嘉禾二年衛士限米六斛一斗【徇】畢【X】嘉禾三年□月十九日□丘朱設關壅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柒·1617)

簡4中的衛士何城,登記的是民爵“公乘”,交納口算錢。簡5反映衛士需交限米。衛士還有專門的衛士田:

6.領二年佃(?)卒(?)衛士田七十五畝々收限米二斛合爲吳平斛米一百五十斛(壹·1669)

佃卒、衛士畝收限米二斛,除此之外,還有郵卒,比普通民衆畝收一斛二斗稅米要高:

7.領二年郵卒田六頃五十畝々【收】限米二斛合爲吳平斛米一千三百斛(壹·1635)

8.領二年民田三百七十六頃六十【五】畝二百卅八步畝收米一斛二斗合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九斛一斗(壹·1637)

普通民衆交稅米,簡8中的民田,即稅田。嘉禾二年整個臨湘侯國民田的面積應該爲簡8所言的“三百七十六頃六十五畝二百卅八步”。下面有兩枚簡提及四個鄉所領稅田的面積:

9.小武陵西鄉領稅田七十八頃七十三畝二百卅一步收米九千四百卅八斛七斗五升五合(陸·43098)

10.桑樂鄉領稅田六十【頃】【八】畝收米七千二百九斛六斗(陸·43096)

① 《晉書》卷二四《職官》,北京:中華書局,1974,736頁。

② 《晉書》卷一〇六《載記》,2765頁。

通過計算,可知四個鄉平均稅田約 34.7 頃。據楊振紅先生研究,已出版吳簡【壹】、【貳】、【叁】中,臨湘侯國下統屬了 12 個鄉,分別是:都鄉、東鄉、西鄉、南鄉、北鄉、中鄉、廣成鄉、樂鄉、模鄉、平鄉、桑鄉、小武陵鄉。其中,北鄉尚待進一步考實。^① 將簡 8 的民田數除以 12 個鄉,平均數約為 31.39 頃。這樣看來,簡 8 的民田數應為嘉禾二年臨湘侯國的稅田數。簡 6、7 與簡 8 清理號相近,涉及內容相同、格式一樣,字迹相同。在形制上,簡 6、7 長為 24.3 厘米,簡 8 為 24.1 厘米,寬均為 1 厘米,於編繩處都寫有字。因此這三枚可能屬於同一簡冊,而簡 6 與 7 可能分別是臨湘侯國的佃卒與衛士及郵卒的田數。郵卒應是專事郵遞業務的人員。^② 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郵人不負擔徭役,沒有從軍的責任,家人也享受同樣的優待,其所有田地,其中有一頃可以不必上繳租稅。^③ 如果郵人不再從事該職業,就沒有這些優待了。這是西漢時期的規定,後來發生了變化。單從吳簡來看,從事行驛遞事的人已由專門的士卒擔任。此時吏卒已呈現傳承代繼之勢,即向“吏家”“士家”發展。^④ 郵卒已成為一種專門職業,並趨向於從士卒家庭中選任。佃卒是專門種植糧食的,衛士是保衛皇宮的。

此外,吳簡中還有“部伍衛士”的記錄:

11. 慈□□書□書部伍衛士朱□開馮八謝郡□(陸·45663)

“部伍”是軍事用語,指軍隊。“又引申指軍隊的實際編配、訓練、紀律和秩序。”^⑤前揭衛士在漢代已屬一種軍事編制。又“部伍衛士”後面接的是衛士的名字。孫吳時期的“衛士”同樣屬於一種軍事編制。這裏的“部伍”可能是指軍隊訓練之義,與吳簡中的“部伍夷民”含義不同。

前面我們對孫吳的衛士有所了解,接着來探討吳簡中的“白衣”。

白衣原指白色的衣服,後指平民服,因即指平民。《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⑥成帝微服出行,其隨從皆着白衣,即穿平民服,扮成平民。《後漢書·鄭均傳》:“明年(元和二年即 85 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

① 楊振紅:《長沙吳簡所見臨湘侯國屬鄉的數量與名稱》,《簡帛研究二〇一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39-144 頁。

② 王子今:《走馬樓簡所見“郵卒”與“驛兵”》,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1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318 頁。

③ 張家山漢簡《行書律》:“一郵十二室。長安廣郵廿四室,敬(警)事郵十八室。有物故、去,輒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戶勿減。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為它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5 頁。

④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文史》2014 年第 2 期,63 頁。

⑤ 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附論《吳簡中的“部伍夷民”問題》,《歷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16 頁。

⑥ 《漢書》卷二七《五行志》,1368 頁。

中，卒於家。”^①鄭均前已告老還鄉，則無官，應為民，白衣表明其無官為民的身份。漢代有其官職纔有其祿秩，鄭均因皇帝所賜纔得以無官食祿的待遇。武威漢簡《王杖詔書令冊》：“隴西男子張湯坐桀黠毆擊王杖主，折傷其杖，弃市。亭長二人、鄉嗇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毆辱王杖功。”^②“白衣民”指的就是平民。

三國時期的吳國，“白衣”除在“白衣衛士”中出現外，私學名籍也出現了。如：

12.私學黃客 狀：客，本正戶民 □(肆·3943)

13.□長沙黃[星]年廿六，狀：[星]，白衣，居臨湘都鄉吳澹丘，帥龔傳

無有[戶]^③(肆·3979)

這些記錄為白衣的私學名籍，凌文超先生認為是所有舉私學者的名籍，包括遺脫和正戶民。其中遺脫的私學居住在臨湘鄉丘，安排有本主進行管理，應是臨湘侯國的依附人口。而“給私學”的正戶民，一般從戶品低下者且未承擔吏役的民戶中選任，在當地服役。^④可見，私學名籍中的白衣，不論入籍與否，其身份是民。吳簡中“白衣”的身份也應為民，“白衣衛士”應該理解為以民充當衛士。

在兩晉南朝時期，有一種士兵，被稱為“白衣”“白服”。他們是從民間徵募，不隸屬軍籍，未授軍職的兵。是相對於名屬軍籍，或者已授軍職的軍人而言的，因為當時兵和武吏乃至將帥穿的是絳衣或戎服。^⑤前揭白衣指百姓，這裏同樣因其徵自百姓，而稱“白衣”或“白服”。還有一種隨從，稱為“白衣左右”和“白從左右”。《南史·茹法亮傳》：“(宋)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⑥左右是隨從的一種名號，這裏“白衣左右”是皇帝的侍從。北朝也有“白衣左右”，《魏書·趙脩傳》：“(趙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遇日隆。”^⑦從後面“仍充禁侍”來看，趙脩之前在東宮為白衣左右，也就是充當禁侍。“禁侍”也就是皇帝侍從。另臣僚的隨從稱“白從左右”，《梁書·王亮傳》御史中丞奏彈范縝：“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⑧唐長孺先生認為“白從左右”即門生，與“白衣左右”通常是由寒門

① 《後漢書》卷二七《鄭均傳》，946頁。

②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7頁。

③ 釋文修訂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43頁。

④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37-71頁。

⑤ 唐長孺：《讀史釋詞：絳衫與白衣》，《唐長孺文集》卷二《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262-263頁。

⑥ 《南史》卷七七《茹法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1928頁。

⑦ 《魏書》卷九三《趙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1998頁。

⑧ 《梁書》卷一六《王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269頁。

富室有姿容少年充當的。他們爲了避免徭役和謀取入仕,投充皇帝和貴族官僚的隨從是進身道路之一。”^①但他們不是兵,不屬軍籍,又未授官,所以還是像普通百姓一樣穿白衣。南朝時期,還出現了“白衣吏”。《宋書·吳喜傳》:“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②後因其“少知書”,有才干,受到將軍沈演之的賞識,而被推薦爲官。“白衣吏”應如“白衣左右”一樣理解,即以平民充當吏。他們以“白衣”“白服”“白從”爲稱,表明民與兵、吏的區別。

通過充當皇帝隨從或侍衛,成爲進身之道路,有其歷史淵源。周代貴族子弟在做官前需充當“士庶子”,即充當宿衛。《戰國策·趙策四》左師觸龍見太后說:“(老臣賤息舒祺)愿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③“補黑衣之數”也是讓其預身宿衛,以爲進身之階。漢代有郎官出仕之制。郎官是“宦皇帝者”,作爲皇帝的近侍,和承擔着國家行政的吏不同,呈現了濃厚了“私”的色彩。^④漢初郎官用皆選,家資不足者做郎官久難爲繼,需家資雄厚纔行。人們之所以肯去“宦皇帝”,也祇是爲了由宿衛或侍從獲得進身資格。魏晉南北朝是士族門閥時期,士族爲公卿百官,權重位尊,世代承襲;寒門地主和商人因出身低微,難以躋身貴族行列,但他們爲了免役和蔭族的特權,仍然爭取仕進之路。當時已產生了專門的“吏戶”和“士家”,因此,白衣、白衣左右的出現,是這一歷史時期以上兩項制度的反映。

吳簡中的白衣爲平民,到兩晉南朝“白衣”指不屬軍籍的士兵或隨從,北朝出現“白直”,《隋書·百官志》記錄北齊制度,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⑤唐長孺先生認爲,白直即是白衣或白身上直,爲隨從人員,這裏是配給地方政府機構的吏役。^⑥這時,白衣成爲吏役的一種名稱了。

孫吳時期處於士族和“吏戶”和“士家”形成時期。走馬樓吳簡中“白衣衛士”,以民充當衛士,已反映出兵、民的區別。私學的身份是白衣,因其并非爲吏。又吳簡的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是孫吳爲保證吏源的穩定性,選擇州、軍吏家庭的男性成員作爲吏的備員,這已體現出“吏戶”形成趨勢。^⑦其中,有“以下戶民自代”:

14. 𠄎東鄉勸農掾殷連[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爲簿。輒料核鄉界,州吏二人,父

𠄎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審實,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

① 唐長孺:《讀史釋詞:絳衫與白衣》,259-260頁。

② 《宋書》卷八三《吳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2114頁。

③ 諸祖耿編撰:《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122頁。

④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76頁。

⑤ 《隋書》卷二七《百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763頁。

⑥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吏役》,《江漢論壇》1988年第8期,68頁。

⑦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吏、民分籍及在籍人口》,北京吳簡研討班討論稿,2014年9月14日。

覺,連

𠄎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菟保據。(209)

東鄉州吏有父兄二人因刑踵、叛走,而以戶品為下品的百姓代替他們,即允許在州、軍吏不足的情況下,以民代替。可見,普通百姓可以充當州、軍吏,他們有可能被稱為“白衣州吏”或“白衣軍吏”,但是現有材料還不能提供確切證據。前文已述,衛士是皇宮警備體系中保衛皇宮的常備軍,在漢代屬於徭役範疇。吳簡中的衛士屬於正戶民,但衛士已具有身份性。他們的職責應與漢代一樣,負責保衛皇宮。從臨湘地區輸送衛士保衛皇宮是有可能的,因為吳簡中有不少關於“宮”的記載:

15.其□□吏李便□齋裴(?)已嘉禾四年五月十一日於建業宮,入付吏陳彊、何玄,便(肆·3835)

16.草言府……軍吏□元[已]詣^①建業宮事 □月七日兼兵曹掾□□白(柒·3185)

簡 15 殘缺,可能是從臨湘送東西到建業宮;簡 16 兵曹派軍吏到建業宮。還有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較多“隨某在宮”:“春兄子男絮年廿五隨春在宮(叁·1992)”;^②“君教”簡中“丞庾固還宮”,^③指縣丞因痼疾還宮,凌文超先生認為這裏的“宮”亦指建業宮,^④等等。可見,臨湘地區與中央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我們認為,吳簡中的衛士應是籍貫屬於臨湘,而在中央服役。正如州、軍吏父兄子弟簿中州、軍吏在宮供役,其中就有戶籍在臨湘的,並且其子弟也隨其在宮服役;又《三國志》記載的永安元年(258)十一月詔中有“父兄在都”,即在建業服役。

孫吳時期,“吏家”和“士家”已逐漸形成。上面提到的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已將州、軍吏家庭中男性成員作為力役的後備軍。其中,州、軍吏主要來自編戶,也有遺脫者。^⑤關於孫吳吏役的記載,見於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詔:

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⑥

① 釋文修訂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宮”》,《出土文獻》第7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258頁。

② 如:君教 丞庾固還宮,掾丞循、潘棟如曹,都典掾丞若、錄事掾潘琬校

已 主簿尹

桓省 嘉禾四年五月廿八日乙巳白

③ 王素先生則認為這裏的“宮”指武昌宮,參見其著《長沙吳簡勸農掾條列軍州吏等人名年紀三文書新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2009,10頁。

④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吏、民分籍及在籍人口》,北京吳簡研討班討論稿,2014年9月14日。

⑤ 《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傳》,1157頁。

“諸吏家有五人”應如吳簡中的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一樣，都是指家戶內的男性成員。“三人兼重爲役”指“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即父兄征發到建業，子弟在當地郡縣充吏。另外兩個男性成員可能如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記錄的“細小”或“老鈍”“刑踵”之類的情況而未被征發。“既出限米”表明吏家和吳簡中的諸吏一樣需交納限米，可見，他們也有自己的田，未在官府供役時，也需從事農業生產。“軍出又從”指出現戰事，也需要從征。吳簡中却未見吏家從征的記錄。不過，吳簡中的州、軍吏父兄子弟中的丁壯多任給吏或隨本主服役，還有給限佃客的，其中，給限佃客應是從事農業生產。由此可見，詔書所提到諸吏家的情況和吳簡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祇是吳簡中針對吏家男性成員而製作名籍以編戶民爲主，而“吏戶”是作爲一種有別於編戶的特殊名籍存在的。

如果我們對“白衣衛士”理解不誤的話，它反映了吳簡中的衛士屬於一種軍事編制，可以補充衛士的不足。同時，兵、民的差異也促進了當時“士家”的形成。由此可見，兩晉南北朝“白衣”“白服”“白衣左右”“白衣吏”的出現，可以從孫吳“白衣衛士”中尋到淵源。正是三國時期“士家”“吏戶”的形成，到兩晉的成熟，致使兵役和吏役從特定家庭中產生，民與吏、兵完全分開。同樣，兩晉南北朝由於士族制度的成熟，壟斷了官僚貴族階層。普通寒門地主和商人爲獲得免役特權，積極爭取入仕途徑，充當皇帝和官僚貴族的隨從或門生。吏與民的差異，致使這些寒門子弟祇能以民的身份充當。前者是兵役和吏役的專門化，後者是貴族階層的特定化，使不同階層人的有着明顯等級界限。

吳簡所見復民身份考辨*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蘇俊林

[日]新瀉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

內容提要 吳簡中的復民是孫吳政權對士卒復員、恢復平民身份後的特殊身份稱謂。“復”為“恢復”之意。兩漢時期對復員士卒有賜爵(可憑爵位占田宅)、復除自身及家人租稅徭役等優待政策。孫吳政權對復員士卒沒有賜爵,但在熟田納米標準上予以優待。孫吳時期復民(復員士卒)受優待程度較兩漢時期低。孫吳時期復民的地位低於士,但要高於“優復之民”。柒·4446中的“復民”為“恢復民籍”的行為,不是與田家莚中“復民”意義相同的身份名詞。官、吏、卒離職後是否也能成為復民,依據現有資料尚難以斷定。

關鍵詞 吳簡 復民 復員士卒 特殊身份稱謂 優待政策

走馬樓吳簡中有很多表示人物身份的名詞,其中有被稱之為“復民”者。關於復民的身份,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檢討各家觀點之後發現復民的身份仍有探討的必要。本文試圖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復民的身份進行新的詮釋和考察。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 現有研究成果及存在的問題

關於吳簡中復民的身份,不少學者進行過研究。王素先生認為“復民”為“復人”(或“復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成果。

客”),是當時“專門賜給功臣的一種特殊依附人口”。^① 胡平生先生認為《吳書》中的“復人”“應是唐代避李世民名諱而改,字本爲‘復民’”。^② 王明前先生認為復民由復客或復人轉化而來。^③ 高敏先生認為復民要承擔租稅,不是復除租稅、徭役的“優復之民”。臨湘侯國內存在“復民”階層,但“復民”不是“復客”。^④ 王偉雄先生推測復民可能是從軍士兵的家屬,被政府在己酉年集中居住在己酉丘并被免除徭役。^⑤ 蔣福亞先生認為復民是簡牘中的“尫羸老頓貧窮女戶”和“老頓窮獨女戶”。他們的身份是平民,不是依附民。^⑥ 張文傑先生認為復民爲“復爲平民”之意,即參與叛亂的民衆在平定叛亂後重新恢復平民身份。復民是針對逋逃、新戶而言的。^⑦

“復民”稱謂表明其應屬於“民”的範圍,與士、復客等身份有別。壹·1537 載有“復客”:“入南鄉嘉禾二年復客限米十斛|||嘉禾三年三月十七日惠(?)□。”^⑧ 高敏、張文傑二位先生據此認為復民、復客的身份有區別。^⑨ 我們贊同此觀點。就現有資料看,也很難將復民與“老頓窮獨女戶”聯繫起來。復民是受到國家政策優待的群體。如果復民是叛賊、逋逃而重新恢復平民身份的人,豈不是有國家鼓勵民衆叛亂、逃亡之嫌? 據《三國志·吳書·呂岱傳》載,嘉禾四年,呂岱討平廬陵、會稽、南海三郡後,孫權下詔言:“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⑩ 孫權視叛民爲“惡民”,且要其“供賦役”,沒有給予優惠政策。

① 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26-44頁;王素:《〈嘉禾吏民田家莧〉所見“己酉丘復民”性質新探》,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51-56頁。

②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莧研究》,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8-49頁。

③ 王明前:《東吳農業經濟的國家政權主導因素》,《江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6期,73-78頁。

④ 高敏:《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27-35,81-85頁。

⑤ 王偉雄:《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復民”與“復”》,簡牘學會編《簡牘學報》第18期,2002,287-308頁。

⑥ 蔣福亞:《走馬樓吳簡經濟文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87-96頁。

⑦ 張文傑:《三國孫吳政治社會結構及其統治政策探研》,中興大學博士學位論文,臺灣:中興大學,2007,159-164頁。

⑧ 本文所引吳簡俱出自以下各書: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各書在文中分別簡稱爲“田家莧”“壹”“貳”“叁”“肆”“柒”“捌”。所引簡文祇列出書名和簡號,不一一注釋頁碼。

⑨ 高敏:《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85頁;張文傑:《三國孫吳政治社會結構及其統治政策探研》,163頁。

⑩ 《三國志》卷六〇《呂岱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1385頁。

吳簡中有將叛逃者稱為“賊”，其物品稱為“叛物”的記錄：

其卅二斛一斗七升賊黃勳黃龍三年叛物買米 貳・3859

其卅六斛大男張吉張狗所買賊黃勳黃龍三年牛價米 貳・3866

吳簡中還記載有追捕“叛民”的事情：

草言府逐捕叛民鄭□… …事

四月廿五日兼兵曹史□□白 柒・4453

“叛民”指叛逃的民衆，與復民身份不同。吳簡又載：

□□隱核叛吏區蘇家財□傳送□□ 叁・6869

有的叛走者家產要被籍沒充公。^① 對叛走者要予以懲戒、沒收家產，自然不會有優待政策了。

關於復民的現有研究，學者大多認同其身份屬於“民”，祇是在具體的身份屬性判定上存在分歧。不少學者受“復”為“復除、優復”之意的影響，過於看重田家莧中復民受到優待的情況，將“復民”中的“復”理解為“復除、優復”。的確，史書中以“復除、優復”的義項而使用的“復”字頻繁出現。但是，田家莧中的復民並沒有被免除租稅或徭役，而僅僅是享受了較普通田家低的熟田的納米標準而已，甚至繳納錢、布的標準都與普通田家相同。由此可知，“復民”的“復”不是“復除租稅（或徭役）”的意思。張文傑先生試圖跳出復民受到部分租稅減免優待這一現象的思維限制，從來源上分析復民的身份屬性，但其結論難以讓人信服。因此，復民的身份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 從來源看復民的身份

吳簡中關於復民的記載，有的出現於《嘉禾吏民田家莧》中，如：

己酉丘復民五(?)麥，佃田三町，凡廿九畝，皆二年常限。其廿四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五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畝收布二尺。其米三斛七升六合，四年十二月十日付倉吏李金。凡為布二丈六尺一寸四分，五年二月十二日付庫吏番有。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為錢八百八十八錢，五年二月十日付庫吏……嘉

禾五年三月□日□戶…… 田家莧 4・42

^① 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竹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5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167頁。

田家蒯中的復民共有 13 戶,都屬於己酉丘。^① 田家蒯中有復民,其他簿籍中也有復民。如下:

南鄉領復民田六十四畝	畝	一百廿	步	收	□□	壹 · 1605						
□	嘉	禾	二	年	復	民	租	米	…	□	壹 · 2884	
……二千復民三年租錢											壹 · 5180	
入邑下復民楊樊租錢四千											壹 · 5328	
承正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復民租錢一千											壹 · 5625	
右	□	鄉	入	復	民	限	米	一	斛	五	斗	貳 · 522
入	□	鄉	復	民	租	(?)	錢	四	□	□	□	貳 · 8558
入四年復民租米十四斛三斗五升												叁 · 1983
其五斛一斗一升復民嘉禾元年租											米	柒 · 18

復民不僅要交納租米、限米,還要繳納租錢,並以鄉為單位、分年別進行統計。不僅己酉丘有復民,邑下(屬都鄉)、^②南鄉也有復民。復民雖有集中居住的傾向,^③但并非祇居住於一個地方。嘉禾四年、五年有繳納米、布、錢的復民,^④嘉禾元年、嘉禾二年、三年(可能是嘉禾三年)有繳納租米、租錢的復民。復民極可能是嘉禾年間一直存在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群體。^⑤ 高敏先生認為孫權時期臨湘侯國內存在一個復民階層,^⑥較為符合實情。這樣一個身份特殊的群體,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呢?

如果單從“復”為“復除、優復”來理解復民的意思,祇能解釋其受到優待的現象,而無助於理解其身份,甚至在解釋其“復”的內容時也存在分歧。^⑦ 這說明以受優待的現象來反推“復民”身份的思路難以成功。張文傑先生將“復”理解為“恢復”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思路,即從來源予以考察,或許更能接近復民的真實身份。

關於“復”義項的使用,翻檢秦漢三國史籍,可以見到諸如“復其民”“復其身”“復其次”

① 這 13 件田家蒯分別是: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7、4·589。其中 4·537、4·589 原釋文中的丘名缺,王素先生認為都是己酉丘。參見其著《〈嘉禾吏民田家蒯〉所見“己酉丘復民”性質新探》,53 頁。

② 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關尾史郎先生提示,此“邑下”在都鄉城內。

③ 王偉雄:《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復民”與“復”》,《簡牘學報》第 18 期,291-292 頁。

④ 雖然祇有嘉禾四年田家蒯中有復民,但是如 4·42 等納米在嘉禾四年,納布、錢在嘉禾五年。

⑤ 就現有資料看,目前祇能確定嘉禾年間有復民存在,但不排除嘉禾之前或之後存在復民的可能性。

⑥ 高敏:《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82 頁。

⑦ 關於復民“復”的內容,學界多有論述,王偉雄先生有過總結,並提出“復”為免除徭役的觀點。參見其著《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復民”與“復”》,《簡牘學報》第 18 期,298-301 頁。

“復其家”“復其田”“復終身”“復其口算”“復其徭役”等記錄。但這裏的“復”為“復除、優復”的意思，與“復民”之“復”意義有別。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將“復”作為“恢復”的用法，如“復為左丞相”“復為衛尉”等。這類用法在秦漢史籍中經常見到。此用法可以歸納為“復為+身份名詞”的格式，其中“復”為“恢復”之意。在此義項下使用“復”，除了恢復舊有官職外，還有恢復平民身份的記錄。如：

(1)《後漢書·光武帝紀》：“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并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2)《後漢書·殤帝紀》：“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

(3)《三國志·蜀書·李嚴傳》：“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

(4)《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

這些史料都是從其他身份重新恢復平民身份的記錄。其中(1)是從士卒身份恢復為平民身份；(2)是從被禁錮者的身份恢復為平民身份；(3)(4)是從叛賊身份恢復為平民身份。前面已經論述，孫吳不會對由叛賊復為平民的人予以政策優待，因為這樣可能會產生鼓勵叛亂的消極影響，不利於孫吳統治。雖然(3)(4)是恢復平民身份，但因其不會受國家政策優待，故而與吳簡中復民的性質不同。(2)是由被禁錮的人復為平民。東漢時期被禁錮者往往附帶諸如不得錄用為官等懲罰性限制。被禁錮者雖有社會影響力，但法律地位甚至低於平民。^①此時將被禁錮者復為平民，實際上是免除其被禁錮時所附帶的身份限制，從而具有重新進入仕途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講，從法律地位低於平民的被禁錮者到重新獲得與平民同等的法律地位，這本身就是一種優待。對於這些人，未見國家對其有租稅優待政策的記錄，也未見稱他們為“復民”。他們也應不是吳簡中的“復民”。

於此，只剩下(1)中士卒恢復平民身份的情況了。士卒本出自平民。《漢書·馮唐傳》載：“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來自平民的士卒，或因戰爭結束，或因傷病等失去戰鬥能力，或達到一定年齡等，都可以從軍隊復員。“還復民伍”，意即士卒恢復其平民身份。雖然他們曾經是士卒，但其復員之後身份變為平民。他們曾為國家征戰、有功於

① 越智重明先生認為被禁錮者是身份受限制的庶人=庶民。被處以禁錮的官吏，要被剝奪官吏身份，身份降到比庶人(農民)以下，被赦免之後纔成為身份不受限制的平民。參見其著《漢時代の賤民、賤人、士伍、商人》，《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7卷，1979，1-26頁。

國家,其復員後國家給予一定的政策優待,賦予其不同於一般平民的特殊身份,以酬答他們過去的功勞,并藉此鼓勵其他民衆從軍、爲國效命。他們不再是士卒而是民衆,故而以“民”稱之。但是他們有從軍的經歷,故而又以“復”來標識其特殊身份。於是就出現了“復民”這種受到國家政策優待的特殊稱謂。^① 孫吳政權處於戰亂環境之中,如光武帝將“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的復員政策,《三國志·吳書》等孫吳的有關史籍中未見記載。但士兵達到一定年齡可復員爲平民的政策,孫吳時期可能是存在的。^② 此外,那些因傷病而失去戰鬥能力的士卒應也可以復員。他們構成了復民的主要來源。復民確如張文傑先生所說爲“復爲平民”之意,但不是由叛民而來,而主要是由士卒復員而來。復民是孫吳政權對士卒復員、恢復平民身份後的特殊身份稱謂。

三 兩漢、孫吳對復員士卒的優待政策

孫吳時期對復員士卒(即復民)有優待政策。那麼,兩漢時期對復員士卒是否也有優待政策?《漢書·高帝紀》所載高祖“兵皆罷歸家”詔書中有: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對於復員士卒,漢高祖劉邦給予了政策優待。有罪者赦免,無罪且無爵或爵低於大夫者賜爵爲大夫。爵位大夫以上者賜爵一級。七大夫以上者可以享有食邑,七大夫以下者可以“復其身及戶,勿事”。關於“復其身及戶,勿事”的內容,顏師古注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即復除其自身及家人的賦稅徭役。漢代實行以爵位爲基礎的名田宅制,可以憑爵位占有田宅。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規定:

關內侯九十五頃,大庶長九十頃,駟車庶長八十八頃,大上造八十六頃,少上造八十四頃,右更八十二頃,中更八十頃,左更七十八頃,右庶長七十六頃,左庶長七十四頃,五大夫廿五頃,公乘廿頃,公大夫九頃,官大夫七頃,大夫五頃,不更四頃,簪裹三

① 值得注意的是,對“復民”(恢復爲民)這種特殊身份人群的命名方式,與“還民”(還鄉之民)的命名方式如出一轍。

② 《宋書·武帝紀》載:“荆、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士卒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娘,悉仰遣之。”《陳書·宣帝紀》載:“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漢代(東漢)士卒到56歲可以復員,南朝宋、陳時期士卒到60歲可以復員。由此推測,處在兩者之間的孫吳時期,士卒達到一定年齡後也應可以復員,不過尚不知其具體年限。

頃，上造二頃，公士一頃半頃，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頃，司寇、隱官各五十畝。不幸死者，令其後先擇田，乃行其餘。它子男欲爲戶，以爲其□田予之。其已前爲戶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

宅之大方卅步。徹侯受百五宅，關內侯九十五宅，大庶長九十宅，駟車庶長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長七十六宅，左庶長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裹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隱官半宅。欲爲戶者，許之。^①

具體執行時此規定并非都能落到實處，以至於高祖又下詔責備地方官吏：“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②不論如何，復員士卒都能從政府手中獲得一定數量的田宅。對於復員士卒，除了授予爵位進而可以獲得田宅外，詔書還規定免除其自身和家人的賦稅徭役。漢初復員士卒受到國家政策優待十分明顯。《後漢書·光武帝紀》中說“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並沒有提到對復員士卒的優待政策。依照東漢初期沿用西漢制度的慣例，可能此時已有對復員士卒賜爵、復除賦稅徭役之類的優待政策。因爲已有相關制度的存在，可以依制度執行，故而無須特別提及。

隨着普賜民爵所帶來的爵位貶值以及土地的長期占有，到孫吳時期已經很難憑爵位（特別是民爵）占有田宅了。所以，對於復員士卒——復民，孫吳政府並沒有賜予爵位——這由“復民楊樊”又稱“大男楊樊”可知。^③孫吳所面臨的內外環境決定了其必須對平民徵收租稅，不能像漢代那樣完全免除復民及其家人的賦稅徭役，而祇能在熟田納米標準上有所優待。

田家菑中3戶復民（4·42、4·45、4·50）有熟田5畝。這個整齊劃一的田畝數可能是安置時政府配給熟田的標準。其他復民沒有熟田，是因沒有熟田可分還是他們因爲經濟原因已把熟田賣掉，尚不得而知。復民所佃旱田的畝數也不一樣，從23畝到49畝不等。這是與配給旱田時的依據標準（如家庭人口）有關、還是與土地買賣導致他們旱田畝數的變化有關，目前也不清楚。但從復民都有不少田地（最少者旱田23畝）、特別是3戶復民有5畝熟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2頁。

②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54-55頁。

③ 高敏先生認爲壹·5328簡中的“邑下復民楊樊”與壹·4362簡中的“大男楊樊”可能爲同一個人。參見其著《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83頁。

田這一情況看,當時孫吳政府確實對復員士卒進行了統一安置。^①

復民熟田的納米標準為 5.86 斗/畝,遠低於普通民衆 12 斗/畝的熟田納米標準。復民受到政策優待明顯可見。就田家菑所見,實際享受優待的復民祇有 3 戶,約占田家菑中復民總戶數的 23.08%。復民受優待的範圍似乎并不大。但也應注意到,凡是有熟田的復民都享受到了優待,沒有享受到優待的復民都沒有熟田。這說明復民是否享有優待并非是國家政策所致,而應跟其所佃田地性質有關。孫吳政府對復民的優待政策是存在的。

對於復員士卒,漢代有賜爵(可以憑爵位占有田宅)、復除其自身及家人賦稅徭役等優待政策。孫吳時期已經不再對復民賜爵,也不能免除其自身及家人租稅徭役,祇是在熟田納米標準上有一定程度的優待。雖然孫吳政府對其進行了統一安置,也配給了土地,但是此時期復民(復員士卒)受優待的程度已經遠低於兩漢時期。

四 復民與士及“優復之民”的身份差別

復民是受政策優待的群體。此外,吳簡中受優待的還有州吏、士以及戶籍簿中登有“復”的吏民。鑒於吏、民身份有別,暫不把州吏納入討論的範圍。在此祇討論復民、士以及那些“優復之民”,討論他們的身份差別以及相互間的等級地位。

1. 復民與士的身份差別。

吳簡中士的田家菑共有 9 件。^② 關於“士”身份的認識雖曾有分歧,但是“士為兵士”的說法越來越得到學者的廣泛認同。我們贊同此說法。準確地講,士應為當時正在服兵役的士卒,即現役士卒。士的田家菑中有“熟田依書不收錢布”的語句。^③ 以簡文內容看,士的熟田不止是不收錢、布,也不收米。^④ 可知士也是享受國家優待政策的群體。

① 吳簡中有以下幾枚簡,如下:

其五斛一斗一升復民嘉禾元年租米	柒·18
其五斛一斗一升嘉禾元年復民租米	捌·3040
其五斛一斗一升嘉禾元年復民租米	捌·3044
其五斛一斗一升嘉禾元年復民租米	捌·3305
其五斛一斗一升復民嘉禾元年租米	捌·3752

這 5 枚簡納米數額、交納時間、交納者身份等完全相同。是否從另一側面說明當時確實對復民進行了統一安排,所以其交納數額等相同,這值得注意。

② 這 9 件田家菑分別為:4·490、4·491、4·492、4·493、4·495、4·496、4·548、4·550、4·631。

③ 此以田家菑 4·492 為例,其內容如下:

樸丘士吳有,佃田十三町,凡九十四畝,皆二年常限。其七畝熟田,依書不收錢布。其八十七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凡為布一匹一丈二尺一寸,准入米二斛六斗一升,五年三月十日付倉吏潘慮。旱田畝收錢卅七,凡為錢三千二百十九錢,准米一斛九斗九升,五年三月七日付倉吏潘慮。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戶經用曹史趙野、張惕、陳通校。

④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菑研究》,47 頁。

國家對現役士卒予以優待是由來已久的慣例。漢高祖時曾多次對現役士卒及其家人予以優待。“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① 漢魏之際，“復除門戶”依然是優待從軍者的措施之一。《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所引《江表傳》載：

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孫策對從軍者有“復除門戶”的優待。由此可見，作為現役士卒，從西漢到三國兵士都受到政策優待。

吳簡（主要依據田家荊）中士和復民受優待的程度並不一樣。就佃田畝數看，有熟田的復民祇有3戶，都是5畝；而士都有熟田，從5畝到10畝不等。熟田畝數最少的士李安家（4·491）為5畝，與復民熟田畝數相等。旱田畝數中，除了士李安家旱田48畝略低於復民中旱田最多者龍困家（4·51）的49畝外，其他士的旱田畝數都在60畝以上，最高者94畝（4·496），遠遠多於復民的旱田畝數。即便是李安家，其旱田畝數也要高於除龍困之外的其餘12家復民的旱田畝數。就熟田的租稅繳納標準而言，士的熟田不收米、布、錢，而復民要按照平民標準收布、錢，祇是在納米標準上較平民低，但是要較不納米的士高。士與復民在土地占有情況和受優待內容等方面的差別可整理如下表（表1）：

表1 田家荊中士與復民的待遇差別

		士	復民
土地占有	熟田	5—10畝不等	5畝
		每戶都有熟田	祇有3戶有熟田
	旱田	48—94畝不等 (除李安家48畝外,其他家都在60畝以上)	23—49畝不等
優待內容		熟田不交米、錢、布	熟田以5.86斗/畝的標準納米,納錢、布的標準與普通田家相同

由上表可知，士與復民相比，不僅在土地占有數量上要普遍高於復民，其租稅繳納方面受優待的程度也大於復民。從受優待程度體現地位高低的角度講，士的地位可能要高於復民。士的地位之所以高於復民，可能跟二者的身份有關。復民曾經是士卒，但現在已經復員為民。士則是現役士卒，是國家維護統治的直接依靠力量。士和復民之間的待遇差別體現

① 《漢書》卷一《高帝紀》，33、65、78頁。

出孫吳依據身份而予以優待的統治政策。這有鼓勵民衆直接爲國效命的意圖。

2. 復民與“優復之民”的身份差別。

在復民之外,吳簡中還有一部份登錄有“復”的民衆。高敏先生稱之爲“優復之民”,我們借用之。這些“優復之民”多見於戶籍簿。此略舉幾例:

雷寡嫂大女把年卅三算一刑右足復 壹·2880

素寡婦大女思年卅六算一八十^可復 壹·3322

有對身體殘病者(如刑右足)的“復”,有對高齡者(80歲)的“復”。此外,還有對吏、給吏的“復”,如下:

子公乘生年廿三算一真吏復 壹·3346

小成里戶人公乘五陵年卅六給縣吏復 壹·9435

“復”的原因不盡相同,但似乎與爵位無關。即便如此,吳簡中也有不少符合上述條件而沒有登錄“復”的情況,如:

屈季母大女妾年八十五 壹·7364

□□公乘龍年八十六 □□^大^女□年廿三算一 貳·1541

宜陽里戶人公乘信化年卅五真吏盲左目 壹·2872

高遷里戶人公乘□□年卅三算一給縣吏 壹·7353

東陽里戶人公乘烝謂年廿二算一給州吏 壹·8646

壹·7364 中的妾 85 歲,貳·1541 中的龍 86 歲,年齡都高於壹·3322 中的 80 歲,但都沒有“復”。壹·2872 中爵位公乘,爲真吏,且盲左目,也沒有“復”。壹·7353、壹·8646 中爵位公乘,爲給縣吏、給州吏,也沒有“復”。目前尚不知道這些具有相同特徵但有的“復”、有的不“復”的原因何在,需要進一步的考察。但就現今公布的吳簡所見,對於“優復之民”的“復”都是以個人爲優待對象,即復除對象是具體的個人,而不是一家一戶地復除。這與從軍者“復家”“復除門戶”有別,也與以戶爲單位受到租稅繳納優待的復民存在差別。復民是以較低的熟田納米標準爲優待內容,^①“優復之民”是以免除徭役(或復除算賦)爲優待內容,^②

① 復民已服兵役,也很有可能免除其徭役。漢高祖時就曾免除復員士卒及其家人的徭役。但就目前資料所見,祇能斷定復民在租稅繳納上享有優惠。孫吳時期復民是否享有免除徭役的優待,目前還不清楚。

② 關於吏民簿中“復”的內容,學界曾有爭論。凌文超先生總結爲“免除徭役說”和“復除算賦說”,並支持後者。參見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54頁。壹·3346中記載了“算”“真吏”“復”三項內容,“復”的內容是什麼尚難以斷定。因此,本文暫將兩種說法都列於此。

二者受優待的內容也存在差別。復民與“優復之民”的優待差別如下表(表2)所示:

表2 復民與“優復之民”的優待差別

	復民	“優復之民”
優待對象	復民及其家庭—戶	“優復之民”自己—個人
優待內容	熟田以較低的納米標準納米	免除徭役(或算賦)

復民與“優復之民”存在戶與個人的優待對象的不同,二者受優待的內容也存在差別。正如高敏先生所言,復民與“優復之民”是兩個身份有別的群體。^① 復民和“優復之民”雖然都是“民”,但復民是從士卒復員而來,這決定了其不同於其他一般民衆的特殊身份。“優復之民”在土地租稅繳納上沒有特別的優惠政策,而復民熟田納米標準要低於民衆的標準。由此推測,復民與“優復之民”不僅身份有別,可能其地位也要高於“優復之民”。

五 餘論

新近公布的《竹簡[柒]》中,也有一枚含有“復民”字樣的竹簡,內容如下:

戶曹言理出小男利臣付典田掾蔡忠復民事

嘉禾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柒·4446

此簡中的“復民”到底是指“恢復民籍”的行為,還是與“復民”一樣是身份名詞,必須加以分析。這樣的“言事”文書在《竹簡[柒]》中有不少,下面羅列兩份與戶曹相關的文書:

戶曹言依科結正大男陳脩罪名事

嘉禾六年三月十三日幹蔡□封

柒·4436

戶曹言……有入五萬五千六百悉畢事

嘉禾六年二月廿四日書佐呂承封

柒·4437

按照這些“言事”文書的格式看,柒·4446簡中的“理出小男利臣付典田掾蔡忠復民”,應是戶曹所言事情的內容。《廣雅·釋故三》:“理,治也。”《淮南子·時則》:“理關市,來商旅。”^② “理”有“治理”之意。此簡中的“理出”當與吳簡中的“料核”“隱核”等核查行為有關,^③ 為

① 高敏:《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81-83頁。

②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417頁。

③ 凌文超先生對學界關於“隱核”的觀點有所總結,並認為“‘隱核’當為有所憑證或依據而進行的權宜、臨時性核實,其目的則在於加強對某些重要政務的監察和掌控”。參見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443-444頁。

“治理(戶籍之後)而得出”之意,目的在於加強對民戶的監管。柒·4446 應屬於向上級提交的有關戶籍核查結果的報告文書。如此,柒·4446 的簡文內容這樣理解似更合適:戶曹報告“核查出(核查戶籍前曾脫離戶籍或者不正當地取得了“民”之外的其他身份的)小男利臣,然後交付給典田掾蔡忠恢復(利臣)民籍”一事。“復”為“恢復”之意,“復民”為“恢復民籍”的行為。^① 恢復民籍自然也恢復了民的身份,但這與受到政策優待的特殊身份——“復民”不同。作為身份名詞的“復民”中的“復”祇表示其來源或曾經的身份變化過程,不再是現時(如以優惠標準納米時)的行為動作。

若將柒·4446 中的“復民”理解為與田家菑中“復民”具有相同意義的身份名詞,則會導致如下兩種理解上的困境:其一,國家政策上難以圓通。返還鄉里的“還民”未能享受國家的賦稅優待,若是曾脫離戶籍或者不正當地取得了“民”之外的其他身份的人被核查出來之後會受到國家優待,如此政策讓人難以理解。難道孫吳政權鼓勵民衆去脫離戶籍或不正當地取得“民”之外的其他身份,然後再不厭其煩地讓官府去把這些人核查出來,重新登記到民籍之中,並予以政策優待?這種“自找麻煩”的國家政策既不利於國家招撫流散的民衆返還鄉里,也不利於人口管理和社會控制。如此“奇怪”的政策不太可能存在。其二,用語習慣和簡文內容上也難以理解。如果此簡中的“復民”為身份名詞,那麼它和“典田掾蔡忠”都是名詞。“名詞+名詞”的用語習慣確實存在,如“官職稱謂+人名”,但這種用語習慣指向的是同一個人,人名前的官職稱謂實際上起到具體說明的修飾作用。但此簡中是“典田掾蔡忠+復民”。如果復民是身份名詞,它指代的是“小男利臣”,而不是“典田掾蔡忠”。意即此簡中並列使用了兩個指向不同人物的名詞。果真如此,“典田掾蔡忠”和“復民”(利臣)兩個不同人物之間因為缺乏動詞、助詞等起連接作用的詞,不僅不符合用語習慣,也會導致簡文內容無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係、戶曹報告的內容等都不能明白。

相反,將柒·4446 簡中的“復民”理解為“恢復民籍”的行為,不僅不會出現國家政策上的理解困境,也不會出現不符合用語習慣的情況,簡文的內容也變得容易理解。由此看來,“復民”為“恢復民籍”的行為,似更符合邏輯。此簡中雖有“復民”字樣,但與作為特殊身份的“復民”不是一回事。柒·4446 的記錄祇能說明孫吳有較為嚴密的人口管理制度,並不能成為否定前文所得出的“復民主要是士卒復員後的特殊民衆”結論的證據。

排除復民為復人(或復客)、士兵家屬、貧困女戶、曾經的叛逃者等多種可能後,我們認為這種重新恢復平民身份的人,主要是由士卒復員而來。“復”為“恢復”之意。“復民”是孫吳

^① 曾就柒·4446 簡中“復民”一詞的理解問題向中國社會科學院鄔文玲先生請教。先生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的回信中指出:從前後文看,該簡中的“復民”可能不宜理解為一種身份,而應理解為“恢復民籍”的行為。“復”為動詞,是“恢復”之意。簡文大意是:清查出一個非法脫離正戶民籍的小男利臣,交給典田掾蔡忠處理,使之恢復民籍。後再三思考,認為此種理解更為合適。於是放棄舊有觀點,採用此說,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詳細分析。

政權對士卒復員、恢復平民身份後的一種特殊稱謂，其身份要低於士，但要高於“優復之民”。壹·4362載：“大男楊樊餼錢月五百”。有學者認為餼錢跟商業活動有關。^①高敏先生已經指出，這個楊樊跟復民楊樊為同一個人。可知孫吳時期復民不僅擁有土地，從事農業生產，還可以經商。《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載：“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應合選為亭長。”^②士卒到達一定年齡後復員為民，成為復員士卒，可以應選亭長。如果這種情況在孫吳時期也存在，那就意味着復民不僅身份特殊，受政府優待，可以從事農業，可以經商，還可應選基層官吏，其經濟生活、政治地位都較有保障。

士卒復員之後被稱為“復民”，其他人員如官、吏、卒^③等離職之後是否也能成為“復民”，需要予以考察。官、吏、卒在任職之前其身份是民，離職之後也應屬於民的範疇，其身份有一個由“民”到“官”“吏”“卒”再恢復為“民”的變化過程。他們離職後成為“復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嘉禾吏民田家荊中祇有州吏享有一定的租稅優惠，郡吏、縣吏、軍吏、州卒、郡卒、縣卒等都與普通民衆繳納同樣標準的租稅。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吏卒不享有優惠而復民享有優惠的原因何在。他們在職時未能享有租稅優待，如果說其離職後會受到國家的租稅優待，這多少令人懷疑。離職的官員是受到政府優待的群體。《風俗通義·窮通篇》載陳蕃言：“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敕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④不僅如此，撫恤、賞賜離職官員的記錄也不絕於史。離職官員可以憑藉其任職經歷、現有爵位受到政府禮遇，甚至可能憑此享有減免賦稅徭役的權力。不過，官員離職後是否稱為“復民”尚無記載，更沒有其憑藉“復民”身份享受政府優待的記錄。就現今公布的吳簡所見，田家荊中沒有對離職官員予以租稅優待的記錄。吳簡中有“故+官職名/吏”的身份稱謂格式，應是對曾經任官、吏者的稱謂，但田家荊中未見他們受租稅優待的記錄。依據目前所見傳世文獻和出土簡牘等資料，尚無法斷定官、吏、卒等離職後是否可以成為享受國家政策優待的復民。這有待於新材料的進一步公布和研究的深入。

後記：論文草成後，承蒙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于振波先生、日本新潟大學關尾史郎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鄔文玲先生、凌文超先生及匿名審稿專家等提出修改意見，本文多有採納，在此致謝！

① 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宋超：《吳簡所見“何黑錢”、“餼錢”與“地餼錢”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240-247頁；王子今：《長沙走馬樓竹簡“地餼錢”的市場史考察》，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2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232-244頁。

② 《後漢書》志第二八《百官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3624頁。

③ 關尾史郎先生提示，此“卒”當為在州、郡、縣等單位服勞役者，為差役，與軍隊的“士卒”不同。

④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343頁。

走馬樓吳簡紀日干支錯亂問題試探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連先用

內容提要 走馬樓吳簡所見年月清晰的紀日干支中,有超過四成與陳垣《魏蜀吳朔閏異同表》所推不合。析言之,吳簡中使用紀日干支的日期按照是否書寫月朔干支可以分為“有朔類”和“無朔類”,“有朔類”干支大多數與陳《表》相合,而“無朔類”干支則不僅將近半數不合陳《表》,且彼此之間也往往牴牾。吳簡中紀日干支錯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漢末三國時期干支紀日法的沒落,同時受到孫吳初期新舊曆法并行、賬簿中干支書寫不嚴謹等因素的影響。“有朔類”日期大多數干支正確的原因,在於這種日期多用於上行文書,又寫明了月朔干支。吳簡中年份不明的紀日干支,至少有一部分也應是錯亂的。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干支紀日 數字紀日

干支紀日是早期中國常用的紀日方式,出土簡牘中所見極多。作為孫吳初期檔案文書的走馬樓吳簡,其中同樣可以看到不少使用干支紀日的例子。然而,吳簡中的紀日干支却大量地與陳垣《魏蜀吳朔閏異同表》(以下簡稱陳《表》)所推不合。^① 整理者首先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並在注釋中予以說明,^②但限於體例,未對其原因作進一步的探討。隨着吳簡的不斷公

①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222-226頁。案,本文所涉時間區間為黃武六年(227)到嘉禾六年(237)。據筆者核對,至少在此區間內,陳《表》與方詩銘、方小芬《三國曆日表》(收入兩位所編著《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294-305頁)及張培瑜《魏蜀吳朔閏異同表》(收入其編著《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1057-1060頁)皆無出入。陳《表》實可代表現今學界對此時期孫吳朔閏的一般認識。又,本文所論紀日干支包括月朔干支和日干支,行文中紀日干支與月朔干支、紀日數字相對言時,則特指日干支。

② 走馬樓吳簡使用干支紀日的情况目前祇見於《竹簡》部分,本文所引《竹簡》簡文出自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貳]、[叁]、[肆]、[柒]、[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2011、2013、2015。除《竹簡[肆]》以外,各卷對簡文中的紀日干支不合陳《表》處均予注釋說明,但亦有失注之處。

布,其紀日干支不合陳《表》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凌文超先生已指出該現象“值得綜合探討”,^①然因其研究重心不在此而沒有展開論證,學界也尚無針對此問題的專題研究。有鑒於此,本文擬對走馬樓吳簡中使用紀日干支的簡文作一系統梳理,探明其紀日干支不合陳《表》問題的具體特徵,在此基礎上,對問題的成因提出一孔之見。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吳簡中使用紀日干支的簡文及其特徵

走馬樓吳簡數量巨大,使用紀日干支的竹簡分散在不同卷次中。但是,如果把這些分散的簡文全部搜集起來並加以排比之後,就會發現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規律。以下,先以表格的形式將有關材料分類列出,然後對其中紀日干支使用的特徵作出分析。

(一) 使用紀日干支的簡文

吳簡中使用干支的日期,按照是否書寫月朔干支,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有朔類”和“無朔類”。現依時間先後對兩類簡文進行排比,^②並據陳《表》,對其干支做出校正。審慎起見,這裏祇統計使用干支且年月俱全的日期,日期釋文不確定者,暫不收錄。同時,核對圖版,對釋文有疑義處,隨文注出。

表一:“無朔類”簡文及其干支校正

序號	簡號	節引簡文 ^③	干支校正
01	壹·2055	被督軍糧都尉黃龍元年四月廿九日辛亥書	壬子
02	肆·4909	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二月十五日己巳書	丁巳
03	壹·2069	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五月十七日丙寅書	丁亥
04	壹·2030	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七月十八日戊子書	丁亥
05	肆·4752	被督軍糧都尉黃龍三年十月十六日乙卯書	甲寅
06	肆·4163	都尉黃龍三年十一月二日庚辰書	庚午
07	壹·1832	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十一月六日乙巳書	甲戌

①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發掘庫布賬簿體系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267頁,注②。又見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372頁,注⑤。

② 如日期相同,則按卷次及簡號先後排序。

③ “無朔類”簡主要是“被書簡”,所被之“書”絕大多數來自縣或“督軍糧都尉”,完整簡文較長,不便具引,節引簡文中祇保留日期及文書所自。有關這兩種“被書簡”的研究,參看戴衛紅《長沙走馬樓吳簡中軍糧調配問題初探》(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04-224頁)、《長沙走馬樓所見三州倉出米簡初探》(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197-210頁)及鄧瑋光《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年第1輯,231-254頁)。

續表

序號	簡號	節引簡文	干支校正
08	捌·3440	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十一月九日乙巳書	丁丑
09	壹·2008	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乙巳書	己卯
10	肆·4145	督軍糧都尉黃龍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乙未書	
11	肆·4105	被督軍糧都尉黃龍三年十二月一日己亥書	戊戌
12	肆·4979	□黃龍三年十二月廿一日己未書	戊午
13	壹·1760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三月四日庚午書	
14	壹·2018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四月九日甲寅書	甲辰
15	壹·2312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四月十七日壬子書	
16	叁·2172	被縣嘉禾元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壬戌
17	壹·2125	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十四日戊申書	
18	壹·2303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十四日戊申書	
19	壹·2354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十四日戊申書	
20	叁·1361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十九日辛丑書	癸丑
21	叁·1419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十九日辛丑書	癸丑
22	叁·2494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十九日辛丑書	癸丑
23	叁·5160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十九日辛丑書	癸丑
24	叁·1507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廿日甲寅書	
25	叁·1528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廿日甲寅書	
26	叁·1537	被縣嘉禾元年六月廿日甲寅書	
27	壹·209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書	
28	壹·2171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書	
29	叁·1512	被縣嘉禾元年八月四日庚辰書	丁酉
30	貳·7629	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八月八日辛丑書	
31	壹·225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八月九日壬寅所書	
32	壹·2257	都尉嘉禾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書	
33	叁·1417	被縣嘉禾元年八月廿日甲辰書	癸丑
34	叁·1590	被縣嘉禾元年八月廿日甲辰書	癸丑
35	貳·7364	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二日甲子書 ^①	

① “十一”原釋作“十”，今據圖版改。

續表

序號	簡號	節引簡文	干支校正
36	貳·7463	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十月廿二日甲辰書	甲寅
37	壹·2407	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二日甲子書	
38	貳·7372	☑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二日甲子書	
39	壹·2107	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三日乙丑書	
40	壹·1850	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六日壬辰書	戊辰
41	壹·2105	禾元年十一月六日壬辰書	戊辰
42	壹·2112	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癸卯書 ^①	壬申
43	捌·3413	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嘉禾元年十二月二日癸巳書	
44	捌·3216	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庚戌書	
45	叁·2507	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二月卅日辛酉書	
46	叁·2527	糧都尉嘉禾元年十二月卅日辛酉書	
47	捌·3374	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嘉禾元年十二月卅日辛酉書 ^②	
48	捌·3240	糧都尉嘉禾二年正月十日辛未書	
49	柒·1304	☑禾二年正月十八日壬午書	己卯
50	柒·2349	☑嘉禾二年正月十八日己卯書	
51	捌·320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正月十八日己卯書	
52	叁·1425	被縣嘉禾二年正月廿一日庚申書	壬午
53	叁·1525	被縣嘉禾二年正月廿一日庚申書	壬午
54	叁·1400	被縣嘉禾二年正月廿二日庚午書	癸未
55	捌·3303	被監作部都尉王暉嘉禾二年正月廿九日庚寅	
56	捌·314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二月一日辛卯書	
57	柒·2019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二月九日己卯書	己亥
58	捌·5641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二月十三日癸卯書 ^③	
59	叁·1347	被縣嘉禾二年二月十四日戊午書	甲辰
60	叁·1423	被縣嘉禾二年二月十四日戊午書	甲辰
61	叁·2483	被縣嘉禾二年二月十四日戊午書	甲辰

① “癸卯”原釋作“壬申”，今據圖版改。

② “禾”原釋作[禾]，今據圖版確定。

③ 據圖版，“卯”似應作“巳”。

續表

序號	簡號	節引簡文	干支校正
62	捌·3322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三月三日癸亥書	
63	叁·1522	被縣嘉禾二年三月十七日戊寅書	丁丑
64	捌·3012	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嘉禾二年三月廿九日庚寅書	己未
65	叁·1369	縣嘉禾二年四月四日甲午書	
66	叁·1353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五日乙未書	
67	叁·1363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五日乙未書	
68	柒·208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四月七日丁酉書	
69	叁·1483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十三日癸卯書	
70	叁·1511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十三日癸卯書	
71	叁·1558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十三日癸卯書	
72	叁·2171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十三日癸卯書	
73	叁·1541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十五日乙巳書	
74	捌·3046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四月十七日丁未書	
75	叁·2271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日甲寅書 ^①	庚戌
76	叁·2477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日甲寅書	庚戌
77	叁·1420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78	叁·1486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79	叁·1623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80	叁·2204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81	叁·2252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82	叁·2286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甲寅書	
83	叁·2468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四日庚寅書	甲寅
84	叁·1356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85	叁·1421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86	叁·1429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87	叁·1544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88	叁·2174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89	叁·2495	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七日壬子書	丁巳

① 整理者注：“‘廿’下應脫‘四’字。”考慮到吳簡中確有同年同月不同日而紀日干支相同者，則該簡未必脫“四”。簡叁·2477同。

續表

序號	簡號	節引簡文	干支校正
90	叁·1593	被縣嘉禾二年五月八日丁卯書	
91	叁·2277	被縣嘉禾二年五月八日丁卯書	
92	叁·1381	被縣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庚午書	辛未
93	叁·2242	被縣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庚午書	辛未
94	貳·4009	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辛未書	
95	捌·3049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辛未書	
96	叁·1441	縣嘉禾二年五月十七日辛未書	丙子
97	叁·1422	被縣嘉禾二年五月廿四日庚申書	癸未
98	捌·3002	承縣嘉禾二年閏月四日癸巳書 ^①	
99	捌·3015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閏月七日丙申書 ^②	
100	捌·3033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閏月七日丙申書	
101	捌·2997	都尉嘉禾二年六月廿日戊寅書	
102	捌·3219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七月十一日癸巳書	己亥
103	貳·4229	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七月十四日壬寅書	
104	叁·1519	被縣嘉禾二年八月十二日丙午書	己巳
105	叁·7160	被嘉禾二年八月十五日己未書	壬申
106	貳·3861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十月十八日甲戌書	
107	貳·3836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十月廿七日癸未	
108	捌·3452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十一月七日丁酉書	癸巳
109	叁·7933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午書	丁酉
110	叁·2546	被縣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丁巳書	己亥
111	壹·1142	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戊子下起右金曹 ^③	戊寅
112	捌·5404	都尉嘉禾三年正月十日乙未書	
113	肆·3629	都尉嘉禾三年正月廿一日癸丑書	丙午
114	柒·103	被督軍糧都尉嘉禾三年五月十二日辛未書	乙未
115	肆·3840	嘉禾六年三月三日庚午部督軍行左義都尉規督	庚子

① 據陳《表》，當年閏五月。

② “丙”，圖版上為一字之空白。

③ 據圖版，“年”與“十”之間原有約容四五字之空白。

④ 據圖版，“六年”下有約容兩字之空白。

表二：“有朔類”簡文及其干支校正

序號	簡號	簡文	干支校正
116	叁·6513	黃武六年十月壬戌朔日臨湘侯相君□□	
117	壹·4363	嘉禾元年五月丙寅朔日兼中部督郵書掾傅汜叩頭死罪敢言之	
118	壹·4371 正	嘉禾元年五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臨湘侯相□叩頭死罪敢言之	
119	壹·4392 正	□禾元年五月丙寅朔十二日□□臨湘侯相□丞祁叩頭死罪敢言之	
120	壹·9646	嘉禾元年五月丙寅朔日兼中部督郵書掾傅汜叩頭死罪□	
121	壹·4396 正	□禾元年九月乙丑朔廿日甲戌臨湘侯相靖丞祁叩頭死罪敢言之 ^①	朔日當為甲子， 廿日當為癸未。
122	壹·9641	嘉禾元年十一月癸亥朔日長沙太守兼中部督郵書掾尤當察□	
123	捌·5407	嘉禾二年五月庚申朔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124	肆·1294	嘉禾二年十月丁巳朔十八日丁卯右郎中訢督察告 ^②	丁巳朔不誤，十 八日當為甲戌。
125	柒·1971 正	嘉禾二年十月丁巳朔廿日丙子 安成長君□叩頭死罪敢言之	
126	肆·3951	嘉禾二年十一月丁亥朔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③	
127	肆·4557	嘉禾二年 十一月丁亥朔□□□	
128	肆·1476	嘉禾二年十二月壬辰朔卅日辛酉臨湘侯相君丞 叩頭死罪敢言之 ^④	朔日當為丙辰， 卅日當為乙酉。
129	叁·3510	嘉禾三年二月乙卯朔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130	叁·3224	嘉禾三年七月癸未朔日	
131	壹·6919	嘉禾三年十一月辛巳朔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132	肆·1267	嘉禾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主簿羊君叩頭死罪敢言之 ^⑤	辛巳
133	壹·5701	嘉禾四年二月庚戌朔一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134	柒·3191	嘉禾四年六月戊申朔□日……叩頭死罪敢言之	
135	柒·3242	嘉禾四年六月戊申朔七日甲寅南都鄉勸農掾郭宋叩頭死罪敢言之	

① 以九月乙丑朔推算，廿日當為甲申，簡文自相牴牾。

② “□”，該字左半從“言”。又，據圖版，“年”下約有三字之空白。

③ 據圖版，“日”右下方有一小字“戊”。

④ 據圖版，“卅”“辛酉”皆為雙行小字書寫。又，“卅”當作“廿”，以十二月壬辰朔推算，廿日當為辛亥。

⑤ 據圖版，“癸”字相當模糊，亦似“辛”字。

續表

序號	簡號	簡文	干支校正
136	柒·2262	嘉禾四年六月戊申朔十一日戊午南鄉勸農掾謝詔叩頭死罪敢言之	
137	肆·3568	嘉禾四年八月丁未朔 日臨湘侯相君丞敢言之 ^①	
138	捌·4046	嘉禾四年八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從史位廖咨頓首死罪々	
139	捌·4062	嘉禾四年八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從史位臣廖咨頓首死罪十八	
140	柒·3193	嘉禾四年十月丙午朔 日臨湘侯相君□□叩頭死罪敢言之	
141	捌·4239	嘉禾四年十一月丙子朔 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②	
142	捌·4081	嘉禾四年十一月丙子朔九日甲申核事掾趙譚這貴叩頭死罪敢言之	
143	捌·4248	嘉禾四年十一月丙子朔廿一丙申日臨湘侯相君丞叩頭死罪敢言之 ^③	
144	柒·4180	嘉禾五年十二月己巳朔十日戊寅丞宰紀叩頭死罪敢言之	

(二) 紀日干支使用的特徵

根據以上兩表，我們可以看出吳簡中紀日干支的使用具有如下特徵：

第一，紀日干支與陳《表》所推不合的比例相當大。據表一、表二，吳簡中使用干支紀日且年月清晰、釋文明確的竹簡凡 144 枚，其中干支與陳《表》不同者有 61 枚，約占總數的 42.4%。也就是說，走馬樓吳簡中所使用的紀日干支，有超過四成與陳《表》不符。

第二，“有朔類”日期與“無朔類”日期的干支在與陳《表》不合的比率上，呈現出截然的區分。據以上兩表統計，“無朔類”簡凡 115 枚，其干支與陳《表》不合者 57 枚，約占“無朔類”簡總數的 49.6%；而“有朔類”簡凡 29 枚，紀日干支與陳《表》不合者共 4 枚，約占總數的 13.8%。其中，朔日干支與陳《表》不合者 3 枚，約占“有朔類”簡的 10.3%。這說明吳簡中紀日干支與陳《表》不合現象主要集中在“無朔類”簡中。

第三，就“無朔類”日期而言，其干支不僅大量地不合陳《表》，而且彼此之間往往牴牾。

① “日”，原釋作“日”，據圖版及文例改。

② “朔”“日”之間原釋作“□”。查圖版，此處為一字之空白，本無字迹，據改。

③ “廿一丙申”原為雙行小字書寫。

這表現為相互聯繫的五個方面：(1)同年同月同日干支不同，如簡 82 與簡 83。^① (2)同年同月同日干支與陳《表》有合有不合，如簡 50、94 合陳《表》，與它們分別對應的簡 49、簡 93 却皆與陳《表》不合。(3)同年同月相鄰兩日天干相同，如簡 53 與簡 54。(4)同年同月不同日干支相同，如簡 7 與簡 8、9，簡 15 與簡 16，簡 76 與簡 77，皆屬此類。(5)同年同月內不同日期所推算出來的月朔干支不同，前述四種情況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實際上也是此種情況的衍生。以下列舉兩組顯著之例，第一組：

簡 91 嘉禾二年五月八日丁卯	庚申朔 ^② (合陳《表》)
簡 92 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庚午	己未朔
簡 96 嘉禾二年五月十七日辛未	乙卯朔
簡 97 嘉禾二年五月廿四日庚申	丁酉朔

第二組：

簡 108 嘉禾二年十一月七日丁酉	辛卯朔
簡 109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午	丙申朔
簡 110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丁巳	乙巳朔

這些情況表明，“無朔類”日期的紀日干支不僅大量地與陳《表》不合，而且自身也相當混亂。

事實上，紀日干支與陳《表》不合甚至自相矛盾的現象在漢簡中亦有所見，但漢簡中紀日干支與陳《表》相合者占大多數，自相牴牾的比例則更小。^③ 這種情況下，吳簡中干支使用的上述特徵就顯得更加引人注目。

二 吳簡中紀日干支錯亂的原因

關於吳簡中紀日干支不合陳《表》的原因，首先需要從曆法本身來考慮。黃武二年(223)正月，孫吳“改四分，用乾象曆”，^④而魏、蜀仍沿用四分曆。從陳《表》來看，乾象曆每月朔日干支中的半數與四分曆相同，其餘半數則規律地比舊曆提前一天。^⑤ 在以上兩表中，簡 1、4、

① 這裏所用簡號為表一、表二中簡文的序號，下同。

② 此為按簡文日期所推算出來的月朔干支，下同。

③ 陳夢家先生在《漢簡年曆表叙》(《考古學報》1965 年第 2 期，後收入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232-233 頁)中最早指出漢簡中所見干支與陳《表》所推“大多數是一致的，由此可證後人用漢時曆術所推定的朔閏，大致是符合實際的”。隨着更多漢簡的發現和公布，陳先生的觀點也不斷得到新材料的印證。有關文章很多，參見胡永鵬《〈肩水金關漢簡(貳)〉中與曆表不合諸簡考證》，《簡帛》第 9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73 頁，注③。

④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9 頁。

⑤ 參羅新《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168 頁。

5、11、12、63、121 都出現了所記干支比乾象曆晚一天的現象，且除簡 1 和簡 121 之外，均與陳《表》所推的四分曆相合。^① 這些情況都發生在嘉禾二年（233）以前，又以黃龍年間為最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簡 62 與簡 63 所記日期同為嘉禾二年三月，但却分別與乾象曆和四分曆相合。這說明孫吳在推行乾象曆之後，四分曆仍在一定時間和範圍內繼續行用。這樣看來，吳簡中部分紀日干支的錯亂與新舊曆法的并行直接相關。^② 不過，除去上述情形，吳簡特別是“無朔類”簡中紀日干支的錯亂依然嚴重。那麼，這些紀日干支為什麼會大量出錯，並且多出現在“無朔類”簡中呢？筆者認為，其原因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察：

（一）日期書寫格式與使用場合對干支正誤的影響

根據表一、表二所提供的信息，我們發現兩類日期在書寫格式和應用場合上存在顯著差異。在表一中，“無朔類”簡凡 115 枚，除簡 111 和簡 115 以外，皆為學界所通稱的“出米簡”，所屬簿書性質為賬簿。表中節引簡文的基本格式為“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縣/監作部都尉+某年+某月+日數+干支+書”。李均明先生指出：“‘被書’指接受上級下發的某種指令文書，該文書具有調遣的效力。”^③ 也就是說，這些所被之“書”是一種下行文書。那麼，“書”前面的日期（包括干支），也應該來自下行文書。

再來看“有朔類”簡，此類簡文較完整者，除簡 122、124 以外，基本格式多為“某年+某月+朔日干支+日數+干支+官職+人名+叩頭死罪敢言之”。但其中有不少“月”後僅書“朔日”二字，有的“朔”字後面還留有空白，同時人名空缺或以“君”字代替，這些應該是上述完整格式的草稿形態。^④ 以上格式以“叩頭死罪敢言之”結句，顯然用於官府間的上行文書。^⑤ 據學者研究，簡 126、127 與“舉私學簿”有關，^⑥ 而簡 138、139、141、142 則隸屬於有關“許迪割米案”的多份簿冊，^⑦ 其內容均是就有關事務對上級的匯報或請示。近年披露的兩枚五一廣場東漢中早期木牘，亦見官文書開頭使用此種格式：

永元十五年閏月丙寅朔八日癸酉，武陵大守伏波營軍守司馬郢叩頭死罪敢言之。

前言船師王皮當償彭孝夫錢……

（J1③：325-1-140）

① 據陳《表》，黃龍元年四月、嘉禾元年九月，乾象曆與四分曆置朔相同，簡 1 與簡 121 出現所記干支比乾象曆晚一天，是否因為陳《表》有誤，待考。此外，簡 92 及簡 93 紀日干支又比陳《表》所推的乾象曆早一天，是否別有原因，值得繼續關注。

② 此點筆者在初稿中未能留意，匿名審稿專家提出是否存在新舊置朔并存的可能，據以上考證，這種情況確實存在。

③ 李均明：《走馬樓吳簡會計用語叢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3 頁。

④ 參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65-166 頁；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19-121 頁。

⑤ 參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95-99 頁。

⑥ 參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文史》2014 年第 2 輯，第 47 頁。

⑦ 參徐暢《新刊走馬樓簡牘與許迪割米案司法程序的復原——兼論三國孫吳的法制狀況》，《第三屆簡帛學術研討會暨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會議論文集》，桂林，2015 年 11 月，252-253 頁。

元興元年六月癸未朔六日戊子，沮鄉別治掾倫叩頭死罪敢言之。倫以令舉度民

田……

(J1③:264-294)^①

發掘者指出，五一廣場簡“紀年中凡見月朔干支者皆與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符合”。^② 這表明，吳簡中的“有朔類”日期在格式及其嚴肅準確性上，都是對東漢中早期以來歷史傳統的繼承。

兩類日期書寫格式和使用場合的上述差異，對其干支書寫的準確性造成了不同的影響。“有朔類”日期多用於上行呈文，這種場合正式而莊重。揆諸常理，下級官吏向上級匯報工作時一般會小心謹慎，唯恐出錯。因此，“有朔類”日期的月朔干支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這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後面紀日干支的準確。與之相反，“無朔類”日期多來自下行文書，同時本身又不標明月朔干支，故其紀日干支較易出錯。同時，“出米簡”祇是一般的賬簿，其核心在於對米的名目和數量予以準確記錄，而於紀日干支等其他要素則不甚嚴謹，書寫中也容易發生訛誤。這些應是走馬樓吳簡中干支錯亂問題集中出現在“無朔類”日期中的重要原因。

(二) 漢末三國時期干支紀日法的沒落

如前所述，不書月朔干支、多用於下行文書、賬簿書寫干支不嚴謹，是“無朔類”簡紀日干支大量出錯的重要原因。然而，如所周知，嚴格確保時間的準確性，是秦漢以來文書行政的基本要求，孫吳時期的情況也不會例外。根據鄧瑋光先生的研究，“出米簡”當中的日期，具有檢驗運輸是否在規定時限內完成的重要作用，^③ 因而儘管其紀日干支大量出錯，但這種錯誤應絕不至於影響時間的準確表達。

我們注意到，走馬樓吳簡中的紀日干支無一例外地綴在紀日數字之後，重複承擔着與紀日數字一樣的功能。這種重複並非吳簡中纔有的特殊現象，前舉五一廣場東漢簡例也是如此。根據汪桂海先生的研究，官府間往來文書在紀日干支前加入日數乃是東漢建武以後的統一規定。^④ 陳侃理先生認為，這種變化反映了數字紀日的普及。^⑤ 筆者讚同陳先生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筆者有以下推測：由於數字紀日的普及，在前的數字已經準確地表達了日期，干支的紀日功能隨之弱化。至遲到孫吳初年，官文書中的日數實際上已完全獨自地承擔起紀日的功能，紀日干支的正確與否變得無關緊要，即便出錯，也無礙於日期表述的確切。這也正是吳簡中紀日干支嚴重錯亂的主要原因。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6期，22、23頁。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16頁。

③ 參鄧瑋光《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240頁。

④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67-69頁。

⑤ 陳侃理：《數字紀日的產生與通行》，《“出土文獻與學術新知”學術研討會暨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2015年8月，164頁。

雖然我們尚不清楚東漢以來干支紀日功能弱化的軌迹,但漢末三國時期,干支紀日法的嚴重沒落與數字紀日的更為通行,則是不爭的事實。呂思勉先生指出:“古以干支紀日,後世則易之以數。用干支為紀,不能與月相合,又不能與年相合,故曆術漸普遍於民間,而其法遂廢矣。《宋書·禮志》二:‘……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蓋至魏世,用干支紀日者已希矣。”^①池田溫先生也認為,中國古代重數節日“大致形成於後漢末……穩定下來并得到普及則在三國時代……自三國以後,正式的公文書寫格式多用干支,而日常的紀日中,序數則逐漸普及。重數節日的形成,有序數日的普及作為背景”。^②可見,漢末三國是基層社會生活中數字紀日取代干支紀日的重要轉變時期。

以上論斷也可以得到走馬樓吳簡的印證。一方面,如前所述,吳簡中已不存在獨立的干支紀日,紀日干支皆附麗於紀日數字;另一方面,使用干支的日期固然還有一些,但相較於吳簡中紀日簡的龐大總量而言,這類日期屬於絕對的少數,《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甚至連一個紀日干支也見不到。^③走馬樓吳簡中使用最多的日期書寫格式都是現代人所熟悉的“某年(有時可省)+某月+日數”。而且,與干支紀日使用範圍的局限不同,這種紀日方式被廣泛地運用於吏民田家莧、草刺、納錢糧憑證、收支統計、吏民死亡時間注記等等眾多場合之中,其例極多,茲舉數例如下:

……其米十五斛九斗,五年十二月九日付倉吏張曼、周棟。凡為布二丈六尺,準入米一斛六斗一升,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付吏孫儀……凡為錢一千冊,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付庫吏潘慎、潘宗畢。嘉禾六年二月廿日,田戶曹史張惕、趙野校。^④ (5·1)

賊曹言大男黃碩被病物故事

嘉禾五年六月廿八日書佐呂承封(柒·4403)

中鄉大男張信故戶中品出錢八千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鄉典田掾蔡忠白

(柒·4182 正)

入平鄉稅米二斛胄畢|||嘉禾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伯丘石希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肆·3139)

中倉謹列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訖三年三月卅日受三州倉運黃龍二年租稅米要簿

(壹·9547)

夷新兵五十六人人二斛起嘉禾二年正月訖二月卅日其年四月十六日付柅師市

(叁·2169)

①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86頁。

② 池田溫:《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收入其著《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79-381頁。

③ 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④ 本段中的省略號為筆者所加。

□陽里戶人公乘黃宜年五十三 嘉禾五年九月十一日被病物故 (柒·3853)

這就說明,干支紀日在當時的基層檔案記錄中已不太重要,數字紀日已經取而代之了。

在年月日通常皆以數字表示的情況下,人們的時間觀念也徹底地“數字化”了,此時的日期書寫,紀日干支已變得無關緊要,即便附上,也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正確與否。因此,我們還可以見到不少“被書”日期不書干支的情況,^①如:

出黃龍三年稅米一百六十四斛九斗被縣嘉禾二年四月廿九日書付大男朱才運詣州中倉 (叁·1383)

出嘉禾元年稅米千一十斛六斗被縣嘉禾二年正月十五日書付大男文宜運詣州中倉 (叁·1427)

出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卅二斛□斗六升被縣嘉禾二年七月卅日書付大男李平運詣州中倉平 (叁·1515)

出嘉禾元年吏帥客限米一百卅八斛被縣嘉禾二年五月九日書付大男陳□ (叁·1517)

我們甚至還可以找到上行呈文開頭日期中省去所有干支的例子:^②

嘉禾二年十二月五日臨湘侯相君丞[祁]叩[頭]死罪敢言[之] (肆·4548)

嘉禾三年四月一日雷□□□臨湘侯相君叩頭死罪敢言之 (叁·5724)

基層行政日期書寫中,干支的可有可無,於此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根據以上情況可以認為,漢末三國時期干支紀日法的沒落也是走馬樓吳簡中紀日干支錯亂的重要根源。

三 相關問題探討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的基本觀點是:漢末三國時期干支紀日法的嚴重沒落是吳簡中紀日干支錯亂的重要根源;而“有朔類”日期絕大多數干支正確的原因,在於這種日期多用於上行文書,同時又寫明了月朔干支。如果這個認識大體不誤的話,那麼我們對有關問題的理解還可以再進一步:

第一,前文所引日期皆年月清晰,而吳簡中還有一些使用干支的日期沒有寫明年份或者

^① 此種情況在《竹簡[叁]》中比較多見,除文中所舉四簡以外,還有如下數例:叁·1365、1360、1367、1494、1532、1550、1586、1601、1617、1619、2176、2183、2213、2215、2248、2276。

^② 此類日期省書全部干支的情況很少,以上為吳簡中僅見之例。

年份不清,整理者對其年份做了一些推定,如簡壹·2419:“☐年八月十三日丙午書給監運兵曹孫供所領吏士三人。”整理者注:“據陳垣《魏蜀吳朔閏異同表》,嘉禾元年八月朔爲甲午,十三日爲丙午。”又如簡壹·6970:“☐主簿五☐十一月廿五日乙巳☐”,整理者注:“據陳垣《魏蜀吳朔閏異同表》,嘉禾三年十一月朔爲辛巳,廿五日爲乙巳。”但筆者認爲,這種不明年份的干支至少有一部分也是不準確的,如:

☐ 二月廿日辛亥白 (肆·5187)

☐☐八月十日辛未臨湘侯相君謂☐ (肆·5413)

按照簡文所推,二月和八月的朔日干支分別應爲壬辰和壬戌,但據陳《表》,在走馬樓吳簡所在的時間區間(建安二十一年——嘉禾六年)內,^①並沒有與之相合的年份。^②筆者認爲,這些日期沒有書明月朔干支,其紀日干支有誤的可能性較大。因此,要確定此類日期的具體年份,尚需要其他方面參證。

第二,吳簡當中還可以見到“書”前面祇加干支的情況,如:

家屬可詭責者已列言依癸卯書原除 (貳·51)

出錢廿四萬八千八百☐卅☐三☐錢被府丙寅書☐☐錢十萬四千六百七十☐ (叁·7003)

右郎中治所被丁卯書白縣各有文☐☐☐米七萬斛錢 (肆·1257)

府中部督郵移戊午書自(?)言料校文入☐連年運雜米合 (肆·1265)

☐大☐常☐府丁卯書曰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 (肆·4483)

☐☐☐被督軍糧都尉壬午書給……私學☐☐ (肆·5346)

學界通常認爲,這些冠在“書”前的干支,即文書下達之日的干支。^③但由於吳簡中的紀日干支約有半數存在錯亂,“書”前干支也可能有一部分不盡準確。如以上所舉的簡肆·5346,與之同屬發掘簡第五盆的簡肆·4815作“被督軍糧都尉黃龍三年十二月☐四日壬午書給監運掾章禮士十☐☐”。簡肆·4815爲成坨簡(Ic3⑥)中的一支,而簡肆·5346爲與之層位、區域相同的不成坨簡。從內容來看,它們也密切關聯。因此,簡肆·5346“壬午”之前很可能漏

① 此時間區間係據《竹簡》各卷所附《紀年索引》而得。

② 王彬先生在探討與“許迪割米案”有關的木牘文書時,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並認爲“是否我們對孫吳紀年曆日的認識有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參看其著《吳簡許迪割米案相關文書所見孫吳臨湘侯國的司法運作》,《文史》2014年第2輯,76、83頁。

③ 樓勁:《魏晉時期的干支詔書及其編纂問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11,9頁;魏斌:《“原除”簡與“捐除名簿”》,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191頁。

寫了“黃龍三年十二月^十四日”。^①雖然“十”字並不確定,但據陳《表》,該月戊戌朔,則四、十四、廿四日干支分別為辛丑、辛亥、辛酉,那麼,“壬午”確實沒有準確反映出督軍糧都尉下達“書”的時間。其他“書”前的干支,應該也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第三,紀日干支書寫錯亂,並不是吳簡所獨有的問題,王仲殊先生指出:“銅鏡銘辭(特別是吳鏡銘辭)中的干支有誤,可謂屢見不鮮。”^②對此,俞偉超、董亞巍、光武英樹等先生皆曾論及,^③但都沒有考慮到干支紀日法本身的沒落。事實上,在存世的漢末三國紀年鏡中,吳鏡占很大一部分,^④而吳鏡和吳簡所處時代和地域都十分接近,那麼它們同時出現干支錯亂問題就絕非偶然。干支紀日法的嚴重沒落應該也是漢末三國銅鏡(特別是吳鏡)銘辭中紀日干支錯亂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另文探討。

附記:本文是在沈剛師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的,匿名審稿專家也給出了很好的建議。文章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還先後得到樂游、趙海龍、田可諸君的幫助和指教,在此一併致以深深謝意!

① 被督軍糧都尉“書”前例當有年月及數字紀日,沒有的情況,筆者僅見此一例。這樣看來,“壬午”前漏寫年月及數字紀日的可能性就更大。

② 王仲殊:《“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考古》1987年第7期,636頁。

③ 湖北省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編:《鄂城漢三國六朝紀年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頁;董亞巍:《鄂州鏡銘與古代鑄鏡工藝的若干問題考辨》,《鄂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64頁;[日]光武英樹:《漢三國西晉紀年鏡銘における干支と作鏡年月日の研究》,《東方學報》87,2012,53-86頁。

④ 參劉永明《漢唐紀年鏡圖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日]“中國古鏡の研究”班《漢三國西晉紀年鏡銘集釋》,《東方學報》87,2012,153-265頁。

漢代伏日及臘日：節日與地方統治

[韓]首爾大學校人文大學 金秉駿

內容提要 漢代的伏日和臘日均帶有為祖上及諸神祭祀，並以此驅除惡鬼且伴隨享用酒食的熱鬧的祝祭性質。伏日臘日是根據陰陽五行人為確定的。從出土簡牘中的漢代官方日曆來看，其日期隨夏至冬至的干支變化約有十餘日的浮動，其設置原則每年也有些許變化。伏日臘日與王朝權力緊密相聯，儘管每年伏日臘日反復舉行相同的活動，皇帝仍通過詔書決定日程並布告天下，這是為了告知民衆，節日等時間走勢是由時間主宰者的皇帝決定的。帝國要依照皇帝所頒布的同一時間運行，象徵着整個帝國作為一個統一體維持運轉。人們在祝祭中冀望於從所有規定中解放出來以釋放壓力，然後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對國家權力而言，為了社會安定，需要讓人們盡情享受祝祭。不過，為避免祝祭引起的治安混亂，更為了強調休息與祝祭是由國家的施惠提供的，國家有必要指定與傳統祭祀不同的休息日並提供酒食以引導民衆。因此，除四川地區享有“自擇伏日”的特權外，其他地區不允許“自擇伏日”。在古代國家權力管制民間習俗的特徵淡化後，後世伏日臘日作為節日的意義亦隨之散去。

關鍵詞 伏日 臘日 祝祭 國家權力 地方統治

一 緒言

漢代戶律中，留存有“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之律。對此，後漢應劭曾對既有俗說加以記錄，並提出自己的見解。既有俗說認為，漢中、巴、蜀與廣漢地區氣候與其他地區有異；而應劭說，高祖滅三秦席卷天下之際，此地之人曾給予很大幫助，故特賜恩澤以示報答。^①

^① 《風俗通義·佚文》：“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蓄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都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凡俗也。”（[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604頁）

然而漢代僅四川漢中郡、巴郡、蜀郡與廣漢郡擁有類似特典,而其他地區則無“自擇伏日”的權力。換言之,禁“自擇伏日”的四川以外地區,應服從政府強制指定的伏日。

為何四川地區“自擇伏日”被視作一種恩澤?四川以外的地區服從國家強制指定的伏日的原因是什麼?以類似方式指定的伏日,為何要如此強制執行?允許四川地區自行選擇伏日的原因是什麼?為準確解釋這些問題,不得不先探析“伏日”之真正含義。

二 作為節日的伏日與臘日

關於漢代“伏日”,傳世文獻記錄不多,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分析,可將伏日作如下界定。首先,為祖上祭祀。漢代時晦、望、二十四節氣、三伏、社、臘及四時為祖上及其他諸神祭祀。^①據張良死後每逢伏日即祭祀的記載,^②以及東漢時的此類記載,^③可以說這一傳統至少從漢初起且歷經漢代一直延續下來。

其次,其帶有伴隨諸多酒食的祝祭(Festival)性質。事實上,到後代伏日除在炎夏進行這一點外,祝祭特點已幾無可尋。^④“伏”字本身含有不為而卧倒之意,又據官府每逢伏日即休之記載,^⑤可知其與伴隨有酒食的祝祭還是有一些距離的。然而至少在漢代,儘管是在炎夏,但其依然帶有強烈的消耗大量物資的祝祭性質。事實上,祭祀時所用祭品最終也會被人食盡,故兩者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相較於普通祭祀,伏日所耗酒肉尤多。

據記載,農民在農季“歲時伏臘”,以燒煮羊肉伴酒而食來緩解久積的疲勞;^⑥正月起就開始準備伏日用酒;^⑦百姓由於為葬禮等祭祀破費,導致本應享樂之伏日却無法備好酒食;^⑧東

① 《續漢書·祭祀志下》:“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3200頁。)

② 《漢書》卷四〇《張良傳》:“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北京:中華書局,1962,2038頁。)

③ 《後漢書》卷五五《章帝八王傳》:“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1801頁);又參見上引《續漢書·祭祀志下》文。

④ 《太平御覽》卷三一《時序部》“伏日”條:“《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并作湯餅,名為辟惡。’”(北京:中華書局,1960,148頁)

⑤ 《太平御覽》卷三一《時序部》“伏日”條:“程曉時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148頁)

⑥ 《漢書》卷六六《楊惲傳》:“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2895頁)

⑦ 《四民月令》:“正月,及祀日進酒降神畢……命典饋稷春酒,必躬親潔敬,以供夏至、初伏之祀。”([漢]崔寔著,石聲漢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1、16頁)

⑧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115頁)

漢時為家人同聚而歡，偶有釋放罪犯回家或赦輕犯之事。^① 以上記錄皆表明，在漢代民間伏日帶有伴隨酒食的祝祭性質。由於這一祝祭消耗酒極多，故根據規定官吏還可從國家領取肉食。^②

再次，其為夏季進行的活動，確切日期在後文會有言及。然關於夏季進行這一點，至後代亦無變化，故其基本性質亦與夏季有關。關於伏日留存有“以狗禦蠱”^③“磔狗邑四門”^④等記載，所謂傳染病、毒蟲及其他諸惡氣之“蠱”亦是因暑季濕熱氣候而多發。^⑤

上述三點即為漢代伏日的性質，然而由於記錄片面，須同時考察臘日方可全面正確瞭解伏日。關於伏日的大部分記載多涉及臘日，因此儘管兩者時間不同，但基本性質相同。^⑥ 關於漢代的臘日，流傳有相對更多的記載。

不同於伏日，漢代臘日在冬季年末舉行。觀其性質，基本與伏日無異，即臘日為祖上，^⑦ 以及竈神、門神、戶神等諸神祭祀，^⑧ 朝廷亦為相當於祖上之已故皇帝們、各種超凡存在及聖人等諸神祭祀。^⑨

然而更為顯著的特徵是其祝祭。漢代臘日從其前一夜開始就舉行活動，^⑩ 且是持續多天的極其重要的祝祭。如處處可見農民通過臘日緩解農耕疲勞，^⑪ 當天伴隨豐盛酒食的紅火氣

① 《後漢書》卷三三《虞延列傳》：“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并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1150 頁）

②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2846 頁）

③ 《史記》卷五《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北京：中華書局，1959，184 頁）

④ 《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573 頁）

⑤ 把犬宰殺後掛在村口，亦可以從東西洋諸多風俗中，通常將暑與犬相聯繫而敘述來理解。參見 Derk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New Year and Other Annual Observanc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 B. C. - A. D. 2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21.

⑥ Derk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p.322. 把伏日看作夏季臘。

⑦ 《後漢書》卷六八《符融列傳》李賢注：“《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忼慨，有文武异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伉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2233 頁）

⑧ 《後漢書》卷三二《樊宏陰識列傳》：“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1133 頁）

⑨ 《續漢書·祭祀志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3200 頁）

⑩ 《續漢書·禮儀志中》：“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3127 頁）

⑪ 參見上引《漢書》卷六六《楊惲傳》。又《續漢書·禮儀志中》：“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3127 頁）

氛,^①以及數十人着豔裝聚歡的景象。^②當然這不僅限於民間。這一天,朝廷高官們聚在一起飲酒歡樂,^③與伏日無異。官吏可根據自身品階以“臘賜”名目從國家領取酒肉金錢,^④而這在居延漢簡中亦可得到確認,如“臨木候長上官武,十二月臘肉直石二斗”(E.P.F 22:204),“不侵燧長石野,臘錢八十”(E.P.F 22:206)^⑤。

通過臘日與伏日并稱這一事實,可知兩者性質相同,而事實上兩者皆帶有為祖上及諸神祭祀,并以此驅除惡鬼且伴隨享用酒食的熱鬧的祝祭性質。^⑥

三 伏日與臘日的日期

筆者認為,注重祭祀和與此相關祝祭的古人不可能一年當中僅紀念這兩個節日。據《鹽鐵論》及《四民月令》,不管是朝廷還是民間,一年中有諸多祭祀和伴有酒食的或大或小的活動,其中尤以諸如二十四節氣等與農事相關的節日最被重視。那麼這些祭祀與伏日臘日有何區別?後者僅僅是眾多節日之一嗎?

以下是關於伏日與臘日舉行日期的分析。據《太平御覽》卷三一引《陰陽書》可知,漢代伏日以夏至後第三個庚日為初伏,第四個庚日為中伏,立秋後第一個庚日為末伏。^⑦查檢關於伏日的其他記載,皆說明以庚日為伏日的理由,因此可以說《陰陽書》較好地反映了漢代伏日日期選擇的情形。《說文解字》言臘月為冬至後第三個戌日,^⑧而這似乎亦無問題。

①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1340頁)《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劉盆子列傳》李賢注:“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481頁)

② 《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列傳》李賢注:“《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開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1207頁)

③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顏師古注引《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360頁)

④ 《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列傳》李賢注:“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1482頁)《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下》李賢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2580頁)《續漢書·禮儀中》劉昭注補:“《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3129頁)

⑤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91頁。

⑥ 參見上引《漢書》卷一二《平帝紀》顏師古注引《漢注》。

⑦ 《太平御覽》卷三一《時序部》“伏日”條引《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詢也。”(147頁)

⑧ 《說文解字》:“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72頁)

然而并不以某月某日或夏至冬至後幾日，而是以庚日或戌日為準，會使伏日臘日隨夏至冬至之干支而出現約十餘日的浮動。關於伏日有說明曰，伏日為陰氣藏伏之日，而因金氣可退火氣，故選擇相當於金之庚日；^①關於臘日有說明曰，戌意為溫氣，如擇此日，可防過重之陰氣。^②也就是說，與二十四節氣以日月及天文現象確定日期不同，伏日臘日是根據陰陽五行人為而定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然而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如上所定之日期每年都會有些許變化。因此為確認伏日臘日之確切日期，需查看漢代曆譜。漢代曆譜并非當下日曆的模樣，當時為官人所用的日曆現在以簡牘的形式留存下來。從沙畹(Chavanne)及王國維等在敦煌漢簡及居延漢簡中發現曆譜并公布後，至今已發現很多曆譜，它們大部分為從數日到一個月不等的日曆。^③這些曆注中伏日臘日與冬至夏至等八節被一同記入，故可以此核校文獻中關於伏日臘日日期設置的規定。

出土簡牘中的曆譜，伏日皆與庚日掛鉤，臘日則皆與戌日掛鉤，但又不與既有文獻記錄完全一致。據尹灣漢簡之元延元年曆譜，五月三日夏至後過三庚(即五月二十四日)標為初伏，六月五日標為中伏，然後六月二十日立秋後過一庚(即六月二十五日)標為末伏。再以元延二年《日記》為例，因標有五月十四日夏至後過三庚(即六月九日)之簡缺失，初伏不見，但簡牘中標注從此過一庚(即六月二十日)為中伏，又標注七月一日立秋後過一庚(即七月十一日)為末伏，因此可以說與文獻記錄一致。可元光二年曆譜中，六月三日夏至後過二庚(即六月十五日)為初伏。元康五年曆譜中，五月二日夏至後過四庚(即六月十日)為初伏。又永光五年曆譜中，五月四日夏至後過四庚(即六月八日)為初伏，再過一庚(即六月十八日)為中伏，六月二十一日立秋後過二庚(即七月八日)為末伏。再以永始四年曆譜為例，五月二十一日夏至後過三庚(即六月十九日)為初伏，再過一庚(即六月二十九日)為中伏，七月九日立秋後過二庚(即七月二十九日)為末伏，而這亦與文獻記錄不同。即初伏在夏至後或三或二或四庚後；末伏在立秋後或一或二庚後。

臘日亦與此類似。元延二年尹灣漢簡《日記》指定十一月十日冬至後過三戌(即十二月二十二日)為臘日。再以永光五年曆譜為例，以十一月十日冬至後過三戌(即十二月十七日)為臘日。但元延元年曆譜以十一月九日冬至後過四戌(即十二月十七日)為臘日，這與文獻

①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顏師古注：“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1196頁)

② 《風俗通義》卷八“雄雞”條：“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374頁)

③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收入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229-274頁；森鹿三：《敦煌、居延出土の漢曆について》，《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京都：同朋舍，1975；陳久金、陳東美：《從元光曆譜及馬王堆帛書天文資料試探顓頊曆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83-103頁；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3-136頁；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曆譜及其相關問題》，饒宗頤主編《華學》第3輯，1998，247-257頁。

記錄也不相同。即臘日在冬至後或三或四戌後。特別是比較尹灣漢簡之元延元年與元延二年《日記》後可發現,每年的伏日臘日日期各有不同。即根據現存曆譜,伏日臘日各與庚日戌日掛鉤,但每年却以不同的方式指定。^①再有,如果考慮它并非指定特定日期,而是根據干支而存在十天左右浮動的話,伏日臘日之年浮率又會更大。這又意味着什麼?

值得注意的是,記有伏日臘日的日曆性質。衆所周知,在傳統時代,日曆并不由普通人定制,而是徹頭徹尾在國家的管控下作成的。目前所發現的曆譜又皆從官署遺址及官員墓葬中出土,可以說它們皆是正式的官方日曆。

當然曆譜中不光祇記有伏日臘日,二十四節氣之二至(夏至、冬至)及二分(春分、秋分),以及四立(立春、立夏、立秋與立冬)亦有記載,八節皆作為農曆與太陽運行和天文現象有關。通過這些,農民可知與農事相關的節氣,這亦符合通常所知的日曆之意義。與此相反,伏日臘日與天文現象無關,一旦八節已定,接着會人為地指定其為第幾個庚日或戌日,故亦無從尋找關乎農事之因素。但國家主管的日曆却記有二日,可以說官方對此賦予了特別的意義。^②

其實不管是包含八節之二十四節氣,還是古代中國社會諸多節日祝祭,皆與農耕社會有着密切的聯繫,且隨着農耕經驗的積累,它亦自然形成。換言之,其并非由國家或某種特定外部因素而出現。部分節日中亦有為紀念某一特定人物而設之情況,然這亦是在原存節日中添加歷史元素後在漢代流行的。伏日臘日與此不同。伏日最早見於史書《史記·秦本紀》“秦德公二年(前 676),初伏,以狗禦蠱”,《秦本紀》中還有“惠文王十二年(前 326),初臘”^③等關於臘日的記載。關於臘日,《左傳》有公元前 655 年虞因亡國無法再行臘祭的記載,^④故《秦本紀》的記載意味着地處邊境地區的秦國該年纔接受臘日。^⑤又鄭玄主張周代大蠟與漢代臘日相同,^⑥應劭則主張夏代嘉平、殷代清祀及周代大蠟即為漢代之臘。^⑦可問題不在於伏日臘日起始為何時,重要的是秦“記載”開始實施伏日臘日這一點。其他任何一種節日均沒有類似一國從某一時間開始實行的記載。一國從某一特定時期開始實行某一節日,即意味着該國從該時開始人為地採納了該節日。可以說,這體現了王朝權力意志的強烈介入。

① 陳久金認為,伏日照六月上旬或中旬定制,臘日照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定制,但元延元年曆譜記載伏日為五月二十四,故無法以此解釋。參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26 頁。

② 關於附錄於日曆之說明,與今日一樣難免會注有製作機關等主要事項。

③ 《史記》卷五《秦本紀》,206 頁。

④ 《左傳》僖公五年:“虞不臘矣。”(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二,阮元校麋香:《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795 頁)

⑤ Derk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p.49.

⑥ 《禮記·月令》十月注。(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一七,《十三經注疏》,1382 頁)

⑦ 《風俗通義》卷八“臘”條:“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以戌臘也。”(379 頁)

伏日臘日與王朝權力有着緊密聯繫這一點，又可從其他事例得以確認。衆所周知，王莽即位後更改了漢的制度、法令及正朔。據記載，元后對此不以爲然，仍以漢代日期與親信品食。^① 陳咸父子還鄉亦守漢代臘日，有人問其故，陳咸說我祖上豈知王氏之臘日。^② 又東漢滅亡後，魏議新制伏日臘日，高堂隆論及各朝伏日與臘日因其屬德而有異。^③ 此皆爲隨着王朝更替而伏日臘日亦隨之變化之例，這表明此二者與普通節日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徵。

如果伏日臘日以王朝權力而成，其內容被記入日曆而在全國頒布，其日期由國家制定且每年皆有不同。那麼王朝權力爲何制定這類伏日臘日，又爲何不以每年同樣的方式，而非得以不同的方式施行呢？

四 節日活動與時間

爲了解每年伏日臘日的日期選擇問題，首先來考察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此簡冊被大庭脩復原後，已作爲認識詔書形式及文書行政實態的資料廣爲引用。^④ 其內容爲中央政府指示各地方在“夏至”應做何事，例如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及在此之前應準備的諸般事情。^⑤ 然而筆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夏至作爲節日或有大體應做何事的慣例，可儘管如此，如《元康五年詔書冊》依然通過複雜的詔書等手續進行處理。夏至活動最早在元康五年出現的可能性很小，而諸如太史等專職官員提議的內容通過御史大夫及丞相的審核後，接受皇帝裁決，而後轉到行政機關，再通過複雜的手續方可施行。

《漢書》中留存有東方朔未等詔書就割伏日賜肉而歸的故事。^⑥ 其後皇帝訓斥東方朔，而他卻以機言巧語愉悅皇帝，再次得到賞賜。這真實反映了漢代伏日官吏從國家領取酒肉金

① 《漢書》卷九八《元后傳》：“自莽即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4035頁）此處“改伏臘”，即與其他干支改漢代庚日戌日之意。

② 《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列傳》：“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1548頁）

③ 《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補：“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蠟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3127頁）

④ 大庭脩：《居延出土的詔書冊》，收入其著《秦漢法制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225-258頁。

⑤ 《元康五年詔書冊》簡文如下：“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太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夏至，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進鳴鷄，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禦者水衡抒大官禦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10.27）“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在長安雲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布臣，昧死以聞。”（5.10）“制曰：可。”（332.2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6、8、522頁。

⑥ 參見上引《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錢的情形。這一故事中值得關注的是，為頒布伏日賜肉的詔書，儘管大官丞一清早就着手操作，但東方朔仍於難耐之下割肉早歸，大官因此奏請，皇帝因此以“昨賜肉，不待詔”為由訓斥東方朔。同樣，臘日亦有下詔書以賜羊肉的事例。^①即每年例行賜肉規定亦需通過頒布詔書等具體手續方可執行，而這又與前述夏至節日活動一脈相通。

雖然容易讓人覺得好像每年都要舉行相同的節日，如果月令的內容不以法令規定的話，各地方其實不必遵守。通常情況下，節日年年重複相同活動，各地方其實不必遵守不以法令規定的月令。當然從月令以農耕生活經驗為基礎，又是長時間統治經驗積累的結果這一點來看，地方應該是積極參照了月令，然而它無法律強制性這一點亦是很明確的。假如將尹灣漢牘集簿“以春令成戶七千卅九，口二萬七千九百廿六，用穀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口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記載中的春令視為月令之春令，而與月令中“春以合男女”^②的記載簡單聯繫，^③則很難說明為什麼集簿中“成戶”的戶口比為一比四。其記載的戶口數中應當包含因為沒有聘財而無法正式通過媒人聘娶，即所謂的“奔者野合”或無依無靠的鰥寡們再婚合居者。^④如此尹灣漢牘集簿中的“春令”則不悖於月令中“春以合男女”的事實，或可說具有更具體的內容。其實，尹灣漢牘集簿中的“春令”完全可以以該年“春季下達之令”來理解。事實上，漢代每年春季都會下達基於月令內容之詔書，即春令。僅以宣帝時期為例，地節三年春三月下詔，“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元康元年春三月下詔，“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此後亦反復出現類似內容。^⑤此為該年春季新下之詔令，故各地方官必須遵守，且其是否遵守應反映在上奏文書中。又邢義田研究指出，漢代并非祇有一種月令。^⑥所謂有多種月令，暗示着各地方完全可以選擇不同月令。即使我們目前無法確認地方可否任意選擇未統一的月令，應該也不存在強制性。相反從中央按季下發之實際詔令理應必須執行。

如上所述，甚至年年反復舉行的活動亦是通過下達詔書的方式執行，且其內容也不盡相同。如《續漢書·禮儀志中》夏至部分中没有與漢宣帝《元康五年詔書冊》相對應之記載，相反立秋部分記載有《元康五年詔書冊》所未行的浚井改水活動，而冬至部分則記載有鑽燧改

① 參見上引《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下》。

②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四《地官·媒氏》賈公彥疏引《管子·時令》，《十三經注疏》，733頁。

③ 邢義田：《月令與西漢政治——從尹灣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戶”說起》，《新史學》第9卷第1期，1998，第1-54頁，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125-167頁。

④ 李成珪：《虛像の太平：漢帝國の上書と上計の造作》，《古代中國の理解》4，首爾：知識產業社，1998，128-130頁。

⑤ 《漢書》卷八《宣帝紀》，248、254頁。

⑥ 邢義田：《月令與西漢政治——從尹灣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戶”說起》，《新史學》第9卷第1期，1998，43頁，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159頁。

火的活動。^①又《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冬至“絕事，不聽政”而不是夏至，^②蔡邕《獨斷》亦記冬至五日間“寢兵鼓，不聽事”，^③而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却不見冬至休務、靜居。這些資料說明，每年的夏至冬至活動日程并不相同。^④

此外，與月令內容相悖的詔書亦易於尋見。例如據《呂氏春秋》仲春紀之記載，祭祀不用犧牲，用珪璧。^⑤但漢高祖詔有春二月及臘日祠社稷以羊豕。^⑥又如，儘管是戰國時代的例子，但學者已多次提出記載於青川木牘的詔令與《呂氏春秋》以及《月令》有異。^⑦

如上所述，儘管是每年反復進行的活動，但并未依托在當時已廣為流布的月令，而是每年通過複雜的文書行政手續實施。而其內容存在若干差異的原因，其實是至少在季節及節日活動上，國家還是意圖一一介入的。筆者認為，這種意圖介入的意志源於作為時間主宰者的皇權。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皇帝是時間的支配者。作為天之代理人，為統治農民，知天象之象征尤為必要。天子月月穿着不同顏色的服裝居住在不同地方，亦是以天子嚴格遵守時間的形象示於天下，顯示其與天之密切關係。^⑧此外，農曆或與季節實際變化不符，故對農民而言，與農耕有關的太陽運行狀態，即一年的時間走勢尤為重要。為統治這些農民，有必要準確知曉時間走勢并把這些告知天下。^⑨

如果說在皇帝支配下掌握時間走勢并告知天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話，那麼皇帝有必要經常以此為權利的象征而粉飾，即原則上記載時間走勢之曆法理應由皇帝頒布。為強調作為皇帝作為時間主宰者的面貌，國家每年在宮中編制曆法後，年初在帝國全境頒布。天文現象與實際曆法有異時出現的改曆風波亦是如此。^⑩帝國依照皇帝所頒發的同一時間運行，

① 《續漢書·禮儀志中》：“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3122頁）

② 《續漢書·禮儀志中》：“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3125頁）

③ 《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補引蔡邕《獨斷》：“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五日。”（3217頁）

④ 李成珪：《前漢末郡屬吏宿所斗旅行》，《慶北史學》21，1998，40-43頁。此處言，因為參與羽山傳統儀式，東海郡太守及胥吏無法享受五天假期與靜居。參與羽山傳統儀式是實情，但亦是因為沒有令五天休日詔書之緣故。

⑤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二《仲春紀》：“祀不用犧牲，用珪璧。”（北京：中華書局，2009，37頁）

⑥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1380頁）

⑦ 邢義田：《月令與西漢政治—從尹灣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戶”說起》，《新史學》第9卷第1期，1998，7-15頁，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129-133頁。李成九：《中國古代呪術的思惟斗帝王統治》，首爾：一潮閣，1997，254-257頁。

⑧ 李成九：《中國古代呪術的思惟斗帝王統治》，253頁。

⑨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⑩ 陳美東：《觀測實踐與我國古代曆法的演進》，《歷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象徵着整個帝國作為一個統一體以維持運轉。^① 傳統時代一直賜予鄰國曆法之事,亦可由此加以解釋。^②

因此,儘管是每年反復舉行的活動,皇帝仍通過詔書決定日程并布告天下,這是為了告知民衆,節日等時間走勢是由時間主宰者皇帝決定的,即可以理解為這是再三強調主宰時間是皇帝獨有的權力。筆者認為,伏日與臘日的制定,每年不以相同原則,且年年有些許變化這一點,即帶有那些日子就是由皇帝所決定的意味。

五 祝祭與地方統治

因為與二十四節氣相關的節日和農民的農耕生活有關,所以國家介入此事,但國家介入看似與此有着相當距離的伏日臘日又意味着什麼呢?當然,作為進行驅除夏季疾病等惡氣儀式的伏日,以及意味着辭舊迎新的臘日皆與農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聯繫。但是完全可以在伏日之外的日子裏驅除惡氣,而通過頒布曆法亦能充分解決迎新春之事。與農耕生活相比,它是否更多地與伏日臘日所含有的其他性質,即祭祀與祝祭之性質有關?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待先考察國家對於與祭祀相結合的祝祭立場。

祝祭性質中有違反規則甚至破壞規則的部分,它是體驗無規範的世界即混沌世界的活動。平時人們被禁止做有悖於規定之事,因此人們在祝祭活動中冀望於從所有規定中解放出來以釋放壓力(并非有意識的侵害),然後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整個社會亦能由此維持安定。^③

這種祝祭的性質,孔子即已明確說明,人們看似像瘋人一樣歡樂的景象是祝祭的常態,其目的是在一天之內消除“百日之勞”。^④ 國家權力方面對在臘日舉行的狂歡祝祭加以關注的目的,則是為有效統治人民。作為有酒食助興的狂歡祝祭,不可避免地需要充足的費用。事實上各種祭祀與祝祭將會伴隨着不小的經濟負擔。^⑤ 《風俗通義》所載洛陽男子臘日借錢的記載,就反映了這一點。^⑥ 官方賜予官吏伏日臘日所需肉、錢等,亦是出於國家想分擔官吏

① 宮田登:《日和見—日本王權論の試み》,東京:平凡社,1992,83-88頁。

② 現今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及西藏藏族自治區因經度的不同,日出日沒時間與北京有着顯著的差異,儘管如此亦依然沿用北京時間的原因亦在於此。

③ Jean Duvignaud, *Fetes et civilisations*, Paris: Weber, 1973.

④ 《禮記·雜記下》:“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四三,《十三經注疏》,1567頁)所謂蠟即臘,漢代的鄭玄、蔡邕及應劭等已指出。參見 Derk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pp.68-74.

⑤ 參見上引《史記》卷二八《封禪書》。

⑥ 《風俗通義·佚文》:“光和匯總,雒陽男子夜龍,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570頁)

經濟負擔的目的。^① 據李悝之“盡地力之教”所示的小農家庭開支，春秋兩次社祭經濟負擔有十石（三百錢），占小農歲收的十五分之一，而這還是相當節儉的消費水準。^② 從李悝所言可知，當時春秋兩次祭祀已廣為普及。可以說春季農耕伊始前所進行的祭祀祝祭是為祈願無事，秋季所進行的祭祀祝祭則是對於豐收的感恩，因此祭祀與祝祭是以長時間的農耕經驗為基礎自然形成的產物。^③ 然而僅憑這些是無法滿足其作為祝祭之性質的，故國家須提供若干天的休息日，以及相應酒食，方可體現出國家指定祝祭的意義。

伏日臘日的祝祭活動往往會伴隨着暴力而造成治安混亂，但它也起到了穩定整個社會的作用。從國家權力的立場而言，祝祭活動造成的治安混亂絕不能坐視不管。因此國家既要通過準備祝祭來緩解社會壓力，同時又要為杜絕社會混亂及綱紀鬆弛而加以管制。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指出，鄉俗、淫佚之民層出不窮，應當改變這一情形，^④ 漢代儒家官僚亦不斷指出淫祀的弊害以及移風易俗的必要性，^⑤ 很好地反映了國家一方的立場。

以村落為單位的里社，與其說是吏民自律的組織，不如說它是在國家嚴控下維持社會穩定的組織。^⑥ 然而即使存在國家管控祝祭的原則，也不可能阻止農民舉行長久以來流傳下來的各種祭祀和節日活動。^⑦ 與一般的強制禁止相比，應該說官員直接參與祭祀，并把百姓引

① 近來民衆在春節或中秋從政府或企業等單位領取的獎金，亦可以此理解。

② 李成珪：《戰國時代國家與小農生活》，《古代中國の理解》1，首爾：知識產業社，1994，131-138頁。

③ 《風俗通義》卷八“司命”條：“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今法律令已布，聞吏民犯法為間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自從令、丞以下知而弗舉論，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而養匿邪僻之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13頁）

⑤ 《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2024頁）《風俗通義》卷九“九江遼適有唐居山”條：“九江遼適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400頁）同卷“會稽俗多淫祀”條：“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401頁）

⑥ 處罰為秦王儘快痊癒而自發舉行社祭的里正、里老等即為代表性事例。李成珪：《秦の地方行政組織とその性格——縣の組織とその機能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學研究》31，1989，44頁。

⑦ 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與《為吏之道》，就是否更改各地習俗而出現不同的態度（李成珪：《秦帝國の舊六國統治の二限界》，《関錫泓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首爾：三英社，1985，791-794頁）。然而出現類似不明態度，祇是表明更改各地區各自不同的悠久傳統習俗實為不易，並沒有放棄其要以單一法令來統治的意圖。從《史記》所載秦始皇刻石中更改各地區習俗的內容，亦能清晰地看出這種意圖的堅定性。《泰山刻石》：“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琅邪刻石》：“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匡飭異俗……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東觀刻石》：“黔首改化，遠邇同度”；《會稽刻石》：“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為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賢，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243-262頁）。參見李福泉《儒法并用，移風易俗——論秦始皇禮俗改革》，《秦文化論叢》第2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118-130頁。

導到官方指定場所的方法更加可靠,^①這一做法,^②在漢代縣鄉里官員直接參與里社并祭祀的事例,^③以及郡縣胥吏中戶曹或五官掾擔任祭祀之記錄等事例中,^④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然而亦存在各地區在不同的日子裏各自舉行不同的祭祀與祝祭的情況,換言之,官方不可能一一參與民間如此多樣的祭祀習俗,但又不可能就此放縱此事,故與其一干涉,不如考慮管理祝祭舉行日期的方法。如果說祝祭期間的綱紀鬆弛及混亂氣氛無可避免,那麼選定一個日子,至少能使治安空白變得最小。在縣邑里,對先農、風伯等諸神的祭祀在指定日子裏進行的記錄,應是源於這種意圖。^⑤

爲了使祭祀與祝祭過程由國家施惠來提供,又有效傳達其被管制這一點,有必要另行指定與傳統祭祀不同的日期。如國家指定節日活動,官方提供酒食,并通過祭祀與祝祭認可其休息與娛樂,農民亦不得不參與官方主管的節日,而其節日亦由此成爲民間的重要活動。^⑥

如果以上說法成立,那麼進入秦漢時期後,統一戰國時代各地區各自不一的節日日期亦在情理之中。如上所述,漢代戶律中言伏日不可自擇,正是出於這種原則。除伏日臘日外,對於夏至等活動皇帝亦每年頒布詔令。此外,國家亦介入春季和秋季在地方舉行的社稷祭祀,而其日期同樣亦由中央決定并單方面予以通告。

如以國家指定節日爲中心統一舉行祝祭,因而再無治安等地方統治上的重大問題,祝祭亦將會作爲農民緩解疲勞的休息活動,又由此作爲保持社會安定的密鑰而對地方統治起到重要作用。^⑦

① 循吏們亦未能阻止民間祭祀。他們祇是通過禮樂整頓民間習俗的無序,以此造就行使地方統治最基本的空間,但他們亦無法強制更改。參見上引《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另參《風俗通義》卷九“城陽景王祠”條:“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395頁)

② 這種做法,在後代亦得以持續。在宋代,地方官正式參與受封之神的祭祀,且根據等級來補助一定的財政,皆能以此解釋(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IV “Granting of Titles” pp.79-104, 1990)。

③ 《春秋繁露》卷七五《止雨篇》:“令縣鄉里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耆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耆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④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130頁。

⑤ 《續漢書·祭祀志下》:“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3204頁)《風俗通義》卷八“風伯”條:“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364頁);同卷“雨師”條:“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其丑日祀雨師於東北”(366頁)。

⑥ 今雲南省與貴州省不少少數民族的節日規模都比較大,而這些活動皆是由官方主導的大規模活動,散居在各地的衆人在這一天集聚,亦是源於此。事實上,在少數民族村寨舉行衆多與農耕有關的節日,其中有很多規模較小或無祝祭性。

⑦ 鄭玄指出,臘日有“正齒位”職能,可視爲通過節日活動得以確認共同體團結性的傳統習俗,倘若這一活動是由國家推行,則它應具有把民間“年齒的秩序”納入國家秩序的職能。

六 結語

伏日、臘日是為管制民間節日祝祭而由國家制定的節日。作為時間主宰者的皇帝，為表明皇權而指定節日日期和活動內容。如果伏日臘日日期的確定並沒有考慮農事的因素，那麼對於熟悉傳統農耕習俗的農民而言難免會有不便。對農民來說，農耕開始之前及收穫後舉行的活動都是為順利完成一年農事而進行的，並且是不能輕易中斷的。不僅如此，各地方亦有根據自身文化而產生的節日祝祭，且其節日祝祭亦是很難簡單強制中斷的。^①如伏日臘日等作為不符合各地方氣候及傳統習俗且消耗大量經費的人為性節日，其不便程度不言而喻。故將伏日臘日日期移植到符合當地氣候或其他傳統節日日期的方法應是最便捷之策。如與同一季節所舉行的其他節日日期相同，至少它能簡便地與悠久習俗相容。可是，從國家立場而言，須強調休息與祝祭是由國家的施惠來提供的，為此有必要由國家另行設定日期。^②四川地區可“自擇伏日”被視作一種恩澤，其他地區是不允許“自擇伏日”的。這些地區對國家強制指定的伏日就會有不便之感。進入曹魏時期以後，連四川地區之“自擇伏日”亦被禁止，這清晰地反映了古代國家掌控伏日臘日之重要性。^③

儘管漢代伏日是與臘日相對應的夏季節日，但相較之下，後者更受重視，這是因為臘日帶有驅除一年當中沉積之惡氣以迎接全新未來之意，即它有着時間再生的意思。對於農民日常生活而言，從賦予新的生活節奏角度來看，臘日顯然比伏日更加重要。事實上，在漢代文獻中，對於臘日活動的記載更多，規模亦更大，這也表明臘日更受矚目。倘若相較於伏日，臘日果真被賦予更重要意義的話，國家更應掌握臘日日期。相反，如果國家為給予某一地區一種特典而允許其自行擇日的話，應該說與臘日相比受關注程度較少的伏日將會成為國家的選擇對象。為給滅三秦過程中給予幫助的四川人民下賜特典而允許“自擇伏日”的應劭說，亦可從這一角度得到解釋。

最後來考察漢代伏日臘日在後世的變遷。原則上，此後伏日臘日亦依然與二十四節氣一同被記入日曆。而每逢王朝更迭，各王朝皆以自身所屬德更換其日期，如唐代擇辰日，^④五

① 通過《四民月令》可知，當時幾乎每月都有傳統農耕節日以及為諸神獻祭的祭祀。“正月……以上丁，祀祖於門……以上亥祠先穡；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於祖禰；三月……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四月，立夏節後，蠶大食；五月……夏至之日，薦麥魚於祖禰，厥明祠冢；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齊；八月，筮擇月節後良日，祠歲時常所奉尊神……是月也，以祠太社之日，薦黍豚於祖禰，闕明祀冢，如薦麥魚；十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於井，以及祖禰；十二月，臘日，薦稻雁，前期五日殺豬，三日殺羊，前除二日，齊，饌，掃滌。”（7、19、26、31、41、49、60、71、74頁）

② 現代的國慶日亦帶有相同的意義。不同於由曆譜而決定的春節或中秋節，國慶日帶有國家通過人為設定休息日，而對民間注入國家意圖的立場。

③ 《晉書》卷三〇《刑法志三》：“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北京：中華書局，1974，926頁。）

④ 《舊唐書》卷二五《禮儀志五》：“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蠟祭之後，以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941頁）

代時期亦以不同日期指定臘日。^① 然而作為民間重要節日的伏日臘日的意義却有去無回,伏日僅是為避暑歇工等事而設,其意義有所縮減,^②臘日則由於變為臘八節這一帶有佛教性質的節日,其實際意義已轉移到農曆年末的活動。^③ 筆者認為,這一現象反證了漢代伏日臘日是由國家權力強制執行這一事實,即由於是以國家權力來制定并舉行的節日活動,故古代國家權力——管制民間習俗的特徵淡化後,伏日臘日作為節日的意義亦隨之散去。

(原文《漢代の節日と地方統治》,[韓]《東洋史學研究》第69輯,2000。)

① 《舊五代史·晉書》卷八四《少帝本紀》:丁丑,狩於近郊,臘也。”(1112頁)《舊五代史·周書》卷一一〇《太祖本紀》:“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墓為臘,請以未日為臘。’從之。”(1460頁)

② 參上引《太平御覽》卷三一《時序部》“伏日”條。

③ Derk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pp.211-220。查檢整理中國各地民間習俗的資料集,幾乎不見伏日活動,臘日活動亦僅限於臘八節。參見《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從簿籍的制作與管理看臨湘侯國

——以名籍類爲中心

[日]新瀉大學人文學部 關尾史郎 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振紅 譯

前 言

關於長沙吳簡,我曾經將其理解爲一種史料群,以此爲目的,除了從形制和內容外,還嘗試從性質和功能等方面對其進行分類。^① 這篇文章是在除大木簡外,竹簡剛剛公布時所寫,現在來看極不成熟。即使在近十年後的今天,公布的簡牘也祇是一部分。由於出土情況的具體細節逐漸清楚,以占長沙吳簡多半的簿籍爲中心的優秀成果相繼出現。^②

這裏所說的簿籍,與從發文者(機關)送往收文者(機關)所在地的狹義文書不同,指的是既無發文者也無收文者,其本身就是內容完整的文書,但它最終也會被附上標題或狹義的文書發送出去。實際上,長沙吳簡中的簿籍很多都是由送達地也就是收文方管理的。對於負責的吏員來說,相較狹義的文書製作,這種簿籍的製作應當是更爲日常且基礎性的工作,所以這樣來看,簿籍在長沙吳簡中占了大半應當說是理所當然的。^③

① 關尾史郎:《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試論》,《木簡研究》第27號,2005。

② 致力推進各種簿籍復原工作的凌文超,主張應當從出土狀況分析(考古學整理信息)和古文書學分析(簡牘遺存信息)兩個方面,進行簿籍的復原(凌文超:《走馬樓吳簡簿書復原整理芻議》,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③ 這一點主要是受山口英男關於正倉院文書意見的啓發(山口英男:《正倉院文書に見える文字の世界》,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平川南編:《歷博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古代日本と古代朝鮮の文字文化交流》,東京:大修館書店,2014)。

很早就有學者指出,長沙吳簡主要是以孫吳政權時期長沙郡首個縣臨湘侯國內製作的文書和簿籍為中心構成的。^① 因此,通過對這些簿籍的整理、分類工作,或許可以接近臨湘侯國文書行政系統之一斑。當然,由於臨湘侯國內製作的簿籍可能數量極大,長沙吳簡出土的可能祇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在了解了這些情況後,仍要嘗試進行簿籍的整理、分析工作,一是希望通過這一工作,搞清楚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的縣的職能與權限;二是因為我確信,這樣的工作對於掌握作為史料群的長沙吳簡的整體面貌是有效的。由於篇幅的原因,本文將把範圍限定在簿籍中以數量最多著稱的名籍類,以此來開展上述工作。^②

一 簿籍及其構成

這裏首先想簡單地梳理一下簿籍的構成。如上所述,長沙吳簡中,出土簿籍大多是作為附帶標題和狹義的文書被傳送來的,在送達地(收文方)使用并管理,其後,在不需要時被廢棄。而且,除了條列記載人名等專有名詞和數字的簿籍正文外,還同時出土了有標題的或狹義的文書。這表明,它們不僅是在送達時,而且在經過利用、管理期間,直至廢棄時,都是和正文一起保管的。因此,本文也把這些材料包括在簿籍範圍內,希望了解它們的構成。幸運的是,居延漢簡中簿籍方面,已有永田英正、李天虹等成果。^③ 現在,參考這些成果,可以將簿籍的構成歸納如下:

- 1 表題簡(永田稱為“封面”^④,李天虹稱為“標題”)
- 2 本文簡(永田稱為“本文”^⑤,李天虹稱為“正文”)
- 3 帳戶簡

① 以往研究大多認為長沙吳簡中含有長沙郡製作的文書(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長沙文化研究文庫”,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但是最近安部聰一郎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長沙吳簡是“將位於這一地區的臨湘侯國(縣)稱作田戶曹的機構製作的文書整體廢棄的東西”(安部聰一郎:《三世紀中國の政治、社会と出土文字資料》,歷史科學協議會編《歷史評論》第769號,2014,57頁)。

② 本文討論的名籍,是以掌握戶口為目的製作的簿籍,而那些為了賦課特定賦役或者徵收而製作的則不在討論範圍之內。另外,據胡平生、李天虹的簿籍分類(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可包括①黃籍(戶口簿籍),②調查居住鄉里的州郡縣吏家屬狀況的簿籍,以及③作部工師及妻子的名籍三類名籍,但由於最後一類③不是單純以臨湘侯國為對象,所以本文也將其排除在外。

③ 永田英正:《簿籍簡牘の諸様式の分析》,其著《居延漢簡の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同朋舍出版,1989,1974年初版;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然而,相對於永田在簿籍復原工作的基礎上進行了文書行政系統整體面貌的考察,而李天虹關注的僅限於構成簿籍的簡牘分類問題。

④ 譯者按:《居延漢簡研究》中文版將“表紙”譯為“標題”,參見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258頁。

⑤ 譯者按:《居延漢簡研究》中文版將“本文”譯為“正文”(參見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258頁),此處為了加以區別,仍襲用原文。

①集計簡(永田稱為“・右”類、“・凡”類,李天虹稱為“右類”“凡類”。永田也將其稱為“帳戶簡”)

②細目簡(集計簡中也有并記細目的情況)

4 狹義的文書(永田稱為發送單、簿籍送達文書,李天虹稱為呈報)

5 標籤(永田稱為楮,李天虹稱為簽牌)

居延漢簡和長沙吳簡因在時間和空間上都相隔甚遠,因此無論是在簿籍的構成方面、還是樣式方面,都存在若干差異,^①但是就以上五項構成這一點而言,長沙吳簡也是如此。但五項全部都具備的情況很少見,大多數情況下殘存的不僅是簿籍的一部分,而且很難判斷它具體是哪一種簿籍。但是,如果殘存的是上述1或4的話,即使找不到本文簡,不清楚其內容,也可以推定其是哪類簿籍。基於這一觀點,本文以1表題簡和4狹義的文書等為主要綫索,對這一課題進行探討。

二 吏民簿

本節將討論據認為是臨湘侯國內制作、管理的各種名籍中最基礎性且一般性的名籍即吏民簿。下文中對這些簡的名稱,盡量使用表題簡等中記錄的詞語。

《竹簡〔壹〕》至《竹簡〔肆〕》以及《竹簡〔柒〕》五冊中,收錄的全部是吏民簿。就此而言,它也是長沙吳簡中研究最集中的竹簡群,日本方面,安部聰一郎最早根據格式嘗試進行分類,^②石原遼平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研究,^③鷲尾祐子從各簡的形狀(格式)探討了制作主體的問題。^④中國方面,最近侯旭東和凌文超等依據示意圖有力地進行了冊書復原工作。^⑤但是,吏民簿不僅數量多,而且本文簡的樣式(記載事項、記載順序、標記方法等)也多種多樣,^⑥這導致了對吏民簿理解的混亂。

① 居延漢簡中,帳戶簡不包含細目。另外表題簡中也不見“謹列”二字。由此可以反證,含有這兩字的長沙吳簡表題簡應當是向上級機關傳遞時製作或編綴的。

② 安部聰一郎:《長沙吳簡にみえる名籍の初步的検討》,長沙吳簡研究会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2004。

③ 石原遼平:《長沙吳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狀況を中心に—》,《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4號,2010。

④ 鷲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連記名籍簡の検討—家族の記録について—》,中國古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集,“立命館東洋史學會叢書”,立命館東洋史學會,2010。

⑤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效能》,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⑥ 詳細內容可參看石原遼平《長沙吳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狀況を中心に—》,《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4號,2010。

吏民簿的本文簡由下列三種類型構成：①戶人簡(有僅記錄戶人(即戶主)的單記簡，和記錄戶人及其家屬的連記簡)；②家族簡(有和戶人簡相同的單記簡和連記簡)；③戶計簡(在集計每戶口數的簡中，有的也一并記錄男女各自的數字)構成的。^①類型的多樣性並不是因為制作主體的各鄉或各里固守着自己的樣式造成的，即使是同一鄉或里的吏民簿，也可以找到三、四種樣式。本文以目前已知存在多種吏民簿的廣成鄉平樂里的吏民簿為例，來進行考察。^②

- 1 嘉禾四年平樂里戶人唐宜年/□十三 /□ (肆 5145)
 2 /宜妻大女伺年五十三 /□子女銀年□ (肆 5165)
 3 右宜口食三人/ /□ (肆 5167)

上引三例的整理編號相近，可以認為原來是按照這一順序編綴的。1是戶人簡，2是家屬簡，3是戶計簡。^③家屬簡中，簡的中段和下段採用的是連記簡。在戶人簡開頭，明確記錄着年號(嘉禾四年)、里名(平樂里)，以及意味着戶主身份的“戶人”二字，接着記錄姓名和年齡。和1格式相同的戶人簡，也包括下列的4和5，《竹簡〔肆〕》中收錄了10枚，在姓名前記有公乘這樣的爵位，1中可能是誤脫這兩個字。另外由於1的下部殘損，無法判斷是單記簡還是連記簡，但是從4、5來看，可以判明它是祇記載戶人的單記簡。此外從4、5可以知道，後面應該記錄着該人作為成丁所課的口算數(筭一)，^④如果有疾病或是殘疾者，還應該記錄殘疾的具體情況(腹心病)。^⑤

- 4 嘉禾四年平樂里戶人公乘李/客年卅三筭一 / (肆 2495)
 5 嘉禾四年平樂里戶人公乘唐/美年六十九腹心病/ (肆 5166)

但是平樂里的吏民簿並不都是這種格式。下面列舉一些不同樣式的戶人簡。

① 此外，在賬戶簡的最後，會附上記有負責製作該吏民簿的里魁姓名簡(主者簡)，這也可以說是吏民簿的特徵。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叁〕》、《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08、2011；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本文下面所列的釋文是以圖錄本的釋文為基礎，對照圖版，對部分釋文進行了修訂，省略了注記。記號以圖錄本為準，從圖版上可以確定為編繩痕迹的用“/”表示。由於通常在上下兩個地方編綴，所以編繩痕迹也可以看到兩個。

③ 關於唐宜，有下列賦稅繳納簡，也可以作為平樂里為廣成鄉下轄里的根據。(//是表示核對的記號，下同。)

入廣成鄉孫丘男子唐宜[布一匹]……//嘉禾元年九月四日付庫吏殷 [] (叁 256)

④ 關於丁中制和口算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關於成丁的年齡有很大分歧(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2期)。本文承伊藤敏雄先生教示，認為是15歲以上60歲以下。

⑤ 關於長沙吳簡中所見疾病、殘障，也出了不少成果，請參考本書福原啓郎的論文：《長沙吳簡の傷病表記の特徵》，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15。

- 6 平樂里户人公乘鄭張年五十一 / / (壹 5460)
 7 平樂里户人大女番妾年卅八 / / (壹 9006)
 8 平樂里户人公乘龔小年卅二 / (叁 5616)
 9 平樂里户人公乘郡吏曹□ / ? 年□筭一 / 子男□…… (柒 1926)
 10 民男子唐宜年六十四□ (貳 2689)

其中,6~8的户人簡若去掉開頭的年號這一點也與4等(1、5是老丁,不是口算的對象)有所不同。接着的9,與6~8相似,但下段是記載家屬的連記簡,并且也記錄有口算數。最後的10,既無年號也無名里,而且也無爵位。僅以“民男子”開頭。“民”應當是和吏、卒相對的概念,而男子則意味着是成丁。之所以知道這枚簡是平樂里的吏民簿,是因為這裏的唐宜和1中的户人唐宜是同一人。而且由此可以推定,製作1時唐宜的年齡為63歲。遺憾的是10祇殘留有上段,但《竹簡[貳]》的簡1536至簡2771中有很多包含了平樂里在內的廣成鄉吏民簿的簡,^①因此可以列舉一些與10編號比較接近的簡。

- 11 民男子張客年五十二 / 刑右足養官牛 / 客妻大女愁? 年卅五 (貳 2448)
 12 郡吏區邗年卅八 / / □? 邗妻大女平年廿二筭一 (貳 2417)
 13 · 右邗家口食十四人 / / (貳 2506)

12是吏(郡吏)的户人簡(13是與之對應的户計簡),但由於它和11一樣(11與10都是民的户人簡),下段記錄了家屬的資料,據此可知這種類型的户人簡是連記簡。此外11的中部除了明確記載户人張客的殘障(刑右足)外,還有雜役(養官牛)。已有學者指出,這種雜役,通常被寫作“給××”,其種類實際上也有很多種。^②

如上所見,平樂里吏民簿的户人簡是以下四種格式并存:①記載年號和里名的單記簡(1、4、5);②祇記載里名的單記簡(6~8);③祇記載里名的連記簡(9);以及④沒有年號和里名的連記簡(10~12)。另外,口算數和雜役等記載的有無也不能忽視。

那麼,這四種吏民簿相互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讓我們從製作的年份來考察一下。首先,從1到5是嘉禾四年即235年吏民簿的一部分,這一點從簡本身就可知道。其次,由1加一年就是10,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應當是翌年的嘉禾五年,但在《竹簡[貳]》中有下列記錄廣成鄉整體情況的表題簡和賬户簡(集計簡)。

① 關於這一組吏民簿,侯旭東進行了詳細的復原研究。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② 關於這一組吏民簿中所見的雜役,請參看谷口建速的論文:《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三國吳的給役與賦稅》,《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2010。

14 廣成鄉謹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爲簿/ (貳 1798)

15 □凡廣成鄉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千三百一十人/ (貳 2529)

從簡號來看,認爲這兩枚簡和類型④中的 10~12 是連着的大體不會錯。因此,就應當認爲 10~12 可能是類型①的兩年後嘉禾六年(237)吏民簿的一部分。關於即使是兩年後但年齡僅增加一歲的原因,侯旭東認爲本文簡是在表題簡所記年份的前一年做成的。^①亦即,他理解爲,類型④是嘉禾五年的數據,它在第二年被附上表題簡後送到縣廷。但是,還有與上述簡不同的下列簡。^②

16 平樂里謹列嘉禾五年所/領吏民戶數品中人名年/紀魁佐爲簿 (簡號不詳)

其一百卅四人男

17 集凡平樂里領五年吏民五十三/戶父母妻子合二百八十三人/ 魁谷碩主

其一百卅九人女

(簡號不詳)

它們是平樂里單獨的表題簡和賬戶簡(集計簡),是嘉禾五年即 236 年的。因此也不能馬上接受侯旭東的解釋。那麼,是否可以說 6~9 的戶人簡是上述嘉禾五年簿的本文簡呢?也不能這麼說。因爲還可以看到下面這樣的表題簡(括號內是根據 17 推測補釋的)。

18 平樂里□(魁)谷□(碩)謹列□/□□□人名□□□ □ (壹 9005)

這枚簡的整理編號與 7 是連着的,或許至少可以認爲 7 是編綴在這枚表題簡之下的。^③

進而言之,也存在同一年製作幾種吏民簿的可能。關於這一點已有很多學者指出,^④其根據是下列的戶人簡。

19 民楊明年八十五 / / (壹 8405)

20 郡吏黃士年十二 / / (壹 7638)

與上文所舉的 10 相比,格式更爲簡略,姑且不論 20 中的吏,19 中的民祇寫作“民”。證明其

①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② 16 和 17 的圖版、釋文,見《湖南長沙三國吳簡》第二冊,26 頁以後。根據圖版對釋文進行了修訂。

③ 根據 17 可以推補出 18 的里魁是谷碩,由於里魁是同一人,因此兩簡的製作年份應當相差不遠。或者如本文後面談到的例子,也不排除是同一年的可能性。

④ 石原遼平:《長沙吳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狀況を中心に》,《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14 號;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效能》,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3 輯;鄧瑋光:《試論吳簡名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是廣成鄉的戶人簡的證據是,《竹簡〔貳〕》收錄的廣成鄉類型④的戶人簡中,可以看到與上述兩個人同名的簡。

21 民男子楊明年八十六/給驛兵 /明妻大女敬年六十二 (貳 1778)

22 郡吏黃士年十三 / 士兄公乘追年廿三刑□□ (貳 1623)

像 19、20 這樣年號和里名都沒有的單記簡可以稱之為類型⑤,^①遺憾的是找不到可以斷定是平樂里的這類簡。不過像 19、20 這樣的平樂里的吏民簿,不能完全排除其被收錄在《竹簡〔壹〕》的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它們又比 21、22 這種類型④的嘉禾六年簿早一年,若按一般理解應當是嘉禾五年。但是如前所見,由於嘉禾六年簿比嘉禾四年簿僅加算一年,類型⑤和類型①就應當是同一年,即是嘉禾四年簿。如果是這樣的話,嘉禾四年簿中就存在明確記載年號和里名的類型①和年號、里名均不記的類型⑤兩種。石原遼平提出,八月以前由里製作的吏民簿和鄉以此為基礎在八月製作的吏民簿可能是一起送到縣廷的,目的是為了防範不當行為和錯誤。^②考慮到石原的說法,重新審視類型①和類型⑤,就會發現按照戶明確記載年號和里名的類型①的格式,與最早的紙質戶籍,即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建元廿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06TSYIM4:5-1、5-2),及“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B.L.S.113)等有共通之處。^③如果這是解開編綴的按鈕,那麼,即使是没有年號和里名的簡牘時代的缺名簡,也可以說同時記錄年號和里名的類型①的格式,與後代的同類戶籍最為接近。在此基礎上,或許可以推斷類型①的吏民簿可能是當時最正式的名籍。進一步是否可以推測,與之相對的缺失年號和里名的類型④、⑤可能是由里製作、最初保管在里那兒。^④祇是這其中,類型④明確記載了服雜役者具體的職務,很

① 雖然尚未找到廣成鄉所屬的戶人簡,但是在其他鄉有以下三人的連記簡。或許可以稱作類型⑥。

宜陽里戶人韓時年七十九/妻汝年六十四 /孫子男客年九歲 (柒 2)

② 石原遼平:《長沙吳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狀況を中心に》,《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14 號。

③ 關於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戶籍格式請參看拙著《ベルリン所蔵“北凉承陽二年十一月戶籍”初探》(小口雅史編《在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文書の比較史的分析による古代アジア律令制の研究》,平成十七~十九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法政大學文學部,2008);《“前秦建元廿(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戶籍”新釋》(《東方學》第 127 輯,2014)等。

④ 但是,類型④中,如下所列,在里的表題簡中也有“謹列”二字。

廣成里謹列領任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爲簿/ (貳 1797)

由於這個廣成里的表題簡和 14 的廣成鄉表題簡是連着出土的,因此它應當是接續廣成鄉的表題簡,編綴廣成里的吏民簿時,排在其開頭的。侯旭東認為,廣成里的吏民簿在送往廣成鄉時,開頭編綴的是無字簡,在廣成鄉送往縣廷時,在這種無字簡上寫上表題,14 纔完成。負責書寫的是廣成里里魁,兩枚簡的字迹是一致的。我親自查看了這兩枚表題簡,但不能確認兩者字迹的異同。

可能發揮着後代差科簿那樣的作用。^① 儘管可以確認這些是廣成鄉平樂里的吏民簿,但同樣是廣成鄉,在廣成里類型①(與平樂里相同的嘉禾四年簿)的戶人簡中,有下列格式的簡。

23 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公乘郭當年/廿七給習射 / (肆 2043)

24 𠄎年廣成里戶人公乘廖士年廿/三給習射 / (肆 2053)

25 右士家口食六人 / / 訾五十 (肆 2019)

23 中可以看到姓名、年齡之後接着記錄了“給習射”的雜役。可以推測上端殘缺的 24 也是同一年的戶人簡。在戶計簡 25 中除了家庭人數外,還明確記錄了該戶的資額(訾五十)。當時設有上、中、下、下下四級戶等,其在吏民簿中分別表現為一千、二百、一百、五十的資額。^② 因此,25 這樣的戶計簡和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訾簿“北凉年次未詳(五世紀中期)資簿殘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趙星緣舊藏)具有類似的功能,^③但是其反例是下面 26 這種未記載算的簡。

26 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公乘蔡宰/年卅五 (肆 2669)

因此,還不能斷定類型①是戶籍的淵源,類型④、⑤(尤其是④)是差科簿的淵源。是否當時已經有了這樣的意義,但是尚未像後代那樣將戶籍、差科簿、訾簿等進行明確區分呢?若這樣來考慮,那麼某種程度上就清楚了像這樣每年甚至同一年都製作多種吏民簿的原因。^④

關於吏民簿,本文所能談的就是如上這些。雖然出土了許多表題簡、本文簡、賬戶簡,但是書寫鄉(里)送往縣廷時所附文書的簡牘,到現在為止一枚也沒有公布。標籤也是一樣。在這種每年都固定送往縣廷的簿籍中,是否不需要上述文書?我想這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但現在也祇限於指出這一點。^⑤

①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② 張榮強認為還有“五千”的資額(張榮強:《吳簡中的“戶品”問題》,“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研究叢書”,其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004年初刊),例證是《竹簡[壹]》10378和10392兩個例子。但是,後一個例子,圖版無法辨識。前者也應當是誤記或者誤釋。

③ 關於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資簿,請參看拙著《“北凉年次未詳(五世紀中頃)資簿殘卷”の基礎的考察》上(《西北出土文獻研究》第2號,2005)。另外,凌文超認為吏民簿可以分為為征賦而製作和為派役而製作的兩類(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簡“戶籍簿”復原整理與研究——兼論吳簡“戶籍簿”的類型與效能》,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但是,是否應當重視掌握戶口這一最基本的功能。

④ 由於已公布的吏民簿年號,僅限於嘉禾四年至嘉禾六年這三年,因此吏民簿是否每年都必須製作還難以遽斷。與之相關,明確記載年號和里名的類型①的戶人簡中,嘉禾四年的有廣成鄉所屬平樂、廣成兩里,以及新成里、陽成里、漂里;嘉禾五年的有緒中里(以上見於《竹簡[肆]》)和常還里(見於《竹簡[柒]》);嘉禾六年的有東扶里(見於《竹簡[肆]》)。現階段,在所有的鄉和里,相較每年都要製作有類型①戶人簡的吏民簿的觀點,認為鄉(或者里)的製作年份不同的觀點更為合理。

⑤ 另外本文主要是為了討論吏民簿的基本性質和功能,而賬戶簡、細目簡以及本文簡中所追記的遷移資料沒能言及。關於這一點有機會再討論。

三 有關吏的簿

上節討論的吏民簿，是以吏和民兩者為對象的名籍，但是關於吏，除此之外還製作單獨的名籍。這裏總稱為有關吏的簿。雖然總數有限，但是從性質、功能等方面，還是有若干區別。

最早進行討論的，是安部曾稱之為吏籍的。^① 侯旭東曾否認其存在，^②但可以從下列表題簡證明它的存在。^③

27 𠄎𠄎𠄎𠄎𠄎軍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紀簿 / (貳 7091)

28 𠄎模鄉謹列軍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 / (叁 3814)

其中 28 似乎是專門以軍吏及其家屬為對象的(27“軍”字前可能寫的是“州”或“郡”),從簡號來判斷,它們的本文簡可能是下面四枚。

29 軍吏李𠄎年𠄎卅七 / / (貳 7096)

30 州吏谷前年𠄎廿五 / / (貳 7097)

31 軍吏烝昭年廿八 / / (叁 3834)

32 軍吏謝趙 / / (叁 3840)

無需解釋就可以確定 29、30 是 27 的本文簡,31、32 則是 28 的。但是這些都是戶人是吏的單記簡,家族簡還無法確認。

除了沒有記錄年齡的 32 外,這些簡和吏民簿 20 的形制、格式十分相似。因此,這些簡可能是出於某種需要,從吏民簿中摘出來製作而成的。

但是在以吏及其家屬為對象的名籍中,除了這種諸吏父兄子弟簿以外,還有下面這類簡。

33 𠄎諸鄉謹列郡縣吏兄弟叛/走人名簿 / (壹 7849)

34 𠄎右𠄎鄉郡縣吏/兄弟合十五人前後各叛/走𠄎趣劉陽吳昌醴陵𠄎 (壹 7454)

① 安部聰一郎:《長沙吳簡にみえる名籍の初步的検討》,長沙吳簡研究会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2 集。

②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 1 期。

③ 筆者也曾進行過初步探討,當時將吏民簿誤釋為吏家屬簿(關尾史郎:《長沙吳簡中の名籍について—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試論(二)—》,《唐代史研究》第 9 號,2006)。正如本文所示,筆者想修正這一看法。

33 是表題簡,34 是賬戶簡、且可能與 33 相對應。此外,下面的 35 和 36 可能是它的本文簡。

35 縣吏毛章弟頡年十五 /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 / (壹 7865)

36 郡吏監訓兄帛年卅^八 / 嘉禾四年四月十五日叛走^四 (壹 7975)

《竹簡〔壹〕》中,編號七千到八千之間大約收錄了 12 枚左右這類簡,^①它們可能全都是 33、34 的本文簡。問題是“叛走”的含義,將其解釋為“逃走”“隱匿”是不正確的。因為同時記錄有年月日(本文簡)和目的地(賬戶簡)等。可能是外出的意思,記錄的是外出的日期和外出地點。劉陽、吳昌、醴陵全部都是長沙郡管轄的縣。這些也可以稱作諸吏父兄子弟叛走簿,而且表題簡、賬戶簡的筆迹是相同的。^② 因此,各鄉送來的數據是否在縣廷抄寫了一遍,然後附上表題簡和賬戶簡進行保管呢。

如果這種推測大致不錯的話,那麼就應當說它一定存在原本,即各鄉送來的諸吏父兄子弟簿,它應是附在文書後面,書寫在木牘上的下列文書。^③

37 都鄉勸^農掾郭宋言被書條^列軍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紀爲簿輒隱核鄉界軍吏^八
人父兄^子

弟合十一人其一人被病物故四人叛走定見六人其三人跣踵二人守業已下戶民自代一人

^給吏隱核人名年紀死叛相^應無有遺脫若爲他官所覺宋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
破蒯 (簡號不詳)

譯文:都鄉的勸農掾郭宋向上言:收到文書,逐條記錄郡吏的父兄、子弟的人名、年齡,製作成賬簿。在鄉的管理區域內進行調查,軍吏八人,其父兄、子弟共十一人,其中一人病死,四人外出(叛走),現僅有六人。這六人中,三人殘疾(跣踵),二人經營產業,一人以下戶自己代服吏役(給吏)。(按照指示)調查了姓名、年齡、死亡、外出等,沒有遺漏。如果被其他官發現(遺漏),我(宋)自己服罪。嘉禾四年(235)八月,破蒯。

① 具體的例子可參看拙文《長沙吳簡中的名籍について—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試論(二)—》(《唐代史研究》第9號)。這些簡屬於第十三盆(壹 7267~8890)。下文中關於盆的信息,根據的是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揭取與室內揭剝——兼談吳簡的盆號和揭剝圖》,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

② 與其他簡相比,它們的文字較小,墨色較濃。

③ 37 的圖版和資料見西林昭一監修《湖南省出土古代文物展 古代中國の文字と至宝》,每日新聞社・(財)每日書道會,2004,95、157 頁。

37 是都鄉勸農掾廓(郭)宋製作的文書,此外還可見到東鄉、廣成鄉等的勸農掾同一天製作的文書。^① 因此,應當是縣廷向各鄉(負責的勸農掾)下達指示,在八月製作吏民簿的同時,讓他們掌握鄉內諸吏及其家屬的詳細動向,將其調查結果編成專門的冊書,和吏民簿分別送到縣廷。^② 而且,和文書一起同時從鄉送到縣廷的還有名籍的表題簡即下列 38 簡。

38 ……書□□/吏死叛□□年紀人名簿□ (貳 7382)

從這一名籍中抄錄了叛走簡,并在縣廷中重新編制成 33-35-36-34 的順序。由於收錄的現存十二枚本文簡中的叛走年月日是在嘉禾二年(233)十月十五日(壹 7893)至嘉禾四年(235)四月十八日(壹 7903)之間,因此都在 37 記載的日期之前。

說到 37 中的“被書”,可能是來自縣廷(直接負責的可能是戶曹)的指示,那麼,其背後是否有更高一級機構即長沙郡府的參與呢? 反映這一情況的有下列幾條簡。

39 臨湘□□□□□□□□□□□□十人父兄子弟十九/人其二人被病物故一人叛走□ (叁 3017)

40 人以下戶自代□一人…… (叁 3028)

可以看出,這兩枚簡分別是總計和細目(“其”字以下),并按照這樣的順序寫在兩枚簡上的賬戶簡。這樣考慮的話,39^③ 開頭有“臨湘”,引人注目。附在其後編制的諸吏父兄子弟簿,是否是從臨湘侯國送往長沙郡的呢? 下面的 41、42 是附在其後文書的一部分。

41 戶人見□一人任吏□□刑腫叛走/以下戶民自代□□□□/人名年紀爲簿 (叁 3003)

42 簿如牒盡力重復審實/無有遺·□簿保□/君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死罪 (叁 3011)

42 末尾的恭敬用語也用於縣廷向郡府發出的上行文書(“敢言之文書”),可以根據嘉禾二年(233)以後某君擔任臨湘侯相的職位等來判斷,^④ 因此很可能是從臨湘侯國送往長沙郡

① 詳情請參考高村武幸和王素的成果(高村武幸:《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郷》,長沙吳簡研究会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王素:《長沙吳簡勸農掾條列軍州吏等人姓名年紀三文書新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2009)。

② 37 是官文書,同時也是契券(券)。關於其意義,請參看拙文《破券・別券考—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藤田勝久編《東アジアの資料学と情報伝達》,東京:汲古書院,2013)。

③ 譯者按:原文爲40,誤,今改。

④ 關於這些問題,請參看拙著《魏晉簡牘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94集,2015)。

的上行文書(副本)。而關於它的本文簡,可以找到很多和 39~42 一樣放在第 27 盆(叁 2971~3165)中的竹簡。^① 現舉二個例子。^②

43 州吏何囊/名饒 / / (叁 3064)

44 /囊子男欽年卅/以嘉禾三/年六月廿五日被病物故 (叁 3065)

45 軍吏劉儀 / / (叁 2947)

46 /儀兄子弟汝年十四細/小隨儀在宮/名海 中 (叁 2950)

44 是 37 中“被病物故”的個案,46 是“細小”(瘦弱)的具體實例。^③ 此外,和它們同放在一盆中的,還有鄉的總計簡。

47 集凡中鄉州軍吏四人/父子兄弟三人 中/ (叁 3012)

48 集凡平鄉領州吏三人/父子兄弟合五人/ (叁 3032)

49 · 右都鄉軍吏八人…… (叁 3043)

這三枚簡無論是格式還是字迹均不相同,^④它們可能是從各鄉送到縣廷的。在此基礎上,就諸吏父兄子弟簿想提出一種假說。

根據長沙郡的指示,臨湘侯國命令各鄉調查鄉內諸吏及其家屬的詳細動向。當調查結果附在像 37 那樣的文書後面送來時,臨湘侯國應是將調查結果抄寫一遍,附在新製作的 39、40 這樣的賬戶簡和 41、42 這類文書後面送往長沙郡。各鄉送來的調查結果原件,附上寫好的表題簡或賬戶簡以及文書後,由臨湘侯國負責機構(可能是戶曹)進行保管。當然 37 等也放在一起。

這種諸吏父兄子弟簿均以吏及其男性家屬為對象,女性家屬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推測它可能與徭役、雜役的賦課有關,但為什麼僅以吏為調查對象,這個問題和確定本文所例舉的各簡的準確年代等一樣,均是今後的課題。^⑤

① 但實際上,正如本文所例舉的那樣,第二十六盆(叁 2647~2970)中也散見有同類的本文簡。

② 釋文沒有出注,由於根據圖版無法釋讀,46 的“中”字可能是紅色。下面列舉的 47 也應是同樣情況。關於這個字的意思,伊藤敏雄認為是表示校閱確認過了(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朱痕・朱筆・「中」字について》,《長沙吳簡研究報告》2009 年度特刊,2010),此處從其說。

③ 本文所舉的都鄉發出的文書 37 中未出現“細小”一詞,但是廣成鄉發出的文書(請參照上頁注)中報告有十二人“細小”。另外關於“細小”的語義,採納的是王子今的觀點(王子今:《說走馬樓簡文“細小”》,《江漢考古》2009 年第 2 期)。

④ 47 和 48 中總計額是以“集凡”開頭,與此相對,49 以“右”開頭,存在差異。另外,雖然同樣是以“集凡”開頭,但 47 和 48 的書寫位置差了一個字符。

⑤ 吏民簿也同樣,未能論及賬戶簡中的細目簡。對此,也希望有機會再行討論。

四 方遠授居民簿

關於方遠授居民簿，先看下列木牘文書。

50 都鄉勸農掾郭宋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條列鄉界遠授居民占上戶籍

分別言案文書輒部歲伍五京陳□毛常等隱核所部今京關言州吏姚達

誠裕大男趙式等三戶口食十三人□在部界謹列人名口食年紀別爲簿如牒謹列言宋
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詣 戶 曹

【肆 4523(1)】

筆者在另一篇論文曾對此文書進行翻譯，請參考，^①發文者都鄉勸農掾郭宋，應當就是 37 中的那個廓宋吧，因此文書的年代也應是嘉禾四年(235)，^②是發往臨湘侯國戶曹的上行文書(白文書)。在接到戶曹的命令(敕)後，檢括了歲伍五京等，並新掌握了州吏姚達以下三戶十三人的情況。這是其梗概。

伊藤敏雄將其命名爲“都鄉勸農掾郭宋白條列鄉界方遠授居民文書”，^③遺憾的是無法找到其本文簡。但是《竹簡〔肆〕》收錄的兩個資料群 Ic3③(肆 4419~4503)和 Ic3④【肆 4505~4523(1)=50】中包含了很多可能與 50 相關的簡，例如下列簡表明戶曹的命令也涉及都鄉以外的鄉。^④

51 寫部諸鄉吏蔡忠/區光郭宋文□□□

(肆 4500)

嘉禾年間時，蔡忠、區光分別是平鄉、廣成鄉的勸農掾。^⑤如上節所見，要求掌握鄉內諸吏及其家屬詳細動向的命令可能是長沙郡發出的，而這個指示也應當是比臨湘侯國級別高的機構發出的，下面兩枚簡可以證明這一推測。

① 關尾史郎：《魏晉南北朝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94 集。關於第一行“授”字的釋讀，採納的是長沙吳簡研究會例會(2014 年 7 月 19 日於櫻美林大學四谷校區)上石原遼平的報告，以及接受這意見的伊藤敏雄先生的教示。

② 如後所述，下達這一指示的潘濬在嘉禾四年(235)被免職，因此它肯定是此前的文書。

③ 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中」文書木牘》，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5。

④ 54 除了人名外，和 50 文字基本相同，應是同一枚簡，這類簡出土了很多(關尾史郎：《魏晉南北朝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94 集)，這也可以作爲旁證。譯者按：“50”應爲“51”之誤。

⑤ 關於蔡忠和區光，可分別參考拙文《穀物の貸与と還納をめぐる文書行政システム一斑—東アジア古文書学の起点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2014)和《破萌・別萌考—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藤田勝久編：《東アジアの資料学と情報伝達》，東京：汲古書院，2013)。另外，據凌文超說，在未公布的竹簡中有小武陵鄉勸農掾文騰的名字(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 年第 1 期)。而從 51 的圖版來看，“文”字後面的字从肉月，因此這可能也是文騰。

52 大常府丁卯書/曰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 (肆 4483)

53 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皆應上戶籍 (肆 4490)

52 中的大常(太常)就是潘濬。潘濬在黃龍三年(231)至嘉禾三年(234)間有假節、太常、劉陽侯等官爵,^①在武昌進行平定武陵蠻,但嘉禾四年被免官。^②實際上可以見到有“持節劉陽侯”(叁 1717)和“使持節、劉陽侯兵曹王攀”(貳 8223)這類記錄簡,^③在武昌設置太常府,由它們向相關諸郡下達將“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可能指未登記的新生兒)和“方遠客人”(寄居者)著籍的命令。這兩枚簡是通過長沙郡向臨湘侯國下達文書的復件,而 50 應當是都鄉根據臨湘侯國下達的指示,將檢括結果上報的文書。這裏的“方遠□(聚)居民”就是綜合 52、53 的“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和“方遠客人”的說法,正是在這次檢括中董基著籍了。其根據是有與 50 文字相同的竹簡。

54 所部□□□/關言州吏董基胡仲牒□□ (肆 4473)

若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它與 50 的第二行到下一行的“所部今京關言州吏姚達誠裕……”除人名以外幾乎是一樣的。這個董基就是嘉禾二年(233)以後擔任三州倉的邸閣郎中,在許多賦稅納入簡上署名的人。^④從其職務名稱來判斷,他無疑應當是上級機構派遣到臨湘侯國的,但他似乎任職後也沒有進行正式登記。像他這樣的人可能也屬於“方遠客人”的範疇。

方遠聚居民簿很可能祇是根據潘濬命令制作的一次性的特殊名籍,像 50、53 這樣,相關文書中頻繁出現“戶籍”的詞彙。今後有必要對第二節論及的吏民簿與這種“戶籍”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的考察。

結 語

本文分三節嘗試對長沙吳簡中所包含的名籍進行探討。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不少名籍類的表題簡,但由於均缺乏把握其具體性質、內容的線索,本文就不對此進行討論。

但是即使僅從目前的討論來看,也可以了解嘉禾年間臨湘侯國頻繁制作吏民簿的情況。可以說,當時的吏民簿包含了後代的戶籍、差科簿以及訾簿等多重功能。因此,僅從吏民簿的制作頻率就可以得出戶口管理很完善的結論。

① 《三國志》卷六一《吳書·潘濬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② 王素:《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1輯,北京:崇文書局,2004。

③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兩套作部工師簿比對復原整理與研究》,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④ 關尾史郎:《出土状況よりみた長沙吳簡—『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竹簡』[肆]所収の賦稅納入簡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7號,2013。

諸吏父兄子弟簿和方遠授居民簿這類名籍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例,是按照上級機關的命令製作的。據此可以推測,或許由於平定武陵蠻這一政治因素,^①普通的吏民簿對戶口的掌握無法發揮十分有效的作用。無論是諸吏父兄子弟簿還是方遠授居民簿,都是通過鄉負責此項事務的勸農掾製作并送到縣廷,而方遠授居民簿,是由勸農掾之下的歲伍負責實際的檢括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未見到按里製作吏民簿的里魁的身影。

此外,本文重點和後代各種名籍進行了比較,但也不應忽視和前代各種名籍特別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規定的各種名籍的比較工作。^② 在意識到還有衆多課題有待探討的同時,就此擱筆。

(原文《簿籍の作成と管理からみた臨湘侯國—名籍類を中心として—》,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15。)

① 鄧瑋光:《試論吳簡名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② 池田雄一也曾論及長沙吳簡的吏民簿研究,他認為秦漢時期是縣吏前往鄉製作名籍的(池田雄一:《秦漢時代の戸籍について》,東洋文庫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東洋文庫論叢,2014)。

第三屆簡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綜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單印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聯合主辦的“第三屆簡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在廣西桂林召開。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副主任鄔文玲主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何林夏、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楊振紅先後致辭。來自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古文獻研究所、甘肅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韓國慶北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日本中央大學等海内外二十五家單位六十餘名學者參加了會議。

會議分兩部分進行。首先為“謝桂華先生《漢晉簡牘論叢》出版座談會”。謝桂華先生長期致力於出土簡牘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和《簡帛研究》雜誌、“簡帛研究文庫”叢書的主要創辦者。2016 年是謝先生去世十周年,為了紀念謝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組織編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謝先生論文集《漢晉簡牘論叢》。作為謝桂華先生的學生,鄔文玲首先圖文并茂地介紹了謝先生的生平,總結了謝先生在“簡牘整理釋讀”“散簡冊書復原”“簡牘與歷史研究”“簡帛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等方面的成就。王素從“重視簡牘復原研究”“重視簡牘草書研究”“重視簡牘新材料研究”三方面歸納了謝桂華先生的研究特點。侯旭東通過《簡牘研究的引路人:追憶謝桂華先生》寄托了

自己的哀思。此外,李均明、張德芳、馬怡等回憶了與謝桂華先生一起工作的點點滴滴,尹在碩、金慶浩、蔡萬進、黎石生、汪桂海等講述了謝桂華先生對後學的提攜。

學術主題報告與研討會分四場進行。學者主要圍繞清華簡、里耶秦簡、嶽麓秦簡、西北漢簡和三國吳簡等出土資料,對出土典籍與中國古史重建、秦漢國家統治、地方行政制度、爵制、法制史等專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討論。

一、清華簡與古史重建。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時期簡牘,已出版五冊。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劉國忠《清華簡〈管仲〉初探》簡要介紹了即將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被命名為《管仲》簡的形制、內容等,認為簡本《管仲》應屬於傳世《管子》的佚篇,簡本的出現將會對《尚書·洪範》《管子》各篇的成書年代研究產生巨大推動作用。李銳《由清華簡〈保訓〉論〈天問〉上甲微事迹》,利用清華簡《保訓》篇對楚辭《天問》中的語句提出了新的解釋。羅小華《試論清華簡〈繫年〉中的“晉東公”和“晉敬公”》,對“晉東公”和“晉敬公”的諡號問題進行了探討。

二、秦漢國家統治與制度史研究。尹在碩《秦朝的“非秦人”認識與占領地支配》認為,秦及漢初對新占領地的新民采取區別政策。此外,秦對道和塞外的臣邦實施比內地郡縣更為寬松的懷柔政策,是古代中國向外擴張的表現方式。鄔文玲《漢代“使主客”略考》利用簡牘材料,論證漢代的“使主客”不是大鴻臚的常設屬官,而是皇帝臨時派出的使者,用以處理外國使客臨時事務,具有加官性質。李均明《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分析了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與合議有關的審批文書的形式和要素,在此基礎上對漢代的合議制度進行了探討。

出土簡牘的發現與公布對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使秦漢地方職官制度研究成為新的熱點。張春龍《沅陵侯國志》將湖南沅陵虎溪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沅陵侯國計簿》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編寫了涉及沅陵侯國建制、地望、行政設置、戶口等內容的《沅陵侯國志》。鄒水杰《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認為,里耶秦簡中的“(廷)某曹”“(廷)主某”均指令史,“某曹令史”與“官”的對應相對固定,而“主某令史”則不對應特定的官,祇主管某類事務文書。秦與西漢時代佐史類吏員在縣行政中具有重要地位,諸曹掾史的格局遲至東漢纔成型。沈剛《秦令、丞、尉問題發微》以出土資料為基礎,探討了秦代縣令、丞、尉的職責以及尉與令丞身份的差異等問題。李迎春《從簡牘看秦漢地方行政系統嗇夫類吏員地位的變化》認為,秦及漢初嗇夫類吏員地位較高,西漢中期以後史類屬吏地位呈上升趨勢,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除了受文書行政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秦和兩漢政權對中央集權在地方行政中如何體現有不同的看法。阿部幸信《“吏潘黔李珠市布”小考》對走馬樓吳簡中承擔“市布”的縣吏進行考察,認為“鄉市掾”“金曹史”都與“市布”有關,但兩者身份不同。

賈麗英《“公卒”簡反映的秦及漢初爵位系統》對秦漢簡牘中“公卒”簡進行分析,認為秦至漢初的爵位系統中分傳統的“二十等爵”和由公卒、士伍組成的“‘士下’之爵”兩大層次。隨着爵制式微,爵稱、爵名趨於簡化,西漢初期“公卒”的爵名第一個被裁并。孫聞博《二十等爵確立與秦漢爵制分層的發展》認為二十等爵是在卿大夫士爵序列上疊加侯爵,糅合了內爵、外爵兩套系統。秦及漢初,重爵取向下“侯卿大夫士”分層最為發達。東漢卿爵衰落,對應吏、民爵的原“大夫士”爵日益等齊化,使外爵性質的列侯、關內侯功能突出,這為認識五等爵復興的魏晉爵制改革提供了線索。

三、法制史研究。廣瀨薰雄《郝家坪秦墓木牘“王命丞相戊內史區氏臂更修為田律”句補論——讀《秦簡牘合集》札記》指出,“區氏”“臂”是左、右內史的名字,秦惠文王時已經分置左右內史。“更修為田律”是再次重申“為田”律之義,“為田”是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的內容摘要。黎明釗《秦簡的〈亡律〉小記》對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中的《亡律》進行了對比研究,並對其中涉及的“室人”“十八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于振波《從勞力需求看秦代赦免制度》認為,秦統一六國後赦令明顯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秦帝國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偶爾的大赦雖會使官府掌握的刑徒數量有所減少,但是可以通過征發徭役、輕罪重刑來彌補,而“久者不赦”恰好體現秦帝國對刑徒這一龐大勞動力群體的依賴性。楊振紅、王安宇《秦漢訴訟制度中的“覆”及相關問題》認為,“覆”不含“重新”“再次”之意,而是指上級機關主理或由上級機關指定某機構(或使者)主理的訴訟審判,主理程序包括立案、偵查、審判、復核、監督等環節。進而考察了“覆治”“復”“復案”“覆訊”的含義。朱紅林《史與秦漢之際的決獄制度》認為,秦漢時期郡縣审理案件時均有史參加,在縣為獄史,在郡為卒史。張俊民《漢代勞役刑刑期問題小識》利用西北漢簡探討了赦令對勞役刑刑期的影響。徐暢《新刊走馬樓簡牘與許迪割米案司法程序的復原》結合揭剝圖和簡牘形制,對新刊走馬樓中與許迪案有關的簡牘進行編聯,進而對三國孫吳的法治狀況進行了探討。

四、社會史研究。任仲燄《戰國秦至漢時期的土地制度綜觀》,認為戰國秦漢時期雖然實行國有制,但也承認土地私有權。土地在授田之前屬於國家,授田之後為個人所有。王田思想在現實中體現為授田制,土地私有權與王田思想並不矛盾。黎石生《走馬樓吳簡所見物直與折算比率》認為,孫吳時期長沙地區稻米具有貨幣功能,嘉禾五年錢、布准米比率多變,既是當時物價不穩的真實反映,也與布、米的品種和質量有關。

劉樂賢《敦煌馬圈灣出土藥方簡補釋》認為,馬圈灣藥方簡至少有第505號、第563號(正、背)、第564號及第1177+1060號等四枚殘簡,並對這四枚藥方簡中的藥名進行了補釋。馬怡《書帙叢考》從書籍的形態與裝具、書帙的規制、帙與卷的關係等方面,對簡牘時代至紙時代早期書帙的使用與變遷進行了考察。金慶浩《從〈居延漢簡〉看西北邊境吏卒日常生活》綜述了居延漢簡所反映的西北邊疆地區的吏卒生活,指出戍卒私人間的爭吵、“私市”、熟

記各種法令文書等也是漢帝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宋豔萍《漢代畫像與漢代“厭勝”之風》對漢代畫像石中厭勝圖像進行梳理,并剖析了漢代厭勝之風的歷史淵源及其時代特點。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吏、民分籍及在籍人口》通過對走馬樓吳簡的相關簿籍分析,認為孫吳時期尚未出現吏民分籍的情況。

五、出土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劉釗《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考》,將曹操高陵發現的“石牌”與簡牘中的“楬”對比,認為“石牌”稱為“石楬”或“石簽牌”更為妥當。并從文字學角度對“石牌”中的文字進行了解讀,認為高陵應當就是曹操墓。張德芳《一百多年來西北漢簡整理的歷史回顧》,對西北漢簡百餘年的整理工作分四個階段進行了回顧。劉紹剛《銀雀山漢簡整理進展》,介紹了目前正在開展的銀雀山漢簡再整理項目的情況,最後對即將開始的整理工作提出了幾點預想。蔡萬進《里耶秦簡釋文與綴合八則》通過簡文綴合的實例,談及對里耶秦簡整理工作的一些思考。汪桂海《洛(雒)陽之洛(雒)與滎(滎)陽之滎(滎)——出土文獻與〈漢書〉校勘舉例》利用考古資料,證明《漢書》等傳世兩漢文獻中“洛陽”“上洛”的“洛”字應校改為“雒”,而“滎陽”“滎澤”的“滎”字應校改為“滎”。戴衛紅《韓國木簡中所見倉庫制度》探討了韓國木簡中“棕”的形制及其相關內容,進而論及東亞世界漢字文化、簡牘文化的傳播。此外,吳雪飛《簡牘考釋兩則》、楊小亮《秦漢簡牘簽署中“發”字的再討論》、孫占宇《放馬灘秦簡中的符號及其功用初探》、馮玉《放馬灘秦簡語氣詞芻議》、莊小霞《走馬樓吳簡所見漢昌、吳昌考》等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副主任鄔文玲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楊振紅對此次會議作了總結發言。她指出,本次會議體現出老、中、青三代學者的不同研究特色,與會學者的報告內容豐富,視角多樣,體現了當今簡帛學多學科交叉融匯、研究深入細致的特點。她繼續倡導簡帛微觀具體的實證研究與宏觀視野、長時段研究相結合,客觀公正地對待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記載中的矛盾。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開創了很好的合作模式,出版了大量的簡帛學集刊和論著。通過此次會議,雙方在為中外學者交流創建平臺的同時,進一步商討今後的合作發展規劃,相信今後會為學界奉獻更多的成果。

文字·文本·文明——出土 文獻研究青年論壇綜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吳雪飛

2015年12月5日—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聯合主辦的“文字·文本·文明——出土文獻研究青年論壇”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楊振紅、副主任鄔文玲出席會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河南大學的30餘位青年學者參加了會議。學者們圍繞論壇主題——文字、文本、文明問題作學術報告并進行了討論。現將會議專題介紹如次:

一、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單育辰《施伯豐鼎考》對最近新見的施伯豐鼎銘文進行考釋,將銘文中的“𠄎”釋為“施”,“𠄎”釋為“禦”,“宕”讀為“託”,“尚”讀為“當”,將“侖”理解為人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吳雪飛《古文字考釋兩則》對1975年安陽小屯村北18號墓出土玉戈朱書和2008年洛陽出土西周甲骨卜辭進行了釋讀。將朱書中的“𠄎𠄎”釋為“執秉”,指玉戈用以執秉。將卜辭中的“白𠄎車”釋為“伯畀車”,指方伯交付馬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鄔可晶《孔家坡漢簡〈日書〉短札四則》利用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對孔家坡西漢早期漢簡《日書》作了新的考釋。將《盜日》篇中的“剛履”讀為“剛戾”,《司歲》篇中的“壑帝”讀為“赫帝”,認為《死咎》篇中的“生子不牴”不必破讀為“全”,《直室門》篇中的“婦人必宜疾”的“宜”為怨恨之義。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樂游(劉釗)《西北邊塞漢簡官文書零拾(五則)》對西北邊塞漢簡部分官文書的文字進行了辨識和釋

讀。將“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中的“從”釋為“從”，“父”釋為“父”，“等”釋為“等”，“失”釋為“失”。將“玉門花海七棱觚”中的“調”釋為“調”，讀為“諫”，“堯”釋為“堯”，“悔”釋為“海”，讀為“悔”。認為居延舊簡 505·3 中的“部”為“部”字殘筆，居延新簡 EPT43:31 中的“奸能”的“能”讀為“態”，破讀為“慝”。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3:619 中的“元康三年”當為“元康元年”。

二、文本研究。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陳英傑《談青銅器中器與銘相呼應的現象》對青銅器中器與銘相呼應的現象進行了系統研究。將器與銘相呼應的情況分為三種，一是青銅器的形制與銘文內容照應，二是青銅器的花紋與銘文內容照應，三是花紋構圖與銘文文字構形照應。指出這些現象對探討銅器製作的原因、銘辭的性質以及當時人的藝術思維都很有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天然《〈孔子閒居〉成篇考》對《禮記·孔子閒居》和上博簡《民之父母》的文本進行對比，進而考察《禮記·孔子閒居》的文本結構和形成問題。認為《禮記·孔子閒居》當分為“民之父母”“參於天地”兩部分，從上博簡《民之父母》可見《孔子閒居》中“民之父母”部分曾單獨成篇流傳。通過梳理“民之父母”“參於天地”的結構，揭示了兩部分的內在聯繫，並通過分析“天地四時”段，探討了“參於天地”段的流變軌迹。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洪伯《尹灣漢墓幾枚木牘性質再考》從文書來歷與用途的角度出發，重新檢討尹灣漢墓所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的性質。認為四份文書不符合東海太守府文書的特徵，應來自中央丞相府與御史府集曹、法曹、東曹之類的部門。其中《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登記的物品是全國的總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莊小霞《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朝東穀”簡考釋》對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朝東穀習字”簡進行了考釋。認為“朝東穀”的“東穀”是“暘穀”的另一種稱法，“息老物”不應指“息民之臘祭”，而是指田夫與萬物。“朝東穀，息老物，明朝東穀昨何在”反映一種對時間和生命的態度，其語言風格和思想內涵可與傳世的樂府詩等文學作品作比較研究。

三、古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安子毓《“水德”考》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秦用“水德”而“刻削毋仁恩和義”的說法提出質疑。結合秦漢的出土材料和傳世文獻，認為“刻削毋仁恩和義”並不符合秦的官方宣傳，“水”在先秦具有正面意義，與嚴刑峻法聯繫起來比較牽強。“水”主“陰”而與刑殺相關是漢代以來儒生和陰陽家賦予的說法，與先秦思想相背。因此秦主“水德”而“刻削毋仁恩和義”的說法並不符合秦的史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孫聞博《秦漢邊地胡騎的使用——基於新獲史料與傳世文獻的考察》對秦漢邊地使用胡騎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秦迄西漢，隨着胡人內附漸多，政府相關管理存在臣邦向屬國的調整變化。西漢後期以降，胡兵在邊郡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且以涼州較為突出。東漢王師出征，軍隊構成亦多出現胡兵為主的情形。漢廷對胡騎使用的原因，除以往總結外，

既有技術因素,又有經濟考慮。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宋潔《〈二年律令〉與〈法經〉〈九章律〉“篇首”問題試探》結合揚雄《太玄》對《二年律令》《法經》《九章律》中的“篇首”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二年律令》以“賊律”為篇首,與《法經》《九章律》“古人堤漢律律目”以“盜律”為篇首不相同。《二年律令》處於《法經》《九章律》與東漢“古人堤漢律律目”之間,篇首却不同於前後,說明傳統的法律沿革認識可能存在問題。通過對揚雄《太玄》中“數字觀”的考察,認為《法經》《九章律》的形成是“數字觀”作用於法律外在形式之後的結果,其出現時間當在《二年律令》之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呂方《張騫的社會流動與西漢“吏民”》通過張騫身份的變化探討西漢社會流動問題。認為張騫經歷了上升、下降的全部垂直接流動過程,折射出西漢“吏民”在社會流動中的普遍特徵。梳理漢簡中大量關於“吏民”“吏卒”上升的信息,可以發現西漢社會中下層的上升條件,主要表現為兩種對立統一的原則:“尚賢”與“親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欣《〈續漢書·百官志〉“有秩比命士”說辨析》對《續漢書·百官志一》“太尉”條下的“有秩比命士”說提出質疑。認為秦及漢初縣的有秩,以縣官嗇夫為主體,其主要由縣長吏除用,與古代由君主任命的命士有明顯區別,漢初“有秩比命士”說當與史實不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凌文超《吳簡中所見孫儀之職事》通過考察吳簡中“孫儀”之職事,探討吳簡中的職事差遣問題。指出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荊及倉米入受荊記錄的“三州掾”“掾”“倉吏”孫儀,並非三州倉的屬吏,而是都市的佐吏,其本職為“市吏”。孫儀在嘉禾五年受上級差遣,帶“監口掾”使職,臨時借調至三州倉收受租稅雜米及准入米。因孫儀的編制未在三州倉,孫儀不是正式的“三州倉吏”。孫儀職事的問題反映了孫吳地方行政制度中的官職差遣問題。

本次會議中,青年學者提交和討論的論文研究跨度大、研究對象新、涉及問題多,圍繞玉石、甲骨、金文、簡帛等材料中的文字展開討論,解決了若干疑難字詞的辨識和釋讀問題;圍繞出土文獻中的文本進行探討,對若干文本進行校勘,疏通了文義,考察出文本的性質、結構和形成過程;利用出土材料探討歷史問題,結合簡帛對秦漢魏晉的政治、職官、軍事、社會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和分析。會議充分體現出青年學者極高的研究熱情、扎實的研究基礎、活躍的思維和極強的創新意識。會議為青年學者的研究創造了條件,為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平臺,推動了出土文獻和商周、秦漢、魏晉史的研究。

1900 年以來出土簡帛一覽(續)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畢育辰

筆者曾在《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發表過《1900 年以來出土簡帛一覽》,收錄了 1900 年至 2005 年 12 月之間出土的簡帛,現在已過去十年,簡帛還在大量出土,其公布情況也有很多變化。此外,舊編也偶有失收的情況。因此著成本編,以為舊編之補充。希望今後每十年能做一次增補。本次修訂的原則是:本編祇收錄舊編未收錄的簡帛的出土及公布情況;本編著錄的體例與舊編保持一致;凡舊編未收錄的簡帛,本編直接按原體例加以收錄;舊編已收錄簡帛有新的公布,則加《補》來標示公布情況。

凡例

一、本文收錄 1900 年至 2015 年 12 月間出土的隋之前有漢文文字的竹簡、木簡、竹牘、木牘、帛書。其他有漢文文字的木質出土材料如簽牌、削衣、謁、封檢等,亦酌情收入。

二、本文收錄出土簡帛按發現的時間先後排列,同時分開標明出土地點不同的簡帛。

三、本文收錄出土簡帛的體例為:“出土時間”(出土時間不明者標明收繳或入藏時間)、“出土地點”(出土地點不明者標明收繳或入藏地點)、“出土簡帛的數量”、“出土簡帛的內容或名稱”、“發表出土簡帛材料的書、刊”。

四、簡牘出土時,多數已殘斷,本文多數情況下祇能按簡牘出土時的考古編號標明,故表“數量”之“支”,絕大多數非指整簡之“支”。

五、本文“簡帛內容或名稱”係參考多家論著寫定,故有些名稱不能和發表出土簡帛材料的書、刊中論及的相一致;在名稱下標有“~~~~~”者表示出土簡帛原有篇題。

六、本文於“發表出土簡帛材料的書、刊”後無任何附加文字者,表明此書、刊已收錄了出

土簡帛的全部釋文或圖版;若在“發表出土簡帛材料的書、刊”後標明“有介紹”或“有簡介”者,表明此書、刊未能收錄出土簡帛的全部釋文或圖版,或僅有出土簡帛情況的介紹性文字。

七、已公布全部釋文或圖版的簡帛,本文祇標明收錄出土簡帛全部釋文或圖版的書、刊,相關研究性著作概不收入;有些出土簡帛釋文或圖版為多種書、刊完整收錄,本文儘量全面標明,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面標明的,選擇其中最重要的書、刊標明。

八、未公布全部釋文或圖版的簡帛,本文儘量標明其出於何種考古發掘報告,若無考古發掘報告可引述,則擇要標明其出於何種論著、報紙;有些祇見於網絡新聞的簡帛出土情況,則暫不標明出處。

1907年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古敦煌郡玉門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兩漢) 709支,帛書3件,及2842片殘簡 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獲

〔補〕其中2842片殘簡收入2007上海辭書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

1910年發表 傳出山東臨朐(北齊) 1枚

1.王江妃墓券(正面為告地書,背面為衣物疏)

1910商務印書館《陶齋藏石記》卷十三;2001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十二卷·戰國秦漢唐宋元墨迹》

1930~1931年 內蒙古額濟納河漢邊塞破城子A8、金關A32、地灣A33、大灣A35等地點(古居延都尉、肩水都尉)(兩漢) 10100支,帛書2件出於破城子,3件出於地灣

〔補〕其中2799支收入於2014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居延漢簡(壹)》;其中2943支收入於2015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居延漢簡(貳)》

1931年 新疆古尼雅遺址(漢) 25支 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獲

〔補〕2007上海辭書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

1951~1952年 湖南長沙徐家灣西漢(劉驕)墓M401 1支

〔補〕2001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十二卷·戰國秦漢唐宋元墨迹》

1957年 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M1 148支

〔補〕2013 文物出版社《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

1961 年 長沙南郊砂子塘西漢墓 M61 43 枚

1. 封檢

1963《文物》第 2 期

1963 年 朝鮮平壤貞柏洞東漢墓 M3 3 枚

1. 內容不詳

2010 廣西師範大學《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有簡介

1971 年 山西榆次王湖嶺西漢墓 M3 1 枚

1. 簽牌

1974《文物》第 12 期

1972 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涼(沮渠封戴)墓 M177 木版 1 枚

1. 授官版

1975 文物出版社《新疆出土文物》、2000《新疆文物》第 3、4 期合刊有介紹

1972 年 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 M1 4942 支及數千殘片

〔補〕7. 論政論兵之類:《將敗》《將失》《兵之恒失》《王道》《五議》《效賢》《爲國之過》《務過》《觀庫》《持盈》《分士》《三亂三危》《地典》《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共》《起師》《奇正》《將義》《觀法》《程兵》《將德》《將過》《曲將之法》《雄牝城》《五度九奪》《積疏》《選卒》《有國務過》《十官》《患之》《六舉》《四伐》《亡地》《五議》《君臣問答》《郭偃論士》《民之情》《有國之效》《有主以爲任者》《自危自忘》《國法之荒》《聽有五患》《德在民利》《十陣》《十問》《略甲》《萬乘》《富國》《三算》 2010 文物出版社《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8. 陰陽時令、占候之類:《曹氏陰陽》《陰陽散》《禁》《三十時》《迎四時》《四時令》《五令》《不時之應》《爲政不善之應》《人君不善之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占書》 2010 文物出版社《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9. 其他:《唐勒》《定心固氣》《相狗方》《作醬法》《算書》《選》《許則》《清禾》《國□□□》《□忌》《能》《官》《傳言》 2010 文物出版社《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1972 年 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辛追)墓 M1 312 支、簽牌 65 枚

【補】2014 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1972~1974 年 內蒙古額濟納河漢邊塞遺址(兩漢) 19637 支
出土地點:

1. 肩水金關 A32 11000 餘支 【補】其中:2351 支收錄於 2011 中西書局《肩水金關漢簡(壹)》;2334 支收錄於 2012 中西書局《肩水金關漢簡(貳)》;2066 支收錄於 2013 中西書局《肩水金關漢簡(叁)》;2065 支收錄於 2015 中西書局《肩水金關漢簡(肆)》

1973 年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 M8 176 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3 年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 M9 69 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3 年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張偃)墓 M10 木牘 6 枚、竹簡 170 餘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3 年 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軼侯利豨)墓 M3 竹簡木牘 608 支、簽牌 62 枚
【補】1. 遣策 2004 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2. 木牘 6 枚 2004 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1) 衣物疏 1994《文物》第 6 期

(2) 隨葬驗對木牘 1994《文物》第 6 期

帛書、帛圖 30 件

1.《周易經傳》:

(1)《周易》(《六十四卦》)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2)《二三子問》、(3)《繫辭》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4)《衷》(《易之義》)、(5)《要》、(6)《繆和》、(7)《昭力》 以上又見 2008 中華書局《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2.《喪服圖》(《喪制圖》)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

3.《春秋事語》 1978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叁]》;1983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叁]》

- 4.《戰國縱橫家書》 1978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叁]》;1983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叁]》
- 5.《老子甲本》及卷後佚書(《五行》《九主》《明君》《德聖》《九主圖》) 1974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壹]》;1980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 6.《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 · 1974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壹]》;1980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 7.《物則有形圖》 2006《文物》第 6 期
- 8.《五星占》 1978 科學出版社《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1 輯;1996 上海書店《馬王堆帛書藝術》;2004 中山大學出版社《馬王堆天文書考釋》
- 9.《天文氣象雜占》 1980 文物出版社《中國文物》第 1 期;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2004 中山大學出版社《馬王堆天文書考釋》;2007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
- 10.《刑德甲篇》
- 11.《刑德乙篇》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
- 12.《刑德丙篇》
- 13.《陰陽五行甲篇》(《式法》、《篆書陰陽五行》)
- 14.《陰陽五行乙篇》
- 15.《出行占》
- 16.《木人占》 2013 中西書局《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
- 17.《相馬經》 1977《文物》8 期
- 18.《宅位宅形吉凶圖》
- 19.《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後三書即《脈書》)《五十二病方》 1985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肆]》
- 20.《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 1985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肆]》
- 21.《養生方》《房內記》《療射工毒方》(後二書又稱《雜療方》)《胎產書》 1985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肆]》
- 22.《太一祝圖》(《辟兵圖》《太一將行圖》《神祇圖》)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
- 23.《卦象圖》(《符籙》《雜占圖》) 1992 湖南出版社《馬王堆漢墓文物》
- 24.《地形圖》(《長沙南部地形圖》) 1977 文物出版社《古地圖》;1990 文物出版社《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

25.《箭道封域圖》(《駐軍圖》) 1977 文物出版社《古地圖》;1990 文物出版社《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

26.《府宅圖》(《小城圖》)

27.《居葬圖》(《城邑圖》《園寢圖》) 1990 文物出版社《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

28.《宅位草圖》(《築城圖》)

29.《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 1985 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肆]》;2004 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以上所有簡帛皆見 2014 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1973~1974 年 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軫侯利蒼)墓 M2 竹簡 1 支

〔補〕2014 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1974 年 甘肅武威東漢(張德宗)墓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01 武威市光明印刷物資有限公司《武威文物考述》

1975 年 湖北鳳凰山西漢墓 M167 74 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5 年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 M168 木牘 1 枚、竹簡 66 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5 年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 M169 55 支

〔補〕2012 中華書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

1975 年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衷)墓 M4 2 支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壹》

1975 年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喜)墓 M11 1155 支及 80 殘片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壹》

1977 年 河北平山三汲中山王譽墓 M1 2 支

1. 簽牌

1996 文物出版社《譽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

1979 年 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兩漢) 1217 支,帛書·1 件

〔補〕2013 甘肅文化出版社《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

1980 年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 M50 2 支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貳》

1980 年 湖南臨澧九里楚墓 M1 100 餘支

〔補〕2012 嶽麓書社《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八輯有介紹

1981~1984 年 朝鮮平壤樂浪洞東漢墓 M1 6 枚

1. 內容不詳

2010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有簡介,同書尚介紹有出土年代未明之朝鮮平壤貞柏洞西漢墓 M166 發現有木簡 3 枚,木牘 1 枚,內容不詳

1983 年 湖南常德德山夕陽坡楚墓 M2 2 支

〔補〕2010 文物出版社《沅水下游楚墓》

1983~1984 年 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墓 M247 1236 支

〔補〕1.《二年律令》 2007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

2.《奏讞書》 2007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

1985 年 湖北江陵毛家園西漢(大女精)墓 M1 74 支

〔補〕2. 告地書 2007 文物出版社《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牘》

1986 年 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 M1 461 支,木牘 4 枚

〔補〕2009 中華書局《天水放馬灘秦簡》;2013 甘肅文化出版社《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

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肆》

1986 年 湖北江陵岳山秦墓 M36 木牘 2 支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叁》

1986 年 甘肅金塔地灣城(A33)肩水候官漢遺址 1000 餘支
〔補〕2005 文物出版社《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有介紹

1989 年 湖北江陵雲夢龍崗秦墓 M6 303 支,木牘 1 枚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貳》

90 年代 甘肅高臺許三灣前涼墓 1 枚

1.墓券

2007《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1990 年 朝鮮平壤貞柏洞 M364 西漢墓 120 支,3 枚木牘

1.《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多少口簿》 2009《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13 號,東京

2.《論語》 2011 中華書局《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有介紹

1991 年 甘肅武威新華鄉紅崖支渠曹魏(左長)墓 木牘 1 枚

1.青龍四年衣物疏

1997《隴右文博》第 2 期;2001 武威市光明印刷物資有限公司《武威文物考述》

1991 年 廣西貴港深釘嶺西漢墓 M31 1 枚

1.簽牌

2006《考古學報》第 1 期

1991 年 甘肅武威新華鄉頭渠兩座前涼墓 木牘 4 枚

1.升平十二年衣物疏 2.十三年衣物疏

1997《隴右文博》第 2 期;2007《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1993 年 湖北荊州沙市區關沮周家臺秦墓 M30 382 支

〔補〕2014 武漢大學出版社《秦簡牘合集·叁》

1993 年 湖北荊門郭店楚墓 M1 805 支

〔補〕2011 文物出版社《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

1993 年 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長沙王后墓 100 餘枚

〔補〕1.木牋、簽牌、封泥匣

2010《文物》第 4 期有介紹

1994 年入藏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 1200 餘支

其中：

〔補〕29.《競公瘡》 30.《孔子見季昞子》 31.《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 32.《平王問鄭壽》 33.《平王與王子木》 34.《慎子曰恭儉》 35.《用曰》 36.《天子建州》(甲本) 37.《天子建州》(乙本) 2007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

38.《武王踐阼》 39.《鄭子家喪》(甲本) 40.《鄭子家喪》(乙本) 41.《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 42.《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 43.《凡物流形》(甲本) 44.《凡物流形》(乙本) 45.《吳命》 2008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

46.《子道餓》 47.《顏淵問於孔子》 48.《成王既邦》 49.《命》 50.《王居》 51.《志書乃言》 52.《李頌》 53.《蘭賦》 54.《有皇將起》 55.《鵠鷄》 2011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

56.《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乙本) 57.《靈王遂申》 58.《陳公治兵》 59.《舉治王天下(五篇)》 60.《邦人不稱》 61.《史蒯問於夫子》 62.《卜書》 2012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

1994 年 河南新蔡葛陵楚(平夜君成)墓 1571 支

〔補〕2013 文物出版社《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

1996 年 湖南長沙走馬樓平和堂吳井 J22 約 100000 支

〔補〕3.其中 9091 支竹簡 2007 文物出版社《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

4.其中 8414 支竹簡 2008 文物出版社《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叁〕》；

5.其中 5613 支竹簡 2011 文物出版社《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

6.其中 6153 支竹簡 2013 文物出版社《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

7.其中 6050 支竹簡 2015 文物出版社《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捌〕》

1996年 貴州安順寧谷漢代遺址 1枚

1.內容不詳

2007年12月20日《貴州日報》

1998年 甘肅高臺駱駝城魏晉(耿少平)墓 M98-6 1枚

1.冥婚文書

2008《考古與文物》第1期

1998年 甘肅高臺駱駝城遺址前涼(周振)墓 1枚

1.墓券

2008《考古與文物》第1期

1999年 甘肅敦煌小方盤城遺址 300餘支

〔補〕2006《敦煌研究》第4期有介紹

2000年 甘肅高臺駱駝城遺址前秦(高俟)墓 M1 2枚

1.墓券

2008《考古與文物》第1期;2009《敦煌研究》第4期

2000年 甘肅高臺駱駝城遺址前秦(高容男)墓 M2 1枚

1.墓券

2009《敦煌研究》第4期

2000年 甘肅高臺駱駝城遺址前涼(趙雙、趙阿茲)墓 M2 2枚

1.衣物疏

2011《考古與文物》第2期

2000年 湖北隨州孔家坡磚瓦廠西漢(庫嗇夫辟)墓 M8 778支,木牘4枚

〔補〕1.日書 2.曆日 3.告地書

2006 文物出版社《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

2000年入藏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 400餘支

吳越史料、字書等

20 世紀初 甘肅高臺許三灣前凉(高丘)墓 1 枚

1.墓券

2007《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2002 年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古城 J1(秦) 38000 餘支

〔補〕1.官署檔案

其中:2552 支收錄於 2012 文物出版社《里耶秦簡[壹]》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東晋(朱少仲)墓 M1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十六國墓 M3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後凉(黃平)墓 M20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前凉(孫狗女)墓 M26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西凉(呂皇女)墓 M30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前凉(趙宜)墓 M37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 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後凉墓 M38 木牘 1 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東晉墓 M40 木牘1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年 甘肅玉門花海畢家灘十六國墓 M51 木牘1枚

1.衣物疏

2011《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2002年 江蘇連雲港海州雙龍村花園路西漢(東公、凌惠平)墓 M1 木牘9枚

〔補〕1.衣物疏 2.名謁

2012《文物》第3期

2002年 山東日照海曲西漢(公孫昌)墓 M106 39枚,無字木牘4枚

1.漢武帝後元二年視日

2010中華書局《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又2010《文物》第1期有介紹

2002年 山東日照海曲西漢墓 M129 2枚

1.遣策

2013中西書局《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

2002年 山東日照海曲西漢墓 M130 2枚

1.遣策

2013中西書局《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

2002~2003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60 200餘支、木牘22枚

1.文書 2.卒簿 3.曆譜 4.編年記 5.日書 6.律令 7.遣策 8.告地書

2004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2003》有介紹、2009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61 木牘3枚

1.文書 2.卒簿 3.曆譜 4.編年記 5.日書 6.律令 7.遣策 8.告地書

2004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2003》有介紹、2009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

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59 800 餘支、木牘 1 枚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62 木牘 1 枚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63 16 支、木牘 8 枚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83 木牘 1 枚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97 1198 支、殘簡 100 餘支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112 44 支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2~2003 年 湖北荊州印臺西漢墓 M115 木牘 33 枚

1. 文書 2. 卒簿 3. 曆譜 4. 編年記 5. 日書 6. 律令 7. 遣策 8. 告地書

200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3》有介紹、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有介紹

2003 年 湖北鄂州茅草村六朝墓 M2 木牘

2004 年 7 月 30 日《中國文物報》有簡介

2004 年 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古井 J10 (西晉) 909 支

1. 西晉桂陽郡文書

2009 嶽麓書社《湖南考古輯刊》第 8 輯有介紹

2004 年 湖南長沙東牌樓東漢古井 J7 218 支

〔補〕1. 郵亭文書

2006 文物出版社《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2004 年 安徽天長安樂西漢(謝孟)墓 M19 34 枚木牘

〔補〕1. 戶口簿 2. 算簿 3. 書信 4. 木刺 5. 藥方 6. 禮單等

2006《文物》第 11 期有介紹,并收入 10 枚木牘

2004 年 甘肅高臺南華鄉東漢墓 數量不詳

2008《考古與文物》第 1 期有簡介

2004 年 江蘇南京大光路孫吳(薛秋)墓 M1 5 枚

1. 名刺

2008《文物》第 3 期

2004 年 湖北荊州紀南松柏西漢(周偃)墓 M1 10 支,木牘 63 枚

1. 遣策 2. 簿書 3. 葉(牒)書 4. 令 5. 曆譜 6. 周偃功勞記錄 7. 周偃升遷文書

2008《文物》第 4 期有介紹

2004-2008 年 甘肅敦煌一棵樹漢代烽燧遺址 15 支

1. 邊塞文書

2010《敦煌研究》第 4 期有介紹

2005 年 湖北武漢黃陂六指街土庫灣楚墓 數量不詳

1.內容不詳

2005 年 廣東廣州中山五路大馬站商業中心古井(東漢~三國) 3 枚

1.內容不詳

2006《南方文物》第 3 期有介紹

2006 年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古城北護城壕 K11(秦) 28 支

1.戶籍

2007 嶽麓書社《里耶發掘報告》

2006 年 江西南昌火車站東晉(雷錫)墓 2 枚

1.名刺

2007 文物出版社《2006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2006 年 湖北雲夢睡虎地西漢墓 M77 2137 支、竹木牘 128 枚

質日、日書、書籍、算術、法律、司法文書、簿籍

2008《江漢考古》第 4 期有介紹

2007 年 雲南廣南牡宜東漢墓 5 枚

1.衣物疏

2008 雲南科技出版社《雲南邊境地區(文山州和紅河州)考古調查報告》

2007 年 湖北荊州謝家橋西漢(恽)墓 M1 208 支,竹牘 3 枚

1.遣策 2008 年 1 月 30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告地書 2009 文物出版社《荊州重要考古發現》

2007 年 江西南昌青雲譜梅湖兩晉(周涉)墓 2 枚

1.名刺

2008《文物》第 12 期

2007 年入藏 湖南嶽麓書院藏秦簡 2098 支

其中:1.質日 2.爲吏治官及黔首 3.占夢書 2010 上海辭書出版社《嶽麓書院藏秦簡

(壹)》

4.數 2011 上海辭書出版社《嶽麓書院藏秦簡(貳)》

5.爲獄等狀四種 2013 上海辭書出版社《嶽麓書院藏秦簡(叁)》

6.秦律令(壹) 2015 上海辭書出版社《嶽麓書院藏秦簡(肆)》,其他 2009《文物》第 3 期有介紹

2008 年入藏 湖南嶽麓書院藏秦簡 76 支

2009《文物》第 3 期有介紹

2008 年 湖北宜都陸城中筆西漢墓 M1 1 枚

1.衣物疏

2008 年 8 月 29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08 年入藏 清華大學藏楚簡 2500 支

其中:1.《尹至》 2.《尹誥》 3.《程寤》 4.《保訓》 5.《耆夜》 6.《金縢》(《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7.《皇門》 8.《祭公》(《祭公之顧命》) 9.《楚居》 2010 年中西書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9.《繫年》 2011 年中西書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10.《說命》(上)(中)(下) 11.《周公之琴舞》 12.《芮良夫毖》 13.《良臣》 14.《祝辭》 15.《赤鰭之集湯之屋》 2012 年中西書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

16.《筮法》 17.《別卦》 18.《算表》 2013 年中西書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

19.《厚父》 20.《封許之命》 21.《命訓》 22.《湯處於湯丘》 23.《湯在啻門》 24.《殷高宗問於三壽》 2015 中西書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

2008 年 甘肅永昌水泉子西漢墓 M5 1400 支

1.字書(七言本《蒼頡篇》) 2.日書

2009《文物》第 10 期有介紹

2008 年 湖北荊州八嶺山連心石料廠楚墓 M4 30 支

2010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09》有介紹

2009 年入藏 北京大學藏西漢簡 3346 多支

1.《老子》 2012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

2.節 3.雨書 4.堪輿 5.荊決 6.六博 2014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

7.蒼頡篇 2015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

8.《周馴》 9.《趙正書》 10.《儒家說業》 11.《陰陽家言》 2015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

12.《妄稽》 13.《反淫》 14.《日書》 15.《日忌》 16.《日約》 17.《醫方》 2011《文物》第 6 期有介紹

2009 年 湖北荊州高臺西漢墓 M46 9 枚木牘

1.賬簿 2014《江漢考古》第 5 期

2009 年 湖北武漢丁家咀楚墓 M1 1 支

1.遣策

2015《文物》第 6 期有介紹

2009 年 湖北武漢丁家咀楚(婁君)墓 M2 70 支

1.卜筮 2.遣策

2015《文物》第 6 期有介紹

2009 年 甘肅玉門金雞梁 M5 前涼墓 2 枚

1.封檢 2.衣物疏

2011《文物》第 2 期

2009 年 甘肅玉門金雞梁 M21 前涼墓 1 枚

1.拜官版

2011《文物》第 2 期

2009 年 湖南醴陵鄧公塘東漢遺址 6 支

1.與陰陽五行有關

2009~2010 年 湖北沙洋嚴倉獯子冢楚(悼滑)墓 M1 700 餘枚

1.遣策 2.占卜

2010 年 2 月 5 日《中國文物報》有簡介

2010 年 湖北沙洋黃歇楚墓 M1 數量不詳

1. 內容不詳

2012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11》有簡介

2010 年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古井 J1 1 萬枚左右

1. 長沙郡或臨湘縣的官方文書檔案

2013《文物》第 6 期有介紹、2015 中西書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有介紹

2010 年 甘肅張掖臨澤黃家灣灘西晉墓 M23 27 支

1. 訴訟文書

2012《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

2010 年入藏 武漢大學藏漢牘 1 枚

1. 衣物數

2015 上海古籍出版社《簡帛》第十輯

2010 年入藏 北京大學藏秦簡 783 支、竹木牘 10 枚、木觚 1 枚

1.《從政之經》 2.《善女子之方》 3.數學文獻 4.《道里書》 5.《製衣》 6.《公子從軍》 7.《隱書》 8.《飲酒歌詩》 9.《秦原有死者》 10.數術方技類文獻 11.記帳文書

2010《文物》第 6 期有介紹

2011 年 甘肅金塔板灘漢晉墓 1 枚

1. 衣物疏

2012《隴右文博》第 1 期

2011 年 湖南長沙東牌樓西漢、東漢、魏晉古井 數百支

1. 內容不詳

2012 嶽麓書社《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八輯有介紹

2011 年 湖北荊州劉家臺西漢墓 數量不詳

1. 告地書

2011 年入藏 武漢大學藏楚簡 110 餘枚

1. 占卜禱祠記錄

2013 年 1 月 16 日《光明日報》有簡介

2012 年 湖北荊州高臺古井 J69(楚) 3 支

1. 內容不詳

201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13》有簡介

2012 年 甘肅永昌水泉子西漢墓 M8 數量不詳

1. 曆譜

2014 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年鑒 2013》有簡介

2012 年 甘肅靜寧黨家塬漢墓 數量不詳

1. 郡縣往來文書信札

2015《隴右文博》第 2 期有簡介

2012~2013 年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西漢墓 M1 50 枚木牘

文書、巫術

2014《考古》第 7 期有介紹

2012~2013 年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西漢墓 M3 920 支

1.《敝昔醫論》 2.《脈死候》 3.《六十病方》 4.《尺簡》 5.《病源論》 6.《諸病症候》
7.《經脈書》 8.《歸脈數》 9.《五色脈臟論》(《逆順五色脈臟驗精神》) 10.《醫馬書》

2014《考古》第 7 期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4(楚) 8 支

1. 衣物織物記錄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9(楚-秦) 數量不詳

1. 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8(張楚) 10 餘支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1(西漢) 10 餘支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7(西漢) 數量不詳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5(西漢) 數量不詳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3(西漢) 8000 餘支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3 年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古井 J6(東漢-孫吳) 1000 餘支

1.文書

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4 年 湖北隨州周家寨西漢墓 M8 566 支、木牘 1 枚、簽牌 3 支

1.日書 2.告地書

2015 年 2 月 27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4 年 湖北荊州望山橋楚墓 M1 15 支

1.遣策

2015 年 2 月 27 日《中國文物報》有介紹

2014 年 湖南長沙市青少年宮西漢井 100 支

1. 內容不詳

2014 年 湖北荊州夏家臺楚墓 M106 400 餘支

1.《詩經》《呂刑》《日書》等

2014 年 湖南湘鄉三眼井楚簡 1000 支左右

1. 內容不詳

2015 年 江西南昌墩墩山西漢海昏侯(劉賀)墓 竹簡、木牘 3000 餘支

簽牌、奏牘、悼亡賦、《論語》、《易經》、《禮記》、醫書、五色食勝等 2015 年 11 月 6 日《中國文物報》有簡介

附：字迹無法辨識或無字迹者

1954 年 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 M185 65 支無字簡

1954《文物參考資料》第 12 期；2000 文物出版社《長沙楚墓》

1987 年 山東日照大古城西漢墓 M1 10 支無字簡

2006《東南文化》第 4 期有介紹

1987 年 山東日照大古城西漢(王溥)墓 M2 木牘 1 枚，及幾支斷簡

2006《東南文化》第 4 期有介紹

2002 年 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 M2 1359 支無字簡

1. 漆圖

2003《考古》第 7 期有介紹；2007 文物出版社《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有介紹

附录:《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適當調整,從《簡帛研究二〇一四》輯開始執行,敬請同仁垂注。

一、作者投稿,敬請惠寄打印稿或電子稿(WORD+PDF文檔)。文稿務請達到齊(內容提要、關鍵詞、正文、注釋均完整無缺)、清(整齊清晰)、定(係作者定稿)。

二、文稿全文繁體橫排(如果需要保留格式,個別簡文可豎排)。標題下標出作者工作單位、姓名。如果是國外學者,請在工作單位前添加國別,並加“[]”,如[韓]。內容提要300字以內,關鍵詞3—5個。

三、文內分層或小節的標題數字順序依次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文內一級標題漢字數碼後用頓號,後出標題題文,文內二級、四級標題後緊接標題,三級標題阿拉伯數字後加“.”。如:

一、名籍的格式

(一)物價波動狀況與換算失誤

1.臨潼銀鋌與安邑分司

(1)婺源縣的事例

四、為突出引文的重要而另立段落者,引文第1行起首空4格,從第2行起,每行之首均空2格。引文的首尾不加引號。引文的注釋號標在引文最後標點之後。

五、系統在默認狀態下不能處理錄入的文字,請造字或以圖片形式插入正文。

六、關於數字的用法:

(一)數字用法以國家技術監督局1995年12月公布的《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為基本依據,並考慮到本專業的特殊性。

(二)如下情形使用阿拉伯數字:

1.作者的一般性敘述:如:

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40個郡國中設立鐵官49處。

2.公曆世紀、年代、年、月、日。如:

1922年12月初,顧頡剛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專任編輯。

3.公制的度量衡單位計數與計量,包括正負數、分數、小數、約數和百分比,各種物理量值。如: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唐武德元年銅權重 464.2 克。

清代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 90% 以上,構成全國人口的主體。

4. 表示順序號、數據及計量單位均用阿拉伯數字。

(三) 如下情形使用漢字:

1. 古籍文獻中的數字。如: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

2. 古籍文獻中的卷數。如:

《冊府元龜》卷三五《帝王部·封禪一》

3. 中國朝代的年號及干支紀年使用漢字,其後加括號標出公元年代,但不寫出“公元”、“年”字。如:

乾道六年(1170),元狩四年(前 119)

4. 數字作爲詞素構成定型的詞、詞組或慣用語。如:

相差十萬八千里,十之八九,四分五裂

5. 帶有“幾”字的數字。如:

幾千年以來

七、文內標點符號用法

(一) 標點符號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爲依據。

(二) 連接號“—”爲短橫(一字綫),占兩個字符。

如:中國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屬溫帶季風氣候。

(三) 引文或行文中的省略號,前、後均不加逗號或句號。

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傳》:“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

八、表格需注明表題,文中含一個以上的表需注明表序號,表中或表後應注明資料來源。

如:

表 1 明天啓元年(1621)北京五城鋪甲戶數統計表

五城	鋪數	甲數(名)	戶數(戶)
中城	53	2544	25440
東城	173	3608	36080
南城	135	4330	43300
西城	101	3764	37640
北城	63	873	8730
合計	525	15119	151190

資料來源:《明熹宗實錄》卷九。

九、注釋格式

(一)注文採用頁下注,每頁連續編號。

(二)注號採用阿拉伯圓圈數字,如:①、②、③。

(三)正文中的注號,無論隨文還是提行引用,一律標注在引號、逗號、分號、句號的後面。

(四)徵引古籍

1.徵引古籍標注一般順序:撰寫時代/撰寫者/著作名/卷數/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社名中已標示其所在地者,可不必再標地名)/出版社/年份/頁碼。影印古籍、未經今人整理的古籍亦出冊頁。撰寫者時代以[]標出。如: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1冊,45頁。

2.習見古籍如二十四史、十三經、十通、《太平御覽》等書,徵引時可不出撰寫者時代和撰寫者。如: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406頁。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唐紀一》貞觀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5777頁。

(五)近人專著標注一般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年份/頁碼。

1.多卷本著作標明卷名,多人撰寫的著作應標出具體責任人。如:

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上冊,第1章《緒論》(林甘泉撰寫),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8頁。

2.文集責任者與析出文獻責任者相同,省去文集責任者。如: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78頁。

3.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相同,但字面關係不明,可在文集前加上“收入其著”。如:

齊思和:《毛詩穀名考》,收入其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24頁。

4.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不同,應標出責任人。如:

顧頡剛:《九州島之戎與戎禹》,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選編《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01頁。

5.期刊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同名异地刊物應有區別說明。如:

潘明娟:《從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關係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

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臺北)第28卷第1期,1976。

6.報紙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報紙名稱、出版年月日/版次。如:

楊伯達:《東北夷玉文化板塊的男覲早期巫教辨》,《中國文物報》2008年4月9日第7版。

7. 網絡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網站名稱/年月日。如:

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修訂稿),簡帛網,2008年4月5日。

(五) 外文文獻標注順序。西文專著: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著作名用斜體,出版地點後用英文冒號,其餘各項間用英文逗點隔開。西文期刊: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卷冊及出版時間。著作名用英文引號標出,期刊名用斜體。引文跨頁用“pp. X-X”。日文、韓文等專著和期刊標注方式基本相同。日文、韓文等中的漢字請遵照其本來寫法,如發展的“發”,日文寫作“発”;“變”寫作“変”,“學”和“國”仍用簡體等。如:

T'ung-tsu Ch'ü, *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121.

Brai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37-7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挙前史》,京都:同朋舍,1971,179頁。

中村圭爾:《魏晉時代における“望”について》,《中国-社會と文化》2,1987,25頁。

方東仁:《韓國의國境綫劃定研究》,首爾:一潮閣,1997,100頁。

金文植:《조선후기 지식인의 자아인식과 타자인식》,《大東文化研究》39,2001,19頁。

(六) 譯著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與責任方式/翻譯者/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責任者和翻譯者間用逗點間隔。

譯文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翻譯者/著作名/刊名/出版時間或卷冊。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以書代刊出版物標出出版單位和時間。如:

[英]柯林伍德(R.C.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55頁。

[德]科卡(Juegen Kocka)著,景德祥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居延漢簡補編〉的出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567頁。

十、各朝代的簡帛資料,參照所引底本內容、格式、符號、標記、編號照錄,或采用通行方法,如《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405頁)附錄的“吳簡徵引格式”。引用簡牘是否斷句、加標點,不做統一要求。

十一、其他

(一)凡徵引文獻以“參見”、“詳見”、“并見”等引導,責任人直接與文獻連接。如:

參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2頁。

(二)同一文獻再次引用時,注釋中祇標出責任者、著作名和頁碼。一律不採用“前揭”、“前引”、“同前注”、“同上注”等。

(三)出版物的出版時間均採用公曆。

(四)需要標出基金項目、資助等,在文章標題後加注,注釋符號為“*”號,在頁下腳注寫出說明性文字。

(五)文稿附加文字如鳴謝等置於全文後,另段標出。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的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論著評論；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本刊祇接受首發投稿。已在正式出版物和網絡上刊發者，均不視為首發。

四、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五、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六、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七、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八、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以便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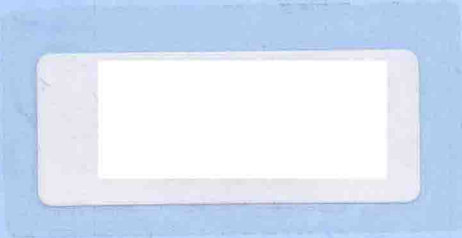
來函請寄：

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

莊小霞 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126.com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環珠重聯
箇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烺學書



ISBN 978-7-5495-8491-8



9 787549 584918 >

定價:10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简帛研究 2016 春夏卷

作者=杨振红, 邬文玲主编

页数=370

SS号=14169948

DX号=

出版日期=2016.06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